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 民 出 版 社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譯出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編譯、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譯校过程中参考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6 $\frac{5}{8}$ · 插页 9 · 字数 627,000

1962 年 4 月第 1 版

196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526 定价 (四) 2.60 元

目 录

第十卷說明	IX—XXVI
弗·恩格斯。欧洲战争.....	3—8
卡·馬克思。*西方强国和土耳其	9—19
卡·馬克思。*东方战争	20—31
卡·馬克思。*东方的軍事行动。——奥地利和法国 的財政。——君士坦丁堡的設防	32—38
弗·恩格斯。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	39—42
卡·馬克思。*沙皇的观点。——阿尔伯特亲王	43—47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君士坦丁堡的設防。—— 丹麦的中立。——英国議会的成分。——欧洲的 歉收	48—55
卡·馬克思。*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俄国的战 时財政	56—60
卡·馬克思。*藍皮书。——二月六日的議會辯論。 ——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軍舰队的行 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議会的召开	61—68
卡·馬克思。*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問題的藍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編者注

- 皮书。——門的內哥罗69—76
- 弗·恩格斯。欧洲战争問題77—81
- 卡·馬克思。*普魯士內閣的声明。——波拿巴的計
划。——普魯士的政策82—84
- 卡·馬克思。議會辯論.....85—99
- 卡·馬克思。*二月二十二日的議會辯論。——波茨
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西方强国的政策.....100—109
- 卡·馬克思。奥地利的破产110—116
- 卡·馬克思。*法国和英国的軍事計劃。——希腊人
暴动。——西班牙。——中国117—124
- 卡·馬克思。*工人議會开幕。——英国的軍事預算125—132
- 卡·馬克思。給工人議会的信133—134
- 卡·馬克思。工人議會.....135—139
- 卡·馬克思。希腊人暴动140—142
- 弗·恩格斯。俄軍从卡拉法特撤退143—147
- 卡·馬克思。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148—159
- 卡·馬克思。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160—177
- 卡·馬克思。*宣战。——关于东方問題产生的历史178—187
- 卡·馬克思。議会的战争辯論188—199
- 卡·馬克思。*俄国和德意志强国。——粮食价格200—206
- 弗·恩格斯。双方軍队在土耳其的态势207—211
- 卡·馬克思。*列施德-帕沙的照会。——意大利报
紙論东方問題212—216
- 卡·馬克思。*希腊和土耳其。——土耳其和西方强
国。——英国粮食貿易的縮減217—220

- 卡·馬克思。*希腊人暴动。——波兰侨民。——奥地利—普魯士条約。——关于俄国武装的文件……221—227
- 卡·馬克思。*炮击敖德薩。——希腊。——門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費尔的演說……228—235
- 卡·馬克思。不列顛的財政 ……………236—243
- 弗·恩格斯。輝煌的胜利 ……………244—248
- 卡·馬克思。*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在苏格兰对領地的清扫 ……………249—254
- 弗·恩格斯。战争 ……………255—261
- 弗·恩格斯。英国军队的現狀及其战术、服装置备、軍需部等等 ……………262—268
- 卡·馬克思。*奥地利—普魯士条約。——五月二十九日的議会辯論 ……………269—274
- 卡·馬克思。*英国特別的陆軍部的成立。——多瑙河上的軍事行动。——經濟状况 ……………275—281
- 卡·馬克思。*英国軍事部門的改組。——奥地利的要求。——英国的經濟状况。——圣阿尔諾 ……………282—288
- 弗·恩格斯。对錫利斯特里亚的圍攻……………289—302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俄土战場的形勢 ……………303—309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俄軍的撤退 ……………310—314
- 卡·馬克思。战争。——議会辯論 ……………315—323
- 卡·馬克思。*馬德里的起义。——奥地利—土耳其条約。——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324—333
- 弗·恩格斯。多瑙河战争 ……………334—339
- 卡·馬克思。*馬德里起义的細节。——奥地利和普

- 魯士的要求。——奧地利的新公債。——瓦拉几亞 ……340—348
- 卡·馬克思。*意大利的緊張。——西班牙事件。
——德意志各邦的立場。——英國法官 ……349—359
- 卡·馬克思。*維也納會議。——奧地利的公債。
——杜耳塞和奧當奈爾的文告。——英國的內閣
危機 ……360—367
- 卡·馬克思。西班牙的革命。——土耳其和希臘 ……368—374
- 卡·馬克思。議會的戰爭辯論 ……375—382
- 卡·馬克思。*奧地利的政策。——下院的戰爭辯論 ……383—394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無聊的戰爭 ……395—400
- 卡·馬克思。埃斯帕特羅 ……401—408
- 弗·恩格斯。對俄國要塞的攻擊 ……409—411
- 卡·馬克思。*撤出多瑙河各公國。——西班牙事
件。——丹麥新憲法。——憲章派 ……412—419
- 卡·馬克思。*撤出莫爾達維亞和瓦拉几亞。——波
蘭。——西班牙人民的要求 ……420—426
- 卡·馬克思。*東方問題。——西班牙的革命。——
馬德里報刊 ……427—434
- 卡·馬克思。*西班牙的革命。——博馬爾松德 ……435—441
- 弗·恩格斯。博馬爾松德的奪取(第一篇論文) ……442—446
- 弗·恩格斯。博馬爾松德的奪取(第二篇論文) ……447—451
- 卡·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 ……453—511
- 一 ……455—464
- 二 ……465—471
- 三 ……472—477

四	478—483
五	484—488
六	489—498
七	499—504
八	505—511
卡·馬克思。西班牙的反动	512—518
卡·馬克思。*馬志尼被捕的傳說。——奧地利的强 制公債。——西班牙。——瓦拉儿亚的状况	519—524
卡·馬克思。*联軍舰队的活动。——多瑙河各公国 的局势。——西班牙。——英国的对外貿易	525—534
弗·恩格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	535—544
弗·恩格斯。克里木的消息	545—550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騙局	551—555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騙局。 ——概評	556—559
弗·恩格斯。阿尔馬河会战	560—565
弗·恩格斯。俄国的兵力	566—571
弗·恩格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圍攻	572—576
弗·恩格斯。克里木战局	577—585
弗·恩格斯。巴拉克拉瓦会战	586—593
弗·恩格斯。因克尔芒会战	594—599
弗·恩格斯。克里木战局	600—606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战况的进展	607—614
弗·恩格斯。奧地利的兵力	615—619
卡·馬克思。克里木战局的回顾	620—625

卡·馬克思。报刊和軍事制度	626—629
弗·恩格斯。英軍在克里木的災難	630—636
卡·馬克思。工商业危机	637—645
卡·馬克思。*四項條款	646—651
卡·馬克思。英国工商业的危机	652—657
卡·馬克思。啤酒店主和禮拜日例假。——克蘭里 卡德	658—660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評塞瓦斯托波爾的圍攻	661—663
卡·馬克思。維也納談判的真正目的。——反普魯 士的辯論。——雪球暴動	664—666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遺稿

卡·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一組論文中未发表过 的片断	669—672
弗·恩格斯。喀琅施塔得要塞	673—679

附 录

英国資產階級	683—688
注釋	691—749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750—765
人名索引	766—806
期刊索引	807—811
地名索引	812—824

插 图

- 載有卡·馬克思給工人議会的信的“人民报”原版的一部分134—135
- 錫利斯特里亚的圍攻和因克尔芒会战的軍隊配置的示意图291
- 馬克思摘有西班牙历史材料的一本筆記本的首頁457
- 卡·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一組文章中未发表的手稿的一頁486—487
- 1854年克里木战区537
- 弗·恩格斯的“俄国的兵力”一文的准备材料的一頁570—571
- 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多瑙河、克里木、高加索三战区620—621

第十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收集了他們在 1854 年 1 月至 1855 年 1 月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其中絕大部分曾經在美国的进步报纸“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过。馬克思寄給“論壇报”的文章，有一些是同时在宪章派报纸“人民报”上发表的，而且为了使英国工人讀者易于理解，有时还作些修改。从 1855 年 1 月起，馬克思也利用他和恩格斯寄給“論壇报”的那些文章上的材料，开始为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撰稿。为“新奥得报”撰稿使馬克思有可能向德国讀者闡明国际政治、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經濟发展和内部状况的重大問題，以及关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論著述，占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这个时期进行的大量的多方面的科学政治活动的很大部分。馬克思认为进一步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論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此他在政治經濟学方面繼續进行研究。恩格斯的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軍事史和軍事理論以及語言学。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研究过程中作出的許多結論和总结，都反映在他們为“論壇报”和其他报纸所写的文章中。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这些文章，大部分是論述欧亚两洲最重要国家中当时发生的事件以及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的。这些文章是运用唯物主义辯证法来分析当代主要問題的光輝范例。

馬克思和恩格斯力求通过自己在报上发表的文章，通过同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的通信，来論证无产階級在国际生活的最重大的問題上以及在欧洲各国的內政問題上的立場。馬克思主义奠基人規定了无产階級在大多数国家的工人运动还没有超出一般民主运动的条件下的行动綱領，并且针对当时的基本任务和各国不同的条件，具体地闡述了关于无产階級的先进作用的学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因为沒有可能像他們曾經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許多文件中以及在“新萊茵报”上那样全面公开地論证无产階級的策略，所以現在只好有时采用諷喻的笔法在偶尔写的分析具体事件的文章中来表述自己的策略原理。

1854年至1855年，由于克里木战争，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注意国际关系和各个战区上的軍事行动的进程。第十卷中的許多文章都是論述这两大問題的。在本卷中，評述各資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的經濟发展和政治生活以及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占有特殊的位置。有很大一部分文章是談1854年西班牙革命事件的。馬克思的“革命的西班牙”这一組文章就屬於这一类，它叙述了十九世紀初西班牙資产階級革命的历史。

在研究欧洲各国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对外政策以及研究外交談判各阶段和軍事行动的进程时，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根据工人运动、革命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前途，根据革命利益来分析每一个問題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像在1848—1849年时那样，认为沙皇制度是欧洲封建专制的反动派的主要支柱。他們认为，推翻沙皇制度并消除它对欧洲的反动影响，是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階級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是民主地解决德国、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和欧洲其他国

家历史发展的根本問題——1848—1849年革命过程中所沒有解决的問題——的必要条件。

同时，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看到，英法統治階級切身需要把沙皇制度作为一支反革命力量保存下来，不希望它彻底崩潰，害怕它的崩潰会給欧洲带来革命的后果，并且认为这样对自己的統治地位将是一种威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中說明，英国寡头政体和法国波拿巴政府的計劃，只是想把俄国当作爭夺近东领导权的对手除掉、确立自己在巴尔干和黑海地区的統治、削弱沙皇俄国的軍事力量。根据这个計劃，英法政府的主要努力就在于尽可能防止战争的扩大，使軍事行动的范围局限在作为它們爭夺对象的那些地区內。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这种为英法統治階級的私利而进行的有限战争的計劃，他們提出了欧洲各族人民起来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战争的口号。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制定无产階級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策略时的出发点是：如果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是一次全欧性质的战争，那末它一定会在欧洲各国引起一个新的革命高潮，使这些国家的反人民的专制制度复灭，使欧洲被压迫的民族获得解放；在这些条件下，已經开始的战争就会变成各族人民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战争。这种战争也会加速俄国本国革命形势的成熟，促进反抗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革命的到来。

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进行革命战争反对沙皇制度的口号，必然会引起欧洲的革命运动，使欧洲各国的人民群众起来反对本国政府。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場同那些欧洲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的民族主义立場的原則区别，后者支持英国和法国的反革命政府，认为它們同俄国的战争就是“自由同专制的战争”。

(見本卷第 283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克里木戰爭時期的策略，是他們在 1848—1849 年的策略的繼續，那時他們已經在“新萊茵報”上号召進行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戰爭。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這個策略是 1789—1871 年這個時代的客觀歷史條件所要求的，因為當時首要任務就是徹底消滅專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在推翻封建制度、專制制度和異族壓迫以前，根本談不上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的發展。”(見“列寧全集”1959 年中文版第 21 卷第 280 頁)

在本卷第一篇論文即恩格斯的“歐洲戰爭”的文章中，明確地提出了進行革命戰爭反對沙皇制度以及革命地改造歐洲的口號。這篇文章是因 1854 年 1 月英法艦隊陳兵黑海而寫的。恩格斯在這篇文章中指出英法統治階級想要進行的反對俄國的戰爭和為了民主改造歐洲所必須進行的反對沙皇制度的真正革命戰爭之間的根本區別。恩格斯深信，當第六強國即革命出現的時候，戰爭的情況、條件和性質就會發生變化；革命將使所謂五“大”強國全都附屬於它，並使每個強國戰慄不已。文章認為，不管英法政府的願望如何，已經開始的軍事行動可能成為歐洲革命的推動力。而歐洲的經濟和政治的發展、階級矛盾的增長、工人和勞動群眾的強烈不滿已為這一革命準備好基礎。在恩格斯的“戰爭”這篇文章中，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戰況的進展”這篇文章中，也闡述了這一思想。這一思想也是他們論述戰爭的其他文章的基礎。

馬克思主義奠基人制定了無產階級在克里木戰爭時期的策略，並針對不同國家的特殊條件，加以發展並使它具體化。他們特別注意當時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認為英國的革命發展前途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馬克思主義奠基人在文章中分析了英國的

經濟和政治狀況，分析了英國社會各個階級及其政黨對克里木戰爭的態度，同時不斷地揭露英國統治階級及其政黨輝格黨和托利黨的对內對外政策。馬克思和恩格斯說明，英國的統治階級通過自己的对內政策來阻礙英國人民的進步，在對外政策方面，則遵照自私的階級利益，只是力圖把沙皇制度削弱，却把這個歐洲的反動支柱保存下來。揭露英國整個政治制度和各資產階級政黨的立場，尖銳地批判英國外交和作戰方法，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英國統治階級政策的那些文章的基本內容。

馬克思在論文中指出，資產階級貴族寡頭政體在東方問題上的政策的特点是英國外交素有的、並成了英國外交的傳統特色的那種背信棄義。馬克思在“關於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來”這兩篇文章中，根據對許多外交文件的詳細分析，揭露了英國的一些國家活動家在戰前時期多次企圖同沙皇政府達成瓜分土耳其的協議，以保證英國在近東占有決定作用的地位。馬克思的結論是：如果沙皇俄國和英國瓜分土耳其的行動不會引起必不可免的對法戰爭，而對法戰爭又不會引起歐洲的革命，那末英國政府准會以同樣的胃口把土耳其和俄國一起吞掉。（見本卷第174頁）

恩格斯曾應馬克思的請求寫了許多軍事評論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作為社論發表。這些文章批評了英國政府的作戰方法。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這種批評是他們揭露英國寡頭政體這一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也把一部分評論發表在憲章派的機關報“人民報”上，認為這是鼓動英國工人反對統治階級政策的方法之一。

從恩格斯的軍事論文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是一個大軍事專家，

是一个精通軍事的人。他在“战争”、“英国军队的現狀及其战术、服装置备、軍需部等等”、“英軍在克里木的災难”等許多文章中揭露了英国軍事制度的保守性，指出了英国的軍事落后于英国的总的資本主义的发展。恩格斯在“欧洲战争問題”、“俄軍从卡拉法特撤退”、“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以及其他許多文章中，研究了战局的进程，說明了交战国的实力，分析了各别的战役。第一次发表的恩格斯的手稿“喀琅施塔得要塞”是很值得注意的。恩格斯在“因克尔芒会战”、“战争”、“克里木战局”这些文章中，高度评价了俄国兵士的英勇精神，同时也严厉地批評了地主俄国的軍事的落后、很大一部分将官的无能以及在沙皇军队中所采用的“閱兵操练”制度。

恩格斯的很大一部分文章是論述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圍攻的，他认为这是战局的新阶段（“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圍攻”、“評塞瓦斯托波尔的圍攻”等）。在1854年10—11月所写的文章中，恩格斯根据联軍在数量上的优势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的薄弱，认为城市可能即将陷落。但是，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英雄气概以及他們所表现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使以前在向陆一面沒有設防的塞瓦斯托波尔能够长期防守。因此，恩格斯在1854年12月底和1855年1月初就指出：“不設防的城市早已成为第一流的营垒了”，（見本卷第624頁）由于俄軍的努力，目前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固，用强攻来占領它已完全不可能了。（見本卷第662—663頁）

在本卷以及在本版第九卷、第十一卷中所发表的恩格斯論克里木战争的文章，包含了軍事学术史、軍事理論、战略和战术等方面的极有价值的材料和理論性的結論。这些文章反映了馬克思主

义軍事思想的形成的重要阶段，反映了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总结当时战争經驗方面的重要阶段。但是，我們在讀恩格斯的軍事論文时必须考虑到：恩格斯当时手中有的往往只是西欧資產階級报刊的故意歪曲的报道，而且軍事評論是紧随事件的发展而写成的，所以沒有時間也不可能核对这些关于軍事行动进程的消息，因此有时片面地估价了某些战役，例如西諾普会战、博馬尔松德的夺取。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英国寡头政体的对外政策的同时，还揭穿了資產階級貴族英国的整个政治制度的反人民的实质。馬克思在关于議會辯論的許多文章中，出色地批判了英国現行的两党制。他強調指出，輝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在对外政策問題上的斗争，只不过是粉飾門面而已，因为每个政党“都不願去破坏自己的政敌的政治‘声誉’……以免統治階級的統治的基础遭到破坏”。（見本卷第 62 頁）这里所发表的馬克思的許多論文，都是針對具体的人即当时英国的国家活动家而写的。馬克思繼續他早就开始的对英国寡头政体的著名代表人物如帕麦斯顿、罗素、阿伯丁、格莱斯顿等人所执行的政策的揭露。

至于談到在战争年代英国議會中各个政党和派別的立場，馬克思指出，議會中的自由主义爱尔兰議員团（所謂爱尔兰旅）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很不光彩的。馬克思指出这个議員团的代表实质上出卖了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运动。爱尔兰旅时而支持英国这个政党，时而支持英国那个政党，从它們那里爭得一些让步，滿足自己的私利，但决不阻止英国殖民主义者对爱尔兰的压迫。它“从来沒有阻止过任何一次对爱尔兰的卑鄙无耻的行为和对英格兰人民的不公正的行为”。（見本卷第 67 頁）

許多文章如“議會辯論”、“戰爭。——議會辯論”、“議會的戰爭辯論”等等都分析了各色各樣的議員在議會中就作戰、預算、個別改革草案等問題所發表的言論。有幾次下院會議是馬克思親自出席旁聽的。他用具體事例無情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揭露它的荒淫腐朽，戳穿統治的政治制度，揭示英國議會制的階級實質和資產階級議員所固有的虛偽和欺詐。馬克思在“不列顛的財政”一文中分析了財政大臣格萊斯頓所提出的軍事預算，強調指出：最後結果，人民群眾只得為戰爭付出代價。馬克思的許多論文尖銳地批判了英國的資產階級報刊。

馬克思在好幾篇文章中尖銳地批判了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自由貿易界代表人物的言論。這些代表人物糾集在自稱“和平擁護者”、反對同俄國作戰的所謂曼徹斯特學派的周圍。馬克思指出，自由貿易派的這種立場決不是出於真誠地愛好和平，而是由於他們深信英國通過和平手段，不花作戰費用也能够在世界市場上確立自己的壟斷地位。自由貿易派根據英國商品向俄國市場輸出的日益增長，證明資本家英國和地主俄國的利益是一致的。馬克思強調指出，自由貿易派的首領科布頓和布萊特作為“和平保衛者”所發表的言論，實際上表明了他們在保衛 1815 年在歐洲建立起來的、有利於大國的反動統治集團而違背各國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制度。因此，英國工業資產階級儘管打着和平主義的旗號，實際上同英國貴族寡頭政體一樣，是民主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敵人。馬克思指出，科布頓們和布萊特們用來掩蓋他們對革命的仇恨和他們保存沙皇制度這種反動勢力的企圖的虛偽的愛和平，暴露了“歐洲資產階級的下流卑鄙的靈魂”。（見本卷第 44 頁）

馬克思批判了英國自由貿易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的立場以

后，又尖銳而严厉地批判了他們的对内政策，他們作为人民群众的“保卫者”所发表的装装样子的言論。馬克思在“工商业危机”和“英国工商业的危机”这两篇文章中，揭露自由貿易派是工人階級的凶恶敌人。他写道，科布頓們和布萊特們假惺惺地抱怨战争使“基督徒互相殘杀”，但同时他們又贊成无止境地剝削工人，千方百計地达到廢除限制妇女和儿童工作日的那些法律。馬克思揭露了自由貿易派想用偶然原因，例如用战争的影响来解釋在英国日益扩大的經濟危机的这种恶劣的意图。自由貿易派企图挽救他們那种把廢除谷物法和采用自由貿易原則当作制止工商业危机的灵丹妙药的教条。

馬克思在論資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的經濟发展的一些文章中，推翻了自由貿易派和其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观点。当时他依靠的是大量的統計資料和平日对当前經濟資料的研究和綜合——馬克思写作他的主要經濟學著作，未来的“資本論”的巨大准备工作的一部分。馬克思根据他所发现的資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規律，证明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是站不住脚的。他強調指出，在英国出現的危机現象是具有对抗性矛盾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尽管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个别生产部門的发展，可以为了战争目的利用一部分游資，但这些危机現象还是出現。馬克思指出了当时已經表現出来的英国經濟的特点，即它同世界市場的紧密联系；由于英国商品向其他国家輸出的日益增长，英国工业以及它所受的震蕩对整个世界經濟的影响就扩大了。

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义經濟的周期性发展时，得出結論說：从1849年开始的英国經濟的繁荣时期不可能无間断地繼續下去，1853—1854年期間在英国經濟中出現的危机現象将发展为严重

的經濟危機。1857年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馬克思把當前的危機同歐洲掀起工人運動和革命運動的新高潮的可能性聯繫起來。

關於英國工人運動的文章，如“工人議會開幕。——英國的軍事預算”、“給工人議會的信”、“工人議會”等在本卷中占有特殊的位置。馬克思和恩格斯好多年一直同憲章運動保持緊密聯繫，並且直接參加了這個運動。在五十年代的上半期，他們幫助革命憲章派爭取在新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恢復憲章主義。馬克思在文章中用淺近的話敘述了在憲章派刊物上發表的材料，宣傳革命憲章派的領袖厄·瓊斯的演說，幫助憲章派向勞動群眾揭露英國議會的階級性。馬克思在“君士坦丁堡的設防。——丹麥的中立。——英國議會的成分。——歐洲的歉收”一文中，分析了議會的社会成分和現行的選舉制度，並且指出英國社会中人數最多的階級——無產階級——實際上被剝奪了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和可能性。馬克思主義奠基人堅決地向英國無產階級提出了建立群眾性的、真正革命的政黨的任務。馬克思在給工人議會的賀信中，提出了偉大而光榮的目標：“在全國範圍內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見本卷第134頁）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中強調指出，英國無產階級只有組織全國性的政黨，才能獲得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才能為反對“現代統治階級的特權以及對工人階級的奴役”而鬥爭。（見本卷第126頁）

編入本卷的文章有很多篇幅是論述法國、法國的對內對外政策和法國在克里木戰爭中的立場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評價這種立場時依據的論點是：波拿巴政體——依靠軍隊的資產階級專政政體——的性質本身必然使拿破侖第三走上軍事冒險的道路。馬克思寫道：“不是國內革命就是對外戰爭——他再沒有別的出路

了。”（見本卷第 109 頁）他屢次強調指出，波拿巴法國在克里木戰爭中扮演了主謀者之一的角色。他指出：“現在東方危機的真正根源是波拿巴的篡位。”（見本卷第 72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拿破侖第三及其黨徒們害怕歐洲革命並不亞于英國寡頭政體，因此他們也贊成有限戰爭。法國波拿巴政府正像不列顛聯合內閣一樣，在戰爭中追求的是自私的掠奪的目的，這在法國統帥部的軍事計劃和行動中表現出來。馬克思在文章中系統地揭露了法國政府的陰謀，抨擊了煽動群眾的沙文主義狂熱的波拿巴主義的騙人口號。他堅決反對某些資產階級民主派想把路易·波拿巴當作民主的保衛者，當作“自由的代表人物”的企圖。（見本卷第 283 頁）馬克思揭露了拿破侖第三的反民主反人民的政策，並且痛斥了“十二月政變的文明”的血腥手段。（見本卷第 559 頁）在“英國軍事部門的改組。——奧地利的要求。——英國的經濟狀況。——聖阿爾諾”一文中，馬克思以卓越的抨擊性文字畫出了一個“負拯救文明之責”的人，即波拿巴法國統治集團的典型代表聖阿爾諾元帥——賣身求榮的野心家，路易·波拿巴的恬不知恥的走狗——的嘴臉。

在法國工人運動遭到失敗的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特別的關切和同情注視着法國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命運，首先是被看做是法國工人階級傑出領袖的奧古斯特·布朗基的命運。這方面很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用俄文發表的“塞瓦斯托波爾的騙局。——概評”一文中把奧·布朗基同在克里木戰爭時期作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情緒俘虜的阿·巴爾貝斯對比的那一部分。

編入本卷的馬克思的許多文章都對普魯士的對內對外政策和它在克里木戰爭中的立場作了尖銳的批判性的分析。這方面的文

章有：“普魯士內閣的声明。——波拿巴的計劃。——普魯士的政策”、“俄国和德意志强国。——粮食价格”、“炮击敖德薩。——希腊。——門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費尔的演說”、“奥地利—普魯士条約。——五月二十九日的議會辯論”等等。馬克思是从解决 1848—1849 年革命所沒有解决的德意志的主要历史任务——成立統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的任务——的观点出发去研究普魯士在战争中所应采取的立場問題的。馬克思认为，普魯士参加对沙皇俄国的战争，可能成为德意志民主运动新高潮的直接推动力，而工人阶级在这个运动中应起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群众的发动的結果将是推翻普魯士和其他德意志各邦中存在的专制政体，建立起統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国家。馬克思揭穿了反动的普魯士統治集团所制定的、对人民群众充滿了恐惧的政策，包括他們竭力要逮捕所有最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并把他們押送到东普魯士要塞，从而使他們沒有可能組織人民运动的意图。（見本卷第 82—84 頁）

馬克思在文章中特別注意分析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場。馬克思和恩格斯很重視奥地利的参战，认为軍事行动移往欧洲中部会在那里引起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就連战争本身的性质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恩格斯写道：“当战争限于西方强国和土耳其为一方同以俄国为另一方的冲突时，它就不可能成为我們在 1792 年以后看見过的那种欧洲战争”。（見本卷第 7 頁）

奥地利的参战可能使奥地利帝国——各族人民的監獄复灭，使受奥地利奴役的各族人民組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使欧洲許多国家得到民主改造。馬克思指出，“除了德国人之外，对东方糾紛的

結局有最直接利害关系的是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見本卷第214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問題的藍皮书。——門的內哥罗”、“馬德里起义的細节。——奥地利和普魯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債。——瓦拉几亞”、“俄軍的撤退”、“东方战争”等文章中根据对奥地利帝国的情况所作的精細分析得出結論說，奥地利政府在东方危机中所奉行的中立政策，是由哈布斯堡帝国反动制度的不稳固、这个帝国的外交和內政中的困难决定的。奥地利政府好像处在两团火焰中間。它不能让沙皇俄国毁灭，因为那样哈布斯堡王朝就“失去唯一能帮助它跳出最近的革命漩渦的朋友”。（見本卷第313頁）另一方面，奥地利政府又不願俄国强大，它担心俄国軍隊向巴尔干半島推进会引起受奥地利帝国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騷动，并促使他們“觉悟到自己的力量和他們在德国人統治下所受的侮辱”。（見本卷第36頁）因此，奥地利要求俄国的軍隊从多瑙河各公国撤退。此外，奥地利政府希望依靠西方强国的帮助摆脱像馬克思在“东方战争”、“奥地利的破产”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种已經非常严重的財政困难。馬克思写道，这些原因就使得奥地利政府采取了搖摆不定的立場。

馬克思在分析奥地利帝国的內部状况时指出，奥地利政府所采取的煽动受奥地利压迫的民族間的民族糾紛的政策，可以在这些民族的資產階級自由派代表的民族主义立場上，特别是在意大利自由派的立場上找到适宜的土壤。馬克思写道：“奥地利帝国长寿的秘密正是包含在这种地方性的利己主义里面，这种利己主义使每个民族陶醉于幻觉之中，以为牺牲其他民族的独立就可以为自己爭得自由”。（見本卷第215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受奥地利压迫的各个民族的命运以及加入封建的奥斯曼帝国的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命运同欧洲的革命民主改造，同必然导致这个帝国复灭并促使巴尔干半島上独立民主的国家建立的革命战争联系起来。馬克思和恩格斯同許多西欧政治活动家的意見，包括英国政論家戴·烏尔卡尔特的主張毫不触动反动的土耳其国家的意見相反，认为封建的土耳其帝国是历史进步的最大障碍，因而支持在土耳其征服者統治下的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爭取民族独立的要求。

除了論述克里木战争、分析軍事行动的进程以及与这场战争有联系的欧洲革命运动的前途的文章以外，馬克思論述 1854 年开始的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的文章，如“馬德里的起义。——奥地利—土耳其条約。——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維也納會議。——奥地利的公債。——杜耳塞和奥当奈尔的文告。——英国的內閣危机”、“西班牙的革命。——土耳其和希腊”、“西班牙的反动”等等在本卷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欧洲大陆革命运动的一切表现，认为西班牙的革命事件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們热烈欢迎西班牙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发动，认为这种发动可能成为欧洲革命的序幕。

为了更好地了解西班牙日益发展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特点以及革命中的階級力量的配置，馬克思仔細地研究了過去西班牙革命的历史，閱讀西班牙、法国、英国和德国作家的著作。馬克思在 1854 年 9—12 月在“紐約每日論壇报”发表的一組文章——“革命的西班牙”就是他研究历史的成果；这組文章深刻地分析了从拿破侖入侵到 1820—1823 年的革命为止的西班牙人民的斗争。第一次发表的这組文章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馬克思曾寄給“紐約

每日論壇報”，但是該報沒有刊登)的部分手稿是這一著作的重要補充。

馬克思論述西班牙問題的文章，是巨大的科學財富。這些著作中所作的總結，不僅闡明了西班牙歷史上的極重要事件——西班牙人同摩爾人的鬥爭，反對查理五世的專制制度、維護中世紀自由的暴動，反抗拿破侖的民族解放戰爭，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資產階級革命，卡洛斯派戰爭等等——而且使人更容易了解世界歷史上一系列共同問題。

在所有闡述西班牙革命史的文章中，馬克思首先注重的是人民群眾的作用，認為無論是專制獨裁政體、“神聖的宗教裁判所”，或者是拿破侖的軍隊，都不能摧折人民群眾的革命毅力。儘管西班牙國家乍一看來多麼死氣沉沉，在它統治下的西班牙人民的活力還沉睡未醒，拿破侖第一原認為西班牙是一具沒有生命的死屍，“但是他發現，如果說西班牙國家死亡了，那末西班牙社會卻充滿生氣，它的每一部分都洋溢着反抗力量，這使他非常不快地大吃一驚”。（見本卷第 463 頁）

馬克思很高地估計了在西班牙展開的反抗法國干涉者的鬥爭，同時辯證地揭露了這個鬥爭的矛盾特點：人民的目的是為爭取自身的解放而鬥爭，西班牙反動統治集團的意圖則是恢復專制制度和維護自己的特權。馬克思指出，這是當時所有反抗拿破侖侵犯、爭取獨立的戰爭在某種程度上所固有的現象。因此馬克思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必須把民族解放鬥爭同深刻的內部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結合起來。

馬克思拿十九世紀西班牙革命作例子，揭示了以前一切資產階級革命特有的一系列規律性。他指出了作為這些革命的動力的

人民群众的作用，同时也揭露了领导这些革命的、与人民利益格格不入的、自由資產階級领导者的不彻底性和階級局限性（这一点使革命斗争的整个发展受到深刻的影响）。馬克思指出，那些实际上仇視革命、只想把运动局限在立宪范围内的自由派分子，經常利用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偏見。馬克思在“埃斯帕特罗”这篇論文中写道：資產階級革命的特点就是：“正当人民似乎临近一个偉大的开端、一个新时代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时候，他們却让自己沉湎于过去的幻想，自动地把自己好不容易才爭得的权力、一切影响让給过去时代人民运动的真正的或者冒牌的代表。”（見本卷第 401 頁）馬克思对西班牙自由派分子所作的深刻的批判，补充了他在早期著作中对于自由主义这个十九世紀資產階級中間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派別的論断。而其中馬克思指出的西班牙革命领导者在殖民地問題上的沙文主义立場和維持西班牙对拉丁美洲領地的統治的意向，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非常典型的表現。

馬克思在分析西班牙历史时，除了揭示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規律性以外，还闡明了这个历史的特殊性，其中包括西班牙人民的民族特点和古老傳統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于是馬克思以西班牙問題为例指出：在封建制度解体和民族国家产生时期，君主专制并不是到处都起进步的作用。如果說在欧洲的一些大国中，君主专制在当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統一的基础出現的”，（見本卷第 462 頁）那末在西班牙，由于許多历史原因，君主专制不仅不能起集中統一的作用，而且还直接阻碍历史的发展。馬克思的結論是：“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純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應該列入亚洲的政体。西班牙和土耳其一样，仍旧是一堆共有一个挂名君主的治理不善的共和国。”（見本卷第 462

頁)馬克思在分析十九世紀初西班牙的历史发展的特点时指出:由于西班牙的傳統,資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即“两种社会制度之間的斗争要采取两个敌对王朝利益的斗争形式”。(見本卷第672頁)

在馬克思所写的一組文章“革命的西班牙”中过去沒有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部分手稿,包含了許多重要的理論結論,这些結論仿佛总结了这組文章的内容,給人提供了理解其中所叙述的事件的钥匙。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思想:1820—1823年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代表市民阶层利益的資產階級革命者脱离了农民群众。馬克思強調指出,如果革命的政党不善于把农民的利益同城市居民的利益結合起来,就是把农民群众排斥在革命之外,从而使农民有可能被反革命势力利用。縮小运动的社会基础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革命市民的依賴軍隊——軍隊是“对利用他們的人有危險……的工具”(見本卷第671頁)——也就是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

馬克思論西班牙的文章,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各別民族历史的光輝的范例。

* * *

本卷中收集了两篇沒有发表过的手稿——卡·馬克思的“革命的西班牙”一組論文中的片断和弗·恩格斯的“喀琅施塔得要塞”。此外,本卷中还刊載了过去沒有收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25篇文章,这些文章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在发表这些新的文章时,曾利用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庫中所保存的馬克思在1850—1854年的筆記本,其中除了其他材料以外,还有馬克思和他的妻子对寄往“紐約每日論壇报”

的文章的登录。这个筆記本和其他的資料使我們能够确定本卷中各篇文章的作者和写作年月。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曾經多次提到的，“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随意增删他們的文章，特别是那些作为社論发表的不署名的文章。編輯部竭力把恩格斯的許多文章，主要是軍事評論改成像是在紐約写的，因此在文章中加进了一些編輯部的文句；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文章甚至增加了整段的文字。在本版中我們已把显然是編輯部所作的增补放在有关篇章的注釋中去了。

在研究本卷发表的文章中所引用的具体历史材料时，必須注意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大量时事評論时所能利用的資料主要是資產階級报刊例如“泰晤士報”、“总匯通报”、“比利时独立報”以及“經濟学家”杂志等的报道。他們从这些报刊上获得关于軍事行动的进程、交战国的軍隊数量、各国財政状况等等資料。有时这些資料和以后研究所确定的資料是有出入的。

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以及其他報紙上印錯了的一些人地名、数字和日期等，本卷中已經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过的資料加以核对和訂正。

本版和全集第一版不同，在第一版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文章被分成許多部分并按照它們的標題分类，有时还整段整段的遺漏，而在本版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都按照当时报上发表的原样刊印。凡是报上沒有刊登標題而由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標題的文章，在標題的上面都加星花。

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4年1月—1855年1月

弗·恩格斯 欧洲战争¹

久待解决的土耳其问题看来终于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即一贯采取卑鄙的、无结果的拖延搪塞手段的外交，已经不能再阻挠问题的解决了。法国和英国的舰队已进入黑海，企图阻止俄国舰队对土耳其舰队或土耳其沿岸地区的袭击。沙皇尼古拉早就宣称，这一类行动对于他将是宣战的信号。现在他会不注意这个事实吗？

不能期望联合舰队会立刻攻击并消灭俄国分舰队或摧毁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和海军造船厂。相反地我们可以相信，两国外交官给两位海军上将^①的指示是这样规定的，就是以一切方法避免任何冲突。但是舰队行动的命令既经下达，海上和陆上的军事调动，便不再服从外交官的愿望和计划，而服从它自己的规律，违反这些规律，就不免使整个远征军遭受危险。俄军在沃耳特尼察被击败，这决不是外交官的意图；但是既然奥美尔-帕沙被允许有某种行动的自由，并且军事行动已经开始，那末敌对双方司令官的行动便进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监督的范围了。

因此，既然军舰已经由贝科兹停泊地起锚，便没有一个人能

^① 即邓达斯和安梅林。——编者注

說，这些軍艦将以多快的速度陷入一种无論是阿伯丁勳爵的和平呼吁，或者是帕麦斯顿勳爵同俄国的秘密勾結都不能使它們解脫出来，而它們只得在可耻的退却和坚决的战斗之間进行抉擇的境地。像黑海这样使敌对双方軍艦都难以隱蔽的狹窄而閉合的海面，恰好是在目前情况下每日都难免发生冲突的地方。此外，指望沙皇尼古拉毫不抵抗地让自己的艦队被封鎖在塞瓦斯托波尔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下一步便是欧洲战争，那末这很可能是以俄国为一方向以英国、法国和土耳其为另一方之間的战争。发生这种事变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我們不得不尽力之所及来比較一下双方胜利的机会和作战的兵力。

但是俄国会不会孤立呢？奥地利、普魯士以及依附于它們的德意志各邦和意大利各国在这一場全面战争中將站在哪一方面呢？据說，路易·波拿巴曾暗示奥地利政府：如果法国同俄国发生冲突而奥地利站在俄国方面，那末法国政府就将利用只需一点火星就足以重新燃起燎原烈火的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風潮，而且法国將试图恢复意大利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这样的威胁可能影响到奥地利的态度，可能促使奥地利尽可能长期地保持中立，但是如果发生战争，那也不能指望它长久地袖手旁观。这种威胁的本身就可以在意大利引起局部的起义，这些起义一定会使奥地利更依附于俄国，更听命于俄国。再說，这种拿破侖式的把戏不是已經演过一次了嗎？² 难道可以期望一个重新使教皇登上世俗的宝座并給那不勒斯王位准备好了后继者³的人，給予意大利人以他們追求得并不亚于脫离奥地利而独立的东西——意大利的統一嗎？难道可以期望意大利人民会莽撞地陷入这个圈套嗎？无疑地，意

大利人深受奥地利的压迫，但是他们未必会有强烈的愿望来帮助巩固这个甚至在法国本土也已经摇摇欲坠的帝国的威望并维护第一个反对意大利革命的人的荣誉。所有这些情况，奥地利政府是知道的，因此可以推测，奥地利的行动受本身财政困难的影响将比受波拿巴的威胁的影响大；同样可以相信，在决定关头，沙皇的影响在维也纳将占上风，并把奥地利拉到俄国方面去。

普鲁士企图重复它在 1780 年、1800 年和 1805 年所玩弄的那套把戏⁴。它计划建立中立的波罗的海各国或北德意志各邦的联盟，而它居于盟主的地位就可以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就可以投到许给它好处最多的那一方面。历史证明，所有这些几乎是喜剧般的企图，总是以贪婪的、动摇的、怯懦的普鲁士政府投入俄国的怀抱而结束的。这一次普鲁士也难以逃脱它那往日的命运。它将向各方伸张它的触角，将公开拍卖自己而在两个阵营之间玩弄奸计，将滤出蠓虫吞下骆驼⁵而丧失它所仅存的一点威望，将要受到打击而终于落到给价最少的人的手里，也就是说，这次将和以往各次一样，落到俄国的手里。对于俄国来说，普鲁士不是盟友，而是累赘，因为普鲁士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使自己满足，它将认为应该先使自己的军队吃败仗。

只要德意志的大邦中有一个没有卷入欧洲战争，战事就只能在土耳其、黑海和波罗的海进行。在这个期间，意义最重大的将是海战。毫无疑问，联军的舰队能够摧毁塞瓦斯托波尔并消灭俄国的黑海舰队；联军能够夺取并守住克里木，能够占领敖德萨，封锁阿速夫海并发动高加索山地居民。如果能够迅速而坚决地行动，这是再容易作到不过的了。假定这需要一个月的奋战，那末下一个月联合舰队的蒸汽舰就可以把行驶缓慢的帆力舰抛在后面而先

到达拉芒什海峡。因为留在黑海要做的事情会很容易地由土耳其舰队完成。为了在拉芒什海峡装煤和作其他准备，可能还需要两个星期。当这些蒸汽舰同法英两国在大西洋和拉芒什海峡的分舰队会合以后，联军舰队便可以在5月底以前以保证攻击成功的足够数量的船只在喀琅施塔得停泊场出现。

在波罗的海应当采取在黑海所采取的措施，是不言而喻的。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同瑞典建立同盟；必要时，还得恐吓丹麦；派出足够数量的部队在芬兰登陆，并提出只有在该省重新同瑞典合并的条件下才签订和约的保证，以发动芬兰的起义。在芬兰登陆的部队可以威胁彼得堡，而舰队则可以炮击喀琅施塔得。的确，这个要塞是一个非常坚固的障地。通向停泊场的航道几乎不容两舰并列通过，并且在通过时这些舰船的两舷要受到不仅设在主岛上的、而且设在小礁岩、浅滩和周围小岛上的炮台的轰击。不仅人员而且船只的某些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如果在制订攻击计划时预先考虑到这一点，如果决心牺牲某些舰船并且毫不动摇地坚决执行计划的话，喀琅施塔得是一定可以攻克的。它的工事的石砌体不能长久地抵御对石墙破坏力最大的佩克桑重炮⁶的集中火力。装备有一整套这种火炮的大型螺旋推进式蒸汽舰会很迅速地发挥不可抵御的威力，当然这时也得冒自己被击沉的危险。但是喀琅施塔得是俄罗斯帝国的锁钥，占领了它就会使彼得堡失去屏障，相形之下，损失三、四艘螺旋推进式战列舰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敖德萨、喀琅施塔得、里加和塞瓦斯托波尔都失守，芬兰被解放，而敌军逼临首都城下，并且俄国的一切河流和港湾都被封锁的时候，俄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它将变成束手无眼的巨人，除了根据敌人战斗的杀声忽东忽西地用自己的笨重身躯去乱撞以压倒

敌人以外，毫无办法可想。如果欧洲的海上强国能如此坚决而有力地行动，那末普鲁士和奥地利就可能彻底摆脱俄国的控制以致加入盟国。因为德意志这两大邦，只要感到国内安全，是乐于利用俄国的困难处境的。但是不可能期望阿伯丁勋爵和德鲁安·德·路易斯采取这样坚决的措施。最高当局无意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而且，一旦爆发全面战争，统帅们的机断行事的权力将大受限制，以致完全无法行动。纵然得到决定性的胜利，也会把它们归于侥幸的成功，使它们的后果尽可能对敌人无害。

在黑海的亚洲沿岸的战争可能因舰队的行动而迅速结束，但是在欧洲沿岸，战争将继续进行，不会出现长期的间歇。被驱逐出黑海并丧失了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不冒很大的危险，就不能渡过多瑙河（除非沿着去塞尔维亚的方向，在那里发动暴动），但是他们只要没有迫于敌人的优势兵力以及后方和翼侧大批部队登陆的威胁而退出瓦拉几亚，就完全可以守住多瑙河各公国。只要没有全面的军事行动，俄军就可以不放弃莫尔达维亚；因为既然霍亨和基希涅夫能保障俄军同俄国本土取得可靠的联络，翼侧和后方的佯动毕竟是意义很小的。

但是当战争限于以西方强国和土耳其为一方向以俄国为另一方的冲突时，它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在1792年以后看见过的那种欧洲战争。不过，一旦战争爆发，西方强国的无所作为和俄国的积极行动很快就会迫使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到专制君主方面。对于普鲁士，也许可以不必特别重视，因为它的军队，无论素质如何，由于自满，很可能重复耶拿的教训⁷。反之，奥地利，虽然濒于破产，虽然在意大利和匈牙利可能发生起义，它仍将是不可轻视的敌人。俄国本身则因为不得不在多瑙河各公国和高加索边境驻军，不得不

占领波兰，并派兵保卫波罗的海沿岸，特别是彼得堡和芬兰，将只有极少数的军队用于进攻战。如果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在普鲁士尚未被彻底击溃的情况下）在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能集中 50—60 万人，那末这已经多于根据合理判断所预期的数量。而对付这 50 万联合军队，单是法军就可以了，不过其将领在素质上不能比敌军将领差；在敌人中间，只有奥军才有真正名实相符的统帅。俄军的将领是不足怕的，而普军根本没有将领；他们的军官是些天生的少尉。

但是不要忘记，在欧洲还有一个第六强国，它在一定的时刻将宣布它对全部五个所谓“大”强国的统治并使它们个个战慄。这个强国就是革命。它已经长久地沉默和退却，但是现在商业危机和饥饉又把它召上战场。从曼彻斯特到罗马，从巴黎到华沙和佩斯——到处都感到有它，到处它都在抬头，从假寐中醒来。它复苏的象征是多种多样的；这些象征在各地无产阶级的骚动和不安中都可以看到。只要一个信号，这个欧洲最大的第六强国就会披戴灿烂的盔甲、手持宝剑昂然地走出来，好像密纳发女神从奥林帕斯神的头脑中出现一样。这个信号将由快要到来的欧洲战争发出，那时，对于列强均势的一切预计都要因新因素的出现而被推翻，这个新的因素将以其创造万物、永葆青春的活力粉碎旧的欧洲强国及其将军们的一切计划，正如同 1792—1800 年时的情形一样。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 月 8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2 月 2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92 号

卡·馬克思

*西方强国和土耳其

1854年1月10日星期二于倫敦

对于瑟美列先生泄露匈牙利王冠隐藏地点的責难⁸最初是由公认为奥地利警察当局机关报的維也納“士兵之友”提出来的，这就足以证明責难的虛伪了。

虽然沒有充分的根据就供出本人的同謀不是警察当局的慣例，但它的常用手法，就是把嫌疑加在无辜的人身上，以包庇犯罪的人。恐怕不能想像，奥地利警察当局既然事先已經取得了瑟美列先生的合作，会牺牲像他这样一位著名的、有影响的人物。如果秘密不是由科苏特方面的某一个人泄露的（这沒有什么不可能的），我就只会怀疑这是目前居住在巴黎的卡·鮑蒂揚尼伯爵的出卖行为。他是知道王冠隐藏地点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而且其中只有他一个人向維也納法庭請求过特赦。这件事，我想他是不会否认的。

不列顛总司令哈丁勛爵被劝收回了辞呈。关于諾福克公爵，根据“都柏林晚邮报”記者的报道，

“大家已从宮廷的复杂关系中知道一些了。暫居宮廷某职、身膺国家最高世袭爵位的某某高貴公爵在女王的筵席上多飲了一些香檳酒，于是在酒宴厅里极其体面地失去了平衡，甚至連女王陛下本人也遭了殃。发生这件可叹

的事情以后，高貴的公爵被撤了职，斯宾塞伯爵被任命为女王陛下宫廷的侍从长。”

爱尔兰旅的經紀人薩德勒先生重又呈請辞去他的內閣职务，而阿伯丁勋爵这一次接受了他的辞呈。薩德勒先生自从在爱尔兰法庭上被揭露依靠卑鄙的詭計钻入議會以后，处境已經十分困难。在这个不愉快的事件以后，“群賢內閣”⁹对爱尔兰旅的影响就不見得能加强了。

星期五和星期六在戴文郡的克勒迪頓地方发生了搶粮風潮¹⁰，这是人民对政府报纸和自由貿易派报纸所大肆渲染的繁荣的一种回答，这些报纸原来是想在辞送 1853 年旧岁时让自己的讀者們高兴一番的。

“祖国报”¹¹从特拉比曾德发来的通訊說，由于駐德黑兰的俄国代办要求解除波斯沙赫两个享有盛誉的大臣的职务，人民中开始騷动，近卫軍司令声称，如果滿足这样的要求，他将不能对社会的治安負責。这篇通訊认为，波斯沙赫正是慑于人民对俄国的憤怒，才不得不恢复了同英国代办的联系。

原来已經公开的大批外交文件，現在又加上了駐君士坦丁堡的四强国大使于 12 月 12 日共同递交土耳其政府的四强照会¹²以及德魯安·德·路易斯先生 12 月 30 日在巴黎签署的給法国駐各国外交代表的通令。仔細閱讀四强照会之后，就会理解，为什么在君士坦丁堡当知道照会已被土耳其政府接受时就开始騷动；为什么 12 月 21 日发生了暴动；为什么土耳其的內閣不得不郑重声明，恢复和平談判并不会結束軍事行动，也不会暫時停止軍事行动。事实上，正是在背信棄义而又畏縮不前的西諾普大屠杀的消息傳到君士坦丁堡，并使整个奧斯曼帝国一致呼吁要复仇之后 9 天，四

強國却心平氣和地邀請(而大不列顛和法國的大使甚至是強迫)土耳其政府,以下列條件為基礎同沙皇進行談判:恢復過去的一切條約;在有關蘇丹賜予他的基督教臣民的宗教特權的敕令中對每一強國,自然也對沙皇補充新的保證;土耳其政府委派全權代表簽訂停戰協定;土耳其政府允許俄國在耶路撒冷建立教堂和醫院,並對列強(自然也包括沙皇)負有改進本國內部行政制度的責任。土耳其政府不僅不能因俄國人的強盜行為造成的重大損害而得到賠償,相反地,俄國強迫土耳其戴了二十五年的鎖鏈將被鍛打得更結實,而且囚犯將比過去囚得更嚴。土耳其政府必須聽任這個專制君主擺布,低聲下氣地向他保證施行關於本國基督教臣民的宗教特權的敕令,並對本國內部的行政制度嚴肅地提出擔保。這樣,它必須在宗教問題上受沙皇的保護,同時必須在民政管理問題上屈從他的指導。人們則答應土耳其政府“儘快從多瑙河各公國撤軍”(克蘭里卡德勳爵還把對多瑙河各公國的占領叫做“強盜行徑”)作為它這次投降的補償,並且向它保證1841年7月13日條約¹³中的序言——對付俄國的“可靠保證”——將得到正式批准。

雖然這些無恥的“強國”表現了聞所未聞的卑鄙,竟在西諾普會戰以後幾天就迫使土耳其政府在上述的基礎上進行談判,但是這種無恥手段還是不能使他們擺脫困境。沙皇真做得過火,他絕對不能容忍歐洲任何強國稍稍觸犯他所捍衛的對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的保護權。

“泰晤士報”¹⁴駐維也納記者報道說:“奧地利曾探詢,俄國宮廷是否將反對歐洲任何一個強國對土耳其基督徒的保護。對這問題立即得到了最堅決的回答,俄國不允許任何其他強國干涉正教教會的事務。還說,俄國與土耳其政府訂立了條約,而且只能同它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還看到“旗幟報”¹⁵有这样的报道：

“尼古拉不准备接受非由土耳其君主本人直接提出的任何建議；这样他就否认了欧洲强国进行調停或干預的任何权利，并且使它們受到了不能說是不应受的侮辱。”

德魯安·德·路易斯先生的通令中唯一重要的地方就是說联合分舰队已經进入黑海，目的是希望“采取联合行动，以杜絕俄国海軍对土耳其領土或舰队作任何新的进攻”。Non bis in idem. [一事不重罰。] La moutarde après la viande. [事后人情。] 在昨天的“紀事晨报”¹⁶上刊登了該报駐君士坦丁堡記者12月30日的电訊，报道联軍分舰队已进入黑海。

“每日新聞”¹⁷写道：“大概，舰队进入黑海，只不过是要做他們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所做过的事，也就是不做什么事。”

“新聞报”¹⁸則报道說：

“英法两国舰队各有一艘軍舰接到进入黑海并挂白旗开向塞瓦斯托波尔的命令。軍舰到达該地以后必須通知俄国海軍上将：如果他駛出塞瓦斯托波尔港，将立即受到轰击。”

的确，俄国舰队在这个不十分順利的季节以及在西諾普会战建立了光荣的功績以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駛入黑海，但是沙皇不会让英法哪怕是在短期內把他从黑海排挤出去；还在1833年，他自己就已經胜利地把英法从这里排挤出去了¹⁹。如果他不以宣战来回答这个通知，就会失去他的威信。

“新普魯士报”²⁰声称：“俄国向英法宣战比俄土之間立即締結和約更有可能。”

就俄国无端攻击土耳其一事在紐里(奧尔斯脫)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我很高兴，承烏尔卡尔特先生的盛情給我寄来关于紐里

大会的报告，使我有机会向读者介绍这位绅士演说中最引人入胜的几段话。因为我已经不只一次地陈述过我对东方问题的观点，所以我认为无需再着重指出我无法同意烏尔卡尔特先生的地方²¹。我只想指出，下面的报道可以说明他的观点：

“小瓦拉几亚的农民在瓦拉几亚兵士的支援下起来反抗俄国人。在卡拉法特四周以及沿多瑙河左岸的整个地带都行动起来了。俄国的官员已经离开土尔馬耳。”

烏尔卡尔特先生说了几句开场的话以后接着说：

“在牵涉到我们最重大的利益以及我们与别国关系的问题上，没有法律的强制，没有系统的准则，没有对民族的责任，没有对任何失职或任何犯罪的制裁。这里，你们完全被剥夺了一切为宪法允许的进行影响的手段，因为你们不是被封锁了消息，就是只能听到歪曲的报道。因而，这种制度的必然后果，只能是人民被引入歧途，政府受人收买，国家遭到危害。其实，你们都敌视这个最老奸巨滑、始终不变、穷兵黩武、恬不知耻的政府，这个政府依靠了它想要颠覆的那些政府的帮助，为建立它威胁全世界的霸权开辟了道路。而我们的处境的特点在于，正如过去在雅典发生的情形一样，俄国在这个具有与它的政策完全相背的代议机构的国家内部已经找到了或是说已造成了它的势力的主要工具。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英国对这类问题一无所知。美国有个总统，享有王权素有的特权。那里还有个参议院，能监督行政权并预先了解行政法令。（注意！注意！掌声）在法国曾多次指定议会委员会去研究国事；委员会要求审阅文件，并召请外交大臣说明情况。同时，那里的人民对得到的情报都是警惕的，至少是仔细的；政府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因为这都决定着内阁和王朝的命运。在奥地利，至少还有一个了解自己臣僕行动的君主。在土耳其和俄国情况是这样：其中一个国家是民意控制政府，而另一个国家则是政府表达民族的意志。只有英国的国王没有权力，政府也没有制度，议会没有监督权，而整个民族一无所知。（注意！注意！）现在回过头来谈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目击的事实，我首先应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俄国没有力量进行威胁，它指望的只是虚张声势地把你们吓住，而绝对

不打算对土耳其作战，因为它还没有錢，甚至也沒有准备好，它希望你们擋住土耳其，使自己能乘机占領土耳其的領地；而現在俄国正期望你們迫使土耳其实现俄国旨在毁灭奥斯曼帝国的无耻的要求。（注意！注意！）俄国得到你們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帮助，又得到你們在博斯普魯斯海峡的分舰队的支援，一定能够达到它的目的。在这里，我必須請你們注意我高貴的朋友切斯尼上校的声明，同时必須弥补他疏忽的地方。他說，从渡普魯特河以前的形勢来看，土耳其比俄国强，但是他並沒有向你們說明他現在和过去对土耳其人軍事素质的高度評价。他說，即使目前由于你們的帮助俄国处于极大的优势，他仍然怀疑土耳其是否真的比俄国弱。只要具备两个条件，我就絕對不会怀疑土耳其会弱些，請你們容許我把这两个条件讲一下：第一，你們的大使和分舰队都应当召回；第二，土耳其不再以寄希望于外国人來削弱自己的力量。以后他又作了一个有些地方不很肯定的新的声明，这个声明既然出于这样高的权威（在这些問題上再沒有更高的权威了），可能使人体会不到原意，或者遭到曲解。切斯尼上校說，目前情况对于俄国可以說是很有利的，因为多瑙河已經封冻，这使它有可能把它的軍队調往保加利亚。但是它能有多少兵力調往保加利亚呢？几个月來，在歐洲听到的一直是夸大的报道，他們煞費苦心地向我們宣傳說，俄国集結了大量軍队准备軍事行动，还估計軍队人数达 15 万。人們也几乎相信 15 万人就足以占領土耳其了。不久以前我获得一个官方的消息，說渡过普魯特河的軍队人数总共只有 8 万，而其中因病死亡或住院的就有 2—3 万人。我曾将这个消息寄給一家报纸，但是沒有刊登，因为他們认为消息不确。現在，俄国自己公布了一个消息，說軍队的总数已縮減到 7 万人。（掌声）我們假如不談两个帝国調动自己全部軍队后兵力的对比情况，那就應該明白，只有这样数量的軍队，俄国是不打算作战的。而土耳其有多少兵力用来抵抗呢？以前在巴尔干和多瑙河之間土軍人数不下 18 万，現在則已增加到 20 万，他們所駐守的陣地也十分坚固，而俄軍人数在縮減，最多也不过 5 万人，并且因为疾病和潛逃，士气不振。关于土軍的素质和他們比俄軍优越的地方，你們已經听过貝姆將軍的证明，而切斯尼上校也是一个目击者，他的話已經由引起整个歐洲惊讶、贊叹的事件证实了。請注意，我們現在关心的不是两个帝国力量对比的問題，而是其中俄国的意图和行动方式。我认为，俄国不准备打仗；因为，一方面它沒有准备好必要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可以寄希望于英国内閣。俄国以前不想打，現在也不想打。还在軍

事行動開始之前，我就說過，俄國將在英國幫助下侵入並占領多瑙河各公國。為什麼我能預見到這點呢？當然，這並不是因為我知道了俄國的意圖，對於這種意圖許多人都同我一樣知道，或許比我知道得更清楚，而是因為我知道英國在充當一個什麼樣的角色。不過現在我們再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太重要了，不能不談。切斯尼上校說，關鍵在於俄國配備普魯特河對岸的預備隊。最近他聽到了許多關於這支預備隊的消息。有人說，奧斯坦-薩肯為了報沃耳特尼察失敗之仇，帶了5萬兵士完全以行軍隊形開到多瑙河。後來，5萬人變成了18 000人，而最有趣的，連這18 000人也沒有到達目的地。（笑聲和掌聲）如果我們以切斯尼上校所說的75 000人這一數字為準，減去死亡和患病的，還有5萬人，再加上有分身本領的預備隊中的18 000人，那末最後總共也只有7萬人，他們必須同已經作好堅固防禦工事的20萬人相抗衡，而且又是在多山地形和俄軍一貫避免作戰的季節。

現在讓我回顧一下上次戰爭，即1828—1829年戰爭中的事件。那時土耳其正發生內亂。穆斯林在殺戮穆斯林，各省發生暴動，希臘起義了，原先的軍事力量已經被殲滅，未受嚴格訓練的新兵總共只有33 000人。在納瓦林港不列顛火炮的轟擊奪走了土耳其在黑海的統治權；而且那時得到英法支持的俄國在土耳其得到宣戰消息以前突然向土耳其攻擊，直抵土耳其歐洲領地的中心。你們想，那時俄國估計需要調用多少兵力呢？216 000人。（掌聲）僅僅因為人們使用了欺騙手段，並且在英國大使（可惜，他已經回國了）的影響下，土耳其才不得已簽訂了由於突然攻擊逼出來的阿德里安堡條約。（听啊！听啊！）你們請看一下現在的土耳其，它團結一致，它充滿因人民熱愛祖國、憎恨暴力而激發的英雄氣概，它權力集中，資源豐富，它可以征召舉世無雙的斗志最高昂的30萬名志願兵，它擁有在亞洲屢獲勝利的訓練有素的25萬兵士，它擁有黑海的統治權（這種統治權絕對沒有在西諾普會戰中失去，這點我立即就要談到），它有一支蒸汽艦隊可以一無傷亡地、及時地把軍隊從帝國最遙遠的地方運送到戰場。從高加索積雪的山頭到阿拉伯荒蕪的沙漠，從非洲遼闊的原野到波斯灣——到處人們都義憤填膺，英勇不屈。（听啊！听啊！掌聲）但是，正像上次戰爭中的納瓦林戰鬥將哥薩克人引入巴爾干一樣，現在英國的螺旋槳可能甚至不經戰爭就把俄國古老的艦船引進達達尼爾海峽。不過我講的是俄國的意圖。事情的實質也就在這裡。今日的勝利應該在唐寧街取得，而不是在東方取得。然而，難道你們沒有受到損害嗎？難道今天到

会的人中間有人沒有受到严重的侵犯嗎？有誰不是付出更多的錢去买面包，不是减少了就业的机会或是投資的机会呢？（听啊！听啊！）誰的稅負沒有增加？难道交易所街^①不是像得了热病一样嗎？难道我們沒有亲眼看到因俄国軍队的进攻引起的金融市場的混乱已經相当于1847年混乱的三分之二了嗎？可是俄国还是絲毫也不想作战。难道我們沒有亲眼看到欧洲一些政府已經崩潰，暴动和混乱的前提已經产生嗎？可是俄国还是絲毫沒有作战的意图。难道我們沒有看到，奥斯曼帝国由于俄国調动了7万人的軍队（供养这些軍队既要土耳其出錢，也要大不列顛工人出錢），而供养50万人的龐大軍队弄得破了产嗎？这些情况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你們信任了那些輕信的人，他們认为，俄国非常强大，沒有人能同它較量，而土耳其又是这样孱弱，給予任何支援也无济于事。我們真是生活在充滿梦囈和神話的时代；我們不但能相信这一切，而且能够相信，俄国比联合起来对付它的全世界列强都要强大。‘泰晤士报’以輕蔑的口吻評論伊斯兰教軍队；对法国陸軍和英国海軍也估計过低，它还郑重其事地对我們說，整个欧洲加上土耳其也不見得能阻止俄軍进入君士坦丁堡，正如不能阻擋北風吹入薩尔馬特平原一样…… 議論欧洲的話同样适合于議論土耳其，但是，如果你們繼續按老样行事，土耳其定将灭亡。俄国調动了7万人，結果土耳其充滿了恐惧和憤懣，英国恐惧得发抖，俄国也在发抖，它是……狂笑得发抖。（笑声和長時間的掌声）我答应过要回头来談一下西諾普会战，或者正确地称它为小納瓦林战斗。我不想把这件不愉快的事件同我們的做法联系起来談，——我們在这次事件中的做法并不比在其他事件中的做法更丢人——我之所以談这件事，只是因为它表明了双方力量的对比。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会战一点也沒有加强俄国，也沒有削弱土耳其，相反，这次会战非常清楚地表明，俄国人有一切理由害怕土耳其人的勇敢。这里，我們看到了我国海軍史上从未有过的事迹：巡航舰同战列舰一起作战，指揮官把火炬投入火药艙而为祖国牺牲。为了反抗这个在每一个步驟上，特別在这次事件上受到每个人憎恨和厌恶的政府，他們已做到了一切。請注意，土耳其的海軍依然完整无損：沒有損失一艘战列舰或一艘蒸汽舰。現在，如果外交官員被召回，土耳其在黑海的統治权就有了双倍的保证；因为正是这些人，而且也只有这些人，造成了所謂西諾普慘剧。可是安排

① 倫敦的一條街道，交易所設在这里。——編者注

這場慘劇是別有用心的，是想以此鞭策巴黎和倫敦的掉隊的馱載的牲口，迫使它們將協議條件強加于交戰雙方。在參加這次大會之前，我聽到一位委員會委員說，如果英法希望由它們調停以保持和平，那它們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我知道他所說的是所有英國人已有的共同的想法，然而，我聽了感到很可怕。誰給予你們權利到處橫行，用武力強求和平？反抗侵略是一回事，進行侵略則是另一回事。（聽啊！聽啊！）要知道，你們除了向俄國宣戰就不能進行干預，即使是為了拯救土耳其也好。你們進行調停也還是對俄國有利，這種調停會在俄國的指使下進行，其結果是迫使土耳其接受把自己導向毀滅的條件……談判的時候也許你們建議土耳其廢除它過去與俄國簽訂的條約，讓它把希望放在全歐協議上。這種借口實際上已經提出，而且受到那些一貫對荒誕現象歡呼的國家的歡迎。上帝慈悲！歐洲協議！這就是土耳其所應期望的！可是，你們的維也納條約當然也是一種歐洲協議，而結果又如何呢？這個協議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建立了波蘭；而波蘭的情況又怎樣呢？當波蘭滅亡的時候，你們的大臣又是怎樣向你們講這個協議的呢？他是這樣說的：‘英國受權提出關於波蘭事件的意見。’接着他說，關於這個問題在事件發生以前他已經提出抗議了，又說：‘可是俄國在這時持另一種看法了。’你們現在的協議情況也會是這樣：俄國又將持另一種看法了。（熱烈的掌聲）這些話都是在下院里說的，而且就是這位過去掌握波蘭命運而今又掌握土耳其命運的大臣〈帕麥斯頓勳爵〉^①說的。不過現在已經有人預先告訴你們了，而那時你們是一無所知的……請允許我引用一下‘泰晤士報’幾天來所刊登的資料。該報報道說，我們駐波斯的公使同沙赫政府意見不一致，沙赫政府已經準備讓步了，俄國公使突然插進來企圖使爭論尖銳化。請看，結果是，就在俄國把英國排擠出波斯的同时，英國卻把俄國的統治強加于土耳其。消息提到了抵達德黑蘭的外交代表團；還說，阿富汗人非常激怒，俄國的死敵多斯特-穆罕默德對自己的代表團促使波斯支援土耳其一事的成敗十分關切。你們大概還記得，16年前，英國為了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曾向阿富汗宣戰，因為那時他是英國的敵人，是俄國的忠實盟友。也許，你們的政府相信了這點。如果真是這樣，那就太奇怪了，因為它不去同俄國作戰，而同阿富汗人作戰，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號〈〉內的話或標點符號，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譯者注

也就是將阿富汗人直接推入俄國的懷抱。可是，你們的政府沒有這樣確信；當時它十分了解，多斯特-穆罕默德，正像現在看得很清楚一樣，是俄國的死敵，正因為這個原因，你們政府就向他進攻。這個事實已經查明，而在下院也已經證明那些把多斯特-穆罕默德錯誤地說成是俄國盟友的文件完全是偽造的。英國公使本人把原件寄回國來公布了。（無恥！）這一切就是政府行動偷偷摸摸，而全國人民陷於不明情況（這點我已說過）所產生的自然而然的後果。我看在我們的會上沒有一個人不是默認這次罪行的同謀者，也沒有一個人不是因為漠視國事和國家的榮譽而墮落到奴隸的地位，雖然，他們還自以為是一個自由的人。（聽啊！聽啊！）請允許我告訴你們關於外國人對你們的一些看法。不久以前，你們已經聽到了許多關於德國人對宮廷的影響的話。你們不想听听女王的德國堂兄們的意見嗎？那末讓我告訴你們：如果德國受到俄國的影響，那末這是英國干的事。只要仔細听听下面的一段話就夠了：

‘只要英國和法國不干預土耳其的事務，土耳其就會勝利。相反，如果一味奴顏婢膝的西方強國不能停止“調停”，即不能停止干預東方的事務，那末土耳其的命運就被注定了，而莫斯科的哥薩克們不久就會成為全世界命運的主宰者！雖然外交官們罪行累累，儘管土耳其錯誤地把殺人的匪幫當作自己的朋友，但是不幸的土耳其迄今的行動畢竟是高尚的。不用說，事情不好！我時時擔心聯軍分艦隊會炮擊土耳其的首都，以挫傷它的鬥志，強迫它可恥地投降。土耳其人真的可以這樣說：《Longa est injuria, longae ambages, sed summa sequor fastigia rerum!》〔“長期沒有正義，長期受蒙蔽，可是我渴望着走向那真理的最高峰！”〕現在土耳其人的行為同英國在同樣的情況下的行為真有天壤之別！他們是在戰鬥，而英國却在做强盜。請你們回憶一下“利馬宣言”、對阿富汗的侵略、對哥本哈根的炮擊、納瓦林戰鬥，再想一想土耳其和它目前的處境就夠了。土耳其受到屈辱和威脅，甚至它的領土受人侵犯，它受到“文明世界”的挑釁，可是土耳其在所有這些遭遇面前仍然是沉着、清醒、堅強、果敢而冷靜。’

從這裡，你們可以看出，你們熱情地給我一個特權，使我能夠發泄胸中的憤慨，預告今後將發生的事情，對此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們只能枉然嘆息而已。請允許我描述一下你們目前的處境。現在不列顛有兩個特點：它對國內來講是個白痴，對國外來講是個狂人，是武裝起來的狂人，它使自己的生命和別人的生命都遭到危險。就每個人來講，你們不是這樣的人，但是加在一起你們

就是这样的人。愿你们个人的洞察力在你们中间苏醒，制服集体的狂人，目前你们还可以治疗这有病的头脑——这是万恶之源。”（热烈的经久的掌声）

对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讲话，我可以补充一点：帕麦斯顿勋爵最近一次 *coup d'éclat* [功绩] 以及他所得到的人民对他的好感，即使不能使他成为正式的首相，也能使他成为实际的首相²²。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1 月 10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4 年 1 月 28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3988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馬克思

*东方战争²³

1854年1月14日于倫敦

久待解决的东方問題看来终于尖銳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外交手段失去了左右它的力量，而且已經不能利用它进行变化无常的、永远沒有結果的活动了。1月3日法国和英国的舰队已进入黑海，企图阻止俄国舰队对土耳其舰队或土耳其沿岸地区的襲击。沙皇尼古拉有一次曾宣称，他将把这种行动看做是宣战的信号。那末，他現在会不注意这个事实嗎？今天得到的消息說，法英两国舰队的联合兵力正和土耳其舰队第一大队共同把17000名土軍运往巴士姆。如果这个消息屬实，那末这就像直接攻击塞瓦斯托波尔一样，是一种战争行为，而沙皇就只好立即宣战。

但是俄国会不会孤立呢？奥地利和普魯士在这一場全面战争中將站在哪一方面呢？

据說，路易·波拿巴曾暗示奥地利政府：如果法国同俄国发生冲突而奥地利站到俄国方面，那末法国政府就将利用只需一点火星就足以重新燃起燎原烈火的意大利和波兰的革命風潮，而且法国将企图恢复波兰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但是，可以有把握地推測，奥地利政府受本身財政困难的影响將比受波拿巴的威胁的影响更大。

最近时期，贬值的纸币流通量不断增大，其次，政府不久以前采取了一项紧急措施，以法律规定它发行的纸币贬值 15%，从这些事实中可以推断奥地利国库的情况。这种使本国货币贬值的措施，也许是在征税方面的登峰造极的发明，因为这种作法就是税上加税。根据德国报纸的报道，奥地利 1854 年的预算在经常开支方面的赤字将达 4 500 万弗罗伦，在特别开支方面的赤字达 5 000 万弗罗伦。奥地利第一百次决定借款，但是看来不会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准备借款 5 000 万弗罗伦，显然是为了支付定期债券的利息和应付其他一些刻不容缓的急需。

当联军的分舰队即将进入黑海的消息传到维也纳时，银行家们大忙了一阵，纷纷把纸币换成银币。持有 100 和 200 弗罗伦纸币的人们则拥挤在这些银行家的办公室里，力图挽救受到威胁的积蓄，然而在决定关头，圣彼得堡对维也纳的影响还是占了上风，奥地利将卷入这场即将到来的冲突并站到俄国方面。至于普鲁士，它仍企图玩弄 1780 年、1800 年和 1805 年的那套把戏，即建立中立的波罗的海各国或北德意志各邦的联盟，而它居于盟主的地位就可以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就可以投到许给它好处最多的那一方面。

毫无疑问，土耳其和欧洲的舰队能够摧毁塞瓦斯托波尔并消灭俄国的黑海舰队；联军能够夺取并守住克里木，能够占领敖德萨，封锁阿速夫海并发动高加索山地居民。在波罗的海应当采取在黑海所采取的措施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同瑞典缔结同盟；必要时，还得恐吓丹麦，派出足够数量的部队在芬兰登陆，并提出只有在该省重新归并瑞典的条件下才签订和约的保证，以发动芬兰的起义。在芬兰登陆的部队可以威胁彼得堡，而

舰队則可以炮击喀琅施塔得。

这一切都决定于欧洲海上强国的行动是否坚决有力。

12月29日的“新普魯士报”证实了俄皇命令帝国所有部队做好战斗准备的消息。他不仅从英国和法国銀行提出了他的存款，而且命令在貴族中間进行募捐，并停止修建铁路，以便把騰出来的人力和金錢用于战争的需要。

另一方面，法国比过去更加紧张地扩军；1852年的80万兵員总额中还没有征召的一半也征召入伍了。法国也早就打算发行2亿法郎（約合800万英鎊）的公債，但是粮价昂貴、葡萄歉收、生絲减产、工商业普遍停滞、对2月底的支付的严重忧虑、国家有价证券和铁路股票跌价的趋势等等——这一切情况絲毫沒有减少发行公債的困难。

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英国政府今年准备把海軍陆战队和水兵扩充到53 000人，即較去年議会通过的数字約多8 000人，較得比勋爵內閣时期所动員的人数多5 000人。因此可以說，从1852年以来海軍人数約增加13 000人。海軍将有38 000名水兵和見习水兵，15 000名海軍陆战队兵士。

西諾普会战的秘密終於揭开了。根据有关俄国和土耳其在西諾普的兵力对比的消息看来，俄国比土耳其多3艘两层甲板蒸汽舰、1艘三层甲板舰和680門火炮。因此，西諾普事件絲毫沒有使俄国的实力增强，也絲毫沒有使土耳其的实力减弱，而且可能正相反。这里我們看到了甚至在英国海軍史上也从未有过的事迹：巡航舰和战列舰排成一列，指揮官們把火炬投入火药艙而为祖国牺牲。土耳其海軍的主力依然完整无損，沒有損失一艘战列舰或一艘蒸汽舰。不仅如此，根据最近的消息，俄国舰队最好的三层甲板

舰之一、装备有 120 門火炮的“罗斯提斯拉夫号”被土軍击沉了。俄国对这个损失一直是巧言掩飾，說“罗斯提斯拉夫号”不是在战斗时而是在战斗后不久沉沒的，但现在俄国人已公开承认了²⁴。这个损失大大抵銷了土耳其舰队的损失。如果这一艘三层甲板舰确实沉入海底，那末可以推測，俄国其他舰船在战斗中也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损伤，归根到底，西諾普的胜利使俄国舰队受到了比土耳其舰队更大的削弱。埃及的帕沙一听到西諾普惨剧，就立即下令装备 6 艘巡航舰、5 艘輕巡航舰、3 艘二桅橫帆舰，以弥补土耳其舰队舰船的損失。

埃及的蒸汽巡航舰“彼尔瓦茲·巴赫里号”經過 5 小时战斗后被击坏，并被一艘比它大得多的俄国蒸汽巡航舰“弗拉基米尔号”俘获。它被炮彈打得千疮百孔，以致勉强被拖到塞瓦斯托波尔后就立即沉沒了。“彼尔瓦茲·巴赫里号”全靠輪机长英国人貝尔的帮助才开到塞瓦斯托波尔灣，海軍上将科尔尼洛夫曾經答应，如果他能順利完成这一任务，便立即让他自由。但是到达塞瓦斯托波尔后，貝尔非但没有被釋放，反而和他的助手們——輪机兵和鍋炉兵一起被严密拘禁，每日只給 3 个辨士的微薄口粮，而且俄国人还要他們在这严寒季节步行 80 英里到俄国内地去。在塞瓦斯托波尔担任指揮的緬施科夫公爵得到了沙皇和他的大臣們的贊許，后者对敖德薩的英国領事和圣彼得堡的英国大使提出的照会置之不理。大家都已經知道，在西諾普大混战中，有两只因私人事务开到該处的英国商船被毫无理由地无情地击沉了。下面是一家法国报纸发表的关于这两只船被击沉的經過的率真的报道：

“11 月 30 日，从英国南部港口比德弗德开来的‘霍瓦尔德号’二桅帆船，为奥地利駐西諾普的領事皮倫茨先生卸完煤以后，停泊在該处裝載压艙物，

准备駛往法特薩裝載谷物運往英國。突然俄國艦隊出現了，它沒有發出任何警告，也不給外國船隻以離開危險區的機會，就對停泊在該處的土耳其艦隊進行猛烈的射擊。只幾分鐘‘霍瓦爾德號’以及港內的其他商船就全部被擊沉了。”

關於這一粗暴地破壞國際法的情況在敖德薩的戰報中已公布了。同時，俄國報紙還用侮辱性的詞句宣稱，英國艦隊不敢開進黑海，英國政府也不敢阻止俄國軍艦利用英國的修船廠進行修理。

最近的一批郵件又給我們帶來了有關最近期間亞洲軍事行動的補充消息。顯然，土耳其軍隊已經被迫全部撤出了俄國的阿爾明尼亞，不過還沒有關於迫使他们撤退的那些會戰的結果的確切消息。土耳其的一個軍走的是從阿爾達汗直通阿哈爾齊赫的大路，而另一個軍則在這以南，沿着從卡爾斯經亞歷山大羅波爾（格魯吉亞語為居姆里）到梯弗里斯的道路前進。這兩個軍大概都遇上了俄軍。根據俄國的報道，這兩路土軍都被擊潰，並損失了約四十門火炮；我們沒有土耳其的官方戰報，但是據一些私人的消息說，撤退的原因是必須返回冬季營地。只有一點是無疑的，這就是除了聖尼古拉堡壘外，俄國領土上的土軍都撤退了，俄軍追擊土軍，俄軍前衛甚至大胆地進到距卡爾斯一英里的地方，但被擊退了。此外，我們知道，土耳其安那托里亞軍團是從亞洲各省——舊伊斯蘭教的野蠻統治的支柱——征召來的，其中有大量總的說來雖然強悍少見，但是既不正規又不可靠的臨時的兵士，他們是冒險家和庫爾迪斯坦的強盜；這個安那托里亞軍團同安分的、有紀律的而且受過嚴格訓練的魯美利亞軍團毫無共同之處；在魯美利亞軍團中，指揮官了解每天在他管轄下有多少兵士，是什麼樣的兵士；在這個軍團里有軍事條例和戰地法庭可以制止個人的冒險欲望和

掠夺习气。我們知道，在亚洲战局的初期曾迫切需要部队的俄国人，后来得到中将奥勃魯切夫第二指揮的第十三步兵师（16 000人）和一支頓河哥薩克部队的增援；我們知道，他們控制住了山地居民，保持住了經過高加索山脊到弗拉基高加索以及由海上到敖德薩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交通綫。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再加上土軍的司令官阿勃迪-帕沙不是一个叛徒便是一个傻子（阿勃迪-帕沙后来被召回；被派去接替他的是阿罕默德-帕沙），那末土軍的失敗就絲毫不足怪了，虽然也沒有疑問，俄軍的战报照例都是夸大的。

在多瑙河，俄軍不久以前攻击了位于該河支流上的曼成堡垒。有一艘蒸汽舰和两艘炮艇开近这个堡垒，它們遭到猛烈的炮击；据說炮艇都被击沉，蒸汽舰也受到严重损伤，因而以赶紧退却为上策。曾經发生过三、四次冲突，其中有的是卡拉法特的前哨战，有的是多瑙河的俄軍哨所和渡河偷襲的土軍小部队的接触。土軍认为自己在所有这些小規模的战斗中都占了上风。只可惜沒有更早地使用土耳其的非正規部队（它比其他任何部队都更适合于这类行动）来更积极地进行这种小規模战斗。这些部队完全可以抗击哥薩克，破坏敌人长达 300 英里因而必然很薄弱的前哨綫，打乱俄軍的計劃，出色地偵察敌人的一切調动，并且只要保持应有的謹慎和大胆，在每次冲突中就都能占上风。

剛剛收到的电訊說：

“1月6日土軍一个师 15 000 人携火炮 15 門，向距卡拉法特不远、构筑有战壕的切塔特障地攻击，經過猛攻加以占領；俄軍損失 2 500 人；从卡腊烏拉开来的俄軍增援部队 18 000 人，在損失 250 人后，被迫退却。”

另一則电訊說，小瓦拉几亚大部分居民都奋起反对俄軍；后者已包圍了克拉約瓦。

然而，俄国已經筋疲力尽了，它正在世界各地，在英屬印度的边境、在波斯、在塞爾維亞、在瑞典、在丹麥等地使用收買和恫吓的手段。在波斯，英國公使和沙赫政府之間發生了小爭執，后者已經準備讓步了，但是俄国大使進行干涉，不僅竭力激起沙赫對英國的憤恨，而且企圖把他卷入對土耳其政府的積極的敵對行動，並慫恿他對土耳其宣戰。但是，據說這個陰謀失敗了，因為英國代辦湯普遜先生威脅說他將離開德黑蘭，沙赫害怕會立即引起波斯人民反俄的怒潮，同時阿富汗外交代表團來到恫吓說，如果波斯同俄国締結同盟，阿富汗人就要進占波斯領土。

與此同時，大批俄国間諜布滿了塞爾維亞。他們到處游串，尋找過去以忠于被推翻的奧布廉諾維奇王朝而出名的人。他們同一些人談論年輕的米哈伊爾公爵，同另一些人談論他的老父米洛什，在談話中時而暗示有希望在俄國的保護下擴大塞爾維亞的疆界，把現在在土耳其和奧地利統治下的全部操塞爾維亞語的人聯合起來，建立一個新的伊利里亞王國，時而威脅說，如敢反抗，就派大軍侵入，把塞爾維亞完全征服。俄国儘管不斷使用各種陰謀手段，仍然破壞不了塞爾維亞和蘇丹的親密關係。相反，貝爾格萊德正在等待接受君士坦丁堡發出的兩道敕令：一道敕令是斷絕塞爾維亞同俄国之間原有的一切聯繫，另一道敕令是把各個時期承認給塞爾維亞人民的所有特權肯定下來。其次，俄国政府還在斯德哥爾摩和哥本哈根積極進行談判，企圖說服瑞典和丹麥政府在歐洲即將到來的衝突中站在俄国一邊。俄国企圖同這些國家締結同盟的主要目的，在於封鎖松德海峽和貝耳特海峽以對付西方強國。但是，直到目前為止俄国所爭得的却是，瑞典、丹麥和普魯士之間締結了武裝中立的條約，並進行了顯然用來對付俄国本身的武裝准

备。从瑞典发出的一些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人们因为俄国未经宣战而无耻夺占的芬兰公国有可能归还斯堪的那维亚王国而感到欢欣鼓舞。至于丹麦，它的（不是人民的，而是宫廷的）态度还不很明确。甚至传闻现任的丹麦外交大臣将呈请辞职，而由雷芬特洛夫-格里敏尼尔伯爵这位以同圣彼得堡的宫廷有着密切联系而出名的人物继任。在法国，由于俄国的影响，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联合”的问题²⁵取得了某些成绩；同时这种影响也正被千方百计地用来破坏英法政府之间的 *entente cordiale* ²⁶，并在它们之间散播不信任。某些接受基谢廖夫先生津贴的巴黎报纸企图使人们对英国政府是否真诚产生怀疑，我们也看到，接受布隆诺夫先生津贴的一家英国报纸也在怀疑法国政府是否真诚。另一个主要针对西方强国的打击是俄国禁止波兰输出粮食。

然而，西方强的外交活动丝毫不带有敌视俄国的性质。正相反，当问题涉及伸张正义的时候，他们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拖延倾向，当问题已经涉及犯罪行为时，他们又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妥协倾向。但是现在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这样的行动是错误的有害的。最近6个星期以来外交方面的主要事件有下列几点：维也纳会议复活了；会议参加者于去年12月5日拟定了议定书；法国和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给列施德-帕沙写了一封信；²⁷ 12月15日四大国交给土耳其政府一份共同照会，该照会于12月31日为苏丹接受；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向法国的驻各国外交代表发出12月30日通令，告知联军的舰队已进入黑海。关于维也纳会议的议定书，本报读者在读完这几行字后就可以了解它的内容。再没有什么比议定书中的下列论点更荒唐的了：

“俄皇在各个时期所作的保证，消除了任何关于至尊的皇帝怀有某种破

坏奥斯曼帝国領土完整的意图的想法。”

也沒有什么比議定书中所謂同意簽訂3个月的停战协定对土耳其是适当的这种声明更恶毒的了。在可耻的西諾普大屠杀的消息傳到君士坦丁堡两天以后,即12月5日,列施德-帕沙写信給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和巴拉盖·狄利埃將軍,告知西諾普来的消息,并請求联軍舰队进入黑海。12月12日,即列施德-帕沙发出照会后一个星期,他收到两位大使非常冷淡的复照,复照中通知他說:

“联軍舰队的出現只有‘政治意义’,因而毫无軍事意义,这只是‘精神支援’,因而决非軍事支援。”

于是,土耳其政府被迫接受12月15日的四强共同照会。这个照会对于土耳其政府因专制君主海盜式的行为所受的損失沒有規定任何賠償,而且坚持恢复过去的一切条約——凱納吉条約、阿德里安堡条約、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和其他条約²⁸,所有这些条約在一个半世紀以来一直成为俄国取得欺騙、干涉、进犯和吞并的武器的武庫。这个照会还允許沙皇对土耳其在宗教問題上有保护权,在民政管理問題上有指导权,因为在照会中写明,对各强国,

“土耳其政府应当告知有关它給予所有非伊斯兰教臣民的宗教特权的敕令的內容,同时对每一强国作出相应的保证”,

而且土耳其政府应当宣布它更加积极地推行行政制度和进行內部改革的坚定决心。

虽然从这些新建議的字面上看来,欧洲五强国都有权共同保护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但实际上只有俄国才有这种权利。这一協議的实质是:法国和奥地利是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国家,应当保护

土耳其的羅馬天主教居民，英国和普魯士是信奉新教的國家，应当保護苏丹的新教臣民，而俄国則應保護信奉正教的臣民。但是，由于土耳其信奉天主教的还不到 80 万人，信奉新教的不到 20 万人，而信奉正教的却将近 1 000 万人，因此很清楚，沙皇实际上獲得保護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權利。直到 12 月 19 日，即里扎-帕沙和哈利耳-帕沙進入內閣，因而保證了“主和”派或者說“親俄”派的勝利以後，土耳其政府才接受了四強國的建議。

12 月 21 日，當內閣會議已經通知四國大使接受他們所提出的建議的消息傳開的時候，索弗特（大學生）就聚集起來呈遞請願書，抗議政府所作的決定，只是在逮捕了為首的學生以後才阻止了風潮發生。熾烈的怒火席卷了君士坦丁堡，以至苏丹^①在第二天既不敢到御前會議廳，也不敢像平時一樣在外國軍艦的禮炮齊鳴和全體艦員的“萬歲”聲中駕臨托普汗訥清真寺；而列施德-帕沙則從自己的伊斯坦布尔的官邸，逃到同苏丹府相鄰的一座官邸去避難。第二天苏丹出告示，宣稱不停止軍事行動，於是輿論才有些平靜下來。

在最近的陰郁的 9 個月中，西方國家的這些混亂、畏縮、不可理解的外交活動，幾乎使公眾再也無法忍耐，使人們對英國政府的誠意發生懷疑。由於無法理解西方強國這樣長期容忍的原因，人們開始談論在幕後的那些勢力。傳說紛云，有人說女王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干預朝政，他不僅伴隨他的掌握最高政權的夫人參加樞密院的會議，而且還利用他的影響操縱樞密院負責官員的行動；其次，他一方面利用機會參加女王同大臣們的會商，同時同法國除

① 即阿卜杜-麥吉德。——編者注

外的一切外国宮廷(包括俄国宮廷)保持經常的和直接的联系。另外一种傳說是:奥尔良派同波旁王朝的长系(法国过去的王族)的“联合”,从英国宮廷那里得到了几乎同俄国宮廷一样的支持。为证明这一点,人們还引证了奈穆尔公爵在同“亨利五世”^①商談后立即拜訪了維多利亞女王宮廷的事实。

第四种傳說是:經俄国同意,关于东方問題的談判已經完全委托給美延多尔夫伯爵的内弟布奥尔-紹恩施坦伯爵。这一傳說被用来证明,英国政府从来不希望进行独立的、有效的談判,并且假装反对俄国及其同盟者的阴謀,实际上从一开始便尽力促使这些阴謀实现。人們确信罗巴克先生准备向下院而布魯姆勋爵向上院广泛地提出科堡的影响的問題。毫无疑问,目前科堡家族的影响問題几乎是首都人們的唯一話題。議會将于1月31日重新召开。

从1809年以来,这里还没有过像今年这样寒冷的冬天。但最可怕的并不是严寒,而是温度和天气变化无常。火車行駛极端困难;有些地方的交通似乎完全中断,而且就英国的交通工具來說早已远远落后于时代了。为了减少由于积雪使商业文书的邮递受阻而引起的种种不便,以及防止因无法預先通知推迟付款而引起拒付期票起見,开始使用电报。然而,倫敦有五百多張期票拒付的情况具体說明了寒冬給社会造成的混乱状态。報紙上滿篇都是关于暴風雪造成可怕的船只遇难(特別是在东海岸)的消息。虽然不久以前公布的貿易、航行和收入的統計表指出1853年开始的繁荣景象繼續存在,但是严寒和生活必需品(特別是粮食、煤和食油等)的漲价严重地影响了下层階級的生活。餓死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国

① 即尙博尔伯爵。——編者注

内西部的搶粮風潮目前正形成对北部同盟歇业的伴奏。

由于時間不够,关于工商业的詳細情况只好留待下文再談。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1 月 14 日
載于用英文和荷兰文出版的 1854 年
3 月 6 日“南非人报”

俄文譯自英文版“南非人报”,
并按荷兰文版校对过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东方的軍事行动。——
奥地利和法国的財政。
——君士坦丁堡的設防

1854年1月20日星期五于倫敦

最近的一批邮件給我們带来了关于不久以前在亚洲发生的战事的一些补充消息。看来，土軍被迫全部撤出了俄国的阿尔明尼亚。但是，还没有关于迫使他们撤退的战斗的結局的确切消息。土軍走的是从阿尔达汉直通阿哈尔齐赫的大路，而另一个軍則在这以南，沿着从卡尔斯經過亚历山大罗波尔（格魯吉亞語为居姆里）到梯弗里斯的道路前进。这两个軍大概都遇上了俄軍。根据俄国的报道，这两路土軍都被击潰，并損失了大約四十門火炮；我們还没有得到土耳其的官方消息，但是在一些私人信件中則說，撤退的原因是必須轉移到冬季营地。

只有一点是无疑的，这就是除圣尼古拉堡垒外，俄国領土上的土軍都撤退了，俄軍追击土軍，俄軍前卫甚至大胆地进到距卡尔斯一英里的地方，但是在那里被击退了。此外，我們知道，土耳其安那托里亚軍团是从亚洲各省——旧伊斯兰教的野蛮統治的支柱——征召来的，其中有大量总的來說虽然强悍，但是既不正規又不可靠的临时的兵士，他們是冒險家和强盜；这个安那托里亚軍团同严格

的、有纪律的而且受过严格训练的鲁美利亚军团毫无共同之处；在鲁美利亚军团中，指挥官了解每天在他管辖下有多少兵士，是什么样的兵士；在这个军团里有军事条例和战地法庭可以制止个人的冒险欲望和掠夺习气。我们知道，在亚洲战局的初期迫切需要部队的俄国人，后来得到了中将奥勃鲁切夫第二指挥的 16 000 人和一队顿河哥萨克的增援；我们知道，他们控制住了山地居民，保持住了经过高加索山脉到弗拉基高加索以及由海上到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交通线。

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再加上土耳其的指挥官阿勃迪-帕沙不是一个叛徒就是一个傻瓜（他后来被召回并在卡尔斯被捕；被派去接替他的是阿罕默德-帕沙），那末土军的失败就毫不足怪了，虽然也没有疑问，俄军的报道经常是夸大的。我们在“奥格斯堡报”²⁹上读到：

“11 月底，沙米尔妄图向南突围，与土耳其人建立直接联系。他的军队的人数是 10 000—16 000 人。人们断定，他的军队的精华——狂信派已被击溃。”

但是，最近的消息还有待证实。

西诺普会战的秘密终于揭开了。土军在那里击沉了俄国舰队最好的三层甲板舰之一——装有 120 门火炮的“罗斯提斯拉夫号”。俄国对这个损失一直巧言掩饰，说“罗斯提斯拉夫号”不是在战斗时而是在战斗后不久沉没的，但现在俄国人已公开承认了。这一损失大大抵销了土耳其舰船的损失。如果确实有一艘三层甲板舰被击沉的话，那末可以推测，俄国其他舰船在会战中也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损伤，归根到底，西诺普的胜利使俄国舰队受到了比土耳其舰队更大的削弱。看来土耳其人在海上也真像土耳其人

一样^①进行战斗的。埃及的蒸汽巡航舰“彼尔瓦茲·巴赫里号”經過 5 小时的战斗后被击坏，并被一艘比它大得多的俄国蒸汽巡航舰“弗拉基米尔号”俘获。它被炮彈打得千疮百孔，以致勉强被拖到塞瓦斯托波尔后就立即沉沒了。这样看来，俄国人的战利品現在还等于零。事实上，俄国人沒有能够使一艘被俘的舰船开离西諾普，这证明土耳其人的頑强抵抗以及俄国舰队在会战中的严重損失。

有消息說，法英联合舰队和土耳其舰队的第一大隊共同把 17 000 名土軍运往巴士姆。如果这一消息屬实，那就可能发生相当于直接攻击塞瓦斯托波尔的軍事行动，而沙皇就只好立即宣战。就在联軍舰队开进黑海以前，沙皇好像曾命令黑海的所有俄国軍舰返回塞瓦斯托波尔。12 月 24 日敖德薩来信說：

“俄国阿速夫海区舰队司令官派了一个副官到塞瓦斯托波尔去报告他的处境如何危急。两个軍(每个軍拥有 12 000 人)都已作好开往塞瓦斯托波尔的准备，但是联軍舰队在黑海的迅速出現这一消息使这次軍事行动突然停止了。”

从最近收到的电訊中可以看出，俄軍打算在 1 月 13 日，即俄历元旦那一天向卡拉法特的土軍陣地发动总攻。他們已經調动了切塔特（卡拉法特以北 9 英里的一个村庄）附近进入战壕的大約 1 万名兵士，但是他們沒有能够集中自己的全部現有兵力，因为土耳其將軍比他們先行动了一步。土耳其將軍率領 15 000—18 000 名兵士向敌人的战壕强攻，在 1 月 6、7、8、9 日和 10 日的几次短兵相接中取得了胜利，最后迫使俄軍向克拉約瓦方面退却。俄

① 双关語：«like Turks» 有“像土耳其人一样”的意思，也有“殘酷无情”的意思。——編者注

国人自己也承认，他們有 1 000 人陣亡，4 000 人受伤。据电訊报道，“俄軍指揮官”安烈普將軍“和土伊南特將軍均受重伤”。同时有消息說，1 月 10 日在塞里姆-帕沙（波兰人捷德林斯基）指揮下的土軍又**撤退**到卡拉法特。一直作为关于这些极端重要事件的消息的唯一来源的电訊就是这些。从这个最后还說到俄軍撤到克拉約瓦，而土軍則撤到卡拉法特的消息看来，恐怕敌对双方又犯了重大的战略性錯誤。有消息說，奧美尔-帕沙强令整个軍渡过阿留塔河和席尔河之間的多瑙河，从而对俄国在克拉約瓦的一个軍的交通綫造成威胁。但是，除了已經作好渡河的必要准备的唯一地点——卡拉法特以外，土軍怎能在別的地方渡过滿是浮冰排的多瑙河呢？

俄軍在卡拉法特遭到的失敗，从政治上来看也許比从軍事上来看更为重要。这次失敗加上联軍舰队抵达黑海，也就排除了下述的最后可能性：沙皇对于由維也納會議派往彼得堡的信使轉达給他的关于和平的誠懇請求实行让步。另一方面，这次失敗的影响立即促进了邻近的塞尔維亚的民族派的加强，引起了俄国的伙伴們的恐惧，这些伙伴最近在貝尔格莱德的行为可耻到了惊人的程度。誠然，亚历山大公爵和塞尔維亚人民群众是不会相信他們的国家有同苏丹断絕关系的必要的，尽管大批俄国間諜布滿了塞尔維亚，在各方面进行阴谋活动：他們到处游串，寻找过去以忠于被推翻的奧布廉諾維奇王朝而出名的人，同一些人談論年輕的米哈伊尔公爵，同另一些人談論他的老父米洛什。他們时而向这些人暗示有希望在俄国保护下去擴張塞尔維亚的疆界，把現在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統治下的全部操塞尔維亚語的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伊利里亚王国；时而威胁說，如敢反抗，就派大軍侵入，把塞

尔維亞完全征服。你們知道，目前住在維也納的米洛什公爵老早就以梅特涅為靠山，而他的兒子米哈伊爾不過是一個 1842 年從塞爾維亞丟掉王位逃跑出來的俄國傀儡。此外，俄國在卡拉法特的失敗還可以使奧地利消除這樣的恐懼：俄軍會在貝爾格萊德出現，並喚醒那些與俄軍同一族系同一信仰的奧地利臣民，使他們覺悟到自己的力量和他們在德國人統治下所受的侮辱。

關於奧地利，我可以 *en passant* [順便] 說，它終於打消了長期以來想得到新借款的希望。關於它的財政狀況，可以從不久以前該國政府把紙幣行市降低 15% 這一措施看出來；這種財政手段只能同那些善于找竅門的法國 *rois faux monoyeurs* [造偽幣大王] 的騙人詭計相媲美，後者在需要付款時，就把紙幣行市提高，而在需要收款時，則把行市降低。根據德國報紙的報道，奧地利 1854 年的預算在經常開支方面的赤字將達 4 500 萬弗羅倫，在特別開支方面的赤字將達 5 000 萬弗羅倫。每當維也納得到有火藥氣味的消息時，人們就擁進銀行，把紙幣換成銀幣。

大家都知道，法國也早就打算發行 2 億法郎（800 萬英鎊）的公債。但是，糧食不夠、葡萄歉收、生絲減產、工商業普遍停滯、對 2 月底的支付的嚴重憂慮、國家有價證券和鐵路股票行市下跌的趨勢——這一切情況絲毫沒有減少發行公債的困難。波拿巴沒有能夠在交易所里找到新公債的買主。因此只好採取 *coup d'état* [政變] 前夕所採取的一種方法——派培爾西尼到法蘭西銀行提取 5 000 萬法郎（1 000 萬美元），而用同等數目的國庫債券作為“擔保”。在元旦那天確實是這樣做的。實行這一財政上的 *coup d'état* 的結果是：有價證券的行市下跌到 69%。正如現在官方報道的，政府將從法蘭西銀行得到用國庫債券作擔保的 200 萬或 300 萬法

郎的貸款。那些不知道元旦那天在法兰西銀行沙龙里所发生的事情的人，自然不能理解这家銀行怎么会同意提供交易所拒絕的貸款。

关于波斯的消息仍然是互相矛盾。有些消息說，波斯軍隊正向埃尔斯倫和巴格达推进，而另一些消息說，俄国的阴谋失败了，因为英国代办湯普遜先生以撤离德黑兰相威胁，沙赫担心波斯人民对俄国的仇恨会立即爆发出来，同时阿富汗外交代表团来到恫吓說，如果波斯同俄国締結同盟，阿富汗人就要进占波斯領土。

根据在“祖国报”上发表的寄自君士坦丁堡的私人信件来判断，御前會議已經决定在君士坦丁堡向陆一面构筑工事。据說，由欧洲一些国家和土耳其的軍官組成的混合委员会已經开始初步視察地形。君士坦丁堡的設防会使俄土战争完全改观，而且对于那些抱有僭称拜占庭帝国皇帝继承者的宿願的人是最沉重的打击。

关于奥地利在巴納特集結了将由伯爵施利克將軍指揮的一个軍的傳說，德国报刊已予否认。

据柏林“通訊”报道，各級政府都已經收到作好动員后备軍³⁰的准备的共同指令。

圣彼得堡方面已經向哥本哈根內閣提出把博恩霍尔姆島让給俄国的建議。

“每日新聞”正确地指出：“博恩霍尔姆島可以成为波罗的海的馬尔他島或直布罗陀。該島距松德海峽和哥本哈根只有一天的航程，它位于波罗的海的入口处。”

雷德克利夫勳爵送交塞瓦斯托波尔总督一份通知书，說联軍分舰队已在黑海出現，指出这一次調动的唯一目的是“保卫奧斯曼的領土以防任何侵犯和敌对行动”，但是根本沒有提到保卫奧斯曼

舰队。

从巴黎、維也納、柏林、君士坦丁堡和圣彼得堡得到的消息都說明了战争的可能性，所以拉芒什海峽两岸各个市場的物价普遍下跌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1 月 20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4 年 2 月 8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3997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弗·恩格斯

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

本报倫敦記者的文章和欧洲报纸上的消息，终于使我们对俄土两軍之間的一次长时间的会战有了一个完整的概念。这次会战的地点是卡拉法特以北 9 英里的一个不大的村庄——切塔特。虽然在所谈的一系列血战中，土耳其軍隊表现了高度的勇敢精神并且获得了胜利，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既然問題在于把俄軍逐出瓦拉几亚，那末这些战斗就沒有获得任何实际結果。原因是土軍犯了錯誤，关于这一錯誤我們已不止一次提起讀者注意。我們指的是土軍为了切断通往塞尔維亚的道路而派遣一支独立部队到卡拉法特的做法，然而防止俄軍侵入这一地区的最好保证应该是在魯舒克和希尔索瓦附近保持强大而集中的軍隊。这样的軍隊会威胁任何一支西进的俄軍的交通綫，而沃耳特尼察的或附近的桥梁和桥头堡(像卡拉法特的工事那样的桥头堡)就能成为土軍在多瑙河左岸的据点。但是即使沒有这样的条件，俄軍也不可能在上游渡过多瑙河向塞尔維亚推进而不給土軍造成从下游渡过多瑙河向布加勒斯特推进的机会。当然，我們在肯定这一点时，是根据双方实际兵力的对比，而且认为土耳其的魯美利亚軍团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俄国的瓦拉几亚軍团。

应当指出，土軍尽一切力量来使自己的优势化为烏有，并为自

己的最終失敗准备条件。他們不是把兵力集中在多瑙河下游，而是把兵力分散。虽然以 30 000—35 000 人占領維丁和卡拉法特，但其余的部队則留在多瑙河的中游和下游。土軍配置在弧綫上，而俄軍則配置在这一弧綫的弦上。因此俄軍要把部队集中到需要的地点，只要通过較短的距离。不仅如此，俄軍較短的路綫通过平坦的地区，而土軍較长的路綫要經過山岭和許多溪流。因此，土軍的障地是极其不利的，然而他們还是占領了它以迎合一种陈腐的偏見：要想最有效地阻止敌人前进，必須橫断他的去路。

12 月 20 日奧美尔-帕沙在苏姆拉得知俄軍准备于 1 月 13 日向卡拉法特发动总攻。当时他还有 22 天的時間。但是根据卡拉法特同其他土軍的配置地点的相互位置，奧美尔-帕沙除了可以从索非亚調来极少的預备队以外，看来不可能給卡拉法特增派援兵了。另一方面，俄軍当时並沒有从国内得到較多的补充兵力，——1 月 3 日，处处露头的奥斯坦-薩肯軍还没有到达布加勒斯特，——却敢于把部队远远向西方集中，这一情况說明，或是天气情况和多瑙河的高水位使土軍不能在下流渡河，或是哥尔查科夫有其他根据預料該地区的土軍不会有任何的行动。卡拉法特的土軍奉命在俄軍还没有来得及集中兵力以前向它們攻击。为此当时最正确的就是再采取在沃耳特尼察附近的做法³¹。为什么沒有这样做呢？尽管是冬季而且有浮冰，卡拉法特的桥仍然屹立着，而下游再沒有其他地方可以修建这种带有桥头堡的桥梁。难道奧美尔-帕沙得到了留在河右岸的命令嗎？土軍的行动这样自相矛盾，这样时而采取大胆机智的措施，时而又造成令人难以容忍的疏忽失策，无疑在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外交陰謀。无论如何，哥尔查科夫如果不是确信土軍不会重复沃耳特尼察那样的战法，他就不会

向卡拉法特前进一步。

显然，俄軍投向卡拉法特的兵力总数約为 3 万人，因为兵力再少，他們就未必敢于攻击一个拥有 1 万守軍、而且至少有 1 万人作为預备队或作为出击兵力的筑壘陣地。因此，俄軍在这个地点至少集中了在瓦拉几亚作战的一半兵力。而分散在很长战綫上的另一半兵力在什么地方又怎样能阻止土軍从沃耳特尼察、錫利斯特里亚或希尔索瓦附近渡河呢？如果保持維丁和卡拉法特之間的联系沒有困难，那末在其他地点也可以渡河。这样，俄軍由于陣地設在土軍配置的弧綫的弦上，便能在切塔特战场上集中优势的兵力，而土軍虽然早就知道敌人准备攻击，却无法加强在卡拉法特的那个軍。土軍既不能进行牵制行动以防止整个会战的发生，也不能得到援助，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勇敢，指望在敌人来不及集中兵力以前加以各个击破。但是甚至連这一点指望也不可靠，因为土軍不能远离卡拉法特，而敌人兵力較少的任何一个軍，却可以离开土軍活动的区域。这样，土軍經過 5 天的战斗（大部分是他們获胜）之后，仍然不得不向卡拉法特周圍村庄的工事退却，因为俄軍在最后一天又得到了增援，形成了决定性优势。結果，俄軍对卡拉法特的攻击很可能被阻止或推迟，而土軍表现出不仅能在壘墙和壕沟掩护下，而且能在平地上出色地作战。关于会战的激烈程度可以从布加勒斯特发出的一封信中看出，信中談到在战斗中俄軍一个猎兵团被全歼，一个枪騎兵团只剩下 465 人。

俄軍在沃耳特尼察攻击了土軍的筑壘陣地，而土軍在切塔特攻击了俄軍的筑壘陣地。这两次土軍都是胜利者，但是沒有获得胜利的果实。沃耳特尼察会战发生时，恰好停战的消息正从君士坦丁堡傳到多瑙河，而切塔特会战又奇怪地同御前會議接受西方

盟国强加于土耳其的最后媾和建議³²的消息湊上了。在前一場合，外交上的陰謀詭計被武装冲突化为烏有，在后一場合，浴血奋战却由于某些秘密的外交活动而毫无成果。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 月 19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4 年 2 月 8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3997 号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沙皇的观点。——阿尔伯特亲王

1854年1月24日星期二于倫敦

俄国军队企图在所有作战方向(曼成、茹尔日沃、卡拉法特)同时渡过多瑙河,这与其說是严重的攻势,不如說是偵察行动,因为哥尔查科夫將軍未必敢于以他現有的力量来发动这样的攻势。

星期六的“新聞报”(迪斯累里的喉舌)发表了一篇关于沙皇不久同某位“杰出的”英国人士在加特契納举行会談的評論。几乎倫敦所有的日报都轉載了这篇評論,这篇評論除了大家知道的,已听得相当煩膩的对俄国外交的議論以外,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論点。

沙皇“明确地宣称,緬施科夫的最后通牒并没有受到倫敦的反对,而且当英国政府被告知土耳其政府可能接受最后通牒时,它认为这是圓滿解决問題的办法”。

这一切只能证明,关于土耳其政府的“可能的”意向問題,可怜的約翰·罗素受了布隆諾夫男爵的騙,而且土耳其政府拒絕立即接受緬施科夫最后通牒³³的責任无论如何不应当推在联合內閣身上。接着,沙皇告訴这位“杰出的”紳士說:

“当大家都知道了西諾普会战的胜利消息以后,卡斯特尔巴雅克將軍(法国大使)曾給他一封信,信的开头大致是这样写的:‘請允許我作为一个基督

徒和軍人，为了陛下海軍所取得的光荣胜利向皇帝陛下表示我的祝賀。’”

这里，我想指出，卡斯特尔巴雅克是老牌的正統主义者，拉罗什雅克兰的亲戚，他获得將軍的佩劍不是由于在战场上献身，而是由于在宮廷前厅中比較不冒風險的値勤，由于狂热地信奉崇高的君主主义原則。波拿巴任命卡斯特尔巴雅克为駐圣彼得堡宮廷的大使以表示尊重沙皇个人的願望，虽然他十分了解，卡斯特尔巴雅克与其說会关心自己的名义上的君主的利益，不如說必定同沙皇合謀来恢复波旁王朝。因而，这位卡斯特尔巴雅克是“作为一个軍人和基督徒”向沙皇祝賀这次无結果的西諾普大屠杀的很合适的人物。沙皇好像說过，“我不相信，英国及其資產階級議會能够光荣地进行战争”。无疑，沙皇很了解他的科布頓們和布萊特們，并且认清欧洲資產階級的下流卑鄙的灵魂。最后，沙皇說得完全正确：一方面，他没有准备战争（因为他确信通过简单的威胁就能得到他所希望的一切），另一方面，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了，那就是“庸人的战争”，也就是說这些人胆怯地渴望避免战争，却又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最后，自己輕率地投入战争以掩盖自己的錯誤和保持自己的职位。

“社会輿論几乎有意把阿尔伯特亲王变成某些議論的牺牲品。最初流傳的有利于某个政党的窃窃私語已变为怨言，而意味深长的暗語已发展为明显的駭人听聞的捏造。每个有机会觀見女王的人，一定会在女王陛下那里遇到阿尔伯特亲王，这个事实很引起英国社会的贊許和尊重；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亲王也出席女王同大臣們举行的會議；并且，又要大臣們注意亲王的出席，尽管大臣們不希望在討論問題时有第三者在場，但又不得不这样做，甚至他們必須在亲王面前为自己的意見辯护，亲王实际上已干預了他們同女王的會議；他不仅仅影响女王的意見，而且他由于有机会同外国宮廷自由交往，也就成为女王樞密院同外国君主（也許是英国的敌人）的内閣之間不受檢查地

交换情报的途径，——总之，阿尔伯特亲王背叛了女王，犯下叛国之罪，最后，他以叛国罪被捕，并监禁于伦敦塔。这就是前两天不仅英国各地到处在議論，甚至某些人已經信以为真的事件的經過。”

我从“旁观者”³⁴引证这一段是要向讀者表明，帕麦斯顿的报刊是如何炮制社会輿論，竭力要把这个可怜的目光短淺的年輕人作为負責的大臣們的替罪羊。阿尔伯特亲王是同欧洲大多数专制独裁政府都有亲戚关系的德国亲王³⁵。他在高升为大不列顛女王的丈夫以后，就把他的時間一部分用来养猪，一部分用来創制令人发笑的軍帽，规划毫不舒适的标准小店，筹办海德公园展覽会和耍弄兵形玩具。他被公认为一个和气而不得罪人、智力中下的人，一个多子女的父亲和温順的丈夫。可是，近来却有人故意把他說成是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說成是联合王国最危險的人物之一，好像他根据俄国的秘密指示，在左右整个国家机器。当然，未必能够怀疑，亲王对宮廷事务是有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是有利于专制主义的。亲王只能起亲王所起的影响，难道有誰竟这样愚蠢而不以为然嗎？但是不必由我提醒讀者，女王的权力被不列顛寡头政体削弱到了什么程度；例如大家都知道，威廉四世是俄国的死敌，而他的外交大臣^①，輝格党寡头政体的成員，却迫使他同土耳其为敌。只要不是指什么微不足道的宮廷瑣事——什么毫无价值的綬带或用金銀綫做的星章，——如果认为阿尔伯特亲王能够做出違反內閣的意志的事来，該是多么荒謬！他的专制主义的 penchants〔傾向〕被利用来轉移人民对那些負責的大臣的阴謀活动和叛国行为的注意。如果說这一切叫囂和攻击还有一点意义，那末，这就

① 即帕麦斯顿。——編者注

是把所有这一切当作是对君主制度的进攻。要是沒有女王，也就沒有亲王；要是沒有王位，也就沒有宮廷的影响。如果沒有了支持亲王的和亲王可以依靠的王位，那末亲王也就失去了权力。但是，請注意，那些最突出地表現自己“惊人的勇敢”、叫喊得最厉害、并且试图从阿尔伯特亲王的事件中賺得一笔政治資本的报纸，正是在效忠王位方面最热心最卖勁、替女王吹嘘得最无耻的报纸。至于托利党的报纸，那就可想而知了。至于激进的“晨报”³⁶，正是这家报纸欢迎波拿巴的 coup d'état [政变]，并且在不久前攻击一家爱尔兰报纸，因为后者竟敢批評女王訪問都柏林；也正是这家报纸指責法国革命者的共和主張，并且老是把帕麦斯顿勋爵描繪为英国的救主。整个事件都是帕麦斯顿的阴谋詭計。帕麦斯顿由于他亲俄被揭露，又由于他反对新改革法案，已經失去了威望。反对改革法案的行动已把他的发霉的五顏六色的蜜糖餅干上的自由派金紙撕下来。但是，为了做一个首相或者至少做一个外交大臣，他需要威望。現在重新装出自由派的姿态，扮演一下受宮廷阴谋迫害的布鲁土斯角色，該是多好的机会！攻击女王的丈夫对于誘惑人民該是多好的食餌！他必将成为当代最有名望的国家活动家。要侮辱自己的同僚，痛斥他們是阿尔伯特亲王的工具，迫使宮廷按照帕麦斯顿自己提出的条件重用他，这該是多漂亮的借口！托利党自然支持这种叫喊，因为比起英鎊和地产来（現在地产正急剧地从他們那里轉到棉紡大王的手里），教会和王位對他們又算得什么！当托利党人为了“宪法”和“自由”激烈攻击亲王时，哪一个有教養的自由主义者不是虔敬地拜倒在他們的脚下呢？

在曼彻斯特貿易协会年会上，主席阿斯皮納耳·特納先生談到罢工、同盟歇业以及一般工潮——他把这些情况正确地描述为

“郎卡郡的企业主同工人之間发生的内战”——的时候，声称：“正同曼彻斯特推翻国王暴政和貴族暴政一样，他也必定推翻民主的暴政。”

“新聞报”喊道：“这无意中向我們供认了曼彻斯特学派的政策。在英国，国王具有最高的权力嗎？——那就限制国王的权力！貴族政体阻碍你們嗎？——那就把它从路上搬开！工人鬧風潮嗎？——那就把工人消灭！”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1 月 24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4 年 2 月 11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000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君士坦丁堡的設防。——丹麦的
中立。——英国議会的成分。
——欧洲的歎收

1854年1月27日星期五于倫敦

我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①中已經指出，君士坦丁堡的設防是土耳其人能够采取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如果君士坦丁堡設防以及波斯普魯斯和达达尼尔海峽的堡垒相应地加固，土耳其或其他任何一个占有这个都城的强国都根本不需要任何外国力量来保证自己的独立。沒有比君士坦丁堡更容易設防的城市了。三角形地区只有一面，即向陆的一面，需要筑起綿亘的垒墙；向馬尔馬拉海的一面和向金角的一面都不需要构筑工事。在离要塞圍墙适当距离的地方构筑一条向东伸展的为保卫彼腊、加拉塔和金角东北岸的单堡防綫，可以同时用来加强要塞圍墙，并阻碍敌人迂迴要塞圍墙，阻碍他們在位于彼腊和加拉塔后面瞰制市区的高地上构筑圍攻工事。

这样的要塞几乎是无法攻破的。它的交通綫只有在达达尼尔或波斯普魯斯海峽被占領时才可能被切断；而在这种情况下，該城

① 見本卷第37頁。——編者注

也立即会失守。但是这两个极其狹窄的海峽非常容易加强防务，使任何敌人的舰队都无法通过。从陆上进攻的俄軍，为了同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薩取得联系将不得不走危險的海路，而且也未必能支持到拿下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俄軍由于不断减員，經不住城里守軍和亚洲来的增援部队的打击。

俄国对丹麦中立的声明³⁷的答复于1月20日送到了哥本哈根。据說俄国拒絕承认中立，而要求丹麦同这一方或那一方联合。在得到这通知以后，法、英、俄的大使^①似乎立即同丹麦的大臣們举行了一次會議。但我从非常可靠的方面知道（不过我当然还不能担保消息絕對正确），圣彼得堡內閣的抗議只是一种手法，想以此促使其他强国尽快地正式承认丹麦中立的条件。有人告訴我，不久前，丹麦同英法举行过談判，决定一旦发生战争，英国海軍将占領松德海峽，而法国陆軍将占領什列斯維希公国。厄斯特德大臣将这次的联合行动告訴了涅謝尔罗迭伯爵。俄国为了破坏这次联合行动，似乎需要哥本哈根內閣作出一个俄国現在假装表示反对的中立声明；如果法英承认了丹麦的中立，那就不仅破坏了他們原定的計劃，而且中立国船只运输的貨物也就不受軍事法規的限制，从而保证俄国的商品可以通过波罗的海出口。

沙皇对普魯士占有北海的奥登堡港提出了抗議。不管柏林的公众对这位帖木儿-塔梅尔兰的继承人到处进行干預的这种新的表現感到多么惊奇，但是这个抗議是 *bona fide* [完全真实的]。

“英国人”周刊說业已举行的“曼彻斯特改革拥护者大会”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謬論典范，这个說法很中肯。頌揚阿伯丁的政策，侮

① 即多特扎克、布坎南和翁格恩-施特恩堡男爵。——編者注

辱土耳其，贊美俄国，反对一切对他国事务的干預——这几个話題（因为談的是对外政策）就成为曼彻斯特学派³⁸的主要資本；科布頓先生、布莱特先生和其他一些“质朴而謙逊的人”一再地搬弄这些，希望在英国軍队的总司令部找到“和平的拥护者”，并且想向上院宣告同盟歇业，以期出卖英国人民，并且以更低廉的价格拍卖他国人民。

科布頓先生的演讲无非是他在議會会議閉幕时的讲话的重述，而且是恬不知耻的重述。他**不惜追求的唯一的**新东西就是两点攻击，一点对法国，另一点对美国。当“十二月活动家”的功績在英国激起憤怒的吼声的时候，在同法国締結同盟方面起了出色作用的那个人，現在却来破坏亲手做的事，嘲笑这个同盟，宣称它是“考虑欠周的”和“不适时的”。这就使人感到极大的疑惑。

关于美国，科布頓声称，威胁英国經濟和民族繁荣的偉大事业的是美国工商业的发展，而完全不是俄国的黷武政策。这怎么能符合他的职业自由貿易派的假仁假义的論断：一个民族的商业繁荣决定于其他一切民族的工商业的发展，而两个工业发达的民族之間会有激烈竞争的思想是保护关税主义的“庸医”的錯誤呢？这又怎么能符合下面的論点呢？

“英国以它的机器生产的惊人作用把两个不相連的半球永远用和平的紐带联合在一起，使欧洲和美洲处于不可分割的完全相互依賴之中。”

科布頓已經不止一次地企图轉移英国人民对俄国的怀疑和仇恨，而竭力使他們怀疑和仇恨美利坚合众国。1836年，俄国軍舰在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对一只英国船的掠夺，圣彼得堡內閣就多瑙河航行問題采取的財政措施³⁹，以及“公文集”⁴⁰发表的揭发性的文章，引起了英国人民（主要是商人）对俄国的憤激。当时还是“文

坛新手，还不慣于公开演讲”⁴¹的科布頓先生发表了一本匿名的抨击性小册子，标题是：“俄国：医治恐俄病的良药。曼彻斯特一厂主著”⁴²。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证明說，“不用 20 年，这些观点（即害怕美国的繁荣，而完全不怕俄国的擴張政策）将为全体英国人民所贊同，而且政府也将不得不加以承认”。在这本小册子中科布頓还写道：

“在探討那些議論這個問題的人所根据的对俄国抱敌对态度的种种理由时，我們非常惊奇而自信正确地发现，百年来英国的貴族統治已經使社会上所有的階級都感染上了他們执政者的那种驕傲自大、目空一切的习气（对温順的俄国）。假如圣彼得堡政府迁都博斯普魯斯的海岸，那末用不了 20 年，現在茅舍林立的土耳其首都就会成为一座富丽的欧洲城市；这里就会兴起宏偉的建筑，出現学术团体，产生优美的艺术。假如俄国政府真有这样的力量，它就不会再动干戈，而会用鋪設铁路、建造桥梁、促进資本积累、加速城市发展、发揚文明的和自由的成就等等方法来克服野蛮現象……玷污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制度立即会被消除，而商业和保护生命财产的法律（例如，像莫尔达維亞、瓦拉几亞現在施行的一样）会占据应有的地位。”

为了证明俄国的文明，并进而证明俄国有权占領土耳其，科布頓先生告訴他的感到惊奇的讀者說，拥有 10 000—15 000 卢布的俄国商人不仅参加对外貿易，而且“免除了体刑，有权乘坐双套馬車”。既然如此，对于俄皇不久前表示相信“英国及其資產階級議會不能光荣地进行战争”这一点还能感到奇怪嗎？1836 年科布頓先生已經深深地意識到那些敢于指責主宰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的“政論家和演說家行为不端”，所以下面的問題就成了他那本小册子的結論之一：

“这些著作家和演說家是誰？他們究竟是些什么人？难道还能允許这些政治騙子一直这样无法无天地煽風点火、扰乱民心嗎？”

我們以為他們就是擁有 10 000—15 000 盧布、可以乘坐雙套馬車、至少可以免除“**體刑**”的“官方政論家和演說家”。有些人至今一直認為科布頓先生的親俄狂是他特有的許多怪癖之一，另一些人則把這點看成是他的和平論的必然結論。可是不久以前，有權自稱為過去反谷物法同盟⁴³的“文壇駑馬，或者可以稱為文壇笨駑”的某君^①向公眾說，科布頓先生在寫他的第一本小冊子以前，“1834 年和 1835 年曾到俄國作了一次獲益匪淺的商務旅行”，“1836 年他的心和印花布還在俄國”，而他对“英國的政論家、演說家、著作家、新聞記者”的憤恨是因為他們批評了他的新主顧，主宰全俄的尼古拉。

鑒於過幾天就要恢復下院的會議，所以我們認為提供一個關於英國議席的哪怕是很簡單的統計，也是適宜的。

	所占席位	百分比
貴族親屬.....	103 }	17.0
愛爾蘭貴族.....	6 }	
領地貴族.....	266	41.3
文學科學界人士.....	20	3.0
陸、海軍.....	30	4.6
財貿界代表.....	109	17.1
律師.....	107	17.0
工人.....	無	—
<hr/>		
議席總計.....	641	

下院中的**愛爾蘭貴族**⁴⁴是：梯維爾頓區——帕麥斯頓子爵；伯克郡——巴林頓子爵；格里姆斯比——安斯利伯爵；朴次茅斯——蒙克子爵；雷特沃尔德——高尔威子爵；東約克郡——霍桑勳爵。

① 即亞·索麥維爾。——編者注

文学科学界人士：白金汉郡——本杰明·迪斯累里；爱丁堡——历史学家托马斯·马考莱；格拉斯哥——商务统计学家麦克格莱哥尔；佩特郡——“西班牙艺术家史”等作品的作者威廉·斯梯林；牛津大学——“国家与教会”等作品的作者威廉·格莱斯頓；艾尔斯貝里——“尼尼微城的遺址”等作品的作者奥斯汀·亨·累亚德博士；威斯特貝里——“经济学家”⁴⁵杂志編輯詹姆斯·威尔逊；南威克——霍布斯等人著作的編者威廉·摩耳斯沃思爵士；哈特福郡——詩人、戏剧家、小說家爱·利·布尔韦尔-利頓爵士；奥尔丹——反谷物法同盟的作家威廉·約翰遜·福克斯；賴伊——“文明史”（毫无价值的）等作品的作者威·亚·麦金倫；庞特弗拉克特两名——“旅途观感”等作品的作者理·蒙克頓·米耳恩斯和“东方之行”的作者本杰明·奧利維腊；罗契得尔——神学和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家爱德华·迈奥尔；苏格兰的倫弗魯郡——“希腊文学史”作者威廉·繆尔；爱尔兰的威斯特米特郡——“弗兰契斯科·斯福察的生平”一书的作者威·波·烏尔卡尔特；威特比——著名的铁路工程师罗伯特·斯蒂芬逊；博德明——医生威廉·迈克尔；利特里姆——外科医生約翰·布雷迪；是否能把約翰·罗素勋爵列入文学家一項，我們不准备探討。

还有至少一百个議員，名义上是由自己选区选出的，其实都是由公爵、伯爵、侯爵、貴夫人以及靠自己在当地的势力取得政治利益的人指定的。例如，韦斯明斯特侯爵在共有 2 524 名选民的切斯特城就控制了两个席位；諾福克公爵在阿倫德耳控制了一个席位；薩特倫德公爵在紐卡斯尔-安德-萊恩控制两个席位；兰斯唐侯爵在卡耳恩控制一个席位；菲茨威廉伯爵在莫尔頓控制两个席位；里士滿公爵在契切斯特控制两个席位；皮尔斯小姐在諾塔列尔頓

控制一个席位等等。

从下面几个例子来看，就可以断定选民人数同居民总数之間以及当选的議員人数同居民总数之間的比例都是不恰当的。

伯克郡的居民是 170 065 人，而选民是 7 980 人。該区选入下院的代表共 9 名，而有 230 308 名居民和 13 081 名选民的萊斯特郡却总共只有 6 个席位；林肯郡居民 407 222 人，选民 24 782 人，在下院中占有 13 个議席，可是有 1 886 576 名居民和 113 490 名选民的密多塞克斯选入下院的議員总共只有 14 名。有居民 2 031 236 人的朗卡郡只有 81 786 名选民，并且在下院只占 26 个席位，可是有 163 723 名居民和 8 125 名选民的白金汉郡却有 11 名議員。有居民 336 844 人和选民 18 054 人的薩塞克斯选出 18 名議員，而有居民 608 716 人和选民 29 607 人的斯泰福郡却只选出 17 名議員。

选民人数和居民人数之間的比例是这样的：

英格兰农业区每个选民代表 20.7 个郡居民。

威尔士农业区每个选民代表 20 个居民。

苏格兰农业区每个选民代表 34.4 个居民。

英格兰每个城市选民代表 18 个城市居民。

威尔士每个城市选民代表 24.4 个城市居民。

苏格兰每个城市选民代表 23.3 个城市居民。

关于爱尔兰的資料还没有像英格兰和苏格兰那样完整。但是下列数字大体还接近 1851—1852 年期间的实际情况：

农业区每个选民代表 36 个居民。

爱尔兰城市每个选民代表 23 个城市居民。

欧洲粮食市場普遍发生困难，情况如下：在法国，并不像“通

报”⁴⁶ 为了安定人心所說的只缺粮 1 000 万百升，而是大大超过 2 000 万百升，也就是超过 800 万英制夸特；馬鈴薯的缺乏不少于 5 年来平均产量的四分之一，酒、植物油、栗子更为缺乏。比利时和荷兰粮食产品尚少 400 万百升左右；根据保守的統計，萊茵区的几个省、普魯士、瑞士缺粮 1 000 万百升以上。至于意大利，則只知道遭到极严重的歉收，即使概略的数字也很难确定。但是最低的数字也要达 1 000 万百升；因此在西欧主要产粮区缺少的粮食至少是 4 400 万百升(1 700 万夸特)。英国的缺粮已經知道有 500 万夸特以上，而根据某些非常值得注意的統計資料来看，这只是小麦一項的数字。因此，仅西欧一地，因去年严重的歉收至少缺粮 2 200 万夸特；如果再加上因其他禾本科作物质量很差和歉收以及到处蔓延的馬鈴薯病害而少收（折合为小麦計算）至少 500 万夸特，这样缺粮总数就达到 2 700 万夸特。

至于是否可以指望国外市場輸入粮食，根据貿易問題方面极有权威方面的消息来看，情况是这样的：

“波兰粮食收成极低。俄国歉收；波罗的海各海港粮价昂貴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粮价在我国缺粮的消息傳到以前，就已經上漲了。多瑙河各公国虽然没有歉收，但是同敖德薩一样，由于向地中海沿岸各国和法国大量出口粮食，存粮已經大大减少了。而美国連 200 万夸特也不可能拿出来。况且，就是把全世界所有的船只都用来运粮也不够运输現在全英国都知道的我們所缺的粮食的一半或将近一半。”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 月 26—27 日

載于 1854 年 2 月 16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004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奧爾洛夫伯爵的使命。
——俄国的战时財政

1854年2月3日星期五于倫敦

我在陸軍總司令部大廈附近看到了去參加議會開幕式的女王的隆重儀仗。人們高聲歡呼，歡迎土耳其大使。阿爾伯特親王面色蒼白，街道兩邊的人群向他憤怒地噓叫；女王看到人民這樣異乎尋常地不滿，很少作一般應酬的表示，只是一臉苦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我已經指出反阿爾伯特運動的實際規模，並且也證實了這只是派系鬥爭的一種手段^①。但是對公眾的遊行示威應該加以足夠的重視，因為這證明不列顛人民作出來的忠順不過是一種表面的形式，虛偽的禮貌，它是經不起輕輕一擊的。這次的遊行示威說不定會迫使王室解除內閣職務，因為內閣的反民族政策可能使王室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脅。

當不久前奧爾洛夫伯爵去維也納內閣的使命⁴⁷已經家喻戶曉的時候，“泰晤士報”向它輕信的讀者報道說，奧爾洛夫正是經常受沙皇委託從事和平活動的人。可是不用我來提醒，你們當然也記

① 見本卷第43—47頁。——編者注

得，1833年春前往君士坦丁堡强迫土耳其政府接受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的就是这个奥尔洛夫⁴⁸。現在他得到了維也納內閣的允許，將俄國的一個軍從華沙經過匈牙利開往多瑙河戰區。奧地利堅決要求土耳其政府將目前在多瑙河的土耳其司令官塞里姆-帕沙、伊斯馬伊耳-帕沙、奧美爾-帕沙當作叛教者和革命者加以免職，這可以認為是奧爾洛夫的維也納之行的第一個成果。凡是了解土耳其過去歷史的人都知道，從奧斯曼帝國存在時起，它所有主要的陸海軍將軍、外交官員和大臣們一向是叛教者-基督徒，是塞爾維亞人、希臘人、阿爾巴尼亞人等等。為什麼不要求俄國也將它從歐洲各處收羅的並成為它的外交藝術、政治智謀和軍事天才方面的全部家底的四五十個人一概撤職呢？與此同時，奧地利在土耳其邊境特蘭西瓦尼亞和匈牙利集結了8萬軍隊，並且派出了一個3萬人左右的捷克軍同他們會合。沙皇曾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以俄國的名義並且為了俄國的利益調10萬軍隊占領波蘭，使駐防在那裡的軍隊可以南調多瑙河各公國作戰，而普魯士政府好像是拒絕執行沙皇的要求。

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①，我已經向你們談過不久前奧地利政府所採取的財政詭計，它要求繳納稅款時，紙幣按票面貶值15%。在意大利現在也在普遍實行這種巧妙的“稅上加稅”的方法。1月22日的“米蘭報”公布了奧地利財政大臣的命令，宣布“因紙幣貶值，海關收稅時應按行市將票面貶低17%計值”。

至於俄國國庫的問題，我已經在所謂東方糾紛開始時向讀者警告過⁴⁹，不要聽信那些努力散布的謠言，說什麼聖彼得堡銀行的

① 見本卷第36頁。——編者注

地下室藏有“秘密”珍宝，也不要听信那些令人发笑的夸張的話，說俄国似乎有随时都可以动用的大量錢財。事实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沙皇不得不从英国和法国的銀行提取他的金屬儲备，除此之外，还采取了欺詐的沒收手段。帕斯凱維奇公爵通知华沙的貼現貸款銀行說，它的資本将作为强制性貸款提出（虽然这家銀行的章程規定，除地产之外，不得以任何保证条件貸款）。我們还听說俄国政府打算发行 6 000 万卢布的不兌現的紙币，以抵补軍事費用。彼得堡內閣采用类似的巧妙手段已經不是第一遭了。1768 年年底叶卡特林娜二世为了抵补同土耳其作战用的开支，建立了一个似乎以发行可兌現的紙币为原則的阿西格那齐銀行^①。但是，同时完全有意地忘記告訴公众，这些紙币将以什么貨幣兌換，而过了几个月才开始只用銅币兌換。由于另一个不幸的“意外”，这些銅币的面額又高出了所含金屬的价值 50%，而且它們所以能按票面价值流通，仅仅因为数量很少，零售商业用的小額貨幣不足。可見，貨幣的兌換原来不过是一种詭計。最初叶卡特林娜发行的票面 25 卢布的紙币总数不超过 4 000 万卢布；卢布是按外汇行市折合英幣为 38 到 40 辨士的銀幣，相当于一百多个銅戈比。1796 年，叶卡特林娜去世以前，这种紙币数量增长到了 15 700 万卢布，也就是比最初的发行量增加了几乎 3 倍。倫敦的外汇行市从 1787 年的 41 个辨士，降到 1796 年的 31 个辨士。在以后的两届政府执政期間发行量都增长很快；1810 年紙币流通量达 57 700 万卢布，1 个紙卢布只值 $25 \frac{2}{5}$ 戈比，也就是等于 1788 年时的价值的 $\frac{1}{4}$ ，而 1810 年秋倫敦外汇行市降低，1 个卢布不能像以前那样換 38—40

① 指发行一种称为阿西格那齐的紙币的銀行。——譯者注

个辨士，而只能換 11.5 辨士。到 1817 年，据古里也夫伯爵的声明，流通中的銀行券数量达 83 600 万卢布。由于关税和其他賦稅都以銀卢布計算，政府也就宣布，阿西格那齐按 4 : 1 的比例收受，从而也就承认贬值 75%。那时因为还在繼續贬值，所以商品价格也在相应上漲而且波动极大。这种情况甚至使政府也开始感到不安，不能不去借外債，以便使部分銀行券回籠。到 1821 年 1 月 1 日，官方宣布銀行券的数量已减少到 64 000 万卢布。由于后来連續同土耳其、波斯、波兰、希瓦等国进行战争，阿西格那齐重又增加，外汇行市重又下跌，一切商品价格重又大幅度地波动。直到 1839 年 7 月 1 日，由于有大量粮食向英国出口，外汇行市才得到了調整，那时沙皇发布一个告示，宣布从 1840 年 7 月 1 日起，全部阿西格那齐必須都轉为銀行票，而銀行票应按足值銀卢布即 38 个辨士兌換。沙皇亚历山大过去曾宣布阿西格那齐由稅吏按 4 : 1 的比例收受；沙皇尼古拉依靠轉換的办法，似乎重又恢复了阿西格那齐的全部价值。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附加条件，即規定三張半的旧票作一張新票使用。可見，虽沒有宣布旧票贬值到它原有价值的 28%，但是承认了三張半旧票等于一張新票。从这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一方面，俄国政府在財政方面也像对待外交事务那样认真，絲毫不苟，另一方面，单是临近的战争的威胁就足以使尼古拉几乎二十年来一直試圖摆脱的財政困难重新产生。

欧洲政府一个跟着一个向自己心爱的臣民发表演說，呼吁要錢。連沉着的荷兰人的国王^①也向国会要求用 60 万国家达勒来修筑工事和进行国防建設，并且說：“情况可能迫使他动員部分軍

① 即威廉三世。——編者注

队和派出他的海軍。”

如果采取巧妙的會計方法可以帮助解决貨幣实际不足的問題，而把空錢箱裝滿的話，那末不久前在“通报”上公布的法国預算的編制人大概已經取得一些成績了。但是，即使是巴黎最小的商人也不会看錯这样的事实：用最巧妙的数字分类决不能把他的名字从債主的賬本中勾掉，而且十二月二日的英雄^①认为人民的錢財是取之不尽的，不加考虑地增加了国家的債務。

最天真不过的是丹麦內閣在 1 月 17 日下院會議上发表的声明，声明說，政府打算把改变丹麦基本制度的計劃和实施等待已久的全国宪法(Gesamtstaatsverfassung)⁵⁰推迟到最适当的时候。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2 月 3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4 年 2 月 20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007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① 即拿破侖第三。——編者注

卡·馬克思

*藍皮书。——二月六日的議會辯論。
——奧尔洛夫伯爵的使命。——
联軍艦队的行动。——爱尔兰旅。
——关于工人議会的召开

1854年2月7日星期二于倫敦

我非常认真地讀完了“正教教会和天主教会的权利和特权”（这是人們給政府关于东方問題的藍皮书⁵¹的俏皮的称呼），并打算在最近向讀者簡要地評述一下这个外交上的迷宮。現在我只是肯定地說，历史上也許从来没有过比这更駭人听聞的表明政府的卑鄙和愚蠢的文献了。讓我們也回忆一下貝利先生在下院对这个藍皮书的評价：

“至于說到消息，那藍皮书里有的是，但是請注意，这不是正式的消息，而只是从那个仔細編写的、对政府乐意隱瞞的一切东西只字不提的藍皮书中可以知道的东西。我这样讲是根据自己亲身的經驗（喊声：“听啊！听啊！”，政府席上发出笑声）。我很清楚这个給下院的对外政策問題的藍皮书是怎样編写的。”

我非常清楚，有一次有人責备帕麦斯顿勋爵歪曲了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文件，隱瞞了官方报告中的几个极为重要的地方，甚至还

故意捏造一些地方⁵²；帕麦斯顿作了下面这个很机智的回答：

“先生，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那末，是什么东西妨碍了接替我們的那两届我們的政敌的政府——其中有一届还执政5年——宣布这事实并把真正的文件公布出来呢？”

但是我同样地非常清楚，藍皮书里这种把戏的秘密在于輝格党和托利党輪流执政这种制度本身，在这种制度下面，每个政党为了自己的利益都不願去破坏自己的政敌的政治“声誉”，相反地，力图使他們有可能替换自己以免統治階級的統治的基础遭到破坏。而不列顛人还把这一套叫做發揮自己的光荣宪法的职能。

克兰里卡德勋爵曾經預告，他要在定于昨天举行的上院會議上建議开始討論东方問題。因此，人們对这次會議抱了很大的期望，上院几乎挤得滿滿的。在昨天的“晨报”上，烏尔卡尔特先生甚至毫不犹豫地称克兰里卡德勋爵为民族派的未来領袖，他还提到在1829年只有克兰里卡德一个人反对俄国人越过巴尔干。但是烏尔卡尔特先生无疑忘記了，也就是这位高貴的侯爵在1839—1840年这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曾任帕麦斯顿勋爵駐圣彼得堡宮廷的大使，而且在1840年締結单独条約以及同法国断絕关系⁵³这些事情上是勋爵的主要工具。

公众对辯論显然感到失望，因为克兰里卡德侯爵以报上所謂“在維也納某种类似談判的东西看来还在繼續”的消息为借口声明，“他很不願意引起可能妨碍上述談判的和平結束的辯論”。因此，他在最后指出，他打算一星期后就同一問題提出建議。高貴的侯爵只是問克拉倫登勋爵是不是“还没有收到俄皇对維也納建議的答复”，“給英国駐圣彼得堡大使发出的指示”是什么。克拉倫登勋爵回答說，他“今天白天才从維也納得到关于局势的正式消息”。

俄皇拒絕了維也納的照會，提出了一個反建議。而2月2日的會議又拒絕了這個反建議。

克拉倫登勳爵繼續說：“俄國提出的新建議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這些建議不能轉交給君士坦丁堡，因此，關於這些建議就不必再提了。我沒有根據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將開始新的談判。至於對保持和平的希望，那我根本沒有。”

在回答克蘭里卡德勳爵的另一個問題時，他說：

“星期六晚上，布隆諾夫男爵到外交部來拜會我，並交給我一份照會，照會說，他從我那里收到的對於他根據本國政府的指示而提出的問題的答復，使他不能再繼續保持外交關係，因此俄國同英國的外交關係斷絕了。布隆諾夫男爵星期六晚上同我告別，但當時離開倫敦已經晚了，據我所知，他應當在今天清晨離開。”

據電訊報道，基謝廖夫先生昨天已離開巴黎前往布魯塞爾。官方的或者說政府的報紙報道說，駐倫敦的大使館將要關閉，所有的俄國人都將離開英國。而我根據非常可靠的消息所了解的情況正好相反，在英國的俄國人只減少了大使一人，其餘的全体 personnel〔人員〕都留在倫敦由大使館一等秘書貝爾格先生領導。關於英國駐聖彼得堡宮廷的大使的情況，克拉倫登勳爵說：

“因為布隆諾夫男爵是在星期六6點半來拜會我的，又因為要事先同法國政府商量，所以當時已不可能向英國駐聖彼得堡的大使發出指示，但是我們已經同法國大使商量過這個問題，明天就會給漢·西摩爾爵士和德·卡斯特爾巴雅克將軍發出指示，這個指示將使他們處於同這里的俄國大使一樣的境況，兩國同俄國的外交關係也將斷絕。”

約翰·羅素勳爵在下院重復了克拉倫登勳爵在上院的聲明，而帕麥斯頓勳爵宣稱，

“他打算提出一項把關於民軍的各項法律歸并的法案——這個法案規定組織蘇格蘭和愛爾蘭的民軍部隊，而募集的時間應由下院投票決定”。

英国军队将立即增加 11 000 人；此外，还应立即从海岸警卫队里調 1 500 人到舰船上，作为最近准备出航的舰只的新补充的舰員的預备队。女王已經頒布了一道命令，禁止向俄国輸出任何軍艦、軍事物資和彈药。海軍当局視察了太晤士河的私营造船厂，查禁了两艘正在为俄国建造的舰船。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在哥本哈根簽訂了供給总共 11 000 馬力的蒸汽舰用煤的合同。海軍上将查理·納皮尔爵士应当担任新編的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

据官方报纸“維也納日报”报道：

“政府已接到通知，說俄国已直接向四强国声明，俄国认为它已經不受它在奥里繆茨提出的在多瑙河各公国保持防御状态的諾言的約束。”

关于奥尔洛夫伯爵在維也納的使命所追求的目的，傳說紛紜；其中最可靠的，看来是今天“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柏林通訊所談到的傳聞。

記者写道：“俄国邀請奥地利和普魯士同它締結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的中立条約；俄国建議它們的宣言要宣布整个德意志联邦保持中立，俄国同意在联邦中的任何一个成員遭到攻击时帮助联邦，并且保证，如果战后領土有任何改变，应当充分考虑到各德意志强国在領土改变的情况下的利益，否則决不締結和約。这个关于中立条約的建議，显然援引了 1815 年神圣同盟的原則和条例。”

至于奥地利和普魯士可能作出的决定，我只能重述我在这个問題上已經讲过的意見^①。只要可能，奥地利将尽力保持自己的中立立場，并且只要有利的时机一到它就会站到俄国方面去。另一方面，普魯士可能又会放过拒絕中立的适当时机，結果給自己带来新耶拿的耻辱。

① 見本卷第 4—8 頁。——編者注

据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报道，联軍舰队不顾“参孙号”輪船代表大使們轉交給它的命令而返回了自己在貝科茲的停泊地，这个命令說：

“大使們对海軍上將們的出乎意外的决定感到惊讶，特别是在目前，在装載供給安那托里亚軍团的彈药和其他物資的土耳其蒸汽舰区舰队已經作好了开航的准备的时候，尤其如此。法英两国政府在命令中正式地、清楚地指示过（的确是这樣，但是这不是指起初給海軍上將們的命令，而只是指剛剛接到的命令），联軍分舰队必須保卫奧斯曼的舰队和領土。因此，再一次請两位海軍上將注意这些按照应有的手續交給他們的指令的严重性质。看来，海軍上將們认为，不管他們所指揮的兵力在什么地方，——在貝科茲或是在西諾普，交給他們执行的措施一样可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可能认为即使分舰队安然地停在馬尔他和土倫，那些指令也能完成。）但是，这个問題如何解决应当完全由他們考虑，由他們負責。”

大家知道，俄国的舰队停在靠近刻赤海峽的卡法，从那里到巴士姆的路程只等于到貝科茲的三分之一。試問，海軍上將們是不是“不管他們停在什么地方，——貝科茲或是別的地方”，都能防止“西諾普”事件在巴士姆重演？

大概你們还記得，沙皇的第一个文告曾指責苏丹把全欧的革命“渣滓”收罗到自己的旗帜下面。正当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向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表示，不能帮助他把这些“渣滓”的任何一部分組成志願軍团的时候，沙皇本人就首先成立了“革命”部队，即所謂希腊-斯拉夫軍团，直接为了煽动苏丹的臣民暴动。这个部队是在瓦拉几亚組成的，根据俄国的报道，它已有3 000多人，对这些人，将不是像对瓦拉几亚人那样付以 *bons à perpétuité* [无期債券]，而是答应每天給上校 5 杜卡特^①，少校 3 杜

① 古代威尼斯的金币，十三世紀初見于意大利，以后欧洲許多国家都鑄造杜卡特币。——譯者注

卡特，上尉給 2 杜卡特，軍士給 1 杜卡特，兵士給 40 分尼；他們的武器應由俄國供給。

然而，法國顯然已經不再打算僅在紙上談兵了。你們都知道，1851 年的預備兵已經應征入伍，而最近幾天已經從阿拉斯運了大量的軍事裝備到麥茨和斯特拉斯堡。佩利西埃將軍已經前往阿爾及利亞，按照他接到的命令，他在那里必須為即將遠征君士坦丁堡選拔幾個軍，約·伯戈因先生和阿爾丹上校已經前往君士坦丁堡作扎營的準備工作。

關於奧美爾-帕沙率領的大軍調動的傳說，還有待證實，儘管實行這個措施未必會有更有利的時機，因為大家知道，俄國軍隊已經集結在布加勒斯特和卡拉法特之間的克拉約瓦。

現在讓我們再回過頭來談英國議會的活動，雖然那里除了提出關於外國船隻近海貿易自由航行的法案（而且這個提案沒有遭到任何反對）以外，實際上值得提起的事件很少。沒有反對這個法案，顯然是由於無力抗拒已經贏得了整個世界的現代貿易原則：在最便宜的市場上購買你所需要的一切。至於最便宜的船員是怎麼保護人的生命和財產的，最近“泰勒號”輪船的遇難⁵⁴就已經作了證明。

在昨天下院的會議上，巴特先生說他打算

“在明天提出一項建議，要議院秘書在講台上宣讀今天‘泰晤士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和以前‘都柏林公民報’（«Dublin Freeman's Journal»）的一些報道，其中都指責下院的〈愛爾蘭的〉議員拿職位賣錢。他還打算建議選出一個委員會來調查上述報道中關於拿職位做買賣的說法。”

凡是還記得前一次會議規定過用任何別的方式做買賣都是合法的人，都會明白為什麼巴特先生只是對拿職位賣錢表示憤慨。

从1830年起，唐宁街就处于依賴爱尔兰旅⁵⁵的地位。正是爱尔兰議員擅自任命和支持大臣。1834年他們把詹·格萊安爵士和斯坦利勳爵攆出了內閣。1835年他們迫使威廉四世让皮尔內閣辞职而恢复了墨尔本政府。从1837年大选直到1841年选举，尽管同这届內閣相敌对的英格兰的議員在下院占多数，但是爱尔兰旅的票数力量却大得足以决定大局，使这个內閣仍然执政。建立联合內閣的也是这个爱尔兰旅。虽然爱尔兰旅有了这种建立內閣的能力，但是它从来没有阻止过任何一次对爱尔兰的卑鄙无耻的行为和对英格兰人民的不公正的行为。1834—1841年的奥康奈尔时期是爱尔兰旅最强大的时期。它的强大力量被用来为誰的利益服务呢？爱尔兰的宣傳鼓动始終不过是大叫大嚷地支持輝格党反对托利党，以便向輝格党勒索一些职位。任何一个稍微知道所謂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⁵⁶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根据这个协定，奥康奈尔虽然也可以大叫大嚷地反对輝格党，但是他必須投票贊成輝格党，条件是給予奥康奈尔以在爱尔兰任命負責人員的权利。現在是爱尔兰旅抛掉爱国主义假面具的时候了。現在是爱尔兰人民不再对英格兰人采取沉默的仇視，而要求自己的代表对他們的罪过負責的时候了。

“艺术和騙术协会”⁵⁷最近企图运用自己的艺术，通过一种妄图“制止”英国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不斷斗争的手法来破坏工人議會^①。在某高貴的勳爵主持下曾召开了一个會議，建議双方代表完全本着在路易·勃朗的主持下在卢森堡宮召开的會議⁵⁸的精神申訴自己的意見。厄內斯特·琼斯先生代表工人階級对这种欺騙提

① 見本卷第125頁和編者注。——編者注

出抗議,老罗伯特·欧文向有教养的紳士們声明,不管用什么仲裁办法,用什么圈套或詭計,永远也不能填滿那条把英国和任何一个国家里的两大主要階級分割开来的鴻沟。大概不用多說,这个會議在成了一般人的笑柄之后解散了。第二天,倫敦的宪章派和外地的宪章派組織的代表举行了公开會議,会上一致通过了召集工人議会的提案,并定于3月11日在曼彻斯特开幕。

卡·馬克思写于1854年2月7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4年2月21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4008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問題的
藍皮书。——門的内哥罗

1854年2月10日星期五于倫敦

在丹麦同瑞典訂立中立条約时，我就曾确信^①，与英法流行的看法相反，这个条約根本不能看做是西方强国的胜利，俄国假意反对中立条約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斯堪的那維亚各报以及引述这些报纸的“泰晤士报”記者現在也一致表示同样的看法，并且宣称整个条約都出自俄国之手。

奥尔洛夫伯爵向維也納會議提出的并已被它否決的建議是这样的：

- (1) 恢复过去的条約；
- (2) 俄国对土耳其的正教臣民具有保护权；
- (3) 将所有政治流亡者逐出奥斯曼帝国；
- (4) 俄国拒絕接受任何其他强国的調停，并拒絕举行談判，除非直接通过土耳其派往圣彼得堡的全权代表。

至于最后一項，奥尔洛夫伯爵是准备让步的，可是會議拒絕了。會議究竟为什么要拒絕呢？或者說，为什么俄皇对會議的最

① 見本卷第49頁。——編者注

后一些条件也加以拒絕呢？其实双方的提議是一致的。恢复过去的条約这一項被通过了，俄国的保护权也被接受了，只是作了某些形式上的修改，最后一項俄国自己也放棄了；就是奥地利关于驅逐政治流亡者的要求⁵⁹也不能成为俄国与西方决裂的原因。显然，俄皇現在的处境就是：他不能接受法英提出的任何条件，并且必須使土耳其屈从于他，而不管这会不会引起欧洲战争。

軍界已經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所有战綫正进行备战工作。布律阿海軍上将已离布勒斯特前往阿尔及尔，并将指揮 1 万人从这里上船；駐扎在爱尔兰的 16 个团的英軍已奉命准备开往君士坦丁堡。这次远征只可能有两个目的：或者像烏尔卡尔特先生所断言的那样，迫使土耳其人屈从于俄国；或者真的去与俄国作战。这两种情况都必然使土耳其人遭受到同一个厄运。如果他們重新落到俄国手里（即使不直接落在它手里也一样），遭到俄国破坏力的摧殘，那末奥斯曼帝国很快就会像当年拜占庭那样仅仅保有同首都直接相連的一片領土。如果土耳其人受法英共同监护，那同样会丧失对它的欧洲領地的权力。

“泰晤士报”指出：“如果我們必須将战争的进行掌握在我們手中，那末我們也必須有可能指导一切軍事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政府将处于西方强国大使的直接领导下，土耳其的陆軍部将受英法陆軍部领导，而土耳其的軍隊也将归英法將軍领导了。原来的土耳其帝国将不再存在。

奥尔洛夫伯爵在維也納全盤“失敗”以后，現在回到了圣彼得堡，他“得到的保证是，奥地利和普魯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保持中立”。

另一方面，維也納的电訊报道說，土耳其政府发生了变动，因

为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已经呈请辞职。“泰晤士报”不能理解，正当英法准备发动战争的时候，主战派怎么会遭受失败。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末我个人认为这次“解救性的”事变只不过是英国联合内阁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造成的，也就是那位因“自己对土耳其内阁的压力目前还远不能达到预期的影响”而经常在他的紧急报告(已在蓝皮书中发表)中表示遗憾的代表造成的。

蓝皮书一开始就是关于法国在圣地问题上提出的要求的报告，这些要求还没有完全被过去的特惠条例⁶⁰承认，而且这些要求的提出显然是企图使罗马天主教会比正教教会占优势。乌尔卡尔特先生认为，沙皇利用在巴黎的潜在影响，唆使波拿巴发起冲突，企图使俄国有借口为正教徒的利益亲自出面干预，这种看法我完全不同意。大家都十分了解，波拿巴不惜 *coûte que coûte* [任何代价]求得天主教派的支持，他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支持看做他篡夺政权成功的主要条件。波拿巴十分明白，天主教会对法国农民具有多大的影响；要知道，正应该是农民使他违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意志而当皇帝。耶稣会教徒法卢先生是第一届波拿巴政府中最有势力的成员，而 *soi-disant* [所谓] 伏尔泰信徒奥迪隆·巴罗只是政府中名义上的首脑。这个政府在波拿巴就任总统以后的第一天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是对罗马共和国的有名的远征。耶稣会派的首领蒙塔郎贝尔先生是波拿巴在推翻议会制度和十二月二日 *coup d'état* [政变] 时最得力的工具。1850年时，耶稣会派的正式机关报“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界”每天要求法国政府采取坚决的措施来保护东方的天主教会。波拿巴本来就想讨好教皇，拉他到自己这边来，并由他给自己加冕，所以当然有理由听取这种要求，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最忠于天主教的”⁶¹ 法国皇帝。所

以現在東方危机的真正根源是波拿巴的篡位。不过，当波拿巴一发现尼古拉皇帝要把他的要求作为把他从欧洲教皇选举会开除出去的理由时，他又聪明地收回了他的要求，而俄国，却与烏尔卡尔特先生所想的相反，是按他一貫的做法，努力在他自己无力創造的环境中取得利益。无論如何，历史学家都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奥斯曼帝国目前的危机是因为天主教会与正教教会的冲突引起的，而过去这种冲突曾推动这个帝国在欧洲建立起来。

我本不想深入研究“天主教会和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全部内容，所以沒有先提到藍皮书中諱莫如深的极其重要的事件。这里談的是奥土两国关于門的內哥罗的爭吵。預先了解这件事情极其必要，因为这可以揭示奥俄協議的关于消灭和瓜分土耳其帝国的計劃是存在的。其所以必要，还因为英国把圣彼得堡宮廷同土耳其政府的进一步談判交給奥地利的这一事实本身使人对英国內閣在发生东方危机的整个时期中的态度感到困惑。由于沒有任何关于門的內哥罗問題的正式文件，我就以剛出版的萊·弗·辛普森的著作“东方問題手冊”⁶²为依据。

土耳其扎勃利亚克要塞(在門的內哥罗和阿尔巴尼亚接壤处)于1852年12月受到門的內哥罗部队的攻击。讀者还記得，土耳其政府曾派奥美尔-帕沙击退了这次的进攻。土耳其政府宣布封鎖阿尔巴尼亚全部海岸。显然，这个措施只能是用来对付奥地利和它的舰队，这也說明土耳其內閣相信門的內哥罗的叛乱是由奥地利挑撥起来的。

后来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刊登了下面一則由維也納寄来的日期标明为1852年12月29日的短評：

“如果奥地利真想支援门的内哥罗人，那末封锁也是徒劳的。就是亚得利亚海有土耳其的舰队，只要门的内哥罗人能下山，奥地利就能在卡塔罗供应他们枪枝弹药。奥地利既不支持当前门的内哥罗人的袭击，也不赞助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基督教居民中即将发生的暴动。奥地利经常表示反对压迫基督徒，这样做是出于人道的考虑。它对待东方教会的问题不得不保持中立。耶路撒冷最近的消息说明，那里燃起的宗教仇恨的火焰具有多么可怕的力量。所以奥地利的活动家不得不竭尽全力保持奥地利帝国的正教居民和天主教居民之间的和平。”

从这篇短评看来，我们可以知道，首先，人们坚定地指望土耳其基督教居民中会发生暴动；其次，奥地利为俄国控诉压迫正教教会准备了根据；第三，预计奥地利的“中立”将使“圣地”问题上的宗教纠纷复杂化。

俄国就在那一个月递交土耳其政府一份照会，建议由俄国出面调停门的内哥罗问题。这次调停被拒绝了，其理由据说是苏丹自己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看到，俄国在这件事上的行为正像在希腊革命⁶³时一样：最初向苏丹表示保护他而反对他的臣民，为的是一旦俄国的帮助不被接受，就保护苏丹的臣民去反对苏丹本人。

从1852年12月30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另一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俄奥之间在那时已经有了关于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协议。

“不久前承认门的内哥罗独立的俄国对事变未必会抱袖手旁观的态度。此外，从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来的事务性函件和旅行者的谈话中可以得知，自沃伦到普鲁特河口的整个地带到处都是俄国军队，而且还不断有增援部队开到。”

就在那时，维也纳的报纸报道说，在奥土边境集结了奥地利的观察兵团。

1852年12月6日斯坦利勳爵曾向馬姆茲伯里勳爵詢問門的內哥羅的事態，這位波拿巴的高貴朋友曾作了以下的聲明：

“高貴的勳爵想詢問在同阿爾巴尼亞接壤的名叫門的內哥羅的野蠻國家中政局是否發生了什麼變化。我認為那里的政局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這個國家的首腦具有雙重身分：他是這個國家正教教會首領，同時是世俗的國王。他作為教會的首領，應服從被認為是全正教教會首領的俄皇的管轄。門的內哥羅首腦（我想他所有的先輩也一樣）慣於由俄皇批准和承認他的主教的權力和稱號。至於這個國家的獨立問題，雖然各種人對上述情況的重大作用有許多看法，但事實仍然是事實：門的內哥羅作為獨立的國家，已存在將近150年了。雖然土耳其政府多次企圖征服它，但是這種企圖都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敗。目前這個國家所處的情況正像它200年前所處的情況一樣。”

當時托利黨政府的外交大臣馬姆茲伯里勳爵在這次講話中滿不在乎地將奧斯曼帝國加以分割，把一向從屬於它的國家同它分割開來，同時承認俄皇對於土耳其帝國臣民進行精神統治的要求。關於這兩個寡頭政治集團，他們除了爭做蠢事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自然，土耳其政府對不列顛大臣的這一番話感到極大的不安，於是緊接着就在一家英國報紙上登出了一封1853年1月5日發自君士坦丁堡的信：

“馬姆茲伯里勳爵在上院竟聲稱門的內哥羅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使土耳其政府大為震驚。他這是為俄國和奧地利出力；這樣一來，英國喪失了一向享有的威望和信譽。土耳其政府和奧地利之間在1791年（在英國、俄國、荷蘭的調停下）簽訂的西斯托夫和約的第一條中規定得很明確，對兩國起來反對本國合法君主的臣民應予特赦；當時列舉的土耳其帝國的叛亂臣民是塞爾維亞人、門的內哥羅人、莫爾達維亞人、瓦拉幾亞人。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門的內哥羅人約有兩三千，他們都繳納哈拉志（人頭稅），並且在法院審理在君士坦丁堡居住的其他強國的臣民時，他們也一直被看成是土耳其的臣民，

而且也沒有人提出过任何異議。”

1853年初，奥地利政府派了皇帝的侍卫长克耳納·馮·克倫施坦男爵到卡塔罗观察事件的进展情况，就在那时，駐君士坦丁堡的俄国代办奥捷罗夫先生也正向御前會議提出抗議，反对在圣地問題上向天主教会所作的让步。1月底萊宁根伯爵到达君士坦丁堡，2月3日被允許单独覲見苏丹，并向他轉交了奥皇的专函。土耳其政府拒絕执行专函中所提出的要求，接着，萊宁根伯爵又递交了最后通牒，限土耳其政府4天内答复。土耳其政府立即請求英法保护，而英法并没有給它任何保护，同时萊宁根伯爵也拒絕了英法的調停。2月15日萊宁根达到了他的一切要求（第三条除外），他的最后通牒被接受了。最后通牒包括以下几項：

一、立即撤出門的内哥罗，并恢复 *status quo ante bellum*〔战前状态〕。

二、土耳其政府声明自己有責任保持克列克和苏托林領土の *status quo*〔現狀〕，并承认奥地利在 *mare clausum*〔內海〕的利益。

三、严格追究穆斯林反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維那的基督教居民的宗教狂热行为。

四、清除与奥地利接壤各省現有的全部政治流亡者和叛变者。

五、支付20万弗罗倫給奥地利商人，以补偿他們因原訂合同被随意廢除而受的損失；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遵守合同。

六、賠償一个被非法沒收船只和貨物的商人5万弗罗倫。

七、在波斯尼亚、塞爾維亞、黑塞哥維那和魯美利亞各地設立領事館。

八、譴責1850年土耳其当局在侨民問題上的行为。

据辛普森先生报道，奧斯曼政府在同意最后通牒以前曾向英法大使送去一份照会，要求它們在发生对奥战争时答应給它实际的援助。“因为两国大使都没有可能用某些义务把自己束縛起来”，

土耳其政府才向萊宁根伯爵的坚决要求作了让步。

2月28日萊宁根伯爵回到維也納，而緬施科夫公爵到了君士坦丁堡。3月3日約翰·羅素勳爵回答達德利·斯圖亞特勳爵的詢問時厚顏無耻地說，

“奧地利政府在回答我們提交的文件時，已經肯定表示在這個問題上同英國政府持有同樣的觀點；雖然他也不能確切說明這次的協議，但是英法進行的干預**很成功**，而且他相信最後的分歧也已經消除。英國所採取的方針，就是勸告土耳其保持它的榮譽和獨立……他自己認為，從正義、國際法、對我們盟國的忠誠這方面來看，同時從整個政策和合理性方面來看，**保持土耳其的完整和獨立是英國對外政策中重大的和決定的環節。**”

卡·馬克思寫於1854年2月10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1854年2月27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4013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弗·恩格斯

欧洲战争问题

虽然“訥什維耳号”到达后并没有从战区给我们带来任何重要的消息，但是只要注意一下目前的局势，我们就可以知道十分重要的事实。其主要之点就是：现在，在俄国大使已经离开巴黎和伦敦、英法大使已经从圣彼得堡召回、法英两国的海陆军已经集中待命立即行动的最后时刻，——就在这最后的时刻，两个西方国家政府又建议俄国举行谈判，而且建议本身中就已包含了对俄国的几乎一切要求的让步。值得提醒的是，俄国的主要要求是承认它有直接同土耳其政府解决它所谓的仅仅涉及它同土耳其的争端而不受其他强国干涉的权利。现在俄国已被承认有这个权利。建议写在拿破侖的信⁶⁴中（该信另栏发表），归纳起来就是：俄国可以直接同土耳其谈判，但是它们之间签订的条约必须由四强国保证。这种保证缩小了让步的意义，因为它给西方强国留下了在将来任何类似冲突中进行干涉的现成的借口。但是俄国的处境并不会因此而比现在更坏，现在沙皇尼古拉不能不看到他想瓜分土耳其的任何企图都要冒同英法交战的危险。可是，俄国能否得到真正的好处将决定于还没有签订的条约的性质；俄国现在已经看出西方强国如何胆怯地力求避免战争，所以只要将自己的军队保持集中状态，照过去那样使用恐吓的手段，就足以在谈判时在所有条款上达

到自己的目的。何况俄国外交可以不怕同那些提出以失策見称的第一次維也納照会⁶⁵的声名狼籍的大使們进行爭辯。

但是，还不知道沙皇是接受这些建議还是宁願依靠自己的军队。他不能使自己每五年就这样备战一番，并在整个辽阔的帝国内調遣军队。备战的規模这样大，以致只有取得物质上非常大的好处才能弥补这方面的耗費。俄国居民的战斗热情被精心地激发起来了。我們曾看到一个俄国商人写的一封信的副本，他不是許多定居在莫斯科的德国、英国或法国商人中的一个，而是道道地地的老俄国人，是神圣俄罗斯的真正儿子。他以經紀人的身分在自己的仓库里貯存着准备出售的英国貨物。有人問他如果发生战争，这些貨物是否有被沒收的危險。这位老俄国人对于在这方面对他的政府表示怀疑的态度感到憤怒，加之他掌握了官方的用語，即所謂俄国与西方“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同，是“秩序、財產、家庭和宗教”的偉大的捍卫者，因而他反駁說：

“謝天謝地，在我們俄国‘我的’和‘你的’之間的区别还完全有效，因此你們的財產在这里比在任何別的地方都要安全。我甚至还要劝你們尽量把你們的財產轉存到这里来，因为存放在这里可能比它現在存放的地点更好。如果为你們的同胞担心，你們也許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你們的財產不安，就毫无必要了。”

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也在最大規模地进行备战。法国的远洋舰队从布勒斯特被召回土倫，准备运送部队到近东去。根据各种消息来看，預定派出4—6万人的军队，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非洲军队中抽調的。远征軍将由猎兵来大大加强，并将由巴拉盖·狄利埃或圣阿尔諾指揮。英国政府准备派出大約18 000名兵士（22个团，每团850人），在我們最近所收到的消息发出的那一天，

有一部分军队已经运往总集合地点馬尔他島。步兵由輪船运送，而帆船則用来运送騎兵。应于3月6日在距席尔涅斯不远的太晤士河口集中的波罗的海舰队，将由15艘战列舰、8艘巡航舰和17艘小型舰船組成。这是英国人从上次战争⁶⁶以来所編成的最大的舰队；既然这个舰队的半数舰只一定是明輪式和螺旋推进式蒸汽舰，既然現在軍舰的体积和舰上的火炮的威力比半世紀以前几乎增大50%，那末波罗的海舰队可能拥有任何一国过去从未有过的最强大的武器装备。指揮这个舰队的将是查理·納皮尔爵士。如果发生战争，沒有人能比他更善于将炮口立即指向有决定意义的地点了。

在多瑙河上，切塔特会战看来使俄軍推迟了进攻卡拉法特的時間。这5天的战斗使俄軍認識到要夺取一座能够进行类似的出击的营壘不是容易的事。也許有了这样的經驗以后，就連专制君主本人的圣諭也不足以迫使他的軍隊輕率地进攻了。专门从华沙派到那里去的工程长官施尔德尔將軍的到达，看来甚至造成了同沙皇命令完全相反的结果，因为在一定距离上对工事的观察，已經完全足以使施尔德尔相信不是去加速进攻，而是要增加比短期內所能集中的更多的兵力和重炮。因此，俄軍在卡拉法特周圍集中一切可能調遣的兵力已經有一段时间了，同时还在向那里运送攻城炮，据說，有72門炮已經运到瓦拉几亚。倫敦“泰晤士报”估計俄軍兵力为65 000人，如果回想一下多瑙河各公国内俄軍的总数，我們认为这个数目似乎有些夸大。这一支俄軍現在除哥薩克、猎兵和其他专业部队以外，有6个步兵师、3个騎兵师和大約300門野炮；軍事行动开始前正式公布的总数为12万人。除去伤亡和病員3万人以外，估計現在适宜于执行勤务的还有9万人，其

中至少有 35 000 人要用来防守多瑙河一綫、担任重要城市的守备勤务和保障交通綫。因此，用来攻击卡拉法特的最多只有 55 000 人。

現在我們再来看看双方的陣地。俄軍既不注意多瑙河全綫，也不理睬奧美尔-帕沙在苏姆拉的陣地，而把自己的主力甚至重炮都集中在极右翼，集中在使他們距离自己最近的作战基地布加勒斯特比土軍距离該地还远的地点。因此他們的后方便暴露无遺了。更糟的是，俄軍为了哪怕从后方稍微得到掩护起見，不得不分散兵力，因而在卡拉法特前面就沒有那种保证他們取胜、从而证明整个这次机动正确的明显的兵力优势。俄軍以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的部队分散配置在主力的后面，而这些部队当然无力抵抗稍微坚决的攻击。因此，夺取卡拉法特是沒有保证的，而圍攻者的交通綫却有被攻击的危險。这个錯誤如此明显，如此严重，以致只有絕對确凿的事实才能使一个軍人相信会有人真正犯了这样的錯誤。

仍然掌握較大兵力的奧美尔-帕沙，如能率領譬如說 7 万人在魯舒克和希尔索瓦之間的任何一点强渡多瑙河，那末俄軍不是全部被歼，就是只好到奧地利去避难。奧美尔-帕沙曾有整整一个月的時間可以用来集中这样数量的軍隊。既然現在河上已沒有流冰，为什么他不强渡呢？为什么他甚至不重新占領沃耳特尼察附近的 tête-de-pont〔桥头堡〕以便能随时出动呢？說奧美尔-帕沙沒有看出俄軍因严重失策而給他造成的机会，那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因此可以推測，他受到外交活动的限制。显然，他按兵不动一定会冲淡联軍舰队在黑海漫游所造成的印象。把俄軍歼灭或驅逐到奧地利是不行的，因为这样会給締結和約造成新困难。正是为了迎

合这些投机外交家的阴谋诡计和不正当的活动,奥美尔-帕沙才只好容忍俄军轰击卡拉法特;他只得看着俄军把全部军队、全部攻城炮都置于他的打击之下,却无权利用这一机会。事实上,如果俄军司令官没有得到完全肯定的保证而相信他的翼侧和后方不会受到袭击,我们认为他决不敢对卡拉法特采取行动。否则,不论他接到过什么样的指示,他都会受到战地法庭的审判并被枪决。如果今天或至迟最近这几天轮船开到后,我们得不到奥美尔-帕沙渡过多瑙河并向布加勒斯特进攻的消息,我们就很难放弃这样的结论:西方强国相互之间签订了正式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卡拉法特不得不作为牺牲品来满足俄国的军事虚荣心,同时土耳其不得使用唯一可靠的手段,即在多瑙河下游采取进攻行动的方法来保卫卡拉法特⁶⁷。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2 月 13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3 月 6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19 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普魯士內閣的声明。——波拿巴的 計劃。——普魯士的政策

我們从倫敦非常可靠的来源得到了以下消息。这些消息如被证实,将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英国报纸只是部分披露了这些消息,而且加以歪曲⁶⁸。

一、2月3日普魯士內閣向巴黎和倫敦送去了如下的声明:

“(1)經奥尔洛夫伯爵說明以后,毫無疑問,在圣彼得堡內閣那里繼續進行調停的企图是徒勞無益的,所以,普魯士特此声明不再調停,因为調停的条件不再存在了。

(2)奥尔洛夫伯爵关于締結**正式的**和具有約束力的中立条約的建議遭到了堅決的拒絕,并在專門的照會中已通知了他,因为即使沒有奧地利的同意,普魯士自己也要堅守最嚴格的中立,并且決定在適當的時候用**相當的武裝**來保證這種中立。

(3)普魯士是否將和奧地利共同提出武裝全德意志聯邦的建議——將取決於海上強國對德意志的態度。”

二、路易-拿破侖派他的代表(布朗尼埃先生)携函前往都灵晋見皮蒙特國王和卡富尔先生。函件內容如下:帕尔馬、皮阿琴察、瓜斯塔拉、摩地那在一定的時刻將會爆發革命運動。那時撒丁必須占領這些地方,把目前在那里進行統治的君主們赶走。拿破侖向皮蒙特國王保證將前三个公國,可能還有摩地那都并給撒丁;但

必須把薩瓦伯爵領地讓給法國作為交換。英國在表示了某種程度的反對後，可以說也同意了這種勾當，雖然十分勉強。後來布朗尼埃先生繼續在意大利旅行，最後到了那不勒斯，他在那裡的出現留下了“非常難堪的印象”。布朗尼埃先生的使命是在意大利製造起義，因為拿破侖當真認為自己不僅能在意大利燃起一場大火，而且能確定火焰蔓延的確切界限。他預定把軍隊集中在以下地點：

- (1) 薩瓦邊境 10 萬兵士；
- (2) 麥茨 6 萬兵士；
- (3) 斯特拉斯堡 8 萬兵士。

三、普魯士並不反對在薩瓦邊境駐扎 10 萬法國軍隊，但是它認為把一個軍團集中在麥茨，把另一個軍團集中在斯特拉斯堡是對它的直接威脅。它彷彿看到起義已經席卷了巴登、黑森、維爾騰堡等地，10 萬農民從南德意志走向普魯士邊境。所以普魯士對這兩個措施提出抗議，而普魯士聲明的第三項的內容正是對這一點的暗示。無論如何，在 3 月底以前，也可能更早一些，普魯士軍隊的人數將增加到相當於戰時的水平。普魯士打算根據情況征集 20 萬到 30 萬人。但是，普魯士政府已經決定，如果拿破侖堅持把兩個軍團集中在麥茨和斯特拉斯堡的話，它將把自己的軍隊增加到 50 萬人。據說，柏林內閣充滿了恐懼和驚惶。在那里，國王和很大一部分大臣都傾向於同俄國合作，只有曼托伊費爾在普魯士親王的支持下，才使中立宣言得以通過（曼托伊費爾最初建議同英國結成正式同盟）。現在已經作出正式的內閣決議（Kabinetts-Beschluss），根據這個決議，在一定的情況下，必須在一夜之中把王國境內，首先是萊茵普魯士境內的所有最著名的民主主義者逮捕起來，並送往東普魯士要塞，在那里他們將不再有可能協助實現拿破侖的叛

乱計劃 (die Umsturzpläne Napoleon's!!) 和普遍地組織人民运动。預定只要在意大利一开始騷动，或者拿破侖把軍隊集中在麦茨和斯特拉斯堡，这个措施就立即付諸实行。听说，这个決議曾获得一致通过，虽然还没有規定出內閣认为需要实行这个措施的一切情况。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2 月 17 日

作为社論載于 1854 年 3 月 9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02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議會辯論⁶⁹

1854年2月21日星期二于倫敦

陸軍預算和海軍預算都已提交議會。下一年度的全部陸軍人員規定為 112 927 人，即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10 694 人。在國內外服役的陸軍的總開支，在到 1855 年 3 月 31 日為止的財政年度內，是 3 923 288 英鎊，其中不包括澳洲各殖民地的軍餉和東印度公司所擔負的開支。總數是 4 877 925 英鎊，這筆錢可以養活軍官 5 719 人，軍士 9 956 人，兵士 126 925 人。到 1855 年 3 月 31 日為止的年度的現役海軍預算是 5 979 866 英鎊，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1 172 446 英鎊。軍隊和炮的運輸費用是 225 050 英鎊，相應地增加了 72 100 英鎊。全年撥款總額為 7 447 948 英鎊。全體人員計有水兵 41 000 人，見習水兵 2 000 人，海軍陸戰隊兵士 15 500 人，再加上 116 個輔助人員，共為 58 616 人。

上星期五晚上累亞德先生聲稱，他打算促使人們注意東方問題，並且，正當下院議長準備離開議長席，使議院能夠轉而審查海軍預算⁷⁰的時候，他要求發言。剛過 4 點鐘，議會大廳四周的走廊上都擠滿了人，5 點鐘，議員全部到齊了。整整消磨了兩個鐘頭的時間空談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使得議員和公眾都表現出明顯的不快。那些尊敬的議員們居然產生了这么大的好奇心，為了參加

大辯論的開場竟把晚餐推遲到 8 點鐘，這種情況在下院議員們的議會生活中是少有的。

累亞德先生的發言不斷為掌聲打斷，他在開始時聲稱，政府使議員們處於如此奇怪的境地，以致他們很難確定自己的態度。在他們對請求的貸款進行表決以前，政府應當說明，它的意圖是什麼。但是在質問政府打算做什麼以前，發言人想問問它已經做了什麼。去年他就講過，如果政府具有同我國更相稱的風度，它也許不會被卷入戰爭；而現在，在他詳細地研究了最近出版的厚本的藍皮書之後，他沒有理由改變自己的見解。發言人對比了來自各方的各種報道，得出這樣的結論：內閣忽略了最明顯的事實，不了解最肯定的傾向，相信了分明是虛偽的保證。發言人說西諾普悲劇敗壞了英國的聲譽並且要求作出詳細的說明，然後他根據已公布的文件證明，如果沒有英國政府的胆小怕事、含糊不清的命令，聯軍分艦隊的海軍上將們本來是能夠防止慘劇的發生的，土耳其人自己也能夠防止慘劇的發生。根據政府最近的一些聲明，發言人得出結論說，政府仍舊想以 *status quo ante bellum* [戰前狀態] 為基礎進行談判；發言人譴責這種作法。他要求政府履行自己的義務，他相信英國人民是會履行自己的義務的。

詹姆士·格萊安爵士以他所特有的無恥態度回答道，議員們應當是或者信任大臣們，或者把他們趕走。而“現在我們不準備在藍皮書上白白浪費時間”。

他說，政府受了俄國這個大不列顛的忠實老盟友的欺騙，但是“在崇高的心靈里是不容易產生陰暗和惡毒的懷疑的”。這個老狐狸精，羅伯特·皮爾爵士的“小跑腿”和屠殺邦迪埃拉兄弟的劊子手⁷¹，在談到“崇高的心靈”和“不愛懷疑”這些話的時候，真是動聽

极了。

接着发言的是乔斯林勋爵和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他們的发言在第二天登满了报纸，但是使当天晚上的議院空无一人。下一位发言人是罗巴克先生，他先替大臣們的行为辯解，說他們陷入了容易被人誤解的境地，最后則声称，现在是政府清楚地說出它打算做什么的时候了。約翰·罗素勋爵似乎是为了回答这个問題而起发言的，他在为政府辯解时，逐一地叙述了近来发生的意見分歧的来由，但是他知道这不会有任何結果，于是装出一副样子，好像要告訴議員們“政府打算做什么”，虽然他自己并不見得确切地知道这一点。据他說，政府同法国不是通过条約而是通过交換照会結成了一种类似非固定同盟的东西。英国和法国現在也建議土耳其締結一种类似条約的东西，根据这个条約，土耳其政府不得到它們两国的同意不得求和。沙皇的难以置信的背信棄义行为使政府失去了信心。他(罗素)对保持和平的可能性感到失望。政府并非沒有参战的可能，因此他要求預算撥款比上一年度增加300万英鎊。秘密是战争取胜的条件，所以他現在不能告訴議院，政府在战争的情况下打算做什么。他的发言的結尾部分，或者更加确切些說是有戏剧性的一部分讲得非常有力，并流露出对沙皇“劊子手”的不滿，所以很受欢迎，热情洋溢的議院已經打算批准預算了，可是忽然間迪斯累里先生起来发言，他做到了把辯論推迟到星期一晚上的會議上繼續进行。

昨天晚上又繼續辯論，直到夜里两点钟才結束。

第一个发言的是科布頓先生，他曾經保证他要紧紧地抓住这个具体問題。他拿藍皮书作根据，竭力证明誰也沒有否认的事实，即法国政府以拉瓦累特先生的圣地問題的使命，以及他迫使土耳

其作出的让步⁷²，引起了這場“伤心的爭論”。当时有可能做皇帝的法国总统以天主教基督徒的名义向土耳其提出了这些要求，大概是想捞一笔政治资本。因此俄国的最初一些措施可以拿法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来解释。維也納照会沒有签字，罪过不在土耳其政府而在盟国。如果用从貝捷克灣撤出舰队的手段来威胁土耳其政府的话，它是会立即签字的。科布頓說，我們現時面临着战斗，因为我們已經要求土耳其用照会通知俄国，說土耳其拒絕把我們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即关于更好地对待基督徒的保证給予俄国。土耳其帝国絕大多数居民都貪婪地注視着俄国現行政策（例如在莫尔达維亞-瓦拉几亞）的成就。发言人根据同样的藍皮书证明，基督教居民所遭受的侮辱和迫害是不能容忍的，同时他还着重地引证了克拉倫登勋爵所写的显然是为沙皇效劳的那些报告。克拉倫登勋爵在其中一份报告中写道：

“土耳其政府应当决定，它是否不怕牺牲盟国对它的同情和支持而繼續坚持錯誤的宗教原則。”

科布頓先生因此問道：

“議院是否认为像土耳其的狂热的伊斯兰教居民那样的民族有可能放棄自己的宗教？要知道不彻底放棄可兰經的戒律，就根本不可能使居住在土耳其的基督徒同土耳其人享有平等权利。”

我們也可以問一下科布頓先生，在現行英国国教和現行英国法律的条件下，英国工人是否能够同科布頓之流和布萊特之流享有平等权利呢？

接着科布頓先生根据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和英国各代理領事的信件竭力证明，在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中籠罩着普遍不滿，有酿成大暴动的危險。

既然如此，我們不妨再問一下科布頓先生，在歐洲各國人民中是否也籠罩着對本國政府和本國統治階級的普遍不滿並有很快地釀成大革命的危險呢？如果德國、意大利、法國甚至大不列顛也像土耳其那樣遭到了敵視它們政府並激起暴動情緒的外國軍隊的侵犯，那末這些國家是否也能像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那樣長久地保持平靜呢？

科布頓先生得出結論說，如果英國參加保衛土耳其的戰爭，那它就是為爭取奧斯曼帝國的土耳其居民的優越地位和反對我國大多數居民的利益而戰。俄國軍隊和土耳其軍隊之間所進行的純粹是宗教性的爭執。英國的利益把英國同俄國結合在一起。英國對俄國的貿易具有巨大的規模。誠然，它向俄國的輸出總額現在只有 200 萬英鎊，但這只是俄國還常常受到保護關稅的幻想的影響所造成的暫時的結果。可是英國從俄國輸入 1 300 萬英鎊的商品。除了美國，英國沒有同任何一個國家進行過像同俄國這樣的廣泛的貿易。如果英國打算打仗，它為什麼把自己的陸軍開到土耳其去而不是光用自己的艦隊呢？如果哥薩克人和共和主義者互相戰鬥的時刻已經到來，為什麼普魯士、奧地利、德意志其他各邦、比利時、荷蘭、瑞典和丹麥等國依然保持中立，而法國和英國却要在沒有任何援助的情況下作戰呢？如果這個問題對整個歐洲都有意義，那末誰離危險地近，誰就應當第一個投入戰鬥，這樣一個假定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嗎？科布頓先生在結束發言時聲明，“他反對同俄國作戰”。他認為，“最好是回到維也納照會上來”。

約翰·曼納斯勳爵認為，政府的漠不關心和過分的自恃應當受到譴責。克拉倫登勳爵在他最初給俄、法、土三國政府的一些通知中，就不是聲明同法國一致行動，而是堅決拒絕同它合作，並且

通知俄国政府說英国将不同法国合作，这就促使俄皇給緬施科夫公爵下了一道引起了莫大灾难的命令。当英国最后通知說它打算在君士坦丁堡采取有效措施的时候，法国政府对女王陛下政府的真誠势必有几分怀疑，这并不奇怪。不是英国劝土耳其政府拒絕緬施科夫公爵的最后通牒，恰巧相反，而是苏丹的大臣們自己冒風險采取了行动，并且他們根本沒有指望得到英国的帮助。英国政府在俄国人占領了多瑙河各公国之后进行的长期的外交談判使土耳其利益受到了重大損失，而給俄国带来了很大好处。俄国不經宣战就占領了多瑙河各公国，以防过去作为它压迫土耳其的实际工具的条約被廢除。因此，現在，当土耳其已經宣战的时候，要求恢复这些条約作为談判的基础已經是愚蠢的了。主要的和真正现实的問題是：政府加入这个可怕的战争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曼納斯說道，人們总是泛泛地向我們声明，应当維持土耳其的荣誉和独立；但是最迫切需要的是非常具体地談一談怎样理解这种声明。

霍斯福耳先生竭力駁斥科布頓先生的錯誤論据。問題的实质不在于土耳其現在是什么样子，而在于如果土耳其包括在俄国的版图之內，俄国将变成什么样子；問題在于俄国的皇帝是否也成为土耳其的皇帝？霍斯福耳說道，俄国只有一个公认的目的，这就是通过战争来加强自己的政治实力。它所追求的是擴張領土；从标志着俄国专制君主在这方面的最初措施的惊人騙局起，直到西諾普的駭人听聞的大屠杀止，俄国专制君主的活动的特点就是殘酷、虛伪和罪恶，这种罪恶甚至在俄国这样一个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充滿罪恶的历史的国家的年鉴中也是罕見的，尤其駭人听聞的是，沙皇极其粗暴地踐踏基督教教义的基础，竟又褻瀆地援引这一教

义。相反地，上述牺牲者的行为却非常好。接着霍斯福耳先生竭力用政府现在所处的困难的处境替政府的动摇辩护。他说，这就是政府在外交方面不坚定的原因。即使所有欧洲政府、所有諳练的外交家一起来反对这个专制君主，也不能使他所处的境地比他现在由于我国大臣們的錯誤或者是他自己大臣們的狡猾而陷入的境地更艰苦、更困难、更絕望、包含着更多危險和損失。半年以前，尼古拉皇帝还是欧洲秩序和法制的主要支柱；而现在他已经撕下了假面具，以一个了不起的革命者出现。沙皇在政治阴谋上失利，在亚洲也没有获得战果，在多瑙河上又被土耳其人打垮，现在他已经开始非常迅速地失去自己的地位，这只会令人称快。目前英国政府的责任就是，一旦军事行动恢复就要做到只有在提供了将来不会再发生类似进攻的充分可靠的保证的条件下才能締結和約。发言人认为，恢复和平的条件之一就是，俄国应当賠償土耳其被迫用掉的費用，而土耳其則应当收回被俄国夺去的領土作为物质保证。

德拉蒙德先生认为，英国正被卷入宗教战争，并开始进行新的十字軍征討来保护被破坏得无处可坐的布尔昂的哥特弗利德的坟墓。已经查明，罪魁祸首从一开始就是羅馬教皇。英国对土耳其問題丝毫不感兴趣，而英俄之间的战争也不可能决出胜负，因为两国将长久地打下去，但是彼此永远不会给对方以任何危害。

“在目前这场战争中，除了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外，我們不会得到任何东西。”

德拉蒙德回忆起不久以前科布頓先生曾經建議約制俄国；如果他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他就会使英国摆脱好多麻烦。事实上现在爭論的是：应该由誰来打扮圣墓上的偶像，是販賣时新貨品

的巴黎商人，还是彼得堡商人呢？英国政府突然发现，土耳其是它的老盟友，沒有它就不能够保持欧洲的均势。但是英国怎么沒有更早地发现这一点，沒有在整个希腊王国从土耳其手里被夺走以前发现，也沒有在納瓦林战斗⁷³（仿佛記得圣海倫斯勋爵曾把这次战斗描述为卓越的会战，只不过认为還沒有把致命打击加在应该打击的人身上）中遭受失敗以前发现这一点。为什么当俄国人越过巴尔干半島时，当英国能以自己的舰队給土耳其以实际帮助时，英国沒有考虑到这一点呢？只是現在，当奥斯曼帝国老朽不堪时，才认为有必要在保持欧洲均势的借口下支持这个即将崩潰的帝国。德拉蒙德先生对出人意外地表現出来的对波拿巴的好感挖苦了一番，然后問道：应该由誰当陸軍大臣？大家都有机会确信掌握国家大船的是軟弱无力的舵手。发言人不相信，在現政府下面某个海軍上将或某个將軍的美名会不受到玷污，因为現政府准备牺牲任何人来討好議院中的这一集团或那一集团。如果下定决心要打仗，那就应当打击俄国的心臟，而不是在黑海白白浪費炮彈。首先应当宣布恢复波兰王国。发言人特別想知道政府的意图是什么。

德拉蒙德先生說道：“政府首脑引以自豪的是他善于保守秘密，有一次他會說过，他倒想看一看誰能够从他那里弄到他不打算公开的消息。这种說法使我想起了一次我在苏格兰听到的一个笑話：一位苏格兰人到印度游历，回英国时帶了一只能說会道的鸚鵡送給妻子作礼物。他的一位邻人不甘落后，到了爱丁堡，从那里为自己妻子带回了一只大猫头鷹。有人告訴他永远也不可能教会猫头鷹說話，他回答說，这話說得倒是不错，可是你們注意瞧它那副用心思考的神气。”

巴特先生說，內閣出席議会，并对自己的提案不作明确而詳細的說明就請求軍事撥款，这种情况自从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就

法律意义上讲，英国現在还没有处于战争状态，議院在表决提出的撥款时有权知道，是什么东西阻碍着对俄国宣战。要知道英国舰队在黑海的处境是很曖昧的！海軍上将邓达斯接到了把俄国船只赶到俄国的一个港口去的命令。在同俄国的和平关系还没有正式破裂的时候，如果他执行这个命令时击沉了某一艘俄国軍舰，那怎么办？諸位大臣是否准备为这样的行为辯护？发言人希望有人出来向議院說明，它是否应当支持如此令人屈辱的条件，因为根据这些条件，土耳其为了同俄国締結和約就应当受英国和法国的支配。如果英国的政策是这样，那末，要求議会現在批准补充軍备就是为了奴役土耳其而不是为了保证土耳其的独立。巴特先生有点怀疑：現在所議論的备战是否只是大臣們为了准备締結可耻的和約而玩弄的花招。

陸軍大臣悉·赫伯特先生的极其庸俗而愚蠢的发言，簡直不像一个联合政府的大臣在如此严重的关头能够发表的言論。政府处在两团火焰中間；它怎样也弄不清議院在这个問題上的真正見解是什么。可敬的紳士們，亦即反对派的代表們处于可以利用事实的优越地位；他們批評过去；而政府沒有可以利用的事实，它只能对未来作一些假設。它所以乐于参加这个战争，与其說是为了保护土耳其，不如說是为了抵抗俄国。这就是議院从可怜的赫伯特先生嘴里所知道的“关于未来”的一切。但是他还透露了某种全新的东西。据赫伯特先生說，“科布頓先生反映了英国人民中人数最多的那个階級的情緒”。当从議院各个角落都来駁斥这种說法时，赫伯特先生补充說：

“极可尊敬的議員如果不是人数最多的階級的代表，起碼也是我国工人階級中很大一部分工人的代表。”

可怜的赫伯特先生！继他之后发言的是迪斯累里先生，一位真正的辯論家换下了一个空談家，可令人高兴了。

迪斯累里先生影射約翰·罗素勋爵于星期五晚上发言結束时的戏剧性的言詞而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我一向认为，任何一国人民，特别是我国人民，如果他們真正知道是为什麼而战，那他們所表現出来的承受战争負担的决心和願望就会比在人家用激昂的号召煽动他們的热情，并利用他們的激动情緒驅使他們进行战斗的情况下要大得多。后一种手段也許一开始对某个大臣是有利的，但是几个月之后，就会造成不可避免的难以設想的后果，这些后果可能因軍事失敗而更加严重。”

1828—1829年的战争就是这样，在这次战争中英国站在俄国方面，而不是土耳其方面。应当认为，土耳其目前所形成的复杂局势和它最近期間所处的絕境一样，完全是由上述的英法联合对土战争造成的。当时没有一个下院議員真正知道英法为什么加入战争，或者它們打击土耳其究竟想达到什麼目的。因此，現在必須弄清当前战争的原因和目的。这只有从藍皮书中才能知道。至于什麼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局势，这可以直接从這張桌上放着的許多报告中知道。这些报告所叙述的政策准备了一种可以完全吸引住——如果相信大臣們所說的話——他們的注意力的未来。因此发言人反对詹姆斯·格萊安爵士的空談。赫伯特先生剛才反对只宣讀这些报告中的个别篇章。但是迪斯累里先生不会答应在議院中把所有的藍皮书一一宣讀。如果极可尊敬的紳士的反对意見被认为是正确的話，那他显然也只好这样做。根据所有熟悉东方問題的人的一致見解，以及根据他个人的見解，俄国沒有任何意图想用强力征服奥斯曼帝国，它只是想依靠巧妙的政策和完善的方法

来获得对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居民的影响，这种影响为它树立的威信大概不下于它占领苏丹国家的首都。在这些谈判开始时，涅谢尔罗迭伯爵本人在他的 1853 年 1 月和 6 月的报告中就明确地叙述了俄国的政策。俄国想在土耳其帝国内获得优势，给占苏丹臣民绝大多数的 1200 万人以特别的影响。在俄国给英国政府的急件中，不仅清楚地叙述了这个政策，而且同样直率地把实现这一政策的方法（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通过保持现行条约并对这些条约作广义的解释）告诉英国政府。因此还在这次严肃的争论刚刚开始时，在庫楚克-凱納吉所签订的条约就成了外交活动的根据。由于这项条约，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将受苏丹的特殊保护。俄国对这次条约的解释不同，它说苏丹的基督教臣民将受沙皇的保护。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可以要求保护自己的新教堂（貝伊奧格魯街的建筑）；俄国人把条约的这一条款解释为，俄国有权保护一切正教教会，自然也有权保护在苏丹领土内占苏丹臣民绝大多数的一切信仰正教的宗教团体。这就是俄国人对凱納吉条约的直率解释。另一方面，从 1853 年 1 月 8 日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涅谢尔罗迭伯爵告诉汉密尔顿爵士说，“必须举行实力示威来支持俄国的外交”，而汉密尔顿爵士又把这一点告诉克拉倫登勋爵。根据同一个报告，涅谢尔罗迭伯爵相信问题将得到满意解决的根据是“女王陛下驻巴黎和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应当作出的努力”。因此俄国公开宣称，实力示威只不过是示威而已，而目的则应当靠和平途径来达到，靠英国驻巴黎和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努力来达到。

迪斯累里继续说道：“这样一来，我倒想知道一下，这些大使们——在这样叙述了目的、描写了方法以及最后有了这样的外交之后，——是怎样对待

这种計謀的？”

迪斯累里认为，談論圣地問題是多余的。事实上這個問題在君士坦丁堡很快就得到了解决。甚至涅謝尔罗迭伯爵在談判刚开始时就表示惊奇和滿意，而且证明法国是爱好和平的。尽管如此，在整个这段时间內，俄国軍隊却在土耳其边境集結，而涅謝尔罗迭伯爵一直都对克拉倫登勋爵說，他的政府要求等价偿还正教教会在耶路撒冷失去的特权，而特权問題是在沒有他的政府参加的情况下解决的。当时还提到了緬施科夫公爵的使团，这是可以从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的各种报告中看出来的。約翰·罗素勋爵上一次曾經說，涅謝尔罗迭伯爵的行为像一个騙子。另一方面，同一个約翰·罗素勋爵又承认，涅謝尔罗迭伯爵不止一次說过，他的皇帝要求給正教教会等价賠償；同时他又埋怨，涅謝尔罗迭伯爵从来不讲他要讲的話。

“不中用的涅謝尔罗迭伯爵！（笑声）俄国国家活动家騙人的两面手法！（笑声）为什么高貴的勋爵不能够知道他需要知道的东西？既然不可能从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得到需要的情报，为什么还让他呆在圣彼得堡呢？”

如果說涅謝尔罗迭伯爵从来沒有向高貴的勋爵讲过他要讲的話，那是由于高貴的勋爵一次也不敢向他提出相应的质問。在談判的这个阶段，大使們应当向圣彼得堡的内閣提出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如果俄国政府不能够明确自己的要求，那末声明英国政府拒絕在巴黎和君士坦丁堡进行友好的帮助，是完全适宜的。当約翰·罗素勋爵辞职而由克拉倫登勋爵接替时，外交活动的性质就起了有利于俄国的变化。克拉倫登勋爵担任了外交大臣的职务以后，必定給赴职的女王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拟出指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指示呢？在土耳其处在灾难深重、非

常危急的情況下，教它必須在內部行政和貿易方面進行改革。還開導它說，土耳其政府的行为应当極端溫和而明智，也就是說，它應當同意俄國的要求。同時政府仍舊不要求俄國對俄國的意圖作出確切的解釋。緬施科夫公爵到了君士坦丁堡。克拉倫登勳爵接到了羅斯上校的令人萬分焦慮的信件和漢密爾頓·西摩爾爵士警告性的報告之後，在他給英國駐巴黎大使考萊勳爵的信中，譴責羅斯上校下令出動不列顛艦隊，對命令法國海軍上將開進希臘領海表示遺憾，並且以輕蔑的口吻教訓法國說，“懷疑的政策是不明智的、危險的”，並宣稱他完全相信俄國皇帝，因為俄國皇帝曾經莊嚴地向他保證，他一定保全土耳其帝國。然後克拉倫登勳爵寫信給自己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說，他完全相信，緬施科夫公爵的使團所追求的目的，“不管怎樣，都不會使蘇丹政權或者蘇丹領地的完整有什麼危險”。不僅如此！克拉倫登勳爵甚至還對留在英國方面的唯一歐洲盟友加以責難，說什麼如果東方的危局威脅到英國，那完全是由於法國在聖地問題上所一度採取的立場。因此涅謝爾羅迭伯爵祝賀阿伯丁勳爵在使法國處於 «isolée» [“孤立狀態”] 方面所起的 «beau rôle» [“崇高作用”] (在藍皮書中翻譯為“重要作用”)。4月1日英國從羅斯上校那里知道了俄國向土耳其提出的秘密協定。僅僅過了10天，斯特腊特弗德勳爵來到了君士坦丁堡，證實了羅斯上校所報告的一切。在這以後，克拉倫登勳爵於5月16日在給漢密爾頓·西摩爾爵士的信中寫道：

“俄皇所作的解釋〈即藍皮書中所沒有的解釋〉使我們有理由不去分擔，而是漠視與俄國南部的備戰相配合的緬施科夫公爵的行動所必然在整個歐洲引起的憂慮。”

此後，涅謝爾羅迭伯爵得以毫不客氣地於6月20日通知克拉

倫登勛爵說，俄国已經占領了多瑙河各公国。在这个文件中，涅謝尔罗迭伯爵声明，

“俄皇打算拿这些地方作为抵押，直到他得到滿足时为止；他的行为依然忠于他向英国政府所作的声明；在同倫敦內閣交換有关在开始談判的同时进行备战的問題的意見时，他直言不諱地說可能有一天他不得不向英国求助，并且欢迎英国政府所表現的友好意图，同时把英国政府的行为同法国的行为加以对比，并把緬施科夫公爵后来的失利完全归咎于斯特腊特弗德勛爵。”

在这一切之后，克拉倫登勛爵于7月4日写了通令，依然指望俄皇的正直和温和，并引证了俄皇多次关于不打算侵犯土耳其帝国的声明。而7月18日他在写給斯特腊特弗德勛爵的信中說：

“严肃对待問題的法国和英国，完全能够粉碎俄国的力量，不过土耳其在这个期間不免要遭到彻底的崩潰，因此唯一正确的途徑就是和平談判。”

但是迪斯累里认为，如果这个論据在当时是适用的話，那現在它也适用。或者是政府表現了过分的輕信，或者是它犯了姑息的罪过。战争是女王陛下政府在最近7个月来进行談判的結果。如果英国政府犯的是輕信，那就是俄国以背信棄义的行为加速了一場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使欧洲独立、英国安全和世界文明得到保障的冲突。如果英国政府犯的是姑息，那末这将是一場怯懦的战争，一場不坚决的、沒有結果的战争，或者更正确些說，是一場恰恰导致最初就考慮到的結局的战争。4月25日克拉倫登勛爵在上院发表了虛伪的声明，說什么緬施科夫是奉命来調解圣地爭論的，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接着迪斯累里先生簡短地叙述了維也納照会的經過，以证明政府或者表現极大的愚蠢，或者姑息圣彼得堡的宮廷；然后他又轉来談論第三个时期，即从維也納照会的失敗到西諾普会战这一个时期。当时財政大臣格萊斯頓

先生在公开會議上发言时，曾以极其輕視的口吻談論土耳其。一些半官方的报刊也是这样。只是由于土耳其人自己的毅力才使土耳其的局势和命运发生了变化，結果政府不得不用另外一种語言来讲話。但是沃耳特尼察会战剛一发生，无論是拥护輕信政策的人还是拥护姑息政策的人又干起骯髒的勾当来了。尽管如此，西諾普潰敗还是引起了人們对土耳其的同情。各分舰队已經接到了向黑海挺进的命令。但是它們是怎样行动的呢？它們竟开回博斯普魯斯海峡！至于談到未来，約翰·罗素勋爵非常含糊地叙述了英法同盟的条件。迪斯累里先生劝大家不要把保持欧洲均势同保持欧洲現有的領土划分混淆起来。意大利的未来主要决定于是否承认这个真理。

在迪斯累里先生作了精彩的发言（自然我只是大体上引证了他的发言）之后，帕麦斯顿勋爵起来发言，但是遭到了慘敗。他的发言部分地重复了他在上届會議閉会时所讲的話，他为內閣政策的辯护毫无說服力，而且竭力注意不說一句包含任何新消息的話。

后来根据詹·格萊安爵士的建議，沒有辯論就通过了对海軍預算草案的某些修正。

最后，最有趣的是，在經過了如此热烈的辯論之后，議院完全沒有做到使大臣們向俄国正式宣战并指明英国将要参战的目的。結果无論是議院或公众，都沒有获知比这以前更多的东西，都沒有得到任何新的消息。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2 月 21 日

載于 1854 年 3 月 9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022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二月二十二日的議會辯論。
——波茨措-迪-博尔哥的緊急報告。
——西方強國的政策

1854年2月24日星期五于倫敦

報刊上充滿了大量的關於科苏特的“好戰的準備”和他的計劃中的“調動”的無益空談。然而我偶然從一個現在到君士坦丁堡去，並且曾同科苏特商量過這件事情的波蘭軍官那里聽說，從前的執政者勸他不要離開倫敦；科苏特以一種極不贊同的態度談到匈牙利和波蘭軍官可能參加這次土耳其戰爭，他所持的理由是，他們將被迫或者在查爾托雷斯基的旗幟下行進，或者放棄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他認為前者是與他的政策相矛盾的，後者是與他的原則相矛盾的。

迪斯累里先生對政府的政策的巧妙揭露所造成的印象是那樣地深刻，以致“群賢內閣”認為必須作一次事後的嘗試：用一出小小的喜劇使事情不了了之。這出喜劇已經由大臣們和休謨先生在下院星期三上午的會議上演出來了。迪斯累里先生挖苦地說二者必居其一，不是過分的“輕信”，就是背叛性的“姑息”。帕麥斯頓勳爵對此作了軟弱無力的回答，最後說，他要撇開反對派轉而請求全國

的公正判決；於是像在“匹拉麥斯和雪絲佩的最慘酷的死”^①中扮演獅子的木匠史納格那樣代表全國作答復的這份光榮，就落在休謨先生身上了。休謨先生在自己的整個議會生涯中，都竭力把反對派變得令人喜歡，為了以後把這些修正收回而提出修正，並且永遠充當輝格黨內閣的後衛的所謂獨立的反對派，只要輝格黨內閣的正式擁護者剛一顯露出動搖的跡象，它一定會去援救這個內閣。休謨 *par excellence*〔主要〕是一個最偉大的議會“滅火器”。他不但是議會的最老的議員，而且是議會的獨立的議員，不但是獨立的議員，而且是激進派，不但是激進派，而且是一個學究式的，大家所公認的看守國家錢袋的塞卜洛士^②；他的使命是在為了不到一個法尋而爭吵的時候讓好些英鎊悄悄地失去。

休謨先生洋洋得意地聲明，在他的議會活動的整個時期中，他第一次不是為了斥責國家預算草案，而是為了贊成國家預算草案而發言。他沒有忘記指出，這次異乎尋常的事件應當不可辯駁地證明，內閣在受到了反對派的莫須有的誹謗性的指責以後呼喚全國的合理判斷不是徒勞的，它受到的所謂輕信和姑息的指責是應當鄭重取消的。他的證明是很特殊的。為了把大臣們從不是輕信就是姑息這種二者必居其一的指責中解救出來，他證明大臣們在同俄國談判上表現出了輕信。由此可見，他是明白帕麥斯頓勳爵呼喚的真正用意的。內閣想竭力求得的，不過是取消所謂蓄意背叛的指責。至於說到輕信，難道高貴的詹姆斯·格萊安爵士不是說過“在崇高的心靈里是不會輕易產生懷疑的”嗎？既然可能爆發的戰爭是大臣們自己在外交上失策的結果，那末戰爭自然是他們

① 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第一幕第二場。——編者注

② 希臘神話中看守冥府門的三頭怪犬。——譯者注

的战争，因此，根据休謨先生的意見，他們比任何人都更能胜利地进行这次战争。在休謨先生看来，这次提出来的預算比較小，这就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正在打算进行的战争的規模。帕麦斯顿勋爵自然感激休謨先生代表全国作出的判决，而且为了奖励，他还发表了关于国家文件的議論以飽自己听众的耳福。在他看来，在事情还没有混乱到公布文件已經失去任何意义的时候，文件不应当向議院和全国公布。这就是联合內閣在考虑成熟以后能够做到的事后英明。落在联合內閣的领导人帕麦斯顿勋爵身上的任务，不仅是要冲淡政敌的发言所造成的印象，而且要把自己那种戏剧性的从議院轉而向全国呼吁的作用化为烏有。

星期二晚上，利物浦的議員霍斯福耳先生提出了下面的质問：

“同外国締結的条約，或者女王陛下政府在战争发生时打算采取的步驟，真的能够有效地阻止給私掠船装备索具来对付在中立港口的不列顛船只？”

帕麦斯顿勋爵回答說：

“极可尊敬的紳士和議院自己应当明白，在目前情况下，这样的問題是不可能得到解釋性的回答的。”

帕麦斯顿私人的 *moniteur* [正式通报]“晨邮报”⁷⁴，在談到自己主人的这个回答时說：

“高貴的勋爵不对这个最棘手、最困难、目前可能是談判內容的問題进行研討就不可能給予別的回答（不管政府对这件事是多么了解）。如果希望這個問題能够順利地解决，就必須相信不希望在我們这个文明的世紀再恢复合法的海盜行为的各强国所具有的自然正义感。”

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的喉舌宣称，所謂“困难的問題”是現在正在进行的談判的內容，另一方面又說要解决這個問題，应当相信

有關強國的“自然的正義感”。如果備受贊揚的丹麥和瑞典之間的中立條約不是聖彼得堡內閣授意的，那末，不言而喻，這個條約就應當包括禁止這些國家在自己的港口給私掠船舶裝備索具這樣一條。實際上，全部問題只可能涉及美國，因為波羅的海預定由英國的戰列艦占領，荷蘭、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意大利的地中海港口都完全操縱在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手裡。如果土耳其戰爭引起了英俄戰爭，那末，在聖彼得堡內閣看來，美國會扮演什麼角色呢？我們只根據 1825 年秋天波茨措-迪-博爾哥給涅謝爾羅迭伯爵的緊急報告⁷⁵，就可以對這個問題作出確切的回答。俄國當時決定入侵土耳其。同現在一樣，俄國當時也是打算從和平占領多瑙河各公國開始。

波茨措-迪-博爾哥說：“假定採取了這個計劃，那末，適當的做法是心平氣和地同土耳其政府進行談判并向它保證，如果它不願使自己卷入戰爭，皇帝同意和平解決這些分歧。”

波茨措-迪-博爾哥在列舉了一切必須採取的措施以後，繼續說：

“最好是把所有這些行動都通知美國，以表示皇帝內閣的尊重，並證明皇帝內閣重視美國輿論的正確報道甚至它的支持。”

波茨措-迪-博爾哥說，一旦英國同土耳其聯合起來向俄國開戰，

“它〈英國〉將會依靠自己臆想的在海上反對各中立國的權利，封鎖我們的港口。美國是不能容忍這樣做的！這就會造成嚴重的分歧和危險的局勢”。

因為用俄國歷史學家卡拉姆津的正確說法，“我們的〈俄國的〉對外政策絲毫未變”⁷⁶，所以我們可以假定，俄國在現在，也許還從

1853年2月起，就“把自己所有的行动通知美国”，并且采取了各种措施，用献媚的办法使华盛顿内阁至少采取中立立场。同时它希望在同英国作战时发生关于“中立国的海上权利”的争论，因为这种争论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分歧和危险的局势”并且使美国同圣彼得堡建立某种程度的公开的同盟。

既然我已经引用了波茨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中最著名的一份紧急报告，那就顺便把关于奥地利的那一段也引出来。这一段就是在1825年以来在加里西亚、意大利和匈牙利发生了一些事件以后，也丝毫没有失去它的现实的意义。

波茨措说：“我们的政策要求我们对这个国家采取威胁性的立场；我们的准备应当使它相信，要是它采取什么行动来反对我们，那末，它就会碰到一场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暴风雨。梅特涅公爵可能向土耳其人宣布，我们进入多瑙河各公国是由土耳其人自己挑起的，或者可能擅自侵入奥斯曼帝国的其他省份。第一种情况，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谈妥了，第二种情况就意味着我们将会达成协议。我们应当担心的唯一的事情，是采取公开反对我们的行动。如果，梅特涅公爵是英明的，他一定会避免战争，如果他想使用暴力，那他就要受到惩罚。对待一个处于像他那样情况的内阁，像我们这样的政府，必要时会找出上千种途径来消除分歧。”

约翰^①勋爵的煽动性的发言，关于英国的荣誉的叫嚣，对俄国的背信弃义所表示的正当的愤慨，巡航于塞瓦斯托波尔和喀琅施塔得城下的英国浮动炮台的幻影，战争威胁，示威性的派军队上船——这些戏剧性的插曲把舆论弄得糊里糊涂，像一层雾似的遮住了舆论的眼睛，使它除了自己的幻觉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在看到对蓝皮书的种种揭露之后，还认为这个内阁突然变了，变得不但

① 即罗素。——编者注

能進行一般的戰爭，甚至還能同俄國進行別的不光是做做樣子的（也就是恰恰有利於似乎是與之作戰的敵人的）戰爭，難道會有比這更大的自我欺騙嗎？讓我們來看看這些備戰是在什麼條件下進行的。

根本沒有正式向俄國宣戰。內閣甚至不能公開說明戰爭的目的。連正在被裝上軍艦的軍隊開到什麼地方去也不十分清楚。要求的撥款用來進行大戰爭是太少了，進行小戰爭又太多了。這個以擅長偽造破壞自己最莊嚴的諾言的借口和拖延最迫切的改革的理由而出名的聯合政府，突然天良發現，感到自己必須履行過分匆忙地許下的諾言，而且提出了一項使舉國驚訝的新改革法案，使全國所經歷的嚴重危機更加複雜。議會改革的最熱烈的捍衛者認為提得不合時宜的這個法案，不是在任何外部壓力下提出來的，各方面對它的提出抱着極其冷淡和懷疑的態度。計劃就在於提出一個具有重大國內意義的問題來轉移輿論對於對外政策的注意，難道這還不清楚嗎？

竭力使公眾對英國同外國的關係產生誤解，這是相當明顯的。直到現在還沒有同法國締結任何約束性的條約，然而製造了一個條約的代用品，這就是“交換照會”。但是英國早在 1839 年就同路易-菲力浦的內閣交換過這樣的照會，根據這些照會，聯軍艦隊應當進入達達尼爾海峽，阻止俄國單獨一國或同別的強國一起干涉東方的事務。我們知道這種交換照會的結果是出現了反對法國的神聖同盟和達達尼爾海峽條約⁷⁷。人們究竟是多麼嚴肅認真地考慮法英同盟，這從下院昨天的會議上發生的事件可以看出來。你們在“通報”上可以看到，波拿巴威嚇希臘暴動者，並且給奧托國王政府一個相應的聲明。當約翰·華爾希爵士就這一點質問內閣的

时候，約翰·羅素勛爵說：

“他一点也不知道法英两国政府关于上述問題的協議，他沒有能够同外交大臣談這個問題。但是他的印象是法国政府沒有发出任何声明，至少是沒有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或者参与。”

如果不列顛政府真正打算同俄国开战，那为什么它那么頑固地避免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宣战方式呢？如果它打算同法国結成真正的同盟，那为什么它那样用心地避免使用通常結成国际同盟所使用的方式呢？关于德意志各邦，詹姆斯·格萊安爵士声明，它們同英国締結了联盟，而約翰·羅素勳爵則与他相反，在当天晚上就断言似乎目前与这些邦的关系同东方开始发生糾紛的时候是一样的。大臣們說，他們現在正打算搞好同土耳其的关系并建議同它締結条約。他們沒有預先同土耳其簽訂条約，就派兵去占領君士坦丁堡。因此，当我們从君士坦丁堡的来信中知道，土耳其政府的一个秘密代表奉命从維也納到圣彼得堡去向沙皇建議締結非正式協議时，我們一点也不感到惊奇。記者写道：

“土耳其人在认清了自己的假朋友的背叛和愚蠢以后，同英明的敌人結成同盟，給这些朋友以报复，这是很合情理的。打算强加于土耳其的协定，其条件的危害性比緬施科夫的要求要大十倍。”

关于英国內閣认为英国軍隊負有使命去完成的行动，从联軍分舰队过去和現在所做的一切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了解。它們在进入黑海 20 天以后回到了博斯普魯斯海峽。在这以前不几天，有消息說：

“土耳其政府的大臣們出于对不列顛大使的声明的尊敬，应当把希腊報紙‘博斯普魯斯電訊’（«Télégraphe du Bosphore»）的編輯逮捕入獄，因为他在自己的報紙上声称，英国和法国的舰队不久一定会从黑海回到博斯

普魯斯海峽。‘君士坦丁堡日報’的編輯受權聲明，兩支艦隊仍繼續留在黑海。”

俄國海軍上將為了感謝英國和法蘭西的海軍上將們給他的指點，於2月19日派了兩艘蒸汽艦去炮擊舍夫卡捷爾的土耳其人；俄國的蒸汽艦以特拉比曾德為目標進行巡航，而當時除了一艘英國軍艦和一艘法國軍艦在塞瓦斯托波爾以外，聯軍分艦隊在黑海沒有自己的艦隻。西諾普會戰和俄國蒸汽艦炮擊舍夫卡捷爾——這是聯軍分艦隊唯一可以夸耀的功績。大使和海軍上將們之間的爭吵弄到彼此的關係完全破裂。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勳爵竟拒絕接待鄧達斯海軍上將，而巴拉蓋·狄利埃不讓法國海軍上將和他的軍官參加自己的正式舞會。但是，這種爭吵只有從屬的意義，因為外交界的吹牛家，由於自己的緊急報告在倫敦和巴黎被發表而感到自己的名譽受了損害，顯然要竭盡一切來挽回失去的威信，而不管這樣做會損失多少軍艦，犧牲多少水兵。

然而問題的實質在於發給大使們的公開的指令被一系列發給海軍上將們的秘密指令撤銷了，海軍上將們的確不能執行相互矛盾的指令。既然在發指令以前沒有宣戰，指令又怎能不是這樣呢？一方面，命令他們攻擊黑海的俄國艦隻，迫使它們退回塞瓦斯托波爾，而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應當越出單純防禦的狀態。最後，如果這是一場嚴重的戰爭，那末，不列顛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怎能把他成功地撤去土耳其政府里的主戰派領袖穆罕默德-阿利-帕沙的陸軍大臣職務，而以“和事佬”里扎-帕沙來代替他，同時把總司令的職務交給列施德-帕沙的亲信穆罕默德-帕沙這件事描繪成一大勝利呢？

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只是在關於阿爾巴尼亞爆發了希

腊居民的暴动⁷⁸、暴动已蔓延到特薩利亚和馬其頓的消息傳到了倫敦和巴黎之后，他們才着手派遣不列顛和法国的軍隊。正如罗素、克拉倫登、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的急件所表明的，英国内閣一开始就很不耐煩地等待这次暴动。这次暴动給英国内閣一个最好的口实，使它可以借口充当土耳其人和俄国人之間的調停人而去干涉苏丹同他自己的基督教臣民之間的糾紛。从天主教徒开始干涉希腊人（我在这里只是在宗教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詞^①）的事务的时候起，就可以有把握地指望欧洲土耳其的 1 100 万居民同沙皇达成协定，沙皇在这种場合下就会真正成为他們在宗教上的保护者。在穆斯林和他們的正教臣民之間是沒有任何宗教上的糾紛的，但是在宗教上对天主教徒的仇視可以說形成了土耳其境內信仰正教的各種民族之間的唯一的共同联系。自从穆罕默德二世包圍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起，自从希腊的海軍上将、拜占庭帝国最有势力的人魯卡·諾塔腊斯公开声明，他乐意在首都看到土耳其的纏头的胜利，而不乐意看到羅馬帽子的胜利的时候起，这方面就沒有发生任何变化；而另一方面，曾經流傳过一个匈牙利的預言，說只有消灭了可詛咒的正教異教徒，只有土耳其人毁灭了君士坦丁堡，基督徒才能真正幸福。因此，西方强国对苏丹同其正教臣民之間的关系的任何干涉都将有利于沙皇的計劃。如果奥地利打算像自己在 1791 年⁷⁹ 那样，借口反对俄国派在塞爾維亞的叛变性的陰謀而去占領这个公国，那結果也是一样。还要补充的是，倫敦傳說伊皮罗斯的暴动的居民似乎得到从伊奧尼亞群島来加入他們中間的希腊人的支持，英国当局在这方面沒有阻撓这些希腊人，而

① 在原文中 «greeks» ——“希腊人”，这个字也作“正教徒”解釋。——編者注

且聯合政府的機關報“泰晤士報”在星期六的報上把希臘暴動的消息看成是一個非常稱心的事件。

我自己決不懷疑在聯合內閣的這些大叫大嚷的備戰後面隱藏着背叛的行為。當然，波拿巴進行這次戰爭是十分認真的。不是國內革命就是對外戰爭——他再沒有別的出路了。他已經不可能繼續像從前那樣，把拿破侖第一的殘酷的專制同路易-菲力浦的那種賣身的和平政策結合起來了。如果他不能把法國軍隊派到國外，他就得同時停止把一批一批的囚犯不斷地流放到凱恩。但是，波拿巴的未加掩飾的企圖和聯合內閣的秘密計劃之間的矛盾只能使局勢更加混亂。我決不會根據這一切得出戰爭不會發生的結論；相反地，戰爭將具有聯合內閣的小人們連想也想不到的那種可怕的規模，那種革命的性質。他們的背信棄義本身就是使局部衝突變成全歐戰火的手段。

但是，即使不列顛內閣不是像今天這樣十分虛偽而表現出十分真誠，它的干涉終究只能加速奧斯曼帝國的崩潰。英國人不要求土耳其政府給予其基督教臣民以保證，就不能進行干涉，而只有使土耳其政府滅亡才能取得這些保證。甚至我上面提到的那個顯然是親土耳其分子的君士坦丁堡記者也不得不承認，

“西方強國要使土耳其帝國所有的臣民在世俗和宗教關係方面完全平等的建議，將會立即使帝國發生混亂和內戰，從而使帝國徹底地、迅速地毀滅”。

卡·馬克思寫於 1854 年 2 月 24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4 年 3 月 13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4025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卡·馬克思

奧地利的破产

尽管有着战争的威胁和迫切的需要，但不論是法国政府或奥国政府直到現在都未能使 *nervus belli* ⁸⁰ 健全起来，就是說未能巩固自己的財政状况。虽然法国財政大臣盛宴招待財政部門的要員、Crédit Mobilier ⁸¹ 的領導人和巴黎的大銀行家，可是这些資本家仍然无动于衷，仍然抱着一种慎重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习惯于損害国家的利益来满足个人的利益，从国家那里取得最大的好处。所以推銷預定为两亿法郎的法国公債的条件至今沒有肯定下来。

至于奧地利，那末毫無疑問，它对西方强国采取友好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希望以此恢复財政界的信任，摆脱財政困难。的确，維也納的一家政府報紙剛剛透露了关于奧地利中立和同法国亲善的消息，又立刻刊載了使公众驚訝不已的一則关于打算把600万英亩的官地的很大一部分出卖的意外消息和1854年2月23日的敕令——敕令規定按强制性行市流通的总数为15000万弗罗倫的国家紙币必須全部交归国民銀行，并逐步換为銀行券。在兌換完結以后，所有国庫发行的紙币将停止流通，而按强制性行市流通的国家紙币今后将停止发行。实行这种兌換办法时，帝国政府向銀行担保对轉交給它的国家紙币負責，并且必須向銀行償

付这种轉換所需的一切支出；政府每年至少要花 1 000 万弗罗倫来清償因此所負的債務；政府給予銀行从国家關稅收入中提款的权利，作为按时支付的保证；支付应用硬幣，其比率与收稅时收受金屬貨幣的比率相等。同时，政府必須采取一切措施使銀行有可能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恢复硬幣支付。从銀行方面来讲，为了使銀行券的持有者随时能把銀行券換为用硬幣付息的有息証券，銀行开始发行完全与國債証券相等的有息債券。此外，政府打算把所謂贖买证书和預付证书集中到自己手里，使它們完全停止流通。

把按强制性行市流通的国家紙幣換为不兌現的銀行券并不能減少紙幣的数量和提高它的行市，而只能簡化所发行的紙幣的名称。因为国家拥有它給予銀行贖回紙幣的資金，所以，如果国家不知道它已經这样信譽扫地，以致只有依靠不是国有財產的銀行才能恢复它的信用，那末它自己是会利用这些資金的。这样一来，奧皇对維也納的犹太銀行家的依賴程度，随着他的統治的軍事性质的加强而增长。1852 年 1 月，他把格蒙登、奧斯澤、施塔尔萊因的盐場抵押給他們了。1854 年 2 月，他們取得了整个君主国的關稅抵押权。銀行一步步变成了帝国的真正主宰者，而政府則不过是名义上的主宰者罢了。奥地利越是拒絕滿足資產階級参加政权的要求，它就越要被迫向这个階級中的一派——金融家-債权人的无限的专制屈服。

我們在这里已指出了实质的那个法令使举借新債的企图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就是帮助銀行券的持有者把銀行券換为用硬幣付息的有息債券。1852 年政府还保证用硬幣来支付各种小額款項和債款，但是由于稅收使用的只是国家紙幣或銀行券，政府不得不在倫敦和法兰克福簽訂了 3 500 万弗罗倫的借款契約。显然，新的

借款增加了原有的赤字，結果引起了新幣的再次發行，而新的借款本應該防止紙幣過多和相應貶值的。政府雖然規定了硬幣支付和銀行券支付之間的重大差額，但是就像把銀行的支付手段增加 15 000 萬不能使銀行履行自己的義務和恢復現金支付一樣，這種差額也不能消除銀行券的惡劣聲譽。政府必須按照收稅時的硬幣比率用硬幣給銀行付款；可是，大家知道，在奧地利，不僅農民而且小城市的居民都像中國人和印度人一樣喜歡攢錢；1850 年甚至把銅幣都積蓄了起來，而在 1854 年，所有稅收全是用紙幣繳納的，雖然用紙幣納稅要多繳 17%。

熟悉奧地利國庫歷史的人，不管在新法令的諾言中，或者現在採取的財政措施中，都找不到任何新的東西。奧地利是在瑪麗-泰莉莎女皇統治時期七年戰爭快結束的時候第一次發行紙幣的。最初發行的是一種必須在國家機關中兌換成白銀的銀行票。在 1797 年，對法戰爭引起的財政困難迫使政府取消了兌換白銀的制度。瑪麗-泰莉莎女皇統治時期第一次的發行量為 1 200 萬弗羅倫，而到 1809 年，銀行票的總數達到了 1 060 793 653 弗羅倫，同時銀行票的貶值到了極點。1811 年 2 月 20 日政府公布了一項命令，規定銀行票完全停止流通，並按照 100 兌 20 的比價贖兌成稱為 Wiener Währung〔維也納貨幣〕的新紙幣（贖買證書的名稱由此而來）。政府宣布這些證書為國家的真正貨幣，並且許諾發行量決不超過兌換銀行票所需要的數量。1811 年 5 月 Wiener Währung 比價就跌了 8%，並且發行了預付證書，其所以稱為預付證書，是因為用這種證書提前 12 年預付了部分稅款。的確，第一次發行的預付證書只有 4 500 萬弗羅倫。為了兌回這些預付證書，在 12 年中每年要在土地稅賬下撥支 375 萬弗羅倫。

但是由于战争的缘故，满不在乎地接二连三地发行新的预付证书，每一次都引起相应的贬值。1815年白銀的貼水已达 Wiener Währung〔維也納貨幣〕的400%。1816年6月1日，敕令宣布，国家今后絕不发行不兌現的紙幣，正在流通中的紙幣必須逐漸停止流通，金屬貨幣必須重新成为标准的流通手段。为了履行这些諾言，1818年1月18日成立了享有特权的国民銀行。政府同国民銀行事先簽訂了協議，責成銀行兌回不兌現的紙幣。虽然如此，1852年6月我們在一家政府的報紙上却又看到了財政大臣发表的一个声明，說今后絕不会再有强制公債、特別稅和貨幣贬值的現象，而奥地利的紙幣如果現在不能，那末无疑将来会毫无損失地換为金屬貨幣和目前正在討論之中的用于收回国家紙幣和还给銀行國債的公債。这些諾言的周期性的重复最好不过地证明了它們是不可靠的。

在瑪丽-泰莉莎时代，奥地利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发行它自己的可兌換硬幣的銀行票，在兌換白銀时甚至还有貼水。1818年，为了兌回紙幣，国家不得不成立屬於私人資本家的財產的享有特权的銀行；这个銀行获得一种对国家是非常沉重的負擔的特权，但是銀行必須发行可兌現的銀行票。1854年政府求助于銀行，但是銀行发行的銀行票像国家发行的紙幣一样，也贬值了，变成不能兌現的了。

虽然1815—1846年期間奥地利几乎沒有間断地享受和平和內部平靜的好处，但是在这长期的和平以后，第一个打击就弄得它完全束手无策。1846年2月底的克拉科夫起义和加里西亚騷动⁸²使国家的开支比1845年增加了1000万弗罗倫。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軍队的开支：1845年軍队开支为50 624 120弗罗倫，1846年就

增加了700万弗罗倫，同时帝国各省的民政管理費用也增加了200万弗罗倫。1847年由于商业危机和农业歉收，稅收大大减少了，可是，軍事預算却增长到6400万弗罗倫，其主要原因是意大利发生了騷乱。这一年的赤字是700万弗罗倫。1848和1849年不仅整个整个区域的收入断絕，而且还加上意大利和匈牙利的軍事开支。1848年的赤字是4500万弗罗倫，1849年的赤字是12100万弗罗倫。1849年发行了7600万弗罗倫的强制性行市的三厘国庫券。在此以前銀行早就停止了硬币支付，它发行出来的东西被国家宣布为不能兌現的。1850年赤字为5400万弗罗倫，而与普魯士作战的危險使紙币的行市降低了60%。1849—1851年期間发行的国家紙币的总数为21900万弗罗倫。1852年的赤字比1849年增加了800万弗罗倫，比1847年增加了4600万弗罗倫。1851年的軍事預算为12600万弗罗倫，就是說正好比1847年增加了一倍。1852年用于警察的开支为900万弗罗倫，即比1848年增加了三倍。而1853年警察和軍队的費用又有增加。

但是，真正的問題并不在于解答奥地利怎样陷入了財政的困境，而在于說明它虽然陷于虚金本位和債務之中，为什么仍能避免公开的破产。1850年国家收入比1848年增加了19600万，比1849年增加了4200万。1851年国家收入超过1850年21900万。1852年的国家收入总额达22600万，超过1851年的收入600万。总之，国家的收入在不断地增加，虽然1852年的收入不像1851年增加得那样多，而1851年的收入又不像1850年增加得那样多。

收入增加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把撒丁的軍事賠款和在倫巴第-威尼斯沒收的財物⁸³这些特別收入攔在一边不談，那末奥地利农民向自由的土地所有者的轉变，当然增加了农村納稅的潛力和

土地稅的收入。同时由于撤銷了財產继承法院，从而把貴族过去依靠他們的司法权而享有的收入轉入了国庫。从1849年起这方面的收入越来越多。其次，1849年10月29日的敕令所規定的所得稅也使得收入大大增加。在奧屬意大利各省，由这种稅提供的收入特別多。例如，1852年德意志和斯拉夫各省的所得稅总共才增加了60100万弗罗倫，而仅意大利各省就增加了63900万弗罗倫。但是，使奥地利帝国免于正式破产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对匈牙利利征服以及对匈牙利征收与其他各省同等的捐稅。

土地稅可以說是整个奥地利稅收制度的基础。1817年12月23日公布了一項敕令，弗兰茨皇帝在这个敕令中宣称，他决定在德意志、斯拉夫和意大利所有省份实行划一的土地稅征收制度。敕令中有一条曾規定今后不得“因土地所有者或房产所有者的个人特权”而免繳土地稅，这个原則大体上已經实行。1834年在奥地利大公国实行了新的土地清册，这个公国是在奥地利君主国的世襲領地中新制度首先生效的地方。奥地利的倫巴第从查理六世以来就已具有叫做 Censimento Milanese 的很完善的土地清册。但是，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根本沒有同帝国其他各省一样承担繁重的土地稅和其他稅。根据匈牙利宪法，拥有大部分土地的匈牙利地主免繳直接稅，甚至别的省份都繳納的某些間接稅，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也不繳納。1846年，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边屯区⁸⁴的人口是14549958人，而君主国其他地区的人口是24901675人，这样，前几个地区所繳的稅款應該占全部收入的 $\frac{7}{18}$ 。实际上，1846年这些地区只繳納了2300万弗罗倫，不到全部稅收16400万弗罗倫的 $\frac{1}{7}$ 。奥地利君主国的全部面积为12123平方德里，其中匈牙利各省占5855平方德里，也就是說占奥地利領土的一半。

皇帝約瑟夫二世恣意在匈牙利推行新制度，使匈牙利的地位同其他省份的地位相等，其主要目的是要使奥地利君主国集中化和完全德意志化。可是他的措施大大激怒了匈牙利的輿論，以致他在臨終前担心匈牙利人会像尼德兰人一样实行起义⁸⁵。

列奥波特二世、弗兰茨一世和斐迪南一世这几个皇帝都不敢重复这个危险的試驗。自从匈牙利革命在俄国的干預下被扼杀以后，匈牙利宪法阻碍課稅平均化的情况就不存在了。弗兰茨-約瑟夫皇帝从来没有宣誓忠于匈牙利宪法，正因为如此他才取代斐迪南当了皇帝，立刻在匈牙利实行了像在奥地利其他領地已經实行的那种土地稅。此外，从1850年10月1日起取消了匈牙利的内部稅卡，从而使奥地利君主国整个境内的關稅也像其他賦稅一样統一起来了。从1851年3月1日起在匈牙利也开始征收消費稅并实行烟草专卖。1851年匈牙利各省，仅仅直接稅就增加了1150万弗罗倫，而在1852年又增加了約800万弗罗倫。

由此得出这样一个无可爭辯的結論：奥地利帝国的生存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也是依靠占有匈牙利和倫巴第的；只要一失去匈牙利和倫巴第，这个国家的延緩已久的破产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卡·馬克思写于1854年3月3日
作为社論載于1854年3月22日
“紐約每日論坛报”第403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坛报”

卡·馬克思
*法国和英国的軍事計劃。——
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

1854年3月3日星期五于倫敦

正像我在最近一篇文章里所說的，查理·納皮尔爵士被任命为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要归功于他曾公开表示不信任同法国的同盟，并且指責法国在1840年对英国的背叛行为，然而实际上那时英国政府是同尼古拉秘密勾結起来反对路易-菲力浦的。我还應該补充一句，黑海的第二个海軍上将艾德蒙·萊昂斯爵士在他出任英国駐希腊公使的期間，曾表现出他是法国的公开敌人，而且他由于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的报告而被免去这个职务。这样，內閣用自己的任免令竭尽所能地不仅制造英法統帥部之間的不和，而且制造海軍上将們同英国駐君士坦丁堡大使之間的不和。

不能认为波拿巴在他对議員們的御前演說中祝賀他同英国結成緊密的同盟是同这些事实矛盾的，更不能认为是推翻这些事实的。Entente cordiale⁸⁶当然要比帝国商标的恢复更早些。波拿巴的演說中最精彩的地方不在于重彈路易-菲力浦的老調，也不在于揭穿沙皇的野心勃勃的計劃，而應該說在于他宣布他是保护德国特别是奥地利反对它們的國內外敌人的人。

2月5日剛在君士坦丁堡交換了土耳其政府同西方強國的條約的批准書(其中一條規定:土耳其政府未經四強國的同意不得同俄國簽訂和約),四強國代表就同土耳其政府開始了關於土耳其基督徒今後狀況的談判。星期三的“泰晤士報”透露出這次談判的真正目的:

“土耳其帝國的某些地區已經根據蘇丹的敕令和某些條約得到了在承認土耳其政府主權的條件下的充分的內部自治權,這些地區的狀況可以作為對雙方都無損害的今後可以推廣的先例,其次似乎指出一條在目前情況下援助土耳其歐洲領地的最好途徑。”

換句話說,聯合內閣打算保持土耳其帝國歐洲部分的完整,辦法就是把波斯尼亞、克羅地亞、黑塞哥維那、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魯美利亞以及特薩利亞變成像多瑙河各公國那樣的國家。如果土耳其政府接受這些條件,那末在土耳其軍隊取得勝利的時候勢必引起土耳其人自己之間的國內戰爭。

現在大家都知道,維丁密謀的被揭發只是促進了希臘人暴動,而在布加勒斯特,人們在希臘人暴動還沒有開始的時候就認為暴動是已經完成的事實。斯庫塔里帕沙正在集結自己的全部軍隊,以阻止門的內哥羅人同暴動的希臘人聯合起來。

既然談到英國政府的目前意圖,那就只能把英法的遠征看做是一種新的欺騙行為。已經指定羅多斯托為法國人的登陸地點,埃內茲作為英國人的登陸地點。埃內茲城是在河口附近的一個不大的半島上,它的背後是馬里乍河谷的一片寬闊的沼地,毫無疑問這對營地的衛生情況是十分有利的。該城不僅處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區域以外,而且處在達達尼爾海峽區域以外,軍隊要抵達黑海,必需重新上船,尝尝逆海峽水流繞海行250英里的滋味,或者沿着

无路可行的地带走 160 英里，走一趟就得花上两个星期。到罗多斯托的法国人至少还在馬尔馬拉海上，离君士坦丁堡总共还有 7 天的路程。

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軍隊目前需要做些什么呢？显而易见，軍隊奉命或者到阿德里安堡去掩护首都，或者至少是在色雷斯的赫尔松涅斯地峽集中起来保卫达达尼尔海峽。“泰晤士报”就是这样說的，它还援引“绝对可靠的消息”，甚至还援引馬尔蒙元帅的战略性意見来证明这一計劃的英明。

用 10 万名法英兵士来保卫沒有受到任何人威胁，也許在最近 12 个月內也不会受到威胁的首都！老实說，他們呆在家里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成就。

如果这一計劃执行了，那末老实說，这是可能想出来的一个最坏的計劃。这个計劃是以进行防御战的最坏的方法为基础的，也就是以那种在绝对无所作为中寻找力量源泉的方法为基础的。即使預先規定了远征主要应当具有防御性，那末只要給拥有这样的預备队的土耳其人以轉入进攻的机会，或者至少是占領一个可能采取局部进攻的陣地的机会，这一点显然是很容易做到的。其实在埃內茲和罗多斯托的法英軍隊是完全沒有用处的。

最糟糕的是有充分的蒸汽运输工具并且得到拥有 20 艘战列舰的帆力舰队支援的 10 万軍隊，本身就是一支能够在黑海任何地区进行最坚决的进攻的力量。这一支力量应当占領克里木和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薩和赫尔松，封鎖阿速夫海，摧毁在高加索沿岸的俄国要塞，俘获俄国軍舰并把它毫无损伤地送至波斯普魯斯海峽，不然就是它不了解自己的力量和自己作为作战部队的职责。拥护內閣的人硬說，这样的軍事行动只能在这 10 万人在土耳其集中以

后才能进行，并且說头几个师在埃內茲和罗多斯托登陆只是为了迷惑敌人。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軍隊不直接在黑海沿岸地区的某一据点登陆，就等于白白浪費時間和精力。敌人是不会受騙的。只要尼古拉皇帝一听到这个有 10 万人的喧囂一时的远征的消息，他一定会把他手下的所有兵士統統派到塞瓦斯托波尔、卡法、皮列柯普和叶尼卡列去。决不能先用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吓唬自己的敌人，然后使他相信，不想用这些使他受到絲毫損失。这个花招太容易看穿了，如果打算用这种可怜的手法来迷惑俄国人，那末不列顛外交在这里又犯了一个大錯誤。

因此我认为，想出这种远征的人不过是想欺騙苏丹，假装想使俄国引起最大的恐怖，却要想方設法使它受到最小的損害。

如果法国和英国将占領君士坦丁堡和魯美利亚的一部分，奥地利占領塞尔維亚，也許还占領波斯尼亚和門的內哥罗，而俄国将得到加强它在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的障地的机会，那末这不是瓜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又是什么呢？土耳其現在的处境比 1772 年还坏。当时普魯士国王为了迫使叶卡特林娜女皇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因为多瑙河各公国被占領有引起欧洲冲突的危險），曾建議对波兰实行第一次瓜分，这样可以补偿俄土战争的費用。我們还記得，当初土耳其政府投入对叶卡特林娜的战争，是为了保卫波兰不让俄国染指，而結果波兰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的牺牲品。

联合內閣所实行的叛卖性的拖延政策，使得俄国密使有可能筹划、准备克拉倫登勋爵迫不及待的希腊人暴动。暴动于 1 月 28 日开始，据維也納最近的紧急报告說，到 2 月 13 日已經具有十分危險的規模。看来，阿卡尔納尼亚和埃托利亚的一些地区以及伊魯薩和德洛尼亚一些区域已經卷入暴动。有人說，埃維厄島的首

府埃格里波举行了暴动，其严重性不亚于阿尔巴尼亚的暴动。土耳其人放棄阿尔塔和亚尼納这两个城市而由希腊人去占領。这个情况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瞰制这两个城市的要塞仍在土軍手中，而在阿尔巴尼亚，我們根据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之間的多次战争知道，最后占据这两个城市总是先要占据要塞。康太斯灣和薩罗尼加灣地区以及阿尔巴尼亚沿岸一带将宣布戒严。我在另一篇文章^①里曾指出，希腊人暴动对土耳其政府的最不利的后果之一，就是它会給西方强国以干涉苏丹和他的臣民之間的关系的借口；西方强国不去进行反对俄国的斗争，而去唆使希腊基督徒同沙皇結成同盟。从同一班邮件就接到了如下的消息，这就表明西方强国多么急于利用这一借口。这个消息說，土耳其政府接受了英法提出的条約，英法大使派了两艘蒸汽舰去帮助土耳其人，同时不列顛駐雅典的全权公使却把英国干涉暴动地区事件的意图通知了奥托国王政府。維也納記者今天在“泰晤士报”上从軍事观点对暴动的直接結果作了十分清晰的說明：

“最近几天內，維丁的司令部里开始出現某种頹丧情緒，因为期待中的增援部队接到了向相反方向开进的命令，他們現在正在去土耳其西南地区的途中。伊皮罗斯基督徒暴动的消息，在多瑙河一带的阿尔納烏特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中間引起了震动，他們坚决要求准許他們回家去。休森-貝伊准将和苏里曼-帕沙准将已經絲毫不能影响自己的不受約束的軍隊。有人担心，如果試圖用武力来控制他們，結果就会形成公开的叛乱。但是如果准許他們回去，那他們在回去的路上就会把基督徒居住的地区劫夺一空。如果西部基督教居民的敌对运动具有更加危險的規模，那末土耳其軍隊的西翼将不得不退却，这就完全等于受到一次和联軍舰队开进黑海給俄国的打击同样大的打击。”

以上就是格萊安、罗素、克拉倫登和帕麦斯頓为了替內閣在

^① 見本卷第 108 頁。——編者注

東方問題上的政策進行辯護而大肆吹捧的那種拖延政策的最初後果。他們在星期五的夜晚收到消息說，沙皇不等英國召回漢密爾頓·西摩爾爵士的命令到達，就毫不客氣地斷然命令他離開，在這之後他們舉行了兩次內閣會議，一次在星期六，另一次在星期日下午。他們的會議的結果是：用照會的形式給沙皇再拖延三、四個星期，照會中說：

“堅決請沙皇在收到這一通知的6天內作出莊嚴的保證，答應命令自己的軍隊在4月30日以前撤出多瑙河各公國。”

應當注意，如果照會遭到沙皇拒絕，**是不会有宣戰的危險的**。當然可以說（“泰晤士報”也這麼說），儘管又實行了拖延，不過積極的備戰活動仍在繼續進行。但是應當指出，一方面，由於西方強國答應直接參戰，土耳其政府就不可能在多瑙河一帶採取任何積極行動，而在這一地區每拖延一天都會使土耳其人的狀況更加惡化，因為這就會使俄國人有可能加強它的前進障地，並且把多瑙河軍隊後方的希臘暴動者變成越來越嚴重的實際威脅；另一方面，軍隊在埃內茲和羅多斯托登陸會增加蘇丹的困難，而登陸當然不能阻擋住俄國人。

曾經談妥不列顛的遠征軍將是3萬人左右，法國的遠征軍將是8萬人左右。如果在事件的進程中發現，奧地利只是想掩飾它同俄國之間的協議而假裝同西方強國聯合，那末波拿巴勢必對這種極不明智的分散自己軍隊的作法感到很後悔。

另一個暴動，也可以看做是有利於俄國的牽制行動，這就是西班牙的起義。西班牙的任何運動都必然會引起法英兩國之間的摩擦。我們從沙多勃利昂著的“維羅那會議”⁸⁷一書中可以看出，在1823年，俄國是法國干涉西班牙的鼓舞者。從1834年英法干涉⁸⁸

的发起人是帕麦斯顿这一点可以得出結論，这次使得两国間的 entente cordiale〔誠意協商〕終于破裂的干涉是由同一个原因造成的。“西班牙的婚姻”⁸⁹ 为推翻奥尔良王朝开辟了道路。在目前，“无辜的”伊薩伯拉被推翻会使路易-菲力浦的一个儿子蒙潘西埃公爵有可能提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同时也会使波拿巴想起馬德里有一个时期曾經是他的伯父^①的駐在地。奥尔良王族会得到科堡王族的支持，但是也会遇到波拿巴王族的反对。因此，西班牙起义决不是人民革命，而只能成为摧毁像英法同盟这样不坚固的建筑物的有力工具。

据說，俄国、希瓦、布哈拉和喀布尔之間簽訂了同盟条約。

至于多斯特-穆罕默德(喀布尔的艾米尔)，如果他現在想对英国——他的背信棄义的盟国进行报复，那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在1838年，多斯特-穆罕默德曾命令把沙皇派到他那里去的代理人杀死，然后他建議英国宣布俄国是永久的**不共戴天的世敌**，如果英国政府願意的話；多斯特-穆罕默德在1839年阿富汗远征时被迫起的那种作用，重新激起了他对英国的憤怒，在这次远征期間他的王位被廢除，他的国家被殘暴地、无耻地劫掠一空⁹⁰。希瓦、布哈拉和喀布尔的居民是正統的逊尼派穆斯林，而波斯人信奉什叶派的異教教义，所以未必能够設想前者会同俄国——前者一向憎恨并且蔑視的波斯人的同盟者——联合起来，去反对被他們认为是一切正統教徒的最高首領的赫諦沙赫的公开同盟者——英国。

俄国很可能指望把中国的西藏和韃靼^② 皇帝作为同盟者，如

① 即約瑟夫·波拿巴。——編者注

② 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韃靼这个名詞，是十九世紀西歐著作界用来表示居住在东亚的蒙古族、滿族和其他突厥族的。——編者注

果韃靼皇帝被赶到滿洲并且放棄中国本土的王位的話。你們都知道，汉族起义者开始了反对佛教的現代十字軍征討，燒毀佛教的寺庙，杀死和尚。⁹¹但是韃靼人信奉佛教，而承认中国主权的西藏是大喇嘛的所在地，被信仰佛教的人看做是圣地。因此，如果天王能够把滿清王朝赶出中国，以后他将不得不同韃靼人的佛教政权进行宗教战争。由于佛教信仰盛行于喜馬拉雅山的两边，英国不能不支持新的中国王朝，所以毫無疑問，沙皇将站在韃靼族方面，唆使他們进攻英国，并千方百計地在尼泊尔挑起宗教暴乱。从最近东方来的邮件我們知道，

“中国皇帝預見到北京会失守，曾命令各省总督把皇帝的收入交到热河——这是皇帝的旧的氏族領土和他現在在滿洲的夏宮，在长城东北約八十英里的地方”。

总而言之，不久就要在汉人同韃靼人之間发生宗教大战，这个战争一定会波及印度。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3 月 3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4 年 3 月 18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030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工人議會開幕。——英國的
軍事預算

1854年3月7日星期二于倫敦

昨天上午10時，工人議會⁹²的代表在曼徹斯特的民眾文化館里召開大會。第一次會議當然只討論了一些准备工作問題。斯托克波爾特的代表詹姆斯·威廉斯和倫敦代表詹姆斯·布萊提出的邀請馬克思博士作為名譽代表出席工人議會會議的提案（得到厄內斯特·瓊斯的支持）被一致通過。對於路易·勃朗先生和納多先生，也通過了同樣的決定。不管工人議會的直接成果如何，召開工人議會這個事實本身就標志着工人階級歷史上的一個新時代。也許可以把二月革命後在巴黎盧森堡宮舉行的會議⁹³看做是它在這條道路上的先驅者。但是，一眼就可以看出它們之間有很大的差別：盧森堡委員會是由政府發起成立的，而工人議會是由工人自己發起成立的；成立盧森堡委員會的意圖，是要把臨時政府的社會主義者成員從活動中心排擠出去，使他們絲毫不能認真過問國家的當前事務；還有，組成盧森堡委員會的代表完全是各種或多或少相當於中世紀的行會或現代工聯的所謂 *corps d'états* 即同業公會的會員；而工人議會則是全國範圍的各行各業的工人的真正代表機關。工人議會能不能取得成就，主要甚至完全取決於它是

不是从这一原則出发：当前問題不在于所謂劳动組織，而在于工人階級的真正組織。

現代統治階級的特权以及对工人階級的奴役，都同样是以現行的劳动組織为基础的，現代統治階級当然要用它拥有的全部工具（其中之一就是現代国家机器）来維護和支持現行的劳动組織。因此，要廢除現行的劳动組織，并用新的組織来代替它，就需要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需要不仅用于抵抗而且用于进攻的力量；但是要取得这样的力量，就需要組成一支拥有足够的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力量以同敌軍进行斗争的軍隊。如果工人議會把自己的時間浪費在純粹理論性問題的討論上，而不是为真正組織全国範圍的党开辟道路，那末，它就会像卢森堡委員會一样地遭到失敗。

根据宪章派全国协会⁹⁴章程，重新选举了宪章派执行委員會。已經宣布，厄內斯特·琼斯、詹姆斯·芬倫（倫敦）和約翰·蕭（里昂）按照規定被选入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員會，任期6个月。

波拿巴在交易所訂立借款契約的企图，由于巴黎資本家的消极抵抗而遭到了失敗，所以波拿巴的財政大臣向參議院提出的預算包括如下的一条：

“为了國庫和法兰西銀行业务的需要，授权財政大臣发行一种定期偿还的有息长期國庫債券。國庫債券的流通總額不得超过25 000万法郎（1 000万英鎊），但是，根据1833年6月10日的法令轉为償債基金的債券不包括在上述總額內，并且不能当作保证金交給法兰西銀行和其他的貼現机构。”

在补充条文中規定，經過參議院的追认，“皇帝有权用普通法令来增发債券”。

巴黎来信告訴我，这个建議使得整个資產階級非常恐慌，因

为，一方面國庫債券不得超過 25 000 万法郎，而另一方面，又可以超過上述總額，只要皇帝認為有必要下命令超過多少就可以超多少，而且法蘭西銀行或者其他貼現機構還不得接受這樣發行的債券作為保證金。你們都知道，銀行已經用國庫債券支付了它取自 *Caisses des dépôts et consignations*〔儲蓄銀行〕的 6 000 万法郎。

十二月的英雄們甚至千方百計地利用戰爭的幽靈來打破尚在阻撓他們干預國庫的一些最後的微小障礙。已經大大動搖的國家信貸的必不可免的瓦解會吓壞資產階級，而提出增加鹽稅以及其他類似的非常少有的雜稅定會引起人民群眾的憤怒。因此，無疑會使波拿巴在外國贏得一定的威望的戰爭，很可能加速他在法國的崩潰。

我曾預言目前西班牙的困難一定會導致英法之間的嚴重誤會，這一點從倫敦一家報紙的如下報道得到了證實：

“法蘭西皇帝通過瓦列夫斯基先生問克拉倫登勳爵，如果伊薩伯拉女王被推翻，不列顛政府是否同意幫助他把卡洛斯派王位追求者立為西班牙王。據說，克拉倫登勳爵回答道，幸好伊薩伯拉女王還穩穩地坐在王位上，在如此忠於君主制度的國家里，革命只是在遙遠的將來才有可能發生；但是，即使西班牙萬一爆發了革命，而且女王被推翻了，不列顛內閣也應該拒絕受任何義務的約束。

皇帝要立德·蒙太莫林伯爵為王的建議，是通過不讓蒙潘西埃公爵夫人繼承她姐姐的王位這樣一個十分自然的願望暗示出來的；皇帝認為，讓路易-菲力浦的兒子，西班牙女王的丈夫作自己的鄰居，是很不方便的。”

約翰·羅素勳爵在星期五的下院會議上宣稱，他不得不把他的改革法案暫時收回，但是，如果在這一期間向俄國皇帝提出的新建議被接受而使東方問題得到解決，那就在 4 月 24 日審議這個法案。誠然，在沙皇對他的臣民的宣言以及給波拿巴的信⁹⁵公布以

后，这种解决的可能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小了。然而政府的声明还是表明，提出改革法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联合內閣的外交达到恢复俄国的 *status quo ante bellum* [战前状态] 的时候，轉移并緩和社会輿論。在“晨报”（帕麦斯頓的喉舌，他的最热烈的拥护者之一）对帕麦斯頓在这些內閣陰謀中所起的卓越作用，作了如下的描写：

“阿伯丁勳爵是名义上的而不是真正的首相。女王的首席大臣实际上是帕麦斯頓勳爵。他是內閣思想的主宰。自从帕麦斯頓重新回到政府以来，他的同僚經常担心他又会突然离开他們，他們对于实现他的那些据他們知道是他认为具有重大意义观点，自然不敢加以阻撓。因此，他总能达到目的。上星期，有一个鮮明的例子說明帕麦斯頓閣下在女王陛下的內閣中的影响。新改革法案已正式提交內閣审查，当时存在一个問題：在目前的議會會議上是討論这个法案还是把它撤銷。阿伯丁勳爵、約翰·罗素勳爵、詹姆斯·格萊安爵士和威廉·摩耳斯沃思爵士都贊成把这一法案提出来討論。帕麦斯頓勳爵建議撤回这个法案，并且正像我們在几天以前描写的那样大声宣称，如果他在內閣中遭到失敗，他将在下院里投票撤銷这个問題。这次討論或者說座談的結果，是帕麦斯頓取得了胜利。他的反对者——其中包括执政党在上院的領袖以及該党在下院的領袖都遭到了失敗。帕麦斯頓勳爵在上个星期取得的另一次胜利，就是任命查理·納皮尔爵士为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大家都知道，無論約翰·罗素勳爵或詹姆斯·格萊安爵士都反对這項任命，但是帕麦斯頓勳爵却主張任命，結果还是任命了。高貴的勳爵将在今天晚上主持在改革俱乐部举行的庆賀英勇的海軍上将的宴会，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昨天晚上，格萊斯頓先生向下院提出了这一代人所不知道的新玩艺儿——軍事預算。从他的发言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决定这样早把自己的財政措施提交議院审查，目的就是預先說出战争对私人錢袋极不利的后果而抑制国内的战争热情。他的发言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他要求的只是在战争突然停止时把打算离

開不列顛海岸的 25 000 人弄回來所需要的那一笔款子。

他首先敘述最近一个財政年度的实际收支狀況。格萊斯頓強調指出，这一个月年度还没有結束，因此对最后一个月的收入只能根据概算推断。到 1853 年 4 月 18 日截止的一年的全部收入，根据概算为 5 290 万英鎊，而实际收入达到了 54 025 000 英鎊；可見，实际收入超过預計收入 1 035 000 英鎊。另一方面，支出比概算节省了 1 012 000 英鎊。因此，格萊斯頓計算出，如果不发生国家目前所遇到的特殊情况，这一年度的收入大約会超过支出 2 854 000 英鎊。

然后，格萊斯頓談到他执行的降低稅收的結果。关税尽管降低了，1853—1854 年度的收入仍然达到了 2 060 万英鎊，而 1852—1853 年度的收入只有 20 396 000 英鎊，即增加了 204 000 英鎊。降低茶稅带来的亏损只有 375 000 英鎊。用 1 辨士的单一稅来代替 3 辨士至 10 先令的印花稅，沒有造成預計的亏损，而是增加了 36 000 英鎊的收入。

接着，格萊斯頓談到了上次會議通过的增加稅收的法律的結果。所得稅的征收在爱尔兰受到了种种情况的阻撓，但是仍比原来估計大約多收 2 万英鎊。由于扩大收入稅的征收範圍（由 150 英鎊改为 100 英鎊），看来在大不列顛要比預定的概算多收 10 万英鎊，即收入 25 万英鎊。在苏格兰每一加侖酒精征收 1 先令的附加稅，這項收入仅仅增加了 209 000 英鎊的收入，而根据概算，這項收入要增加 278 000 英鎊。

另一方面，爱尔兰的酒精稅的收入比原来估計多收的 198 000 英鎊还多收了 213 000 英鎊。在整个財政年度中应当征收的遺產稅不过 50 万英鎊。以上就是格萊斯頓先生关于截至今今年 4 月 5

日止的这一年大不列顛財政狀況的报告。

1854—1855 年度收入概算

(单位: 英鎊)

关税.....	20 175 000
消費稅.....	14 595 000
印花稅.....	7 090 000
普通稅.....	3 015 000
所得稅.....	6 275 000
郵稅.....	1 200 000
國家財產.....	259 000
过去的結余.....	420 000
其他收入.....	320 000
<hr/>	
共收入.....	53 349 000

支 出 概 算

(单位: 英鎊)

长期國債.....	27 000 000
非长期國債.....	546 000
統一基金.....	2 460 000
陸軍.....	6 857 000
海軍.....	7 488 000
炮兵.....	3 846 000
軍需.....	645 000
其他開支.....	4 775 000
民軍.....	530 000
偵察勤務.....	792 000
東方勤務.....	1 250 000
<hr/>	
共支出.....	56 189 000
赤字.....	2 840 000

格萊斯頓先生在談到弥补赤字的来源以前，先列举了政府不

打算建議下院通過的措施。他不願意恢復他去年提出減低稅率并已取得法律效力的那些稅，哪怕是部分地恢復也罷。他不願意要求無益地恢復過去的政府已經放棄的那些稅。但是，如果國家現已投入的戰爭再拖延一年，政府未必能夠長期地保持這樣的降低稅率。總而言之，格萊斯頓不打算建議提高間接稅。他也不願意發行公債，因為沒有一個國家的財產狀況像英國這樣負債累累。最後，格萊斯頓在談了以上這些開場白以後，進而談到政府的建議。這裡指的是在6個月內把所得稅稅率提高一倍和完全廢除現行的把期票分為國內期票和國外期票的作法。匯票的平均稅率，雖然不是平均分配的，直到現在每100先令是1先令6辨士。格萊斯頓曾建議去掉比率的零頭，把它減為1先令。根據他的計算，這一改變應當增加6萬英鎊的收入。至於所得稅稅率，收入在150英鎊和150英鎊以上的，每英鎊應當從7辨士增加到 $10\frac{1}{2}$ 辨士，收入在100—150英鎊的，每英鎊應當從5辨士增加到 $7\frac{1}{2}$ 辨士。同時，格萊斯頓建議，由下院通過一項提案，授權他在稅款收到以前發行175萬英鎊的國庫券，這些國庫券用增加的所得稅收入來償還。最後，格萊斯頓先生試圖為他的旨在減少國債的最新措施辯護（沒有完全成功），你們都知道，這些措施都以可恥的失敗告終了。

有許多議員參加了這一報告以後的辯論，但是唯一值得指出的是迪斯累里先生的發言。他說，他絲毫不反對政府為了保證戰爭能夠全力而勝利地（如他希望的）進行而認為自己必須負責向下院提出的建議。但是，如果戰爭拖延下去，他反對把直接稅變成戰費的唯一來源。至於格萊斯頓報告中第二部分，即有關國內目前財政狀況和游資的部分，他認為不明确是這一部分的特點，它不像

財政報告，至少不像在目前情況下提出來的報告。他認為目前的國庫收支狀況是有缺點的，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現政府上台的時候，國庫收支表的存額，在 1853 年 1 月 3 日達到 900 萬英鎊。而過了一年，到 1854 年 1 月，就減少了一半。迪斯累里計算出，國庫收支表上的存額，在 4 月 5 日定將降低到 300 萬英鎊，因為支付國家貸款利息以及進行債券轉換的費用總共要 900—1 000 萬英鎊。極可尊敬的紳士說，用不着把它列入國庫收支表，而應當把不足的數目加到赤字里面。迪斯累里斷定，在目前把收支作到完全相符合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現在發生的問題不像過去那樣，是收支相符還是收支表上有些剩餘的問題，而是收支大致平衡還是有很大的赤字的問題；事實上，不是收支勉強相符，而是有了很大的赤字，這個赤字是財政大臣從兩個方面造成的。第一，他在幣值提高的時候把國庫券的利息降低到 1.5%；第二，南海公司⁹⁶債券的不幸的轉換措施，這個措施不僅把他的存額消耗殆盡，而且給他留下了 200 萬英鎊的赤字。

在其他的議員提出了不太重要的意見以後，就結束了關於概算報告的審查，並且通過了決議。

卡·馬克思寫於 1854 年 3 月 7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4 年 3 月 24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4035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The People's Paper

THE CHAMPION OF
POLITIC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RIGHT.

981

LONDON, SATURDAY, MARCH 10, 1854.

Price Fourpence

卡·馬克思 給工人議会的信

1854年3月9日于倫敦
索荷廣場第恩街28号

非常遺憾，我不能，至少目前不能离开倫敦，因此不可能亲自来表达我在接到要我作为名誉代表参加工人議会的邀請时所感到的驕傲和感激的心情。召开这个議会的事实本身，证明世界历史上的新时代已經到来。这个不平常的事件的消息将会喚起欧美各地工人的希望。

在世界各国当中，大不列顛是資本专横和劳动被奴役达到了頂点的国家。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对于拥有整批产业軍的百万富翁和勉强度日的雇佣奴隶之間的中間阶层，都沒有消灭得这样彻底。这里已經沒有欧洲大陆各国那样的几乎在同等程度上依靠自己的財產和自己的劳动的人数众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階級。在大不列顛，財產同劳动已經完全分离。因此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組成現代社会的两个階級之間的战争都沒有这样巨大的規模，沒有这样清晰可見的輪廓。

正因为这样，大不列顛的工人階級最先准备好并且最先負有

使命来领导最終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偉大运动。它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地位，数量上的极大优势，过去的艰苦斗争的經驗和現在的精神力量。

大不列顛的千百万工人第一个奠定了新社会的真实基础——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力的現代工业。英国工人阶级以不懈的毅力、流血流汗、絞尽脑汁，为使劳动变成高尚的事业并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造成产品普遍丰富的水平創造了物质前提。

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創造了現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現在它应当实现解放劳动的第二个条件。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財富的力量从壟断組織的无耻的枷鎖下解放出来，使它們受生产者的集体监督，这些生产者直到今天还在听任自己劳动的产品本身轉过来反对自己，变成压迫他們自己的工具。

工人阶级征服了自然，而現在它应当去征服人了。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但是需要把所有这些力量組織起来，在全国范圍內把工人阶级組織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議會面前的偉大而光荣的目标。

如果工人議會仍然忠于使它产生的那个思想，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这样来写：1854年英国有两个議會——倫敦議會和曼彻斯特議會，即富人的議會和穷人的議會，——但是真正的人只出席了工人的議會而沒有出席老板們的議會。

忠实于你們的 卡尔·馬克思

写于1854年3月9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4年3月18日“人民报”第98号

俄文譯自“人民报”

The Mass Movement.

THE LABOUR PARLIAMENT.

FRIDAY'S SITTING.

The house re-assembled at nine o'clock.

Mr. Clark Cropper in the chair.

The minutes having been read and confirmed, it was ordered that instead of 300 copies, 1,500 copies of the balance sheet should be printed.

Mr. E. Jones then read the following letter from Dr. Marx, of London:

"28, Dean Street, Soho, London.

"5th March, 1884.

"I regret deeply to be unable, for the moment at least, to leave London, and thus to be prevented from expressing verbally my feelings of pride and gratitude on receiving the invitation to sit as Honorary Delegate at the Labour Parliament. The mere assembling of such a Parliament marks a new epoch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news of this great fact will arouse the hope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throughout Europe and America.

"Great Britain, of all other countries, has seen developed on the greatest scale, the despotism of Capital and the slavery of Labour. In no other country have the intermediate stations between the millionaire commanding whole industrial armies and the wage slave living only from hand to mouth so gradually been swept away from the soil. There exist here no longer, as in continental countries, large classes of peasants and artisans almost equally dependent on their own property and their own labour. A complete divorce of property from labour has been effected in Great Britain. In no other country, therefore, the war between the two classes that constitute modern society has assumed so colossal dimensions and features so distinct and palpable.

But it is precisely from these facts that the working classes of Great Britain, before all others, are compelled and called for to act as leaders in the great movement that must finally result in the absolute emancipation of Labour. Such they are from the conscious clearness of their position, the vast superiority of their numbers, the dignified struggles of their past, and the moral strength of their present.

It is the working millions of Great Britain who first have laid down the real basis of a new society—modern industry, which transformed the destructive agencies of nature into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man.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es, with invincible energies, by the sweat of their brows and brains, have called into life the material means of enabling labour itself, and of multiplying its fruits to such a degree as to make general abundance possible.

By creating the inexhaustible productive powers of modern industry they have fulfilled the first condition of the emancipation of labour. They have now to realize its other condition. They have to free those wealth-producing powers from the infamous shackles of monopoly, and subject them to the joint control of the producers, who, till now, allowed the very products of their hands to turn against them and be transformed into as many instruments of their own subjugation.

The labouring classes have conquered nature; they have now to conquer man. To succeed in this attempt they do not want strength, but the organization of their common strength—organiza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on a national scale—such, I suppose, is the great end and aim of the Labour Parliament.

If the Labour Parliament proves true to the idea that called it into life, some future historian will have to record that there existed in the year 1884 two Parliaments in England, a Parliament at London, and a Parliament at Manchester—a Parliament of the rich, and a Parliament of the poor—but that was not only in the Parliament of the man and not in the Parliament of the masters.

Yours truly,

KARL MARX.

Mr. E. Jones announced that he expected Dr. Marx in Manchester—if not that week, early in the week following.

載有卡·馬克思給工人議會的信的
“人民報”原版的一部分

卡·馬克思 工人議會

1854年3月10日星期五于倫敦

大不列顛是資本專橫和勞動被奴役達到了頂点的國家。在任何一个國家中，對於擁有整批產業軍的百萬富翁和勉強度日的僱傭奴隸之間的中間階層，都沒有消滅得這樣徹底。這裡已經沒有歐洲大陸各國那樣的幾乎在同等程度上依靠自己的財產和自己的勞動的人數眾多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階級。在大不列顛，財產同勞動已經完全分離。因此在任何一个國家中，組成現代社會的兩個階級之間的戰爭都沒有這樣巨大的規模，沒有這樣清晰可見的輪廓。

正因為這樣，大不列顛的工人階級最先準備好並且最先負有使命來領導最終必然使勞動得到徹底解放的偉大運動。它所以如此，是因為它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地位，數量上的極大優勢，過去的艱苦鬥爭的經驗和現在的精神力量。

倫敦的每日報刊對工人議會的活動實行“沉默政策”。它們希望以大規模的 *«conspiration de silence»* [“緘默陰謀”] 來扼殺它。幾個月來，它們發表的許許多多關於這種議會是否有可能召集的文章已經使公眾膩煩了，而現在却有意只字不提工人議會已經出世，並且已經開始工作的事實。這種以為只要假裝看不見危險就能逃避危險的鴛鴦的才略在我們的時代是不中用的。以後報刊將

被迫談論工人議會，而且不管它們裝作怎樣漠不關心，未來的歷史學家將這樣來寫：1854年英國有兩個議會——倫敦議會和曼徹斯特議會，即富人的議會和窮人的議會，——但是真正的人只出席了工人的議會而沒有出席老板們的議會。

下面是制定工人議會行動綱領的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

“委員會認為，工人議會的任務是：

- 促使這個時期舉行的罷工和同盟歇業在有利于工人的條件下勝利結束，採取今後可以避免罷工和同盟歇業的措施；
- 保證工人在工作期間的合理待遇；
- 幫助婦女和兒童擺脫工廠制度的壓迫；
- 籌備工人教育資金，禁止剋扣工資和暗降工資。

其次，委員會認為議會的任務是，為保證勞動者合理地分得自己勞動所創造的利潤而鬥爭，首先是為創造出使他們能夠成為自己勞動的支配者以便完全擺脫僱傭奴隸制的條件而鬥爭，委員會深信，籌備必要的活動資金是這方面的有決定意義的步驟，因此提出以下各項請你們審查：

1. 募集作為建立全國工人基金的資金；
2. 保管所募集的基金的措施；
3. 基金的使用和工人權利的保障；
4. 群眾運動的組織。

一、建立全國工人基金

(1) 根據工資的水平，每周從工資中扣除如下的數目：

- 每周 4 先令以下—— $\frac{1}{2}$ 辨士
- 每周 8 先令以下—— $\frac{3}{4}$ 辨士
- 每周 12 先令以下——1 辨士
- 每周 15 先令以下—— $1\frac{1}{2}$ 辨士
- 每周 20 先令以下——2 辨士
- 每周 30 先令以下——3 辨士
- 每周 40 先令以下——4 辨士

(2) 参加群众运动的各工人組織的負責人員將募集的資金送交运动理事会。

二、基金的保管

(1) 各地方組織的負責人員把他們為群众运动募集的錢每星期向运动理事会送交一次, 詳細办法将在下面說明。被指定接收資金的負責人員应立即把收款收据交給募集人。

(2) 理事会理事应把全部所收到的为群众运动募集的錢以理事会理事的集体名义存入銀行(留于手头的不得超过 50 英鎊); 从銀行提取全部存款或部分存款, 必須交驗載有經理事会法定多数理事签字的有关決議的理事会記錄。

(3) 按此手續提取的活期存款(如果超过 5 英鎊) 應該是銀行券, 銀行券的號碼記在便于审查的本子上, 并在报上公布; 取出的銀行券应分成几份, 委托理事会理事分別保管; 提取大笔款項时, 应分成相等的几份由每个理事保管。

(4) 按这种方式保管錢款的每个理事应出一張从銀行領得相应一份錢数的字据, 事先款項必須根据理事会理事的人数分成相等的份数; 在根据決議需要用錢时, 如果他拒絕交出他所保管的那部分銀行券, 便可立即根据他所立的字据对他进行追究, 只有在他归还了那部分銀行券后, 字据才可作廢; 这种字据应存放在保險柜或保險箱中, 保險箱应交給非有关人員(非理事会理事) 負責保管, 只有当理事会全体理事在場时, 保管人員才允許取出字据。

(5) 为了支付或购置而从銀行領出的款項, 只有在理事会全体理事在場时, 理事会才能支付。

三、基金的使用

(1) 募集的資金的用途如下: 資助所有举行罢工的城市和地方, 清偿过去和現在罢工和同盟歇业期間积累的一切債務。对各城市的援助按現有失业人数的比例等量分配。这里也根据海船上当粮食快完的时候所实行的各取相等的一份的原則, 不管工資水平的高低, 对每个人的資助应当相等。虽然对于現在罢工和同盟歇业的参加者将一律給以資助, 但是在将来将仅仅援助那些承认和支持群众运动的組織。

(2) 必須建立調整劳动价格的部門, 为此每月必須公布关于凡有工人参加

群众运动的一切生产部門所用的原料价格、劳动价格、成品出售价格和其他生产費用的賬目。理事会根据这些資料公布关于企业主利潤的資料，而且必須把所有能够从企业主那里得到的关于同生产有关的任何特別費用或补充費用的資料包括在內。劳动价格應該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調整，并且相应地規定工資率。在农业部門也應該采取类似的办法。

(3) 工人除了具有分享企业主的利潤的不可爭辯的权利之外，还具有另一种更加不可爭辯的权利，即成为自己劳动的支配者的权利。为了这一点，而且为了更有效地調整工資，除了剝夺企业主因为有了剩余劳动力而得到的权力之外，群众运动的資金應該用于购置土地。土地以非理事会理事的个人的名义购置，并根据土质，根据个人租用或大合作社企业使用等不同用途分成大小不同的农場。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屬於群众运动，不得轉让。土地将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短期出租，在租借合同中有專門的条文規定，无力支付租金者立即剝夺租借权。根据合同的另一条規定，租借者必須将租金付給交接书(关于交接书下面将有說明)所規定的受托人。出面购置土地的人必須在交接书上签字，交接书規定租借人不向出面购置土地的人繳納租金，而繳給当时群众运动理事会的理事。理事会理事应立写字据，保证在离职时如果不向理事会的继任人签具所收租金数目的交接书，每人应向两位被指定的不是购置土地的人員繳 5 000 英鎊的罰款；继任人应受同样的字据的約束。

(4) 为了更好地保障工人成为自己劳动的支配者的权利，为了避免劳动市場劳动力过剩，委员会还建議你們投資開設作为群众运动财产的合作工厂、作坊、貨棧。在这些企业工作的人員，除了得到按照工資率規定的工資(这一点上面已經談到)以外，还可得到企业出售产品的純利潤的一半；另一半利潤应列为群众运动的收入。由工人选举的每个合作社企业的管理人員应当經過理事会的批准。每个企业的管理人員对采购和銷售进行調整，每月向理事会提出关于采购、銷售、支付、亏损或贏利的报告。当对于工人同管理人員之間的分歧提出有充分理由的申訴时，工人有权撤換管理人員，选举新的管理人員，但是需經总票数四分之三以上的大多数通过。管理人員必須把每个合作社企业純利潤的一半送交群众运动理事会。对于群众运动将来为合作社企业购置的财产，應該像对待地产一样，采取妥善保管的措施。”

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委员会的报告到第二部分为止已在工人

議會星期三的會議上通過。參加制訂這個群眾運動行動綱領的委員會的有厄內斯特·琼斯、詹姆士·芬倫、詹姆士·威廉斯、阿伯拉罕·羅賓遜和詹姆士·布萊。

卡·馬克思寫於 1854 年 3 月 10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4 年 3 月 29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4039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卡·馬克思 希臘人暴動

引起巴黎和倫敦很大不安的蘇丹希臘臣民的暴動，現在被鎮壓下去了，但是人們認為，再度暴動的可能性還存在。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說，我們在仔細地閱讀了有關整個事件的文件以後，得出了如下的堅定的看法：暴動者只能從品都斯山脈南坡的山地居民中得到補充；他們除了門的內哥羅自由逃民中的虔誠教徒，得不到土耳其其他基督教臣民的同情；特薩利亞平原的居民是還處在土耳其統治下唯一人口眾多的希臘移民，他們怕自己的同胞比怕土耳其人更厲害。不應當忘記，這部分居民由於胆小怕事，甚至在希臘獨立戰爭⁹⁷時期也不敢暴動。其餘一部分希臘居民估計不過30萬人，散居在土耳其帝國的各個城市，他們得不到其他民族的基督徒的好感，以致凡是人民運動勝利的地方，如塞爾維亞和瓦拉幾亞，所有希臘籍教士都被趕走，由本地牧師來接替他們。

雖然這次希臘人暴動本身一般來說意義並不大，但是從它使西方強國有了干涉土耳其政府同它的大多數歐洲臣民（其中希臘人只占100萬，而信仰正教的其他民族却有1000萬人）之間關係的借口這一點來說，它仍然具有意義。居住在希臘王國的希臘人以及居住在伊奧尼亞群島受英國統治的希臘人，自然認為自己的民族職責就是在一切操希臘語的地方把土耳其人趕走，使特薩利

亚和伊皮罗斯并入希腊国家。让他们甚至幻想恢复拜占庭吧——虽然整个说来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民族，他们是不会相信这种幻想的。但是希腊人关于扩大民族国家和关于独立的这一切计划，在当时曾得到俄国的阴谋活动的支持（不久前被揭露的阿法纳西神甫的阴谋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受到山地强盗的宣扬，但没有得到平原农民的响应，——这一切计划同土耳其臣民的宗教权利问题没有任何关系，而人们却企图把这个问题扯进去。

我们从英国报纸以及舍夫茨别利勋爵在上院作的和蒙克顿·米耳恩斯先生在下院作的报告中得悉，英国政府部分地由于这次希腊居民的运动的缘故将采取措施来改善土耳其帝国基督教臣民的处境。在这个报告中清楚地指出，西方强国所追求的伟大目标，就是使土耳其境内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享有平等权利。这一点或者根本不意味着什么，或者意味着不论谁信哪一教，根本不分教别地赋予穆斯林和基督徒以政治权和公民权，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国家同教会、宗教同政治的完全分离。但是土耳其国家同所有东方国家一样，是以国家和教会、政治和宗教紧密交错而且几乎两位一体为基础的。对于土耳其帝国及其当权者来说，可兰经同是信仰和法律的源泉。但是在可兰经面前，能不能使正统教徒和异教徒、穆斯林和莱雅^①享有平等权利呢？这实际上必然意味着用新的民法典来代替可兰经，换句话说，就是破坏土耳其社会的结构，在它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秩序。

另一方面，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混为一体。在拜占庭帝国，国家和教

^① 土耳其用语，从十九世纪初起通常指受压迫的非伊斯兰教居民。——译者注

会是非常紧密地交織在一起的,以致不叙述教会的历史,就不能叙述国家的历史。在俄国也是这样混为一体的,不过同拜占庭的情况相反,教会变成了国家的普通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按照土耳其人的东方概念,在奥斯曼帝国,拜占庭的神权政治可以发展到这种程度:小教区的教士同时是法官、村长、教师、遺囑执行人、稅吏和在民事生活中到处出头露面的受委托人,他不是小公務員,而是百事通。这里可以对土耳其人提出的主要責难,并不是他們限制了基督教教士的特权,相反地是在他們統治之下,这种无所不包的专制监护,这种教会监督和干涉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領域。法耳梅賴耶尔先生在他的“东方来信”中十分开心地描述了一位正教神甫在听到他說天主教神甫沒有任何世俗权力、不承担世俗职能后如何惊讶的情况。这位正教神甫惊呼:“那末我們天主教弟兄們用什么来填滿自己的時間呢?”

从上述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土耳其实施新的民法典,即同宗教完全沒有关系的并以国家和教会完全分离为基础的民法典,不仅意味着廢除伊斯兰教,而且意味着消灭在土耳其帝国存在的那种形式的正教教会。难道会有人幼稚到真的相信,似乎参加英国現政府的胆怯而軟弱的反动派会想到要在土耳其这样的国家里担負起实现彻底的社会改革这样巨大的任务嗎?这是十分荒謬的。他們只可能有一个目的,这就是自吹自擂地欺騙英国人民和欧洲人民。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3 月 10 日

作为社論載于 1854 年 3 月 29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03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俄軍从卡拉法特撤退⁹⁸

俄軍从卡拉法特撤退了，而且据說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作战計劃。这就是耗尽瓦拉几亚的最后一些資源的3个月进军中所作的努力和飽尝艰險的光荣結局。这就是看来完全忽視了最基本的战略原則而莫名其妙地向小瓦拉几亚进军的战果。为了夺取土軍在多瑙河左岸所控制的唯一的桥头堡卡拉法特，俄軍把自己的主力部队集中在极右翼，从而使兵力已經削弱的中央和左翼在遭到敌人任何攻击时完全沒有掩护，并且对于交通綫和退路表现了战史上从未有过的漠不关心。奥美尔-帕沙沒有利用俄軍的这一失策，这只能說是因为英国駐君士坦丁堡大使从中干預。至于俄軍为什么沒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不得不可耻地撤退，这一点我現在打算来談談。

我們所以說这次撤退是可耻的，是因为在进攻开始时曾大肆喧嚷，結果只占領了一个有威胁性的陣地，而最后則偃旗息鼓，乖乖地撤退了，甚至沒有試图进行一次认真的战斗，其次，是因为一連串的錯誤和荒謬行动所造成的战局，除了使將領有可能相信自己当了傻瓜以外，毫无所得；这一切是最可耻的。

現在我們来談問題的实质。

1853年年底俄軍在瓦拉几亚、莫尔达維亚、貝薩拉比亚有以下的部队：

(1)第四軍(丹年別尔格軍): 3个步兵师, 1个騎兵师, 4个炮兵旅; 除去伤亡, 共有 45 000 人;

(2)第五軍(利迭尔斯軍)的一部分: 1个步兵师, 1个騎兵师, 2个炮兵旅, 总共有 15 000 人;

(3)第三軍(奧斯坦-薩肯軍): 3个步兵师, 1个騎兵师, 4个炮兵旅, 总共 55 000 人。

除了非战斗人員和利迭尔斯軍駐在敖德薩近郊的一个师(它必須执行守备勤务, 所以不应把它計算在內)以外, 共約 115 000 人。

到 12 月初, 多瑙河各公国的俄国部队只有由丹年別尔格和利迭尔斯指揮的部队。奧斯坦-薩肯軍的移近, 應該是大規模集中兵力向卡拉法特进攻的信号。奧斯坦-薩肯在布格河和普魯特河的陣地应由从莫斯科开出、正在途中的第六軍(切奥达也夫軍)接替。在同第六軍会师以后, 多瑙河軍团約有 17 万人, 如果西南各省的新兵能够直接派往战区, 那末它将会更加增强。

但是俄国的总司令认为, 只要 115 000—120 000 人就足以防守多瑙河沿岸从布来洛夫到尼科波尔的整条战綫, 并且可以分出足够的兵力集中在极右翼去进攻卡拉法特。

当这个计划在 12 月底以前开始执行的时候, 卡拉法特的守軍恐怕不超过 10 000—12 000 人, 在維丁还有 8 000 人, 但是指望他們的支援是不可靠的, 因为他們必須在雨季渡过水势湍急的河流。然而由于俄軍移动迟緩, 哥尔查科夫公爵优柔寡断, 更主要的是由于卡拉法特的司令官伊斯馬伊耳-帕沙的勇敢、剛毅, 土軍得以向这个受威胁的地点調集 4 万人, 把卡拉法特从一个无力抵抗两倍于守軍兵力的敵軍的攻击的普通桥头陣地, 变成一个能够至少掩蔽 3 万人并抵御敌人一切襲击(除了正規圍攻以外)的要塞。有句

話說得很对，野战工事构筑者的最大胜利就是迫使敌人构筑塹壕。如果俄軍实际上沒有这样做，那只是因为他們知道即使用这些最极端的手段也不可能在規定期限夺下卡拉法特。从此，卡拉法特将和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崩采耳維茨的营垒、托列斯-維德拉斯的工事和卡尔大公在維罗那城外的塹壕⁹⁹那样的野战筑城的巨大成就一起作为軍事学术的典范而載入史册。

現在我們来研究一下俄軍进攻所采取的手段。他們运到克拉約瓦的攻城炮的总数可以证明，他們的的确确想夺取卡拉法特。我們順便指出，用軍事观点无法理解而只能用外交影响来解釋的事情之一，就是奥美尔-帕沙听任俄軍把火炮調来調去而不加阻撓。俄軍現在唯一的需要是要有足够的兵力以击退土軍，保卫塹壕和炮队，并在缺口被打开时立刻向缺口强攻。这里，伊斯馬伊耳-帕沙又采取了一个有毅力、有才干的統帅所应采取的行动。1月6日他在切塔特的出击，他使兵力占优势的俄軍終于失敗的勇猛攻势，他在俄軍繼續集中兵力和俄軍的优势兵力把他完全封鎖在小小的多瑙河半島以前一直反复采取的那种进攻行动，——总之，他对俄軍正面上各个地点进行集中攻击以各个歼灭(只要力所能及)敌人的防御方法，正是像他这样处境的統帅所应当做的，并且同奥美尔-帕沙在沃耳特尼察采取的消极防御，或在多瑙河下游駐守的整个时期內的懈怠不振、毫无作为形成有趣的对照。因为，如果奥美尔-帕沙也曾在什么地方采取过規模不大的进攻，——看来，这些进攻从来不是适可而止，而是盲目地、頑固地在同一地点繼續好几天，甚至明知不会有什么結果却仍然如此，——那末当需要調4—6万人渡过多瑙河的时候，这些小規模的进攻就算不上什么了。

到1月底俄軍終于在卡拉法特周圍集中完毕。在平地上他們

占了明显的优势，因而那里一定有3—4万人。从115 000人中除去3—4万人，另外再除去防守布来洛夫到海边一綫所必需的2万或3万人，在整个大瓦拉儿亚連守备部队在內还剩下将近50 000—65 000人，这支军队远不足以防守这样一条漫长的战綫和与战綫平行、在战綫后面很近的交通綫。甚至以不到65 000人的军队对某个据点进行猛攻，也能够使所有这些分散的俄军最后彻底失败，夺得俄国的所有弹药庫。奥美尔-帕沙迟早会說明他为什么放过了这个机会。

总之，俄军虽然尽了自己一切努力，也不过勉强地在卡拉法特前面集中了足以击退土军前哨、然而不足以进攻要塞本身的兵力。他们几乎用了5个星期的时间才取得了这一暂时的、虛假的战績。工程长官施尔德尔接到了攻占卡拉法特的直接命令。他来了，看到了并决定，在切奥达也夫沒有到达因而不能从中央和左翼調来生力军以前，不采取任何行动。

俄军5个星期来一直处于翼側和后方完全暴露的危險境地，似乎是有意誘敌进攻，实际上他们对于这种进攻連一分钟也抵抗不住。5个星期以来奥美尔-帕沙一直在威胁着俄军的翼側和后方的陣地上一动不动，尽管他从这个陣地上不用眼鏡和望远鏡就可以看到俄军的弱点，但是他什么也沒有做。的确，在盟国庇护下进行的这一套現代作战方法是无法理解的！

突然有消息傳到倫敦說，俄军从卡拉法特全部撤退了。“泰晤士报”叫道：啊！这是我們同盟国奥地利人的胜利，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军队集中在俄军的后方特兰西瓦尼亚。自然，这是同奥地利結成的光荣的同盟的胜利，也是阿伯丁勋爵的光荣的政策胜利。阿伯丁万岁！但是在第二天却出現了奥地利真正的声明，說同奥

地利不存在任何同盟，奧地利人至今沒有說過，而且看来直到現在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支軍隊派到現在的駐地去。因此，現在大家根本弄不清俄軍撤退的原因。

現在有人告訴我們，俄軍試图像 1828—1829 年那样在布来洛夫和加拉兹之間的地区渡到多瑙河对岸，直扑阿德里安堡。如果俄軍同英法分舰队之間沒有互相充分的諒解，这种進軍在战略上是不可能的。我們还听说俄軍撤退的另一个原因。据说命令切奥达也夫停止進軍，是为了在敖德薩以北建立一个 3—4 万人的兵营。如果这是事实，那末他就既不能替換普魯特河和塞勒特河地区的任何部队，也不能增援卡拉法特的哥尔查科夫。因此，哥尔查科夫公爵就只得像他来时那样秩序井然地撤退了。俄軍向卡拉法特進軍的一出偉大的悲喜剧就是这样結束了^①。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3 月 13 日
載于 1854 年 3 月 18 日“人民报”第
98 号，并作为社論載于 1854 年 3 月
30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04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并根据
“紐約每日論壇报”校对过

① “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刊登的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因此，我們的不列顛伙伴完全不了解俄軍撤退的原因。究竟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很简单：法国和不列顛的軍隊正开往君士坦丁堡。从那里派軍隊到敖德薩或貝薩拉比亚去切断俄軍的交通綫是最輕而易举的了。

不管盟国的真正意图怎样沒有恶意，外来的压力却会迫使它认真地行动起来。显然，哥尔查科夫并不相信西方軍隊是在执行純粹外交的使命。他甚至可能完全相信英国，但是对于法国他就不可能这样信任了。他甚至可能相信所有內閣，但是他不可能相信將軍們。在当地只有土軍的时候，他可以采取冒險的側敌行軍，但是在法国和不列顛的軍隊可能逼近和威胁他的翼側的时候，他就不能不更严肃慎重地对待問題了。因此命令切奥达也夫停止進軍是为了叫他在敖德薩以北建立一个 3—4 万人的兵营。因此，他不可能把軍隊調到普魯特河或塞勒特河地区。因此，决不能期望有任何部队来增援在卡拉法特的哥尔查科夫。因此，在这个地方进行强攻是不可能的。因此，哥尔查科夫公爵不得不像来时那样秩序井然地撤退了。俄軍向卡拉法特進軍的一出偉大的悲喜剧就是这样結束了”。——編者注

卡·馬克思

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

1854年3月21日星期二于倫敦

目前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大臣們被迫公布了他們在上台后最初3个月中同俄皇来往的秘密公文¹⁰⁰以及关于1844年沙皇同阿伯丁勋爵会見的备忘录,阿伯丁勋爵是为了向“圣彼得堡报”¹⁰¹应战才公布这个备忘录的。

現在我就从分析涅謝尔罗迭伯爵給英国政府的“备忘录”开始,这个备忘录是根据1844年6月俄皇訪英之后的通报写成的。备忘录指出,奥斯曼帝国的现状“最符合于保持和平的共同利益”;英国和俄国在这个基础上已經达成協議,并且共同努力来維持这个 status quo [状态]。“要达到这个目的,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打扰土耳其政府,沒有必要就不要用外交上的爭論去惊动它,非到万不得已就不要干涉它的内部事务。”但是怎样才能够有效地执行这个“不干涉制度”呢?第一,大不列顛不应当妨碍俄国认为必要时对俄土条約所作的解釋,相反地应当促使土耳其根据俄国对条約所作的解釋来行动;第二,应当使俄国能够“經常地”干預苏丹和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間的关系。总之,对土耳其政府的“不干涉制度”就等于俄国的参与制度。但是这个奇怪的建議表达得远不是这样坦率。

看起来备忘录說的是“一切大国”，但是实际上分明在暗示，除了俄国和英国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大国。备忘录說，法国“必須根据圣彼得堡和倫敦之間取得協議的那种行动方式来行动”。奥地利被描繪成俄国的一个簡單附屬物，既說不上独立存在，也沒有什么确定的政策，有的只是“通过**完全一致**的原則”同俄国的政策保持“紧密联系”的政策。普魯士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区区小国，因而也就根本沒有被提到。因此所謂“一切大国”无非是对圣彼得堡內閣和倫敦內閣的一种修辞性的說法，而一切大国应当据以联合起来的行动方式也无非是由圣彼得堡規定而倫敦必須遵循的行动方式。备忘录中說：

“土耳其政府总想摆脱它在同其他国家締結的条約中所承担的义务。它希望不受任何懲罰地作到这一点，因为它指望各國內閣之間相互竞争。它认为，如果它不执行它对某一內閣的义务，其他內閣就会站到它的方面来，使它摆脱任何責任。

重要的就是不支持土耳其政府的这种錯誤打算。每当它不执行自己对某大国的义务时，其他一切大国的共同利益要求——迫使它認識自己的錯誤，严肃地促使它对于向它提出正当要求的內閣給以滿足。一旦土耳其政府看到其他內閣都不支持它，它也就会让步，这时所产生的爭論将通过协商得到解决而不会引起任何冲突。”

这就是俄国为了要求英国帮助自己迫使土耳其根据旧条約作出新让步而向英国提出的公式。

“根据目前欧洲人們的思想情緒，各國內閣对于土耳其基督教居民所遭受的殘酷压迫和宗教迫害不能漠然置之。应当經常使奥斯曼的大臣們認識到这个真理，并使他們确信，只有在他們对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采取寬大而温和的态度时，他們才能指望得到各大国的友誼和支持。

遵循这些原則的外国代表們，应当本着彼此完全一致的精神行事。他們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照会时，应当使这些照会表现出真正的一致性，但是仍然

不采取命令的形式。”

俄国就这样温和地提示英国，要它支持自己对土耳其基督徒实行**宗教保护**的要求。

俄国在如此叙述了自己的“不干涉政策”的前提之后，就不能向自己的亲密朋友隐諱：正是这种不干涉要比任何侵略政策更加危險，它会非常可怕地促使奥斯曼帝国現有的“分解成分”增加起来，因此有朝一日“**难以預料的情况**会加速奥斯曼帝国的崩潰，那时各友好內閣就无力阻止这种崩潰”。接着提出了这样的問題：一旦这种难以預料的情况使土耳其遭到不可挽回的災难，該采取什么措施呢？

备忘录指出，一旦土耳其遭到不可避免的崩潰的威胁，唯一必須做的就是英国和俄国“**在采取行动之前事先达成協議**”。备忘录肯定地說，对于这一点，“在俄皇最近訪問倫敦期間已經原則上取得一致了”（經過这位专制君主同威灵頓公爵、罗伯特·皮尔爵士和阿伯丁伯爵長時間的会商）。結果，“**俄英两国承认約定的义务：一旦土耳其发生某种突然事件，双方应事先就共同行动达成協議**”。

这个約定的义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第一，俄英两国应当事先就**瓜分土耳其**問題取得相互諒解；第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应当同俄国和奥地利即所謂俄国的 alter ego〔第二个我〕結成神圣同盟来反对法国，使法国“**不得不**”，也就是被迫按照它們的目的来行动。这种相互諒解的必然結果就是英国被卷入对法的流血战争，这样就会使俄国放手在土耳其实行自己的政策。

备忘录非常坚持地一次又一次地強調那些能够加速土耳其崩潰的“**不可預料的情况**”。但是在备忘录的末尾，这些隐晦的詞句不見了，而代之以比較明确的說法：“如果我們看到奥斯曼帝国要

崩潰的話”，英国同俄国就應該事先达成協議等等…… 这样一来，唯一难以預料的情况就是俄国关于奥斯曼帝国現在要崩潰了这种难以預料的声明。約定的义务的主要結果就是使俄国有权随时看到土耳其的即将到来的災难，并迫使英国在互相諒解的基础上就这种不可避免的崩潰进行談判。

因此，在备忘录写好十年以后，英国按規定的形式得到通知說，奥斯曼帝国的生命力已經枯竭了，現在已經到了事先就排除法国的問題，即背着法国和土耳其来策划陰謀的問題达成協議的时候了。由于这个建議，也就出現了圣彼得堡和联合內閣之間来往的一系列秘密文件。

1853年1月11日不列顛駐圣彼得堡大使乔·汉·西摩尔爵士向当时的外交大臣約·罗素勋爵送去了第一个秘密报告。1月9日晚間，他“荣幸地”在叶列娜大公妃的宮中見到了俄皇，叶列娜大公妃敬請爵士夫人和西摩尔勋爵来同皇室会見。俄皇和藹可亲地走到他跟前，表示对联合內閣成立的消息非常滿意，并祝賀联合內閣长期执政；他請大使向年迈的阿伯丁轉达他的祝賀，并請大使告訴約翰·罗素勋爵：

“現在最重要的是两国政府——英国政府和我，我和英国政府——要保持最好的关系，这一点，从来都沒有像目前这么必要。”

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話是在1853年1月讲的，恰恰在这个时候，奥地利，也就是备忘录所說的，“在土耳其問題上同俄国原則上完全一致”的奥地利，在門的內哥罗問題上公开地兴風作浪了。

沙皇說：“只要我們达成協議，別人怎么想，怎么做，都无关紧要。”他以假慈悲的口吻繼續說道：“現在土耳其的局勢非常危急，这可能会給我們大家招来很多麻煩。”

沙皇讲了这些话之后，和藹可亲地向汉·西摩爾爵士伸出手，仿佛要向他告別。但是汉密爾頓爵士“立即想到話还没有讲完”，于是鼓起“很大的勇气”謙恭地請求专制君主“就土耳其問題稍微詳細地談一談”。

汉密爾頓爵士指出：“皇帝的談話和态度尽管依然是非常和藹可亲的，但是表明皇帝陛下不打算同我談論他准备在南方举行的示威問題。”

必須指出，汉密爾頓爵士在 1853 年 1 月 7 日的报告里就已經告訴不列顛政府：

“第五 corps d'armée [軍]已經奉命向多瑙河各省的边境推进，而第四軍將奉命整装待发。”

他在 1853 年 1 月 8 日的报告中說，涅謝尔罗迭曾經把自己对于“必須用武力示威来支持俄国外交”的意見告訴他。汉密爾頓爵士在报告中繼續說：

“皇帝的講話开始时还拘謹，但是后来便直言不諱无拘无束地談論起来，他說：‘現在土耳其的情况混乱得很。看来国家本身已經处于灭亡 (menace ruine) 的前夜。它的崩潰将是巨大的不幸，現在十分重要的是，英国和俄国应就这个問題达成充分的協議，两强国的任何一方，沒有通知对方就不采取决定性的措施。’

皇帝提高了声音說：‘瞧，在我們手中的是一个病人，一个病得很重的人！我坦白地告訴您，如果在最近的某一天这个病人死去，特別是在一切必需的准备做好以前死去，这将是巨大的不幸。但是現在还不是同您談論这个問題的时候。’”

俄国熊认为病人已經奄奄一息了，**应当**吃掉他。汉密爾頓爵士对于俄国医生的这种“难以預料的”診斷有些吃惊，他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仁慈的陛下，請允許我再讲一点。陛下說，这是一个病人，完全正确；但是請陛下恕我冒昧地說，寬宏大量和身强力壯的人应当怜悯病人和弱者。”

不列顛大使感到自慰，因为他觉得他同意沙皇对于土耳其和病症的看法，他要求对病人采取寬大态度等等“至少沒有使皇帝感到难堪”。汉·西摩尔爵士关于他第一次同沙皇秘密談話的报告就是这样結尾的；虽然在这次 vis-à-vis [会見] 中他表现出是一个十足的內侍臣，但是他还是有足够的理智来用下面的話提醒自己的內閣，他說：

“提出这样一类的任何一个建議的目的，只是要使对方进行左右为难的抉擇。我认为这种抉擇就在于：如果女王陛下政府不同俄国就土耳其突然崩潰时应当采取的措施問題达成協議，那末后果一旦对英国不利，女王陛下政府就更沒有理由来埋怨別人。反之，如果女王陛下政府参加討論这些可能性，那末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促使災难发生的因素，而女王陛下政府最关心的却是尽量延緩这种災难的发生。”

汉密尔頓爵士用以下警句似的箴言来結束自己的报告：

“根据上面所說的一切，看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对于英国來說，最好是同俄国取得密切的協議以阻止土耳其的崩潰；而对于俄国來說，最好是这种協議能造成足以引起土耳其崩潰的事件。”

乔·汉·西摩尔爵士在 1853 年 1 月 22 日給約·罗素勛爵的报告中說，1 月 14 日他又同沙皇进行了秘密談話，这次沙皇“单独接見他”。专制君主同意給英国大使讲一讲东方問題。对于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的理想和計劃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他并不贊成。他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对俄国来讲也許只存在一个危險，这就是进一步扩大它本来已經过于廣闊的領土。（讀者該記得，我在引证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的报告摘要时已經提出过这一点。）土耳其的 status quo [状态] 最符合俄国的利益。一方面，土耳其人

已經喪失了軍事上的進取精神；另一方面，“這個國家還有足夠力量，或者說到目前為止還有足夠力量來保持自己的獨立和保證自己得到別國的尊重”。但是在这个帝國內住有幾百萬基督徒，他必須關心他們，儘管這個任務有時是困難的，“棘手的”。他的權利、他的義務和他的信仰都同時要求他這樣做。後來沙皇突然轉到他那個關於一個病人、一個病得很重的人的比喻上來，無論如何不能讓這個病人“在他們手中突然死去”（de leur échapper [從他們身旁消失]）。“如果在某一未來計劃制訂好以前突然發生災難，那就會同時發生混亂、騷動和不可避免的歐洲戰爭。”

沙皇在對奧斯曼帝國的必然死亡作了這種新的暗示之後，緊接着又一次要求英國——根據“約定的義務”——同俄國一道來考慮遺產問題。但是沙皇不暴露自己的未來“計劃”，而寧願以議會的用語來指出瓜分時應當注意的主要之點。

“我想把您當做朋友和君子來談一談。如果英國和我能夠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協議，那末其他問題對於我是不關重要的。別人怎麼做，怎麼想，對我都無所謂。因此我要開誠布公地告訴您，如果英國打算最近在君士坦丁堡建立自己的統治，我是不允許的。我並不是說你們一定有這種打算，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直率地講出來。我自己也願意保證不在那裏建立自己的統治，——當然是作為永久的占領者，——至於作為暫時的保護者，我是不拒絕的。如果不事先採取措施，如果一切憑偶然，那末情勢可能迫使我占領君士坦丁堡。”

這樣，英國就被禁止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統治。而沙皇卻可以做，即使不是作為永久的占領者，至少也是作為暫時的保護者。不列顛大使感謝皇帝陛下這種直率的解釋。然後尼古拉援引了他以前同威靈頓公爵的談話——這次談話的記述或者說談話概要已寫入1844年的備忘錄。談到沙皇對聖地的要求這個迫切問題時，不

列顛大使表示了这样的担心：

“一旦出現俄国軍队就会有两种后果：或者是法国可能进行反示威，或者是（这更加严重）基督教居民举行暴动来反对本来就因秩序混乱和财政危机严重而削弱的苏丹政权。皇帝向我保证，到目前为止他的軍队沒有前进一步（n'ont pas bougé）；而且他希望他的軍队也不需要前进一步。談到法国远征苏丹領土，皇帝陛下暗示，这种步驟会立即引起危机；荣誉感会迫使他毫不犹豫地立即把自己的軍队开赴土耳其；如果这样的行动方式使土耳其苏丹（le Grand Turc）遭到崩潰，他只能对这种后果表示遺憾，但是仍然认为这是迫于不得已而做的。”

这样，沙皇現在就为英国出了一个当前就要研究的題目：英国应当制訂一个消灭奥斯曼帝国的“未来計劃”，“并就取代現行制度的新制度問題事先达成協議”。他鼓励自己的学生，如果这个問題解决得好，还能够得到奖賞，并以父亲般的口吻諄諄叮嚀：

“如果有可能用不破坏普遍和平的办法，也就是由两个最关心土耳其命运的主要政府采取預防的措施来填补由于欧洲伊斯兰教統治的消失所形成的空白，那将是十九世紀的文明的偉大胜利。”

在沙皇向英国提出这种要求之后，罗素勋爵出場了，他于1853年2月9日用密件答复了沙皇。如果約翰勋爵对沙皇的阴險計劃（利用英国同沙皇秘密談判将来瓜分盟国的問題而置英国于一种令人怀疑的处境）有充分了解，他就会也像沙皇那样，只限于口头上答复布隆諾夫男爵，而不是向圣彼得堡发去正式的文件。在秘密文件提交議院以前，“泰晤士报”曾把約翰勋爵的文件說成是对沙皇的建議的有力的、“憤怒的駁复”。可是“泰晤士报”在昨天收回了对罗素勋爵的贊揚，并且声明：“那个文件不值得贊揚，这种贊揚是因为消息不确切而造成的。”約翰勋爵使“泰晤士报”感到恼火的是他在星期五下院會議上的声明，他說他沒有向这

家报纸提供消息的习惯，关于那篇影射他给乔·汉·西摩尔爵士的复信的文章，他只是在文章发表三天以后才读到。

凡是了解 1814 年以后所有英国大臣们（甚至包括坎宁在内）同俄国讲话时的那种卑躬屈膝、阿谀奉迎的口吻的人一定会认为，约翰勋爵的这份密件可以算是这个矮子的英雄行为。

因为这个文件是对历史的卓越贡献，它能够说明谈判的进程，所以，如果读者不嫌，我就把它 in extenso [全部] 引录出来。

约翰·罗素勋爵致乔·汉·西摩尔爵士

(机 密)

1853 年 2 月 9 日于外交部

閣下！

您于 1 月 22 日寄来的秘密报告已经收到并呈交女王。像以往一样，这次女王陛下也满意地注意到皇帝陛下的温和、坦率和友好愿望。女王陛下命我以同样温和、真诚和友好的态度来讨论问题。皇帝陛下所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鉴于土耳其帝国可能崩溃，甚至即将崩溃，也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在未来计划制订好以前突然发生灾难，那就会同时发生混乱、骚动和不可避免的欧洲战争，与其如此，那末预先采取一些对策岂不更好。皇帝陛下说：“这就是我希望您提请贵国政府注意的一点。”女王陛下政府在研究这个重要问题时首先根据以下的考虑：过去还没有发生任何实际危机使我们必须解决这一广泛的欧洲问题。关于圣地的争论曾经发生过，但是这种争论同土耳其内部管理问题没有关系，关系更多的是俄国和法国而不是土耳其政府。土耳其人进攻门的内哥罗造成了奥土关系的某些不和；而这里涉及的也只是威胁奥地利边界的危险，而不是威胁苏丹权力和安全的危险；总之，没有充分根据向苏丹宣布，他没有能力维持国内秩序或保持同邻邦的友好关系。其次，女王陛下政府应当指出，不能肯定地说，什么时候将发生这种事件。当威廉三世和路易十四签订条约来确定西班牙查理二世死后的继承制度时，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只是针对为时不远的事件。西班牙君主的痼疾和任何一个人生命的必然完结都是使预定的事件无疑地很快地到来。西班牙国王的死亡决没

有因瓜分西班牙的条约而提前。关于上个世纪所签订的预先决定托斯卡纳在梅迪契家族的最后君主死后的命运的协议，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可能性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这种崩溃也许会在20年、50年或100年之后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预先就分配苏丹所统治的领土，与同样鼓舞着俄国皇帝和大不列颠女王的那种对苏丹的友好情感未必相称。除了上述考虑以外，还应当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必然会加速它所针对的那些情况的凑合。如果不让奥地利和法国知道这个协议，那是不公正的，而且这种隐瞒行为也是同防止欧洲战争这一任务不相容的。事实上，皇帝陛下也不可能有这种隐瞒的打算。应当认为，只要大不列颠和俄国就适当的行动方式达成协议，并且想要使它生效，它们就会把自己的打算通知欧洲各大国。这样签订出来并且这样通知欧洲各大国的协议是不能长久保持秘密的；而关于这种协议的消息一传出来，除了使苏丹感到不安和不愉快而外，还将煽动他的所有敌人加紧采取强制行动，进行更顽强的斗争。他们在斗争中确信，他们一定获得最后胜利，而苏丹的将领和军队则会感到，任何暂时的胜利都不能够挽救他们的事业而不致最后垮台。现在人们担心的那种无政府状态正是会这样造成并且日趋严重的，而病人的朋友们的预见将成为病人死亡的原因。对于执行任何这一类协议所带来的危险，女王陛下政府恐怕用不着再作更多的叙述。“王位继承权战争”的例子充分证明，这种协议在人们为强烈诱惑力驱使而加以破坏的时候是不会受到多大尊重的。由于俄国人民长期以来的要求以及欧洲国家的竞争，俄国皇帝作为君士坦丁堡的暂时保护者而不是作为永久占领者的这种地位却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最后的占领者不管是谁，恐怕都不会满意穆罕默德二世后裔们那种无所事事和萎靡不振的作为的。君士坦丁堡的占领者由于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的大门，对于欧洲事务自然具有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用来为俄国谋利益，也可以用来控制和限制它的实力。皇帝陛下正确而英明地说道：“我的国家幅员广大，各方面都很美满，因此对我来讲，如果希望再扩大现有的领土和实力，那就是愚蠢的。”他接着说：“相反，对我们说来巨大的危险，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进一步扩大本来就非常大的帝国版图。但是代替土耳其政府的一个强盛而好大喜功的国家可能会使俄国皇帝或者他的继承人必须进行战争。”为了防止欧战而提出的手段可能正是引起欧战的手段，因为无论英国、法国，可能还有奥地利，都不会容忍君士坦丁堡永远留在俄国手里。至于大不列颠，那末女

王陛下政府声明，它沒有任何占領君士坦丁堡的打算或願望，这是永远不会变更的。皇帝陛下可以完全相信这一点。政府还願意提出这样的保证：如果事先沒有同俄国皇帝磋商，决不簽訂任何关于土耳其崩潰时应采取的措施的協議。总之，女王陛下政府完全相信，皇帝陛下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政策是最英明、最无私并且对欧洲最有益不过的政策，这个政策使他比起那些从完全不正当的侵略和瞬息的荣誉中寻求不朽業績的最显赫的君主更加揚名于世。要使这个政策取得胜利，最好是尽最大的克制对待土耳其；最好是使欧洲各大国向土耳其提出的各种要求成为友好談判的对象，而不是成为无条件的要求的对象；尽量避免反苏丹的陆海軍示威；对于涉及土耳其和屬於土耳其政府职权範圍的問題的意見分歧，要根据大国相互的協議来解决，而不要强迫弱小的土耳其政府接受。除了預先提醒這些問題以外，女王陛下政府还要补充它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劝告苏丹根据欧洲各文明民族所普遍采用的公正原則和宗教自由原則来对待本国的基督教臣民。土耳其政府愈是实行平等的法律和公正的管理，皇帝陛下就愈认为沒有必要在实际上行使那种他认为非常麻煩和不便的专有的保护权，虽然毫无疑問，行使这种权利是义不容辞的，是条約規定的。您可以把这份密件宣讀給涅謝尔罗迭伯爵，如果认为适当的話，甚至可以把密件的副本交給皇帝本人。在这种情况下，您在轉交副本时，應該向皇帝陛下保证女王陛下对他的友誼和信賴——他的行动方式所理应赢得的友誼和信賴。

您的忠誠的

約·罗素

我的叙述不得不在下一篇文章中結束^①。但是在結束本文以前，我想供給你們一些广大公众无法弄到的最新材料，作为我以前所說的关于普魯士的立場和計劃問題的补充。

当俄国同英法同盟之間的冲突达到某种頂点时，尼古拉皇帝給自己在柏林的内弟^②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說，虽然法国和英国能够在海上使他遭受某些損失，但是他在陆上不怕它們，因为到

① 見本卷第160—177頁。——編者注

② 即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編者注

4月底他就能准备出动60万大军。其中20万他准备交给弗里德里希-威廉支配,只要后者答应进军巴黎,推翻路易-拿破侖。愚蠢的国王对这个计划是如此热衷,以致曼托伊费尔为了劝止他不要接受这个建议竟花了3天的时间。这是关于国王。

至于馮·曼托伊费尔先生这位普鲁士资产阶级引以自豪的“伟人”本人,只要我们看了他给普鲁士驻伦敦大使本生所发的秘密指令,就对这位人物的全貌了如指掌了,他的这些指令正是在接到上面所说的俄国来信的时候发出的,并且落到了我的手里,虽然落到我手里的途径与我的私人信件落到本生手里的途径是完全不同的¹⁰²。这些指令由于无耻的模棱两可的笔调暴露了这个学究兼军人的真面目,指令的内容大致如下:

“要好好地看一看刮的是什么风。如果您看到英国同法国结成紧密同盟并下定决心进行战争,那您就要坚持土耳其的‘完整和独立’。如果您看到英国在政策上摇摆不定,无意进行战争,那您为了国王即我的和您的君主的荣誉和尊严,就要勇敢地投入争吵。”

瞧,俄国专制君主把普鲁士看做一个区区小国不是很正确吗?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3月21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4年4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45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馬克思

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

1854年3月24日星期五于倫敦

如果总的說来，約翰·罗素勋爵的密件^①可以看作是对沙皇的建議——就可能发生的瓜分土耳其問題事先取得協議——的婉言謝絕，那末它毕竟包含了一些非常奇特的地方，我想請讀者加以注意。約翰勋爵写道：

“沒有充分根据向苏丹宣布，他沒有能力維持国内秩序或保持同邻邦的友好关系。”

但是，在汉·西摩尔爵士的秘密报告中，任何地方都沒有提到，沙皇曾建議向苏丹宣布类似的东西。因此，我們只好假定，或者是罗素勋爵假装反对这个步驟，而实际上自己要提示別人这样做，或者是汉密尔顿爵士的某些秘密报告被压下了，沒有收集到提交議會的文件中去。尤其令人怀疑的是，仅仅16天以后，即1853年2月25日，克拉倫登勋爵在就任外交大臣时給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发出了如下指令：

“閣下，請用謹慎而又不触犯苏丹尊嚴的态度开誠布公地向苏丹說明，是哪些原因使女王陛下政府担心奧斯曼帝国目前莫不是处于特別危險的境地。

^① 見本卷第156—158頁。——編者注

外国的要求有增无已，而土耳其政府又没有能力满足或者不愿意满足这些要求，土耳其内政非常糟糕，土耳其执行机关日益软弱无能，这一切使得它的盟国近来改用了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语调。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可能引起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的普遍暴动并成为对帝国的独立和完整的致命威胁，这将是女王陛下政府深感遗憾的一场灾难，女王陛下政府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一点通知土耳其政府，但某些欧洲大国认为这种灾难是可能的并且已经临近。”（见关于正教教会和天主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蓝皮书第1卷第31、32页）

然而，难道这不是英国明确地向苏丹“宣布”，“他没有能力维持国内秩序或保持同邻邦的友好关系”吗？沙皇曾经非常不客气地对汉密尔顿爵士说，他不允许英国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统治，但他自己却打算在那里建立统治，即使不是作为永久占领者，至少也要作为暂时保护者。约翰勋爵对这个横蛮无礼的声明如何回答呢？他以大不列颠的名义否认有“任何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打算或愿望”。他没有要求沙皇提供这种保证。

罗素说：“由于俄国人民长期以来的要求，以及欧洲国家的竞争，俄国皇帝作为君士坦丁堡的暂时保护者而不是作为永久占领者的这种地位却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危险。”

欧洲国家的竞争，而不是英国的反对！至于英国，它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然而约翰·罗素勋爵不敢用俄国对英国说话时所用的口吻对俄国说话，——“如果君士坦丁堡永久在俄国手里”，英国“是不会满意的”。这样说来，如果君士坦丁堡暂时处在俄国手里，那它是会满意的。换句话说，英国完全同意沙皇本人所提出的建议。它不容许那些沙皇本人拒绝去做的事情，但是准备容忍沙皇打算去做的事情。

约翰·罗素勋爵不“满意”把沙皇作为可能的保护者安置在君

士坦丁堡，却用英国政府的名义声明，“如果**事先沒有**”同俄国“磋商，英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关于土耳其崩溃时应采取的措施的协议”。换句话说，尽管沙皇向汉·西摩尔爵士说过，他**已經**同奥地利签订协议，而事先并没有将此事通知英国，但是英国却保证在同法国签订协议以前一定同俄国磋商。

約翰勛爵說道：“总之，俄皇陛下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政策是最英明，最无私并且对欧洲最有益不过的政策。”

哥薩克陛下始終不渝地奉行的正是他即位时就已宣告的政策，也就是自由主义者約翰勛爵現在宣布为多么无私，对欧洲多么有益的政策。

在目前东方的糾紛中，明显而主要的爭論之点就是，俄国要求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信奉正教的基督徒实行宗教保护。沙皇决不隱諱自己的要求，他直截了当地对汉密尔顿爵士說，“保护这几百万基督徒的权利是条約規定屬於他的”，他“一直温和而謹慎地行使着这种权利”，这使他“有时承担很不便的义务”。約翰·罗素勛爵是否向他暗示过，这种条約并不存在，沙皇沒有这种权利，他无权干涉土耳其正教臣民的事务，就像英国无权干涉俄国新教臣民的事务或者法国无权干涉大不列顛的爱尔兰人的事务一样呢？我們让罗素本人來說明吧：

“女王陛下政府还要补充它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劝告苏丹根据公正原則和宗教自由原則来对待本国的基督教臣民……土耳其政府愈实行平等的法律和公正的管理，俄国皇帝就愈认为沒有必要在实际上行使那种他认为非常麻煩和不便的**专有的保护权**，虽然毫无疑問，行使这种权利是**义不容辞的，是条約規定的。**”

俄国对土耳其臣民的“**专有的保护权**”是条約規定的！这是毫

无疑問的，——約翰勛爵說。而約翰勛爵是誠實人；約翰勛爵是用女王陛下政府的名義說的，而且約翰勛爵是向專制君主本人說的。英國同俄國還有什麼爭執呢？為什麼要把所得稅增加一倍呢？為什麼要用備戰來驚動全世界呢？約翰勛爵怎能在幾個星期以前在議會中以卡桑德拉^①的精神發表演說，那樣裝腔作勢並且傲慢地痛罵沙皇背信棄義和陰謀狡詐呢？難道不是他向皇帝說，皇帝要求專有的保護權“是義不容辭的，是條約規定的”嗎？

聯合內閣可以埋怨的不是沙皇的不坦率或者過分矜持，恰恰相反，而是他的無恥的坦率，因為他曾坦率地對大臣們傾訴衷腸，使他們成為執行自己最隱秘的計劃的心腹，從而把唐寧街的內閣變成涅瓦大街皇帝陛下的辦公廳。有一個人信任你而對你說，他打算殺死你的朋友，並建議你同他事先商定分贓問題。如果這個人是俄國皇帝，而你是英國大臣，那末你就不是把他拉到被告席上去，而是十分奴顏婢膝地感激他對你的高度信任，並像約翰·羅素勛爵那樣認為自己非常幸福，能夠看到“他的溫和，坦率和友好願望”。

但是我們現在回頭來談談聖彼得堡吧。

2月20日晚上，即緬施科夫公爵到達君士坦丁堡之前不過一個星期，在皇太子夫人——大公妃舉行的 *soirée* [招待晚會] 上專制君主走到漢密爾頓·西摩爾爵士身邊，於是兩位“君子”進行了以下的談話：

沙皇：“怎麼，您已經接到復信，明天應當把它交給我。”

① 希臘史詩中特洛伊國王的公主。阿波羅鍾情於她，授以預言的才能；但是她拒絕了阿波羅的愛情，因此阿波羅處罰她，使她的預言永遠沒有人相信。——譯者注

汉密尔顿爵士：“我将荣幸地这样做，不过陛下已经知道，复信的内容和我曾经提请陛下注意的话是完全一致的。”

沙皇：“我听到这一点很遗憾，但是我觉得，贵国政府不正确地理解了我的心意。我主要的不是想知道当一个病人快死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而是想同英国商定，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做些什么。”

汉密尔顿爵士：“但是，皇上，请允许我说，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病人快要死了…… 国家不会死得这样仓猝。如果不发生难以预料的危机，土耳其还会存在很长一个时期。皇上，正是为了预防那些可能引起这种危机的情况，女王陛下政府指望得到您崇高的协助。”

沙皇：“应当告诉您，如果有人硬要使贵国政府相信，土耳其还有什么生机，那末贵国政府大概是接到了不正确的情报。我向您再说一遍，‘病人’快要死了。我们决不应让这种情况弄得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应当达成某种协议…… 请注意，我并不要求签订条约，议定书。一个大体上的协议——此外，我没有别的要求；君子之间只要这一点就够了。但是今天不多谈了。请明天到我那里来。”

汉密尔顿爵士“衷心地感谢皇帝陛下”，但是，当他刚刚离开皇宫客厅回到家里，便发生了怀疑。于是他坐近写字台，给约翰勋爵写这次谈话的报告了。末了，他在信边写上以下值得注意的意见：

“皇帝如此坚持地谈到邻国即将崩溃，他心中早已认定，如果不是瓦解的时刻，至少也是引起瓦解的时刻已经临近了。这一点未必有什么疑问…… 但是，如果在俄国和奥地利之间没有取得某种大体的然而无论如何是密切的相互谅解，他恐怕不敢这样武断。

如果我的怀疑有根据，那末皇帝的目的就是促使女王陛下政府同他的内閣和维也纳内閣共同制定一个彻底瓜分土耳其的计划，同时不让法国参加。”

这个报告于3月6日送到伦敦，那时克拉伦登勋爵已接替罗素勋爵担任外交大臣。大使的惊惶预告对这位胆小怕事的土耳其

崇拜者的心理的影响十分令人惊讶。克拉倫登既然已经完全知道沙皇不要法国参加而瓜分土耳其的背信弃义的計劃，他却向法国駐倫敦大使瓦列夫斯基伯爵說，“同法国相反，他倾向于信任俄国皇帝”，“不信任的政策既不明智，又无益处”，“尽管他希望英法两国政府始終共同行动，因为它们的政策和它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他仍然应当坦率地說，法国政府最近以来的行为不能指望获得这种所希望的结果”。（見藍皮书第1卷第93、98頁）

应当 *en passant* [順便] 指出，恰恰在沙皇开导英国駐圣彼得堡大使的时候，倫敦的“泰晤士报”天天重复說，土耳其已陷入絕境，奥斯曼帝国正在土崩瓦解，它留下的不过是“土耳其人纏着头巾的脑袋”的幻影而已。

在皇帝的 *soirée* [招待晚会] 談話后的第二天早晨，乔·汉·西摩尔爵士如約拜会沙皇。他們之間进行了“一小时零十二分的談話”。关于这次談話他又在1853年2月22日的报告中向約翰·罗素勋爵作了汇报。

俄国皇帝一开始就請汉密尔顿爵士向他大声宣讀約翰勋爵2月9日的密件。当然，他宣称这份密件中的声明是非常令人滿意的；他“只能希望，声明再詳尽一点”。他重复說，土耳其的灾难每一分钟都可能爆发，

“在当前任何时刻这个灾难都可能发生，发生的原因或者是对外战争，或者是旧土耳其派同‘主張按照法国方式进行新的表面改革’的党派之間的內訌，或者是大家知道的基督徒迫不及待地要抛掉伊斯兰教的枷鎖而发起的暴动”。

他不放过机会来讲他那套已經讲滥了的大話，說什么“要不是他在1829年阻止了吉比奇將軍的胜利进军，苏丹政权早就完蛋

了”。然而，大家都知道，当时他派到土耳其去的 20 万人只有 5 万人生还。如果不是土耳其帕沙同外国大使們一起叛变，吉比奇的殘部早已在阿德里安堡平原被歼灭了。

他強調指出，他根本不要求有一个由英国和俄国完全同意的預先决定苏丹管轄下的領土的命运的計劃，尤其是两个內閣之間的正式协定，他只是要求某种大体上的協議或者是交換一下意見，以便每一方都秘密告知对方，它不希望做的是哪些事情，

“哪些可能同英国的利益发生矛盾，哪些可能同俄国的利益发生矛盾，以便遇到这种情况时，每一方都能够避免采取違背对方意願的行动”。

通过这种反面的協議沙皇会达到他所追求的一切。首先，奥斯曼帝国的崩潰可以被俄国和英国看成 *fait accompli* [既成事实]，尽管是以反面的假定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因为現在全看沙皇顛倒黑白以致能够有点像真有其事地向英国宣布，預計的情况已經出現了。其次，英国和俄国一致行动的秘密計劃，不管它帶有如何不确定的和反面的性质，必然会使英国同法国互相对立，因为計劃是在沒有法国参加和背着法国的情况下拟定的。第三，由于英国受到关于它将不做什么的这种反面諾言約束，沙皇就有可能完全放心地制定他的正面的行动計劃。此外，很明显，双方商定在一定情况下它們不允許对方做什么，其实就是以隱蔽的形式商定它們允許对方做什么。这种反面協議形式只是为这两个伙伴中更机灵的一个創造更有利的条件。

汉密尔頓爵士胆怯地嘟囔說：“陛下，也許您能惠然告訴我关于这种反面政策的本意。”起初沙皇假装謙虛地謝絕了，但是后来好像受不了温和的压力，发表了以下极为精辟的意見：

“我不允許俄国人永久占領君士坦丁堡；我这样讲以后就要指出，君士坦

丁堡永远不会落入英国人、法国人或者任何其他大国之手。同样地，我也绝不允許人們试图恢复拜占庭帝国，或者把希腊扩大成一个强国；我更不允許把土耳其分割成許多小共和国，使它变成科苏特、馬志尼和其他欧洲革命者的避难所。我宁願发动一場战争，而且只要还有一兵一枪，就要繼續打下去，我也不願容忍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出現。”

不要拜占庭帝国，不让希腊的版图大大扩展，不要小共和国的邦联，这一类的东西都不要！那末他要什么呢？不列顛大使是用不着苦猜的。在談話过程中皇帝忽然道出了以下意見：

“实际上，多瑙河各公国是在我的保护下的独立国家。可以照旧不变。塞尔維亚也可以采取这种政体。保加利亚也是一样；看来，沒有根据說明为什么这个地区不能組成一个独立国家。至于埃及，我完全理解这块領土对于英国的重要意义。因此我只能說，如果在奥斯曼帝国崩潰后分配帝国的遗产时你們占据了埃及，我是絕不会反对的。对于干地亚也可以这样說；这个島也許对你們有用，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不能屬於英国。”

这样他就证明了，“一旦土耳其帝国瓦解，領土問題的完滿解决，在他看来并不像通常所想的那样困难”。他坦率地声明，他想做的是些什么——瓜分土耳其，并且再清楚不过地描繪了这种瓜分的輪廓，無論是說出来的或者是避而不談的都很清楚。埃及和干地亚——归英国；多瑙河各公国、塞尔維亚、保加利亚——成为俄国的藩屬；土耳其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維那（这些地方他故意避而不談）将并給奥地利；希腊的扩大“不宜过分”；譬如，可把下特薩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并給它。君士坦丁堡应暂时由沙皇占領，然后成为由馬其頓、色雷斯和土耳其欧洲地区的殘余部分組成的国家的首都。但是誰将成为这个小国（它或許还会扩大到安那托利亚島的某些部分）的最后占有者呢？关于这一点他沒有說；但是人們都知道，他心目中早已为这个位子物色好了一个人

物，这就是他的幼子^①，后者正渴望有自己的王国。而法国呢？难道它什么也得不到嗎？或許如此！但是，不，它也将得到一份礼物，这就是——誰会相信这一点！——突尼斯。沙皇对汉密尔顿爵士說，“法国的目的之一无疑就是占領突尼斯”，因此在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时候，他或許真的表現很慷慨，滿足法国对突尼斯的胃口。

讲到法国，沙皇总是用一种特別引人注意的傲慢的輕蔑口吻。他說：“看来法国政府正竭力使我們大家在东方爭吵。”至于他本人，那根本沒有拿法国当一回事。

“从他这方面來說，他不大担心究竟法国认为在东方問題上采取什么行动路綫合适；一个多月前他通知苏丹說，如果苏丹需要他的支持来反抗法国人的威胁，他完全願意为苏丹效劳！”

皇帝繼續說，总之，‘正如我已經对您說过的，我的全部希望，就是同英国达成善意的協議，并且这个協議不是規定應該做些什么，而是規定不應該做些什么。只要达成了協議，只要英国政府同我，我同英国政府达到彼此充分信任，其余一切对我說来都无所谓’。”

“但是陛下，您忘了奥地利！”——汉密尔顿爵士高声說道。

“啊”，皇帝使他非常吃惊地反駁道——“您应当懂得，我談俄国，也就是談奥地利；凡是对前者适合的东西，对后者也是适合的；在土耳其問題上我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他談俄国，也就是談奥地利。关于門的内哥罗他毫不含糊地声明，“贊同奥地利內閣的立場”。

如果在以往的談話中他把苏丹称为小歌剧中的 Grand Turc [苏丹]的話，那末現在他則按保尔·德·科克的手法称他 ce monsieur [这位先生]。而且他多么爱护这位先生呵！他仅仅把緬施

① 即米哈依尔。——編者注

科夫派到君士坦丁堡去，“而我如果願意的話，本来可以把軍隊派到那里去——什么也阻擋不住它”；后来他在沃尔特尼察和切塔特证实了这一点，而他的軍隊从卡拉法特英勇退却也证明了这一点。

哥薩克陛下在同汉密尔頓爵士分手的时候說：“总之，請敦促貴国政府把这些事情再写一下，写得詳細些，而且不要犹豫不定。”

3月7日，即这次非常有趣的對話（或者更正确些說是独白）之后不久，涅謝尔罗迭伯爵邀見了不列顛大使，并将一份“非常机密的、遵照皇帝陛下的圣諭拟就的、并且作为对約翰·罗素勋爵的通知的答复或者說是注解的备忘录”交给了他。涅謝尔罗迭伯爵請他把这个“規定給他的”文件讀一遍。为此，汉密尔頓爵士研究了文件。而他这位先前沒有找出一个字眼来抗議俄国人对法国的显然蓄意侮辱的人，突然哆嗦起来了，因为他发现“备忘录是根据一种錯誤的印象拟出来的：女王陛下政府似乎在俄国和法国的分歧中倾向于后者”。第二天一早他就急忙給涅謝尔罗迭伯爵送了一封 *billet doux* [情书]，向他保证說：

“在最近非常严肃的談判期間，女王的顧問們不仅沒有倾向于法国，如备忘录中所說的那樣，而且相反，他們希望——在被迫〈！〉采取中立立場的政府一般許可〈！！〉的範圍內希望——皇帝陛下的有根据的要求得到充分滿足。”

由于这封阿諛奉迎的信，汉密尔頓爵士自然“同总理大臣”有了另一次“非常友好而滿意的談話”。总理大臣安慰这位不列顛大使，說他沒有了解皇帝备忘录中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絕不是指責英国偏袒法国。涅謝尔罗迭伯爵說：“这里仅仅是希望女王陛下政府能尽力开导法国的大臣們，向他們指出皇帝的寬宏大量和正义感。”因而，“这里”仅仅是希望英国对“卡尔梅克人”卑躬屈节，而对

法国人采取严峻专断的口吻。为了使总理大臣相信英国政府多么忠誠地执行这个任务的第二部分，汉密尔顿爵士念了一段約翰·罗素勋爵的密件，作为“一个例子，說明英国大臣是用什么样的語言同法国政府說話的”。涅謝尔罗迭伯爵相信，这超出了他最大胆的期望。他感到“遺憾的只是早先他手中沒有这样重要的证据”。

汉密尔顿爵士认为俄国答复約翰·罗素勋爵的密件的备忘录乃是“出自皇帝樞密机关而不是出自俄国内閣办公厅的最出色的文件之一”。的确是这样。但是，我們沒有必要細談它，因为它不过是沙皇在“對話”中已經發揮的那些观点的簡述。备忘录竭力暗示英国政府，“不管这些談判的結果如何，两国政府都应当保守秘密”。备忘录指出，沙皇的做法，“正如英国内閣自己承认的，一向是以寬大态度”对待土耳其政府。法国采取了另外的行动方針，从而迫使俄国和奥地利也采取威胁的行动。在整个备忘录中俄国和奥地利是相提并論的。备忘录直截了当地提出，可能造成土耳其立即崩潰的原因之一，就是圣地問題，以及“正教徒因对天主教徒让步而感到受辱的宗教感情”。末了，备忘录宣称，“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受托向皇帝轉达的关于女王陛下政府的友誼和信賴的证明”，同罗素密件中所提供的保证是“同样珍貴的”。这些表明維多利亞女王像藩臣一样忠于沙皇的“证明”，被十分周密地瞞着英国公众，但是，它們或許很快就会在“圣彼得堡报”上发表出来。

汉密尔顿爵士在解釋他同皇帝的談話以及俄国人的备忘录时，再一次提醒自己的内閣注意奥地利的立場。

“如果以为两位皇帝在土耳其問題上业已达成協議或簽訂条約是一个确定不移并且已經得到公认的事实，那末打听清楚它們彼此承担了多少义务就是非常重要的了。至于簽訂這項協議的方式，在我看来，未必能引起怀疑。

毫无疑问，这个协议的基础是由去年秋天两位皇帝几次会见中的一次奠定下来的，以后，这个计划大概又由俄国驻奥地利宫廷公使美廷多尔夫男爵进一步加以制定。男爵是在圣彼得堡度过冬天的，而现在还在那里。”

怎么，在这些事情揭露出来以后，英国政府要质问奥地利吗？不，它仅仅谴责法国。在俄国侵入多瑙河各公国之后，它使奥地利成为一个调停人，而且从所有城市中恰恰挑选了维也纳作为协商地点，把谈判交给布奥尔伯爵领导，并且直至今日继续愚弄法国，硬要法国相信，在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而对俄国人进行的战争中，奥地利可以成为忠实的盟国，尽管英国政府在一年多以前就清楚地知道，奥地利是同意瓜分这个帝国的。

3月19日，关于汉密尔顿爵士和沙皇的谈话经过的报告送到了伦敦。现在克拉伦登勋爵已经接替了约翰勋爵的职位，他竭力要超过他的前任。在得到这份沙皇已经认为没有必要掩饰自己对法国和土耳其的阴谋，而公开加以承认的令人惊异的报告之后4天，高贵的伯爵向汉密尔顿爵士发出了以下急件：

“女王陛下政府感到遗憾的是，笼罩着巴黎的惊惶和忿怒促使法国政府下令把自己的舰队开往希腊领海；不过法国政府的处境在许多方面都同女王陛下政府的处境不同。据女王陛下政府所知，法国政府一直没有从俄皇那里获得有关他打算奉行的对土政策的保证。”（见蓝皮书第1卷第102页）

如果沙皇也告诉法国，“病人快要死了”，现在有了一个瓜分遗产的详细计划，那末，法国自然既不会感到惊惶，也不会对土耳其的命运、施科夫使团的真正目的以及俄国皇帝维护他所谓已经没有了“生机”的帝国的完整和独立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感到疑惑了。

在同一天（3月23日），克拉伦登伯爵给汉密尔顿·西摩尔爵

士发出了第二份急件，这份急件虽然不是为藍皮书而“編造”的，但是包含了对圣彼得堡的秘密报告的秘密答复。汉密尔顿爵士在他的关于談話的报告末尾审慎地提出了如下建議：

“我不揣冒昧地建議，在将发給我的急件中写上一些要結束进一步研究，至少是結束进一步討論那些极不适宜当作應該討論的問題的詞句。”

克拉倫登伯爵感到自己是最适于解决棘手局面的人，他根本不顾自己大使的預告而完全遵照沙皇的指示行事。他在急件中一开头就声称，女王陛下政府“对皇帝希望繼續开誠布公地討論問題的願望表示欢迎”。皇帝从英国政府方面“得到了”“最开誠布公地表明意見”的“权利”，因为他具有“崇高的信念”，认为英国政府会帮助他瓜分土耳其、出卖法国以及在奥斯曼的統治被推翻时帮助他鎮压基督教居民企图成立自由独立的国家的任何活动。

自由民出身的英国人繼續写道：“女王陛下政府完全相信，假使由于新产生的情况，簽訂某种協議是适合的或者是真正可能的，那末皇帝陛下的話将比任何可能簽訂的条約都更值得重視。”

在任何情况下他的話都可以抵得上同他簽訂的任何条約；要知道，不列顛女王的顧問們早已声明过，同俄国簽訂的一切条約由于俄国方面的破坏已經不再生效了。

“女王陛下政府仍然相信，土耳其仍然具有生机。”为了证明这种信念是真誠的，伯爵温和地补充道：

“如果皇帝关于土耳其帝国的时日已經屈指可数的意見公布于世，土耳其帝国的崩潰可能比皇帝陛下所預料的还要早些。”

这样，只要“卡尔梅克人”一說出自己的意見，說病人要死了，他就真的会死去。这就是所謂生命力！这里甚至連耶利哥的

羊角^①也用不着。只消皇上的尊口輕輕一吹，奧斯曼帝國就化為灰燼了。

“女王陛下政府**完全贊同**皇帝的意見：由任何一個大國占領君士坦丁堡是同保持各大國之間的現有均勢，同維持歐洲和平不相容的，並且應立即認為是不可能的；沒有恢復拜占庭帝國的條件；希臘的長期的混亂局勢無助於擴充它的版圖；**由於沒有建立區、鎮自治的基礎**，如果讓土耳其各省各自為政或者允許它們成立特殊的共和國都會造成無政府狀態。”

請注意，對自己的韃靼主子卑躬屈節並奴才般地重複主子的話的不列顛大臣，甚至恬不知恥地重複彌天大謊，說什麼土耳其沒有“建立區、鎮自治的基礎”，然而正是區、鎮生活的大力發展使土耳其直到今日還能抵擋住國內外的極其殘酷的打擊。不列顛內閣既然贊同沙皇所提出的一切假設，也就承認沙皇有意從這些假設中作出的一切結論是正當的了。

英勇的伯爵繼續說道，一旦土耳其帝國崩潰，“歐洲會議將是達到和平結局的唯一手段”。但是他害怕這個會議的後果倒不是因為俄國詭計多端（俄國在維也納會議上把英國擺布得連拿破侖在聖海倫島上都感慨地說：“如果我在滑鐵盧獲勝，我也會強迫英國接受更屈辱的條件。”），而是因為害怕法國。

“在這種情況下，1815年條約應予修改，法國大概會甘冒歐洲大戰的危險，以便擺脫它認為有辱自己民族尊嚴的義務，這些義務既然是獲勝的敵人強加於它的，也就成為經常觸怒它的根源。”

女王陛下政府“希望保存土耳其帝國”，不是要使它充當反對

① 根據聖經傳說，公元前2000年的下半年占領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兵士用吹羊角的聲音使耶利哥攻不破的城牆塌陷（見“舊約全書”約書亞記第6章第2—5、12—20節）。——譯者注

俄国的堡垒，也不是因为土耳其的崩溃会迫使英国反对俄国以保卫自己在东方的截然相反的利益。啊，不是的！——伯爵說道，——“俄国和英国在东方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英国想保存土耳其帝国并非根据某种同东方問題有关的理由，而是“由于它相信，任何一个重大的东方問題被提出来，都会成为西方糾紛的源泉”。因而，东方問題势必引起的不是西方强国对俄国的战争，而是西方强国之間的战争，英国对法国的战争。也就是这位写出这些話的大臣和批准这些話的同僚，却要欺騙我們，硬要我們相信，他們实在打算联合法国来同俄国进行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是“由东方产生的問題引起”的，尽管“俄国和英国在东方的利益是一致的”！

威武的伯爵还往前走。

用他的話來說，对法国战争应当是土耳其帝国瓦解和被瓜分的“必然結果”。为什么他害怕这场战争呢？对法国战争本身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但是，这牵涉到一个微妙的情况，这就是：

“在西方，任何一个重大問題，都将带有革命的性质，而且包含了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审查，大陆各国政府当然不愿意这样做。

皇帝完全知道社会的表层下面經常动乱的力量，知道它們的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会爆发的能力；由于这个緣故，皇帝陛下大概会同意这样一种意見：第一响炮声可能成为造成一种甚至比战争必然带来的灾难还要危险的局势的信号。”

坦率的和平使者感叹道：“因此，女王陛下政府便产生了防止灾难的热烈願望。”如果在瓜分土耳其的后面沒有隐藏着对法战争，而在对法战争后面沒有隐藏着革命的怪影，那末英国政府会以同样的胃口把 Grand Turc [苏丹] 和“哥薩克”陛下一起吞掉的。

忠实于由汉·西摩尔爵士轉来的俄皇办公厅的指令的英勇的克拉倫登，在其急件末了要求“皇帝的寬宏大量和正义感”。

在我們这位伯爵于1853年4月5日給汉密尔顿爵士的第二个急件中曾委托后者通知俄国总理大臣：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已奉命返任；女王陛下的亲笔信使子爵的使命具有**特殊的性质**，因为人們认为，土耳其政府会比较乐于接受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深諳土耳其問題的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的**中庸适度的**忠告，即土耳其政府必須以最温和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基督教臣民。”

就是这位发出这些**特別**指令的克拉倫登，在1853年3月23日的密件中写道：

“对待基督徒并不殘酷。土耳其对待这一部分臣民是寬大的，这种寬大态度倒可以成为某些把土耳其蔑視為野蛮国家的政府的榜样。”

这个密件承认，斯特腊特弗德勋爵是作为一个对苏丹施加压力的最机伶最听話的執行者而被派往君士坦丁堡的。而在当时內閣的報紙上却把派遣他說成是对沙皇的强烈示威，因为高貴的勋爵早就在扮演俄国的私敌的角色了。

向議院提出的一批秘密文件的最后一个是我国的备忘录。尼古拉在备忘录中表示庆幸，因为万一东方发生非常事件，在那些首先应当避免的政治局面的問題上，他同英國內閣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备忘录上注明的日期是1853年4月15日。备忘录保证說，“支持土耳其政府繼續存在的最好办法是，**不要用有損它的尊严和独立的过分要求来干扰它**”。这恰恰是在緬施科夫表演自己的喜劇的时候。緬施科夫曾于4月19日递交了一份无耻的普通照会，

这份照会，正像克拉倫登伯爵在上院所說的，“是用一种幸好在外交界非常罕見的語言写成的”。然而伯爵閣下更加坚定地相信，沙皇打算寬恕病人。当哥薩克侵入多瑙河各公国的时候，他的信心就更加坚定了。

联合內閣只找到了一个裂縫可以躲避这些揭丑的文件。它硬說，緬施科夫公爵使团的明显目的是圣地問題；而就瓜分土耳其交換意見，只涉及遙遙无期的未来。但是沙皇在他的第一个备忘录中明确地說：土耳其崩潰的問題“在他看来絕不是一种幻想或者渺茫的可能性”；英國內閣錯了，它“认为門的內哥罗和圣地这两个問題是跟外交上通常碰到的那些困难問題沒有区别的普通爭执問題”；圣地問題“可能发生最严重的变化”而“引起災难”。內閣本身不仅同意，沙皇在这个問題上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而且同意，沙皇对苏丹的 1 100 万臣民享有“条約所規定的专有的保护权”。如果联合內閣沒有促成土耳其政府接受緬施科夫的要求，那末沙皇就仅仅根据 1844 年的备忘录的精神，根据同这个內閣达成的協議以及他对汉·西摩尔爵士的口头声明——“他不允許別人跟他开玩笑。”——来行动而打算搞死 ce monsieur [这位先生]。这里甚至不产生他对內閣的态度是否正确的問題；唯一的問題就是內閣自己对待他的态度，甚至在目前，是否“合宜”。每一个仔細讀完这些文件的人都該清楚，如果这个可耻的內閣繼續执政，那末只消国外局勢一复杂化，就足以把英国人民推向可怕的革命，而这場革命将把王位、議會和已經沒有保持英国的世界地位的意志和能力的統治階級一扫而尽。

尼古拉通过“圣彼得堡报”向联合內閣提出了挑战——公布证明这个內閣的鮮廉寡耻的秘密文件，这一次他的行动也是恪守自

己的箴言的：

«Je hais ceux qui me résistent; je méprise ceux qui me servent». [“我痛恨那些反抗我的人；我鄙視那些为我效劳的人。”]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3 月 24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4 年 4 月 11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050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宣战。——关于东方問題
产生的历史¹⁰³

1854年3月28日星期二于倫敦

终于宣战了。女王的詔书昨天已由阿伯丁勋爵和約·罗素勋爵分別在上院和下院宣讀。詔书談到了“为了积极反抗俄国对土耳其的侵犯”将要采取的种种措施。明天“倫敦官报”将公布正式的宣战书，議會将在星期五討論对女王詔书的复文。

在英国发表宣言的同时，路易-拿破侖也向参議院和 Corps Législatif [立法团] 发出了类似的文告。

布莱克伍德上尉曾把英法两国的 ultimatum [紧急最后通牒] 送交沙皇，而于上星期六带回的答复說，俄国根本不打算答复这个文件，这样一来，对俄宣战已經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但是，布莱克伍德上尉的使命并不是毫无結果的。由于这个使命俄国赢得了一个月——这是一年中对俄軍最危险的月份。

沙皇和英国政府之間秘密往来的公文的公布，不仅沒有使社会憤懣爆发出来，反而产生了一种 incredibile dictu [不可思議的东西] ——使各种日报和周报有了祝賀英国有一个真正的民族政府的理由。但据我所知，将召集一个群众大会来使盲目的英国公众看清政府的真正行为。这次大会将于下星期四在貨棧街音乐厅

举行；預料庞森比勋爵、累亚德先生、烏尔卡尔特先生等人将参加这次大会。

“汉堡記者”刊載了如下一則簡訊：

“据此間3月16日得自彼得堡的消息称，俄国政府准备公布有关东方問題的其他各种文件，其中包括阿尔伯特亲王的几封信。”

令人詫異的是，就在下院宣讀女王詔书的那一个下午，政府在这次議會會議上遭到了第一次失敗。尽管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关于强迫貧民迁返原居住地的法案¹⁰⁴的二讀，仍以209票对183票的多数决定延期到4月28日进行。政府这次遭到失敗，原因不在別人，而在帕麦斯頓閣下。

“泰晤士报”写道：“閣下善于把他和他的同僚置于两团火焰之間（托利党和爱尔兰党之間）而不寄很大希望于不經過外人的干涉而解決問題。”

我們得悉，3月12日法国、英国和土耳其簽訂了一个三国同盟条約¹⁰⁵，但是，尽管苏丹亲自向受烏列瑪¹⁰⁶协会支持的伊斯兰教大高僧提出要求，后者还是拒絕作出批准关于改变土耳其境內的基督徒地位的決議的决定；这些決議似乎違背了可兰經的教义。看来，这个消息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使得比勋爵不得不发表下述声明：

“我只想表明自己的真誠希望：政府将发表一个声明來說明近日来流傳的一則消息是否屬实，这則消息說英国、法国和土耳其之間訂立的协定中包含一些規定我們具有保护权的条文，这种保护权至少应同我們會加以反对的俄国的保护权一样受到指責。”

“泰晤士报”今天說，政府的政策同得比勋爵的政策完全相反，还說：

“如果某种严重違抗这一政策的行为是伊斯兰教高僧或烏列瑪的宗教狂热的結果，我們將感到非常遺憾。”

無論要了解土耳其政府和宗教当局的关系的性质，还是要了解目前土耳其政府在保护土耳其帝国基督教臣民的問題（初看起来好像是目前东方糾紛的根源的問題）上所面临的困难，都必須先追溯一下這個問題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可兰經和以它为根据的伊斯兰教法律把各个不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归結为一个簡便的公式，即把他們分为两种国家和两种民族——正統教徒和異教徒。異教徒就是“哈尔比”，即敌人。伊斯兰教宣布異教徒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并在穆斯林和異教徒之間造成一种經常互相敌視的状态。在这种意义上說，貝尔貝萊国家¹⁰⁷的海盜船曾是伊斯兰教的神圣舰队。但是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如何能同可兰經并存呢？

伊斯兰教法律規定：“如果某个城市投降，其居民同意成为**萊雅**，即信奉伊斯兰教君主的臣民，而又不放棄自己的信仰，那末他們必須繳納**哈拉志**（人头稅）；他們和正統教徒訂立停战协定，無論誰都不能侵犯他們的房屋或財產……在这种情况下，他們的旧教堂被看做是他們所有的財產的一部分，允許他們在这些教堂中举行祈禱仪式。但是不允許他們修建新教堂。他們只有权修繕和恢复教堂的坍塌的地方。各省总督定期派專員巡視基督徒的教堂和圣殿，檢查是否有以修繕旧房为名增添新建筑的情况。如果城市是經過战斗而夺取来的，那末居民可以保存自己的教会建筑，但是只是作为他們居住处或避难所，不允許在里面举行祈禱仪式。”¹⁰⁸

因为君士坦丁堡同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大部分地区一样是投降的，所以那里的基督徒享有在土耳其政府的保护下作为**萊雅**而存在的特权。他們之所以享有这个特权，仅仅是因为他們同意把自己置于穆斯林的保护之下。因而，仅仅是由于按照伊斯兰教法律

基督徒应服从穆斯林管理，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即他們的宗教首領，同时也就成为他們的政治代表和最高审判官。凡是奥斯曼帝国内我們看到有正教的萊雅聚居的地方，根据法律，大主教和主教都是市政委员会的委員，并在总主教的领导下管理向正教徒分派賦稅的事宜。总主教对自己的教徒的行为向土耳其政府負責。总主教由于有权审判本教的萊雅，他可以把这个权利轉托給大主教和主教在他們管轄的教区内行使，而他們的判決，必須由土耳其官吏和法官等等执行。他們有权判处罰款、徒刑、笞刑和流放。此外，他們的教会还賦予他們开除教籍的权利。除了罰款以外，他們还对民事和商业案件課收各种稅款。教阶制度中的每个等級都有一定的价格。为了获得举行授职仪式的权利，总主教向御前會議繳納很重的貢賦，但他也把大主教和主教的职位卖給本教会的僧侶，而后者則靠出卖下一級职位給別人并从教士身上征收貢賦犒賞自己。教士又把从上級那里买来的权力零售出去，并在他执掌的洗礼、結婚、离婚、遺囑等执事上大做其生意。

从这个 exposé [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土耳其对信仰正教的基督徒的宗教統治系統以及整个基督徒团体都是以萊雅服从可兰經这点为基础的，而可兰經則把萊雅看做異教徒，也就是看做宗教上的一个单独的民族，准許把教会和世俗权力集中在他們的教士的手中。因此通过世俗的解放来廢除他們对可兰經的从屬，也就是同时廢除他們对教会的从屬，并引起他們在社会、政治和宗教各方面的革命，这场革命首先不可避免地会把他們推入俄国的怀抱。誰想用 code civil [民法典]来代替可兰經，誰就必须按照西欧的式样来改造拜占庭社会的全部結構。

穆斯林和他們的基督教臣民之間的关系就是这样。但是又产

生了一個問題：穆斯林和異教徒的外國人之間的關係又怎樣呢？

因為可蘭經把一切外國人都宣布為敵人，所以誰也不敢沒有預防措施而到伊斯蘭教國家去。因此，第一批冒險去同這樣的民族做生意的歐洲商人一開始就力圖保證個人享有特殊條件和特權，後來，這種特殊條件和特權擴大到他們的整個國家。這就是特惠條例產生的根源。特惠條例——這是土耳其政府發給歐洲各國的帝國文書，即特權證件，它允許這些國家的臣民通行無阻地進入伊斯蘭教土地，在那裡從事自己的營業並按照本國的儀式進行祈禱。它和條約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是建立在相互基礎上的協定，不是經過有關雙方的共同討論磋商，也不是在互利互讓的基礎上經雙方批准的。相反地，特惠條例是由一個政府單方面賦予的優待，因此也可以由它自行決定廢除。而事實上，土耳其政府已經不止一次地使它賦予某個國家的特權化為烏有，其辦法就是把这些特權也賦予其他國家，或者完全廢除這些特權，再不就是拒絕繼續加以遵守。特惠條例的這種不穩定的性質使它永遠成為各國大使爭執和埋怨的根源，並且造成了永無休止地交換矛盾的照會和敕令（每當新王即位就被重新頒布）的情況。

外國列強的那種不是對土耳其帝國的基督教臣民——萊雅，而是對去土耳其旅行或者作為外國人在那裡僑居的本教教徒的**保護權**，正是從這種特惠條例開始產生的。獲得這種保護權的第一個強國是法國。在 1535 年蘇里曼大帝和弗朗斯瓦一世時代，1604 年阿罕默德一世和亨利四世時代以及 1673 年穆罕默德四世和路易十四時代，法國和奧斯曼政府之間簽訂的特惠條例於 1740 年在一本條約匯編中得到了修訂、確認、重申和增補，這本匯編的標題就是：“法國宮廷和奧斯曼政府之間的新舊特惠條例和條約。——

公元 1740 年（回历 1153 年）修訂和增补。由御前翻譯秘书、奥斯曼宫廷首席翻譯官德瓦尔先生譯于君士坦丁堡”¹⁰⁹（这是經土耳其政府批准的第一个正式譯本）。这个协定的第三十二条規定法国有权将自己的保护权扩大到一切傳播“法兰克”宗教的寺院（不管这些寺院屬於哪一个国家），以及一切到圣地去的法兰克朝圣者。

俄国是第一个在 1774 年把仿照法国的先例而編制的特惠条例列入条約的国家。这个条約就是凱納吉条約。同样地，拿破侖在 1802 年认为，使特惠条例成为条約的一項条款而保留下来，并使它具有相互約束的协定的性质是有益的。

圣地問題同保护权問題又有什么联系呢？

圣地問題是关于保护耶路撒冷的正教徒的宗教团体和它們在圣土上占有的建筑物，特别是圣墓神殿的問題。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的占有意味的不是所有权（这是可兰經拒絕給予基督徒的），而只是**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决不排斥别的团体在同一个地方进行自己的祈禱仪式的可能性；占有者只有权掌管**钥匙**、巡視和修繕庙宇、燃点圣灯、打扫屋舍、鋪置地毯，此外沒有其他特权，而这一切在东方被认为是占有的象征。因为圣地可以說是基督教的体现，所以关于保护問題也就由于圣地的关系具有最尖銳的性质。

占有圣地和圣墓神殿的有天主教徒、正教徒、阿尔明尼亚人、阿比西尼亚人、叙利亚人和科普特人。在这些覬覦者中发生了冲突，欧洲君主們认为这些宗教糾紛是一个有关自己在东方的影响的問題，于是他們便首先注意到了土地的主人——濫用自己职权的、狂热的和貪婪的帕沙們。奥斯曼政府和它的官吏非常出色地掌握了很麻煩的 *systeme de bascule* [秋千法]，他們对問題的解

决是使天主教徒、正教徒和阿尔明尼亚人轮流得到好处，从而向这些人或那些人要求和索取黄金，并拿所有的人来开心。土耳其人刚刚把占有争议地区的敕令授给了天主教徒，阿尔明尼亚人就带着更沉重的钱袋来了，转瞬之间就得到了一道相反的敕令。他们对正教徒也使用这样的策略。除了土耳其政府的各种指令和它的官吏们的“哈德热茨”（命令）所正式证明的东西以外，正教徒还千方百计地为自己伪造各种各样的名义来占有。有时，由于叙利亚的帕沙们和下级官吏们的自私自利和居心不善，苏丹政府的决议实际上等于一纸空文。这样一来就必须重新商谈，任命新的专员并再牺牲一笔钱。土耳其政府过去为了钱而干的事情，现在由于害怕才去干，以便获得偏袒和保护。它向法国的要求和天主教徒的野心让步之后，赶忙又向俄国和正教徒作出同样的让步，企图用这种办法来躲过它无力反抗的风暴。真可以说没有一个圣物，没有一座小礼拜堂，没有一块圣墓神殿的石头，不曾被用来挑起各基督教团体之间的争端。

我们发现圣墓周围聚集着多不胜数的基督教教派，在它们的宗教野心后面隐藏着同样多的政治的和民族的角逐。

在耶路撒冷和圣地居住着各种不同的民族，依照宗教信仰划分为天主教徒、希腊正教徒、阿尔明尼亚人、科普特人、阿比西尼亚人和叙利亚人。希腊正教徒有2000人，天主教徒有1000人，阿尔明尼亚人有350人，科普特人有100人，叙利亚人有20人，阿比西尼亚人有20人，共计3490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有1373万希腊正教徒，240万阿尔明尼亚人和90万天主教徒，其中每一种人又划分为若干较小的支系。我在上面谈到过的承认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的希腊正教教会同俄国正教教会根本不同，后者的最高宗教首

脑是沙皇；它也同希腊正教教会根本不同，后者的最高首脑是国王和雅典正教最高会议。同样，天主教徒也分为罗马天主教徒，希腊合并宗派信徒和马龙派；阿尔明尼亚人分为格里哥里派和阿尔明尼亚天主教派；科普特人和阿比西尼亚人同样也划分为许多支系。在圣地的三大教会是希腊正教、天主教和阿尔明尼亚教。天主教可以说主要是代表拉丁民族的；希腊正教主要是代表斯拉夫人、土耳其斯拉夫人和海伦人^①的，其余的教会则主要是代表亚洲和非洲民族。

不难想像，所有这些敌对的分子是怎样包围圣墓的，僧侣们是怎样进行战争的，而战争的表面理由是占有伯利恒星、随便一块什么样的帷幕、圣殿的钥匙、祭坛、陵墓、宝座、圣枕——一句话，追求某种可笑的特权！

要了解僧侣们的这个十字军征讨，首先必须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其次是他们的住所的性质。

关于这一点，一位旅行家不久以前叙述道：

“各民族的所有这些宗教渣滓彼此隔绝地居住在耶路撒冷，他们互相敌视和竞争；这是一些流浪居民，他们从朝圣者中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并经常死于鼠疫和贫困。过了若干年，欧洲人死去了或者回到欧洲去了，帕沙和他们的近卫军到大马士革或君士坦丁堡去了，而阿拉伯人则跑到沙漠里去了。耶路撒冷——这是每个来的人短时客居的地方，但谁也不想在那里定居。在这个圣城中每种人都在自己的宗教中找到生活的来源——希腊正教徒和阿尔明尼亚人依靠每年到耶路撒冷来的 12 000 或 13 000 朝圣者的施舍过活，天主教徒则依靠他们在法国、意大利等地的教友的津贴和周济过活。”

除了寺院和圣所之外，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还占有的一些造在圣

^① 海伦人是希腊人的自称。——译者注

墓神殿旁边的矮小的住房或单人住所，其中居住着日夜守护着这个圣地的僧侣。履行这些职责的僧侣定期更换。单人住所只有一道通向神殿内的房门；担任看守的僧侣的食物是从小窗口由外面送进来的。神殿的大门经常锁着，由土耳其人看守，他们只是为了钱才把门打开，并且由于任性或者贪财，就擅自把它关上。

馬扎里尼說，教士之間的爭吵总是最恶毒的。对于这些不仅全都靠圣地为生，而且住在圣地并且全都住在一起的教士又有什么可說的呢！除了这个情景之外，还要提醒一句，天主教神甫几乎完全是由羅馬人、撒丁人、那不勒斯人、西班牙人和奧地利人組成的，他們全都同样嫉妒法国的保护，而都渴望代之以奧地利的、撒丁的或那不勒斯的保护；不仅如此，撒丁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都自封为“耶路撒冷国王”。还要补充的一点是，耶路撒冷的定居居民有 15 500 人，其中有 4 000 穆斯林，8 000 犹太人。不言而喻，約占全部居民四分之一并包括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摩尔人在內的穆斯林在所有各方面都是主人，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政府的軟弱无能完全沒有影响他們的地位。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遭受的貧困和痛苦非笔墨所能形容，他們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最骯髒的地区，即錫安山和莫里亚山之間的一个叫做哈萊特-厄尔-雅胡德的地区（那里有他們的教堂），他們經常遭到穆斯林的压迫和排斥；他們受到正教徒的侮辱，受到天主教徒的迫害，仅仅依靠从他們的欧洲弟兄那里获得的微薄的施舍为生。但是这里的犹太人不是当地居民，而是出生于遙远的不同国家的人，他們之所以被吸引到耶路撒冷来，只是希望居住在約薩法特河谷一带，并在救主应当出現的那些地方死去。

一位法国作家說道：“他們在忍耐和祈禱中等待死亡。他們眼巴巴地望

着莫里亚山，那里曾經矗立着一座所罗門神庙，但他們是不許走近这座山的，他們为錫安山的不幸而落泪，为他們不得不散居天下而哀泣。”

不仅如此，英国和普魯士在 1840 年又派了一位英国国教的主教到耶路撒冷来，其明显的目的就是使这些犹太人返回原籍。在 1845 年，他受到了犹太人以及基督徒和土耳其人的痛打和嘲弄。实际上，他可以說是使耶路撒冷一切宗教联合起来的第一个和唯一的原因。

現在我們很清楚，为什么基督徒在圣地共同进行祈禱仪式会变成各种不同教派之間的永无休止的拚命的“爱尔兰式的爭吵”；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神圣的爭吵不过掩盖着不仅是各个国家而且是各个民族之間的卑鄙的战争，而在西欧人看来是如此可笑的、在东方人看来却是如此異乎寻常地重要的保护圣地問題，仅仅是經常出現的、始終被掩盖着的和永远不能解决的东方問題的一个阶段。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3 月 28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4 年 4 月 15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054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議会的战争辯論

1854年4月4日星期二于倫敦

英国悲剧的特点之一就是崇高和卑賤、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詼諧离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它使法国人的感情受到莫大的伤害，以致伏尔泰竟把莎士比亚称为喝醉了的野人¹¹⁰。但是莎士比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让丑角在英雄剧中担当念开场白的任务。这个发明的荣誉属于联合内阁。阿伯丁阁下扮演的角色就算不是英国的小丑，那也是意大利的潘塔隆¹¹¹。眼光短浅的人总以为，好像一切伟大的历史运动终究都会变成滑稽戏，或者至少变得平庸无奇。但是这样来开场，这正是一出名为对俄战争的悲剧所独具的特色，这出悲剧的序幕已经于星期五晚上在议会两院同时揭开了；两院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内阁对女王诏书的复文，而且打算在昨天午后把这个复文呈交端坐在白金汉宫宝座上的女王。上院的情况用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克拉倫登勋爵阐明了政府的观点，得比勋爵阐明了反对派的观点。一个讲的是执政者的话，另一个讲的是在野者的话。

阿伯丁勋爵，这位领导政府的高贵的伯爵，这位沙皇“机智的”代理人，路易-菲力浦的“可爱的、真挚的、卓越的”阿伯丁，庇护九世的“尊敬的绅士”，虽然也是用通常的哀求和平的声调结束了他

的說教，但是在他发言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再引得議員們哄堂大笑，因为他不是在向俄国宣战，而是在向倫敦周报“新聞报”宣战。馬姆茲伯里勋爵对高貴的伯爵表示了異議。布魯姆勋爵这个“愚蠢的老懦夫”（威廉·科貝特就是这样称呼他的）发现，开始进行的这场斗争“并不轻松”。本着自己特有的基督教精神别出心裁地把不列顛的殖民地变成惨絕人寰的地獄的格雷伯爵，竟提醒不列顛人民說，关于战争的辯論的声調和情緒以及对沙皇和他的哥薩克的敌意是不符合一个基督教民族开始战争时所应有的精神状态的。哈德威克伯爵认为英国所拥有的手段不足以和俄国舰队相抗衡。英国在波罗的海的兵力至少应当有 20 艘装备齐全、火器精良和乘員訓練有素的战列舰，而不应当像过去那样用一伙刚刚招募来的兵士去作战，因为作战时这样一伙人在战列舰上的作用比其他任何人都差。兰斯唐侯爵出来为政府辯护，他希望，战争期短，而且得到胜利，因为（这充分說明了这位高貴的勋爵的理解水平）“这不是一场通常都会引起极严重后果的和极难結束的王朝战争”。

經過这场愉快的、每个人都讲上一句两句的 *conversazione* [談話]，詔书就 *nemine contradicente* [无異議地] 被通过了。

我們从这次 *conversazione* 中所获悉的一切新东西全部包括在克拉倫登勋爵的几个正式声明和关于 1844 年的秘密备忘录事件的某些材料中。克拉倫登勋爵确认，“当前同法国达成的協議只限于交換純屬作战指示方面的照会”。因而，目前英法之間不存在任何条約。关于奥地利和普魯士，他說，前者将保持武装中立，而后者将保持普通中立，但是“在这样一场即将在两国边境爆发的战争中，它們将不可能保持任何中立”。最后，他声明說，“如果能够保证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享有平等权利和自由”，未来战争結束时

所获得的和平才是光荣的和平。

但是我們知道，伊斯兰教总教长已經由于拒絕作出决定来批准确立这种平等权利的条約而被撤換了；君士坦丁堡的老土耳其居民非常憤懣；而从今天收到的电訊中我們得知，沙皇向普魯士声明說，如果西方强国能够迫使土耳其政府接受这种条約，他就准备把自己的軍隊撤出多瑙河各公国。除了推翻奧斯曼的統治以外，他沒有其他的目的。所以就是西方强国打算越俎代庖，他自然也不会冒失得同它們打起仗来。

現在我們来談談秘密备忘录事件，这是我从得比、阿伯丁、馬姆茲伯里和格蘭維耳等人的发言中弄清楚。备忘录“应当是俄国、奧地利和英国之間就涉及土耳其的某些准备工作所达成的临时的、有条件的和秘密的协定。这些准备工作应当不取得法国的任何同意而迫使它参与”。馬姆茲伯里勋爵用这样的話来描述的这个备忘录，是沙皇、阿伯丁伯爵、威灵頓公爵和罗伯特·皮尔爵士之間秘密磋商的产物。而沙皇之所以同公爵和罗伯特·皮尔爵士商量也正是听了阿伯丁的忠告。在阿伯丁勋爵和他的反对者的爭論中，有一点还没有弄清楚：这个文件是沙皇于1844年从英国回到圣彼得堡后由涅謝尔罗迭伯爵拟定的呢，还是由英国大臣們自己拟定作为皇帝声明的笔录的。

阿伯丁伯爵对这个文件的关系，同一个大臣对任何一个正式文件的普通关系不同，这一点，按照馬姆茲伯里勋爵的說法，可以由另外一个沒有提交給議院的文件来证明。尽管阿伯丁肯定地說，他已經把备忘录的“实质”通知了法国，但是备忘录被认为是极端重要的文件，而且是不得通知其他强国的。沙皇無論如何也不知道他已經通知法国了。威灵頓公爵和罗伯特·皮尔爵士贊同并

批准了备忘录。但是备忘录并没有通知皮尔內閣，并提交內閣討論，当时得比勳爵是这个內閣的成員之一。备忘录没有和外交部的普通文件放在一起；在內閣更动的时候，外交大臣亲自把它交给自己的继任人保存。在外交部該項文件没有任何副本。所以得比勳爵虽然是 1844 年皮尔內閣的成員，但是他在就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关于备忘录的事。阿伯丁伯爵离开外交大臣的职位时把装有备忘录的小匣交给了帕麦斯顿勳爵，后者又把这个潘多拉的盒子¹¹² 交给了他的继任人格兰維耳伯爵，而格兰維耳伯爵，据他自己說，他是根据俄国大使布隆諾夫男爵的要求在馬姆茲伯里伯爵进入外交部的时候把这个盒子交给了她，但是，这时文件上的真正的签署看来是被更改了，或者确切些說，被贗造了，因为格兰維耳伯爵在把它交给馬姆茲伯里伯爵的时候說明，这是根据俄皇、罗伯特·皮尔爵士和阿伯丁勳爵会談的結果而由布隆諾夫男爵拟定的备忘录，根本没有提到威灵頓公爵的名字。这种不正确的說明，除了企图把备忘录說成是大使的普通札記，而不是从圣彼得堡宮廷办公厅发出的正式文件，以便抹煞它的重要性之外，想不出有其他任何理由。

俄国对于这个文件非常重視，在馬姆茲伯里勳爵就任 48 小时之后，布隆諾夫男爵就拜訪了他，并問他是否讀过这个文件。但是馬姆茲伯里当时还没有讀过，因为文件在几天以后才交給他。布隆諾夫男爵执意向他指出，必須閱讀这个文件，男爵肯定地說，这个文件是理解同俄国的一切談判的關鍵。然而，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同得比政府的成員談过这个文件，因为显然他是认为托利党政府太軟弱太不穩定，不能很好地执行俄国的政策。1852 年 12 月得比政府辞职了，不久，即 1 月 11 日，当联合內閣成立的消息剛

剛傳到聖彼得堡，沙皇就重新提出了這個問題，這就足以證明他認為“群賢內閣”能夠繼續根據這個備忘錄行事。

這樣，我們看到了一些最權威的見證人在上院中進行的有損政府名聲的揭露，因為他們每一個人當時都是大不列顛的首相或者外交大臣。備忘錄中說，英國外交大臣私自同俄國簽訂“有條件的協定”，不僅未經議會批准，而且也背着他自己的同僚，其中只有兩個人曉得這個秘密。這個文件十年來都沒有交給外交部；它由歷任外交大臣們秘密保存起來。每當一個外交大臣退出舞台的時候，俄國大使就出現在唐寧街¹¹³，並通知繼任人說，希望他好好研究一下條約，研究一下根本不是由國家的合法代表，而是由內閣的某些大臣和沙皇簽訂的秘密條約；希望他遵循聖彼得堡宮廷办公厅擬就的俄國備忘錄給他規定的行動路線。

如果這還不是對憲法的公然破壞，如果這還不是陰謀和叛國，如果這還不是同俄國的秘密協定，那我們就不知道這些詞的含義究竟是什麼。

同時從這些揭露中我們知道了，為什麼罪犯們感到自己太平無事，並且就是在對他們不斷秘密勾結（這點他們已被揭露）的俄國公開作戰時還能夠從容地繼續為國家掌舵；我們還知道，為什麼議會反對派純粹是一種詭詐力量，是使政府傷傷腦筋，而不是去阻礙政府的活動。1844年以來的歷任外交大臣，以及一屆接一屆的政府都是同謀犯；這些人在抽不出工夫控告自己的前任，而心照不宣地把那個神秘的小匣接到自己手里來的時候，就成了他們的同伙。單是一個掩蓋秘密的念頭就使他們每一個人都成為罪人。對議會隱瞞陰謀使每一個人都成了陰謀的參加者。法律認為窩主與盜匪同罪。因此無論進行什麼審判，不僅聯合內閣，而且還有它的

对手，不仅現任的大臣們，而且还有他們所代表的議會党派，不仅这些党派，而且还有英国的統治階級都会陷于毁灭。

En passant〔順便〕指出，在上院中唯一值得注意的发言是得比伯爵的发言。但他对备忘录和秘密往来的公文的批評——关于下院的辯論情形我也可以这样說——并没有包含什么超出我在泛論这个禍患无穷的备忘录和这些絕非寻常的往来的公文时^①告訴你們的那些內容。

“宣战权——这是国王的特权，真正的特权；女王如果向議會提出并通知議會說，她认为必須进行战争，那末下院就不能申述它认为战争是否合适的意見。在这种情况下，議院的职责就是团結在女王周圍，而只有在以后，在一个适当的和符合宪法的时机，才能討論导致战争的那項政策。”

迪斯累里先生在下院就是这样声明的，下院全体議員也是这样說的，“泰晤士报”也用了整整十七栏的篇幅来刊登对这项政策的評述。为什么？正因为这是“不适当的时机”，并且他們的空談必然毫无結果。然而，累亚德先生应当算例外，这位先生直截了当地声明：

“如果議院听取他的意見后确认，大臣們的行为使議会有理由提出質問，那他不会推諉由此而承担的义务，并准备請大臣們在最近期間指定一个時間让他提出这种質問。”

現在非常清楚，为什么“泰晤士报”要开始怀疑累亚德先生的亚述发现¹¹⁴的真实性了。

約·罗素勋爵在下院宣讀了詔书，他和克拉倫登勋爵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当他讀到不可侵犯性、独立自主、自由、文明等字眼

^① 見本卷第 148—159、160—177 頁。——編者注

时用了一种特殊的声調，这种声調使他博得了比較單純的公众的掌声。

累亚德先生在回答問題时有两个极大的疏忽，使他总的說来，非常精彩的发言的效果遭到了損害。第一，他企图证明在联合內閣中存在着两个对立的因素——俄国因素和英国因素，阿伯丁派和帕麦斯頓派，其实除了向俄国阿諛逢迎时所使用的語言和方式以外，这两个派別彼此之間根本沒有任何区别。一个領袖不了解俄国，所以拥护俄国，另一个領袖虽然了解俄国，但还是拥护俄国。前者因此是俄国的公开拥护者，而后者則是它的秘密代理人。前者因此是无私地为俄国效劳，而后者則是有报酬地为俄国服务。前者的危險性比較少些，因为他公开違背英国人民的感情；而后者則会造成无法挽救的禍害，因为他把自己装成对俄国的民族仇恨的体现者。至于說到累亚德先生，那就只好假定，他不了解他认为是同阿伯丁对立的那个人。而对于援引这种对立性的迪斯累里先生，这种原諒就不成立了。因为沒有人比这位反对派領袖更了解帕麦斯頓勳爵，他还在 1844 年就声明过，对英国的利益說来，从来还没有一位大臣的外交政策比这位高貴的勳爵的政策更具有危害性。累亚德先生的第二个疏忽是，他硬說“泰晤士报”是阿伯丁派的公开机关报，根据是，“泰晤士报”往往在秘密往来的公文到后两三天就用其中的材料撰写社論，企图說服全国同意在圣彼得堡策划的无耻勾当；其中最突出的是去年二、三月間所登載的那些文章。如果累亚德像帕麦斯頓勳爵那样，假定这些材料是俄国駐倫敦大使供給報紙的，那他会做得好些；这将使他有可能同时揭露“泰晤士报”和外交部，說它們两者都是圣彼得堡內閣的机构。

我姑且假定，“泰晤士报”真正比联合政府更有力量，不是由于

它所持的見解，而是由于那些揭露了这一秘密通信的叛变性质的报道，因此我把累亚德先生反对这家报纸的声明全部轉引在这里。

“英国收到第一份密件是在 1853 年 1 月 23 日，当月 26 日在‘泰晤士报’上就发表了本人所引证的那些文章中的第一篇文章。第二份密件是在 1853 年 2 月 6 日收到的，而在当月 11 日，即 4 天以后，‘泰晤士报’上又发表了一篇专論，其中有一段摘在下面。文章中說：‘我們并不认为，俄国政策的目的是加速东方灾难的来临；英国将再度誠摯地为緩和一触即发的危局而效劳。但是我們不应忘記，企图延长土耳其人在欧洲的粗野和衰朽的权力只有付出重大代价——使肥沃的省份和众多的基督教居民受野蛮統治——才能实现；如果文明和基督教能克服奥斯曼的征服所造成的罪恶，我們將感到高兴。’

1853 年 2 月 23 日的‘泰晤士报’在說了許多关于土耳其已經衰弱不堪的話后又声称：

‘土耳其政府政治上极端衰朽，統治者中根本没有能干的和廉洁奉公的人，伊斯兰教居民日漸减少，国庫已趋空虛，同时它又統治着南欧某些最肥沃的区域，最优良的港口和最精明能干、有天才的人民，这形成了某种离奇的对照…… 很难了解，这样深重和无可置疑的罪恶竟然在如此长久的时期內还能在政治活动家（他們把这种恶視为相对的善）中找到保护人；尽管我們也知道在如此龐大的帝国的領土上进行任何变革会引起多么大的困难，但是我們仍然願意預見到（不是惊惶不安地而是滿意地預見到）那个时刻’——‘泰晤士报’从何得知，这个时刻已經很近了？——‘那时候像土耳其政府这样的政府再也不能繼續統治像它現在統治着的这样的国家了。或許，这个时期比一般想像的要短一些，或許，某些聰明的国家活动家已在准备措施来对付这种結局，因為他們再也无法繼續无限期地推迟这种結局了。我們并不认为而且也不打算假定，奥地利和俄国目前已經有了或者已經背着其他欧洲强国預先制定了一种对奥斯曼帝国的領土野心怀有敌意的計劃。我們有充分理由认为’——当‘泰晤士报’这样声明的时候，我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緬施科夫公爵作为特使从圣彼得堡被派往君士坦丁堡所負的專門使命是代表尼古拉皇帝声明，作为正教首脑的沙皇本人不能接受也不能强迫东方教会接受不久前法国大使所收到的苏丹关于圣土上的圣地問題的敕令所規定的条件。’

关于緬施科夫公爵使团的第一个消息包括在2月14日和21日收到的汉·西摩尔爵士的紧急报告中。必須指出，1853年3月6日又接到一份紧急报告，轉达了俄皇关于瓜分土耳其的全盘計劃。前面已經指出，对这个紧急报告的答复直到3月23日才送出去；3月13日以前內閣一次會議都沒有举行，虽然政府的某些成員在此以前一星期就已收到了皇帝的建議。这个建議直到3月13日才通知他們的同僚；然而‘泰晤士报’却早就得悉了，因为在3月7日，即在接到紧急报告后的第二天——当时除了两三位內閣成員以外还没有人能够知道，連外交部的職員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見到，——在‘泰晤士报’上就发表了一篇詳細的文章，(听啊！听啊！)这篇文章中提到：

‘土耳其帝国的局势和欧洲强国对东方的态度——对这个問題，政治家們和独立自主的报刊必須认真考虑一下，以便提出并表述自己的观点，尽管实现相应的計劃現在还不是时候，还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国家活动家不得不处理日常政治事务，不得不經常坚持所謂国家必要性的准則，因此受到很大限制，显然，如果一种新的或独创的思想事先沒有受到公众的注意和沒有經過公众縝密思考，他們也就提不出来。’

高貴的勛爵应当特別注意‘泰晤士报’上所說的下面一些話，因为这些話同勛爵的反駁有关，它說：‘正因为这样，所以約翰·罗素勛爵的表現絲毫也不使我們感到惊奇，他在提到不久前在土耳其，特別是在它的欧洲边境发生的困难时，表示不同意不久前人們对这个問題所表述的那些观点，他也重复了——以一个官方人士的庄重态度重复了——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的古老的神話。但是，这类論据對我們是没有用的。’

該文作者怎样知道高貴的勛爵不同意呢？(听啊！)文章繼續写道：

‘我們不同意約·罗素勛爵的意見，好像除了必須討論如果产生瓜分土耳其帝国的問題应当做些什么而外，对于欧洲說来也不可能有更大的災难了。’

希望議院注意下面这段話，它們和俄皇的話几乎如出一轍：

‘我們认为，如果在討論分割土耳其的問題以前，就开始分割土耳其，这会帶來更大的災难。’(听啊！听啊！)这也就是那些話。往下該文作者繼續写道：

‘对于一个国家活动家竟把他在土耳其帝国一旦崩潰时应当奉行的政策和导致瓜分波兰的政策混为一談，我們只能表示惊奇。自然，从国家必要性

方面所作的考慮對於保存土耳其帝國不受侵犯和獨立依然是有效的。但是這些可以有許多否定因素與之對立的考慮，實際上只是意味着害怕去解決重大和複雜的問題。事實上，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有許多根深蒂固的成見（近年來尤其變本加厲），以致連討論真正的問題的嘗試在某些人士看來都是政治腐化和破壞各個國家賴以聯繫的一切法律的行为。’

下一篇文章發表於3月10日。也許議院認為在此以前所引用的表明‘泰晤士報’撰稿人一字不差地使用緊急報告中的用語的證據是沒有說服力的。我們現在將要宣讀的文章，會消除我們在這方面的任何懷疑。3月10日發表的文章一開頭是這樣寫的：

‘緬施科夫公爵此行負有更明確的外交使命。我們有理由認為，比起萊寧根伯爵的指令來，緬施科夫公爵的指令帶有比較和解的性質。’

類似的詞句在漢·西摩爾爵士2月21日的緊急報告中可以找到：

‘涅謝爾羅迭伯爵閣下希望使我確信，緬施科夫公爵將接到的指令，帶有和解的性質。’

文章繼續寫道：

‘我們敢說，當代國家活動家一碰上涉及某些大地方的文明、恢復基督教曾經一度在全歐洲享有的優越地位、保證千百萬人的進步和福利的問題，往往就顯得有些束手無策；他們能夠達成協議的唯一解決辦法就是，用纏頭把土耳其人打扮起來，並繼續認為這是力量和權力的象徵。’

3月19日內閣舉行了會議，討論了3月6日收到的緊急報告，3月23日發出了對緊急報告的答復，其中有這樣一段話：‘雖然女王陛下政府認為必須堅持約翰·羅素勳爵2月9日密件中所闡述的那項政策的原則，但仍然樂於贊同皇帝希望繼續開誠布公地討論問題的願望。’

當天在‘泰晤士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可以找到克拉倫登勳爵密件中的一些句子，文章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我們對於奧斯曼帝國的現狀及其前景的看法同約·羅素勳爵所持的並告知下院的觀點不一致。我們這些看法同我國過去在許多場合所奉行的政策不同，也同大多數倫敦報刊並不那麼出色和特別順利地加以維護的體系根本不同。’

不列顛報刊可以以它沒有堅持‘泰晤士報’的觀點為榮，儘管它並沒有那些曾經動搖過殖民大臣的地位而且幾乎把內閣推翻的利箭。‘泰晤士報’的這

篇文章的末尾写道：

‘他〈皇帝〉声明說，他所希望的是同我国保持良好关系和博得我国的信任。他就这个問題进行的商談将是对他的保证是否真誠的考驗；但是，再不可能有比他准备今后在这个問題上繼續同不列顛政府合作的意願更能证明他对土耳其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温和态度和善良願望了。’

就在‘泰晤士报’宣布它使不列顛公众容忍瓜分土耳其的企图沒有成功的那一天，拖延了整整16天的对紧急报告的答复送到了圣彼得堡。（听啊！听啊！）沒有必要再从‘泰晤士报’上摘录一些引文来麻煩議院了。”

布萊特先生支持科布頓先生，为的是使帕麦斯頓勋爵能再次用咒罵俄国和假殷勤地坚持战争政策的办法来为自己博得声誉。帕麦斯頓在一个地方說：

“但是，我想，凡是长期以来密切注視欧洲事态发展的人都知道，俄国对土耳其的观点不是昨天也不是不久以前形成的。（听啊！）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俄国的政策就具有明显而不变的目的是，这就是至少占領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然后再占領它的亚洲部分。这个政策始終坚定不移地执行着，从来沒有被忽略过。情况順利就前进一步，遇到阻碍就后退一步，但这只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即将出現的时机。（听啊！听啊！）拖延日期决不是使俄国馴服并迫使它放棄自己計劃的妥当办法。它的政策就是始終不忘自己的目的——不慌不忙，不过早地掠取它窺伺的东西以免得而复失，但密切注意其他欧洲国家政府的政策方針并利用每一个可乘之机朝着既定的終极目的迈进，哪怕只是很小的一步。”

如果把帕麦斯頓勋爵的这个声明同他在1829、1830、1831、1833、1836、1840、1841、1842、1843、1846、1848和1849这些年发表的声明对照一下，那末就可以看出，这次声明与其說是对布萊特先生的回答，不如說是对他自己过去的政策¹¹⁵的回答。但是，正当这个狡猾的敌人力图用对俄国的猛烈攻击来获得公众的同情的時候，另一方面他又以下述意見来博取沙皇的欢心：

“先生們，难道我因为俄国政府奉行类似政策而指責它嗎？用合法手段执行的擴張政策是这样一种政策，你可以认为它对你說来是危險的，你可以把它当成威胁其他国家的独立和自由的政策而与之作斗争，但是只要这个政府所使用的是光明正大的、誠实的和公认的手段，不隱瞞，不規避，不欺騙，这种政策就不能成为譴責奉行它的政府的理由。遺憾的是，我应当承认，俄国政府在最近事变进程中所选择的道路，不是一条能够证明它公开承认和大胆宣布的政策是正确的公开直接的道路。”

但是，正如迪斯累里先生所說的那样，对俄国政府可以提出的唯一責难，恰好就是它的无可救药的坦率。由此可見，帕麦斯顿指責的是俄国沒有做的事情，而完全贊同它在实际上所做的一切。

迪斯累里先生对秘密文件提出的批評像往常一样是聰明的，但并未达到目的，因为他声明說，批評現在是不合时宜的，他之所以要向議院发表演說，唯一的目的是拥护女王的詔书。令人懊丧的是，这样一个聰明人由于渺小的升官发财思想和出于党派政策的考虑竟然不仅在議会中，而且在自己的很有分量的喉舌“新聞报”上向任何一个帕麦斯顿大献殷勤。

在昨天的議院會議上，詹·格萊安爵士通知說，已接到关于舰队駛入黑海，現在正停泊在瓦尔那附近的消息。

阿伯丁勋爵在上院說，他打算在4月11日(星期二)建議議院會議延期到4月27日(星期四)举行。

卡·馬克思写于1854年4月4日

載于1854年4月17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405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俄国和德意志强国。——粮食价格

1854年4月7日星期五于倫敦

克拉倫登勳爵昨天在上院宣称，“他有理由认为”从敖德薩乘运输船出发的4000名俄軍在多布魯甲登陆的消息是不确实的。他不知道俄国舰队离开了塞瓦斯托波尔，因为塞瓦斯托波尔几乎一直是处在英国或法国軍艦的監視之下。关于联軍舰队看来沒有动静的问题，他本来想说：只有投入整个联軍舰队，才能对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薩进行封鎖，但由于处在阴雨时期，这样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此他认为，先让舰队停泊在貝科茲是非常妥善的。“泰晤士报”駐維也納記者同意克拉倫登勳爵的这种見解，此外，还揭示了他采取这种策略的真实原因。自从关于“解放基督徒”的談判公开以后，担心君士坦丁堡暴动就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了。因此，在有一支足以迫使土耳其人沉默的陸軍以前，就把舰队撤出博斯普魯斯海峽，是极其“不妥善的”。

約翰·羅素勳爵在下院宣称，雅典宮廷应对希腊的風潮負責，因为它——起初是秘密地，而現在則公开地——支持那些風潮。

这个星期議会的辯論，除了对穆尔先生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来审查任命赫·斯托諾尔为維多利亞殖民地法官案件的建議的爭論外，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在議院的不公开會議上查明，这

位斯托諾尔在 1853 年斯来果鎮选举时有賄賂行为。議院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但是实际上，对斯托諾尔先生的追究只是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已經分裂的爱尔兰旅¹¹⁶ 的两个派別之間斗争的一种借口。至于格萊斯頓先生的假仁假义的党羽和皮尔派拥护者們被吸引和卷入这出爱尔兰丑剧中的程度如何，这可以从“晨邮报”的下面短評中看出来：

“在所提交的信件、流傳的謠言和最近几个星期向議會委员会提出的文件中，有許多令人更加怀疑的地方：参加联合內閣的皮尔派从前些时候起就不断利用一些爪牙来影响爱尔兰的选举，并且为此提供大量資金。名声特別坏的是紐卡斯尔公爵。正如所发现的，曾举行过(看来是根据他的指示)一次會議来討論关于提拔那些搞选举阴谋的人員的問題。”

“每日新聞”今天发表了法国、英国和土耳其簽訂的条約，不过內容只是有关軍事行动的协定。西方强国在条約中有意不写明自己“援助苏丹”的真正条件。这些条件是由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 *in loco* [就地] 用威胁手段强加于人的，可是后来都作为土耳其政府的自願行动被提了出来。

梅克倫堡公爵在柏林的和平使命，除了給普魯士国王多添一个不參與西方同盟的借口以外，沒有其他目的。我接到柏林来信，說俄国只有在国王保证重新命令瑞典港灣司令遵守旧的規定，即在海岸炮火射击区内至多允許 4 艘外国軍艦拋錨停泊的情况下，才同意承认瑞典的中立。这个命令同瑞典和丹麦所采取的中立的規定有重大的差別，因此需要等待斯堪的那維亞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間的談判来确定。斯德哥尔摩正广泛流傳着这样一种說法：俄国人将不再占領阿兰群島，他們正在那里拆除自己的工事，并且运走武器和其他軍用物資。今天接到的电訊說，这些都已經做了¹¹⁷。

奧地利駐在匈牙利東南地區的 corps d'observation [觀察兵團]現在完全處於戰鬥準備狀態，並已進入給它們指定的在各地的陣地。集中起來需要 10—12 天。德國報紙一般認為，這支部隊是在奧地利積極參加俄國一方的情況下被派去從翼側向土耳其軍隊進攻的，而且這樣做並沒有什麼困難。但是奧地利人只有通過麥哈提亞或貝爾格萊德才能深入土耳其，在麥哈提亞他們將碰上土耳其軍隊，而在貝爾格萊德則他們同土軍拉开的左翼防綫處於一條綫上。因此非常可能的是，如果奧地利人懷着敵意進入土耳其，那末他們就會從貝爾格萊德通過克魯謝伐茨和尼什向索非亞推進。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土軍從維丁直接南下到索非亞的路程還是比較短的。

在普魯士債務委員會向下院提出的報告中，闡明了普魯士在東方問題上所實行的政策，並且發表了尙未被英國報刊掌握的某些外交文件，因此我打算從這個報告中摘引一些重要的材料。

1 月底，在奧爾洛夫伯爵向奧地利宮廷提出有關建議的同時，俄國駐柏林大使向普魯士政府提出了一個建議：邀請三國宮廷——普魯士宮廷、俄國宮廷和奧地利宮廷——簽訂一個共同的議定書。在這個議定書草案的序言中提出，制定這個共同義務的動機是，希望三國同盟在面臨着威脅歐洲和平的危險情況下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希望調整三國之間以及在現有局面下三國同西方強國之間的关系。

這個草案包括以下三點：

(1) 兩個德意志強國在英法積極參加俄土戰爭的情況下正式保證遵守嚴格的中立；其次它們聲明，在西方強國施加新的壓力或威脅時，如有必要它們決心用武力來維護自己的中立。

(2) 三国将把法国或英国对奥地利、普鲁士或德意志其他任何一个邦的领土的侵犯, 看做对本国领土的侵犯, 并将根据情况和共同的军事协定 (这个军事协定现在正由海斯将军和普鲁士陆军大臣在柏林拟定) 相互援助, 抵抗侵略。

(3) 俄国皇帝重申自己的愿望: **将在他的尊严和他的国家的理所当然的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內, 尽快结束战争。**但是鉴于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改变土耳其的现状, 因此陛下保证, 如果在这一点上同各海上强国订立协议, 那末, 不事先同自己的**德意志同盟者**协商, 就不作任何决定。

这个草案附有一份涅谢尔罗迭伯爵的急件, 在急件中总理大臣提醒普鲁士和奥地利注意长时期以来就是欧洲盾牌的三国同盟的重大意义。由于战争的威胁, 皇帝陛下认为自己有向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发出庄严的号召的义务。他们的共同利益要求他们把对待如此重大事件的立场明确规定下来。他强调指出西方强国所采取的单方面行动, 同时提请注意它们对德意志各邦的利益所采取的蔑视态度。而俄国却不是这样。它准备单独挑起战争的重担, 而不要求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任何援助或牺牲。两个大邦和整个德意志的幸福取决于它们的联盟。它们用这样的办法阻止危机蔓延, 而且也许会促进危机的解决。其次, 俄国的急件中指出了德意志强国面临的三种互相排斥的可能性: 同俄国联合起来对付海上强国, 同海上强国联盟反对俄国, 以及严格遵守中立。至于同俄国联盟, 那末沙皇并没有这种需要; 至于反对沙皇, 那末只要德意志强国不让西方强国来吓倒自己, 也没有可能。最后一点则是意味着屈从侮辱性的需要和迎接悲惨的未来。本土不可攻破的俄国, 它不怕任何军事侵略, 也不怕更为有害的革命精神的侵袭。如果同盟

者們离开它，那末它能够利用本国的資源，爭取做到在今后沒有它們的援助也行。（涅謝尔罗迭先生是用德文写的急件，他担心把急件譯成別国文字会是一件絕望的难事。我引用原文中最后一句作为他德文写作的一个例子：Wenn seine Alliierten es verliessen, so würde es sich gesagt sein lassen sich auf sich selbst zurückzuziehen und sich so einrichten, ihrer in Zukunft entbehren zu können。）但是沙皇信賴他所了解的朋友和同盟者的感情，信賴他們的早已通过共同流血（Bluttaufe）和不可否认的原則的一致性同俄軍发生联系的光荣軍隊。因此俄国内閣认为选择第三条道路是唯一的、值得德意志宫廷考虑的道路，是符合于他們的利益，并有助于（因为这条道路給他們保留了調停人的作用）实现俄国的特殊願望的道路。当然，这种中立不应当是曖昧不明的，或者是十分短暫的，或者是待机行事的，否則它将被各交战国、特别是俄国认为是敌意的中立。这种中立最好应以在艰难的时刻不止一次地保证了普遍秩序和国际和平的原則（神圣同盟的原則）为依据。德意志强国的职责就是在必要时拿起武器来保卫他們的政策所依据的这些原則。如果两个海上强国之一（法国）有对德意志侵犯的意图或进行侵犯，那末另一个国家（英国）就一定会立即改变自己的立場。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那末俄国无论如何会全力以赴地保卫德意志。

这个建議起初在柏林遭到拒絕，过几天又在維也納遭到拒絕。当时还扮演着独立的国家活动家角色的曼托伊費尔給圣彼得堡发去了一份急件，急件中說，俄国虽然假装着似乎不需要普魯士的援助，但是提出恢复三国同盟的要求来間接强求这种援助。曼托伊費尔指出，“至于俄国似乎并不害怕的革命精神，普魯士也是在不請求外国援助的情况下把它压制下去的”。作为反革命首領“拯救

了”普魯士的独立大臣,并不能掩盖他对于把沒有自己的匈牙利的普魯士同奥地利相提并論这一点表現恼怒。

正当普魯士这样夸耀自己的安全时,在报告中暗示的其他一些文件都证明了在2月的最后几天奥地利把四强公約草案轉給了普魯士。普魯士在3月5日的急件中拒絕了这个草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国家同时发表了一項声明,說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政府仍然认为四强联合是順利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因此連奥地利也不得不放棄可以結束两个德意志强国模稜两可的态度的公約。

普魯士3月16日的急件中包括下列主要的一点:

“普魯士內閣了解了奥地利为維護自己东南边境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当然,普魯士同其他德意志各邦一样,应当維護本身的特殊利益。但是这并不排斥同奥地利取得協議。相反地,普魯士准备进行协商,因为这涉及維護德意志利益的問題。因此普魯士等待着关于下列問題的較为詳細的通知:

(1)奥地利是否打算占領与它接壤的土耳其領土以保证它边境地区的安宁?

(2)奥地利是否有意占領这些地区作为和平恢复以前的抵押?

(3)奥地利是否有意积极参加战争?”

对于普魯士來說,这些問題的答复关系到弄清楚这样的問題:为了維護德意志的利益,可以提出什么要求,以及普魯士为了緩和西方强国(而决不是俄国!)对奥地利所施加的压力,能否采取什么行动。

3月14日,普魯士政府和奥地利政府分別給德意志宮廷送去两封彼此完全相反的通函,普魯士的通函断定,日益逼近的战争將純屬局部的性质。相反地,奥地利却坚持这样的看法:战争的发展會十分密切地影响到奥地利本国的情况。只要情况允許,它将不参加战争,但仍然必須指出有参加的可能性。这里所涉及的利害

关系，对于德意志各邦來說，也是有意义的。因此帝国内閣估計，在这种情况下普魯士和其他德意志宮廷就把自己的力量同奧地利的力量联合起来。那时德意志联邦必将表明，尽管它采取防禦立場，它在這一問題上准备起积极的作用。一旦西方强国同俄国真的宣战，奧地利就会发表新的宣言。如果一般說来还有防止目前威胁欧洲的危險繼續增长的办法，那末这种办法就只能是奧地利和普魯士在德意志联邦各邦支持下的联合行动。

其次，曼托伊費尔先生在这封通函中对委员会成員所提問題的忧郁的回答决不是沒有意义的：俄国絲毫沒有把自己的瓜分草案告訴普魯士政府。

最后，我們从这个文件中知道，維也納會議¹¹⁸的騙人把戏仍然沒有結束。相反地，这个文件引用了普魯士首相的話，认定新的議定书正在草拟，其中将确定**四强国之間要經常相互了解**。

粮食市場上的价格又上漲了。不久以前法国和英国的粮食价格下降的原因是投机商的活动发生了困难，他們由于資本不足和銀根吃紧不得不大量拋售，以致粮食市場商品过剩。另一个原因是商人、磨坊主和面包商以为将有大批粮食运来欧洲各港口，因而决定銷光自己的全部儲备。因此我依旧认为，价格还远未达到最高峰。毫無疑問，在粮食市場的可能儲备上，还从来沒有一年有过像今年这样錯誤的和不可靠的投机行为，产生过这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受自由貿易派報紙的伪善行为激励的幻觉。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4 月 7 日

載于 1854 年 4 月 21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4059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弗·恩格斯

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

当最初得到俄军占领多布鲁甲的消息时，以及在他们渡过多瑙河的真正意图能够从他们后来的行动中看出来以前好久，我们就说过，俄军这次机动的主要目的无非是改善他们的防御阵地。他们从那时起所采取的一切步骤以及对方所采取的步骤，都证明事实确是如此。俄军派往多布鲁甲的兵力有4—5万人，根据最可靠的消息判断，这些部队最远前进到切纳沃达—居斯坦杰一线。看来他们向锡利斯特里亚对面的卡拉腊什派遣了同样多数量，甚至更多的兵力，他们企图威胁这一要塞，并在条件有利时向它攻击。俄军把配置在布加勒斯特西面的部队，除后卫外全部撤走。而后卫由于无力在卡拉法特前面长久地支持下去，大概是向多瑙河对岸的塞尔维亚境内实行了小规模的进军，其目的可能是要表明俄军对塞尔维亚的中立抱着蔑视态度，并观察一下，少数穿军服的俄国人的出现会在塞尔维亚农民中引起什么反应，也可能是为了给奥地利占领这一国家制造借口。

毫无疑问，我们不久将会听到俄军撤离整个小瓦拉几亚的消息。那时他们的阵地又将如何呢？他们的正面将由特果维希特经沃耳特尼察和卡拉腊什通向切纳沃达，再过多瑙河由切纳沃达到黑海边的居斯坦杰。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阵地。对俄军来说也确

是如此，尽管縮小正面本身对他們是有利的。同时，这也說明俄軍部队向左移动了，因此原来好像是正面延長綫的退却路綫，現在已位于正面之后并且同它垂直。两个月以前，奧美尔-帕沙只要在錫利斯特里亚和希尔索瓦之間的任何一個地方渡过多瑙河，就可以切斷俄軍的退路，現在已經不可能了，除非是派遣部队在德涅斯特尔河口附近登陸。俄軍这次机动的主要好处就在这里，甚至把多布魯甲的一个軍按长方形配置（一面和敌人的坚固障地相連接，另一面靠海，其余两面是多瑙河的两个弯曲部，而且总共只有3座桥梁可以用来联系、增援或撤退）而造成的危險，也不能貶低这一好处。

但是，俄軍的有利之处也只限于这一点。他們所得到的的是能退不能攻的障地。在沃耳特尼察到切納沃达的一段正面前是多瑙河，只有几个地点可以渡河，而且这些地点，不是有設在較高的对岸的威力强大的炮台防守，就是有像錫利斯特里亚那样的永久性要塞防守。往下，由切納沃达到海边的一段是卡腊苏湖泊和沼澤地、图拉真垒墙（这里的所有通路都重新改建得适于防御）、居斯坦杰要塞，而在翼側，即在黑海上則有联軍的舰队。在多瑙河以及图拉真垒墙的南面是比較荒瘠的地区，大部是高地，四面八方交錯着由无数河流形成的陡峭的雛谷，沒有任何桥梁。当然，这一地区不能认为是軍队无法通过的，但是只有在軍队坚信会到达有利的障地、只会遭遇兵力薄弱的敌人而且通过后可以找到大量粮秣的情况下，才会去通过它。但是，当前的情况恰恰相反。如果俄軍从图拉真垒墙向巴扎尔吉克以及从沃耳特尼察和土尔图凱向腊兹格腊特进攻，那末他們必須留下部分軍队来封鎖錫利斯特里亚和監視魯舒克。他們在这样削弱了自己的兵力以后，通过这一难以通行

的地区到腊兹格腊特和巴扎尔吉克,那时他们会处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就会直接处在巴尔干山的支脉面前,这些支脉截断了他们的作战方向,而他们必须分成几支独立的部队,沿几条不同的道路通过。假设他们试图这样做,那末这几支独立的部队就有被从苏姆拉来的、兵力集中的敌军各个击破的危险,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切断敌军的退路。我们甚至假定俄军克服了这一切障碍,而且,有10万人到达了瓦尔那和苏姆拉的近郊,那时又将如何呢?苏姆拉的地形不仅可以使4万土军抵抗10万进攻部队,而且可以使这支优势兵力甚至无力抵挡数量上居劣势的土军出击。同时苏姆拉还可以掩护瓦尔那,而瓦尔那的另一翼侧又有联军的舰队掩护。瓦尔那和苏姆拉合起来所形成的阵地,甚至比1848年拉德茨基元帅受皮蒙特人和意大利起义者四面围攻时所防守的维罗那到列尼亚哥的阿迪杰河阵地还要坚固得多。不仅如此,同苏姆拉和瓦尔那相呼应的,还有位于敌人翼侧方向上的鲁舒克和锡利斯特里亚,尽管它们看来薄弱,但是只要土军的主力还能从苏姆拉朝任何方向出击,那就不能成功地攻击它们。这两个要塞都在多瑙河岸,锡利斯特里亚对着俄军现在的阵地中央偏右之处,而鲁舒克则在它的右翼。只有在河的右岸才能将它们封锁住,这就是说,围攻部队应当直接配置在这两个要塞和苏姆拉之间,而根据一切情况来判断,奥美尔-帕沙正把他的大部分军队调往苏姆拉。因此,任何围攻鲁舒克和锡利斯特里亚的军队都必须拥有足够的兵力,不仅要对付这两个要塞的守军,而且要对付集中在苏姆拉的、至少占全部土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另一方面,如果俄军经巴扎尔吉克进攻,那末同样需要足够的兵力,以便在平地上对抗从苏姆拉来的、占全部土军三分之二的兵力。此外,俄军必须分兵封锁瓦尔那,至少要从

北面,可能时还要从南面封鎖,因为如果封鎖不住瓦尔那也就不能夺取它,如果夺取不下瓦尔那,俄軍就不可能越过巴尔干。如果再考虑到保障从魯舒克到瓦尔那整个距离上各个軍之間的交通綫以及保障补給所必需的兵力,那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为了順利地进攻苏姆拉和瓦尔那——土軍在巴尔干半島东部防御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两个据点,俄軍的兵力必須超过土軍在苏姆拉所能集中的兵力的两倍。

从上述一切可以看出,土軍的行动是非常明智的。撤离多布魯甲这件事,第一次清楚而无可辯駁地证明了奧美尔-帕沙具有高度的軍事学术水平。死守这一地区及其要塞是沒有价值的。这位土耳其將軍不是让人員和武器遭到損失,而是立即命令他的部队在不使总退却的安全受到打击的情况下,只要一有可能就放棄各个据点,退向图拉真垒墙。因此,虽然俄軍輕而易举地获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土軍却給他們以重創,占領了自己的真正的防御陣地,而沒有給敌人反击的时间。土軍只在重要据点以及主力或黑海上的舰队可以支援的地点才留有守軍。因此在必要时,土軍在瓦尔那和苏姆拉之間至少可以集中8—9万人,而且如果将派往卡拉法特的一部分兵力迅速調回原陣地(本来派遣这些部队就沒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只不过是出于政治上的惊慌失措),还可以加强这支軍队。但是俄軍要以两倍于这一数目或者更多的兵力渡过多瑙河是不可能的,至少在这次战局中如此。我們肯定这样說,是因为我們假定俄軍是企图坚决进攻的,而且我們沒有把英法輔助軍队可能开到的情况估計在內,如果他們开到,那末俄軍越过巴尔干的任何尝试都是不理智的。我們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因为对我們來說,重要的是說明目前交战双方的真实情况。可

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战争只在俄土两国之间进行，那末即使土耳其因外交上的拖延而失去了进攻所必需的优势，至少在今年，君士坦丁堡不会遭到俄军侵入的威胁。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4 月 13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4 月 28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65 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列施德-帕沙的照会。
——意大利报纸論东方問題

1854年4月18日星期二于倫敦

据傳英法两国政府终于互换了攻守同盟条約的批准书。条約包括五項条款，內容不詳。

奧普之間的条約还没有簽訂——分歧在于普魯士宮廷中有一部分人不同意占領俄屬波兰的边界。

4月6日在雅典举行了紀念希腊独立一周年的«Te Deum»^①。西方强国的大使們沒有参加祈禱仪式。同一天雅典“观察家报”公布了国王的16道 ordonnances [敕令]。国王在这些敕令中宣布撤銷21个軍官的职务，其中有將軍、上校和其他軍阶的軍官，因为他們企图投向暴动者。第二天雅典获悉暴动者在阿尔塔遭到慘敗。发生会战的地点本身就表明，暴动波及的范围并不大，它的唯一牺牲者目前还只是农民，即居住在和希腊王国接壤地区的希腊人。

讀者大概还記得，1827年俄、英、法三国大使曾要求土耳其政府从希腊召回所有土耳其人，不管他們在那里是长期居住还是暂时居住的。在土耳其人拒絕这样做的时候，就发动納瓦林会战来

① 祈禱，在进行祈禱时唱«Te Deum laudamus»（“贊美我主”）。——編者注

强迫他們服从。現在，土耳其政府向希腊人发布了类似的命令；列施德-帕沙致希腊大使梅塔克薩斯先生的照会和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給不列顛領事們的通令还都沒有在倫敦报纸上发表，因此我从4月5日的“君士坦丁堡日报”上把这两个文件譯了出来。

“外交大臣列施德-帕沙致梅塔克薩斯先生的照会的复照

1270年7月3日(1854年4月1日)于君士坦丁堡

我讀了您在3月26日在决定离开我国首都时交給我的一份照会。鉴于土耳其政府就当前事件所提出的公正的抗議沒有得到希腊政府的滿意的答复，以及土耳其政府的 *chargé d'affaires* [代办] 已奉命离开雅典，閣下如果也离开君士坦丁堡那将是适宜的。因此，我根据您的請求，特将您的护照送給您。由于从今天起两国之間的外交关系和貿易关系已經中斷，我們決定，設立在我帝国各省的希腊办事机构以及希腊領事应立即撤回。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商人以及其他希腊臣民也应离开君士坦丁堡；但为保护希腊貿易的利益起見，我們給予他們两周的期限。对于那些居住在各省的希腊人，这个期限将自他們接到离境命令之日算起。业已证实，对我国边境諸省的侵犯，不是出于某种疏忽，而是出于希腊政府的姑息。尽管帝国政府完全有权扣留并沒收停泊在我国港口內的一切船只，以抵償我們所遭受的极其重大的物质損失，但我的至尊的皇帝认为，在仅仅涉及希腊政府的事情上不使希腊臣民遭受任何損失，更合乎他寬厚的本意。当希腊政府恢复比較符合正义的精神并尊重国际法和律令——*jus gentium*^①时，才宜于研究当前的暴动所造成的損失的問題。因此，所有希腊舰船在規定期限內都可以不受阻碍地返回祖国。政府已下令各有关部門协助生活特別困难的希腊臣民离境，并对病人和体弱者尽可能給予方便。〈最富于基督教精神和最文明的奥地利政府是本着一种不大一样的精神来处理这类事情的，驅逐德森人的事件¹¹⁹就是一例。〉我认为，有必要重申，迫使我們作出这个决定的是希腊政府，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应全部由希腊負責。

列施德-帕沙”

① 直譯是：万民法(国际法的拉丁文名称)。——編者注

根据这道命令,3 000 名希腊人已于4月5日在君士坦丁堡被送上船,据悉,土麦那的帕沙已对居住在这个城市中的希腊人发布了命令。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向不列颠驻土耳其和希腊的领事发出的通令如下:

“1854年4月1日星期六于君士坦丁堡

閣下!我已得悉,侵入土耳其边境各省的希腊人正唆使苏丹的希腊臣民举行叛乱,并宣称,法国和英国政府准备支持他们推翻苏丹政权的企图。同时我还知道,他们采取了許多类似手法,使人相信,如果土耳其政府由于同希腊断绝了外交和贸易关系而一旦宣布准备将土耳其的希腊臣民逐出苏丹领土,法国和英国大使将保护土耳其的所有希腊臣民。因为这些推测会使人产生错觉,使那些心地善良的人陷入迷途,罪恶地加重任何战争期间所固有的灾难,所以我急于要向你们切实说明,这些论断根本没有丝毫根据。谁要是哪怕只有一瞬间相信如此明显、如此违背常识和事实的臆造,那他就是太无知和过于轻信了。然而遗憾的是,在那些比较闭塞的国家里情况正是这样。你们和我一样知道得很清楚,在苏丹抗击残酷的和不义的进攻的崇高举动中,英国和法国是完全站在苏丹这一边的。由此必然得出结论,两盟国政府对运动只能表示愤慨和憎恨,因为这个运动只能使俄国获益,即使替运动辩护也不能说运动是自发产生的。这一运动归根到底会使土耳其政府和它的盟国处于困难境地,它除了使那些为了极其虚幻的空想不惜牺牲生命的人遭到毁灭外,绝不会有什么好的前途。当然,我们怜恤那些由于暴力和无原则的政策而遭受苦难的无辜的家庭;但是我们既不能同首领们保持任何关系,也不能掩饰由于轻举妄动的党派的行为而在我们身上自然而然引起的那些感情。务请你们利用一切机会把本通令的内容告诉那些容易相信在本通令中遭到驳斥的谬论的人。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

除了德国人之外,对东方纠纷的结局有最直接利害关系的是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因此,了解一下这两个国家的不同党派的意图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没有意义的。都灵“同盟报”上的一

篇文章（我特地把它譯了出来）使我們能够判断意大利立宪党¹²⁰的观点。看来，这个党完全准备牺牲匈牙利，以恢复意大利的独立。奥地利帝国长寿的秘密正是包含在这种地方性的利己主义里面，这种利己主义使每个民族陶醉于幻觉之中，以为牺牲其他民族的独立就可以为自己争得自由。

“英国报纸竭力想使人们把当前的对俄战争看成似乎是争取欧洲自由和独立的战争。然而事实上它们所重视的只不过是英国的贸易利益而已；约翰·罗素勋爵所说的话可以证实这一点。他劝告我们意大利人要乖乖地呆着，要我们了解，奥地利迟早总会变得讲点人道的。可见，至少他承认了，奥地利在目前绝不能说是讲人道的。但是慈悲为怀的英国为了‘欧洲的自由和独立的胜利’硬要同奥地利结成同盟。至于法国的报刊，它们是不自由的。报纸违法，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查封，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它们总是重复政府喜欢听的话。除此以外，法国报刊是不善于广泛阐述当前政治问题的，它们太喜欢赶时髦了。德国的自由派报纸对俄国怕得要命，只要想想俄国在两个最重要的德意志邦获得了多大的影响，这种恐惧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究竟希望什么呢？——意大利的独立。但是，只要还在谈论土耳其的领土的完整和以维也纳条约为基础的欧洲的均势，那末很自然，我们应当十分满意这种完全违反我们愿望的 status quo [状态]。俄国图谋什么呢？图谋消灭奥斯曼帝国，从而消除 status quo 的均势，并重新划分欧洲的版图。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可能有人反驳我们，说俄国是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张重新划分欧洲的版图。然而正是这种情况可能对我们有利，因为不管是法国、英国或德国都不会容忍一个无论在领土或声势方面都已经过分的帝国再扩张它的领土和声势。因此，它们就不得不寻求反对俄国的支柱。而能够成为这个支柱的只有奥地利。对于奥地利，西方强国不得不慷慨万分，答应把从沃尔肖伐起到黑海止的整个多瑙河盆地，以及多瑙河下游的多布魯甲和通向巴尔干的要冲都给它。那时归奥地利占领的土地将有：

- (1) 居住着和奥地利本土民族同源的居民的广大地区；
- (2) 对于德国贸易非常必需的那条大河的整个流域。

在这种情况下，至少从防御目的看来，奥地利将不再需要意大利；它统

治的除了現有的 300 万南方斯拉夫人和大約同等数量的达克-羅馬尼亞人而外，还将加上大約 600 万南方斯拉夫人和 400 万达克-羅馬尼亞人。

土耳其的完整和独立！两个夸大其詞的說法。如果你們所理解的独立是人民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原則管理自己的事务，使任何外国人都无权干涉，那末这种独立已經被凱納吉条約大大地破坏了，并在不久前同西方强国簽訂的条約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colpo di grazia）。根据這項条約，土耳其已經不是由苏丹統治而是由西方强国統治，如果穆斯林和基督徒、胜利者和被征服者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如果占居民五分之四的萊雅能够携带武器，这就是說，土耳其已經不再存在，这就是說改造已經开始了，而这种改造除非通过暴力，通过严重的騷乱，通过 400 年来一直互相敌視的两种信仰的人們之間的肉体上的冲突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我們不想再多听关于土耳其独立的高調，这只不过是神話而已。

而領土完整呢！难道不是法国和英国按照同俄国达成的協議从土耳其夺走了包括伯罗奔尼撒、阿提卡、貝奧提亞、佛基达、阿卡尔納尼亞、埃托利亞、涅格羅龐特島^①等地在內的有数百万居民的希腊王国嗎？不是它們又是誰呢？难道不是法国从土耳其夺走了阿尔及利亞，不是法国、英国和俄国让埃及得到部分独立嗎？难道不是英国人在 15 年前占領了紅海上的亞丁而現在正在覬覦埃及嗎？难道奧地利不也是在覬覦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嗎？既然正在酝酿着种种陰謀来反对現狀，而現狀也不能按照慣性再保持下去，那又为什么要談保持現狀呢？

因此，我們认为，俄国想消灭土耳其是打了一个好主意；而西方强国打算反击俄国的侵略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这些强国真正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們就应当拋棄他們用以掩盖自己真面目的虛偽的外交手腕，而坚决决定消灭土耳其并重新修改欧洲地图。它們是会作出这个决定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4 月 18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4 年 5 月 2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068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署名：卡尔·馬克思

① 即埃維厄島。——編者注

卡·馬克思
*希臘和土耳其。——土耳其
和西方強國。——英國
糧食貿易的縮減

1854年4月21日星期五于倫敦

我們從“普魯士通訊”中得知，著名的本生男爵並非奉召回國，而是根據他本人的請求延長了休假。伯恩施托爾夫伯爵受命做他的臨時 *locum tenens* [代理]。

瑞典議會制憲委員會以 12 票對 11 票的多數決定，各大臣由於不久前研究簡化稅收制度問題時的表現，一律要受王國最高法院的審訊。

據奧地利駐貝爾格萊德領事梅羅尼先生報告，奧地利人可以預料：如果他們把軍隊開進塞爾維亞，塞爾維亞人將以武力來抵抗他們。

4月3日梅塔克薩斯先生離開了君士坦丁堡，因為在不到兩星期的期間內竟有 4—5 萬同胞來糾纏他。沒有一個大使館願意暫時替希臘大使館來辦理日常事務。奧地利大使拒絕的理由是：既然法國和英國是希臘的保護國，那末正是它們的代表機構在此刻應當維護希臘的利益。普魯士因為奧地利拒絕也表示不同意。英國和法國的大使卻聲明在這個時候要他們作為梅塔克薩斯先生

的代表出面是不适宜的。那些中小国家的代办则认为竭力迴避表示同情或反感才是上策。因此，梅塔克薩斯先生只好把自己的随員留在君士坦丁堡。然而不久发现这位代理濫用土耳其政府所授予的职权，尽力地把护照发給希腊的萊雅，使他們有可能加入阿尔巴尼亚起义者的队伍。因此希腊代表机构的活动被完全取締，而把签发护照的事宜交給由两个土耳其人和两个萊雅組成的委员会負責办理。

与此同时公布的一項通告声称：任何一个希腊王国的臣民，如果願意作苏丹的臣民，只要他找到两个可以信賴的人担保他是可靠的，就可以获得批准。侨居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公开威胁說要在临走前火燒和洗劫城市，因此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土耳其兵士日日夜夜在街上巡邏，在彼腊的大街上架着 50 門火炮。从日落到午夜，城内或郊外的行人和車輛都得点灯；而午夜以后禁止任何通行，并且特令禁止粮食外运。希腊天主教徒在彼腊的主教担保的条件下，被允許留在城市。这些提諾斯島、安德罗斯島和錫罗斯島出生的人大都屬於家僕等級。基德里亞島居民上书土耳其政府，一致譴責希腊人暴动，同时恳求政府在执行反希腊人的一般措施时不要扩大到他們身上。特里卡拉的土耳其帝国屬下的希腊人臣民的代表团也到特薩利亞来請求立即保护他們免受希腊强盜的迫害，这些强盜把整座整座的村庄焚毀，而对居民，則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赶到边界附近去受极为殘酷的折磨。

土耳其人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西方盟友，不信任他們和敌視他們。土耳其人开始把英国和法国看做是比沙皇更危險的敌人，下面这两句話反映了一种普遍看法：“他們企图推翻苏丹和瓜分帝国，想把我們变成基督教居民的奴隶。”联軍不在瓦尔那以北而在

君士坦丁堡南面登陸以後，在加利波利構築工事來專門對付土耳其人。這座村莊所處的地帶是個與大陸相連的狹長的半島，它很適合作侵略軍的據點。過去熱那亞人就是從這裡向君士坦丁堡的希臘皇帝進行挑釁的。此外，正統的穆斯林對新伊斯蘭教總教長的就任表示憤慨，因為他們幾乎把他看作是希臘宗教界的工具；同時，在土耳其人中間逐漸傳播着這樣一種堅定的信念，即寧願滿足尼古拉的單一要求，也不願作一群貪得無厭的列強豺狼的玩物。

對聯合內閣的不滿和它的作戰方法所引起的民憤是這樣強烈，甚至連“泰晤士報”（它不能不或者用自己的發行量來冒險，或者停止對“群賢內閣”逢迎）也認為在星期三那天的報上猛烈抨擊內閣是適時的¹²¹。

“晨郵報”駐魁北克記者寫道：

“英國太平洋艦隊十分強大，足以占領俄屬美洲部分沿岸地區的所有堡壘和工事（這些堡壘、工內在國內是沒有的），以及他們設置在福克斯群島、阿留申群島和千島群島（它們聯成了一條從美洲海岸至日本的鎖鏈）上的各個築壘要點。這些島嶼盛產毛皮和銅，氣候溫和，而且有許多優良的港灣靠近沒有好港灣的亞洲大陸，只要能占領這些島嶼以及俄屬美洲部分，我們在太平洋的影響必將迅速增長，而且正好是在太平洋各國開始具有它們按理早就該有的作用的時期。我們的艦隊可能在錫特卡島上的新阿爾漢格爾斯克遇到有力的抵抗，這裡是個天然形成的有利障地，同時構築有堅固的工事，配有六、七十門火炮。島上約有1500人，其中500人是守軍，還有一所建造過很多軍艦的造船廠。其他據點大部分都有50到300人，其中為數不多的據點築有相當結實的工事。假使我們占領了這個障地，而法國希望得到一些領土作為我們占領這個障地後對它的補償的話，可以讓它占據堪察加及其毗連的海岸。”

“官報”上登載的關於英格蘭和威爾士貿易中心出售小麥的數字，表明小麥的出售量比1853年同時期有了驚人的縮減，而這一

点可以作为确定以往每次粮食收成数量的标准。

小麦出售量如下：

1月	2月	3月
1853……582 282 夸特	345 329 夸特	358 886 夸特
1854……266 477 夸特	256 061 夸特	227 556 夸特

上周出售 36 628 夸特，而 1853 年同一周内则出售了 88 343 夸特。总之，这些数字说明 3 个月内出售的小麦比 1853 年同期几乎少了 50 万夸特，同时异常显著地证明了最近一次收成很差。

“粮食交易所快报”报道：

“到现在为止，由于从国外大量输入，人们没有严重地感到本国供应的不足；目前还有大量小麦和面粉正在从各国运往英国途中；但是，能否指望在未来一次收成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一直保持这么大规模的输入呢？美国已把它海港里储备的全部都给我们了；虽然我们不怀疑它在遥远的西部还有大量储备，但是把这些储备运到东部沿岸，再从那里运到英国，这当然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费。北欧各港口差不多耗尽了旧有的储备，而对俄战争又排除了继续从黑海和阿速夫海沿岸得到供应的可能性。”

我们把上述这一切想法提供给读者们研究，不再作进一步解释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4 月 21 日

载于 1854 年 5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72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 希腊人暴动。——波兰侨民。
——奥地利—普魯士条約。
——关于俄国武装的文件

1854年4月28日星期五于倫敦

最近从土耳其来的可靠消息完全证实了“論壇报”对俄国人撤离卡拉法特并进占多布魯甲以及对希腊人暴动性质的看法。

“劳埃德氏报”¹²²证实了这样的傳說：俄国人解除了对卡拉法特的包圍，并且撤出小瓦拉几亚的行动已告結束。在君士坦丁堡得到的最新的消息也证实俄国人沒有进攻，而是相反地在加强多布魯甲的防御。

至于希腊人暴动，“通报”昨天登載了4月25日来自維也納的一封信：

“希腊人暴动沒有在伊皮罗斯蔓延，但它的真实性质开始显露出来了。如果有人认为民族和宗教利益不會成为一种无聊的借口，那末希腊王国的海倫匪帮首領們的行为就会消除此类謬見。大家知道，格里瓦斯和察韦拉斯一开始就为谁应当领导暴动者这个问题爭执起来。这两个首領繼續单独行动并且一有机会就毫不客气地相互攻訐。尤其是格里瓦斯，他自封为基督徒的解放者，但給他們带来的只是擄掠和火災。苏利奥人决定禁止这些希腊首領进入自己領土，他們特別指責格里瓦斯，因为他在上月初曾請求在希腊大主教德温集斯特那里过夜，但第二天劫走了主人的財物和妻子。为了向这种兽

行报仇，大主教要求在阿勃迪-帕沙手下当差。然而格里瓦斯的搶劫技艺在梅措房表现得最为高明。这个被俄国人的宣傳蒙蔽了的城市，主动地給这位‘大元帅’格里瓦斯打开城門。于是他首先向基督教居民勒索了20万披亚斯特‘爱国’捐。这个数目还不十分大，人們也就繳納了。可是格里瓦斯并不滿足。他亲自訪遍最有名和最富裕的市民，劝他們把自己所有珍貴的金銀財宝，以捐款的形式送交銀行。这种招搖撞騙的伎倆引起了不滿，进行得既不順利，也沒有撈到什么便宜。于是格里瓦斯又忽然想出一个主意，这个主意可以說是搶劫技艺的杰作。他借口奧斯曼軍队迫近梅措房，宣称为自卫起見必須把几乎整个城市焚毀，因此让市民們連同自己家眷在市大教堂集中。很快就在那里聚集了差不多4000人。正如格里瓦斯所期望的，他們隨身携带了金錢、珠宝和最珍貴的东西，于是梅措房的全部財產就落在他手中了。这时候他开始把人們小群小群地放出教堂，然后让自己的爪牙異常粗暴地搶劫他們。这些就是在此以前在伊皮罗斯暴动中起了最主要作用的希腊首領的功績。当时格里瓦斯对土耳其人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焚毀城市后他退往拉多維察方向的阿基魯斯。在伊皮罗斯，除亚尼納和布阿特以外，梅措房算是最繁荣的城市了。現在它变成了一片廢墟，它的居民則变得一貧如洗。在整个城市里保全下来的房子不超过100幢。”

据傳科苏特和馬志尼打算到君士坦丁堡来，为此，列施德-帕沙发表声明說，不允許他們踏上土耳其国土。

建立波兰軍团一事似乎沒有遭到法国和英国大使的反对，但是碰到了另一种阻碍。維索茨基將軍把一份有几千人签名、授权他全权代表很大一部分波兰侨民的文件呈遞給土耳其政府和雷德克利夫勋爵。而上校扎莫伊斯基伯爵(查尔托雷斯基公爵的侄儿)也呈递了有許多人签名的类似文件，根据这个文件来看，另一部分波兰侨民則授权他来代表他們办事。英国大使考虑到他們彼此的矛盾，想調和一下双方的要求，并利用維索茨基和扎莫伊斯基为自己效劳，便提議不建立一个而建立两个波兰軍团。

4月17日帕斯凱維奇元帅到达雅西并在当天前往布加勒

斯特。

据“汉诺威日报”报道，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的攻守同盟条约¹²³包括以下主要条款：

“1. 奥地利和普鲁士互相保障它们德意志的和其他的领地(in und ausserdeutschen Besitzungen)，对两国中任何一国的进攻，将被另一国视为对自己的进攻。

2. 奥地利和普鲁士有互相支援的义务并在必要时采取联合进攻，如果缔约国一方认为德意志的利益处于危急之中，而另一方也同意这种判断的话。需要给予支援的特殊情况，在作为这个条约的组成部分的单独文件中另有规定。为保证条约的效力，有关的军事力量将在一定的规定期限内处于准备状态。关于这种期限以及军事力量的数量和使用方法将另行协议。

3. 邀请德意志联邦全体成员参加这个攻守同盟并遵照联邦法所规定的义务给这个同盟以支援。”

把这个条约同涅谢尔罗迭伯爵向普鲁士宫廷提出的中立协定比较一下，就可以在它们中间找到许多共同点。同时也必须指出，条约实际上仅仅符合防御政策的需要，如果实行进攻政策时，一切决策还得由有关宫廷另行决定。

4月25日普鲁士第一议院根据该院委员会的建议批准了3 000万塔勒的公债。曼托伊费尔先生就此事引用了内阁提出的根据，这些根据，对于力图以爱国的姿态和愚蠢的傲慢态度来掩饰自己内在软弱的普鲁士外交来说，是十分典型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文件 in extenso [全部] 引出来。曼托伊费尔先生说：

“俄土之间产生的、后来波及西方强国的纠纷，是人所共知的。普鲁士政府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和利益，认为调解这些纠纷和消除各种分歧是适当的。但它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仿佛有一种什么恶运和这个问题纠缠在一起似的。很多本来有助于恢复和平的尝试并没有得到什么效果——这也可能是因为它们作得不合时宜和方法不当。于是分歧的加剧便导致战争。普鲁士

和奧地利為保證維持和平所作的努力，可以說為恢復談判奠定了基礎。這就是維也納會議的主要目的。在這次會議上普魯士政府一直盡最大的努力來維持和平。它本着和解的精神（作為尼古拉皇帝的“和平使者”）行事，但它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大國的地位，所以又始終不渝地保持堅決和果敢的態度（和俄國皇帝在密函中所說的一模一樣）。正因為普魯士政府（對於成為俄國的一個省份和改變局勢）沒有利害關係，正因為它無私的（*uninteressiert*）立場已為別國公認，所以它也就能夠公開和果斷地說話。敵對雙方對它的倡議和努力的态度時而感激，時而抱憾。然而政府不想離開它既定的道路。獨立是任何大國存在的首要條件。普魯士政府善於維持這種獨立，為和平而行動，並不因這個或那個國家對它的行動是否喜歡而有所顧慮（大國獨立的十分微妙的定義！）。由於時局更加惡化，政府決定一方面為維持和平作出巨大努力，同時也有責任首先維持普魯士和德意志的利益。為此目的，它和奧地利簽訂了條約。德意志聯邦的其他成員也將加入這個條約。因此，我們可以切實地指望奧地利和全德意志的合作。政府認為，這個合作是對德意志各邦最好和最可靠的保證。在結成這個緊密的同盟的同時，以前普、奧同西方強國在維也納會議決議基礎上締結的協定仍然有效。普魯士並不像英國報刊所說的那樣已經同西方強國疏遠了。和西方強國的這種協定至今仍然有效。把協定固定下來的議定書已經由普魯士大使簽署，但是還不能呈交議院。這四強國保持著自己先前的地位並將像過去一樣為恢復和平而努力，儘管其中兩國開始了軍事行動（而這就證明戰爭是為了轉移視線而進行的，和平談判才是西方政府真正要作的大事），至於說到俄國，聖彼得堡內閣最近採取了比較友好與和平的步驟，雖然現在對恢復和平只抱微弱的希望，但它畢竟為新的和談打開了大門。普魯士政府表示自己準備到最後一分鐘也相信可能實現和平。只要和平還有最後一線希望，普魯士絕不放棄自己的一切嘗試和努力（*Mühen*）。對於普魯士有決定性的時刻一旦到來，〈*Trema Byzantium!*〉〔發抖吧，拜占庭！〕，政府將毫不遲疑、絕不猶豫和毅然決然地行動起來。普魯士必須準備好迎接這一時刻。只有它每分鐘都準備好拿起武器，它的話才具有更大的分量。當俄國和土耳其發生衝突時，西方強國表示了強硬態度，支持了奧斯曼政府。當時普魯士沒有受委託作調停人。除了第三國的權利遭到破壞外，它最為關心的是本國臣民的安寧。東方問題涉及普魯士比涉及奧地利的程度小，因為奧地利在這個問題上有着直接的利害關係，於是它

坚决請求普魯士不要拒絕和它合作。普魯士和奧地利給自己規定的任务是：限制双方过分的、使恢复和平的使命受到阻碍的要求。正是它們的努力促成了維也納會議的召开，这个會議被公正地看作是值得庆幸的事件。我国政府不能避开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它还可以对西方强国起良好的〈对俄国來說〉影响。政府可以充当联系这些国家的紐帶，也許还将为增强实现和平的希望作出貢獻。至于四强国給俄国政府的照会的草案，那末不应忘記，俄国一直不承认會議，同时不能忘記，由于新情况的出現，这个草案已成为土耳其所不能接受的了。新的維也納議定书〈在这里曼托伊費尔先生給我們揭开一个很重要的秘密〉可以为普遍和平，至少为防止普魯士和德意志参加战争，提供新的可能。早些时候奧地利要求德意志联邦議會遵守对普魯士來說也必須遵守的严格的中立，然而政府按自己的打算行事，认为不能同意奧地利的要求。它认为牺牲独立强国的地位和放棄决策的自由都是办不到的。况且，这种中立可能会被其他国家看作是对我們采取敌对立場的借口，只要它們认为这个立場适合自己的利益。現在西方强国的处境由于它們的新情况〈維也納議定书¹²⁴〉而发生极大的变化。最不利的情况是，和平将不能实现，然而最有利的情况是，战争所引起的一切严重災禍不会涉及我国；这是巨大的、无法估价的好处。〈假如誰能理解这样的抉擇，我准备給他智能的敏銳以应有的贊揚。〉俄国与西方强国之間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采取軍事行动的可能性使得普魯士不得不考虑到它作为大国的地理位置〈与其說大，不如說是长〉，并且为保卫自己利益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手执武器，以防万一。不管怎样，政府面对过去是不畏縮的〈如果这一般能意味着什么的話，那就意味着，它并不以自己的过去为耻〉，同时为它能有机会暢抒己見而感到高兴。”

不言而喻，委員會认为这一番解釋是相当令人滿意的。

在“圣彼得堡报”上刊載了下面一些新文件：

“警察司命令

1854年4月15日

茲奉皇帝陛下旨意，命令如下：当目前交战之际，近卫軍和海軍部队退伍的兵士，凡自认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勤劳能干者，如願再度服役，可享有近卫軍和陆軍退伍軍官之待遇。

將軍銜侍卫长 加拉霍夫

給政府化了的參政院的命令

鑒于建立槳漿戰船後備隊是加強芬蘭灣沿岸警戒措施的良策，特命令如下：

1. 組織四個海上非常後備軍戰鬥隊作為配備該戰船隊之槳手；
2. 此種戰鬥隊由下列省份征集的自願者組成：聖彼得堡省、諾夫哥羅德省、奧洛涅茨省和特維爾省；
3. 責成由海軍部長官康斯坦丁·尼古拉也維奇大公殿下以及國家產業大臣、皇室地產大臣和內務大臣組成之委員會採取必要措施來建立此種戰鬥隊。

尼古拉

1854年4月14日于聖彼得堡

海上非常後備軍條例

一、海上非常後備軍建立的目的是組成人員：

1. 海上非常後備軍建立的目的，在於配合槳漿戰船後備隊，以防衛芬蘭灣沿岸；
2. 該後備軍由四個戰鬥隊組成；其編制和內部機構由海軍部訂定；
3. 身體健康者，不論其出身如何，均可按下述原則自願參加後備軍。

二、招收辦法：

4. 自願加入海上非常後備軍者必須通過合法手續，地主的農民應持有地主或莊園管理人的特別許可書；
5. 聖彼得堡的自願者一律在海軍檢察署報名，各省城的向各省長官報名，各縣的向各地方警察當局報名；
6. 報名者必須呈交身分證，然後立即發給一張注明報名時間的普通證件。身分證須立刻送到海軍檢察署，自願報名者亦須同時前往檢察署，如果需要路費，可提前發給一月薪金，並在證件上注明；
7. 責成地方警察當局嚴格督促自願者迅速前往聖彼得堡，並予以多方協助，萬一自願者中途生病，應給予必要的關照。

（第八和第九兩點無關重要。）

三、服役條件：

10. 参加海上非常后备军者从向检察署报名之日起可以领到：
 - (a) 月薪 8 银卢布。
 - (b) 与海军兵士等量的口粮和海上食品。
 - (c) 农民式的服装，而且准许留 *à la paysanne* [农民式] 的鬍鬚和头发。
11. 服役期限到 1854 年 11 月 1 日为止；
12. 期满后对任何一个自愿者不得加以阻留；
13. 立功者奖赏办法与现役兵士同；
14. 俘获或在炮艇协助下击沉敌方舰船时，在炮艇上服役的自愿者依据法律有权分享缴获的财物；
15. 参加非常后备军的自愿者如受伤或残废，同军人一样得到照顾和优待；
16. 责成地方当局和社会团体在自愿者服役期间，对其家属予以特别照顾。

康斯坦丁

基谢廖夫伯爵

彼罗夫斯基伯爵

德米特利·比比科夫”

再也找不到比上面引用的文件对俄国的描绘更简要、更好的了：皇帝、官员、农奴、*à la paysanne* 鬍鬚、警察司、海军陆战队桨手、村社、陆地和海洋——这是“整个俄罗斯”的全景。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4 月 28 日

载于 1854 年 5 月 15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4079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炮击敖德薩。——希腊。——
門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
——曼托伊費尔的演說¹²⁵

1854年5月2日星期二于倫敦

联軍多次幻想實現的对敖德薩的炮击終於进行了。但是迄今为止所收到的电訊很少而且非常不詳細，因此还不应加以評論。据最可靠方面消息，这次炮击是4月22日开始的，于4月23日停止(这一天建議城防司令投降)，而于4月24日又恢复炮击。有的报道說城市很大一部分已被完全摧毁；又有的报道說只有堡垒受到燃燒火箭和爆炸彈的毀坏。某些方面人士甚至断言这次炮击根本沒有任何結果。有些电訊則报道說击毀了8艘俄国船，当然是商船，因为在敖德薩沒有停泊俄国軍舰。据4月26日敖德薩发出的最后消息說，整个联軍舰队就在这一天早晨离开了。

法国政府为了制造对这一事件的輿論，在“通报”上立即发表了海軍上将安梅林最近向海軍大臣所作的报告中的以下一段話：

“4月6日，英国蒸汽巡航舰‘怒濤号’駛近敖德薩，要求接运領事和因战火逼近而希望离开这个城市的英法臣民…… 虽然在巡航舰和小艇上都挂有軍使旗，俄国炮台在小艇离开防波堤几分钟以后背信棄义地向它开了7排

炮……我同邓达斯海軍上将正在討論懲罰这种野蛮行为的办法。”

俄国人对于整个事件有另一种說法。他們断定，派遣挂有軍使旗的船只是偵察他們的防御工事的一个借口。不久前“复仇号”軍艦以递交急件为名駛抵塞瓦斯托波尔港，而实际上是为了描繪港口内炮台的分布图，这使沙皇大为震怒，尤其是英国报刊对这一功績的大事喧染证实了沙皇的怀疑。因此发布了一項向一切在俄国各港口出現的船只开炮的命令。“比利时独立报”¹²⁶发表了有关这些事情的一封信，这封信看来像是一位俄国軍官自敖德薩发出的，而实际上显然是基謝廖夫先生捏造的。

“3月27日(4月8日)清晨6时，沒有挂軍使旗的英国皇家海軍的一艘蒸汽舰‘怒濤号’駛近敖德薩的卡兰亭港的防波堤。尽管軍港司令得到过向一切英国軍艦开火的命令，但是他还是决定暫緩执行这个命令，估計这艘軍艦可能还没有接到英国已經宣战的通知。‘怒濤号’抛了錨，放下了小艇，派它挂着軍使旗向岸边划去。軍港司令立刻派自己的副官迎接坐在小船上的軍官。这个軍官声明說，他被派来接运英法两国的領事。当时告訴他說，这些先生早已离开敖德薩，因此要求他立即离开；这样小艇就被放到了船上，軍使旗也收下了，但是并没有起錨，船上的軍官們都在描繪炮台的图样。当时为了阻止他們，曾向‘怒濤号’放了空炮，而‘怒濤号’竟置之不理，因此向該舰的一个輪子打了一炮。‘怒濤号’立即駛离了港口。”

英法艦队在対俄国港口采取軍事行动以前，先要等待俄国人提供“借口”，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它也沒有能够夺得这个港口，而只是受到好几排炮的款待，这显然太可笑了。

大約在“怒濤号”被派往敖德薩的同一时候，在君士坦丁堡收到的敖德薩的来信证实，俄国政府沒收了所有存放在倉庫中的粮食，而根本不顾这是外国商人的私人财产。一共沒收了80万夸特粮食。此外，俄国政府还要外国商人提供15万个麻袋和15000辆

大車，以便把沒收的糧食運往內地。總督在答复抗議時說，正是西方強國的政策促使俄國政府採取這種極端行動，只有沒收他們的財產，才能使這些財產免遭憤怒的居民的搶劫。留在敖德薩的中立國家的領事提出抗議以後，總督最後同意不償付沒收的商品，而只發給所有者簡單的收據。

我們再從斯德哥爾摩的一家報紙引證一段話：

“整個城市擠滿了從芬蘭逃出的難民，其中有很多人是為了躲避俄國人征兵而從阿蘭群島逃出來的（顯然阿蘭群島仍舊被俄國人占據）。俄國艦隊感到水兵非常缺乏，而且當局不分老少地抓人。家長在夜間被趕出了家，連一分鐘收拾時間也沒有。為了躲避這種橫暴行為，人們闔家帶着日用雜物逃往瑞典。”

4月23日“聖彼得堡報”刊載了沙皇給臣民的告示，其中說同西方強國的這場戰爭是正教教會反對異教徒、為解放受奧斯曼帝國壓迫的教友而進行的戰爭。

我們今天在巴黎“新聞報”上讀到：

“我們駐君士坦丁堡的一個記者向我們報道了關於不久前被揭發的俄國陰謀（關於這一陰謀的偵訊剛剛結束）的重要細節。偵訊清楚地表明，俄國早就在製造危機，由於這個危機，‘病人’應當讓自己的醫生親眼看着而走進墳墓。偵訊證明，埃爾斯納男爵過去在土耳其警察局供職，只是為了更好地欺騙自己的 *surveillants*（監視人）。根據表報，他每月得到1000披亞斯特。儘管他很狡猾，但是他玩的两面派手法還是這樣被揭露了：他同在土耳其供職的醫生阿斯帕先生結交，認為他可靠，便坦白地對他說，雖然他從土耳其警察局領取薪津，但並不停止為俄國服務。據埃爾斯納先生說，俄國打算從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臘人和斯拉夫人中間招募一支由6萬個陰謀者組成的軍隊，準備根據預定的信號動手，從內部給予君士坦丁堡以堅決的打擊。在這個城市里領導這個陰謀的是一個叫做普蘭塔詹納·哈里遜的英國人。阿斯帕先生假裝贊同埃爾斯納的意見，然而把他的情況告訴了土耳其警察局。早就懷

疑埃爾斯納的警察局，對他加強了監視，並且發現他經常向哥爾查科夫公爵送報告。最後警察局截獲了一份報告。一向行動很謹慎的埃爾斯納不慎把這份報告交給阿斯帕先生看（阿斯帕馬上把他的情況向土耳其警察局的一個密探帕拉馬里先生作了匯報），並且當着阿斯帕的面把這份報告交給了腊德施奇（他是奧地利來的斯拉夫人，同埃爾斯納和他的同謀者保持着聯繫）。在搜查時，从腊德施奇身上搜出的一封信也是一個物證。後來又查明，埃爾斯納同希臘商船船長康斯坦丁諾斯有過協議，他們會商定再吸收 40 名希臘船長參與這個陰謀，而這些人必須在指定的日期把彈藥運到君士坦丁堡，並供給在首都希臘居民中間舉行暴動所必需的一切物資。康斯坦丁諾斯不僅同埃爾斯納保持經常的聯繫，而且同希臘駐土耳其大使梅塔克薩斯先生保持經常的聯繫。俄國上校博迪納羅夫擔任埃爾斯納和哥爾查科夫公爵之間的聯絡人。”

在“奧格斯堡報”上出現了一些非常敵視俄國的文章，這些文章在德國引起了強烈的反應，因為該報在此以前一直非常熱心地捍衛俄國利益；而且大家都知道，奧地利內閣是該報的後台。在這些文章中說，在漢·西摩爾爵士的秘密往來的公文的内容被揭發以後，奧地利應當認為自己不受對俄國所承擔的義務約束。我們在一篇文章中讀到：

“俄國的行動迫使奧地利向聖彼得堡提出了抗議書，而聖彼得堡在接受這個抗議書時態度非常傲慢，對維也納內閣如此無禮地加以鄙視，以致自君士坦丁堡發出的每份新的緊急報告都引起沉重的預感。由於缺乏應有的尊重和重視，門斯多爾弗伯爵不得不請求任命他擔任旅長以免去他在聖彼得堡的職務，儘管他個人沒有理由抱怨。”

因此，他的職務就由埃斯特哈濟伯爵接替。在另一篇文章里則有這樣一段話：

“當俄國皇帝到奧里繆茨時，他對待布奧爾-紹恩施坦伯爵非常無禮，甚至可以說是侮辱，大家都覺察到了這一點，涅謝爾羅迭和美延多爾夫感到非常難堪（我要提醒你們讀者，涅謝爾羅迭慣於挑撥他的至尊的皇帝干這種無

礼的事情，然后再为他悲痛》。年輕的皇帝是亲眼見到人們怎样对待他的大臣的，他忘記不了这件事。汉·西摩尔爵士的信只能促使更快地作出为皇帝陛下早已认可的決定〈阻止俄国对奥地利侵犯〉…… 奥尔洛夫伯爵在駐維也納期間拒絕代表君主承担在任何条件下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的責任。”

“泰晤士报”駐君士坦丁堡記者特別強調指出这种局势：希腊人暴动必然会导致希腊的革命，即必然会导致民族派同俄国的拥护者之間的斗争。另一方面，帕沙在保加利亚的殘酷镇压显然会使人民向往俄国。請允許我举出一些能够說明希腊同西方强国关系的事实。在“馬賽新聞”可以讀到4月17日发自君士坦丁堡的如下一則消息：

“居住在雅典的欧洲人現在正遭受着一切可能遭受的凌辱。甚至有人拿棍棒来对付他們，而希腊的宪兵队根本不制止这种行为。3月15日，法国大使館的一个工作人員，前駐雅典的法国領事的儿子加斯帕里先生被打倒在地上，当时有3个宪兵在場，竟然袖手旁观。就在同一天，其他法国人得到消息說，將遭到‘懲罰’的96个‘法朗克人’的名单已經拟定。这种过火行为迫使英法两国的代表向奥托国王政府提出一个联合照会，說明任何一次对英法臣民施加橫暴行为都将立即賠償25 000 德拉馬。4月12日又向希腊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限期在5天內，即在4月17日以前答复。在这个最后通牒中，要求奥托国王賠償法国人所遭受的損失，严厉譴責暴动，以及追究由于奥托国王的姑息而造成的罪行。誰也沒有期望国王会作出令人滿意的答复。大使們在接到否定的答复以后，决定同該政府断絕一切关系，同时根据議定书（議定书确定建立希腊王国）以英法两国的共同名义开始执行‘希腊行政官’的职务。”

希腊政府向駐各国外交代表发了通令，为希腊不久前在同土耳其政府发生爭执时所采取的行为辯护，据帕伊科斯先生說，土耳其政府最近对待希腊臣民的一些措施是由于土耳其对現在已經不

能把希臘看做是自己的領地這一點的惱怒而引起的，這也正是土耳其 20 年來對希臘陰謀活動的根本原因，特薩利亞和伊皮羅斯的暴動只是進行這種活動的借口。

4 月 28 日維也納“新聞報”¹²⁷ 刊載了丹尼洛國君向門的內哥羅族首領發出的呼呀書：

“我希望你們門的內哥羅人應當以我們的勝利的祖先（他們遺留給我們自由，我們為此在全世界面前感到驕傲）為榜樣，使自己在今後成為像希臘人和其他民族那樣的英雄。因此，我想從已經入伍的兵士那裡了解我是否能夠信賴他們，並且命令每個首領把本族基干召集起來。讓每一個兵士自願地申述他是否願意跟隨我去同我們的信仰和我們的國家的共同敵人——土耳其人作戰。你們首領們應該接收所有的志願者，並把報告寄交策丁耶我處。但是我號召所有不願意英勇犧牲的人留在家裡。跟隨我去的人必須忘掉自己的妻子兒女，忘掉他所愛的世界上的一切。我要告訴你——我的勇敢的人民和你們——我的弟兄們：誰不願意同我一起去死，那末就不要離開原地；因為我知道，一個跟隨我去作戰的人要比 50 個胆小鬼寶貴得多。我號召所有心還沒有變冷的勇敢的人，所有決心為祖國、為正教教會、為神聖的十字架而毫不猶豫地去流血的人們同我共享光榮和美譽。我們不愧是戰勝了 3 個土耳其大臣、打敗過法國軍隊並沖擊過蘇丹的要塞的門的內哥羅先輩的兒子。我們決不出賣自己的祖國，決不放棄我們祖先的光榮，為了上帝，讓我們去戰鬥吧。

丹尼洛

1854 年 3 月 15 日於策丁耶”

在“阿格拉姆報”¹²⁸ 上可以讀到：門的內哥羅各族首領為了應對狂熱的門的內哥羅流民發出的這個號召，召集了年輕的戰士，向他們宣讀了呼呀書，並且有 4 000 個人在聖壇前宣誓“為信仰和祖國”去戰勝敵人或戰死。不能不指出這一運動同普魯士獨立戰爭¹²⁹（在科尼斯堡的多納將軍和整個普魯士 Treubund¹³⁰ 都非常

虔誠地紀念这次战争)的口号和願望有奇怪的类似。通过尼克希奇向黑塞哥維那前进的門的内哥罗人部队将由丹尼洛国君亲自指揮。从南方經過扎勃利亚克向阿尔巴尼亚推进的部队将由格奥尔基·彼得罗維奇將軍率領。

“阿格拉姆报”写道：“山地居民得到很好的彈药供应，并且这两个軍都将拥有 12 門三磅半的加农炮。”

开始軍事行动的信号将由直接从圣彼得堡得到指示的柯瓦列夫斯基上校发出。

馮·曼托伊費尔先生得到了 3 000 万塔勒后，分別解散了两院的議員，并发表了告別演說，現在我引用其中一段最有代表性的話：

“先生們！你們同意这个貸款，这就使政府有可能沿着过去所走过的道路繼續前进，在这条道路上，它一直同奥地利和整个德意志保持完全一致(in voller Einigkeit)，并且同其他强国一致；这就有可能使普魯士在解决目前欧洲所关心的重大問題时保持它所应起的作用。”

請允許我指出，在英国报纸登載的关于这篇演說的电訊报道中，把“同其他强国一致”誤譯为“同西方强国一致”。普魯士抱有更大的目的。它希望在同似乎是交战的双方一致的条件下爭取締結和約——究竟希望同誰一致呢？

就在馮·曼托伊費尔先生解散議院的那一天，他又幸运地在自己的党的 réunion〔會議〕上发表了第二篇演說，这篇演說比上面引用的那些官場行話要精確得多、動聽得多。这篇演說是最典型的普魯士現代作品。它蘊藏着普魯士國家的全部智慧的 in nuce〔萌芽〕。

他說：“先生們，有一个詞被大家用濫了，这个詞就是自由。我并不反对

这个詞，但是我的座右銘是另一个詞，这个詞就是**服务(Dienst)**。先生們，在这里开会的我們每一个人都應該为上帝和皇上服务，我引以自豪的是我能为这样的皇上服务。**服务**这个詞正在把普魯士国家团結起来，虽然它还在整个德意志的国土上(in deutschen Gauen)被乱用。这个詞應該把我們大家团結起来，不管我們所处的地位怎样。**为皇上服务**，这就是我的旗帜，同时也是在这里开会的所有的人的旗帜，現在救星就在这里。先生們，为皇上服务万岁。”

曼托伊費尔是对的，因为現在除了为皇上服务的普魯士以外沒有其他的普魯士。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5 月 2—5 日

載于 1854 年 5 月 16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4080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不列顛的財政

1854年5月9日星期二于倫敦

虽然炮击敖德薩这种毕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行动曾經引起人們很大的激动，但是目前更引起人們注意的是另一种炮击——炮击公众的錢袋。在分析格萊斯頓先生昨晚在下院會議上所作的关于財政状况的报告之前，必須首先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他所实行的財政措施。

迪斯累里先生在任大臣时，曾把国庫期票的利率降低到每天 $1\frac{1}{4}$ 辨士，即降低到从未有过的最低限度。但是格萊斯頓先生竭力超过他的前任，进一步把利率降低到 1 辨士，而不考虑迪斯累里先生降低国庫期票利率时货币十分充足而且不值錢，但在格萊斯頓先生打算超过他的对手时货币很少而且非常值錢。因此，这位偉人不得不为了国庫期票而付出 300 万英鎊；如果他不干涉，国庫期票还会按照过去的利率繼續流通。不仅如此！政府还没有来得及依靠使国家財政受到巨大损失的办法来收回国庫期票，就不得不发行利率更高的新的債券了。这就是牛津詭辯家的卓越天才的第一个明证，他总认为在自己身上集中了全部天才，因为群賢的联合內閣把托利党政府的財政計劃推翻后才替换了托利党的政府，这样也就是宣布財政是联合內閣政策的最强有力的一个方面。

格萊斯頓先生并不以短期國債的這些措施為滿足，他在長期國債上又進行了一個更不尋常的試驗。1853年4月，他向下院提出了一項關於轉換南海公司股票和其他國家有價證券的十分複雜的計劃，結果在半年到一年之後他不得不付出950萬英鎊。有一點指出得十分公正，這就是他這麼作的時候，已經得到漢密爾頓·西摩爾爵士的密件以及羅斯上校和坎寧根領事的警告，因此他對於俄國政府的敵對意圖和歐洲戰爭的臨近不可能有任何懷疑了。大概讀者還記得，就在格萊斯頓先生提出他的計劃的時候，我曾預言¹³¹，這個計劃將要失敗，而且由於這個計劃，政府在會計年度結束時將不得不借500萬或600萬英鎊的債。我這樣斷言時，決沒有估計到東方的複雜局勢。除了東方的複雜局勢以外，格萊斯頓先生計劃的不切實際的形式未必能迷惑得住證券交易所里的那一伙投機分子；不需要有特別的遠見，就可以預見到將要發生歉收，因為淫雨使播種面積比往常大大減少了；而收成不好勢必引起國內黃金和白銀的外流；金銀外流當然不會制止已經出現的金融市場上利率提高的傾向，而在金融市場上利率普遍提高的情況下，如果認為提供貸款的公眾肯讓自己的有價證券的利率降低，或者認為他們不去利用格萊斯頓先生的試驗給他們提供的可能，即要求按票面價值償付自己的有價證券，以便在第二天再把得到的巨款加上純利重新存放，那是十分可笑的。事實上，在會計年度結束時，格萊斯頓先生不得不按照票面價值為南海公司的分年償還的債券付出600萬英鎊，如果不是他干預的話，這種債券目前在證券交易所里每100英鎊只值85英鎊。這樣一來，他沒有任何必要而浪費了600萬英鎊的國家資金，而且，由於實行這一杰出措施，公眾事實上至少損失了100萬英鎊；而國庫的結餘在1853年4月是

780 万英鎊，到 1854 年 4 月战争的期間已經降到 2 778 000 英鎊，即减少了五百多万英鎊。格萊斯頓先生提出的这个毫无用处的轉換計劃，是政府現在不得不努力克服的一切財政困难的基礎。格萊斯頓先生在 3 月 6 日，即在宣战前 24 天說，他的全部措施的前提是用于今年开支的資金应当在今年筹出来；还說由于他采取了种种措施，战争負擔只是在目前才感觉出来，根本談不到要在金融市場上寻找貸款。这番話他在 3 月 22 日重复过，甚至在 4 月 12 日又重复一遍。然而在 4 月 21 日議會休假期間，就发出正式通告說，需要借債并将发行 600 万英鎊的國庫債券。讀者們大概还记得，國庫債券是格萊斯頓先生发明的，并且是和他的轉換計劃同时实行的。

普通國庫期票是一种为期 12 个月的債券，通常在期滿时掉換或者偿还，而且期票的利率是随着金融市場上的利率波动的。相反地，國庫債券規定了几年內一定的利率，这种債券本身就是一种可以用簡單的簽写轉让背书的方式实行轉让而不需要买方或卖方出任何附加开支的定期利息。总之，可以称它們为铁路证券的仿制品。格萊斯頓先生在 1853 年第一次发明这种債券时，得到了发行 3 000 万英鎊債券的权利，并且十分贊賞自己的发明，认为这 3 000 万英鎊不能滿足需要，实际价值将大大超过票面价值。但是“公众吞下 40 万英鎊稍多一点就飽了，这一数目大約等于格萊斯頓估計一定会售完的總額的 $\frac{1}{7}$ ”。格萊斯頓先生为了筹集他所需要的 600 万英鎊，发行了流通期为 4 年、5 年和 6 年的三类國庫債券。为了使这些債券更容易为交易所接受，他决定在还未到期支付时就付息。他宣称，債券按票面价值出售，利息三厘五，同时他注意到新式的有价证券的极不寻常的优点，它的利息等于国家付

出的全部利息的 10—16%。在开始认购时就发现，1858 年还本的第一类債券，总共只要了 80 万英鎊，而其他两类即 1859 年和 1860 年还本的債券，根本还没有人要。但是，还不仅如此。格萊斯頓先生不得不减价推銷自己的商品，按 98.75% 的最低价格出售，并再加上几个月的利息；这样一来，他不是維持南海公司的三厘股票，而簡直是按 4 厘利息借債，因而損失百分之十五的資本和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尽管作了这些让步，他仍然遭到了彻底失敗，因为他不得不把认购債券期限延长到 4 月 8 日，而且不像早先那样要求 600 万英鎊，而只好滿足于“令人可笑的区区之数” 200 万英鎊了。这次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格萊斯頓先生的有价証券既不适用于长期的投資，也不适用于暫时的投資；因为在 1859 年和 1860 年还本，在目前行情下是大成問題的；最后，因为在市場利率提高的时候，这种規定了好多年的固定利率的債券不会像利率必須随着币值的增加而提高的國庫期票那样被人欣然接受。

格萊斯頓先生把三类國庫証券投入市場，他还嫌不够，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向下院提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甚至三个或四个預算。格萊斯頓不同于前任財政大臣，他在 3 月 6 日即財政年度結束前作了关于預算的报告，据他說，这是为了明确地向全国表明，目前国家所处的是什么情况。他告訴下院說，預算中的結余为 300 万英鎊，但是由于十分严重的局勢，政府不得不增加 600 万英鎊的开支，因此在今年要准备好应付 300 万英鎊的赤字。在这之后，还不到两个月，他又向下院要求大約 700 万英鎊，虽然早在 3 月里他就完全能够准确地計算出他要向居民索取多少錢。

他所要求的追加的預算撥款的分配如下：

海軍.....	4 550 000 英鎊
陸軍.....	300 000 英鎊
炮兵.....	650 000 英鎊
民軍補充額.....	500 000 英鎊
意外開支.....	2 100 000 英鎊
	8 100 000 英鎊

用于陸軍、海軍和炮兵的開支，已經在星期五晚上被一致批准了。我要簡單地說明一下，這些開支的用途：有 30 萬英鎊用于增加 14 799 名陸軍官兵（增加的結果，陸軍的名額將比去年增加 40 493 人，即達到 142 000 人）。炮兵的追加開支總共是 742 132 英鎊。海軍的追加開支為 4 553 731 英鎊（其中包括一部分炮兵的追加開支），可以列成下表：

—

1. (一) 水兵和海軍陸戰隊的薪金，因為艦隊補充了兵員 11 000 人，即 2 500 名海岸警衛隊兵士和 8 500 名志願兵.....	461 700 英鎊
(二) 支付超役 6 個月的 5 000 名水兵的薪金，應當在 1855 年 3 月 31 日年度結束時支付.....	110 000 英鎊
(三) 支付水兵的超額薪金，即對 2 500 名海岸警衛人員和現在服役於艦上的索具兵的超出水兵薪金部分的貼補金.....	51 700 英鎊
(四) 用于征募 5 000 名後備水兵.....	220 000 英鎊
(五) 超役 6 個月（到 1855 年 3 月 31 日止）仍在服役的 5 000 人的給養.....	50 000 英鎊
(六) 追加儲備糧，糧食運費以及幾種糧食漲價的支出.....	50 000 英鎊
(七) 在海軍服役 1 年的 5 000 名補充兵員的給養等.....	100 000 英鎊
(八) 白廳和索美塞特宮各辦公廳因戰爭需要而增添的低級公務員的工資.....	5 000 英鎊

(九)英国各海軍机关、粮食机关和卫生机关中的补充工作人员薪金·····	2 000 英鎊
(十)英国軍械庫以及其他各海軍机关、粮食机关和卫生机关的工人的貼补金·····	47 000 英鎊
(十一)国外軍械庫以及其他海軍机关的工人的貼补金·····	1 000 英鎊
2. 用于海軍的补給·····	697 331 英鎊
(一)购置蒸汽舰的用煤和其他燃料·····	160 000 英鎊
(二)购置补充已經发給舰队的物品的儲备品·····	40 000 英鎊
(三)蒸汽机的购置和修理, 因为已經决定, 預备舰队中应当以蒸汽舰为主·····	252 674 英鎊
(四)购买蒸汽舰、炮艇以及其他船只·····	244 657 英鎊
3. 造船厂的建設、改进和修理·····	7 000 英鎊
4. 药品和医疗器材·····	30 000 英鎊
5. 其他各項供应·····	6 000 英鎊
共 計·····	1 457 031 英鎊 ^①

二

有些項目虽然已經列入海軍概算內, 但与其說是屬於海軍

不如說屬於陸軍, 这些項目共請批准 ····· 3 096 700 英鎊

其中:

1. 按月支付的包括蒸汽舰在內的船只运費, 购买船只以及租用 8 艘新蒸汽舰和 86 艘帆力舰其中包括裝載騎兵的 75 艘巡航舰····· 2 610 200 英鎊
2. 租用裝运軍隊及其給养的船只的运費, 因为政府已經租用 18 艘蒸汽舰和 86 艘帆力舰, 租期 1 年····· 108 000 英鎊

总 共····· 4 553 731 英鎊

^① 这个总数不包括(二)、(三)、(四)三項, 这三項列入第二类总数。——編者注

格萊斯頓先生打算用下列办法多收一些稅，即把加倍征收所得稅的办法延长到战争結束，把麦芽消費稅从 2 先令 9 辨士提高到 4 先令，把苏格兰的酒类消費稅每加侖提高 1 先令，把爱尔兰的酒类消費稅每加侖提高 8 辨士，并把本来要在今年 7 月 5 日实行的降低食糖的消費稅的措施推迟实行。关于酒类、麦芽和食糖的决定很快就通过了。

酒类消費稅的提高不会增加收入，因为它使酒类的需求量大大降低。新的麦芽消費稅将是对小酒店主和他們顾客的一种惩罚，因为他們的正式喉舌“晨报”曾表現自己是那么热烈地拥护战争。食糖的消費稅一定使今年的醋汁和果酱发苦。至于所得稅，正像大家十分清楚的那样，3 月 6 日，即收到罗斯上校和坎宁根領事的关于俄国备战的消息 3 天以后，格萊斯頓先生曾經宣称，再过 7 年，所得稅将不存在了。大家同样十分清楚，格萊斯頓在 4 月 18 日宣称，所得稅增加一倍只要实行半年就够了。格萊斯頓先生如果不是一位从未有过的最无远見、目光短淺的財政大臣，那就是他故意装做在摸索前进，使公众迷失方向、莫名其妙并且产生錯誤認識。

不列顛的小市民不仅必須为对俄战争、为格萊斯頓先生的教友派学說和伪善的拘泥細节而付出費用，还应当供給沙皇本人以进行对英战争所需的資金，这一点可以从約翰·罗素勋爵在星期五晚上的說明看出来，他說不列顛政府将继续偿还所謂俄荷貸款协定¹³²的本息；这项协定包括在維也納条約內，其中規定的主要条文之一說，波兰应当成为独立的立宪王国，使克拉科夫成为受保护的自由城市，欧洲各河流因而也包括多瑙河有航行自由。

对爱尔兰人忠誠的怀疑看来是很大的，因为帕麦斯頓勋爵宣

称，女王陛下政府今年不打算招募爱尔兰人加入民軍。就是这个帕麦斯顿曾以約翰勋爵沒有把民軍法推行到爱尔兰去而激起了爱尔兰的憤怒为借口，推翻了罗素內閣。內閣同它的铁路法案一起遭到实际的失敗，因为这个法案只包括为了这个目的而召开的議會委员会所建議的条款一小部分。因为铁路綫老板們的行动十分一致，英勇的卡德威尔先生在代表內閣发言时宁肯把原来的法案撤回，用另一个由铁路經理們本人制定的法案来代替它，而这个法案既沒有給經理增加任何义务，也沒有規定比現行規章更严格的規章。当这个法案在議院里討論时，除了身为議員的铁路公司的經理外，会場中沒有任何人。

一家周刊写道：“看来，大臣和議會既不能保护股票持有人的財產和旅客們的口袋，也不能保证公众不受铁路公司的侵犯，因为铁路公司硬說它們有权擅自任意处理这些財產。”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5 月 9 日

載于 1854 年 5 月 23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086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輝煌的勝利

英国报纸对于沙皇奖励奧斯坦-薩肯將軍参加最近一次联軍舰队同保卫敖德薩港的岸防工事之間的战斗一事，不惜发表了大量尖酸刻薄的評論。它們认为，在这次战斗中联軍获得了全胜，而敌人的狂欢是俄国人吹嘘和沙皇撒謊的又一个例子。我們对沙皇或奧斯坦-薩肯根本談不上有什么特別的好感，尽管后者无疑是一个聪明而果断的人（他是指揮多瑙河各公国的一个軍的另一位奧斯坦-薩肯將軍的兄弟¹³³），但是我們还是认为敖德薩的这一次“胜利”是比較值得重視的，而且弄清到底是哪一方自吹自擂和造謠誹謗也是有好处的；何况到目前为止，这是联軍和俄軍之間第一次、也是唯一的我們了解一些情况的战斗。

从双方公布的正式文件中可以看出，联軍舰队在敖德薩出現的目的，是要求总督交出停泊在該港的英、法、俄的所有船只，作为射击不列顛軍使旗的賠償。联軍明知这样的要求是不会得到任何答复的，因此，他們显然已准备好以武力来夺取他們所要求不到的东西。如果这个目的沒有达到，那就是說不管他們如何重創敌人，他們也是遭到了真正的失敗。

双方兵力的对比究竟怎样呢？从俄国政府任命奧斯坦-薩肯为紧靠多瑙河軍团后方的广大地区的长官这一命令本身，以及奧

斯坦-薩肯把自己的指揮地點選在敖德薩這一事實，都表明俄國人多么重視——而這是完全有根據的——這個地點。正是在敖德薩，敵人的登陸才可能使俄軍遭受最大的損失。敵人在那里不僅可以得到一個大城市的資源，而且可以得到全歐洲的糧倉；到了這裡，他們距離在土耳其作戰的俄軍的交通綫和可能退却的路綫也最近。在這種情況下，聯軍的海軍上將們不可能不知道，這個城市有大量的守軍防守，以他們現在所能派出的水兵和海軍陸戰隊去登陸的任何嘗試都將立即破產。但是不派兵登陸，不占領敖德薩，——哪怕只是短時間的占領，如果不能占領城市，即使占領港口也好，——他們就不能指望解救被扣留在那里的英法船隻。實現這個目的的唯一希望，就是對這個城市進行最猛烈的炮擊，使任何部隊繼續在城內停留都有危險，那時才能試圖解救自己的船隻。然而，對於這樣一個具有非常寬闊的街道和廣場，而且可能中彈起火的建築物占地較少的大城市進行炮擊，能否達到這一目的還不知道。因此，海軍上將們應當了解，如果奧斯坦-薩肯拒絕他們的最后通牒，他們是無力堅持自己的要求的。但是他們認為，在軍使旗受到射擊以後，必須對敖德薩採取某種行動，於是他們就開始行動了。

敖德薩的海口由 6 座大概擁有 40—50 門二十四磅和四十八磅火炮的炮台防守。其中參加戰鬥的只有 2—3 座炮台，因為進攻者一直在其餘炮台的射程以外。聯軍用來對付這些炮台的有 8 艘蒸汽巡航艦，艦上約有 100 門火炮，但是由於這次戰鬥的特點只能使用一邊舷上的火炮，聯軍在火炮數量上的優勢就大大減弱了。從火炮的口徑來看，雙方的力量顯然大致相等，因為二十四磅的加農炮雖然不如三十二磅的長管炮，但四十八磅的重炮同不能使用

全装药的、发射爆炸彈的五十六磅和六十八磅的加农炮无疑是相等的。最后,軍舰比胸墙更容易被攻击,軍舰的运动使瞄准不精确,这些都使得岸防炮处于比舰炮优越的地位,甚至当舰炮在数量上占更大优势时也是如此。什列斯維希的埃克恩弗尔德战斗(1849年)¹³⁴就是一例。在那次战斗中,拥有20門火炮的两座炮台击毀了一艘装备有84門火炮的軍舰,打坏了并俘获了一艘有44門火炮的巡航舰,还击退了两艘装备精良的蒸汽舰的攻击。

总之,由于参加这次战斗的只有岸防炮和8艘蒸汽舰,即使把战斗过程中显示出来的英法两国火炮的射程較远、射击比較准确的情况估計在內,也可以說这次战斗大致上是势均力敌的。因此,破坏工作进展得十分緩慢。許多小时炮击的唯一战果,是击毀了俄軍两門火炮。最后,联軍向前推进并改变了战术。他們不再对炮台的石墙射击,开始用大量炮彈和燃燒火箭轰击俄国舰船以及港口內和港口周圍的軍事建筑物。这样收到了效果。現在瞄准的目标已相当大了,以致每一发炮彈都能落在某个易受攻击的地方;不久,一切都淹沒在火海中。位于防波堤頂部的那座抵抗得最頑强、一开始就受到主要攻击的炮台后面的軍火庫爆炸了。这次爆炸以及火势向周圍蔓延,迫使炮台內的守軍撤退了。同往常一样,这一次俄軍炮兵又显示出他們本領很差,却非常勇敢。他們的火炮和霰彈看来质量很低,而且火药的威力很小。

其实,整个战斗的結果也就只有这些。在防波堤頂部的俄軍炮台的4門火炮的火力被压制了,所有其他的炮台則未必受到什么損失。显然軍火庫爆炸的破坏力并不特別大。根据軍火庫直接配置在炮台后面的这一情况判断,它是只供这一座炮台使用的,其中只儲存一天的彈药,4門火炮每門約60—100发炮彈;如果減去

当天可能已經消耗的炮彈數，那末可以說那里所剩的不超过 300 发炮彈。我們沒有任何材料来确定其他建筑物遭到損失的程度；联軍当然无法查明这次損失，而俄軍断定这次損失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从俄国人的报道中可以看出，被燒毀的船只**并不是**英法两国的报道所断言的軍艦；可能，这是几艘商船加上一些运输船只和政府的客輪。应当指出，以前我們也沒有听說过在敖德薩有什么俄国軍艦。

在战斗期間，有两艘法国商船和一两艘英国商船逃出了港口。直到今天还有 7 艘英国商船被扣留在那里。因此，“英勇的”海軍上將們沒有能实现自己的要求；既然他們沒有获得一定的战果，只击毀了 6 座炮台中的一座而不得不退却，那末他們就应当承认自己的进攻被击退了。他們的伤亡非常少，但是有几艘軍艦的舰体被击伤，而且法国蒸汽舰“沃邦号”被熾热的炮彈击中起火，不得不暂时退出战斗。

这就是不列顛報紙所說的“从敖德薩傳来的光荣消息”，而在英国人心目中也抵銷了海軍上將邓达斯过去的一切失策。不仅如此，这次战斗竟大大鼓舞了英国人的斗志，以致有人郑重其事地告訴我們，海軍上將們确信自己的炮兵在射程方面大大优于俄軍炮兵，才毅然决定轰击塞瓦斯托波尔；好像他們甚至已經到过那里并进行了几次齐射。但是这純粹是異想天开。無論什么人，只要一看塞瓦斯托波尔的平面图就会了解，对这个城市和港口的任何进攻（不論是不是进行炮击），如果不想成为在海灣外的一次簡直是装样子的战斗，那末就必须要在狹窄的水域內、甚至在野炮的射程內进行。

我們对这种枯燥无味的 *exposé* [叙述] 还要补充一点，我們的

英国同行們对这次战斗(他們的进攻完全被击退,而預定目的又沒有达到)的大吹大擂,同他們过去对战争进程所作的評論和推断的总的腔調很少有什么区别。不管战争的結局如何,我們认为,公正的历史家一定会指出,英国在使用斗争最初阶段所特有的誹謗、詭辯、欺騙、外交手腕、軍事吹嘘、謊言等手段方面同俄国是一模一样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5 月 15 日

作为社論載于 1854 年 6 月 6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09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
——在苏格兰对領地的清扫

1854年5月19日星期五于倫敦

今天报上登載了“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第一次攻击”的电訊，看来这次攻击像对敖德薩的炮击一样(在这次炮击以后，双方都宣称自己胜利了)，是一次光荣的英勇事迹。根据所描述的情况看来，这一次攻击是借助于“远射程”炮的轰击的，炮火攻击的目标是外圍工事。要对塞瓦斯托波尔港口和城市本身攻击，如果不进入港灣和逼近城防炮台，無論用什么火炮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沒有大量登陆部队的支援，要占領这个城市一般也是不可能的。这只要看一看地图就很清楚，而且所有的軍事权威都承认这一点。因此，必須把这場战斗（如果它确实已經进行的話）看成是給那些 gobe-mouches [头脑簡單的人] 看的假的英勇事迹，这些人的爱国主义是受到了敖德薩的荣誉鼓舞的。

法国政府派布雷先生到希腊去执行特別的任务。随同他前往的有福雷將軍指揮的一个旅，他受权要求奧托国王立即偿付法国在1828年借給希腊政府的1亿法郎貸款的全部利息。如果遭到拒絕，法軍就要占領雅典和王国的其他一些地点。

讀者大概还記得我所叙述的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清扫領地的过

程，由于这种清扫，本世紀前半期有千千万万的人被从祖居的土地上赶走¹³⁵。这种清扫还在繼續进行，而且是以只有模范国家英国的有美德的、高雅的、篤信宗教的、仁慈的貴族才会有的那种毅力进行的。那些无保护的居民的房子不是當場被燒掉，就是被搗毀。去年秋天，在諾伊达尔特的尼加特庄园里，根据大地主的命令，向受人尊敬的、誠实的、爱劳动的唐納·麦克唐納的房子进行了襲击。他的妻子臥病在床，不能迁移；但是管理人和他的一伙帮凶把麦克唐納的6个孩子赶到街头，其中最大的一个还不滿15岁，整座房子被搗毀了，只剩下了正对着病床的一块不大的屋頂。

麦克唐納被这一切激动得发疯了。医生认为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現在他到处徘徊，在被燒毀和搗毀的住房的廢墟中寻找自己的孩子。他的飢餓的孩子們哭哭啼啼地跟在他后面，然而他不認識他們。他得不到帮助和关照，因为他患的是文靜的精神病。

两个即将分娩的已婚妇女亲眼看着自己的住房被搗毀。她們不止一天在露天下过夜，結果二人都早产，忍受了很大的痛苦，弄得精神失常；現在她們带着她們的一大群孩子到处流浪，得不到任何帮助，毫无恢复健康的希望。这是揭露所謂的不列顛貴族階級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

甚至孩子們也由于受惊和受迫害而精神失常了。在諾伊达尔特的杜恩，被赶出自己住所的貧农佃戶栖息在空无一物的倉庫里。深夜，地主的代理人包圍了这个倉庫，并放火燒这个倉庫，因为这些不幸的貧农想要在这个倉庫里藏身。被吓得发狂的不幸的人們从火中跳出来，其中有些人完全失去了理智。“北方旗帜报”写道：

“一个男孩完全疯了，因此不得不把他隔离；他每夜都跳起来叫喊‘火！火！’，并要周圍的人相信，在燃燒着的倉庫里还有男人和小孩。天黑以后，

他一看到火光就害怕。正是杜恩这种駭人的景象——倉庫燃燒着，照紅了四周，一些吓瘋了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在旁边东奔西竄——使他失去了理智。”

貴族就是这样来对待为他們創造財富的完全有劳动能力的貧农的。現在請听一听貴族的教区的慈善事业吧。現在我根据格拉斯哥的唐納·罗斯先生和“北方旗帜报”的材料举出以下的事实：

1. 寡妇馬瑟逊，96岁，从斯凱島斯特拉斯教区只領到2先令6辨士；
2. 默多·麦金托什，36岁，14个月前被大車压伤而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他有妻子和7个从1岁到11岁的孩子；他每月从斯特拉斯教区只領到5先令；
3. 寡妇賽米尔·坎伯尔，77岁，住在斯凱島布萊得弗德半倒塌的破屋里，她每月从斯特拉斯教区領到1先令6辨士。她抱怨說，这一点錢不够用，教区当局拖延了很久以后，才把她的补助金增加到每月2先令；
4. 寡妇麦金倫，72岁，她从斯凱島斯特拉斯教区每月領到2先令6辨士；
5. 唐納·麦克杜加，102岁，住在克雷达特。他的妻子77岁，两人身体都很弱。他們每月从格倫涅尔格教区只領到3先令4辨士；
6. 瑪丽·麦克唐納，寡妇，93岁，臥病在床。她的丈夫服兵役时失去了双手，20年前去世。她每月从格倫涅尔格教区領到4先令4辨士；
7. 亚历山大·麦克伊薩克，53岁，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他的妻子40岁，有1个双目失明的18岁的儿子和4个不滿14岁的孩子。格倫涅尔格教区每月只給这个不幸的家庭6先令6辨士，平均每口人不到1先令；
8. 安格斯·麦金倫，72岁，他的妻子66岁，有病，他們每月領到2先令1辨士；
9. 瑪丽·麦克伊薩克，80岁，身体很弱，双目完全失明，每月从格倫涅尔格教区領到3先令3辨士。她要求增加补助金，視察員回答說：“別人比你領得还少，你要求增加补助金怎么不害羞”，視察員說完以后就再也不听她說的話了；
10. 詹納·麦克唐納，也叫麦吉利奧雷，77岁，完全没有劳动能力，她每月只領到3先令3辨士；

11. 凱瑟琳·吉利斯, 78岁, 完全没有劳动能力, 她每月从格倫涅尔格教区只領到 3 先令 3 辨士;

12. 瑪丽·吉利斯, 也叫格兰特, 82岁, 已经有 8 年臥病在床, 她每月从阿德納美尔汉教区領到 28 磅面粉和 8 辨士。济貧所的視察員已经有两年沒有到她那里去了; 她得不到医疗, 也得不到衣服和食品;

13. 約翰·麦克伊肯, 86岁, 臥病在床, 住在阿德納美尔汉教区奥赫納克雷, 教区每天給他 1 磅面粉, 每月給他 8 辨士。他没有衣服, 也沒有任何其他财产;

14. 埃文·麦卡勒姆, 93岁, 有眼疾。在阿盖尔郡的納普迭尔教区, 我发现他在克林楠运河两岸求乞。他每月領到 4 先令 8 辨士, 他没有衣服, 得不到医疗, 沒有燃料, 沒有住房。这是一个衣衫襤褸的流浪汉, 一个可怜的叫化子;

15. 凱特·麦克阿瑟, 74岁, 臥病在床, 她孤单地住在納普迭尔教区的丹納迪。她每月除了从教区領到 4 先令 8 辨士以外, 什么也沒有。医生从来不到她那里去;

16. 詹納·克尔, 也叫麦卡勒姆, 寡妇, 78岁, 健康状况不好; 她每月从格拉薩里教区領到 6 先令。除此以外, 她什么也沒有; 她没有住房;

17. 阿契波德·麦克洛林, 73岁, 住在阿品教区, 完全没有劳动能力, 他的妻子同他一样; 他們每月从教区領到 3 先令 4 辨士补助金, 他們既沒有燃料、衣服, 也沒有住房。他們住在不适于人居住的最坏的草屋里;

18. 寡妇瑪格丽特·麦克劳德, 81岁, 住在洛克布魯姆教区的拉斯加克; 她每月領到 3 先令;

19. 寡妇約翰娜·馬肯集, 81岁, 住在洛克布魯姆教区的阿拉普耳; 双目完全失明, 身体很弱; 她每月只領到 2 先令;

20. 寡妇凱瑟琳·麦克唐納, 87岁, 住在基尔布兰登教区的卢英島; 双目完全失明, 臥病在床。她每月領到 7 先令生活費, 其中包括付給助理护士的費用。她的住房倒塌了, 但是教区不答应給她房屋, 她睡在屋簷下的泥地上。視察員拒絕給她任何帮助。

但是殘暴行为还不止这些。不久以前在斯特腊特卡隆发生了一件真正的暴行。一大批被已經进行的逼迁暴行和可能再被逼迁

弄得精神失常的妇女，听说有一队警察要到她们的地区来驅逐佃戶，就聚集在街头。然而来的并不是警察，而是稅吏；稅吏們听说他們被当作了另外的人，却不向人們进行解釋，反而决定利用这种誤会：他們冒充警察，說来这里是为了叫居民迁移。妇女們开始激动起来，官員們就用子彈上膛的手枪威胁她們。至于以后的情况，在唐納·罗斯先生的信中作了描述，他是从格拉斯哥抵达斯特腊特卡隆的，并在这个地方逗留了两天以收集消息和探望伤员。我們从他 1854 年 4 月 15 日在沃温市的“皇家旅館”写的这封信中讀到这样一段話：

“我所收集的消息证实了郡长的可耻行为。他没有事先向他們提出警告，說要派警察来对付她們。他没有宣讀惩治暴乱的法令。他甚至没有給她們以散开的时间，相反，他带着自己的队伍向她們逼近，紧握着木棍高喊：‘滚开！’没有喘一口气，接着又喊：‘打她們！’在这句話喊出以后，立刻出現了一幕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情景。警察开始用沉重的木棍打这些不幸的妇女的头部，把她們推倒在地上，用脚野蛮地踢她們，踐踏她們。不久整个草地染滿了鮮血。倒臥在血泊中的妇女和少女們的喊声震撼了天地。一部分逃脫了警察的追击的妇女跳到了水深流急的加农河，认为它比警察和郡长要仁慈一些。一些妇女的头发被警察的木棍一束一束地打落下来；一个少女遭到了木棍野蛮的毒打，从肩上打掉了一块 7 英寸长、1 英寸多寬、1/4 英寸多厚的肉。一个少女只是要看发生的事情，就遭到 3 个警察的毒打，他們打她的前額，砍伤了她的头，而在她倒在地上以后又用脚踢她。医生从伤口里取出了一块被凶狠的警察打进伤口的头巾布。妇女的背上留下了釘有铁掌的靴子的痕迹。現在在斯特腊特卡隆还有 13 个妇女由于遭到警察的摧殘而处于危險状态中。其中 3 个人情况很不好，已經没有治愈的希望。根据这些妇女的外貌、她們受伤的严重程度以及我所收集的医生的診斷书，我得出这样的結論：其中能够活下来的不超过一半；甚至那些还能活一个时候的人，也将在身体上保留着她們所遭到的极端殘暴的迫害的可悲的证据。在伤势特別严重的人中有一个孕妇。她并没有站在郡长对面的人群中，而是站在稍远的地方，并且仅

仅是一个旁观者；然而她也遭到了警察的木棍的毒打和脚踢，她的状况非常严重。”

我們还可以补充說，遭到襲击的妇女有 18 人。郡长姓泰勒。

这就是 1854 年不列顛貴族阶级的面貌。

地方当局和政府商定，只有在停止对普雷斯頓治安法官和棉紡大王的活动进行調查的条件下，才能停止对考威尔、格林姆肖和普雷斯頓罢工¹³⁶的其他领导人所提出的司法追究。而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做了。

邓科布延了两星期才向議院提出成立調查普雷斯頓治安法官的活动的委员会的建議，似乎正是由于这种勾結的緣故。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5 月 19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4 年 6 月 2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095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署名：卡尔·馬克思

弗·恩格斯 战 争¹³⁷

我們終於有可能來報道英國水兵的功績了。納皮爾海軍上將的艦隊經過 8 小時的炮擊後，摧毀了古斯塔夫斯維恩要塞（瑞典文是古斯塔夫堡壘或要塞）並俘獲守軍 1 500 人。這是對俄羅斯帝國領地的第一次嚴重攻擊，同鬆弛的、沉寂的敖德薩戰事比較，它至少證明，查理·納皮爾只要有可能，就不同意犧牲自己的榮譽和祖先的榮譽。古斯塔夫斯維恩堡壘位於形成芬蘭西南角的半島的頂端，並在所有航行於芬蘭灣的船長所熟悉的漢古特燈塔附近。堡壘的軍事意義並不大，只保衛着很小一片水域和陸地，因此進攻的艦隊可以毫無危險地把它留在後方。根據守軍的數量判斷，堡壘本身也不會很大。但是，關於俄國波羅的海沿岸防禦的實力和價值，連英國海軍部和陸軍部也心安理得地毫無所知，因此，我們在得到詳細情報以前暫不對這件事的戰術意義作任何評論，也就情有可原了。

我們現在只能說，8 小時的炮擊證明俄軍的防守即使不是非常巧妙的，也是很勇敢的，並且預示着他們在防守這一海灣內的頭等要塞時，將進行比預料頑強得多的抵抗。另一方面，1 500 人被俘對於俄國算不上什麼了不起的損失（這等於多瑙河上平均每兩天病死的人數）。但是這些俘虜將給納皮爾造成很多困難。的確，他將怎樣處理他們呢？不管他們是否作了保證，他都不能放走他

們，而可以遣送他們的最近的地点是英国。要保证順利地运送这 1 500 人，至少需要 3 艘战列舰或多一倍的蒸汽巡航舰。这一战果本身会使他的行动迟滞两三个星期。此外，如果没有陆战队，他怎能扼守已夺得的領土呢？我不能想像，假如他不再度削弱人員配备本来就已不足的舰队，假如不再一次减少每一艘舰上的水兵和海軍陆战队的名額，他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我們想提一下目前在不列顛报刊上已引起非常热烈的討論的一个問題，——当然，这种討論照例是太迟了。

不列顛的报刊突然发现，一支舰队无论它怎样强大，如果不載有足以用来登陆和巩固战果的大量部队，那它的作用就是很小的；而为了登陆和巩固战果，仅仅靠舰队对沿岸要塞射击，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远远不够的。可見，一直到上月末，不論是指导战争的英国官方人士还是指导英国輿論的官方人士，都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問題。同时，現有的全部軍队和运输工具都已經派往黑海；預定用于波罗的海的陆軍一共只有 2 500 人的一个旅，并且一个人都没有出发，因为連司令部本身还根本没有組織起来！

法国人同样是緩慢得可怜。至于他們預定用于波罗的海的舰队，那末——我們想起杜科大臣大言不慚的报告：“陛下命令装备第三舰队；陛下的命令业已执行！”——这一支本来應該在 3 月中旬就准备启碇并由 10 艘战列舰編成的声势壮大的舰队，实际上还只有不超过 5 艘的战列舰，它們現在正同巡航舰和小型舰船一起沿着大貝耳特海峽緩慢地前进。这些舰船由布勒斯特到达那里整整用了 3 个星期，虽然一直刮着西風。所謂为了波罗的海远征集結 15 万人，必要时集結 20 万人到圣奥梅尔大兵营的計劃，写在紙上已經三、四个星期了，但事实上連一个旅都还没有調去。其实法

軍很容易从他們的沿岸守軍中抽調 10 000—15 000 人來組成步兵和輕野戰炮兵，而不必慌慌忙忙、裝腔作勢地建立什麼野營。還有，到哪裡去找運輸工具呢？必須租用英國的商船；以法國艦隊的平均速度計算，這些商船需要 4—6 個星期才能相繼到達戰區。然而在什麼地方可以登陸，集中旅和師，組織司令部和軍需機構呢？聯軍陷入了循環論證：要在波羅的海地區擁有陸軍，就必須先奪得可以用來集中並組織軍隊進行攻擊的島嶼或者半島；而要做到這一點，又得先在當地擁有陸軍。不過，只要有一位通曉陸戰、足以指揮陸軍的優秀的海軍上將，就不難擺脫這種困境。查理·納皮爾就完全可以勝任，因為他已多次在陸上作戰。但是，只要最高權力掌握在阿伯丁^①手中，只要有 4 個不同的部干預軍務，只要陸軍同海軍經常對立，只要英法聯軍相互嫉妒對方的成功和榮譽，也就很難期望有什麼行動上的統一了。

因此，在 6 月底以前，不可能建立一支相當數量的陸軍調到波羅的海地區去。其次，如果在今後 4 個月中戰爭不能結束，和約不能簽訂，那末就必須放棄已經取得的一切戰果，——必須把軍隊、火炮、艦船和糧食運回或者遺棄在當地，而俄軍在冬季的 7 個月中將仍然是整個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主人。從這裡可以看出，今年對於俄國波羅的海沿岸地區是談不上什麼重大的和堅決的進攻的。太遲了！只有瑞典同西方強國聯合，後者才能在波羅的海地區擁有在芬蘭進行冬季戰局的作戰基地。但是，在這裡又陷入了循環論證，——當然，這同上面談到的一樣，只有對於怯懦者才是無法解決的。如果西方強國不派遣陸軍並占領芬蘭的一部分領

^① 本文在“紐約每日論壇報”刊出時，此處增加了“和帕麥斯頓”幾個字。——編者注

士，不用事实向瑞典证明自己意图的真切，怎能期望瑞典同它们联合呢？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确保瑞典成为作战基地，能不能向波罗的海派遣这些兵力呢？

实在说，大拿破仑这个采用大胆、坚决和歼灭性的作战方法杀戮过千百万人的“刽子手”，同领导这次对俄战争的那些优柔寡断的“国家伟人”比较起来，堪称人道主义的模范，因为只要这些“国家伟人”还继续像过去一样地行动，那末最终造成的人力和财力的损失要大得多。

如果我们现在看一看黑海的情况，那末我们就会发现，联军舰队怎样在塞瓦斯托波尔前面从远距离对这个要塞的几个可怜的外围工事进行毫无损伤的射击以寻欢取乐。据报道，4天以来，大部分舰船一直就在作这种无关痛痒的游戏；而俄军因为仅有12艘适于航行的战列舰，所以在这个期间始终没有出港，这使安梅林海军上将惊愕不已（见他在5月1日和5日的报告）¹³⁸。诚然，这位海军英雄年事很长，理应记得法国舰队不仅曾被兵力弱得多的英国舰队封锁，甚至在港内遭到袭击的年代。其实，如果以为兵力较弱的俄国舰队会离开塞瓦斯托波尔，以便让数量上多一倍的舰船把它击溃、击沉，从而抵偿它在西诺普犯下的“可恶罪行”，那倒是令人奇怪的！

在同一个时候，两艘战列舰（螺旋推进式蒸汽舰）和7艘蒸汽巡航舰正在开往切尔克西亚。它们的任务是侦察克里木海岸，然后破坏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的堡垒。但是，在攻击堡垒时只准3艘蒸汽巡航舰参加，另外4艘一结束对克里木的认真的侦察，便立即返航。据我们所知，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仍为俄军占领的3个堡垒——阿纳帕、苏胡姆-卡列和列杜特-卡列，——都有相当坚固

的工事，并且都构筑在瞰制海面的高地上（列杜特—卡列除外）。因此，派出的兵力是否足以完成这些任务，很值得怀疑，何况在舰船上没有登陆部队。海軍少将萊昂斯指揮的分舰队应该在这个时候同切尔克斯人取得联系，特别是同他們的首領沙米尔取得联系。至于萊昂斯少将应该同沙米尔联系些什么，没有确实的消息；但是有一点不能怀疑：他不可能給沙米尔运去最急需的东西——武器和彈药，因为在作战期間，軍舰上没有多余的仓位装載貨物。两只装載着这类貴重貨物的破商船或者帆船，比5艘軍舰毫无实效的精神支援要有用得多。同时，我們知道，給切尔克斯人运送必要的軍用品的土耳其舰队正开往那里。因此，联軍的两支舰队在执行着同一任务，而彼此互不知道。这就是计划和行动的統一！也許，一支舰队还会把另一支舰队誤认为是俄国舰队，那时两个舰队彼此射击，切尔克斯人将有一場好戏可看！

在这个时候，联軍的陸軍也在别有風趣地尽情欢乐，他們在斯庫塔里和加利波利消耗了大量濃烈而甘美的当地葡萄酒。其中偶尔没有喝醉的那些人被派去构筑野战防御工事，这些工事构筑在永远不会遭受攻击、因而无需加以防守的地点。无论英国政府或者法国政府都从来没有意思使它們的朋友尼古拉遭受重大損失，如果这一点还需要证实的話，那末只要看看联軍怎样消磨時間就足够了，这連瞎子也可以看清楚。为了給軍队远离戰場找借口，联軍統帅部命令他們构筑橫貫整个色雷斯的赫尔松涅斯地峽的綿亘防綫。每一个工兵，特别是每一个法国工兵都知道，在野战筑城中几乎在一切場合都不宜采用綿亘防綫。但是在加利波利的英法軍队仍然被迫构筑这种工事，而且构筑工事的地区有三分之二可能遭到敌人从高地按照預計方向进行的扫射。他們虽然想尽一切方法

尽可能緩慢地前进，甚至用蝸牛爬行的速度前进，但是終究不免前进一点，所以据傳有 15 000 名法軍正开往瓦尔那，——但是这又为了什么？作为要塞的守軍嗎？在那里又干些什么呢？无非是讓他們去患热病和瘧疾送死。

如果对战争的指导多少有一点理智，那末統帥部應該知道，土軍恰恰缺少英法軍隊所擅長的那種在平地機動作戰的本領，而他們却出色地掌握了防守城牆、壘牆、甚至缺口以抵抗敵人強攻的技能，在這一點上無論英軍或者法軍都不能和他們相比。由於這個緣故，同時又因為土軍所防守的瓦尔那作出了任何一個要塞迄今從未作到的事情，——也就是當城牆被打開了 3 個適于強攻的缺口以後，仍支持了 29 天之久，——正因為這一點，所以把未經嚴格訓練的土軍由瓦尔那調出來，派到平地上去對付俄軍，同時把訓練有素、長于攻擊而不善于長期防禦的法軍派去防守瓦尔那要塞。

根據其他方面的材料來看，所有這些調動無非是一種欺騙，大的事件正在醞釀中。聯軍似乎完全無意在巴爾干作戰；他們要在艦隊協助之下在俄軍後方建立豐功偉績；他們要在敖德薩登陸，切斷敵人的退路，並在敵人的後方同特蘭西瓦尼亞的奧軍會合；此外還要派遣部隊到切爾克西亞；最後，他們要派出 15 000—20 000 人從陸上強攻塞瓦斯托波爾，而艦隊則奪取港口。關於這些消息，只要回顧一下這次戰爭的全部歷史過程和戰爭前夜的外交談判，就可以明了它們的來源。這些消息是在勒盧阿（通常叫做聖阿爾諾）元帥來到君士坦丁堡以後立刻從該地傳開的。凡是知道這位可尊敬的先生的經歷的人^①，都可以立刻在這些吹噓中認出這位在當

^① 本文在“紐約每日論壇報”刊出時，此處增加了一句話：“我將設法把這些材料寄給你們”。——編者注

軍官时曾被三次革职、但仍以善于吹牛而攀踞目前高位的人物。

简单地說，目前的战争形势如下。英国，特别是法国，“虽然并非出自本意，但一定”要把大部分兵力駐在东方和波罗的海，也就是駐在整个軍事部署的两个突出的翼側上，这一部署的最近的中心是法国。俄国則打算牺牲它的沿海地区、舰队和一部分軍隊，以便把西方强国完全吸引到这个同一切战略相矛盾的运动里来。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了，一旦必要数量的法軍从本国派到遙远的地方，奥地利和普魯士就会立刻声明它們站在俄国一边并以优势兵力直取巴黎。如果这个計劃实现，路易-拿破侖将沒有任何軍隊来抵御这个突击。但是还有一支力量，它在任何意外的事件中都可以“动員起来”，同时它还能“动員”路易·波拿巴和他那些卖身投靠的侍臣，就像它以前曾經动員了許多統治者那样。这支力量可以抵抗所有这一类入侵；它已經一度向联合的欧洲表明了这一点。这支力量就是革命，它是不会在需要它行动的时候迟疑等待的，这請放心。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5 月 22 日

載于 1854 年 5 月 27 日“人民报”
第 108 号，署名：卡·馬·，并作为
社論載于 1854 年 6 月 9 日“紐約
每日論壇报”第 410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弗·恩格斯

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 服装置备、军需部等等

1854年5月26日星期五于伦敦

即使东方战争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它也会使已故的威灵顿公爵的军事荣誉部分地失去光彩。在这个被过高评价的统帅还活着的时候就熟悉英国的人一定记得，那些时候甚至把拿破仑看做是一个在某方面同战无不胜的“铁公爵”相匹敌的军人，都会被认为是英吉利民族的侮辱。现在这位光荣的公爵已经去世并安葬了，在这以前的四十年内他是英国军队的实际上的指挥者。过去还没有过比他更具有独立性和更缺乏责任感的军事长官。公爵曾是高于一切权威的权威，无论国王还是女王，对于涉及他的工作范围的事情都不敢有所异议。“铁公爵”饱尝了几十年通常为幸运的庸碌之辈所享受的荣耀和欢乐（这同拿破仑这样的天才人物通常所不可分离的悲剧性动荡生活比较起来，真有天渊之别）以后，与世长辞了，英军的指挥权也转到了别人手里。他死后大约十八个月，英军要和俄国人打仗了，可是还在第一团队伍准备登上军舰以前，就发现“铁公爵”留下的这支军队根本不能执行任何战斗勤务。

总的说来，公爵尽管也具有英国人的健全理智，但在许多方面是一个目光短浅、智力贫乏的人。谁都知道，他对自己的德意志盟

友在滑铁卢会战结束时所起的作用的评价是多么不公平，他把胜利的全部光荣攫为己有，但是要不是布吕歇尔及时赶到的话，这个胜利就会变为失败。他顽固地把英军中的各种荒谬习惯和怪诞作法保存下来，对一切批评的回答是“这类习惯和怪诞作法使我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胜利者”，这种顽固不化和他作为一个保守派所特有的信念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信念就是似乎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传统的愚昧无知和叛卖行为，才能正确发挥“无与伦比的”宪法的职能。如果说在紧急关头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他还善于作一些让步，那末在军事方面他却越发顽固地死抱着陈旧的观点和传统的怪诞作法不放。在英国军队中，假如不算炮兵纯粹技术上的改进，在他掌权的全部时期就没有作过任何一件多少像样的改善。然而，在这里绝对不能忽视工业和技术科学的高速进展。因此，就算英国炮兵拥有世界第一流的兵器，它的组织累赘的程度也不比其他兵种轻些，至于说到制服、装具和一般组织，英国军队没有一件不是落在任何一个欧洲文明国家的军队的后面的。

我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注意一种情况，这就是英国的军事领导权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集中在某一个部门里。有四个各自为政而又互相妨碍的部门。有一个军务大臣，他不过是一个出纳员或记账员而已。在英军总司令部里有一个总司令，属他管辖的是步兵和骑兵。有一个军械总长，他指挥负责军械事务的军官们，也就是说他管理的是军队的兵器。还有一个殖民大臣，他负责派遣军队到海外各属地并且调度这些军队的装具供应。同时还有军需部，最后，为了统管驻印度的部队还委派一个该地驻军总司令。只是在威灵顿死后这些怪诞的制度才成为公众议论的对象，因为1837年议会委员会有关这问题的报告，遵照他的命令被束之高阁了。现

在战争爆发了，这种制度到处都显得无能为力，但人们又反对改变它，因为担心完全破坏了办事的秩序和连贯性。

为了说明这种制度产生的混乱现象，我已举出这样一个事实来作为例证：一个团可以不必向不同的各自为政的部门交涉的两件东西是找不出来的，比如，制服由一个特命的上校发给，而军大衣则由军械部发；武装带和背包由总司令部发给，而火器又由军械部发。国外任何一个海军基地的军官、军械主任、仓库主任和军需官都或多或少地各自为政，并且各自向宗主国的也是不同的各自为政的部门负责。此外，还保留着像“管理制服的上校”这样一种畸形的现象。每一个团里有一个上校级的军官，他的职责是从国库领取一定数目的款项作为本团的被服费，但他只把一部分用于预定目的，其余的被他用作对自己奔波劳碌的报酬。

由于买卖军官官衔证书的缘故，军队中的所有高级职位几乎全由贵族把持。一个军官在当上几年中尉、上尉和少校以后，有权购买新近出现空缺的更高的军衔，只要没有另一个同级而资格较老的军官同他竞争就行。这样一来，有余钱的人就能够迅速晋升，因为他的许许多多资历较久的同事买不起空着的高一级军衔。显然，这样的制度大大缩小了用来补充军官队伍的有才干的人的范围。因为高级军官的提拔差不多只取决于资历或贵族关系，所以只由有限的一部分人补充高级指挥职务，这样一来必然会排斥很多有才能、有知识的人。毫无疑问，大部分英国军官关于军事科学的一般的和比较带有理论性的部门的知识所以如此可怜贫乏，主要应该归咎于这种制度。

就同兵士人数的比例来说，军官的人数过多。在任何别的地方也看不到像在英军部队里那么多的金银饰物和带穗肩章。因此

军官们无事可做，由于进行任何稍微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都会和他们的 esprit de corps [等级精神] 相抵触，于是他们把自己的光阴消磨在各种胡作非为的事情上，认为如果真的发生战斗，他们天生的勇敢精神和“女王陛下的操典”将完全足以引导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在乔宾建立野营¹³⁹的时候，很多军官的无能已完全暴露出来了，这一点凡是比浸透伦敦市僧习气的既可怜又狂热的雇佣作家稍微认真一点评论演习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而这些雇佣作家对自己平生首次见到的不平常场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大加吹捧。

训练制度和操典非常陈旧。部队的机动性异常差，因为各种动作都很复杂、缓慢，而且在执行时又一成不变。英军把旧的横队运动方法作为一切战术机动的主要形式，它保持这种方法的时间比奥军还要久；在地形有利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有一定的优越性的；但是在许多场合下这些优越性便化为乌有，而最重要的是这种方法本身仅仅适用于特殊条件。大陆上各优秀军队所采用的展开成纵队（尤其是连纵队）的方法能保证更大得多的运动性，而且在需要时又能同样迅速地构成横队的队形。

英国兵士的武器由优质材料精工制成，但是在很多场合被陈规旧套弄得畸形了。旧式大口徑滑膛枪做得不错，但大概超过了应有的重量。老的不倫瑞克式步枪本也不坏，但它已被更好的枪超过了。不久以前才使用的普里契特式步枪被认为是改进了的法国米涅式步枪，它也许是最优良的武器，然而只有在一番激烈斗争后当局才迫不得已采用了它。就是现在，它的使用仍然毫无系统并且非常混乱，有时候一个团的这一半使用旧式火枪，而另一半使用步枪，这造成了装备上的非常混乱的现象。骑兵使用的马刀质量很高，比大陆上各国军队的马刀更便于刺杀和砍劈。马匹也是

精壯的，但是騎手和武器太重了。野戰炮兵擁有世界上最優良而且在很多方面非常簡便的兵器，可是這些兵器的口徑和重量的大小非常紛繁，因此也需要種類繁多的彈藥。

相反地，英國兵士的制服和個人裝具却是世界上最別扭的東西。緊束着脖子的高而硬的衣領，使人顯出一副可憐相的、緊身的、帶後襟的上衣，裁剪拙劣的、令人難堪的窄褲子，式樣丑陋的大衣，難看的便帽或高筒帽，還有那些連普魯士人也不能贊賞的子彈帶及背包。關於這些東西近來報紙上談得很多，因此不必贅述了。但是不應忘記，英國兵士穿着這些似乎是故意弄得笨拙的制服，却不得不肩負比任何人都多的重荷。同時，好像是為了把“運動性”作為軍隊的最高原則，給軍隊還加上了一支任何軍隊中所沒有的龐大的輜重隊。這主要是軍需機關笨拙不靈的過錯；像這樣的團輜重隊，特別是這樣多的軍官行李，只有在土耳其或印度才能看到。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這支軍隊在到達土耳其時的行動是怎樣的。法國軍隊由於不斷把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證實有效的一切改進列入自己的軍事制度中，他們還未登陸，就已經把一切安排妥當了。他們隨身帶的東西雖然不多，但都是必需的，而缺少的很快就由法國兵士天賦的會想辦法的才能所補足。這個制度甚至在路易·波拿巴和聖阿爾諾集團的欺詐統治時期執行得也是無可非議的。而英軍呢！他們比自己的軍需倉庫還早到加利波利；他們比兵營所能容納的人數多3倍；對於他們的登陸沒有作任何準備，沒有行軍麵包房，沒有真正負責的管理機構。朝令夕改、出爾反爾的現象達到了最驚人的，或者更確切些說，最可笑的地步。上士或下士都很精通如何在卡弗爾的密林中或印度河赤熱的平原上找地方安置下來，而在这里，他們中却不只一個人感到自己是束手無策

的。任何别的军队的指挥官都能在行军中实行的各种改进，在这里却只能在当前行军中暂时采用；当各个团刚刚往各个方向散开时，过时的女王陛下的操典重又发生了效力，于是行军中获得的全部经验便都落空了。

这就是“铁公爵”以铁一样的顽固所坚持的声名显赫的制度，这种制度被宣布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因为他就是靠这种制度击溃了比利牛斯半岛上的拿破仑的将军们。英国兵士的确可以因自己光荣的“铁公爵”感到自豪，因为他赏赐给了他们种种恩惠：他们穿着勒得紧紧的皮制胸甲，在瘧疾发作时常常曳足而行，由于军需官们的玩忽职守和因循守旧而弄得给养不足，还要负着六、七十磅的东西在保加利亚草原上跋涉。

从公爵的僵硬不变的制度必然产生的可悲后果，由于英国政体的寡头性质而变得越发严重，在这种政体之下，最重要的职位都委派给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议会中的支持对现时掌权的升官发财主义者集团也许是需要的，但他们缺乏最起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就拿联合内阁的军械部秘书贝尔纳·奥斯本先生来说吧。任用贝尔纳·奥斯本先生是对梅费尔激进派¹⁴⁰的一个让步（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人物是威·摩耳斯沃思爵士，霍布斯的著作的“谦虚的”出版者）。贝尔纳·奥斯本先生

……喜欢拾人牙慧，
就像鸽子啄食青豆，
一碰到天赐的机会，
就要卖弄他的伶牙俐齿。
他是个智慧的碎贩，
宴会里，市集上，到处向人兜卖^①。

^①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第五幕第二场。——编者注

即使貝尔納·奧斯本先生以賣弄他的沒有意義的伶牙俐齒為生，但他未必能區別一般的火槍和米涅式步槍。然而，他卻是個女王陛下議會的軍械部秘書呢。

讀者也許還記得，不久前奧斯本請求議會給軍械部撥款，以便生產海陸軍需用的槍械。他說美國官辦工廠製造的武器比私營工廠的便宜，又說，在英國由於承包單位不能按時交出武器，在某些情況下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困難。

下院的表決終於擱下了，因為門茨先生建議委派一個專門的委員會來解決“關於探索一條最經濟、最迅速和最滿意的途徑使女王陛下軍隊的火器得到保證”的問題。這個委員會的報告現在已經公布了，好吧，看看委員會作出了些什麼結論。報告說，私營企業不能按時完成定貨，“是由於軍械部對制成的武器採取無謂的、吹毛求疵的驗收方式以及把武器許多零件分別交給不同承包單位製造的慣例”。報告接着說，“軍械部恐怕不了解美國製造武器的價格，同時也不知道那里採用機器生產已經到了什麼程度”，還說“在部里從未見有美國官辦工廠製造的武器”。

最後，我們從報告中得知，“政府打算興建的工廠，在今後一年半以內連一枝槍也生產不出來”。

從議會報告中所作的摘錄，足以評定聯合內閣專有的軍械部秘書奧斯本先生的業務能力了。Ex ungue leonem [根據爪子可以辨認獅子]。

弗·恩格斯寫於 1854 年 5 月 24 日

載於 1854 年 6 月 10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4102 號

署名：卡爾·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卡·馬克思
*奧地利—普魯士條約。
——五月二十九日的議會辯論

1854年5月30日星期二于倫敦

“泰晤士報”對於不列顛的將軍下令禁止“本報記者”隨不列顛軍隊採訪，感到非常憤慨。如果這次戰爭是 *bona fide* [認真進行的] 戰爭，那末反對這種措施就是愚蠢的了。威靈頓公爵早就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報告中埋怨過，拿破侖可以把從英國報紙上看到的關於他威靈頓的軍隊預計的調動和部署的情報寄給法國在西班牙的將軍。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這種命令只能有一個目的，就是使英國社會對遠征軍的背叛陰謀茫無所知。蘇丹在十二月二日的英雄們的壓力下所頒布的並已在各個清真寺宣讀的一道禁止土耳其人談論任何政治的命令可以作為英國將軍的那道命令的很好的補充。而實際上，為什麼土耳其人在這方面的情況會比英國人好一些呢？

在昨天下院的會議上，布萊克特先生問約·羅素勳爵，在最近的維也納議定書¹⁴¹上，大不列顛有沒有對1854年4月20日的奧普條約第一條作了什麼承認或同意。這一條規定締約國

“相互保障它們對德意志和非德意志的領土的占有，因此，對這兩個國家中的一國的領土的任何進攻，不管這種進攻來自何處，都將被看成是對另一

个国家的领土的进攻”。

約翰·罗素勋爵回答說：“在議定书中没有什么**专门**承认或同意奥普条約的这个第一条的地方。”不管是专门的承认或者不是专门的承认，而我們在昨天法国的“通报”上讀到，

“最近的維也納議定书把英法进行目前战争的协定同奥普防备战争的条約联結在一起了”，

也就是說，把目前英法同俄国的战争与可能发生的奥普维护俄国的战争联結在一起了，总之，这个議定书是西方强国对普魯士和奥地利不受侵犯地占有波茲南、加里西亚、匈牙利和意大利的保证。約翰·罗素勋爵接着还承认，这个議定书

“有巩固和保持各次維也納議定书里的基础——土耳其帝国的完整和俄軍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趋向”。

实际上这意味着保持 *status quo ante bellum* [战前状态] 的新的义务。西方强国不能夸口說，有了这个議定书，他們就取得了对俄国的某种优势。因为奥普条約明确地規定：

“可能引起两个締約国采取进攻或防御行动的，第一是多瑙河各公国并入俄国，第二是俄国进攻巴尔干或越过巴尔干。”

这两个条件显然是俄国自己迫使奥普两国接受的。俄国一开始就表示过，它根本不打算并吞多瑙河各公国；它只想保持住它們作为滿足它的要求的“物质保证”。面对 8 万法軍而越过巴尔干——俄国的作战計劃中从来没有这种打算；俄国的計劃的唯一目的不过是保证自己的軍队在多瑙河右側有几个要塞作为 *têtes-de-pont* [桥头堡]，以便經常有可能侵入保加利亚。我們 *en passant* [順便] 指出，“泰晤士报”在提到这个新的議定书的时候，滿希望西方强国也許促成奥地利站到自己方面来，因为普魯士現在

“分明”受着“俄国代理人”的操纵，而“紀事晨报”甚至对于奥地利有多少誠意表示絕望。如果是大拿破侖，就会迫使奥地利和普魯士同俄国結成公开的联盟；而小拿破侖則让俄国强迫他同德意志各国訂立一个使他的軍队尽可能远地离开軍事行动区的联盟。

約翰·罗素勋爵在回答米耳恩斯先生的质詢时說：

“法国已經命令大約 6 000 人的軍队去占領比里尤斯；上周离开英国的英国步兵团同样是派去占領比里尤斯的。”

这个措施是由于希腊政府同俄国的勾結造成的。軍队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应当占領雅典。我們在今天法国的報紙上讀到：

“奥托国王接受了最后通牒，并且答应只要撤退，就使馬夫罗科尔达托內閣回来。否則，他决定把自己政府所在地迁往內地，并把自己的軍队集中到那里去。”

这种抉擇并不是一句空話，这从約翰·罗素勋爵下面这段話里可以看出。

“如果希腊国王不贊同本国人民的要違反中立国义务的尝试，那他就会从派去的軍队那里得到保卫和迫使人民履行这种义务的手段。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从希腊政府那里得到的庄严的保证是不真誠的，那末，这些軍队就会用別的办法带来利益。”

由此可見，不管希腊政府怎样做，希腊总是要被占領。

“泰晤士报”有点气忿地报道說：

“目前羅馬、雅典和君士坦丁堡这三个古代世界的偉大首都的守备部队大部分都是法軍。”

老拿破侖习惯于占領現代世界的首都。而小拿破侖則满足于舞台式的大場面，把自己的軍队分散到一些小国里，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軍队赶到 *culs de sac*〔死胡同，偏僻地方〕。

昨天在議院的晚間會議上，收回关于防止賄买选民的法案引起了小約翰、迪斯累里和布萊特三人一場非常滑稽可笑的爭吵。迪斯累里先生指出：

“政府在會議期間提出了七項重要的法案。有三項法案在討論時，政府遭到了失敗；有三項法案政府收回去了，而在討論第七項法案時，政府遭到了雖然不是完全的，却是相當大的失敗。在关于根本修改强迫貧民迁返原居住地法令的法案、关于苏格兰国民教育的法案和关于全部修改議會誓詞的法案上，政府都遭到了失敗。政府收回了現在这个关于防止賄买选民的法案，收回了一項十分重要的关于完全改变文职的法律草案；收回了議會改革的草案。牛津大学改革法案被議院通过以后，一定会面目全非。”

如果政府对于通过这些法案並沒有什么希望，那就不該把它們提出来……有人說，現在的政府沒有原則，而有“群賢”，并且可以指望，既然每个大臣都牺牲了自己个人的信念，那末这种英雄主义至少会給国家带来某种好处。

約翰勳爵的憤怒並沒有使他的回答增加什么力量。他把被否決的和已經收回的法案的优点过分頌揚了一番。他补充說，不管怎样，議院並沒有站到迪斯累里先生及其朋友那一边。迪斯累里先生指責政府在执行对外政策中不是輕信就是姑息，但他从来也不敢詢問議院在这个問題上的意見。他装出不願妨碍政府备战的样子；然而他还是提出一項使政府沒有进行战争的手段的提案。這項提案被一百多票的多数否決了。对于犹太人权利的法案（迪斯累里先生扮成一个捍卫犹太人的权利的人），迪斯累里先生的态度是看情况而变化的。

这个回答使可怜的下院領袖遭到了他的政敌的新的比第一次更为猛烈的攻击。

迪斯累里先生說：“好像高貴的勳爵認為，他沒下台我會感到驚奇。恰好相反，如果他這樣做了我倒會感到異常驚奇。（哄然大笑）如果可能的話，還需要遭到許多次新的更不光彩的、更徹底的失敗，高貴的勳爵才會感到有必要走這一步。（掌聲）我對高貴的勳爵太了解了。在他執政的時候，我充當反對派的時間太久了。我看到他處於這種狀況的時候太多了。我曾多次看到他在遭到極其重大的失敗以後，仍然懷着他那令人不勝欽佩的愛國精神和堅定態度執掌政權。（掌聲和笑聲）關於戰爭，政府曾向議會表示，一定把有關這個問題的一切文件擺到桌上來。然而實際上，政府把其中最重要的文件隱瞞起來，如果不是‘聖彼得堡報’的揭露，全國就會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經過這些揭露之後，他迪斯累里不得不改變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說，已經不容作任何假設，而干脆必須說，政府只可能是犯了輕信或者姑息的罪過。他相信，不久這一點就會成為全國普遍的看法。”

然後，迪斯累里先生開始為得比勳爵的政府辯護並證明當時約翰勳爵所持的反對立場是“叛逆性的”。約翰勳爵作了很大的犧牲：

“他為了緊緊擁抱着一向否認他的才能、公開斥責他的活動的那些老仇敵，離開了他一生中忠實於他的同志。他辜負了信任，——我可以這樣說，——他幾乎使這樣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政黨的存在處在危險之中，而這個政黨的信任對於像高貴的勳爵這樣一個人來說，應當是同女王的寵愛一樣可貴。（掌聲）而他為什麼這樣做呢？因為他過去忠實於偉大的原則，滿懷實行偉大措施的決心。但是現在，他的措施一個一個地破產了，他仍然執掌着政權。至於自己在猶太人問題上的行動，迪斯累里明確地、斷然地表示反對高貴的勳爵所作的論斷。”

、其實在迪斯累里發言以後，約翰·羅素勳爵除了談到自己的“失敗”並把聯合的繼續描繪成一種不可避免的壞事以外，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布萊特先生表示了這樣的看法：

“高貴的勳爵在辯論中蒙受了不小的損失。由於政府本身的成分，從它

組成的第一天起就很清楚，它不可能為國家謀福利。他想起了下院的一位很機智的紳士，高貴的勳爵的和整個政府的好朋友曾說過，內閣如果能不管政治，就會取得出色的成績。政府過去所採取的也大致是這樣的方針。除了自由貿易以外，在任何問題上，政府既不能向議院提出建議，指導議院，也不能控制議院。十分明顯，人們客氣地稱之為下院領袖的這位高貴的勳爵，實際上並不領導議院，議院也不跟着高貴的勳爵走，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最不客氣地被否決。你把我拉進戰爭中去，就應當把我從戰爭中引出來。我們不願意承擔責任。這就是政府給我們造成的處境。政府在破壞和摧毀土耳其的國家制度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壞和摧毀了我們的議會制度。”

請問：這種制度為什麼要存在呢？內政問題不能提，因為國家處於戰爭狀態。但是，因為國家處在戰爭狀態，軍事問題也不能涉及。那末還保存議會干什么呢？老科貝特揭穿了這個秘密：作為對付國內沸騰着的激烈情緒的安全閥。

卡·馬克思寫於 1854 年 5 月 30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4 年 6 月 12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4103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卡·馬克思
*英国特別的陆軍部的成立。
——多瑙河上的軍事行动。
——經濟状况

1854年6月2日星期五于倫敦

成立特別的陆軍部的决定已获通过，現在的問題全部在于誰被选来担任大臣了。至今一直身兼殖民大臣和軍务大臣两职的紐卡斯尔公爵，早就表示很不願意放棄其中任何一个职位；而且根据“紀事晨报”的口气来看，他打算无论如何要繼續主掌陆軍部。今天的“泰晤士报”第三次建議任命帕麦斯頓勋爵。

“由帕麦斯頓勋爵担任陆軍大臣来领导国家武装力量反对我們可以称之为他的宿敌的俄国，当然要比他同教区會議和排除污水委员会爭吵不休更为合适。”

“每日新聞”也推荐了帕麦斯頓勋爵。在昨天的“先驅晨报”¹⁴²上，登載了一篇烏尔卡尔特先生揭露这整个阴谋的文章。不管怎样，对“战争”說来，唐宁街的这些事件比在加利波利和斯庫塔里的历次軍事示威有更大的意义。

也許你們还記得，有人曾企图使公众产生一种希望，以为远征軍司令官們一到君士坦丁堡就会立即采取紧急的和坚决的措施。

5月18日，圣阿尔諾元帅、腊格倫勳爵和土耳其陸軍大臣到瓦尔那，5月20日要在那里同奧美尔-帕沙和海軍將領舉行軍事會議。昨天倫敦收到一份電訊，說“在瓦尔那軍事會議上，決定把聯軍从加利波利調往阿德里安堡”。同時“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其中敘述了整個作戰計劃，並報道了關於瓦尔那會議的消息。

“泰晤士報”說：“這次會議顯然是當俄軍在帕斯凱維奇指揮下對錫利斯特里亞要塞發動猛攻的時候舉行的，因此，聯軍的高級軍官們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決定關於支援這個要塞所必需採取的措施的問題。”

正因为如此，他們命令部隊从加利波利开往阿德里安堡去援助錫利斯特里亞；正因为如此，他們作出了下面这个英勇的决定：

“假若仅仅为了击退俄軍对那些保卫多瑙河右岸的要塞的进攻而使土耳其軍隊冒一場總會戰的危險是不适当的……同樣地，把聯軍的相當一部分軍隊調到沿岸地區去立即同俄國前哨發生衝突也是不适当的。”

換句話說，聯軍的將軍們已經決定：絕不阻止俄軍奪取多瑙河右岸各要塞的堅決企圖。“泰晤士報”承認，這種軍事計劃“會使那些自然感到不耐煩的公眾失望”；但是另一方面，該報又發現“這些築壘要點實際上不過是土耳其的外圍工事，決不是它的主力所在”。以前，我們聽說過，莫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只是土耳其的外圍工事，土耳其把它們讓給俄軍不見得就會蒙受巨大的損失。現在我們又聽說，土耳其也可以放心地把保加利亞讓給俄軍。

“巴爾干才是奧斯曼帝國的真正堡壘，如果俄軍在繼續前進中不斷遇到可怕得多的新障礙，那末他們付出沉重的犧牲去占領外綫工事是不會得到什麼好處的。他們在巴爾干以北地區越向前推進，他們的處境就越糟糕……入侵的軍隊會在攻擊多瑙河沿岸的築壘要點和敵人的分散部隊的過程中耗盡自己的力量；而與此同時，保衛敵人的主要陣地的部隊仍然是比較精力充沛而完整無損的。”

毫无疑问，只要吃牛肉长胖的^①联军能够避免同敌人相遇，他们的部队就会是精力十分充沛的。但是，如果俄军在巴尔干以北地区不再前进，而满足于占领这些作为通往保加利亚的咽喉的要塞和多瑙河各公国，那又怎样呢？那时又怎样使它们从这些地区撤退呢？

“在巴尔干防线后的欧洲军队，正准备在适当时机以不可遏止的力量转入进攻，这样，这次战局的最后几个月就会把敌人消灭。”

这种不可遏止的进攻，由于多瑙河要塞都落在俄军的手中，当然是异常轻松的，而联军所不能做到的事情，阴雨季节将会毫不费力地办到。

诚然，“通报”报道说，奥美尔-帕沙正准备援助锡利斯特里亚。可是“纪事晨报”对刚才引证的那篇“泰晤士报”的文章感到不满，它指出：

“制定这个计划的人，看来是希望当时奥地利的外交在满足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而不断取得的胜利之后，就促使沙皇把自己的军队撤回去；另一方面，大概人们在指望，一旦俄国人在巴尔干继续前进，奥普条约所规定的遥远的可能性将会得到实现。”

但是，大家知道，“通报”把自己的新闻这样报道出来，是想使巴黎人保持良好的情绪；而“纪事报”评论“泰晤士报”的计划时所用的方式，只是更加证实了这样的推测：这也是联合内阁的计划。另外一些消息也证实了这种推测。“纪事报”驻君士坦丁堡记者在5月18日的报道中指出：

“多瑙河在盛夏不见得会有什么战局，因为这时候由于患热病和其他疾病而死的人会比由于其他原因而死的人更多。”

^① 原文是：«beef-eating»——讽刺英国近卫军的称呼。——编者注

此外，內閣的報紙“地球報”¹⁴³昨晚也刊登了一篇同“泰晤士報”的那篇文章的精神完全一樣的文章。“地球報”報道說，第一，目前在土耳其的聯軍“只有”45 000 人——29 000 名法軍和 16 000 名英軍；在下一欄接着說，第二，俄軍在錫利斯特里亞附近只有 9 萬人，而土耳其的作戰部隊達 104 000 人。但是“地球報”還是認為這個將近 15 萬人之多的土耳其、法國和英國的軍隊總數，不足以阻止 9 萬俄軍占領保加利亞的要塞，更不必說 3 支強大的艦隊所能給予聯軍的那種援助。“地球報”認為土軍或聯軍同俄軍作任何鬥爭都是多餘的，因為“季節將同他們作對”。“地球報”在敘述聯軍司令官們搞出來的作戰計劃時，比“泰晤士報”更進了一步，它說：

“不管多瑙河各要塞的命運如何，必須集中適當力量，使侵略者不能繼續推進，並使它因冒失進攻而受到懲罰。”

這裡清楚地向我們證明，英法在最近的維也納議定書上同意了奧普條約。他們決定把多瑙河各要塞和保加利亞讓給俄國，只有俄國繼續推進才能成為進行戰爭的理由。

在最初 15 000 名俄軍渡過普魯特河侵入莫爾達維亞的時候，人們勸土耳其按兵不動，據說是因為土耳其反正不能阻止這個 15 000 人的非常厲害的力量把瓦拉幾亞也占領去。後來俄軍果然占領了瓦拉幾亞。當土耳其政府宣戰的時候，已經不能同俄軍進行任何戰役，因為已經冬天了。春天到來以後，奧美爾-帕沙却奉命不得發動任何攻勢，因為聯軍還沒有到來。他們到來以後，已經什麼也不能做了，因為夏天已經到來，而夏天是一個對健康不利的季節。等到秋天到來，而那時又會發現，“要開始作戰已經太晚了”。這種方法，“泰晤士報”稱之為戰略和戰術的配合；顯然，這家

报纸认为战术的实质，是牺牲军队以保存“精神充沛的”后备力量。同时请你们注意，自从这种欺骗行为公开地在反对派报纸面前和英国广大公众面前进行以来，“晨报”和“泰晤士报”就一直竞相攻击普鲁士、丹麦和瑞典没有同西方强国“联合起来”！至于所有小国为什么都倒向俄国方面，这不是没有非常重大的根据的，——比如从丹麦政府报纸的口气里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纪事晨报”驻哥本哈根记者写道：

“内阁执政党用来对民族派进行严厉控制的那种威胁在于：英国对丹麦一直是背信弃义的；如果丹麦同西方强国联合起来，那末 10 万普鲁士军队，也许还要加上奥地利一个军，就会把日德兰半岛直到埃德尔河洗劫一空并把丹麦全部领土占领。”

联合内阁可能期待并且一定在期待，由于自己曾经客客气气地为俄国“正义事业”效过劳（在外交、军事和其他方面），它会看到专制君主多少表示一点客客气气的谢意。但是一点也没有；联合内阁从专制君主那里挨揍的次数比实际上应该挨的还要多。为了说明俄国宫廷对自己假想的敌人抱怎样一种高傲的蔑视态度，我把不久前在“北方蜜蜂”上发表的一篇匿名的俄国梯尔泰的寓言给你们译出来。寓言的语言和结构之所以简单浅显，是因为诗人是给那些不大开化的人写的，这正像“圣彼得堡报”之所以用一种讽刺的委婉口吻批评了安梅林海军上将最近关于敖德萨的报告，是因为这家报纸在这里是对欧洲外交家写的。寓言的标题是：“山鹰、叭喇狗、公鸡和兔子”。内容如下：

一只又大又壮的雄健的山鹰，站在山岩之巅，环视着波罗的海彼岸的整个世界（Weit hinter in Belt die ganze Welt）；它就这样安安静静地站着，满足于自己那点微薄的饮食，也不想到下面山谷中去猎取食物，因为它随时都可以取得一切东西。叭喇狗嫉妒地望了山鹰一眼，就对公鸡说：“作我

的伙伴吧，让咱们联合起来——你是为了报仇，我是出于嫉妒——把这只山鹰扔下去。”說干就干。它們开始了。一路上它們談到怎样打倒山鹰最好，公鸡說：“停一停！你瞧它的脚爪，瞧瞧它的翅膀——誰要想試試它們的力气，誰就倒霉；我不只一次听到我的前輩一想起山鹰的翅膀給他們的打击，就在詛咒。”叭喇狗說：“这是真的，但是咱们要用巧計来捉山鹰。咱们暗中派兔子走近它。它一定会抓住兔子，这时，你就使出你十分擅长的又叫又跳的本領来轉移它的注意，并且装出你想参加进去打架的样子。当咱们这样把它的注意力引开并把它的爪子纏住的时候，我就从后面向它进攻，这样一来，它就沒法防卫，只要几分钟它就会被我鋒利的牙齿咬个稀烂。”这个計划很合公鸡的意，它就在附近担任起了望哨来了。叭喇狗跑进树林，大声狂吠，把兔子朝着正在安靜地等着的山鹰跟前赶去。兔子吓掉了魂，拚命冲向山鹰爪下。忠实于簽訂的协定的公鸡叫了起来，跟着兔子飞跑，但是——真可怕！山鹰原地不动，只是振一振翅膀，看也不看兔子，就把它攆开，然后抓住公鸡，公鸡頓時一动不动，也不叫了。大家都知道兔子爱跑；这时它失魂落魄地跑，一直跑到海里，然后咽了气。山鹰看見肥肥的叭喇狗在远处搞鬼——有什么能够逃过山鹰的眼睛呢？山鹰发现了这位藏在灌木丛后面的英雄。它展开了强壮的翅膀，雄健地騰空而起。叭喇狗汪汪地叫，竭力想溜走。可是白費勁，已經晚了。山鹰从空中直向它扑下来，把利爪扎进了叛徒的背部，于是叭喇狗倒下了，并被撕成了碎片。

由于丰收在望，又因为沒有投机倒把，上周粮价略有下跌。然而回升是必然的，因为，“根据与此有关的一切材料看来，应该认为农民的儲备比常年这个时候少得多”（“粮食交易所快报”）。但澤、施特廷和罗斯托克等地的消息都一致证明，現有儲备很少，郊区农民沒有什么或者几乎沒有什么可卖的了，只有用高价才能指望从这些地区运来一些粮食。从法国运来的谷物，大概也沒有增加，而国内市場上的小麦的供应，未必能够滿足要求。

我还从私人的消息中听說，“泰晤士报”关于曼彻斯特周圍工厂区的工业状况的报告总的說来是不符合实际的，除了北明翰以

外到处都是营业不振。“曼彻斯特卫报”¹⁴⁴证实了这一点，还补充说，有那么多数量的罢工工人复工，一定会使价格下跌。

至于詹·格莱安爵士上星期一在下院会议上发表的声明，即关于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不予封锁的声明，“先驱晨报”用下面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来评论它：“财政大臣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有一所房子。”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6月2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4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05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馬克思
*英国軍事部門的改組。
——奧地利的要求。——英国的
經濟狀況。——圣阿尔諾

1854年6月9日星期五于倫敦

科苏特在設菲尔德的演說是他在居留英国的整个期間发表的历次演說中最有內容的一次；然而不能不指出这次演說的缺点。其中离开本題追溯历史的地方有一部分是不确切的。例如，认为土耳其的衰落开始于薩比斯基援助奥地利首都¹⁴⁵，这是絕對沒有任何根据的。哈麦尔的研究¹⁴⁶无可辯駁地证明，土耳其帝国这一組織当时已經处在瓦解状态，并且在这以前的一段时期，奥斯曼的时代就已經快要告終了。說拿破侖放棄从海上进攻俄国的念头，不是因为他沒有舰队以及英国人使他失去了海洋上的霸权，而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这种論点也是錯誤的。威胁說，如果英国同奥地利联盟，匈牙利就会同俄国联盟，这是非常輕率的。第一，这給政府的报纸提供了武器，而“泰晤士报”也就广泛地利用这个武器，把所有的革命者都“斥”为俄国代理人。第二，他說出这种話，听起来是很奇怪的，因为他的政府早在1849年就表示可以把匈牙利王位让給俄国皇太子。最后，他无法否认，他的这个威胁，不管是

他倡导的还是別人倡导的,如果一旦变成现实,那就是对馬扎尔民族的存在宣判了死刑,因为匈牙利的很大一部分居民是斯拉夫人。把同俄国的战争說成是自由同专制的战争同样是錯誤的。且不說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就会成为自由的代表人物,就以公开宣布战争目的是保持强国均势和維也納条約(正好是那些消灭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条約)这个事实來說,也是同科苏特的論断相矛盾的。

烏尔卡尔特先生在北明翰发表的演說,也比平常强烈,他在演說中又一次指責联合內閣背叛。但是,这个寡头政体的联合內閣是建立在腐烂透頂的議會基础上的,既然烏尔卡尔特先生同那个唯一能消灭这个基础的政党有根本分歧,那末他所有的演說就像对老天讲的一样,很少能达到目的。

約翰·罗素勋爵昨天晚上在下院宣布即将成立一个特別的陸軍部,但是这个部不应把現在各軍事部門所屬单位合并进去,只是在名义上对所有这些单位进行监督。这一变更的唯一优点就是多設了一个大臣职位。至于新的任命,昨天“晨邮报”报道說,皮尔派¹⁴⁷在內閣占了上風,紐卡斯尔公爵将任新的軍务大臣,而殖民地則交給約翰·罗素勋爵来管。昨晚出版的“地球报”证实了这个消息,并且补充說,由于約翰勋爵很可能表示拒絕,殖民大臣一职将由乔治·格雷爵士担任。当皮尔派的报纸繼續装模作样,好像不知道最后决定的时候,帕麦斯顿的报纸今天证实說,紐卡斯尔公爵和乔治·格雷爵士已經得到了任命。

“晨邮报”就奥地利的“絕对要求”写道:

“我們有根据认为,俄国不会以沉默来迴避奥地利的要求,不会加以拒絕,所以,如果我們不久知道,俄国准备在奥地利为了进行談判而采取步驟来簽訂停战协定的条件下,接受奥地利关于从土耳其領土完全撤退的建議,我

們是不会感到惊異的。”

今天的“紀事晨报”也承认，“这个要求可能具有极大的意义”。但該报仍然补充說，不应把这个要求看成是最后通牒，这个要求是用通常的客气的口吻提出的，而且只有在俄国完全不理睬这个要求的时候才会决裂。如果俄国作出模稜两可的回答或者作出局部的让步，那末新的建議和談判就会随之而来。

我們暫且假定“晨邮报”的推測是正确的，并且是可以实现的：显然，奥地利的效劳只能保证再訂立一个对俄国有利的停战协定。很可能有某种类似的考虑，而且作这种考虑的根据是錫利斯特里亚那时将会陷落，“沙皇的光荣和尊严”将会得到保持。然而，如果錫利斯特里亚守住了，土耳其人的英勇终于使联军違背自己的司令官和政府的願望而采取了軍事行动，那整个計劃就会破产。

如果說有什么东西能够粉飾一下这场大战中无穷无尽的疏忽和失策的无聊場面，那就是英国公众和报刊在估計西方强国和德意志强国建立联盟的现实性和利益时所表現的那种可笑的躊躇不决的态度。奥地利为了使大家都滿意剛剛提出了自己的“絕對要求”，奥地利君主和普魯士君主会見的消息又立即引起了大家惊惶不安，这次会見，用“泰晤士报”的話來說，“对西方强国不是什么好的預兆”。

貿易部上月的統計数字已經公布。这些数字不如前几个月那样好。輸出的申报价值比 1853 年同期减少了 747 527 英鎊。同曼彻斯特市場有关的各項輸出，情况最为不妙；而且亚麻紡織业、毛紡織业、絲紡織业也都有了减少。

从北明翰的斯特治先生等出版的这一期每月簡訊中，我們得知小麦生长情况不好，簡訊中关于这一点是这样报道的：

“因为种子价格高，每一英亩土地播下的种子也就比常年少，而因为播种所用的去年的小麦质量差，今年的收成看来不如假設去年收成較好时今年可能达到的收成那样好。”

“粮食交易所快报”談到这个消息时指出：

“这种推論我們觉得是非常可能并且值得注意的，因为质量坏的种子未必能长出在比較好的条件下可能长出那种茁壮的苗来。人們将特別关心庄稼的生长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由于1853年严重歉收，不但在英国而且几乎在世界各大洲，粮食儲备都少到了极点。今后粮价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天气而定；現在麦价太高，不足以刺激投机，虽然，今后3个月从国外輸入的粮食非常可能比过去少得多，但是，如果不发生任何使即将到来的收成前景更为不好的情况，那末囤积剩余粮食的人就将設法尽快把这些粮食脫手，而磨坊主等則将采取观望政策……同时应当注意，全国都感到粮食缺乏。”

現在你無論在倫敦哪条街上走，都会看見一群人站在那里看爱国画，上面画着几个有趣的人物：“文明的三个救星”，即苏丹、波拿巴、維多利亞。为了使你們能够充分认清那些在已經“拯救社会”以后現在又被托付拯救文明的人們是些什么人物，現在我把关于最高統帅圣阿尔諾元帅的特写繼續下去¹⁴⁸。

著名的七月的日子¹⁴⁹把雅克·勒卢阿（原名）即雅克·阿希尔·勒卢阿·德·圣阿尔諾（現名）从他的債权人的爪子下救了出來。于是在他面前出現了一个困难問題：他应当怎样利用当时法国社会由于旧制度突然崩潰而造成的十分混乱的环境。阿希尔沒有参加三日战斗；他連冒充参加也不可能，因为大家都非常清楚，在这些值得紀念的日子里，他被关在圣珀拉惹牢房里。因此，他不能够仿效当时其他許多冒險家，冒称自己是七月战士之一而要求某种奖賞。另一方面，**资产階級制度的成功**看来也絲毫不能有利于这个巴黎名士派的渣滓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一直盲目地信仰正

統主义，根本沒有参加过“自助者天助之”会（他这个沒有先見之明的缺陷因他成为十二月十日会最早的會員之一而得到弥补）¹⁵⁰，沒有在偉大的“十五年的喜剧”中扮演过任何角色。然而，阿希尔还是从他旧日的老师厄·德·普先生那里学会了一点作即兴詩的本事。他大胆地来到陸軍部，声明自己是复辟时期出于政治动机而退职的尉官。至于他被赶出 Gardes du corps〔国王近卫軍〕，被科西嘉軍团开除，以及离开了开赴殖民地的第五十一团等情节，他都很容易地把它們变成他的奔放的爱国热情和受到波旁王朝迫害的证明。誠然，履历表证明他的話是假的，但是陸軍部却装出一副相信他的样子。当时許許多多軍官不願向路易-菲力浦宣誓而紛紛退职，以致有許多缺額需要补充，因此，篡夺者的政府很乐意接收任何一个公开背棄正統主义的人，而不管他們轉过来的动机是什么。于是阿希尔就被派到第六十四常备团，但并不是沒有受委曲：他复职后仍然是尉官，沒有像其他在复辟时期退职的軍官那样得到提升。

岁月和他原来的軍銜終於使他得到了中尉头衔。同时他还得到了一个表現他那种奴顏婢膝的变节者的特殊才能的机会。1832年，他的团队駐扎在帕特訥，即正統主义者在万第省举行暴动的中心。他同聚集在貝里公爵夫人周圍的一些前 Gardes du corps 的旧关系，使他有可能把軍人的职责同警探的职责結合起来，这种結合同他在倫敦賭場和巴黎 cafés borgnes〔下流地方〕成熟起来的天才非常相适。貝里公爵夫人被犹太人多伊茨出卖給梯也尔先生而在南特被捕了。于是阿希尔奉派把她押解到布累，他应当在毕若將軍指揮下在那里担任看管她的獄吏之一。他热切希望不放过公开表明自己对保卫王朝利益极度热心的机会，但做得太过火

了，他对警察局的那种卑鄙的巴結和对公爵夫人的粗暴态度，連毕若都感到厌恶。但是毕若无权解除这个副官的职务，因为他是警察局专门派来看管公爵夫人的，他直接受警察局长若利先生的领导，而且归根到底主要是听命于内务部，而不是听命于陆军部。未来的英法联军最高統帅当了接生婆，因为他的特殊使命是用证人的证詞来确定并证明公爵夫人已經怀孕，怀孕的被揭发使旧制度的拥护者遭到了致命打击。由于这样一种品质，圣阿尔諾先生的名字第一次在“通报”上被提到了。我們在 1833 年 5 月的“通报”上讀到：

“阿希尔·德·圣阿尔諾先生，今年 34 岁，通常住在巴黎，是毕若將軍的副官，他接到了一項命令，要他根据自己的正式地位签署一項证明公爵夫人于 1833 年 5 月 10 日在獄中生了一个孩子的文件。”

好巴結的圣阿尔諾以后仍然忠于自己的獄吏职务，并乘輕巡航舰押解公爵夫人到巴勒摩。

阿希尔一回到法国，就成了全团取笑的对象和替罪羊。他受到軍官們的仇視，被开除出他們的 réunions [俱乐部]，他为人們公开对他表示的极端輕蔑的态度所苦恼，遭到全团的唾棄，他終于不得不到当时正好在貝多上校领导下在巴黎組成的阿尔及利亚外籍軍团里去避难。这个外籍軍团完全可以叫做欧洲軍十二月十日会。坏透了的暴徒、負債累累的冒險家、各国的逃兵、欧洲軍队所有的渣滓組成了这支 Corps d'élite [精銳部队] 的核心，这支軍队完全有資格取名为 refugium peccatorum [罪犯的避难所]。阿希尔的天才不論在什么地方都沒有像在这种軍队的圈子里那样發揮得充分，这种軍队的正式使命防止了警察局的毒牙的侵害，而这种軍队的成員的道德面貌消除了通常限制着正規軍軍官的种种路障。

但是，在各方面都很揮霍的阿希尔，对于证明自己在軍事上的勇敢和才能却很吝嗇，所以他在外籍軍团第一营中尉这个不大的軍銜上繼續混了4年，一直到1837年8月15日新的委任状才給他一个上尉的軍銜。非常可惜的是，法国軍隊的行軍金庫是由上尉監督的，上尉負有发放兵士薪餉和供应粮食的責任。但是金庫正是我們現在的阿希尔所特別垂涎的。所以，在他被提升以后不过几个月，他屬下的金庫就出現了惊人的亏空。視察的將軍德·呂利埃尔先生发现了这种盜用公款的行为，坚持要懲办上尉。給部里的报告已經写好了，眼看就要付邮，德·圣阿尔諾先生眼看就要永远完蛋了，而这时他的长官貝多先生被自己部下的絕望处境感动了，他出来过問这件事，并且使得呂利埃尔將軍的怒气平息下去了。

圣阿尔諾有一种他所特有的报恩方式。他在 coup d'état¹⁵¹ 的前夕被任命为陸軍大臣以后，便下令逮捕貝多將軍并把呂利埃尔將軍从軍官团的名册中除名。呂利埃尔給他写了下面这封信，这封信曾給巴黎的朋友們看过，并在比利时的报上登載出来：

“1837年，呂利埃尔將軍不想使勒卢阿·德·圣阿尔諾上尉名譽扫地，所以沒有剝夺他的軍职。1851年，陸軍大臣勒卢阿·德·圣阿尔諾虽然不能敗坏呂利埃尔將軍的名譽，但是剝夺了他的軍职。”

卡·馬克思写于1854年6月9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4年6月24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4114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弗·恩格斯

对錫利斯特里亚的圍攻

前一个时期尽是一些不值得評論的軍事行动，因为采取这些軍事行动与其說是出于战略战术上的考虑，不如說是出于外交和議会方面的考虑；經過了这段时期以后，终于出現了对錫利斯特里亚的圍攻和强攻这样一个有軍事意义的行动。

这次强攻表明：俄軍繼續握有主动权，并且到目前为止，土軍、联軍陆軍和舰队的行动仍为俄軍的行动左右。联軍舰队本能地、不由自主地被塞瓦斯托波尔可靠的掩蔽地点內的俄国舰队吸引；由于沒有陆軍的帮助就不能攻击这个要塞，結果这支舰队就被在船只数量和质量上都差得多的舰队牵制住而不能自由行动。甚至高加索沿岸堡垒的守軍在英法舰队眼前及时撤退，也表明俄軍决心尽可能长久地掌握主动权。在战争中能做到这一点已經很不錯了。能掌握主动权，就证明軍队或者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或者在指揮艺术上具有优势，而且在一切失利和退却的情况下，除了决战失敗以外，这也可以維持士气。正是这种主动权，既把威灵頓那支被数十万法軍包圍在西班牙的小小的軍队团结起来，又使它在历时 5 年的战争中成为一切事件的中心。你可能被迫退却，你可能被击败，但是只要你能够左右敌人的行动，而不是听任敌人摆布，你就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占有优势。而更重要的是，你的每个兵

士和整个军队都将感到自己比对方高出一筹。此外，对锡利斯特里亚的攻击是俄军从完成多瑙河口的占领以来第一次真正的进攻行动。开入多布鲁甲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御，这既是为了缩短战线，同时也是攻占多瑙河口的一个步骤。而对锡利斯特里亚的攻击，则不仅是大胆的行动，而且是估计得极为正确的行动。

在1828—1829年，当时统治着黑海的俄国人由于要首先攻占瓦尔那而没有重视锡利斯特里亚，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攻占瓦尔那就开辟了一条通往俄国本土的新的海上交通线。尽管如此，锡利斯特里亚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地点，他们在越过巴尔干之前，仍然必须先夺取它。但是在目前联军舰队统治着黑海的时候，瓦尔那对俄国人来说就大大失去了它的意义，而锡利斯特里亚和苏姆拉成了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现在瓦尔那对于俄军仅具有间接的重要性，因为夺取它以后，他们并不能得到一个广阔的作战基地，只不过使敌人丧失一个可以称做海岸桥头堡的阵地；在这个桥头堡的掩护下，敌人也许会利用舰船突然集中相当数量的军队来进行某种行动。例如，丹麦人在1849年把普鲁士军队诱到日德兰半岛以后，突然把一支强大的部队海运到弗雷德里西亚附近的海岸桥头堡，仅以一次出击就消灭了在要塞前面准备进行围攻的、优秀的但薄弱得多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一支部队。因此，如果说退出了黑海的俄军不占领瓦尔那就决不能穿过巴尔干的话，那末他们至少不占领锡利斯特里亚就不能进攻瓦尔那。

但是在目前看来，这些推断都是次要的。没有奥地利的帮助，俄国休想在现代的敌人的眼前穿过巴尔干。现在锡利斯特里亚对于俄军具有头等的防御意义，并且意义如此重大，以致不夺取它，俄军就可以认为今年的战局失败了。锡利斯特里亚的位置正对着

俄軍从茹尔日沃經卡拉腊什和切納沃达到居斯坦杰的陣地的中心。既然在这一陣地的前面有坚强的要塞体系,既然奥美尔-帕沙坐鎮苏姆拉像蜘蛛在它的网里監視着猎取对象的每一个动作一样,既然在卡姆契克河和迭夫年斯卡河可能出现联軍,那末,俄国用于多瑙河战争的軍队在无外援的情况下将很少可能向色雷斯盆地突进(这个盆地的青翠景色曾經誘惑过越过巴尔干山的吉比奇的疲乏的兵士)。俄国在奥地利沒有同它联合以前,或者在它的最厉害的敌人——英法軍队沒有因某种情况而遭到削弱或被迫撤走以前,至少在今年只能单纯防守它目前已夺得的領土。防御战需要有野战防御工事体系或者(在可能时)永备防御工事体系。但是只要錫利斯特里亚仍在敌人手中,俄軍除开多布魯甲的一些小型堡垒便沒有任何永备工事,并且这些小型堡垒在瓦拉几亚失守时就会毫无用处。俄軍可能修复布来洛夫和魯舒克的一些工事,并在布加勒斯特附近建立一个营垒,但是在他們沒有占領錫利斯特里亚以前,他們真正可用的第一道防綫将远在后方,即在塞勒特河—福克夏尼—加拉兹—伊兹馬伊尔这一綫上。

假定錫利斯特里亚是在俄軍手中,那末軍事形势便会立刻不同了。錫利斯特里亚是俄軍作为多瑙河桥头堡的一个最好的地点。它位于多瑙河河灣的内角上,对上述用途來說,这是再好不过的位置。在西北方面有一个大沙洲,上面横貫着一条通向卡拉腊什的堤壩。大沙洲瞰制着要塞以西的平原,距那里1000碼,这个距离对于对塹壕进行纵射和对纵队进行炮击是足够近的了。在东面有两个小沙洲,从这里可以射击东面的接近地,水淺时在沙洲上构筑的临时炮台,将会极严重地威胁圍攻者。因此,北面受到攻击的土軍在防御时所不能利用而不得不让給敌人的那一部分領土,

倒成了俄軍炮兵对从南面进攻的敌人进行側射的一个很好的陣地。这样，暴露給攻击者的正面仅仅是以錫利斯特里亚为頂点的三角形的底边，換句話說，只是南面向陆地的那一面；所以土軍或联軍至少在瓦拉几亚仍为俄軍掌握时，休想大举进攻錫利斯特里亚。

但是主要的优点与其說是战术上的，不如說是战略上的。俄国占有多布魯甲和錫利斯特里亚，就可以控制多瑙河并可根椐情况或从图拉真垒墙方面或从錫利斯特里亚采取短促的进攻行动。敌人在兵力上如不比俄軍多一倍，要在錫利斯特里亚以西任何一个地点渡河，都不能不把苏姆拉暴露給俄軍。至于在錫利斯特里亚以东渡河，那根本談不上，因为在希尔索瓦附近沒有渡口，而要到达那里，得首先占領卡腊苏河的各个陣地，然后再占領希尔索瓦，而希尔索瓦可以有力地抵擋住陆上的攻击，却极其容易被河上的敌人攻破。

因此，俄軍占領錫利斯特里亚以后，多布魯甲的堡垒对他們就有了很大的意义。他們获得一个双重的軸心，可以圍繞它自由机动而不致使自己的交通綫受到威胁。即使由于两倍优势的兵力，敌人能在沃耳特尼察或茹尔日沃附近渡河占領布加勒斯特并把俄軍击退到雅洛米察河彼岸，但要保障安全地向貝薩拉比亚坚决进军，对錫利斯特里亚的圍攻仍然是絕對必要的。因此，在錫利斯特里亚真正陷落以前，俄国人即使在瓦拉几亚沒有一兵一卒，也可以认为自己是瓦拉几亚的占有者。总之，俄軍占有錫利斯特里亚就等于說可以多占領瓦拉几亚 6 个月，而 6 个月后已到冬季，那时在这个地区是根本不能进行任何圍攻的，这就等于把俄国人的統治又延长 4 个月。占領錫利斯特里亚就是打了胜仗，而从錫利斯特

里亚撤退差不多就是打了敗仗。

这样一来，便出現了例外的情况，不管怎样玩弄外交手腕，怎样賄买、怯懦和犹豫不决，但由于战争的內在規律的作用，我們已經接近到有决定意义的轉折点。或者是对錫利斯特里亚听任不管，——那末它的陷落将成为可以用数学方法准确計算出来的事实；或者是联軍开往援助，——那末就将发生决战，因为俄軍如果从錫利斯特里亚城下不战而退，就不能不涣散自己的軍心，丧失自己的威信，——但是，看来，他們也是不准备这样做的。

沒有一个要塞曾經遭遇过像錫利斯特里亚那样变化莫测的命运。1810年，俄軍經過9天的圍攻和5天坚决的强攻后夺取了它。1828年，虽然要塞的情况完全和从前一样，但俄軍于6月21日用陸軍包圍它，8月10日又增加了36艘炮艇。然而攻城炮在9月才到达，并且沒有一点彈药，因此就不能采取正規的攻击。11月10日，由于冬季来临和多瑙河上出現浮冰，俄軍不得不撤圍。在退却中組織涣散、士气沮丧的俄軍遭到守軍猛烈的追击；俄軍的一部分攻城炮被遺棄在炮位上，其余的被在拉索瓦方向上追击的土軍繳获。第二年，吉比奇又去圍攻，在把土軍从俄軍前一年构筑的战壕和多面堡逐出以后，于5月7日包圍了要塞。他們大概沒有經過任何事先的准备便把31門重炮配置在距城約九百碼的高地上并开始轰击。5月26日，在距圍牆約六百碼处配置了破坏敌人火炮的炮队，同时构筑了第二道平行壕；第三道平行壕于6月4日筑成，而在6月12日开始向斜堤頂推进。17日，在一处通过了斜堤，但是整个行动直到26日即在距主牆30碼的壕沟边設置好了5个炮队以后才完成。同时，在目前圍攻中指揮工程作业的施尔德尔將軍，当时曾大規模地进行了他最擅长的地道爆破。埋在外

岸和主墙下面的大包炸药在6月21日爆炸，立刻炸开了一个可通行的缺口，在6月25、27、28和29日又相继爆炸，要塞终于在29日投降了。要不是那些迷信的、未经正规训练的兵士被地下爆炸吓得丧魂落魄，看来当时也不是非投降不可。在整个被攻击的正面和第二道垒墙的后面筑有 *coupure* [二重堡]，即一道新的战壕，要占领它无疑又需进行地道爆破或炮兵轰击。这样，这个令人惊异的要塞，虽然与1810年相比毫无改善，却在敌人掘壕后支持了35天，在主墙被打开能通行的缺口后支持了9天。它迫使俄军在炮击中消耗了3万发炮弹，在地道爆破中消耗了336英担^①火药。

由于财政的困难和埃及的战争，土耳其人在阿德里安堡和约以后对这个重要据点竟没有加以照顾，以致直到1836年，不仅1829年打穿的洞孔没有完全堵塞，壕沟没有清除，甚至连1810年强攻的痕迹仍然历历在目。苏丹当时曾考虑修建独立堡垒，但这个主意在相当一段时期没有实现。现在，锡利斯特里亚的情况已完全不同，这主要应归功于在土军中服务的普鲁士军官格拉赫上校的努力。原来构造上就有缺点的要塞看来未必能作很大的改进，但是在高地上构筑的独立堡垒已经显示了它们的作用。要塞形成一个半圆，其直径沿着多瑙河岸，长约1800码。要塞有10个棱堡面，平均每个长500码。其构造同十六和十七世纪所有的土耳其要塞一样，存在着意大利旧式筑城所固有的全部缺点：中堤长；棱堡不大而且狭窄；侧面短，几乎不能掩护壕沟；壕沟本身很浅（深度不超过8英尺）；没有隐蔽路；只有顶端高出外岸顶部刚4英尺的简陋斜堤。围墙本身高8英尺，厚20英尺，用土筑成。内岸和

^① 1英担等于112磅，或等于50.8公斤。——编者注

外岸的高度，按壕沟深度計算为 8 英尺。壕沟本身由于位置較高，必然是干燥的。在中堤前面甚至連眼鏡堡都沒有。这便是 1836 年前的錫利斯特里亚。此外，在距圍牆 600 碼处，有一連串向南延伸的高地瞰制着要塞，这就使上述缺点更严重了。这些高地是保加利亚台地的支脉，台地有非常平坦的頂部，延伸到距城 1 500 碼处，然后向河流方面緩斜而下，它的一面是狹窄的小支流，一面是高地，为炮队提供了一个正射和纵射用的优良的梯阶陣地。曾在 1836 年視察过这个要塞的莫尔特克少校（上面叙述的具体材料便是从他論 1828—1829 年战局的著作中引来的）发表过以下意見：

“如果不在高地上增建 4 个独立堡垒，不在对面的大沙洲上构筑一个桥头堡，就不能使錫利斯特里亚具有坚强防御的能力。”¹⁵²

在屬於瓦拉几亚的那个沙洲上构筑桥头堡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土耳其人根据和約規定已經撤出瓦拉几亚；但是現在堡垒已經筑成，而且，如果我們所得的消息是正确的話，这些堡垒差不多正是构筑在莫尔特克少校所指出的那些地方。

究竟格拉赫上校在消除要塞主牆缺点方面采取了什么措施，这还很难說。但有一点大概可以不必怀疑：他至少构筑了隱蔽路，并在中堤中央开了射孔，以便沿所有最受威胁的、防御較弱的正面上的壕沟射击。至于 4 个独立堡垒，它們构造的特点目前我們还一无所知，但鉴于格拉赫上校是普魯士人，并且节省費用对于土耳其政府又有很大的意义，我們可以說，这些堡垒很可能是按照目前欧洲大陆几乎到处采用，特別是在普魯士采用的那种体系建筑起来的，就是說，这些堡垒是頂部平坦的方形堡或八角堡，每隔一个角筑有炮眼。它們的位置可以根据形成为台地向城市方向突出的末端并为 3 个雛谷隔开的 4 个地角来确定。它們和主牆的距离平

均应为 1 500 碼，因此要塞的火力不能对它进行多少有效的掩护。但这也不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在离城較近的斜坡上，看来也没有任何地褶可用来很好地掩蔽堡垒，使它不受台地边缘的瞰制。

除了这些永备工事以外，格拉赫上校还在台地上构筑了临时性的土堡，叫做阿拉伯堡，位于两个中央堡垒之前約一千碼处。根据一些报道，我們可以推断还筑有其他的野战多面堡，好像一道外圍堡垒綫一样，所以，前后共有 3 道防綫。但是阿拉伯堡仍然是这些陣地的鎖钥，必須先夺取它才有可能接近內圍堡垒綫。这样的工事配置使錫利斯特里亚有了巨大的防御力量和进攻力量。因为正規攻击只有从要塞的南面进行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所以守軍如有 15 000—18 000 人，便可以派出大批兵力出击。担任出击的部队可以在独立堡垒后面的斜坡上找到很好的掩蔽陣地，从这些陣地他們可以沿着雛谷接近到距敌人很近的地方而不被发觉。因此，在阿拉伯堡遭到强攻时，解决問題的与其說是这个堡垒的守軍，不如說是由錫利斯特里亚出击的部队。現在讓我們来談談这次圍攻本身的情况。

自 4 月底以来，俄軍不时从多瑙河对岸炮击錫利斯特里亚。5 月，他們开始在城市对面的大沙洲上，在通向卡拉腊什的堤壩附近挖掘正規的接近壕，到 5 月 10 日把炮队沿河岸配置完毕。11 日，对城市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并对北堡进行了平射。5 月 12 日，进行了同样的射击，当时刚刚到达的孟加拉炮兵中尉奈斯密斯观察了炮击的情况，写了一篇报道，登在倫敦“泰晤士报”上。射击的主要目标是东北部的奇申格尔棱堡，土軍从这里进行了特別猛烈和非常准确的还击。与此相反，俄軍的射击却显得很认真，在城市中发现的大量榴彈，在发射前竟連信管上的帽盖都沒有取下，所

以既不能燃燒，也不能爆炸。这样的疏忽，虽然在战局开始时期在野战条件下进行快速射击时是常見的，但是在射击速度总是較慢的攻城炮击中却是聞所未聞的。这种疏忽說明，俄軍是多么急于用光他們的彈药。此外，在夜間，俄軍还在錫利斯特里亚以东希布拉克沙洲上安置了一个炮队（1829年，他們在这个地点有两个炮队）。这个炮队的4門炮大概是用来对整个北部正面进行纵射的。

自5月13日到16日，显然沒有任何重大的行动，至少在报道中完全沒有提到。很可能俄国將軍們发现炮击达不到夺取土耳其要塞的目的（这是他們完全可以預料到的），便准备在右岸进行攻击。因此，5月16日在錫利斯特里亚以东架了一座桥，2万人由桥上过了河，据說很快又有从多布魯甲調来的2万人和他們会合。俄軍为了把兵力集中在錫利斯特里亚和土尔图凱的方向上而进行了总的調动，因为一旦决定在右岸进行攻击，便需要兵力作掩护，以防备駐在苏姆拉的奥美尔-帕沙和可能在瓦尔那登陆的英法軍隊的襲击。

5月19日，对阿拉伯堡进行了首次偵察；大批部队集中在火炮射程以外不远的地区，散兵纔开始向前推进。穆薩-帕沙在短時間的炮击后向台地派出了一队巴希布祖克¹⁵³，击退了这些散兵。5月20日，俄軍重新出动，这次出动作为單純的偵察，未免声势过大，而作为真正的攻击，又嫌不够有力。21日，对阿拉伯堡进行了第一次攻击，詳細情形虽不知道，但俄軍受到很大損失后被击退了。逃到土軍方面的两个俄国軍官报告說：敌軍兵力达9万人，由3个軍編成（这同实际符合，就是第三、四、五軍），由康斯坦丁大公指揮。最后这一点显然是錯誤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康斯坦丁正在指揮在芬兰的海陸軍和海岸防御。关于次日再度进行攻击的消

息，沒有被事实证实。俄軍已作好战斗准备，但是沒有向堡垒接近。以后，我們又沒有得到至5月26日止的战况的消息。5月27日拂曉，俄軍以极大的兵力重新进攻阿拉伯堡。三次发起猛攻，但三次都是攻击者受到很大的損失而被击退。土軍的报告称，俄軍1500人被击毙，3000人受伤，这可能有些夸大，但还不是十分不可信的。以后帕斯凱維奇决定按照苏沃洛夫的 *à la* [方法] 夺取堡垒，他在第二天早晨再度使纵队作好攻击准备。看来伤亡惨重，謝耳万將軍陣亡，伯爵小奥尔洛夫上校眼部中彈而死，另一个上校身負重伤。俄軍自己承认死186人，伤379人，但这个数字很可能还不到实际損失的三分之一；从他們投入攻击的兵力来看，他們可能遭到的最小伤亡是2000人。

当天夜間土軍进行大規模的出击，突然襲击了俄軍的防地，驅逐了他們，并使他們受到很大的損失（据报告，为1500—1800人）。由于这一次出击成功，以及由于俄軍在最后一次猛攻中尽管出动騎兵来督促部队前进并阻止他們退却，仍然沒有能够使他們同敌人进行格斗，帕斯凱維奇公爵不得不放棄以白刃冲击夺取堡垒的企图。毫無疑問，这个多面堡的防御不仅是这次战争中而且一般地說是所有俄土战争中最光輝的战績之一。在这个地形上可以用极大的兵力进行攻击，而俄国人也不是那种肯错过机会而不把他們所能使用的兵力都投入强攻的人。因此，俄軍方面在数量上一定占有极大的优势，要击退他們，土軍不仅要有很大的勇敢精神，而且要有計劃周密、行动協調的出击。如果俄軍面对的是1829年的土軍，也許已經攻占了要塞，这一点大概可以不必怀疑。他們目前屢次的失敗說明，土軍，至少一部分土軍，既在战术上和軍事科学上取得了成就，又沒有丧失自己的勇敢精神。就这方面

來說，阿拉伯堡的防守和切塔特会战是整个战局中最出色的事件。

至于俄軍的攻击，没有什么优点可談。看来，帕斯凱維奇十分急于夺取錫利斯特里亚，以致他甚至沒有時間采取为达到这个目的所絕對必需的一些措施。他的犹豫不决是大家一眼就可看出的。首先，他試行炮击，虽然他应当知道，这样做对这个土耳其城市是多么无济于事。炮击只能使俄軍耗費大量彈药，而且只能在靠河这一面的圍牆上打开缺口，而那里距寬 1 000 碼的多瑙河天塹很近，根本別想进行强攻。此后，俄軍便攻击陆上防綫，但是看来既沒有压制住阿拉伯堡的火炮，也沒有作过一次真正的努力去破坏这个堡垒的工事。在苏沃洛夫的后继者看来，所有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正如这位大俄罗斯將軍所說的：“枪彈是笨蛋，刺刀是好汉”，如果这話对于能穿透阿尔卑斯山（也是这位英勇的軍事权威說的）的俄国刺刀來說是正确的，那末对于老是有无法克服的射击偏差的俄国枪彈來說毫無疑問就更正确了。因此，虽然規定强攻，进行强攻，反复强攻，但总是徒劳无功。結果是，規模不大但构造坚固的土耳其堡垒的土质胸牆，比苏沃洛夫所刺穿的阿尔卑斯山的花崗石还要結实，土耳其的炮彈和枪彈并不像俄国的炮彈和枪彈那样是笨蛋。結果，帕斯凱維奇将不得不回到老規矩上来：在未压制住要塞的火炮和破坏要塞的防御工事以前，决不能强攻要塞。因此，大約在 5 月 30 日或者 31 日便开始正規圍攻，而帕斯凱維奇最后还是依靠“枪彈笨蛋”了。

但是不然！这只是表面現象而已。1829 年的名将施尔德尔將軍出場了，他发誓要用他那个地道爆破的老办法来粉碎这个要塞，并且要在几天內完成。用地道爆破对付野战筑城，这是陷入絕境的敌人在軍事上彻底失望和暴怒的表现。如果必須使用地道爆

破,保证成功的第一个条件是通过斜堤。但在通过斜堤以前,应当压制对方的火炮,而这就是说要开掘一条、两条或三条平行壕并配置相应的炮队。实际上,地道爆破是围攻的最后阶段,而不是它的开始。如果施尔德尔不打算在約二十平方英里的地区开凿地道或者在多瑙河下面挖掘隧道,他就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正規围攻。和苏沃洛夫的說法相反,枪彈是必需的。

对阿拉伯堡的正規围攻无疑地会在几天內結束,因为这个堡垒差不多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而且长期的防御会过多削弱守軍。但是,这意味着至少要对两个堡垒采取正規围攻,然后再对城市本身进行正規围攻。5个星期无疑是俄軍在草率围攻的情形下能够完成上述行动的最短時間。要是土軍的粮食和彈药充足,又不遇到任何意外的情况,在7月初以前,要塞可以說是安全的。当然,我們假定堡垒的坚固程度是中等的,而圍墙也不过分陈旧。不过,既然1829年錫利斯特里亚在敌人掘壕后还支持了35天之久,那末在它有了新的改进,而且有智勇双全的指揮官、經驗丰富的炮兵司令和头等的守軍的情况下,在1854年至少也可以支持同样的時間。假使能够得到联軍援助,我們就可以放心地說:这个战局必定使俄軍完全失敗,也可能更糟。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6月10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1854年6月26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4115号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俄土戰場的形勢¹⁵⁴

且不談俄軍由瓦拉几亞撤退和奧軍進駐該地相巧合的有趣的事實，單是如何決定、如何進行以及最後如何撤除對錫利斯特里亞的圍攻這一點，就足以表明這裡根據的決不是純軍事的理由，而完全是另外一些理由。從俄國公報（其中發表了截至5月28日下午為止的戰況，僅在死傷人數上與土軍報告不同）中可以看出，俄軍行動非常倉卒，他們最早也是在事實證明已不可能用強攻奪取錫利斯特里亞的時候才竭力破壞外圍工事，並且這次進攻比俄軍圍攻史上的任何一次進攻都更缺乏組織，更違反軍事科學。關於5月28日到6月15日的軍事行動只有一些極其零星的報道，因而我們無法詳細地敘述事件的經過；但俄軍在反復拚命地攻擊時，幾乎所有的高級軍官都負傷離隊——帕斯凱維奇、施爾德爾（後來截去一條腿）、哥爾查科夫、利迭爾斯以及奧爾洛夫（眼部中彈），——這個事實令人信服地證明，俄軍奉命不僅要不顧一切地奪取這個要塞，而且必須在嚴格規定的期限內完成任務。他們在整個這個過程中的行動，與其說像是進行現代的正規戰，不如說像帖木兒—塔梅爾蘭在庫爾迪斯坦奪取城市時的野蠻行徑。另一方面，英勇而巧妙的錫利斯特里亞保衛戰，無論在盟國方面或者在奧斯曼帝國的御前會議方面都顯然引起了同樣的驚愕。讀者們也許記得，

大約在 6 个星期以前，联軍的指揮官們^①在瓦尔那會見時曾發現巴尔干是土耳其的天然屏障；現在，許多英国報紙对法英軍隊未曾派遣一兵一卒增援錫利斯特里亚的这个事实不仅承认，而且大加吹嘘。最后，决不能否认：錫利斯特里亚是軍事上极其重要的地点，这个要塞的命运决定整个战局的命运，俄軍在放棄圍攻而突然向塞勒特河退却后，已經丧失了他們在今年和去年所夺取的全部領土。

不过仍然要指出，許多英国報紙过分夸大了俄国人这次失利的程度。当然只有最容易受騙的人才相信 6 月 13 日錫利斯特里亚守軍的出击和据傳从奥美尔-帕沙那里得到的 2 000 名援軍使俄軍遭到了彻底的失敗，并迫使 9—10 万人在 15 000 人面前逃走。根据我們的判断，俄軍的突然退却同他們的突然进攻一样是不可思議的，这只有用俄国和奥地利事先达成了由奥軍占領瓦拉几亚的協議才能解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們从“紀事晨报”駐君士坦丁堡記者 6 月 10 日（即奥土条約締結前 4 天）揭露这个阴謀的通訊中發現的下面一段話就特別值得注意：

“土耳其人认为，外交活动正在玩弄他們，企图把錫利斯特里亚让給俄軍。这个猜疑为这里收到的消息证实，消息說在維也納正在准备新的議定书，其中似乎已把錫利斯特里亚的陷落看做既成事实；現在当俄国的軍事野心得到滿足的时候，奥地利便认为进行由它参与解决問題的軍事干涉的时机已經到来，认为占領俄軍将要撤出的多瑙河各公国的时机已經到来。”

因此，如果俄軍及时攻占錫利斯特里亚，那就一切順利。而現在，虽然俄軍沒有能够滿足沙皇的軍事野心，但由于同奥地利有約

^① 即圣阿尔諾和腊格倫，見本卷第 276 頁。——編者注

在先，也只好相当不光彩地撤退。在俄軍退过塞勒特河的同时，奧軍就向塞勒特河和多瑙河前进，这样，他們就处于俄国人同土耳其人及其同盟者的中間。奥地利人处在这个地位，成了爭端的調停人，他們不让任何一方前进。俄軍留在莫尔达維亞，然而維也納會議將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忙于拟制議定书，这样，俄軍就可以贏得冬季時間。如果會議一无所成（无疑，結果必然如此，因为俄皇新从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公司得到一笔 3 700 万美元的貸款）^①，俄軍在多瑙河和塞勒特河以北的地位也将比它原先在布加勒斯特和居斯坦杰之間的战綫巩固一倍。把在錫利斯特里亚前面、在保加利亚境內的俄軍兵力（他們目前正向塞勒特河以北撤退）同在巧妙部署的情况下一般可以起作用的联軍兵力比較一下，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联軍即使作最好的打算，也不可能破坏奧俄的联合。

在欧洲的黑海沿岸同土軍和联軍作战的俄軍兵力由 13 个步兵师組成：第三軍的 3 个师、第四軍的 3 个师、第五軍的 1 个师、第六軍的 3 个师和 3 个預备师。此外，在这个地区还有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輕騎兵师以及第三、第四和第五炮兵师。这些兵力几乎达到主要的作战軍隊的一半，据官方統計，其中每一步兵师有 16 000 人，每一騎兵师有 5 000 人，每一炮兵师有 160 門火炮；全部約 25—26 万人，包括輜重队和兵营勤务人員在內。但是，如果我們根据俄国軍隊在匈牙利战争¹⁵⁵时的实际情形来判定它的人数，那就应当认为俄軍一个步兵师不会超过 13 000—14 000 人，并且騎兵和炮兵的人数也要相应减少。因此，俄軍先后开入多瑙河各公国的部队实际上应当减少到 21 万人左右，并且其中至少还

^① 見本卷第 324 頁。——編者注

要除去战斗减員和因病死亡的 20 000—25 000 人。如果我們回忆一下 1828—1829 年瘧疾在俄軍中造成的大量减員，并拿俄国外科医生在“維也納医学周刊”¹⁵⁶ 上发表的通訊来比較，就可以毫不誇張地认定：俄軍的損失达到总人数的 8—10%。这样一来，俄軍只可能有 18 万人左右了。

弄清俄軍有多少兵力可用于对錫利斯特里亚作战，这是很有意思的。战綫后方的交通綫和倉庫需要大量部队保护，布加勒斯特和多布魯甲战綫必須占領。部队的两翼和一部分正面需要一部分兵力掩护。如果我們除去为完成这种种任务所需的 6 万人，那末用来圍攻錫利斯特里亚并掩护这一行动的兵力还有 13 万人。而且这只能是过高的估計，而不是过低的估計。但是由于錫利斯特里亚位于大河附近，圍攻的部队就不可避免地要分成几路，以便从四面包圍要塞。其次，必須在北岸配置强大的預备队，以便在失利时支援从南岸退回来的部队。最后，占領南岸（即右岸）的部队也要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負責圍攻和抗击被圍者的出击，另一部分則負責掩护圍攻部队并击潰可能派来援救要塞的敌軍。这样，为了占領右岸和在左岸进行圍攻^① 大約需要 35 000—40 000 人。因此，俄軍可用来同解圍的敌軍进行积极的野战的兵力为 8 万人，这就是俄軍在保加利亚境內錫利斯特里亚周圍 10—20 英里半徑內的最大兵力。

現在我們来看一看，联軍有多少兵力可以同目前的 18 万俄軍相对抗。关于苏姆拉的土軍，不久前的报道說，他們約有八万人，但是他們缺乏在平地作战所需的一切条件，据腊格倫勳爵和法軍

^① “紐約每日論壇报”上的原文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 年）德文版第 10 卷更正为“占領左岸和在右岸进行圍攻”。——譯者注

參謀人員最近的報告說，軍官的素質很差，而且总的說，土軍的現狀嚴重地影響了進攻行動。我們不想核對，同時現在也不可能核對這些報道是否正確。但只要說這是聯軍對土耳其主力軍隊的狀況的官方意見就夠了。從那時起，土軍便由卡拉法特派往魯舒克，據說那里設了一個可容 4 萬人的兵營。這種把整整一個軍擱置不用的策略是很難理解的，而這個軍如果不派往魯舒克而派往布加勒斯特，就能夠迫使俄軍立即撤除對錫利斯特里亞的圍攻。但是戰爭的指導權是完全操在外交家手中的。如果除去魯舒克目前的守軍以及蘇姆拉的守軍和預備隊，那末土軍能否提供裝備齊全的 5 萬人在平地上解決他們當前的任務是很值得懷疑的。如果按西方軍事權威的估計，一個英國兵或法國兵至少可以抵得上兩個俄國兵，那末聯軍仍然要有 65 000 人的一支軍隊，才能夠同俄國占領軍勢均力敵。因此，聯軍在瓦爾那集中起這樣的兵力以前，如沒有極端需要，未必會轉入積極的行動。

其實，聯軍是非常謹慎的，他們沒有一下子出動這樣大的兵力，以免失掉逃避往後積極行動的借口。除目前正在開往土耳其的 15 000—20 000 人（包括了幾乎所有的炮兵和騎兵）以外，目前在土耳其的英法軍隊，一共不過 8 萬人。不管是否有意，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運輸船隻的數量非常有限，因而如果部隊必須單由海道向瓦爾那運送，那就需要多次往返航行。但是，根據最近的最正確的消息，——我們上面提到的那位記者這樣說，——到目前為止僅有 12 000 名英法兵士由海道運送，而法軍主力則由加利波利向君士坦丁堡和阿德里安堡緩慢地前進。因為道路非常不好而且軍隊的糧食供應非常困難，所有這些便成了使法軍的聲名狼藉的聖阿爾諾將軍一直留在瓦爾那和君士坦丁堡之間“待命開拔”的

情况。我們可以确信他决不会错过利用御前會議內任何陰謀的机会，以便攫取巨款中飽他那无底的私囊。关于英軍两个师仍然留在斯庫塔里的消息，我們也是由上述記者那里得到的，他說：“他們看来还没有准备好出发，虽然整个运输船队停泊着等待装载。”

根据这一切事实，每个人都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盟国非常担心的是怎样才不致破坏俄奧之間目前的協議。如果盟国想要破坏这一協議，只要作一个简单的选择就能达到目的，那就是或者在波罗的海結成英瑞(瑞典)同盟，給輔助部队建立作战基地，便于他們进入芬兰和从陆上迂迴斯維阿波尔格和喀琅施塔得两个要塞；或者对克里木和塞瓦斯托波尔进行海陆联合攻击。至于第一个可能性，我們很有趣地看到：倫敦“泰晤士报”在不到三星期以前还坚持认为必須把黑海分舰队派到波罗的海，現在却主張只封鎖波罗的海各港灣而立刻把大部分波罗的海舰队召回黑海，突然变成了占领克里木的积极拥护者。也正是这家报纸，对納皮尔在法国舰队同他会合之前不可能有所作为曾經装腔作势地表示惋惜。現在，当这个会合已經成为事实的时候，却又认为結局将是一事无成，认为英法舰队最好还是再作一次經過卡特加特海峽、拉芒什海峽和直布罗陀海峽到黑海的航行。如果注意一下这两个舰队的会合已經花了多少時間，而另一方面为了把它們置于海軍上将邓达斯的統一指揮之下又将需要多少時間，那就可以完全明了，这些建議的主要目的是要在波罗的海或者在黑海什么也做不成。

俄軍如果不算在錫利斯特里亚出乎意外的失敗，那末他們遭受重大損失和充滿危險的唯一地点便是高加索，虽然关于这点还没有十分可靠的消息。他們放棄了黑海东岸的几乎所有的要塞，但这不是由于害怕联軍舰队，而是为了加强他們在格魯吉亞的兵

力。据说，俄军通过达尔雅尔峡谷撤退时，前卫和后卫突然遭到大批山地居民的攻击，而且前卫被消灭了，本队和后卫受到很大的损失而被迫退却。同时，塞里姆-帕沙的军队也由圣尼古拉堡垒推进到奥苏尔盖特，并迫使俄军撤出该要塞，在这以前，俄军是常常从那里扰乱并威胁土军的；这个胜利保障了塞里姆-帕沙同在卡尔斯的土军主力之间的交通线。如果回忆一下甚至这支部队在冬春两季都非常可怜地毫无作为，那末俄军的机动至少证明，他们感到自己在格鲁吉亚的地位已不稳固，迫切需要从沿海地区调兵增援。如果在达尔雅尔战败的消息全部地，或者哪怕是部分地得到证实，那末就应该得出结论：沃龙佐夫军队的退路已被切断，他们必须设法在梯弗里斯建立巩固的基地以便坚守到今年冬季（而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不然就得考虑不惜任何代价冲过这个峡谷。无论如何，采取这一行动也比向里海退却好，因为通往里海的峡谷比达尔雅尔峡谷不知要危险多少倍。但是关于这类问题，只有从这些地方得到更全面和更可靠的消息以后，我们才能比较确切地加以评述。暂时我们只能这样说：俄国由于最近的几次行动，不可否认地得到了两次胜利，一次是霍普公司的贷款，另外一次是奥地利同土耳其的条约；同时它也遭到了一次失败，即在锡利斯特里亚的失败。至于这些胜利能否造成永久的优势以补偿失败的耻辱，那要在将来才能见分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年6月14—16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7月8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2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俄軍的撤退

俄軍退出土耳其，比我們預料的要徹底得多，而且比目前甚至在最壞的情況下從軍事觀點來看所必需的那種撤退還徹底。看來，沙皇對奧地利皇帝承擔的義務以及他給俄國將軍們發布的命令，都是要求俄軍全部撤出莫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使土耳其領土上不留俄國的一兵一卒，而強大的奧軍則應當立即代替俄軍，把不久前還彼此廝殺的兩國軍隊隔開。但是，如果以為俄軍的撤退是由於他們在錫利斯特里亞的失敗造成的，或者對英國報紙的吹噓信以為真，那就錯了。這些英國報紙把這次失敗描繪成復滅，並且一心要世界相信，從要塞出擊的 15 000 人或者至多 17 000 人能夠把 10 萬名或者至少 9 萬名敵兵打跑。毫無疑問，俄軍一次又一次地被堅決擊退並遭受重大損失，這正是他們輕率的、考慮不周的和違反軍事科學的混亂的攻擊——不論這些攻擊進行得多么勇敢——所應得的結果；土軍作戰異常英勇果敢，表現出高度的軍事學術水平，因而使這次反圍攻永垂史冊；但是我們仍然沒有理由相信，正是他們才迫使敵人撤圍。事實上，據最可靠的消息說，在守軍最後一次出擊後，俄軍仍繼續堅守左岸的炮台，並利用它們向要塞射擊，但是某些電訊過急地報道說，這些炮台在那次出擊中似乎已被守軍攻占。事實的真相顯然是，最後從錫利斯特里亞撤退，只不

过是因为沙皇同奥地利曾約定俄軍在一定期限內撤出多瑙河各公国。他曾命令俄軍先要攻占錫利斯特里亚，以便在离开土耳其的时候能够取得哪怕一次胜利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可是軍隊沒有完成这个命令，于是他們只好蒙受失敗的耻辱而撤退了。但是，这次撤退并不是在敌人跟踪追击下的潰退。俄軍沒有攻占錫利斯特里亚，也許甚至采用正規的圍攻也攻占不了它；可能，他們在这一战局中什么也得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他們只得退到塞勒特河；不过，他們仍然比联军（土軍和其他軍隊）强大，至少在防禦方面要强得多。此外，他們还不曾同联军交过鋒，還沒有进行过一次决战。因此无可爭辯，俄軍向普魯特河撤退是由于外交上的考虑，而不是由于奥美尔-帕沙和他在土耳其的同盟者的优势兵力或更巧妙的战略所产生的軍事上的需要。

但是，如果說俄軍懾于武力而被迫从錫利斯特里亚撤圍的这种假設是錯誤的，那末，看不到目前整个战局对俄軍不利而奥地利的干涉才是俄軍改善处境的最好办法，同样是錯誤的。这里我們不是指俄軍在沃耳特尼察、切塔特、卡腊卡耳或錫利斯特里亚的一連串失敗，——这些都只是較小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土軍給俄軍以打击，而俄軍則从未能給予土軍以同样成功的打击）。所有这些冲突加在一起也沒有产生决定性的結果。可是，在亚洲俄軍一直在挨打，他們在那里現在已經有彻底失敗的危險。俄軍在黑海沿岸的許多要塞現在只剩下两座；而在国内，沙米尔和他的山地居民不仅在附近的山地和谷地上肃清了所仇恨的俄国人，而且还切断了沃龙佐夫伯爵同俄国的联系，并在南面同土軍一起行动，向梯弗里斯进发，其兵力之大可能迫使伯爵投降和交出俄国所有那些得来如此不易、而守卫又如此艰难的外高加索領地。对沙皇來說，喪

失这些以大量鮮血和金錢換得的省份，比起在土耳其決戰的失敗來，也許是更大的耻辱，同時，沒有疑問，只要他的軍隊回轉來渡過普魯特河，他立即會派出所有不用於防守克里木和塞瓦斯托波爾的部隊去收復高加索的各山口並支援沃龍佐夫。沙米爾的勝利大概有力地促使俄國接受了奧地利提出的關於從多瑙河各公國撤退的要求。

在這件使戰爭的前景發生這樣變化並且更加複雜的重大交易中，奧地利占有極重要的和有利的地位。這是它在外交上的一大勝利，也是它的軍事力量使交戰雙方敬畏的證明。它作為交戰雙方的朋友進行干涉。俄軍乖乖地退走，給它讓出了地方；而土耳其政府完全按照法國和英國的主意，在允許奧地利占領多瑙河各公國的條約上簽字。總之，這是一個得到交戰雙方同意而進行干涉的武裝的調停人，因為每一方都認為這種干涉對自己有好處。西方強國公開宣稱，奧地利是為了它們的利益行事的；而俄國根據聖彼得堡和維也納之間的協議（事實證明，早在全世界知道奧地利從中干涉以前，在帕斯凱維奇的軍隊在錫利斯特里亞遭到回擊以前，就已達成協議了），無疑也認為奧地利是為了它的利益行事的。究竟是誰受騙呢？奧地利打算出賣哪一方呢？

當然，奧地利和任何其他強國一樣，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它的利益要求俄國不占領多瑙河各公國，不控制多瑙河口和黑海，因為奧地利在這方面進行着大宗的、日益增多的貿易。此外，俄國並吞土耳其全部或一部分土地，都會在奧地利帝國內的斯拉夫人中間引起騷動，因為在他們中間已經有很多人擁護泛斯拉夫主義，主張同俄國結成同盟。因此很明顯，要奧地利同意俄國並吞土耳其，只有使它有可能同時向另外某個方向擴張霸權和擴充

版图，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奥地利的政策是完全同情沙皇而反对法国和英国的；它真正的方针将始终是同西方强国为敌。俄国在它发动的这一場不必要的战争中罪有应得地蒙受了耻辱，这在維也納是不会感到难过的；然而奥地利永远不会听任俄国受到严重的削弱，因为这会使哈布斯堡王朝失去唯一能帮助它跳出最近的革命漩渦的朋友。我們认为，这些就是支配着維也納內閣在战争今后各个阶段中的行动的全部动机。奥地利将出卖交战的任何一方，或者一下子把双方都出卖，这完全决定于它的利益和王朝的利益的需要，——如此而已，再无其他。

俄軍撤退和放棄占領，并把退出的地区轉交給奥地利这一事实，使奥地利承担了在今后維護俄国以防止任何不愉快事件的义务。即使奥地利与盟国保持名义上的友誼，这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盟国今后对沙皇的一切行动都遭到失敗。可以相信，它将为此去做除真正宣战以外的任何事情，——宣战这一手段它无论如何是不会下决心采用的。因此，它必然要执行出卖西方强国的政策。在允許奥地利軍隊占領土耳其地区的条約中，西方强国是受騙的一方，在战争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它們总有一天会相信这一点。

看来，战争进一步的发展不在英国首相阿伯丁勋爵的計劃之內，他极力主張按照奥地利的願望，在恢复 status quo [状态]，可能还把多瑙河各公国的保护权由俄国移交給哈布斯堡王朝的基础上来解决冲突。然而現在可以认为，由于阿伯丁勋爵在他那次臭名远揚的发言中所作的自我揭露以及接着的議會辯論（辯論詳情我們在今天本报上另有报道^①），这些計劃已經破产了。被这些揭

^① 見本卷第 315—323 頁。——編者注

露出来的事实所激动的不列颠人民，在沒有得到比简单地恢复原状更重要的某种赔偿来抵补他們因战争而支出的巨額費用以前，是不会同意締結和約的，至少在目前是不会同意的。他們认为必須粉碎俄国，使它不能很快地重新破坏全世界的安宁；他們焦急地等待着建立某种例如攻占喀琅施塔得或塞瓦斯托波尔那样的赫赫战功。不得到这种因参战而荣获的重大奖賞，他們是不会同意締結和約的。英国人民的这种情緒大概会引起內閣的立刻更換，并使战争繼續下去。可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如果战争繼續进行，俄国将不断受到比它过去所受的更加沉重的打击，——除非土耳其人和切尔克斯人在沒有西方任何援助的情况下能夺取俄国的外高加索各省。从那些在阿伯丁勋爵辞职后可能在倫敦掌权的人物来看，从他們在战争爆发后直到今天的作为来看，完全可以預料，他們有朝一日将在阿伯丁勋爵現在所主張的、也因此失掉职位的同一基础上締結和約。到目前为止，奧地利的外交是成功的；很可能最后的胜利也屬于它。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年6月19—23日
作为社論載于1854年7月10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412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戰爭。——議會辯論

1854年6月27日星期二于倫敦

布加勒斯特的俄国 *moniteur* [正式通报] 正式宣布，遵照圣彼得堡的命令，錫利斯特里亚已經撤圍，茹尔日沃已經撤軍，全部俄軍正准备調回普魯特河左岸。“泰晤士报”昨天在第二次增刊中发表了該报駐維也納記者拍回的类似的电訊：

“俄国皇帝出于对奥地利这个老盟国的深深的尊敬，滿足了它的要求，已下令将自己的軍隊調回普魯特河左岸。”

約翰·罗素勋爵昨天在下院晚間會議上证实了錫利斯特里亚已經撤圍的消息，但是他还没有收到俄国答复奥地利要求的正式通知。

由于奥地利的干涉，土軍和俄軍之間将树起一道壁障，这道壁障将保证俄軍撤退，并使他們有可能加强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木的守軍，甚至重新同沃龙佐夫的軍隊取得联系。此外，当盟国拒絕简单地恢复 *status quo ante bellum* [战前状态] (这种简单的恢复最多不过使沙皇作一些有利于奥地利的微小让步) 的时候，俄国、奥地利和普魯士之間的神圣同盟的恢复将可以說是一个既成事实。

这个堂皇的“决定”据說是梅特涅的杰作。但是現在，由于老阿伯丁的饒舌和帕麦斯頓的阴謀，这个决定的全部妙策就被破坏了。

这里应当提醒一下，在最近一次內閣改組中，一切企图任命帕麦斯顿勋爵主持陸軍部——帕麦斯顿的报刊最急切地要求成立这个部——的努力都落空了，皮尔分子，紐卡斯尔公爵把自己眼下这个为高貴的勋爵垂涎的位子抓到了。显然，这次失敗提醒了帕麦斯顿勋爵：早就該解散整个內閣了。因此，他选中阿伯丁勋爵发表的反駁林德赫斯特勋爵的考虑欠周的发言¹⁵⁷作为借口，掀起了目前这场反对內閣首脑的風暴。所有英国报刊都立刻抓住了这次发言，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先驅晨报”还在这次发言之前就已公开指出有一个反对阿伯丁勋爵的阴谋。累亚德先生于上星期五在下院发了言，宣布他将在下星期四提出下述意見：

“女王的首席大臣所使用的言詞蓄意要引起輿論对战争的任务和目的的重大怀疑，并减少締結光荣而长期的和約的机会。”

这个意見有两个弱点：第一，它違反宪法，也就很容易被駁倒，因为它違背了关于禁止下院議員批評上院中的发言的議會規則，第二，它仿佛要把首相对于某一个別事物所发表的言論同联合內閣的全部活动分割开来。然而，这个意見使阿伯丁勋爵感到如此震惊，以致在它被宣布后两小时，他就要求发言，并以異常激动的口气声明，

“下星期一〈也就是說比累亚德先生早三天〉他将向議院提交在阿德里安堡条約簽訂后他致俄国的急件的副本，并利用这个机会来稍微說明一下不久前他在上院关于战争問題的发言所受到的曲解”。

大家对累亚德先生的意見会使阿伯丁勋爵离开內閣这一点如此深信不疑，以致“晨报”——举个例說——都已經公布了将接替他的內閣的名单，由罗素勋爵任內閣首相，帕麦斯顿勋爵任陸軍大臣。不难想像，昨天晚間上院的會議吸引了非常多的爱看熱鬧的

兴致勃勃的貴族陰謀家，他們都希望看到阿伯丁勳爵如何擺脫他的困难而又微妙的处境。

在概述阿伯丁勳爵的发言和克兰里卡德侯爵对他的攻击之前，我应当先追述一下两位发言人主要涉及的时期和情况；这就是1829年阿伯丁勳爵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时期。当时，俄国舰队在海軍上将葛伊甸的指揮下封鎖了达达尼尔海峽、薩罗斯灣和埃內茲灣以及阿德腊米提和士麦那等港口，从而違背了1815年圣彼得堡內閣和倫敦內閣之間簽訂的协定——按照这个协定，俄国不得在地中海采取任何軍事行动。这种封鎖威胁到了英国在列万特的貿易，使当时英国的通常是矇矓欲睡的輿論激动起来了，并引起了对俄国和对內閣的抗議怒潮。結果俄国大使利文公爵和馬士舍維奇伯爵同威灵頓和阿伯丁举行了会談。关于这次談判的性质，利文公爵在1829年6月1日(13日)从倫敦发出的紧急报告中說道：

“大約一小時后〈在同威灵頓公爵进行了不能使这位俄国外交官完全滿意的談話以后〉同阿伯丁勳爵进行的談話同样是值得注意的。他还不完全了解我同首相的談話，但在获悉談話的詳細內容之后，他就极力設法冲淡他在談話开始时可能使人留下的不愉快的印象。他再三保证說，**英国从来不打算借故同俄国爭吵**；如果英國內閣力图影响我們，要我們放棄对埃內茲灣的封鎖，那末它之所以这样做只是想防止有人提出令人厭煩的要求以及巩固两个內閣之間的良好关系；**我們有或許比我們自己設想的还要多的理由来庆幸我們从英国的这种成功而經常的协助中得到好处**。他认为他的功劳是，为了保持这种協調一致，他可以容忍封鎖埃內茲灣可能給我們带来的暂时利益；但是他担心，圣彼得堡沒有很好了解英國內閣的立場。阿伯丁有时提出的那些反对意見，例如，在不久前发生的事件上提出的反对意見，都被归咎于他心怀叵測和敌意，而事实上这类居心和 *arrière-pensées*〔暗計〕同他的情緒和政策都大相徑庭。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处境是极其微妙的。英国輿論随时准备对俄国进行敌意的攻击。**不列顛政府对此就不能經常置之不顾**，而且在同

民族偏見密切相關的問題上〈指海上權利〉向輿論挑戰是危險的。但是俄國仍然能夠指望得到正在反對它們〈指民族偏見〉的英國內閣的好感和友情。

對於這一點我反駁道：‘我知道輿論在英國的意義，我也觀察了它在幾天之中的變化。在這次戰爭中輿論反對我們，因為它認為我們是侵略者，雖然我們遭到了侵犯；它指責我們企圖推翻奧斯曼帝國，然而我們聲明，這並未列入我們的計劃；最後，它硬說我們奉行我們自己所反對的那種好大喜功的政策。在這個問題上使輿論了解真相是糾正輿論的最可靠的辦法。’

阿伯丁勳爵回答我道，事情並不完全像我所說的那樣；輿論反對俄國是因為在英國輿論通常都是熱烈地支持輝格黨人，*au reste*〔然而〕，不列顛內閣絕不希望我們失敗；相反地，它希望我們迅速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因為它知道，這是結束戰爭的唯一辦法，這場戰爭只能看做是一個極大的不幸，因為它的後果無法預料！在結束談話時，英國大臣發表了長篇議論以證明我們把他不可能有的意圖強加於他了，最後他聲明說，倫敦內閣希望，戰爭的結束能夠使俄國得到光榮和利益。”¹⁵⁸

令人奇怪的是，阿伯丁勳爵的敵人中誰也不認為援引這個報告是恰當的，而這個報告對於阿伯丁勳爵在阿德里安堡條約簽訂以前那個時期的行為揭露得如此令人信服，以致這位閣下在這個條約簽訂以後所寫的秘密報告的內容絲毫不值得重視了。公開上面引用的那個報告，就會一舉摧毀阿伯丁勳爵在昨晚發言中用來為自己辯護的唯一論據。他的真正的辯護只能是公開地反過來責備帕麥斯頓勳爵，因為參加這次“打架”的只是俄國的這兩個彼此勾心鬥角的老僕役。

阿伯丁勳爵在開始時聲明，他既沒有什麼要收回的，也沒有什麼要駁斥的，他只是想作一點“解釋”。有人錯怪了他，以為他要邀草擬阿德里安堡條約之功。他根本沒有草擬這個條約，而是反對這個條約，上院從他現在建議宣讀的這個報告中可以深信這一點。這個條約使他和他的同僚感到的驚恐如此之大，以致單單這

个条約的存在就使政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問題上改变了它的全部政策。政策的这个改变表现在哪里呢？在阿德里安堡条約簽訂以前，無論是他，阿伯丁勳爵，或者是威灵頓公爵（在当时情况下他們都遵循坎宁的政策）絕沒有想到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王国，而只是想建立一个諸如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維亚之类的在土耳其政府保护下的藩屬。阿德里安堡条約簽訂之后，土耳其帝国的局势在他們看来是如此危急，土耳其帝国的存在是如此不穩，以致他們建議把希腊从一个藩屬变成一个独立王国。換句話說，既然阿德里安堡条約大大促使土耳其衰落，那就决定夺走土耳其的若干省份来抵銷这个条約的危險后果。“改变”就在这里。

尽管他們对这个条約可能引起的后果的担心被夸大了，但是，阿伯丁勳爵毕竟不是沒有認識到这个条約是极端有害的。他当时曾說过，“俄国並沒有由于这个条約而获得广大的領土”。而且現在他还相信，俄罗斯帝国最近 50 年来並沒有像林德赫斯特勳爵所断言的那样大大扩展欧洲的版图。（按照高貴的勳爵的意見，貝薩拉比亚、芬兰和波兰王国都不算是大大扩展的結果）但是，正如他在 1829 年 12 月的紧急报告中所說的，如果說俄国扩展的領土不大，然而它毕竟有巨大意义：其一是让俄国“单独控制了多瑙河的航行，其二是让俄国控制了亚洲的一些港口。誠然，这些港口不大，但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俄国人在高加索获得的大片領土这件事又从阿伯丁勳爵的記憶中消失了。）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断言阿德里安堡条約是俄国政策改变的开始，而自从条約簽訂以来，俄国与其說力图获得新的領土，不如說力图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政策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意图的改变。“撒旦只是变得比过去更聪明了”。俄国會同查理十世商量妥了一个通过一系列条約而不通

过引起惊恐的占领来吞并土耳其的计划，这一事实竟被一字不提地迴避了。阿伯丁勋爵也认为不宜提到：俄国甚至还在阿德里安堡条约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他把后一个条约算作俄国政策改变的证据）签订以前，早在 1827 年就向法国和英国承担了义务，即不打算利用对土战争来攫取新领土；而且俄国没有英国的许可，就不可能在 1833 年向君士坦丁堡进军。

往下，阿伯丁勋爵断定，他所說的“如果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后，我们能够获得哪怕只有 25 年的和平，那就不坏了”这句话，被人曲解成好像他准备回到类似阿德里安堡条约这样的条约去，其实他只想說，

“如果由于某项因战争而签订的条约得以保证 25 年和平，那末，从人类事务变幻莫测来看，这样就不坏了。他完全不是建議恢复 *status quo* [状态]，但也不反对它。在宣战以前，除了 *status quo* 外他们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期待和希望；他们不曾希望获得更多的东西，土耳其政府也同意这一点，而这比他们有权期待的东西要多得多。但是，一經宣战，整个问题的提法就改变了，一切都將取决于战争……誰也不能說将会离开 *status quo* 多远，因为这取决于誰也无力操纵其进程的那些事件。但有一点他能够說：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应当得到保证，得到确实的保证”。

应当如何保证呢，这一点他阿伯丁勋爵，就不可能說了，因为这仍然要取决于战争进程。人家这样来看他，似乎他不相信俄国进攻的威胁，或者說他怀疑这种进攻的现实性；实际上他非常担心俄国对土耳其的进攻，虽然，他对俄国进攻欧洲这一点并没有感到很大的不安，而且，“这种不安还在逐日平静下来”。他认为法国比俄奥两国加起来还强大。然后高贵的勋爵抱怨“他所遭到的极端荒謬和恶毒的人身攻击”。事实上在国内除他外再沒有别的和平拥护者了，然而恰好就是他的热爱和平使他特別适宜于以最大的

精力进行一場战争。

“他的同僚不否认，他个人或許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要求迅速前进，并把联軍的兵力集中在巴尔干半島上，以便支持奧美尔-帕沙的英勇的軍隊，并向奧地利伸出手，使它有可能更积极地参与軍事行动。”

这就是阿伯丁始終不渝地坚持的行动路綫。他在回答波門特勋爵的质問时說，“虽然他过去也是梅特涅公爵的摯友，但是自从他执政以来，即最近 18 个月中，他和公爵既沒有直接联系也沒有間接联系；只是在前几天他的一位女友通知他說，她打算写信給梅特涅，問他有沒有什么話要轉告公爵；阿伯丁回答說：‘請向他轉达我衷心的問候。’”。

阿伯丁的发言在議院中大体上順利通过了，但有趣的是：对于克兰里卡德侯爵（絕望的外交大臣职位的追求者、前帕麦斯顿勋爵駐圣彼得堡大使）給他的挖苦的回答，內閣閣員中竟沒有一个人进行任何反駁，而且沒有一个人发言证实阿伯丁是第一个极力主張进行战争的人。

克兰里卡德侯爵特別詳細地談到了阿伯丁参加草拟阿德里安堡条約这件事，談到了对他以往政治活动的总的評价以及他在目前执政过程中所犯的过失。他說，阿伯丁勋爵在几个月前拒絕把急件通知两院的其他議員而現在却为了一己私利，純粹出于个人的动机将它公开出去。但是这个急件的内容同高貴的勋爵在 1829 年 9 月阿德里安堡条約簽訂之后，于同年 12 月写給圣彼得堡的内容完全不同。問題的实质在于，当时他給英国大使发出的是些什么指令，他为了阻止这一条約的簽訂又采取了哪些步驟。当时統率阿德里安堡俄軍的將軍部下最多不过有 15 000 名兵士，而且从这个数目中还需减去因病或因伤而根本 hors de combat〔丧失战

斗力的] 5 000—6 000 人。另一方面，率領着 25 000 名阿尔巴尼亚兵士的土耳其將軍就駐在附近。俄国將軍只給土耳其一个很短的期限来决定簽訂还是不簽訂提出的条件，因为他知道，如果給土耳其人更多的時間，他的真实情况就会被人知道。因此，他也就給土耳其人不过 5 天到 8 天的時間来考虑。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大臣邀請奧英两国大使和普魯士公使来商討对策并征求他們的意見。英国大使遵照阿伯丁勳爵的指令建議尽速簽訂这个条約，而这个条約現在都被高貴的勳爵說成是极端有害的东西。

有一个情况是高貴的侯爵不想提起的，这就是正因他的朋友、当时在野的帕麦斯頓勳爵尖銳地攻击阿伯丁勳爵，指責他过分反俄，才迫使阿伯丁下令簽訂条約的。

侯爵然后又責罵首相，說他一向是欧洲专制制度的最热心的、最坚定的和最有力的拥护者，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用了葡萄牙、比利时和西班牙的历史，并暗示阿伯丁曾經反对 1834 年著名的四国同盟¹⁵⁹。的确，需要有老輝格党人的冷靜沉着和恬不知耻的本領才能在这个时候吹捧比利时的“光荣”，吹捧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宪政”，吹捧欧洲因四国同盟而得到的普遍幸福，而对于四国同盟，帕麦斯頓在自己的辯护詞中曾不顾真相地說这是达萊朗而不是他帕麦斯頓出的主意。

关于目前这场战争的战况，克兰里卡德說道，作战計劃是由俄国最高軍事当局于去年 12 月制定的，不列顛政府也知道这个計劃，計劃規定不单要占領多瑙河各公国，而且要强渡多瑙河，占領錫利斯特里亚，迂迴苏姆拉并进军巴尔干。高貴的勳爵掌握了这个情报，却向議院发表了几次关于和平問題的演說，并且不认为需要把內閣在当时和 2 月底 3 月初发給陸軍部的命令通知議院。

如果克兰里卡德勋爵記得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是怎样回答迪斯累里的，而克拉伦登勋爵在上院又是怎样回答他本人的，他也許不会使自己陷入可笑的境地：仅仅責备阿伯丁勋爵一个人这样玩忽职守，而不同样指責他的輝格党朋友，虽然整个內閣都应当受到指責。

侯爵感叹道：“如果，如果政府在 15 个月前走上了应走的，我甚至想說是走上了光明磊落的道路，那末战争就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这正是迪斯累里先生向約翰·罗素勋爵所說的話。

最后，侯爵竟达到如此荒唐的地步，以致把联合內閣的一切錯誤，內閣在議會中在一切重大問題上所遭到的不断失敗都归咎于阿伯丁勋爵个人，而且只归咎于他一个人。他竟沒有記起，还在这个內閣組成的时候，头脑清醒的人就說过，內閣如果不公开一切立法問題，不放棄一切政治手腕，就連 6 个星期都支持不下去。

布魯姆勋爵发表了一个愚蠢的演說，声明他对阿伯丁勋爵的第一个发言，尤其是第二个发言感到完全滿意。在他演說之后問題便解决了。

整个这个事件的实质在于，在維也納草拟的秘密議定书的意义被一笔勾銷，而这意味着繼續采取軍事行动，繼續战争，而人們却如此确信战争会很快結束，以致尽管在市場上有了大量公債，統一公債还是上漲了 3%，而在軍人俱乐部已有人打賭說，战争不会超过 4 个星期。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6 月 27 日

載于 1854 年 7 月 10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126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馬德里的起义。——
奧地利—土耳其条約。——
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

1854年7月4日星期二于倫敦

早在意料之中的馬德里的軍隊起义，终于在奥当奈尔將軍和杜耳塞將軍的领导下爆发了¹⁶⁰。法国政府报纸急急忙忙地向我們报道說，根据它們得到的消息，西班牙政府已經克服了危局，起义被鎮压下去了。但是，“紀事晨报”駐馬德里記者詳述了这次起义，并引述了起义軍的宣言全文，他說，起义軍撤出首都只是为了同阿耳卡拉的駐軍汇合，如果馬德里形势仍然不利，他們可以很容易地开拔到薩拉哥沙。如果这次运动比不久前这个城市里的起义¹⁶¹順利，这就会迫使法国放棄它所采取的軍事行动，引起英国和法国之間的分歧，可能还影响到西班牙和美国之間現存的糾葛。

据悉，正如我上次根据倫敦和曼彻斯特交易所发表的公告所指出的^①，俄国新的公債显然还没有由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先生等最后办妥手續，这些銀行家不肯給俄国国库預支任何現金。他們只同意請歐洲的各个交易所承担这项公債，自己則不承担任何义

① 見本卷第305頁。——編者注

务。有消息說，这次公債能否成功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同时，据我們所知，柏林和法兰克福对它不表同情。汉堡的参議院禁止它由官方挂牌，如果相信“紀事晨报”的报道，則英国外交代表和領事已經向不列顛臣民发出通告，警告他們不得认购“旨在进行反对女王的战争”的公債。

关于俄軍从錫利斯特里亚撤圍后的去向，各种消息的說法不一。“通报”說俄軍已撤到普魯特河左岸，而維也納的“新聞报”却断定，这种說法絲毫不能令人相信。看来，恰恰相反，俄軍目前甚至还不打算撤出瓦拉几亚，因为利普兰迪將軍占領了普洛耶什特和肯皮納一帶的陣地，并把前哨布置在罗瑟土姆山口的入口处，而主力部队据报道經過斯洛博德捷亚，沿多瑙河左岸，进駐到布来洛夫一带。另一方面，占据多布魯甲的利迭尔斯軍还没有放棄图拉真垒墙防綫，即使繼續撤退，該軍也未必会交出曼成和伊薩克查。据說，大批联軍正向莫尔达維亚开拔，看来，俄軍准备在那里集結大量兵力：帕紐亭將軍率領的軍已經从波多利亚調到这里，补充兵員正在从貝薩拉比亚向这里开拔。在上莫尔达維亚的雅西、罗曼和博托夏尼之間，俄軍兵力似乎达到了6万人，还有2万人的一个师駐在卡緬茨一带。“东德意志邮报”报道：“帕斯凱維奇声称，他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放棄多瑙河口。”俄軍說，他們所以撤退只是因为多瑙河上游发生了时疫。

奧軍的行动目前还完全不清楚。据傳說，科罗尼尼的那个軍已奉命乘船开往沃尔肖伐，以便順河而下，取道茹尔日沃开赴布加勒斯特。奥地利政府机关报“意大利信使报”报道，这一行动的唯一目的是要占領瓦拉几亚的中立地带；同时，我們获悉，俄国拒絕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紀事晨报”登載的一則电訊說：

“俄皇在答复奥地利要求的复文中表示願意同四强国談判除苏丹的基督教臣民的特权問題以外的一切問題。关于特权問題他只想同土耳其政府直接談判,不允許四强国干涉。他也拒絕提出关于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的任何保证。”

因此,这样拒絕的后果完全可能引起奥俄之間一場装装样子的战争。这种战争会变成一場像著名的布隆采耳战斗¹⁶²(当这场战斗結束了1850年普奥之間的假战争的时候,各报还在惊惶地揣測这次“中欧危机”的可怕后果)那样的光荣的 *rencontre* [决斗]。与其对奥地利現行政策可能产生的作用作这类假設,倒不如来看一看真正存在的6月14日的奥土条約。这个条約已經正式全文公布了。

这里需要注意到两个因素:奥土之間的关系以及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人民对土、奥或其他外国的态度;实在令人奇怪,完全受外交家們左右的欧洲輿論完全忽略了后一个因素。

条約的第一条內称:

“奥地利皇帝必須采取一切手段——外交的以及其他的手段,爭取外国占領軍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必要时,甚至派出必要数量的軍隊来达到这个目的。”

这一条使奥地利皇帝有全权不用事先向俄国宣战,就可以調任何数量的軍隊进入瓦拉几亞。这样一来,土耳其的藩屬就会随时遭到攻击而变为奥地利統治下的反对土耳其的中立領地。第二条規定,

“軍隊行动的指揮权仅屬於帝国总司令。而后者則要注意将他所要采取的行动及时通知奥斯曼軍隊的总司令”。

有了这条協議,奥地利人不仅摆脫了土耳其对任何被认为适

当的軍事行动的任何监督，而且还取得了对土耳其統帥部在瓦拉几亞領土上所能采取的一切行动的絕對监督权，因为他們只要通知土耳其統帥部他們打算占領某个据点，就足以阻止土軍开赴到那里。如果考虑到除多布魯甲这块不大的地方之外，多瑙河各公国是唯一可能成为土俄战争的戰場，那末显而易见，奥地利的干涉既能完全阻止土耳其扩大胜利又能惩罚侵入它的領土的敌人。

第三条規定：

“奥地利皇帝必須根据与奥斯曼政府相互之間的協議，尽可能恢复多瑙河各公国的法定秩序——根据土耳其政府在該地区的內部管理方面所賦予的特权而产生的法定秩序。但是，以此种方式恢复起来的地方政权不得把自己的职权扩大到对帝国軍隊作某种监督。”

这样一来，奥地利皇帝只要认为可能，就有充分的自由来恢复現存秩序；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可以完全仿效俄国將軍布德貝尔格那样，恢复地方政权不过为了使它們服从奥地利軍事法規。

第四条規定：

“奥地利宮廷必須不同俄国宮廷締結任何触犯苏丹主权和苏丹帝国的完整的协定。”

第五条又規定：

“一旦土耳其政府和俄国宮廷的和約簽訂而使本协定的目的达到，奥地利皇帝应尽可能立即采取措施，撤出他的軍事力量。有关奥地利撤軍的詳細条件将与土耳其政府專門协商。”

在这两条的前一条中，奥地利保留了同俄国締結协定的权利，只要协定根据維也納照会¹⁶³中所确定的 status quo〔状态〕原則就行。在后一条中，奥地利答应不是在它同俄国簽訂协定之后，而只是在俄国同土耳其之間的条約簽訂后才撤出它的軍隊。“物质保

证”已經不再稳稳当当地操在俄国手中，它正在轉到奥地利手中，而奥地利則有全权保持它——經土耳其政府的同意——直到土耳其同意“两个帝国宮廷之間的协定”为止。

第六条規定奥地利人有权甚至不需有形的偿付，而将俄国人撤走后留在多瑙河各公国的一切生活用品据为己有。这项协定的好处只有在德国才能够理解，因为德国居民已經习惯于把奥軍作为一种对自己的革命罪的惩罚来接受，因为在德国从1849年到1850年，奥軍曾把整片地区劫掠一空。

这个条約实质上就是把多瑙河各公国轉让給奥地利并使土耳其不再对它們行使宗主权。同时，土耳其人像以前俄国人一样，对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人民的权利进行了令人发指的破坏。土耳其人就像有权把多瑙河各公国宣布为俄国行省一样，有权把它們让給奥地利占領。

土耳其政府要求对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的宗主权是根据1393年、1460年和1511年的三个条約。1393年瓦拉几亚和土耳其之間的条約有以下几条：

“第一条 我們，即巴耶济德等本着对隶属于我們不可战胜的帝国的瓦拉几亚的寬厚精神，和它的执政国君共同决定，这个国家將繼續根据本国的法律进行統治，瓦拉几亚国君將有充分的自由自行選擇方式和时机同邻邦宣战和媾和。

第三条 国君(基督徒)由大主教和貴族选举产生。

第四条 瓦拉几亚国君有义务每年給帝国国庫納貢500披亚斯特。”

1460年瓦拉几亚国君符拉德五世和穆罕默德二世簽訂的条約規定：

“第一条 苏丹同意并且保证由他本人和他的继承人保护瓦拉几亚和防

御任何敌人的进犯，为此仅要求瓦拉几亚承认苏丹对作为主权公国的瓦拉几亚具有宗主权，地方长官为此必須每年向土耳其政府納貢 1 万披亚斯特。

第二条 土耳其政府不以任何方式干涉該公国的地方行政，任何一个土耳其人无重大原由，均无权进入瓦拉几亚境内。

第三条 地方长官照旧由大主教、主教和貴族选举产生，土耳其政府承认这种选举是合法的。

第四条 瓦拉几亚人民仍享有按本国法律进行管理的自由，它的地方长官享有对其臣民生杀予夺的权力以及宣战和媾和的权力，他們自己的行为不对苏丹負任何責任。”

第三个条約就是 1511 年的条約。莫尔达維亚在条約中承认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并为自己爭取到比瓦拉几亚所取得的更为有利的条件。

俄土之間簽訂的条約当然不能使莫尔达維亚人和瓦拉几亚人自己同土耳其政府簽訂的条約失效，因为这两个民族从来没有跟俄国人进行过談判，也沒有給土耳其政府代他們达成協議的权利。而且值得指出的，俄国本身在阿德里安堡条約中已經承认上述特惠条例。这个条約的第五条規定：

“鉴于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維亚两公国根据特惠条例服从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而俄国保障它們的繁荣(!)因此，显而易见，它們繼續享有它們的特惠条例所赐予的一切特权和豁免权。”

上面援引的几个特惠条例現在依然有效，因为后来的任何条約并没有廢除它們，根据这些特惠条例可以看出，多瑙河两公国是两个受土耳其政府庇护的主权国家，它們是在土耳其政府保卫它們不受任何外敌侵犯，同时决不干涉其内部管理的条件下向土耳其政府納貢的。土耳其人不仅无权将瓦拉几亚交給外国占領，而且他們自己沒有重大理由也不得进入瓦拉几亚的領土。不仅如

此，由于土耳其人这样違反了同瓦拉几亚人簽訂的特惠條例而喪失了宗主权，俄国人只要有瓦拉几亚人向他們提出請求，甚至可以援引被土耳其違反的條約來論證自己有权將奧地利人趕出兩公國。而且，這一點決不會令人感到意外，因為俄國採取的政策一貫不僅鼓勵，甚至还唆使土耳其人破壞瓦拉几亚人的權利，以便在他們之間煽起敵意，從而給自己製造干涉的借口。就拿 1848 年來說罷，這一年發生了什麼事情呢？這年春天，幾個貴族向莫爾達維亞國君呈遞了請願書，要求進行某些改革；在俄國領事的影响下，不但這些要求沒有得到滿足，甚至連寫請願書的人也被投入了監獄。這個做法所引起的騷動以後就成了俄國于 6 月 25 日越過邊境向雅西推進的借口。同時，瓦拉几亚國君仿效歐洲其他國家政府的做法，答應進行瓦拉几亚貴族自由派所要求的若干改革。這是 6 月 23 日的事情。不用說，這些改革絲毫沒有觸動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但是，它們破壞了俄國依靠在 1829 年占領期間頒布的并為上述改革廢除了的根本法¹⁶⁴ 而取得的一切影响。代替這個根本法而制定出來的憲法廢除了農奴制并把農民耕種的一部分土地轉歸農民所有，而地主可以從國家領取賠償費，以補償他們所失去的土地和占有他們的農民的勞動的權利。後來，執政國君在俄國人的慫恿下放棄了王位，一個臨時政府成立起來主持國事。而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无权干涉公國的內部事務，并且錯過了抗議俄國人進入莫爾達維亞的時机的土耳其政府，派遣蘇里曼-帕沙率領土耳其軍隊進入瓦拉几亚并發表了威脅性的蘇丹告居民書；這些措施自然是御前會議在俄國壓力之下通過的。瓦拉几亚人出來迎接帕沙和土耳其人并同他們結成盟友。于是簽訂了一項協定：臨時政府將由 *Lieutenance Princière* [公國總督] 接替，后者開始時本來

由 6 人組成，以后改由 3 人組成。这个政府得到了帕沙的承认，而且在帕沙的坚持下，也得到外国領事的承认。新宪法又經過了某些修改之后也被苏丹批准了。

然而，俄国政府在向全欧洲发出的宣言中大发雷霆地攻击瓦拉几亚人民，指責它建立了共和国并宣布了共产主义。1848 年 8 月 1 日，大批俄国軍隊渡过普魯特河，向布加勒斯特进发，苏里曼-帕沙突然被土耳其政府召回；苏丹拒絕接見应他本人的邀請前来君士坦丁堡的瓦拉几亚代表，而 9 月 25 日，傅阿德·埃芬蒂率領土耳其軍隊到了布加勒斯特城下，声称此行純粹是为了消除俄国侵入多瑙河各公国的任何借口。布加勒斯特城和城郊的十万多居民听信了土耳其人的話，不带武器，穿上节日服装，以僧侶为首，出城欢迎他們。傅阿德·埃芬蒂让他們派代表团到他的兵营接受訓示。布腊提昂諾先生在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中說：

“代表团还来不及向傅阿德·埃芬蒂說明身分，便已經被捕了；同时，土耳其軍隊以急行軍奔向布加勒斯特，土軍的騎兵的铁蹄踐踏了把土耳其人当作朋友来欢迎的和平居民，撕毀了他們的旗子，折断了十字架，开枪乱射路上見到的兵营和城內的整个街坊区，用霰彈射击兵营里的瓦拉几亚兵士，迫使他們投降和繳械，还杀死病員；軍隊进城后大肆搶劫、屠杀以及干下其他駭人听聞的暴行。”

这里，俄国全权代表杜加美尔將軍支持了并且实际上指揮了土耳其軍隊。在他后面俄軍跟着开到；結果簽訂了巴尔塔利曼尼条約¹⁶⁵。这个条約除了其他一切之外，还恢复了俄国拟定的根本法，即所謂的法規，而这正是奥地利目前有义务在瓦拉几亚恢复的那种 *status quo* [状态]。

很明显，如果奧美尔-帕沙現在率領他的常胜軍进入瓦拉几

亚，那末接受了不久前的教訓并同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土耳其人，就会恢复 1848 年宪法及其全部后果，即“共和国、共产主义”和 1848 年全部产物。没有人会相信，奥地利会比俄国更喜欢这个前途。另一方面，也很明显，土耳其政府一定受到非常强大的压力，才会同意再次破坏自己同瓦拉几亚人訂的条約，虽然它根据經驗知道这个步骤会有怎样的后果。能施加这种压力的只有英国大使。因此，回忆一下同一个雷德克利夫勋爵以及他的唐宁街上司在 1848—1849 年对俄国人和土耳其人破坏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的权利的态度，是很有趣味的。

1848 年 6 月，当俄国军队初次开进莫尔达維亚国境时，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回答忠实不变的达德利·斯图亚特的质問时说：

“俄軍没有得到圣彼得堡內閣的命令开进了莫尔达維亚；它的目的只是維持或建立秩序，事后将立即撤出；它进入国境曾得到国君的同意，俄国无意占据这块地盘。”

1848 年 8 月，当俄国军队再次渡过普魯特河开往布加勒斯特，而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人派遣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御前會議曾向英法两国大使征求过意見并从雷德克利夫勋爵那里得到关于遵循俄国所規定的政治方針的建議。

10 月，当土耳其人和俄国人共同占領瓦拉几亚时，俄国人追查某一个普通的瓦拉几亚軍官一直找到布加勒斯特土軍总司令奧美尔-帕沙的寓所，后者曾和傅阿德·埃芬蒂一起就此事提出抗議。土耳其政府知道这次受辱以后，声明它不願意再跟俄国人打交道，并且命令它的军队撤到多瑙河右岸，不再参与实行俄国人在多瑙河各公国的政策。同时，土耳其政府威胁要向各大国提出一項严正的抗議并以說明多瑙河各公国发生的全部事情的詳細备忘

录作证明。又是那位大使再次出面干涉，并打消了土耳其政府的这一意图。

最后，当 1849 年俄土的联合占领具有恐怖制度的性质，并且瓦拉儿亚非正规军首领馬基耶罗孤军抵抗的时候，他不得不撤到喀尔巴阡山北，而“屈从于不列颠总领事提出的理由，这个总领事向他指出，他的军队在这里有碍外交家们的活动，并且指出他的国家不久将重新享有它的权利”。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7 月 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4 年 7 月 19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134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弗·恩格斯 多瑙河战争¹⁶⁶

大約八十年前，当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常胜軍从土耳其手中陸續夺取了現在改称为南俄罗斯的那些省份时，詩人捷尔沙文在一次詩兴勃发时（在这种时候他通常是对女皇本人的荣誉甚至美德以及对女皇帝国的偉大未来大加歌頌），写了一首值得注意的二行詩，这首詩就在現在也能概括地表现出沙皇政策的傲慢和自負。他写道：

俄罗斯啊，同盟对你有什么用？
迈步前进，全世界就是你的。^①

假如俄罗斯果然能够迈步前进，这些话甚至在今天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俄国的前进遭到极其严重的阻碍。因此，至少在目前它不得不稍微推迟一下夺取全世界的計劃。不过特別伤害它尊严的是它退却了，它不仅不能夺得世界霸权，甚至对于誓欲夺取的多瑙河上普通要塞錫利斯特里亚的鎖钥障地，都只好让它们原封不动地留下。而且更惨痛的是遺下了約五万具同胞的骸骨，他們都是在这场独特的战局中陣亡和病死的。

从軍事观点来看，圍攻錫利斯特里亚无疑是这次战争开始以

① 捷尔沙文“占領华沙頌”。——編者注

来最重要的事件。正由于俄軍沒有能够夺取这个要塞，这个战局对他们說来就完全失败了，而他們目前向塞勒特河对岸的撤退更使沙皇感到耻辱和不高兴。关于圍攻錫利斯特里亚的前几个阶段，本报讀者已經看到了詳細的、在我們看来是完整的分析；現在，在终于得到“太平洋号”輪船带来的俄国公报以后，我們就可以从头至尾把这一次行动整个研究一番，并对每一方作出应有的評价。除了俄国公报（它写得清晰、确切、实事求是，不过在內容上有很多遺漏的地方）以外，現在我們还有奈斯密斯中尉（屬孟加拉炮兵）給倫敦“泰晤士报”写的一篇报道¹⁶⁷。这是完整的圍攻日記，其中有許多有趣的情节，但写得相当粗糙，有时日期也不确切。应当指出，我們以前对圍攻提出的那些看法和結論，都被这些更近更詳細的报道完全证实了，只是下面情节有出入：土軍并未放棄阿拉伯堡的防守，而我們曾估計土軍在圍攻的最后阶段将不得不放棄它。同样很清楚，俄軍的行动比我們所預料的还要輕率。起初，他們从东面的多瑙河低地对要塞展开正規圍攻，希望能完全繞过那些同要塞隔开的堡垒，并立刻在錫利斯特里亚的主墙上打开缺口。如果說这个嘗試有某种优点的話，那末这个优点也只在于它新奇。它可能是第一个在这种不仅側面受到敌人筑有工事的高地的威胁，而且还被后面的高地瞰制的地形上构筑塹壕和接近壕以攻打要塞的例子。但是以后，俄軍便对这些高地进行了另一次非正規圍攻，并且圍攻进行得如此巧妙，以致虽然偵察和强攻花了两个星期的時間，数千名俄軍在强攻中被击毙受重伤，还是不得不对这些高地发动正規圍攻。关于俄軍这种高超的打法，我們不想再說什么，現在来談談圍攻的詳情。

6月1日，俄軍从多瑙河左岸又运来一批攻城炮，組成了攻击

阿拉伯堡的炮队。土軍挖掘了豎井并在堡垒的外岸和斜堤下面埋放了炸药。6月2日，錫利斯特里亚守軍的司令官穆薩-帕沙被爆炸彈炸死。傍晚，俄軍在阿拉伯堡的一个棱堡下进行了一次爆破。既然他們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能够到达斜堤頂，所以炸药无疑是埋得不很准确的。距离和最小抵抗綫显然算錯了，結果这次爆破不仅沒有使土軍的防御工事受到損失，反而向后爆炸，石头和土块雨点般地落进俄軍的塹壕。这时作好攻击准备的强攻部队正集中在塹壕中，因此，这些雨点般的石块会对他們起什么作用也就很容易想像了。至于俄軍封鎖要塞的效果低到什么程度，根据下面事实便可以判断出来：在这一天，5 000名土耳其非正規部队从錫利斯特里亚以西的腊兹格腊特突入了这座被圍的城市。

从6月4日到8日繼續进行攻击阿拉伯堡的掘壕作业。俄軍到达了斜堤，大胆地把地道挖到斜堤頂，不过俄軍对它的炮火掩护很弱。他們开始在壕沟下面埋放炸药，一直埋到棱堡的内岸。当帕斯凱維奇元帅在6月9日又采取他那难以理解的显示威力的行动，即以31个步兵营、40个騎兵連和144門野炮对要塞进行偵察时，这些作业仍在进行中。至于他希望从这种行动中得到什么，这是任何人都无法說明的。看来这是显示威力的行动之一，采取这些行动仅仅是希望找机会采取重大行动或者至少使敌人相信抵抗是无益的。但是对于土軍，并没有发生这样的影响。相反地，他們派出了4 000名騎兵迎击俄軍。据俄軍公报称，这些騎兵被彻底击潰了，但奈斯密斯肯定說，在这次战斗中他們是繳获了俄軍的60匹战馬而回来的。就在这个时候，帕斯凱維奇不但沒有在这次偵察中获得好处，反而被土耳其球形彈偵察上了，这颗炮彈使他 hors de combat [負了伤]，以致他不得不被送到雅西。

6月10日，圍攻达到了顶点。施尔德尔寄予最后希望的大包炸药爆炸了。它确实在阿拉伯堡的前棱堡上炸开了一个可以通行的缺口。俄軍发起了强攻。但是，正如他們所应当預料到的，土軍早在主牆后不远的地方构筑了有壕沟的 *coupure* [二重堡]，即第二道工事，当俄軍接近这里时，就被迫停止前进并遭遇致命的射击。强攻的部队既已被阻前进，那就是被打敗了，因为敌人依靠着圍牆的掩护，依靠着从近距离发射而使每发炮彈都可以击中目标的炮兵的支援，他們的火力簡直可以迫使攻击者在数分钟内退却。因此，俄軍不得不从他們所打开的缺口仓卒退却，土軍一直跟踪追击到俄軍的塹壕，并破坏了一部分圍攻工事。这次攻击是俄軍对錫利斯特里亚的最后一次重大的行动。如果說在停止圍攻的命令到达以前，圍攻在表面上和形式上仍在繼續，那末这只是为了維持面子而已。6月12日，封鎖已非常不严，以致来自苏姆拉的一些欧洲軍官毫无困难地进入了要塞。

俄軍从5月19日起开始在多瑙河低地挖掘塹壕，5月22日以7个炮队开始轰击阿拉伯堡。次日，又增加了15門火炮对付这个堡垒。尽管如此，俄軍的报告說，对阿拉伯堡的正規圍攻是在5月31日才开始的。看来，这說明在5月21日和22日配置的炮队只担任第一綫任务，而装备重炮也仅仅为了对堡垒进行纵射。自5月31日到6月10日，俄軍炮队推进到距堡垒100碼的地点，即从第一道平行壕推进到斜堤脚下的第三道平行壕。斜堤頂上沒有王冠形壕，也沒有构筑塹壕式炮台，但是如我們已經提到的，俄軍挖掘了通向斜堤坡的对壕，以便在斜堤頂埋放炸药。

从所有的报道中可以看出，阿拉伯堡不过是規模虽大但不能进行长期抗御的野战工事，所以，休森-帕沙指揮的包括4个步兵

营和 500 人非正规部队的守军的行动，当然值得大加赞扬。远射程火炮轰击 9 天、在暴露的塹壕中停留 11 天、两次地道爆破和四、五次强攻，这一切都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像阿拉伯堡这样一个普通的外围堡垒能够支持这样久，确实在战史上难以找出第二个例子。这很像普军的 1807 年科尔貝克防御战和法军的 1813 年但澤防御战。

在整个围攻期间，奥美尔-帕沙根本没有设法支援和解救这样重要的地点，这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但是从他给維丁总督薩米-帕沙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当俄军向多瑙河左岸退却时，他确实曾准备前来援救錫利斯特里亚。

他在这封信里写道：“你知道，我已把我们所有的部队集合在苏姆拉地区，准备去援救要塞。6 个骑兵团和 3 个炮队已从苏姆拉向那个方向开拔。俄军知道了这个行动以后，带了他们的全部炮兵仓卒退到左岸。在围攻要塞的 40 天中，他们被击毙的有 25 000 人。”

至于俄军现在打算做什么，还无法断定。如果相信某些維也納报纸报道，俄军则企图在布澤烏河对岸占领阵地，但是，也就是这些报纸又断言，俄军由于害怕奥军才撤退，而且布澤烏河的阵地已被奥军迂回。如果俄军企图扼守莫尔达维亚，奥军就会从加里西亚和布柯維納方面迂回。但是，如果俄国驻波兰的部队同驻波多利亚和沃倫的前多瑙河军团及时会合，也可以反过来迂回奥地利，而使加里西亚的东北部一直到桑河和德涅斯特河为止的地区处于俄军的打击之下。

如果我们暂时撇开政治上的原因不谈而假定奥地利准备同联军一起进攻俄国，那末情况就会是这样：奥地利可能出动 20—25 万兵力同联军一起行动，而联军则拥有大约 10—12 万土军和 6 万

英法军队。为了对抗这些兵力，俄国可以出动多瑙河军团的4个军和它们的预备队，除去一定的伤亡，约有20万人。帕纽亭指挥的第二军、3个骑兵后备军和一些步兵预备队以及由新兵组成的增援部队，总共可能有18万人左右。因此，俄国的全部兵力可达35万人，其中还须除去克里木和南俄某些地区的守军。此外，为了防守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省，还须留下近卫军、掷弹兵和第一军，15 000左右的芬兰军还不计算在内。把这一切都考虑进去，那末交战双方兵力的相差就不是大得连俄军进行狭义的防御也没有取得某些胜利的希望。

如果像我们从最近外交报道以及奥地利在莫尔达维亚边境毫无举动的情形作出的结论那样，奥地利除了在交战双方之间充当调停人外别无其他意图，那末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在莫尔达维亚或者在贝萨拉比亚，今年内都不会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7月6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7月25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39号

卡·馬克思

*馬德里起义的細节。——奧地利
和普魯士的要求。——奧地利
的新公債。——瓦拉几亚

1854年7月7日星期五于倫敦

我們現在收到的关于馬德里軍隊起义的消息，仍然是矛盾百出、零星片断的。所有馬德里的電訊，当然都是政府的消息，也同登在“日报”¹⁶⁸上的公报一样，是值得怀疑的。我能向你們提供的，就是就我手边的貧乏材料写的一篇評論。

讀者們大概还記得，奥当奈尔是今年2月被女王流放的將軍之一；他拒不服从而在馬德里躲藏起来，并且从自己的避难所同馬德里的守备部队，包括同騎兵总监杜耳塞將軍，保持秘密通信。政府知道了他还留在馬德里，而陸軍大臣布拉塞將軍和新加斯梯里亚軍事总督拉腊將軍在6月27日夜間得到了关于由杜耳塞將軍领导的策划中的起义的警告。但是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或者鎮压萌芽状态的起义。因此杜耳塞將軍能够在6月28日毫不費勁地借檢閱为名集中了大約2000名騎兵，并且在奥当奈尔的陪同下帶領这批騎兵一起出城，打算劫持住在厄斯庫里阿尔的女王。但是計劃沒有成功，当6月29日起义軍在首都四郊布防的时候，女王已經在內閣首相圣路易斯伯爵的陪同下到了馬德里，并在那

里进行檢閱。埃查古埃上校和夺取了团部金庫（庫中有 100 万法郎）的亲王团的 400 名兵士，也参加了起义。29 日晚，从馬德里派出了一支由拉腊將軍率領的纵队，包括 7 个步兵营、1 个騎兵团、1 队騎兵宪兵队和 2 个炮兵連，以便迎击駐扎在文塔斯-德耳-埃斯皮里土-桑托和維卡耳瓦罗村的叛軍。6 月 30 日，两軍进行了会战，关于这次会战有三个报告：一个是拉腊將軍写給陸軍大臣并在“日报”上发表的官方报告，第二个是登在“貝云信使报”上的报告，第三个是“比利时独立报”駐馬德里記者——会战的目击者的报告。第一个报告可以在所有的倫敦報紙上看到，没有什么特殊东西可談，在报告中拉腊將軍先說，他向起义軍进攻，后来又說起义軍向他进攻，他抓到了俘虏，后来又說他失掉了俘虏，說他取得了胜利并且返回馬德里，enfin [最后]，他使戰場上躺滿了“敌人”的尸体以后，让起义軍控制了局面，而他自己的損失总共只有 30 人受伤。

“貝云信使报”对作战过程作了如下的报道：

“6 月 30 日早晨 4 时，凱薩达將軍率領两个旅离开馬德里去进攻叛軍。会战沒有繼續多久，凱薩达將軍受到了有力的还击。晚上 7 时，陸軍大臣布拉塞將軍也集中了馬德里的全部守备部队（这里指出，这支守备部队大約有 7 000—8 000 人）去出击。会战立即开始，而且几乎不停地一直繼續到深夜。被人数众多的起义軍騎兵吓倒了的步兵，列成了方队。卡里哥上校率領几个騎兵連十分猛烈地进攻其中的一个方队，而且打散了这个方队，但是他受到由 5 門火炮組成的伪装起来的炮兵連的炮火的袭击，炮兵連的霰弹打散了他的騎兵連。卡里哥上校落到了王国軍隊的手里，但是奥当奈尔將軍毫不犹豫地，立刻集中了自己的騎兵連，十分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步兵，把他們的队伍打散了，救出了卡里哥，繳获了 5 門火炮。王国軍隊受到这一打击后，便向馬德里撤退，并在晚上 8 点到了馬德里。王国軍隊的一个將軍曼西納受了輕伤。由于這場激战，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

現在，我們来談談“独立报”上的报告，上面注明：馬德里 7 月

1日。这个报告向我们提出了最可靠的消息。

“文塔斯-德耳-埃斯皮里土-桑托和維卡耳瓦罗是激战的战区，在这里王国军队被击退到康乐饭店方面。依次設在各个据点的3个方队，按照陆军大臣的命令都自行解散了。第四个方队設在雷提罗的后面。起义军的10个騎兵連在奥当奈尔和杜耳塞两將軍的亲自指揮下进攻了它的中央(?)，同时游击队占領了它的翼側(?)〈既然是向方队进攻，就很难理解，記者指的中央(!)和翼側(!)是什么意思〉。起义军曾两次冲击炮队，但是都被霰弹打退了。起义军显然想夺取摆在方队各个角落上的火炮。然而夜晚降临了，于是政府军队排成梯队向阿耳卡尔門撤退，在那里一个仍然可靠的騎兵連受到隱蔽在斗牛場后面的起义军的枪騎兵的突然袭击。起义军趁这次突袭所引起的混乱状态，夺获了仅存的4門火炮。双方的損伤大致相等。起义军的騎兵受到霰弹的重大損伤，但是他們的枪騎兵几乎消灭了王国的一个团和一个騎兵宪兵队。最近的消息报道，起义军得到了来自托勒多和伐利亚多利德的增援。甚至傳說納尔瓦艾斯將軍今天将到巴利耶卡斯，杜耳塞、奥当奈尔、罗斯·德·奥兰諾以及阿尔梅罗等將軍将在这里接待他。在阿托查門附近挖好了塹壕。好奇的人群挤滿了火車站，从这里可以看到奥当奈尔將軍的前哨。但是，馬德里的所有城門都有严密的戒备……”

同日下午3时。起义军的大量兵力占領了离馬德里3英里的巴利耶卡斯鎮。政府今天在等待外省的军队，其中包括一个国王营的到来。如最后的消息可靠的話，这一部分军队已經加入起义。

下午4时。現在，几乎全部守备部队都离开馬德里并在向巴利耶卡斯进发，以迎击信心百倍的起义军。商店全关闭了。雷提罗和所有政府机关的警卫队很快都武装起来了。我剛才知道，守备部队有几个連昨天加入了起义军。指揮馬德里守备部队的有卡姆普薩諾將軍（有人說他已經向起义军投誠，这种說法是不正确的）、維斯达·埃尔莫薩將軍和陆军大臣布拉塞。政府等待的援军，到現在还没有到来；但是第四基干团和第一騎兵团似乎已經离开伐利亚多利德，并且以急行军向馬德里进发。关于由土朗將軍率領的布尔果斯的守备部队，也有同样的說法。再有，里韦罗將軍亲自率領大軍离开了薩拉哥沙。由此看来，将要发生更激烈的流血冲突。”

到7月6日止，沒有从馬德里来的報紙和信件。只有“通报”

登載了一則簡短的急電，上面注明：馬德里 7 月 4 日。

“馬德里和外省仍然平靜無事。”

据一則私人消息說，起义軍現在在阿兰惠斯。如果“獨立報”的記者 7 月 1 日所預言的會戰是政府取得了勝利，那就不会連信件，報紙和公報都沒有。尽管馬德里已經宣布戒嚴，“人民呼聲報”、“民族報”、“西班牙日報”、“西班牙報”以及“時代報”又重新出版了，而且沒有預先通知政府，政府只是從它的官員那里才得悉這一不幸的事實。在馬德里被逮捕的人中，有銀行家安東尼奧·吉埃爾莫·莫蘭諾和霍賽·曼努埃爾·科耳亞多。還下令逮捕西霍腊·塞維耳昂諾以及納爾瓦艾斯元帥的摯友杜羅的富安特斯侯爵。芒先生和皮达尔先生都受到監視。

判斷這一起義的一般性質，為時尚早。但是可以說，起義顯然不是進步派¹⁶⁹干的，因為聖米格爾將軍——該派在軍界中的代表還若无其事地蹲在馬德里。從種種消息來看，陰謀的主謀多半是納爾瓦艾斯，而克里斯蒂娜女王——她的影響近來由於女王的寵臣聖路易斯伯爵而大大降低了——也參與了這個運動。

在歐洲，除了土耳其以外，恐怕沒有哪一個國家像西班牙那樣被人了解得那麼少，那麼不正確。無數次的地方政變和軍事叛亂，已經使歐洲習慣於把西班牙看成御用軍時代的羅馬帝國。這同有些人對土耳其的膚淺的判斷一樣是錯誤的。這些人認為土耳其這個國家的生命之所以枯竭，是因為近百年來土耳其的正史盡是宮廷政變和近衛軍的 *émeutes* [叛亂]。這種誤解的根源僅僅在於，歷史學家們不是從這些國家的外省和地方組織中，而是從宮廷年鑒中尋找這些人民的生命力的源泉。在我們通常所說的國家的

範圍內發生的變動，很少涉及西班牙人民，而西班牙人民也完全把這個有限的領域交給宮廷的寵臣、將軍、冒險家和少數所謂國家活動家的反復無常的熱情和渺小的陰謀去擺佈了，直到現在他們很少有理由對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感到後悔。對於西班牙現代史，就其性質來說，應當給以迄今它所得到的完全不同的評價，所以我要趁機在我以後的一篇文章里詳細談談這個問題。現在我只能指出下面一點：如果比利牛斯半島的純粹的軍事叛亂發展成普遍的起義，那絲毫也不奇怪，因為政府最近的財政法令¹⁷⁰十分成功地將稅吏變成了革命的宣傳員。

目前，決定戰爭命運的是奧地利。如果奧地利的軍隊到現在還沒有進入瓦拉几亞，那只是因為奧地利在等待俄國皇帝的答復。正如電訊所報道的，哥爾查科夫已經到達維也納，他帶來了不祥的答復。6月3日送出的奧地利和普魯士的要求，第一次在“科倫日報”¹⁷¹上登出來。奧地利要求的要點如下：

“奧地利皇帝認為停止俄國軍隊渡過多瑙河以及得到俄國皇帝關於停止佔領多瑙河各公國的期限——我們希望不會太遙遠——的明確表示是有意義的。俄國皇帝在英明地權衡了向他提出的所有理由以後，一定會考慮到這一意義。我們決不懷疑，尼古拉皇帝是希望和平的；因此，他一定會尋找辦法來改變日益成為奧地利和德意志國內不安的根源的狀況。我們相信，他不希望無限期地佔領或者提出我們不能接受的撤出多瑙河各公國的條件，而使弗蘭茨-約瑟夫皇帝自己採取措施來保護在目前情況下受到如此重大威脅的利益。”

目的在於支持奧地利“要求”的普魯士照會¹⁷²最後這樣說：

“國王希望，皇帝同意把爭論的問題移到能夠實際解決的基礎上，以便採用限制和規定雙方行動的確切範圍的辦法，促使問題得到圓滿的解決。因此我們至尊的國王希望目前的措施將被接受，以符合於產生這一措施的願望，

希望我們以及維也納內閣以與問題的重要性相一致的关切心情等待着的俄国皇帝的答复,能够使国王摆脱他的义务和责任所加在他身上的沉重負擔。”

東方軍团的总司令海斯想把他的大本营設在切尔諾維茨。維也納的“士兵之友”刊載了海斯將軍的小傳:

“馮·海斯元帥于1788年生在維也納,1805年入居萊团任少尉,1815年底任參謀,1822年是中校,被任命为都灵的軍需官。从1829年起是上校,1831年被任命为上意大利的机动軍的軍需官。1842年得到了中將軍銜,1848年被任命为拉德茨基軍隊參謀長。1848年进军曼都亞、庫爾塔唐和維琴察以及1849年以諾瓦拉会战而結束的短期战局的計劃,就是他制定的。”

談到公开承认的奧地利占領瓦拉几亞的意图,我要引用奧地利各报自己說的話。

奧地利在联邦議会的代办处的机关报“法兰克福邮报”指出:

“奧地利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必須最坚决地促进和平的恢复,用占領多瑙河各公国的办法实际上把交战的双方分开,并且占据它們之間的最重要的据点。如果俄国人退到普魯特河以东,土耳其人及其盟国就不能够越过多瑙河了。如果我們再注意到,每一方都已經取得了某些經驗,并且丢掉一定的幻想,〈俄国人丢掉自己在軍事上占优势的幻想,海上强国丢掉自己的海軍强大无比的幻想〉,那就很明显,目前局势就会使和平談判的恢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劳埃德氏报”指出:

“現在爭論的領土即多瑙河各公国,可能置在中立国的保护之下。这样,土耳其軍隊就不可能占領普魯特河两岸的陣地。武装調停人就会站在西方强国軍隊和俄国軍隊之間,防止它們在多瑙河各公国冲突起来。这样,在最重要的战区就会实际上停战。如果真的还存在着和平的可能,那末这一措施就会加速和平的到来。不論圣彼得堡,或者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有絲毫怀疑:奧地利决定占領多瑙河各公国是为了保证和平,同时这一决定也是防止全面战争的最后一个人可行的措施。”

最后，我們在柏林出版的“施本納報”¹⁷³上看到这样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

“有消息证实，四大国的大使即将在維也納再召开一次會議，第一，是为了介紹奧地利和土耳其政府之間簽訂的公約，并宣布这一公約同过去的會議的議定书是一致的；第二，是为了商談修改4月9日維也納議定书所規定的原則，这次修改可以成为将来的以和平而不是以战争为目的的預防行动的积极基础。”

然而奧地利利用这一情况制定了新的公債計劃，官方公布的这一公債的条件如下：

“1. 公債总数大約規定为 35 000 万到 50 000 万弗罗倫。如果认购額达到了这个数目，債款將視认购总額在 3 年、4 年或 5 年內偿还。

2. 发行价格規定为 95 銀行票。

3. 利率为 5%，并且以硬币偿还。

4. 认购不带强制性质；帝国政府将通过各省現行政权激发臣民的爱国心。

5. 公債用作偿还国家欠銀行的总数約为 8 000 万的債務，以恢复銀行票的行市。剩余〈把总額的 $\frac{4}{5}$ 叫做剩余，真是太聪明了〉将作为近几年追加預算的来源。”

当然，“劳埃德氏报”肯定地說，这一龐大的財政措施会像人們現在（几乎是第一次！）所計劃的那樣，将永远結束目前奧地利通貨貶值的現象。讀者都記得，在这个世紀，几乎每次发行奧地利公債的时候提出的都是这个借口。但是在这个龐大的措施中，总还有某几点也許是讀者看不到的，因为这几点在上面所引的报道里被用心地省略了。关于这一方面，“地球报”昨天晚上写了如下的話：

“这次公債将成为全国性的，就是說，每个納稅人都应当按照納稅的多少认购公債。开始时采用道义上的办法，以后就实行直接强制性的办法。因

此，事实上这一措施就等于規定一次附加稅，并答应这笔錢將偿还。”

有趣的是，全部措施所提出的理由以及实行的方法，都很像成了革命序幕的西班牙国王的最近几項命令。

在我的最近一篇文章里^①，曾請你們注意瓦拉几亚人民的权利和他們的状况，同时駁斥了所謂外交冲突是由于这些权利遭到破坏才产生的論調。在巴黎的“世紀报”¹⁷⁴上，剛剛刊出了小瓦拉几亚的美格定茨地方官巴尔布·比伯斯庫先生写給土耳其政府外交大臣的报告。在这里，我們終於听到保护多瑙河各公国人民的呼声，虽然“文明的維護者”是以十分可耻的冷淡态度对待多瑙河各公国人民的命运的。报告一开始就說：

“俄国人为了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的消极抵抗进行报复，从小瓦拉几亚撤退时，竟干出最丑恶的暴行和破坏活动。俄国人搶劫了整个国庫、印信、地方管理局的档案和教堂里的家具。他們在离开前，把过去的无数次征用中幸存的牲畜杀掉，并且不是把牲畜带走，而是留下来腐烂，他們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人民感到他們殘酷和可恨。”

关于当时流傳奧地利人即将进入瓦拉几亚的傳說，比伯斯庫先生指出，“即使是最友善的外国軍隊，对于它占領的国家也永远是一种負擔”。他說，瓦拉几亚不需要奧地利人；它自己就能提供5万名受过訓練、有紀律的战士。在瓦拉几亚的17个省中，每个省目前都有3000名宪兵、林务官、猎兵以及过去的兵士，他們只是需要武器，以便一遇到信号就向俄国人猛攻。他最后說了以下的话：

“我們缺少的只是武器；如果在你們的軍火庫里武器不足，在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許多工厂里武器多得很，我們准备出錢买。武器，还是武器，閣

^① 見本卷第328—333頁。——編者注

下,不要3个月,多瑙河各公国就不会留下一个俄国人,土耳其政府将会得到10万同奥斯曼人一样热烈地渴望驅逐并懲罰自己的共同的死敌的羅馬尼亚人以置于自己的管轄之下。”

可怜的美格定茨的地方官不懂得,奥地利正是为了阻止瓦拉几亚人武装起来,不許他們同奥斯曼人一起驅逐和懲办俄国人,才使瓦拉几亚人屈服于自己占領之下的。

根据倫敦小市民报纸报道,查理·納皮尔爵士企图把沙皇的海軍将領誘出喀琅施塔得,使他們离开掩蔽部,据說,他們在掩蔽部的花崗石圍牆的后面,对着英法舰队“发抖”。但是,为什么英国海軍不离开自己的木制掩蔽部,以便在俄国人认为最如意的地方,在陆地上同俄国人斗争呢?应当指出的是,不管英国人怎样吹牛,俄国人还是走出了塞瓦斯托波尔并且把“富里婭号”蒸汽舰“打伤了”。

巴拉盖·狄利埃被任命为应当在7月14日上船去波罗的海的一个师的指揮。英国应当提供运送6000人的船只。同样数目的軍队以及一个野战炮兵連将乘法国船。如果加上菲埃隆上校指揮下的一支海軍陆战队,那末整个波罗的海师将有13000—14000人。同时在馬賽,装运軍队去黑海的工作尚未停止;很明显,法国的裁軍过程还没有达到預期的“安全”程度。

卡·馬克思写于1854年7月7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4年7月21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4136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意大利的緊張。——西班牙事件。

——德意志各邦的立場。

——英國法官

1854年7月14日星期五于倫敦

查理爵士^①已從喀琅施塔得安然回來了，除了幾名英勇的水手患霍亂之外，無一傷亡。為了使民眾保持良好的情緒，現在有必要在塞瓦斯托波爾重演敖德薩的滑稽劇：在敖德薩，人們已經看見聯軍艦隊的50艘軍艦“開往”該地。

法軍原訂今日在加來登船，現已延期到7月20日，據說是為了等待弄清西班牙事件的真相。

布德貝爾格將軍逼迫多瑙河各公國的人民發表聲明，感謝尼古拉皇帝占領他們的國家和保衛它免受“殘忍的土耳其生番”的蹂躪。7月5日離開君士坦丁堡、7月13日抵達馬賽的“幼發拉底號”帶來一則重要的消息說，俄國人根本沒有撤出多布魯甲，“赫赫有名的”不幸的^②列施德-帕沙重新擔任了外交大臣。

據7月8日來自克拉科夫的消息說，帕斯凱維奇公爵已抵達

① 即海軍上將納皮爾·查理。——編者注

② 雙關語：“不幸的”一詞英文為《wretched》，和列施德的名字同音。——編者注

他在立陶宛領地的哥美里宮，已經不再參加目前的戰爭了。另有消息補充說，不僅他本人被免職，而且他的作戰計劃也被否定了；尤其近乎情理的消息是說，已經開始向莫爾達維亞退却的俄軍，在哥爾查科夫公爵的指揮下又在向前推進。他似乎打算在布加勒斯特正面集結相當的兵力。目前俄軍的部署是這樣的：它的右翼在雅洛米察河上游一直伸展到特蘭西瓦尼亞阿爾卑斯山脈，在那里它可以依靠 24 門重炮扼守泰梅希山口；它的中央占領從福克夏尼到布加勒斯特的一帶地方；它的左翼在利迭爾斯的指揮下駐紮布來洛夫一帶，而極左翼在烏沙可夫指揮下駐在多布魯甲。

最近從戰區發來的消息說，土軍很大一部分兵力（4 萬人，其中有 12 000 名聯軍）已渡過多瑙河，占領了茹爾日沃。法國報紙報道，蘇利納河口附近的俄國小村落曾遭到聯軍艦隊的炮擊並已被摧毀；當然，對這個消息最好同對波羅的海的博馬爾松德再次被炮擊和被摧毀的故事抱同樣的態度。聖阿爾諾元帥在東方的軍事行動似乎引起了土伊勒里宮內的某種憂慮，害怕它的規模會太大。任何一則消息都透露，法國政府已經派出了一位專門的總視察官——當然是財政家——去制止這種過分的热心（son excès de zèle）。

在意大利，政府也好，民眾也好，都令人驚異地緊張起來。皮蒙特的陸軍大臣拉·馬爾摩拉將軍發布了關於在薩瓦、聖莫里斯、亞歷山大里亞、甚至在撒丁島上建立兵營的命令。無限期歸休的大批兵士應召入伍了。同時，在亞歷山大里亞和卡薩勒的要塞里也存足了儲備品。另一方面，拉德茨基元帥也發布了關於在維羅那和沃尔塔之間建立兵營的命令，那里每天有兩萬多兵士在接受進行小規模戰爭（petite guerre）的方法的訓練。在科多尼約、卡

薩勒、普斯特拉尔佐和倫巴第的其他一些城市因食品价格的飞漲而发生了騷乱。約有二百人被捕并被押送到曼都亚。从那不勒斯的来信看来，那里曾經大規模地进行逮捕；在西西里島也这样，卡拉法伯爵的儿子是在这里被捕入獄的。炮彈国王^①正在采取非常措施在陆上和海上武装起来。他命令加埃塔要塞做好战斗准备以防万一。他宣布，全欧洲正流行鼠疫，因此对一切入境船只要規定严格的檢疫期。从葡萄牙、格拉斯哥和撒丁王国来的一切船只要經過 10 天檢疫期，从托斯卡納和羅馬国家来的船只要經過 7 天檢疫期。因为对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施行这样的限制，所以任何一只船只的自由入境都是少有的例外。对于經陆路入境的外国信件要执行对鼠疫流行的国家所采用的一切預防措施。与教皇国的交通可以經過蒙特卡西諾和索拉，也可以經過阿布魯威，不过，防疫哨大概很快就会布滿整个国境綫。

該从馬德里經過波尔多来的最近的邮件，到昨天晚上还没有到达巴黎。据說，王国軍隊正在繼續追击叛軍，它似乎已經追到并正在动手消灭他們。最初我們听說，叛軍正向埃斯特勒馬杜腊逃跑，企图退到葡萄牙边境。現在我們知道，他們似乎正在前往安达魯西亚的途中，情况表明叛軍并不渴求很快离开自己的祖国。从私人的来信中知道，塞拉諾將軍率領 300 名騎兵加入起义軍；“日报”报道，他是一个人参加的。在馬德里到处傳說国王的一个团 (del Rey) 已經投到起义軍方面。“紀事晨报”記者补充說，加入起义軍的有各兵种的 200 名軍官、駐扎在托勒多的各团的一些連和馬德里志願者的 2 个营。“日报”說，奉命追击叛軍的一个师在 7

① 即斐迪南二世。——編者注

月 5 日晚上从馬德里出发，它包括 3 个步兵旅、1 个騎兵旅、2 个炮兵連、1 个工兵連和軍事部門的一批工人。这个师是在維斯达·埃尔莫薩將軍指揮下出征的，但是，第二天，他就被陸軍大臣布拉塞將軍接替。7 月 7 日的王国法令临时任命圣罗曼將軍在布拉塞將軍离职期間代行陸軍大臣的职务。“日报”报道，該师已到达帖姆勃列克并正沿着瓜的亞納河谷向勒阿耳城方向移动。同一天，布拉塞发出告叛軍兵士和下級軍官书，号召他們回到他的旗帜之下，并以女王的名义向他們保证既往不究。我們在“貝云信使报”上看到如下的一段消息：

“根据最近我們得到的消息，奥当奈尔將軍正向巴耳德佩尼亚推进。王国軍队的先头部队已在帖姆勃列克地区集結。奥当奈尔將軍正在利用空隙時間来訓練他那一支由 2 000 名騎兵、6 門火炮和 800 名步兵組成的不大的部队。”

奥当奈尔和杜耳塞的呼吁各有不同：前者援引 1837 年的宪法¹⁷⁵，而后者援引古老的加斯梯里亚法即反对違背加冕誓言的君主的法律。建立瓦倫西亚共和主义游击队伍，这是一个新的特点。从 7 月 6 日收到的消息中可以看到，有些城市和乡村已經起来反对政府，其中有阿魯拉、哈提瓦和卡勒特。退休上校奥罗斯科前往卡勒特領導武装队伍，沒收了全部枪枝，并出告示号召居民参加运动。政府派出騎兵、步兵和国民近卫軍去鎮压瓦倫西亚的起义。

关于俄国給奥地利和普魯士的照会¹⁷⁶，“比利时独立报”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說法。根据这家报纸——它可以看做是布魯塞尔的俄国退职外交家的私人 *moniteur* [通报]——的說法，俄国的照会沒有直接交給奥地利政府，而是交給了哥尔查科夫公爵，他把照会的副本轉交給德·布奥尔先生，同时表示希望奥地利要求俄

軍撤出多瑙河各公國只是指建議停火，因為奧地利不可能希望撤退的俄國軍隊遭到聯軍的襲擊。可見，奧地利的意思只是指停火。因此，土、英、法軍應當放棄任何進攻行動和任何對俄國的新的敵對行動。關於俄軍撤出多瑙河各公國的問題，照會強調說，俄國在這些地方要無條件保持一定的戰略據點以等待簽訂和約，否則，它同聯軍比起來會處於極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照會否認俄國有依靠上述戰略性的占領來威脅奧地利的任何意圖。從這些前提出發，照會表示俄國願意在下面的基礎上開始新的和平談判：保持奧斯曼帝國的完整（俄國政府從來無意加以侵犯）；正如4月9日的議定書所規定的那樣，土耳其帝國基督教臣民和伊斯蘭教臣民一律平等；最後，修改有關海峽的條約。照會允許各國對土耳其的基督徒有共同保護權；但是，在俄國對正教徒的保護權問題上，“比利時獨立報”認為照會中補充了若干供不同的解釋留下充分根據的模稜兩可的詞句。這家報紙報道，哥爾查科夫公爵的口氣比照會本身更為和緩。他的急件不是俄國最後的態度；如果有希望促使奧地利開始新的談判，他有全權再採取其他措施。然而，7月9日維也納內閣仍然沒有作出任何抉擇。

“獨立報”，或者更正確地說，布隆諾夫男爵說：“目前，我們不應當無視這樣一個情況：無論聖彼得堡的意圖怎樣，只要發生任何一個事件，採取任何一個軍事行動，例如英法聯軍進攻喀琅施塔得，或者更可能進攻塞瓦斯托波爾，甚至占領阿蘭群島，都足以改變這些意圖並且使反對作任何讓步的一派占上風。”

無論如何普魯士對這次俄國照會是滿意的，並把它看做是恢復談判和阻止奧地利人進入瓦拉幾亞的手段。就連“通報”也認為，普魯士反對奧軍進駐是維也納宮廷重又猶豫不定的原因。另

一方面，假仁假义的“紀事晨报”报道說：

“在柏林人們确信，普魯士宮廷所承担的保卫奥地利領土不受敌人侵入的約定义务，使它有权抗議俄国的任何新的挑衅。”

另外，大家知道，奥地利和普魯士之間的条約¹⁷⁷ 恰恰規定得使两国之中的任何一国在确信另一国制定的軍事措施的必要性以前可以停止自己的軍事行动。因此，奥地利即使表示願意和西方强国共同行动，也会因为普魯士抗議而不得不拒絕参加。我个人确信，所有这些可能性，北方三强国事先已經共同研究过了，甚至为奥地利設下的新的困难，目的也不过是要使它占領瓦拉几亚的行为具有英勇抗俄的外观。像 1850 年奥普战争一样的小規模的假战争可能也由这个协定預先規定了，因为它仅仅有助于在締結和約时使奥地利的意見更具有决定意义。必須注意到，“奥地利通訊”¹⁷⁸ 斬釘截铁地說，除了可能侵犯俄国現有边界这一項，奥地利在所有各項上都同意西方强国的政策。

为了估計奥地利的立場，注意一下根据 6 月 22 日的质問而現在提交下院的塞尔維亞政府对奥地利占領的抗議书¹⁷⁹ 是很重要的。这份抗議书是塞尔維亞政府交給土耳其政府的。抗議书一开头就指出“奥地利总是答应塞尔維亞帮助保护多瑙河各公国边境不受任何敌人进犯，但是奥地利本身对塞尔維亞的态度，却要看奥地利认为塞尔維亞政府同俄国或同土耳其的关系是好是坏而定”。后来，在塞尔維亞边境上集結了重兵。塞尔維亞政府曾“直接向維也納內閣和間接向土耳其政府”詢問，“奥地利的这种軍事上的調动的目的和意义何在”。奥地利作了支吾搪塞的答复，然而土耳其政府和西方强国駐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則声明他們完全不知道奥地利示威的目的，甚至他們似乎也同塞尔維亞政府一样感到不安

和懷疑。“貝爾格萊德的帕沙沒有指令可遵循，或者更正確地說，有的還是那些舊的指令，根據這些指令，他應當把奧地利對塞爾維亞的任何軍事干涉，看成是針對奧斯曼帝國本身的敵對行動，並應給予最堅決的反击。”奧地利似乎是越來越傾向於西方強國了，所以它駐貝爾格萊德的代表開始發表關於它的意圖的令人放心的言論。同時，維也納內閣向塞爾維亞政府保證說，所談的軍事措施不包含對塞爾維亞的任何敵意；奧地利只希望保衛本國邊境；它只有在俄軍進入塞爾維亞領土或者那里發生反對合法政權的暴動的情況下才會進行干涉；所以，即使後一種情況下，它的干涉還是友好性質的，目的是援助政府和合法政權。奧地利的保證沒有能使塞爾維亞政府安心。塞爾維亞政府認為，奧地利一方面覬覦調停人的角色，另一方面以希望和西方強國共同援助奧斯曼帝國為借口採取了單獨行動。最後，塞爾維亞政府懷疑奧地利企圖製造它似乎多麼渴望預防的那種混亂。因為奧地利的備戰活動一天比一天具有威脅性，所以塞爾維亞政府和伊塞特-帕沙在維也納和君士坦丁堡共同採取了堅決的步驟，以便抵制任何可能使奧地利成為塞爾維亞今天的命運的調停人的陰謀。這就是阿集斯-帕沙起初被派到維也納，而現在又在君士坦丁堡的原因。同時，根據同土耳其代表達成的協議，曾採取了一切國防措施。奧地利干涉塞爾維亞可能有两个借口：(1)俄國人的入侵和(2)塞爾維亞的叛亂。第一個借口是荒謬的，因為戰區距離塞爾維亞太遠了，即使俄國人企圖侵入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和土耳其軍隊也完全能夠加以反击。如果需要輔助軍隊，塞爾維亞寧願要其他國家軍隊，也不要奧地利軍隊。

“塞爾維亞人民對奧地利不信任，甚至可以說是仇恨，以至每個塞爾維亞

人都会把奥地利人进入塞尔维亚看成是极大的危险，莫大的不幸，塞尔维亚人会立即全力以赴地跟奥军作斗争；整个民族会全力来反对这个一贯体现奥地利在塞尔维亚所奉行的以保护塞尔维亚为借口的贪婪、自私的政策敌人。”

至于说国内的叛乱，那只是由于奥地利的干涉，才会使人担心。塞尔维亚将永远忠实于土耳其政府。

“塞尔维亚政府所要求的一切，不外是希望土耳其政府今后继续给予它至今所表示的那种高度的信任，希望不把塞尔维亚置于奥地利占领之下（无穷的灾难的开始）。在这种条件下，塞尔维亚政府完全负责维持塞尔维亚的社会安宁和秩序。”

塞尔维亚的这份抗议书同时清楚地表明，瓦拉儿亚人民多么热情地期望奥地利人开进瓦拉儿亚。

关于小国对英国采取中立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敌对的态度，任何人只要留意看一看英国目前对俄国采取的军事行动、英国波罗的海舰队的掠夺性远征以及为了使瓦尔那附近的军队不能进行任何战斗而采取的种种措施（要知道，不列颠军队在土耳其的机动卫生队直到现在才刚刚乘“喜马拉雅号”军舰离开南安普敦），他就不会感到奇怪。因此，瑞典宣布它最后决定保守中立，不同西方强国采取共同步骤；丹麦和荷兰作为德意志联邦¹⁸⁰的成员国表示可以同意奥地利5月24日的公报，不过有绝对的保留条件，即这个公报的唯一目的是保护最完全的中立和恢复和平。

弯街的治安法官贾丁先生审理了一桩远比波拿巴在布伦的演说或查理从喀琅施塔得光荣退却更使伦敦轰动的案件¹⁸¹。一位德国佩特曼博士被禁闭了4天之后，作为一个无责任能力，因而不能自由行动的人被押解到法庭。司法稽查官雷诺斯先生要求公众和

報界人士退出去，於是，案件也就在法官的私人辦公室內極為秘密地進行審理。被告的朋友，下院議員奧特韋先生憤怒地抗議不許他參加審理案件的作法，後來他被允許參加了；律師路易斯先生也請求允許他作為被告的辯護人參加，他也被允許了。路易斯先生質問，為什麼不經法官審訊就把佩特曼博士在犯人牢里關了4天。賈丁先生對這一點答復說，他得到兩位醫生署名的關於被告精神錯亂的證明書，因而他不得不將被告送到瘋人院。路易斯先生請求法庭讓他提出反面的證據，但是，賈丁先生拒絕考慮任何延擱案件的建議，因為他要根據他現有的文件辦事。當時路易斯先生聲明，他將向上一級司法機關上訴，那里審理案件不會有偏見，並且將听取雙方申訴。於是，他告訴他的被辯護人，雖然法官提出要求，也不要回答問題。奧特韋先生對整個審訊的 *ex parte*〔片面〕性表示抗議並警告說，由於佩特曼博士曾經在審前被拘押并被關進瘋人院，將把整個案件提交下院審理。被告又被解到科爾奈-哈奇^①。

現在，我們將今天“晨報”刊登的不久前剛剛把佩特曼博士從貝德勒姆^②解救出來的醫生派西沃先生的聲明轉引在下面：

“佩特曼博士是一位德國教授，曾先後在波恩大學、柏林大學和哈雷大學求學。他是曾經為喬治三世作戰並在戰場犧牲的一位漢諾威軍官的兒子，又是普魯士地方行政長官李普皮爾特男爵的繼子。大約在30年前，他來到了英格蘭，並且很快就熟習了我們寄宿學校和學院現行的腐敗透頂的教學制度，於是便到牛津和劍橋去講授這一主題的課程。1835年，他被介紹給諾曼比侯爵，在侯爵保護下到了愛爾蘭。因為諾曼比夫人已經為馬爾格雷夫勳爵找到了教師，她就把佩特曼博士介紹給一位愛爾蘭貴族，後者請他當自己兩個

① ② 精神病院的名称。——編者注

儿子的教师。7个月后，发现大儿子深深地爱上了家中的薩克森出生的女僕，并使她怀了孕。年輕人的母亲請求佩特曼博士帮助她把這個姑娘打发回德國，但博士拒絕干涉這樁事。他辞去這家的工作并在都柏林着手公开讲學。1836年3月，这个姑娘突然来到這里，这时她已經在貴族庄园生了孩子，境况十分貧困。她告訴佩特曼博士說，她打算雇請律師控告貴族的儿子誘騙她，而且他将会被召去当証人。佩特曼博士当时决定去找管理諾曼比侯爵的庄园并同侯爵家庭关系非常密切的斐普斯上校。佩特曼博士几次前去拜訪这位斐普斯——諾曼比的兄弟和阿尔伯特亲王的現任秘书，但都沒有得到他的任何答复，也沒有被接見。最后，他被叫到都柏林的治安法官斯塔德特先生那里，斯塔德特先生根据那个斐普斯的証詞，沒有任何其他說明佩特曼博士破坏社会秩序的文件，就在1836年5月把博士送进了瘋人院。在諾曼比助爵当爱尔兰总督期間，佩特曼博士被根据一个叫利頓的医生的证明轉送到迪恩·綏夫特医院，而按照这个医生的意見，根本沒有根据认为佩特曼博士是瘋子。9个月后，經過圣巴特里克大教堂的首席神甫道逊博士的交涉，他被从医院放出来。此后經道逊博士介紹，他在都柏林皇家协会讲學并被邀請到福特德斯居助爵家中。当阿尔伯特亲王来到英格兰时，佩特曼博士曾請求亲王让他担任圖書館管理員，允許他实施他的学校改革。在佩特曼博士和薩塞克斯公爵的長時間交談后，后者指示他的圖書館管理員允許佩特曼博士自由出入他的圖書館。在这之后，佩特曼博士向阿尔伯特亲王递了呈文，并附上本人的证书和11册著作。亲王对呈文不予答复，最后，佩特曼博士請求給予接見，不然就归还文件。大概正在这个时候，年輕的牛津向女王行刺，而一位在亲王逗留波恩期間（在波恩他和佩特曼博士在同一位教授那里学习）同亲王关系密切的女士又从德國来了。宫廷上下不安，而佩特曼博士的倔强引起了怀疑。有人把這一切都报告了內务大臣諾曼比侯爵（佩特曼博士曾經控告侯爵毫无根据地把她送进都柏林瘋人院）；在1840年6月的一个早晨，一名便衣警察被偷偷派到佩特曼博士在白厅的住宅。諾曼比助爵召見了他的兄弟斐普斯上校，值班法官根据上校的証詞命令把佩特曼博士搬进貝德勒姆，他在那里住了14年。他在那里的行为一貫非常好；一次也沒有被隔离过，也从来沒有服过任何药物。他专心于改善对病人的护理和組織能够接受他的讲解的病人学习。被釋放以后，他根据朋友的建議向女王递交了呈文；他以为現在可以自由行动了，用不着担心被人扣留，于是在上星期六到白金汉宮的

皇家教堂去，參加那里的祈禱儀式，以便女王注意到他。然而他在那里又被逮捕了。”

这个例子可以向各位讀者表明，在自由的英国引起宮廷神經過敏，以及与聞道貌岸然的英国貴族的家丑是多么危險的事情。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7 月 14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4 年 7 月 28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142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馬克思

*維也納會議。——奧地利的公債。
——杜耳塞和奧當奈爾的文告。
——英國的內閣危機

1854年7月18日星期二于倫敦

7月13日在維也納召开了在人員上同最近几次著名的會議稍有不同的會議。在这一天，奧地利首相布奧爾伯爵設宴招待俄國大使哥爾查科夫公爵，这位大使的任务是掩护多瑙河各公国的总司令哥爾查科夫公爵的立場。除了俄國使館的 personnel〔人員〕以外，出席宴会的有：在阿尔宁伯爵缺席时代表普魯士的弗萊明伯爵、瑞典公使曼斯巴赫將軍、丹麦公使比列-布腊赫伯爵、荷兰公使德·赫克林先生、希腊国王的被流放的秘书德·温特兰德先生，还有比利时的全权代表和 corps diplomatique〔外交团〕的团长奧修尔利万·德·格拉斯伯爵。总之，你們可以看到一大張公开在俄國旗帜下行动的人員的名单。其实班堡当然也派了代表¹⁸²，不过沒有把这些偉大的人物的名字列出来。

英國的官方報紙無法掩盖自己由于奧地利的停止科羅尼尼伯爵向瓦拉几亞推进的命令，以及由于送交巴黎和倫敦的急件（据这些急件說，俄國建議接受4月9日的議定书作为和談的基础，但是附有一定条件）而产生的恶劣情緒。半官方的“奧地利通訊”认为，

尽管俄国的建議不能完全令人滿意，但是其中的确有值得西方强国注意的东西。“泰晤士报”、“紀事晨报”以及“观察家报”¹⁸³聊以解嘲地說，这一切都是普魯士的过错。如果还需要什么来加深宴会所产生的印象的話，那末俄国军队的重新部署就充分证明俄国是多么相信奥地利的意图。我們在“新普魯士报”这一柏林的俄国 *moniteur* [正式通报] 上，讀到最近俄国军队在多瑙河各公国的調动的情形：

“按照哥尔查科夫公爵的指示，几天以前发布的全部命令都取消了。曾經命令从布加勒斯特撤走守备部队并且退出布加勒斯特；丹年別尔格將軍应当在最近几天內同宪兵队一起离开該城，并且在福克夏尼設立后卫的大本营。按新的指示，現在应当守卫住沃耳特尼察—布加勒斯特—布澤烏河—福克夏尼这条战綫。”

根据其他方面来的消息我們知道，俄国騎兵重新向阿留塔河左岸的斯塔提腊前进。撤离布加勒斯特的意图是多么認真，这可以从为了运出这个城市中的档案而采取的严格措施看出来，据說，档案里有一些使彼得哥弗宮廷名誉扫地的文件。

俄軍的所有这些从表面上看来稀奇古怪、互相矛盾的行动，都是土耳其军队对外交談判的不合时宜的干涉引起的。維也納外交家先后作出的决定，都被土軍在沃耳特尼察、切塔特和錫利斯特里亚的功助推翻了，正像不久以前的外交阴谋被奧美尔-帕沙军队的全面推进打消了一样。

“那些狡猾的信口发誓的坏东西——那块耗子咬过的霉腐的陈年干酪奈斯托尔和那头狗狐烏利斯——定下的計策，簡直不值一顆烏莓子！……所以那些希腊人都像野蛮人一样胡作非为起来，計策权謀把軍誉一起搞坏了。”^①

① 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第五幕第四場。——編者注

要是星期六你在倫敦街頭走走，就會聽到所有的報販子都在喊：

“英國、土耳其、法國軍隊在茹爾日沃大勝俄軍，聯軍占領了布加勒斯特。”

當我談到新內閣的危機問題的時候，你們慢慢就會弄清楚為什麼會這麼洋洋得意地發布消息。至於英法聯軍在茹爾日沃會戰中的聯合行動，我們根據7月4日瓦爾那來的郵件所提供的消息知道，兵營里沒有“任何行動”。據7月13日維也納的最后消息說，輔助部隊正在沿經過蘇姆拉的道路向魯舒克迅速前進，法國的一個師于7月8日到達魯舒克，英國的一個師直到7月9日才到那里。然而8日早晨4時結束的茹爾日沃會戰是在7日拂曉開始的，在這天中午停止了幾個小時以後一直繼續到8日早晨。因此很明顯，不論是法國軍隊或是英國軍隊，都沒有能夠參加戰鬥。土軍發現有8門俄國加農炮壞了，於是立即在茹爾日沃周圍挖戰壕。儘管土軍從魯舒克及其附近島嶼發射了榴彈，但是城市本身並未遭受損失。在俄國軍隊撤退以後，奧美爾-帕沙發出通告，號召居民保持安寧，因為他們的城市再沒有什麼危險了。占領茹爾日沃的是很小的一支正規軍，因為土軍的主力都駐紮在城市四周以及多瑙河的三個島上。奧美爾-帕沙駐在茹爾日沃，賽義德-帕沙駐在魯舒克。土軍控制了沿多瑙河左岸從茹爾日沃到沃耳特尼察的公路。

至於第二次會戰（據說在這次會戰後接着就會占領布加勒斯特），法國的“通報”自己說，不過是給茹爾日沃到布加勒斯特的路上的弗雷特什提附近的俄國後衛一個小小的挫折。“通報”補充說，英法25 000人的一個軍同土軍匯合在一起，聯軍的兵力大約有6

万人；哥尔查科夫公爵率領了大致相等的兵力；可能发生决定布加勒斯特命运的大战。弗雷特什提是一个大約离茹尔日沃 12 英里、离布加勒斯特 30 英里的設防很差的据点。据“通报”說，这个地方的会战是在 7 月 11 日发生的，而据“辯論日报”¹⁸⁴ 說是在 7 月 14 日发生的。据說，俄軍在这场战斗中有 700 人受伤，其中包括两名將軍。

最近从君士坦丁堡到馬賽的輪船带来消息說，英国“惊駭号”船占領了多瑙河的苏利納河口。据說，“惊駭号”船进入停泊場，击毀了俄国的工事，打散了他們的守軍，并且捉住了他們的司令官。我认为，这一消息还需要更可靠的消息加以证实。

英国報紙报道了一个連一家法国報紙都沒有报道的傳說，說什么萊昂斯海軍上将在阿納帕巡航，以便接应布律阿海軍上將的远征，据說，布律阿的船上有 7 000 人用于登陆。

君士坦丁堡的来信說，土耳其政府在英法大使提出意見后，看来已經同意立即恢复同希腊的貿易关系，条件如下：（1）希腊必須在一定期限內支付軍事費用并賠償暴动者在最近造成的損失；（2）希腊应在两个月內簽訂它一直拒絕的通商条約。在这一条約中，承认两国之間目前存在的边界。

沒有波罗的海来的消息。“汉堡記者”对英国到芬兰海岸进行掠夺性远征的結果以及在芬兰人中造成的印象，作了如下的描述：

“据证实，俄国政府在布腊赫斯塔德和烏列阿博尔格焚毀以后，确信住在两个海湾沿岸的芬兰人的情感，命令把武器分发給有战斗能力的居民，使他們能够抵抗英国軍隊登陆的任何新嘗試。已經批准立即成立两个芬兰猎兵营，每营为 1 000 人，将在亚波、瓦查和烏列阿博尔格等地区招募。其他各省也应逐步編組类似的营。”

奧地利的公債正像我預言過的^①，已經變成勒索。現在，這一公債應當完全由帝國各領地分攤。例如，上奧地利應當認購 11 500 萬弗羅倫，下奧地利應當認購 1 500 萬弗羅倫，維也納應當認購 250 萬弗羅倫，匈牙利應當認購 7 000 萬弗羅倫等等。如果說俄國皇帝沒有為自己弄得什麼，那他至少是促使其他國家的政府同臣民在財政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普魯士人不得不在 8 月 1 日前繳納提高了的所得稅。波拿巴似乎也在計劃再發行 5 億法郎的公債，由於目前的葡萄和小麥的收成的情況以及已經到來的——特別是西班牙起義後在里昂——商業停滯，這次公債在法國將產生極為強烈的印象。聯合內閣也打算讓英國人掏一掏腰包，並且在最近一周內就要實行。

西班牙起義顯然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這可以從杜耳塞和奧當奈爾的文告中看出來；杜耳塞是埃斯帕特羅的擁護者，奧當奈爾是納爾瓦艾斯的堅定信徒，也可能是克里斯蒂娜女王的秘密的堅定信徒。奧當奈爾深信目前單靠宮廷革命不可能使西班牙各城市動起來，於是突然把自由派的原則拿出來作幌子。他的文告是在拉曼徹的離勒阿耳城不遠的曼薩那累斯鎮發表的。文告說，運動的目的是保存王位，但同時要排除權奸，嚴格遵守根本法，改進選舉法和出版法，減輕稅賦，文職按功提升，實行地方分權制並在廣泛的基礎上成立國民軍。文告建議委託各省洪達^②和馬德里的議會大會審查各種法律。杜耳塞將軍的文告是用更有力的詞句寫的。文告說：

“再沒有什麼進步派和溫和派了。我們都是被 1822 年 7 月 7 日的人們

① 見本卷第 346—347 頁。——編者注

② 西班牙語，團體、會、委員會等意思。這裡指委員會。——譯者注

的榜樣鼓舞的西班牙人。恢復 1837 年的憲法，支持伊薩伯拉二世，終身流放女王的母親，要現在的內閣辭職，恢復我國國內的和平——這些就是我們不惜任何代價極力追求的目的，並且我們要在戰場上讓叛徒們（他們的瘋狂的罪行，我們一定要加以懲罰）知道這一點。”

據“政治和文學辯論日報”說，在馬德里曾經查獲了許多文件和信件，似乎它們無可爭辯地證明了起義者的秘密目的是宣布王位虛懸，把伊比利安半島合併成一個國家，建議把王冠讓給薩克森-科堡-哥達親王唐·彼得魯五世。“泰晤士報”對於西班牙起義的令人感動的關心以及上面說到的唐·彼得魯的來到英國，似乎都證明在事實上進行着一個新的科堡王族的陰謀。西班牙宮廷顯得十分驚慌，因為已經試遍了各種各樣的內閣的組合；曾經求助於伊斯土里斯以及馬丁涅斯·德·拉·羅薩，但是沒有結果。“貝雲信使報”硬說，德·蒙太莫林伯爵收到起義的消息後立即離開了那不勒斯。

奧當奈爾到了安達魯西亞，他的軍隊分三個縱隊越過了摩勒納山：一隊經過拉-卡羅利納，一隊經過波索布郎科，一隊經過德斯佩尼亞斯佩羅斯。“日報”承認，布塞塔上校突然佔領了昆卡，因此起義軍得以同瓦倫西亞取得聯繫。在這個省里，除了阿魯拉（政府軍在那裡遭到了慘重失敗）以外，目前起義還席卷了 4 個或 5 個城市。

有人又證實說，在雷烏斯和卡塔盧尼亞爆發了起義，而“貝雲信使報”補充說，在阿臘貢也發生了混亂。

Aimes-tu le front sévère,
Du sa(i)ge Napoléon?
Aimes-tu que l'Angleterre,
T'oppose lord Palmerston?

〔你喜欢英明的
拿破侖的严峻的臉孔？
你喜欢英国用帕麦斯顿勋爵来反对你？〕

在这首歌謠里，歌頌了离开加来的法国军队上船的情形。

从上星期六到星期一在倫敦一直是惶惶不安，因为要用帕麦斯顿来代替紐卡斯尔公爵的职务，以便真的用帕麦斯顿勋爵来反对沙皇。無論在政府陣营中或者在反对派陣营中，人們的心情都十分緊張。大家已經知道，新的陆軍部的預算将在星期一晚上提交議院，有人要利用这一情况給联合內閣以毁灭性的打击，并把不败的帕麦斯顿安插到陆軍部里去。

“星期六下午2点钟左右召开了內閣會議。大臣們直到3点才到会。除了外交大臣因謁見女王未能到会外，所有大臣都到了。克拉倫登勋爵直到4点才到他的同事們这里来。會議一直开到6点半钟，会后，阿伯丁勋爵立即到王宮去謁見女王陛下。”

从“先驅晨报”的这段令人不安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些“重大的”事件在托利党人中引起了多么大的希望。約翰·罗素勋爵在星期一把拥护他的人請到白厅¹⁸⁵去，迪斯累里先生也召集了反对派議員。有179位紳士到了白厅，几乎是歇斯底里地預感到罗素将要向他們进行大揭露。他們十分可悲地受了議會中斯庫伊尔斯¹⁸⁶的欺騙，这个人冷淡地向他們宣称：因为摆在日程上的是对軍事預算草案进行表决，他期望他們沉着行动：

“內閣很快又会需要錢来繼續进行战争，因此，信任或者不信任联合內閣的問題，将在下周由議院表决財政問題的时候決定。”

既然沒有让他与聞克拉倫登勋爵的秘密，他就无法告訴他們关于外交方面的情况。結果，罗素在这次會議上拯救了整个联合

內閣；要知道，如果信任票是由于陸軍部的預算草案提出來的，那末失敗就意味着帕麥斯頓對紐卡斯爾的勝利；然而，要是由于整個軍事預算草案而投不信任票，這就會是托利黨對聯合的輝格黨和皮爾派的勝利，——意外的情況當然完全是不能允許的。

因此，對陸軍部的表決，是昨天晚間議院在十分平靜、沒有發生任何事故的情況下進行的，只有羅素和帕金頓說出了大量令人討厭的關於目前軍事指揮管理的狀況的陳詞濫調。

遺憾的是，女王頑固的反對使帕麥斯頓沒有被安插到陸軍部，因為把他安插到那里，就會使激進派現在還用來維護英國對外政策的最後一個欺騙性的借口破產。

當奧特韋先生在上星期五的下院會議上說，他打算把佩特曼博士的遭遇通知議院的時候，帕麥斯頓勳爵從座位上站起來說，他準備作隨便什麼解釋，同時一切都會被認為是“令人滿意的”。然而，佩特曼博士在“晨報”上發表了一封信，這封信證明，雖然在其他方面他從來不是瘋子，他仍然相信維多利亞女王和阿尔伯特親王的寬宏大量，他懇求他們准他回德國，也就是做他們希望做的事。

所謂的激進派報紙的卑鄙的奴顏婢膝也在它對下面的這一空前的情況保持絕對沉默中表現出來：根據 *lettre de cachet* [秘密拘票]，活活葬送一個 18 歲的人，只不過因為他不幸知道了一點點關於王室的和貴族的某某人同德國女僕的曖昧關係。

卡·馬克思寫於 1854 年 7 月 18 日

載於 1854 年 8 月 3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4147 號

署名：卡爾·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發表

卡·馬克思

西班牙的革命。——土耳其和希臘

1854年7月21日星期五于倫敦

古老的加斯梯里亞諺語說：«Ne touchez pas à la Reine»（不要觸犯女王）；然而，冒險家蒙尼奧斯夫人和她的女兒伊薩伯拉老早就越出了甚至賦予加斯梯里亞女王的一切權利，所以西班牙人民已經不再盲目忠誠了。

1843年的政變¹⁸⁷持續了3個月，1854年的政變勉強超過了3個星期。內閣解散了，聖路易斯伯爵逃跑了，克里斯蒂娜女王偷偷地跑向法國邊界，而在馬德里，無論軍隊或者城市居民，都表示反對政府。

從這一世紀初起，除了維護各省和各地方的特權的運動以外，西班牙北部各省周期地爆發的一切革命，都十分相似：在每一次宮廷陰謀之後，接着是軍事叛亂，而軍事叛亂必然引起地方的政變。這個現象有兩個原因。第一，我們知道，人民的生活沒有越出各行省的界限，因此在今天我們所說的國家的範圍以內，軍隊是能夠在全國範圍內抵抗宮廷的唯一力量。第二，西班牙的特殊形勢和比利牛斯半島的戰爭¹⁸⁸造成了一些條件，使西班牙民族的一切富有生命力的力量只能集中在軍隊里。因此，民族情感的唯一表現（在1812年和1822年¹⁸⁹）是出自軍隊；因此，民族的最積極的部分總

是把军队当作一切民族起义的自然工具。然而，在 1830—1854 年的动荡不安的年代，西班牙城市居民已经逐渐相信，军队已经不是为民族事业服务，而变成了那些竭力树立自己对宫廷的监督的野心勃勃的将军们进行竞争的工具。因此我们看到，1854 年的运动甚至与 1843 年的运动也大不相同。人民对奥当奈尔将军的 *émeute* [叛乱] 有各种看法，就是没有把它当作反对宫廷统治势力的阴谋，何况这次叛乱是受到退职的宠臣塞拉诺的支持的。因此城市和农村都不肯响应马德里骑兵发出的号召；因此奥当奈尔将军为了不陷于孤立和遭到失败而不得不完全改变自己行动的性质。他不得不在自己的文告中提出同样是反对军队最高当局的三点：召开议会，成立节俭政府，组织国民军；最后一个要求是由于城市渴求恢复对军队的独立而来的。总之，军队起义只有服从人民起义所提出的条件，才能得到人民起义的支持，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且看，军队起义是否将不得已而保持对这些条件的忠诚并履行这些诺言。

除卡洛斯派¹⁹⁰外，一切党派——进步派、1837 年宪法拥护者、1812 年宪法¹⁹¹拥护者、联合派（要求兼并葡萄牙的人）和共和派——都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对于有关共和派的消息，应该特别慎重，因为这些消息是经过巴黎警察当局的检查的。除各党派之间的斗争外，军人领袖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埃斯帕特罗一听到奥当奈尔取得胜利的消息，马上就离开了他在列加涅斯的避难所，而且宣布自己是运动的领袖。但是凯撒-纳尔瓦艾斯刚听到关于自己的老庞培的行動的消息，马上就表示他要为女王效劳；他的建议被接受了，纳尔瓦艾斯将组织新内阁。我在下面要谈到的细节将表明，军人远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掌握了主动权，相反地有些

地方他們不得不向不可遏止的人民压力让步。

除了我在前一篇文章^①中談到的瓦倫西亞的政變外，在阿利康特也發生過政變。在安達魯西亞的格拉納達、塞維爾、哈安發生過政變。在舊加斯梯里亞的布尔果斯發生過；在累翁的伐利亞多利德發生過；在比斯開的聖塞瓦斯田和維多利亞發生過；在納瓦臘的托洛薩和潘普洛納發生過；在阿拉貢的薩拉哥沙發生過；在卡塔盧尼亞的巴塞羅納、塔腊果納、列里達和赫羅納發生過；據說在巴利阿里群島也發生過政變。據卡塔黑納7月12日來信說，木爾西亞也將發生政變，信中說：

“根據當地軍事總督發布的 bando〔命令〕，卡塔黑納有槍和其他武器的居民，都必須在24小時內把武器送交民政當局。根據法國領事的請求，已准許居住在該地的法國人援引1848年的先例把武器交給領事館。”

在所有這些政變中，只有四處值得談一談，這就是：比斯開的聖塞瓦斯田的政變，卡塔盧尼亞首府巴塞羅納的政變，阿拉貢首府薩拉哥沙的政變和馬德里的政變。

在比斯開，政變是自治機關發動的；在阿拉貢，是軍人發動的。當響起要求武裝人民的声音時，聖塞瓦斯田的自治機關已經決心支持起義。城市立即武裝起來。直到7月17日，還沒有說服兩營駐軍站到人民這一邊來。但是在城市居民和軍人聯合起來以後，有1000名武裝市民在一些軍隊協助下向潘普洛納進發並且在納瓦臘組織起義。正是聖塞瓦斯田的武裝市民的來到，支援了納瓦臘首府的起義。薩巴拉將軍稍遲也參加了運動並動身去貝云，号召不久前在薩拉哥沙遭到失敗而逃到那里去的哥多瓦團的兵士和

^① 見本卷第365頁。——編者注

軍官馬上回到祖國來，到聖塞瓦斯田同他匯合。據一些消息說，後來他到馬德里去投效埃斯帕特羅；同時另一些消息說，他到了薩拉哥沙，目的是同阿拉貢的起義軍匯合。巴斯克各省的司令官馬薩爾雷多將軍拒絕參加維多利亞的政變，被迫跑到法國去了。薩巴拉將軍的軍隊共有波旁團的兩個營和一營馬騎兵，一隊騎兵。在敘述巴斯克各省的事件的結尾，我要告訴讀者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吉普斯科阿省總督任命的巴腊斯帖基准將，是埃斯帕特羅過去的副官之一。

在巴塞羅納，政變顯然是由軍人發動的，但是根據我另外得到的消息判斷，說這次發動政變完全出於自願是很可懷疑的。7月13日下午7點，駐紮在聖普艾勃洛兵營和布恩-蘇塞索兵營的兵士，受到人民示威提出的要求的影響，宣布了政變，口號是：Vive la Reine! Vive la Constitution! [女王萬歲！憲法萬歲！] 處死大臣！打倒克里斯亭娜！和群眾結合在一起並且同群眾一起沿河堤前進的兵士，停在憲法廣場上。由於不被統帥部信任而在最近6天內被禁止離開巴塞羅奈塔的騎兵也宣布了政變。從這時起，全部駐軍就都轉到人民方面來了，當局採取任何抵抗都已經不可能。在整個壓力之下，軍事總督馬爾切西將軍到10點鐘也讓步了；而在深夜，卡塔盧尼亞軍區司令官也宣布他決心參加運動。他到了地方自治機關廣場並且向聚集在那里的人民發表演說。7月18日組成了洪達，參加洪達的有軍區司令官和其他著名人士，提出的口號是：“憲法、女王、道德”。後來從巴塞羅納傳來的消息說，根據新當局的命令，有幾名工人因為破壞機器、侵占財產被槍決了；又說在鄰近城市開會的共和派委員會委員被逮捕了；不過不應忘記，所有這些消息都是經“十二月二日政府”之手發出來的¹⁹²，而這個政

府的使命就是誣蔑工人和共和派。

在薩拉哥沙，據說政變是軍人發動的，然而這個說法被另外的消息推翻了，這個消息說這裡已經着手組織國民軍團。無論如何大家都知道，而且連馬德里“日報”也承認，在薩拉哥沙政變發生前，蒙托斯騎兵團的150名兵士，在去馬德里而在托列杭（離馬德里5西班牙里^①）宿營的時候舉行了起義，離開了他們的指揮官，這些指揮官在7月13日晚上帶了該團的輜重到了馬德里。兵士們在上尉巴腊伊班的命令下騎上馬，沿着去威特的道路前進，據估計，他們企圖在昆卡同布塞塔上校的隊伍匯合。至於說到馬德里（似乎率領“中部軍隊”的埃斯帕特羅和率領北部軍隊的薩巴拉都是反對它的），那末這個靠宮廷過活的城市為什麼最後參加起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日報”早在7月15日就發表了陸軍大臣的公報，公報硬說，叛軍正在逃跑，軍隊的忠誠和熱情正在增長。聖路易斯伯爵對馬德里形勢的估計看來是很正確的，他曾對工人說，奧當奈爾將軍和無政府主義者會使他們失掉任何工作，而政府如果勝利，將使全體工人都有社會工作，每天工資6雷阿耳^②（0.75美元）。聖路易斯想用這個花招把最容易煽動的一部分馬德里居民招募到自己的旗幟下來。然而他的行動也像1848年巴黎“國民報”派的行動¹⁹³那樣順利。他用這個方法獲得的同盟者，不久就變成了他的最危險的敵人，因為用於付給他們工資的資金只夠用6天。拉腊將軍（總督）的禁止散布任何關於起義勝利的消息的文告表明，政府是多麼害怕首都發生政變。再有，布拉塞將軍的策略看來只限於竭力防止起義者同軍隊有任何接觸，以免疫病侵入軍

① 西班牙里等於4.83公里。——編者注

② 西班牙古代銀幣。——譯者注

队。据说，奥当奈尔将军最初的计划预定在极便于骑兵行动的拉曼彻平原同政府军遭遇。然而同安达鲁西亚的几个主要城市保持联系的前宠臣塞拉诺的来到，迫使他放弃了这个计划。这时立宪派的军队决定离开拉曼彻到哈安和塞维尔去。

我们要 *en passant*〔顺便〕指出，布拉塞将军的 *boletinos*〔公报〕很像受到弗朗斯瓦一世嘲笑的十六世纪西班牙将军的勤务命令，很像受弗里德里希大帝譏笑过的十八世纪的命令。

很明显，这次西班牙的起义一定会成为英法政府分歧的原因；一家法国报纸说，奥当奈尔将军在起义以前曾藏在英国大使官邸，这个消息未必会缓和波拿巴对英国的不信任。在波拿巴和维多利亚之间已经积下一大堆恼人的事情。波拿巴希望在他的军队在加来上船的时候能同女王会晤，可是女王陛下对这个希望的回答是：这一天她要拜访前王后阿梅莉亚。此外，当英国大臣们在议会中被质问为什么没有在白海、黑海、阿速夫海进行封锁的时候，他们把同法国结盟当作辩护的借口。波拿巴对这一点的答复是在“通报”上宣布封锁上述几个海面，而不等得到英国的正式同意。此外，因为法国军队搭乘的完全是英国船，在法国引起了很不好的印象，所以波拿巴公布了指定用于这一目的的法国船只的名单，而且使用了这些船。

土耳其政府交给四大盟国的代表一份关于许可希腊商船重新进入土耳其港灣的照会。这次许可的有效期为两个月，条件就是希腊政府没有任何可能使土耳其政府取消这种许可的行动。如果在这个期限内，希腊政府没有给土耳其得到应分的满足，土耳其政府有权恢复目前的 *status quo*〔状态〕。希腊船只在土耳其港灣将服从地方当局的命令，而且不能向其他国家申请保护。在两个月

內應訂出締結協定和通商條約的基本原則。土耳其政府由于在希臘人暴動中受到巨大損失而要求的賠款數目，應該由仲裁法庭根據在各地進行調查的委員會的報告確定，委員會將由法國人、英國人、土耳其人、希臘人組成。

沙米爾從土耳其政府正式得到了切爾克斯和格魯吉亞軍團大元帥的稱號。

在法軍中服務的三個譯員在瓦爾那被槍決，因為發現他們同俄國人有聯繫。其中兩個是希臘人，一個是阿爾明尼亞人。在處決前，其中有一個吞下了破壞聲譽的文件。

7月16日，有人從海爾曼施塔得告訴我們，在弗雷特什提區還沒有發生任何衝突。

關於聯軍到達魯舒克的消息，當然是虛構的。在現在的條件下，聯軍的任務只限於阻止得勝的土軍的——用“泰晤士報”的說法——野蠻的殘暴行為。

卡·馬克思寫於1854年7月21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1854年8月4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4148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卡·馬克思 議會的戰爭辯論

1854年7月25日星期二于倫敦

在上星期五晚間举行的下院會議上，約·羅素勛爵在答复迪斯累里先生的質詢時聲稱，女王陛下曾有意下令解散議院，因此，他打算在星期一提出投票表決 300 萬英鎊撥款的提案；召開籌款委員會是沒有必要的。約翰勛爵沒有答复迪斯累里先生提出的關於今年議會秋季會議是否舉行的問題。請撥的款項在昨天舉行的兩院會議上分別被一致通過。

在上院，阿伯丁勛爵為撥款作了辯解，這次發言是在他擔任首相以來使我們飽嘗耳福的一切發言中最短、最枯燥无味的一次。他說，他不能不申請 300 萬，並且他確信勳爵們不會表示異議。他們在看法上可能有分歧，但是他們有一點應該是一致的，這就是“必須贊同一切最能導致戰爭早日順利結束的措施”。為此目的，首先要求“英法同其他強國共同作出積極的頑強的努力”。阿伯丁勛爵沒有說明他所說的是否指軍事或外交的努力；他甚至沒有把俄國排出于英國和法國應當與之共同行動的“其他強國”之外。由於議會即將解散，保證政府有錢用尤其重要。也許在高貴的勳爵當中有人寧肯把錢托付給別人，而不願意托付給他，然而這種使氣任性的願望不應該在討論事情的地方產生。問題，而且是刻不容

緩的問題，就在于对 300 万英鎊进行表决。

一向以信口开河这种特殊的天才著称的埃倫伯勒伯爵“认为，现在是建議政府在与战争无关的一切民政管理部門中厉行節約的大好机会”。

哈德威克伯爵认为，在波罗的海有一支准备应付任何意外情况的极其强大的舰队，在黑海也有这样一支舰队，而且是过去从英国海岸出发的所有远征軍中人数最多的一支舰队。他不知道政府打算怎样使用这些兵力，所以他呼吁所有的高貴的勳爵批准所要求的撥款。

在野的輝格党人菲茨威廉伯爵反对“似乎我国在所有欧洲国家中稅負最重的說法；相反地，應該說，我国人民的稅負比欧洲集团的其他任何部分都輕得多”。如果高貴的勳爵的这番話說的是勳爵們，而不是人民，那他是說对了。“至于說到我的那位領導政府的高貴的同事的講話”，那末，从来还没有在类似的場合发表过一次講話可以使“人們有充分的根据說，它几乎沒有向議院提供任何一个新的思想”，而高貴的勳爵应当清楚地知道，議院在思想方面的要求是怎樣的。菲茨威廉伯爵想从阿伯丁勳爵那里了解到，他如此热心于与之共同行动的“其他强国”是哪些国家？也許是奥地利？他担心的是，这个国家会慫恿英国政府认定撤出多瑙河各公国或多瑙河的航行自由这类次要問題可以成为簽訂和約的充分理由。（这种担心是可笑的，因为，自然沒有人会慫恿阿伯丁勳爵提出这样过分的要求。）伯爵还想知道，应当怎样理解土耳其的完整？是把这个術語理解为阿德里安堡条約呢，还是理解为其他什么东西？最后，他指出，議院处于非常奇怪的地位，因为議会沒有得到任何有关政府意图的消息。由于所有这些考虑，他将投票贊

成撥款。

随着就任內閣职务的希望日益渺茫而心情也日益忧郁的克兰里卡德侯爵，要求哪怕多少解釋一下从呈請上述撥款以来已取得哪些成就和已采取什么样的方針，以报答他至今对政府所表现的无比的容忍；他希望多少知道一点关于战争的条件和前途，本国与盟国的相互关系。已取得某些成就的是土耳其人，而不是不列颠政府和不列颠的武器，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去吹嘘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英国水兵的英勇精神。至于与盟国的关系，他打算提出关于公布土耳其和奥地利最近签订的条约，以及其他有助于阐明当前形势的文件的建議。

“从广泛流行的一些傳說中可以看出，由于不列颠政府的压力和坚持，御前會議和土耳其公使不久前同奥地利签订了协议，虽然御前會議以前反对这样做。根据协议，奥地利军队应当开进多瑙河各公国并占领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

奥地利在千钧一发之际不是从速调动军队，反而放弃这一做法并开始新的談判，这是怎么回事呢？发言人还希望知道維也納會議是否还在繼續和会上正討論些什么問題。总而言之，他认为英国过分依赖德意志强国了。

为了证明奥地利“应当”是最好的盟国，克拉倫登勋爵指出了俄国正在包围奥地利的一些領土并对它进行恐吓等情况。奥土条约还不可能提交議院，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該条约的批准书。克拉倫登勋爵认为，使議院相信奥地利同英国采取共同行动的时候已經不远这一点是可能的，“但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打保票”。不过从对奥地利的总的評價和克拉倫登掌管外交部的事实来看，高貴的勋爵們是可以做出最令人快慰的結論的。克拉倫登勋爵曾

因散布最无耻的謊言两次被人揭穿，現在自然期望人們絕對相信他这样的声明：

“政府无意恢复 *status quo* [状态]，也无意滿足于仓猝达到的和平，这种和平只不过是一种糟糕的休战，它将使新的战争成为不可避免。”

勋爵們为了显示他們本身的高度文化教养的輝煌范例，自然要把話題扯到国民教育的問題上去——在这一点上我們跟他們告別了。

在上院进行辯論期間，下院在討論一些无关紧要的問題，直到获悉阿伯丁勋爵发表的給人留下“不愉快的印象”的演說的消息才結束。約翰·罗素勋爵立刻感觉到有必要造成一种相反的印象。

当政府打算要求第一次特別追加撥款时，它調动了“威武壮观的”波罗的海舰队；著名的炮击敖德薩事件，則是要求第二次追加撥款的理由；現在被选作口令的是塞瓦斯托波尔。

約翰勋爵首先对議院在慷慨支持政府第一次請求追加撥款时所表現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了应有的贊揚，并对議院至今沒有給政府制造难题这一点表示感謝。这就有可能获得許許多多的东西，即保证有大批船只和人員。英国現在拥有 17 艘一、二、三級蒸汽舰，17 艘帆力战列舰和 57 200 名海軍人員，而在 1853 年 1 月 1 日以前，只有 1 艘蒸汽舰，11 艘帆力战列舰，33 910 名海軍人員。此外，在土耳其沿岸地区还有一个有三万多名兵士的軍登陆，“其中許多人不久前駐扎在瓦尔那”。这就是当时的軍事力量。至于軍事行动，它們还

“剛剛开始，而目前只能說土耳其軍队完成了勇敢精神的奇迹。現在誰也不会說，俄皇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打垮整个奧斯曼强国。除了土軍的輝煌功績之外，法英两国軍队的完全协调一致是这次战争的光荣”。

接着，約翰勛爵轉到請撥的款項問題，他說，他不可能向議員們确切地說明什么地方需要款項。軍需、炮兵和交通運輸需要二百來萬；此外，土耳其軍隊的一個龐大的分隊可能併入不列顛軍隊，它的給養將由不列顛政府負擔。而總的說來，請求議院撥款不是根據什麼詳細的預算，而是供政府“不時之需”。

高貴的勳爵說，奧地利甚至比法國或英國更關心保衛土耳其。沙皇確立了他對多瑙河各公國的統治並在土耳其贏得了占優勢的影響以後，就會使奧地利政府完全屈從於自己。但是，為了正確地評判奧地利，必須記住它所處的困難條件是什麼。俄軍可以在好幾個地點逼近奧地利首都，而另一方面，在一些屬於奧地利的地區情況相當不安，如果參戰，那對奧地利來說是很危險的。因此，只要有可能，它是會力求通過談判來解決這些問題的。不久前，它曾給俄皇發出一份照會，俄皇的答復不能說是含糊其詞的。

“第一，俄國不準備規定撤出多瑙河各公國的期限。它認為，一旦宣戰，一旦英國和法國參戰，在黑海和波羅的海的兵力就超過了俄國，而俄國艦隊又離不開本國的港口，那末作為戰區的依然只有多瑙河各公國和多瑙河航道，在這裡俄國可以指望重建均勢並以它的武器的長處取得勝利。因此，它拒絕在這樣的條件下撤出多瑙河各公國。”

除了允許土耳其加入歐洲強國體系這一項以外，俄國曾經願意接受4月9日的議定書中所陳述的原則。至於說奧地利下一步的行動，約翰勳爵認為它目前的政策是錯誤的，同時他不相信它會背棄它所承擔的義務。根據與西方強國和土耳其簽訂的這些義務，奧地利必須參與反擊俄國的努力。然而，它也許企圖重新獲得聖彼得堡的更為有利的答復。盟國當然不能控制奧地利政府機關，同樣，奧地利也不能控制普魯士國王。由此可見，對所有強國

來說，存在着共同進攻俄國的最有利的條件。

然後，約翰勳爵又詳盡地，興高彩烈地來敘述英國和法國打算採取的措施。土耳其的完整同恢復多瑙河各公國的 *status quo*〔狀態〕是不相容的。約翰勳爵說：

“然而，關下，俄國的障地還從另一方面威脅着土耳其的獨立和完整。我指的是一个堅固要塞的建立，这个要塞構築得十分內行，是目前軍事學術難以攻克的，而且在它的港口還有一支準備隨時順風開往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最大的戰列艦艦隊。我認為這種形勢對土耳其的威脅如此之大，以致任何和約只要給俄皇保留這個威脅性障地都不可能被認為是令人滿意的。（熱烈鼓掌）像以往一樣，今後我們還準備跟法國政府討論這個問題，並且我有一切理由認為，法皇政府在這一點上同我們是完全一致的。”（鼓掌）

關於迪斯累里先生的秋季會議的提案，約翰勳爵說，他“拒絕接受這個院的成員提出的任何限制大臣們自由的條件”。

如果一一轉述休謨、班克斯、奈特、阿耳科克和 *tutti quanti*〔他們一流〕就這個問題發表的全部看法，是令人厭倦的，也是多餘的。

科布頓先生聽信了約翰勳爵的話並且以為他把議院變成了軍事委員會，所以竭力設法說明為什麼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當占領塞瓦斯托波爾和克里木。他提出英國是否和一些反人民的政府結成了同盟的問題，也就觸及一個更有趣味的議題；人們以為戰爭似乎是用來保衛被壓迫民族的，是大錯了；實際上，戰爭是為了使束縛匈牙利和意大利于奧地利統治之下的鎖鏈更加牢靠。議院里有一些可尊敬的但是被弄糊塗了的議員，他們

“說，政府沒有很好地進行戰爭，政府應當指派另外的人來領導軍事部門，甚至有時有人說——來領導政府。他們認為這個人就是帕麥斯頓勳爵。這一切做法似乎是為了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利益。可是，發言人從匈牙利和意大利人民的兩個最偉大的領袖的言論中聽到，他們不僅不把希望寄托在

这位勋爵身上，相反地，他們知道，当他有可能給予他們以道义上的支持的时候，他甚至不肯以弹指之力来維護他們。如果說英国現政府里有一个人是这两位領袖最不信任的人，那末这个人正是高貴的勋爵。科布頓不认为高貴的勋爵觉察到以他的名义制造的大騙局，幸而，現在迷惑已經消散了”。

累亚德先生和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只是重复了他們以前的发言；达德利勋爵仅仅补充了一句話，說他現在对“帕麦斯顿”这个名字的魔力的信仰“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定”。

迪斯累里先生輕輕一吹就把約翰勋爵的言論的肥皂泡吹破了。他引用西諾普会战和去年秋季休假期間发生的其他壮举簡要地論证了他关于秋季會議的建議，接着他說，关于即将摧毀塞瓦斯托波尔和占領克里木的消息使他感到異常惊奇和惶恐不安。約翰勋爵坐在座位上辯駁了几句；而迪斯累里先生也坐着硬要他解釋清楚。于是，約翰勋爵用小心翼翼的腼腆的声調說：

“我只能說我剛才所說过的話：依我之見，不能容許俄国再繼續保持它所占領的那个威胁性的障地，在塞瓦斯托波尔拥有这样龐大的舰队。”

一听到約翰勋爵的这番供认，迪斯累里先生就猛然起来作了一番最尖酸刻薄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值得 *in extenso* [全部]讀一遍。他用下面这段話結束了自己的发言：

“真的，我們听了这番話以后，如果还把阿伯丁勋爵的政策和他的一些同僚的政策精細地区分开来——正像人們所做的那样——那是很不公正的。我不崇拜，也不拥护阿伯丁勋爵，然而我也不崇拜那种认为必須牺牲一些閣員来保全另一些閣員的議會政治。在剛才这位高貴的勋爵就他所說过的話作了解釋之后，可以看出，他在俄国問題上的政策本质上和阿伯丁勋爵的政策毫无区别，而这一点終究会使英国人民感到有些滿意。就是說，我們內閣里沒有分歧；这次會議至少可以在大臣們对这个問題的意見完全一致的情况下結束。可見，作战应当为了渺小的目的，偉大的政治意图必定导致毫无价

值的、微不足道的結果，在這一點上聯合政府是一致的。”

帕麥斯頓勳爵的談話沒有產生任何印象。在迪斯累里先生講話和其他許多聲稱自己曾被約翰勳爵的第一次發言弄糊塗了的下院議員發言之後，請求撥款的提案被批准了，但附帶一個條件：辯論今晚將繼續進行。同時，達德利·斯圖亞特勳爵宣布，他打算上奏女王，“請求陛下在她能夠向議院提供關於同其他強國的相互關係，以及陛下在她被卷入的鬥爭中的看法和計劃的更全面的情報以前，解散議會的措施暫緩執行”。

卡·馬克思寫於 1854 年 7 月 25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54 年 8 月 7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4150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署名：卡爾·馬克思

卡·馬克思
*奧地利的政策。——下院的
戰爭辯論

1854年7月28日星期五于倫敦

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①中，已經向你們分析了6月14日的奧土條約，並且指出，這個有趣的外交勾當的目的在於：第一，給聯軍不渡過多瑙河和不跟俄軍接觸提供借口；第二，阻撓土軍重新占領整個瓦拉几亞並把他們從已占領的瓦拉几亞的部分領土上擠走；第三，在多瑙河各公國恢復俄國曾於1848年強加於羅馬尼亞人的舊的反動制度。現在我們果然從君士坦丁堡方面得知，奧地利已經聲明抗議奧美爾-帕沙渡過多瑙河的意圖；它要求取得占領多瑙河各公國的專有權利和封閉不僅是英法軍隊，甚至包括土軍進入該地的通道的權利。為答复這項抗議，土耳其政府似乎已經命令奧美爾-帕沙目前不要渡過多瑙河，但是原則上拒絕承認奧地利占領多瑙河各公國的專有權利；從自己的老師和保護者帕麥斯頓勳爵那里學會了一點東西的不幸的列施德-帕沙，當然不會認真反對這種做法；實際上容許那些被他在原則上拒絕的事情。可以認為，奧地利已經破壞了並在事實上廢除了6月14日的條約，因為在俄軍向三個方向潰退，並且沒有立即退到塞勒特河左岸而把翼側和

① 見本卷第326—327頁。——編者注

后方暴露在奥地利的攻击面前的时刻，奥地利并没有进入瓦拉几亚。但是应当想到，根据这个著名的条约的条款，奥地利既没有义务立刻进入多瑙河各公国，也没有义务在一定期限内肃清多瑙河各公国的敌人，甚至没有义务迫使俄国人在规定的某一期限内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现在有消息说，奥地利人的确正在进入小瓦拉几亚，而俄国人正在把自己的军队调离喀尔巴阡山的山口并在福克夏尼集中。但是，这只是说明奥地利不是在把俄国人挤出大瓦拉几亚，而是决定把土耳其人驱逐出小瓦拉几亚并且用这种方式来阻碍他们在阿留塔河两岸的活动。当时除非使土耳其军队撤离它所占领的地区并由英法军队（他们尽力避免同俄军冲突，并使土耳其几乎处于被包围状态）来占领保加利亚，想不出更好的计划以引起土耳其军队内部的暴动了。这一点从英法统帅部联合告保加利亚居民书中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个告居民书几乎是从布德贝尔格、哥尔查科夫和 tutti quanti [他们一流] 那里逐字抄来的。我早已向你们预言过，西方强国将为进步事业效一次劳——它们使土耳其这个衰老的欧洲制度的基石革命化起来。

奥地利不仅反对土耳其人占领土耳其地区的意向，而且要求恢复现在居住在维也纳的两位国君的权利；馮·布魯克先生通知土耳其政府，两位国君应当同奥地利军队返回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列施德-帕沙答复说，土耳其政府将讨论恢复两位国君的权利到什么程度适宜的问题，但馮·布魯克先生坚持要履行条约的第三条即恢复旧政府。读者们或许还记得，我曾请诸位注意这项条款^①的模棱两可的措词。列施德-帕沙反对说，在土耳其政府确

^① 見本卷第 327 頁。——編者注

信這兩位國君沒有違背他們的效忠蘇丹的責任以前，不可能恢復他們的權利。土耳其政府對莫爾達維亞國君吉卡並不十分反對，但是瓦拉幾亞國君施梯爾貝的行為曾經具有強烈的挑釁性質：他曾以最可耻的方式表示支持俄國，所以土耳其政府非驅逐他不可。於是，布魯克先生便請蘇丹作主。後者召開了非常會議，制訂出一個折衷方案。這個方案規定兩個國君暫時復位，而土耳其政府任命一個高級專員負責調查他們的行動，然後再作最後決定。列施德並不十分反對的國君吉卡重新掌政自然只是名義上的，因為莫爾達維亞仍在俄國人的手中。相反地，被土耳其政府親自趕走并被斥罵為俄國代理人的國君施梯爾貝的復位却是真正的現實，因為俄國人已經撤出了瓦拉幾亞的一部分領土，其餘部分看來也將很快撤出。

可是，奧地利的外交活動並不只這一些。我們在昨日的“晨郵報”上看到一則7月19日的貝爾格萊德電訊：

“昨日從君士坦丁堡接到立即停止進一步武裝和一切軍事演習的命令。據私下透露，下一個命令就是裁軍。這些消息立即被轉告給亞歷山大公爵。”

看來，這就是土耳其政府對於塞爾維亞抗議奧地利占領的答復。不幸的土耳其政府就這樣失去抗击它的公開的敵人的可能性，同時卷入對它自己忠實的藩屬的敵對的篡奪活動中。土耳其政府用6月14日的條約撕毀了它同多瑙河各公國的協定，而用裁軍的命令破壞了塞爾維亞的根本法。同一個政治上的步驟即使土耳其軍隊內部有發生叛亂的危險，又把塞爾維亞和多瑙河各公國推向俄國的懷抱。奧地利的要求撤出多瑙河各公國變成土耳其人的被禁入這兩個公國，而奧地利的聲名狼藉的備戰卻變成塞爾維亞的裁軍。

愚蠢的奥地利，既然成了沙皇和他的英国同謀者手中的簡單工具，也就不过是准备着使它本身成为第一个牺牲品的普遍革命的因素，对这个革命的到来，只有戴維·烏尔卡尔特之流空想主义反动分子会感到懊丧的。

讀者已經知道在意大利已經开始了的运动。报纸正在报道热那亚、摩地那和帕尔馬等地的風潮。但是，依我看，費拉拉发生的事件比其他一切事件更像 1848 年的普遍起义。

我一开始就对傲慢的和遭到破产的奥地利政府发行的“爱国自願”公債作了正确的分析，这一点讀者会从布尔格尔男爵不久前的告倫巴第臣民书中看出来。告臣民书宣布，倫巴第应摊的自願公債規定为 4 000 万弗罗倫，相当于 10 440 万法郎；如果按人口分摊，每人摊到 40 法郎。

“同盟报”写道：“这个自願公債正在变成龐大的軍稅：每个省，每个自治机关，每个人都应当自願支付規定的一份。”

为了使人对这种“自願”公債的真正性质不再存在任何怀疑，布尔格尔男爵的告臣民书最后說：

“每个人都必須明白，如自願公債失敗，那就要征收特別的强制軍稅。这种軍稅将以适当方式从土地、資本、商业和工业的各项收入中征收。”

在星期一下院會議上樞密院院长兼下院領袖^①发了言，仿佛是要詳尽地陈述內閣的意图，可是 6 个小时之后，发生了一件議會史上空前罕見的事实——他就在同一个地方把他所讲过的話完全收回了。晚上 7 时他宣布：遭到炮击的塞瓦斯托波尔已經被摧毁并且已經从俄国手中夺下；午夜 1 时 15 分，他宣布俄国舰队在

① 即約翰·罗素。——編者注

塞瓦斯托波尔损失了一艘或两艘战列舰，而“目前俄国依然保持着它的威望和地位”。6小时内，小約翰^①在下院議員面前罵人、摆架子、吹牛皮、喧嚷、胡鬧、道賀和瞎扯。在6小时的过程中，他强使議員們在云雾中漫游，但是，只要迪斯累里先生寥寥几句尖刻話，就把这个肥皂泡通破了，使假獅子不得不重新把习常的小羊皮披在自己的肩上。对内閣來說，这是一个“耻辱日”，但是它实现了它的300万英鎊的提案。

星期二的會議就斯图亚特勋爵的延期解散議会的提案进行了辯論。撥款案已經表決批准了；除了对内閣的信任案进行表決外，还有什么可做呢？因为极可尊敬的議員們完全了解这一切，所以出席會議的議員不多，辯論冷冷清清，内閣比任何时候都囂張，而达德利·斯图亚特的提案被一致否決了。内閣巧妙地把它自己的耻辱变成对下院議員的胜利。这对議會來說是一个“耻辱日”。不过，由于沃龙佐夫的内兄弟不列顛軍务大臣赫伯特先生所代表的軍事部門的辯护，由于海軍部部务委員貝克萊的狂妄自大和由于小約翰关于英国内閣的内部情况的傲慢的激昂慷慨的講話，會議还是值得注意的。

从前的“年輕的托利党人”，长着一个漂亮的小脑袋瓜儿的赫伯特先生，用对軍需长官菲耳德的贊揚来答复人們对不能令人滿意的軍需机构的抱怨。他說菲耳德这个人无疑是最适合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因为50年前他曾得到“铁公爵”^②的信任并在他手下担任过很高的职位。赫伯特先生用“軍隊的最好的軍需官”的經過粉飾的报告和一些法国軍官的言不由衷的恭維話来駁斥報紙記者們

① 即約翰·罗素。——編者注

② 即威灵頓。——編者注

的令人不快的通訊。他只字不提軍隊完全沒有運輸工具，軍隊里沒有騾子，也沒有馬來運輸軍隊從瓦爾那和迭夫尼亞向多瑙河轉移時所必需的行李和用水以及其他許多行軍時所必需的東西。他只字不提缺乏購買軍糧的經費。他不反駁這樣一個事實：軍需部只是在許多師出發之後和艦隊到達君士坦丁堡之後才成立的。他不敢反駁這種說法：據腊格倫勳爵本人說，由於軍需部工作的糟糕，他的軍隊在兩個月內一直停在一個地方無法前進，雖然他們在同餓得精疲力盡的敵人的距離幾乎只有相當一炮的射程。

沃龍佐夫公爵的能找竅門的內兄弟也以同樣的手法答复了對於炮隊的裝備的抱怨。他冗長地答复了他本人提出的指責，即在土耳其的軍隊中只有一些六磅的火炮。可是他竭力迴避這樣一個事實：軍隊里沒有攻城炮，幾乎沒有騎兵這個在瓦拉幾亞平原作戰最必需的兵種來支援步兵，在瓦爾那一個 4 萬人的軍團甚至不能配備 40 門火炮去對付俄軍，而俄軍的一個 4 萬人的軍卻擁有 120 門火炮。

沃龍佐夫的內兄弟在回答對政府供應軍隊必需的戰鬥裝具方面所表現的漫不經心提出的指責時，令人氣憤地為統帥部辯護，似乎後者是無可非議的。

至於不幸事件和英國人對這些意外事件（在法國遠征中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意外事件）的壟斷，極可尊敬的赫伯特先生宣稱，第一，的確有一隻載運第六龍騎兵團的部分人員的船成了火災的犧牲品，然而，船長，“一個高貴的老水手，在面臨人們所能遇到的最可怕的死亡時，卻不顧船員們的請求，拒絕離船。可惜呀！當時離船還不算遲，他終於殉職了”。受愚弄的下院議員們以贊同的呼聲迎接了這種毫無意思的回答。至於“老虎號”的損失¹⁹⁴，應當

算为意外事件。“而波罗的海上的可悲事件，——呶，它只能說明我国水兵的有勇无謀”。

然后，长着漂亮的小脑袋瓜儿的先生轉到向他提出的問題：“我国海軍和我国陸軍是否取得了什么实际的結果？”他吹噓了一番“对俄国港口的全面的、成功的和无法突破的封鎖”。这一封鎖是如此成功，以致，例如，有 8 艘俄国軍艦虽然遭到炮击，经历了战斗和重重困难，仍然从塞瓦斯托波尔到达了敖德薩。这一封鎖是如此成功，以致俄国在波罗的海上的貿易繼續在大規模进行，俄国商品仍然在倫敦出售，只是价格略高于战前；敖德薩完全跟去年一样在进行貿易，甚至对黑海和白海的名义上的封鎖还是几天以前由波拿巴强迫英国人去做的。

然而，姓赫伯特的高贵的年輕人断言，英国政府作过的事还要多。难道英国政府沒有使俄国无法利用黑海运送增援部队，沒有切断俄国出海的一切通道嗎？不过他完全忘記了，英国政府在 4 个月中让俄国人控制了多瑙河；它让俄国人仅用 15 000 人就占領了欧洲的谷仓——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夺走了就在它眼前的多布魯甲的丰富牧群，它阻撓土耳其艦队消灭西諾普附近的俄国艦队。英国人对土耳其人的軍事胜利給了不小帮助，因为他們既是土耳其軍队的預备部队，也就給了土耳其軍队利用每个兵士和每門火炮以对付入侵軍队的可能性。

需不需要提醒讀者，当俄国人还没有能够在两个公国集結优势兵力的时候，英国政府却阻止奧美尔-帕沙利用他的軍队的数量上的优势和最初的胜利成果？英国軍队还干了些什么呢？

“俄国在构筑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的堡垒綫上花了多少英鎊？可是在一个短暫的战局中，所有这些像一条鏈子鎖住切尔克西亚的坚固要塞，除了一

个堡垒之外，都落入了英国人或他們的盟国的手中。”

沃龙佐夫！沃龙佐夫！难道你忘記了，当人們在會議一开始就建議你攻占这些堡垒的时候，你拒絕这样做，也就使俄軍能够把这些堡垒的守軍移到塞瓦斯托波尔？你所占領的仅是俄軍自己打算放棄的那些堡垒，而唯一沒有摧毀、也沒有占領、甚至沒有去进攻的“例外”，正好是唯一值得占領的、并且俄軍认为应当守住的堡垒，是唯一打通同切尔克斯人联系的堡垒——阿納帕。

赫伯特先生的庸俗的饒舌达到了頂点，他說，英国参加了光荣的錫利斯特里亚保卫战（这次保卫战不仅英国自己不支持，而且还不許奧美尔-帕沙支持），因为在陣亡者中有一个叫巴特勒上尉的年輕人。关于活着的奈斯密斯中尉，当然一个字也沒有提到。应当說，巴特勒上尉仅仅在政府拒絕派他到錫利斯特里亚以后才到那里的，因而赫伯特元帅現在尤其有一切理由称贊他的行动方式。至于說奈斯密斯中尉，他是屬於那种即将被逐出英国兵营的人物，而且他是以战地記者的身分到錫利斯特里亚的。

由于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攻击政府沒有购置吃水量在3英尺以下并装备一两門重炮的蒸汽舰，在赫伯特將軍之后发言的貝克萊海軍上将就請高貴的勋爵“敎会造船督察如何建造这样的船只”。这就是輝格党的英勇的海軍上将对于海軍部如不保证建造大量炮艇，能否装备一支用在波罗的海作战的舰队的問題的答复。英勇的貝克萊和他的学識淵博的造船督察与其向一无所知的令人发笑的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討主意，还不如求敎于瑞典和俄国的海軍部。

我們不再談文雅的赫伯特和英勇的貝克萊为不列顛統帥部所作的辯护。現在来談談这位貝克萊脫口而出的真心話。如果說昨

天晚上小約翰通破了塞瓦斯托波爾的肥皂泡，那末今天，喀琅施塔得的肥皂泡也因貝克萊的發言而破滅了。既然多瑙河各公國的全部戰鬥將完全由奧地利單槍匹馬地進行，那末，對於“裝備空前精良和任何國家都不曾派出過的最強大的陸軍和海軍”連同它們的螺旋推進式蒸汽艦、佩克桑炮和其他殺傷力極大的武器，就沒有用武之地了。威武的貝克萊從威武的波羅的海艦隊總司令^①的信中引用了這樣一句話：

“我不能率領這支強大的艦隊從事任何活動，因為對喀琅施塔得或斯維阿波爾格的任何進攻都意味着必然的滅亡。”

不僅如此。威武的貝克萊一面陶醉於這支最強大的艦隊無所不能的想法，一面繼續嘟囔說：

“科學知識之淵博在一切人之上的查茲海軍上將也就這一點寫道：經過從燈塔上的兩天的觀察並對堡壘和船隻的周密的察看，我深信，對我們艦炮來說，堡壘太堅固了。這是大塊大塊的花崗石。要進攻停在停泊場的敵艦，簡直不可能。”

關於納皮爾，威武的貝克萊作了這樣的結尾：

“從來還沒有一個不列顛軍官在作戰上得到過這樣的 *carte blanche*^②。政府不但沒有縛住他的手，相反，還千方百計地鼓勵他前進”——從博馬爾松德到喀琅施塔得和從喀琅施塔得到博馬爾松德。

托利黨人希爾德亞德先生指責說，“他有生以來還未聽過有人這樣把什麼都隨便泄露了的”；貝克萊的講話像一個公然的俄國代理人；一切關於喀琅施塔得的高談闊論終究都是得到他的默許的。為應付這種指責，英勇的貝克萊部分地收回了他的沒有分寸的話，

① 即查理·納皮爾海軍上將。——編者注

② 直譯是：“空白的格紙”，此處的意思是：“活動的自由”。——編者注

并且声明，納皮尔所指的只是目前他只有舰艇而没有陆军支援的情况。从納皮尔离开英国海岸时起，我就一再地说，没有陆军，没有同瑞典的同盟，就不可能在波罗的海取得任何成就，这个见解也博得一切有科学头脑的军人的赞同。

现在我来谈谈这些难忘的辩论中的最后一点，即约翰·罗素勋爵的趾高气扬的讲话。300万的支票一拿到手，他就变得如此厚颜无耻，就同20小时前他在迪斯累里的冷嘲热讽的打击下进行狡辩时显得那样羞羞答答一样。

“他根本不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澄清他昨晚所作的发言”。对于有人企图在阿伯丁和阿伯丁的同僚之间制造“不愉快的分歧”，他说：

“至于战争方面的一般措施，组成所谓内阁的女王陛下的顾问们天天都在讨论这些措施，阿伯丁勋爵和他的内阁的全体同僚对所作的决定向议会和国家负有同样的责任。”

他甚至不冒任何危险地对议院说：

“如果认为我们配作女王的大臣，那末，我们就应当有权斟酌召开或不召开议会会议；如果认为我们不配享有这种权利，那就是说我们更不能当大臣。”

旁听了星期一和星期二的英国议会会议之后，我才明白，1848年我在“新莱茵报”上斥责柏林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议会生活的最可悲的表现¹⁹⁵，是多么糊涂。

如果拿沃龙佐夫的英国内兄弟的声明，拿罗素的平淡无味的吹牛和“泰晤士报”社论的吼叫同“泰晤士报”驻瓦尔那不列颠兵营记者7月13日的最近的报道比较一下，读者是会感到兴趣的。现在把这次报道摘录如下：

“昨晚所有人都确信很快就要締結和約了，因为据报道，奥地利公使和布朗將軍曾經共进午餐，而这位公使正从他同奥美尔-帕沙进行过长时间談判的苏姆拉前往瓦尔那，他将在該地同腊格倫勳爵和圣阿尔諾元帅磋商。据报道，劍桥公爵已宣布，騎兵于11月前返回英国，步兵于5月前返回英国。不能肯定，目前我們是否处于战争状态，联軍真是作战的一方还是他們在土耳其登陆后只作了作战的姿态。我們的閱兵、檢閱、演习和檢查都同在薩托里和乔宾进行的一样是不会得罪人的，而我們在陆上的全部行动仅仅是：第一次是卡迪根勳爵的偵察性的游覽，第二次是派出几个工程师和工兵到錫利斯特里亚和魯舒克，第三次是派赴該地几个法国架桥兵，第四次是又派一个工兵小队和150名水兵到魯舒克，架設此岸到島屿和从島屿到对岸之間的桥。”

英国沒有巴士底獄，但是有疯人院，完全可以根据 *lettre de cachet*〔秘密拘票〕把任何一个不合王室心意的或有碍家庭和好的人关进去。这一点在星期三辯論佩特曼博士的案件^①时，已經由汉利先生所支持的奥特韦先生充分证实。帕麦斯頓勳爵，这位 *civis romanus*¹⁹⁶ 和“不列顛臣民的权利和特权”的著名的維護者几句话就把問題压下了。帕麦斯頓甚至不肯定說佩特曼真是個疯子，而只是說，“看来，他自以为有权向政府提出某种訴訟”而且正打算非常固执地要向女王，或者更正确地說，向一个匿名要人——阿伯特亲王提出这种訴訟。科堡家族已經无孔不入；目前他們想使西班牙完全受自己支配。

政府的“地球报”說：“这是博士和女王的权利問題，我們深信，議會內外沒有一個人会在判断这些权利时搖擺不定。”

如果托馬斯·倍恩的“人的权利”在这个自由的极乐国度被公开焚毀，也用不着惊異。

① 見本卷第356—359頁。——編者注

在同一个星期三晚上，还演出了一出議會的小喜剧。在上星期五的會議上，巴特先生提出了一項禁止不列顛臣民买卖俄国政府的有价证券、違者受懲处的提案，但是这个提案只对这次战争时期发行的俄国公債而言。不列顛政府沒有提出这样的法案，但又不能断然反对，因为波拿巴已經在“通报”上发表了一則假消息，說什么英国政府和他見解一致，认为认购俄国公債是非法的。因此，帕麦斯頓支持巴特的提案，但是遭到了“經濟学家”杂志的精明的出版者、財政部秘书长威尔逊先生的相当不客气的反对。于是这一位在星期一为联合內閣辯护、星期二一言不发从而事实上保证了联合內閣的成功的帕麦斯頓，星期三毕竟不能放过重新扮演內閣的“受气的女人”的角色。他以男性巫女的傲慢态度抑揚頓挫地、一本正經地說，他完全受他的爱国热情支配，而他这个被自己官方地位的铁的紀律束縛的可怜人，在前两个晚上却不得不压制这种热情。极可尊敬的受騙的听众的不可避免的热烈欢呼淹沒了他以下的話：

“这个法案只不过是肯定不列顛臣民不应向俄国人提供作战費用的原則。財政部秘书长提出的理由是想强迫我們廢除叛国法。类似的論据純粹是胡說八道。”

必須指出，正是这个人，他 24 年来一直把俄荷貸款协定强加于英国，而目前是內閣——这个內閣仍然在为这种国債还本付息，从而向他这位帕麦斯頓提供“作战費用”——的最有影响的閣員。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7 月 28 日

載于 1854 年 8 月 9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152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无 聊 的 战 争

自从土軍两个步兵营組成的一支不大的部队成功地从沃耳特尼察对岸的土尔图凱附近渡过多瑙河,在那里构筑起野战工事,并且当俄軍向他們攻击时,他們經過短短的、但非常激烈的战斗(这次战斗作为这次战争的第一次冲突而获得了沃耳特尼察会战的赫赫大名)而把俄軍击退以来,已經快一年了。当时,土軍是单独同俄軍对抗的,在他們后面既沒有英軍或法軍作預备队,甚至也不能指望联軍舰队的任何支援。虽然如此,他們仍在瓦拉几亚的多瑙河岸的沃耳特尼察附近扼守陣地达两星期之久,而在卡拉法特附近扼守了整整一个冬季。

从那时起,英国和法国对俄国宣战了。联軍不止一次地表现出英勇精神,虽然效果令人怀疑。黑海分舰队、波罗的海分舰队和将近十万英法陆軍,准备援助土軍或者把敌人的兵力吸引过来。但我們看到这一切的結果不过是沃耳特尼察附近那种战事的更大規模的重复而已,而胜利似乎比去年更小了。

俄軍包圍了錫利斯特里亚。他們在圍攻中的行动是不明智的,反而是勇敢的。他們每天每夜都遭到挫敗,但这不是因为对方用兵高明,也不是因为巴特勒上尉和奈斯密斯中尉这两位英国軍官在場(按“泰晤士报”的說法,是他們拯救了錫利斯特里亚)。不是这样,俄軍遭到失敗是由于土軍的十足无知,土軍甚至不知道堡垒或

者垒墙在一定的时刻不能再扼守下去，而繼續死守着敌人企图夺取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座小丘。此外，俄軍遭到失敗还由于自己將領的昏庸无能，由于霍乱和热病的流行，以及由于威胁其左翼的联軍和威胁其右翼的奧軍对他們的精神上的压力。战争一开始我們就指出，俄国从来不善于进行正規圍攻，而对錫利斯特里亚軍事行动的拙劣指揮，只是证明俄軍从那时以来什么也沒有学到。就这样，俄軍遭到了失敗，不得不极其可耻地退却，不得不在最有利的季节，在被圍守軍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外援的时刻，停止对这个极不完善的要塞的圍攻。这样的事情可以說是一百年難遇。不管俄軍在秋季将采取什么行动，这个战局是已經失敗了，而且是可耻地失敗了。

現在讓我們来看看問題的另一方面。錫利斯特里亚解圍了。俄軍退到多瑙河左岸。他們甚至准备放棄多布魯甲，并且正在逐步实现这个計劃。希尔索瓦和曼成被破坏了。看来塞勒特河是俄軍选来保卫本土而不是选来保卫占領区的防綫。狡猾的老克罗地亚人奧美尔-帕沙（他“为了职责”可以緘口不言，也可以信口胡說，在这方面他不比別人逊色），在把一个軍派到多布魯甲的同时，把另一个軍派到魯舒克，这样就立刻包圍了俄軍的两翼。当时，本来可以有另外的比这好得多的作法，但看来老奧美尔对土軍和联軍了解得比我們清楚。从軍事观点来看，让軍队通过多布魯甲或者卡拉腊什进到敌人交通綫上可能更正确些，不过当我们看到一切情况以后，就不能再非难奧美尔错过了好机会。大家知道，他的軍队的給养很坏，几乎得不到什么供应，因此不能进行远离基地的或者开辟新作战綫的迅速移动。如果用足够的兵力进行这样的移动，那末会获得具有决定意义的結果；但是对一支半饥半飽而且要通过不毛之地的軍队來說，这样的移动是不能胜任的。大家知道，

奥美尔-帕沙曾去瓦尔那向联军的将军们求援，当时这些将军率领75 000名精兵驻在距多瑙河只有4天行程的地方；但是无论圣阿尔诺或腊格伦，都不认为有必要把部队派到可能同敌人相遇的地方去。因此，奥美尔就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了。他把25 000人派往多布鲁甲，亲自率领其余的兵力向鲁舒克进发。在这里，他的部队接连越过了许多沙洲，一直到渡过多瑙河为止，随后又突然向左行进，从背后夺取了茹尔日沃，并从这里赶走了俄军。第二天，俄军退到茹尔日沃以北的高地上，在这里遭到了土军的攻击。一场血战发生了，从竞相以首先战死为荣而且如愿以偿的英国军官的数量来说，这是一场非凡的战斗。这些英国军官一个个中弹而死，但这无论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认为土耳其兵士仅仅因为看见英国军官阵亡就变得不可战胜，那是荒谬的。不管怎样，在那里仅仅配备了前卫（由科累万团和托姆斯克团编成的一个旅）的俄军被击败了，土军巩固了在瓦拉几亚境内多瑙河岸上的地位。他们立刻着手构筑工事，而且无疑地筑成了坚固的障地，因为有英军工兵同他们在一起，并且他们自己在卡拉法特也已经证明，他们是满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但是土军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再前进一步。那位在过去8个月内竭力扮演局外人角色的奥地利皇帝突然出面干涉了。因为曾经答应过他，由多瑙河各公国供养他的军队，而他也想得到多瑙河各公国。土军在那里干什么呢？让他们回到保加利亚吧。因此，君士坦丁堡就发出了命令，叫土军从多瑙河左岸撤回，并让奥地利兵士在“整个这块不大的地区”为所欲为。外交高于战略。不管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奥地利有意要在边境外占领几码土地来保卫自己的边境；为了这个重要目的，甚至那些从军事观点看最为必要的措施也应退居次要地位。难道奥美尔-帕沙不是奥

地利的逃兵嗎？奧地利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忘掉什麼。在門的內哥羅它曾經妨碍過奧美爾-帕沙的勝利前程，現在它又重複同樣的做法，要使這個變節者感到自己對那合法的君主還負有臣民的義務。

詳細分析這一階段的軍事行動是毫無益處的。就戰術觀點來看，這些戰鬥行動並沒有多大意義，它們只是些簡單的、直綫的正面攻擊。雙方軍隊的移動與其說是由於戰略上的需要，不如說是由於外交上的需要。很可能，戰局就在沒有什麼大規模軍事行動的情況下結束，因為在多瑙河上完全沒有作好大舉進攻的準備，至於我們已經聽厭了的奪取塞瓦斯托波爾的行動，看來將被推延到冬季，到那時，又不得不推延到來年。

歐洲一切抱有保守觀點的人，看到東方問題無法解決，似乎也應改變自己的觀點了。全歐洲已經有 60 年之久顯然不能解決這個細小的爭端。最後，法國、英國和俄國投入戰爭。戰爭進行了 6 個月，但直到現在，除了因錯誤而引起的戰鬥或規模極小的戰鬥以外，還沒有真正交戰。在瓦爾那城下駐扎着八、九萬英法兵士，他們由老威靈頓的前軍務秘書^①和法國元帥^②指揮（順便說一句，這位元帥最突出的功績是在倫敦當舖里建立的）；法軍什麼也不做，而英軍也盡力在這方面幫他們的忙；大概因為這種行動在他們看來還不夠十分隆重，所以艦隊也開到巴耳契克的停泊場看一看這兩國軍隊中哪一個更會享受這 *dolce far niente*〔悠哉游哉的樂趣〕。雖然到目前為止聯軍只是坐吃土耳其軍隊所指望的儲糧，而且兩個月來在瓦爾那城下天天閑暇無事，但他們仍未準備履行自己的職責。如果指望他們援救，那末錫利斯特里亞也許要到明年

① 即腊格倫。——編者注

② 即聖阿爾諾。——編者注

5月才能解圍。正是这些军队征服过阿尔及利亚，并在一个最复杂的战区里研究过作战理论和实践¹⁹⁷；也正是这些兵士曾在比保加利亚野蛮得多的国家里作过战——在印度河的沙岸上同錫克教徒以及在南非的荆棘丛中同卡弗尔人作过战¹⁹⁸，——而现在这些兵士却束手无策，毫无用处，什么事也做不了，而且还是在一個輸出谷物的地区呢！

然而，如果說联軍不能夸耀自己的功績，那末俄軍的情形也并不好些。他們有足够的時間进行准备，而且也作了所能作的一切，因为他們一开始就知道将会遇到怎样的抵抗。但他們究竟作出了什么成績呢？什么成績也沒有作出。他們沒有能够从土軍手里夺得一寸他們所力爭的土地，沒有能够夺取卡拉法特，而且無論在哪一次战斗中都沒有能够打敗土軍。要知道正是这些俄軍，曾在米尼希和苏沃洛夫的指揮下占領了由頓河到德涅斯特尔河的黑海沿岸地区。然而施尔德尔不是米尼希，帕斯凱維奇也不是苏沃洛夫，虽然俄国兵士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兵士都更能忍受鞭笞，但是如果經常退却，就是这样的兵士，也会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兵士一样失去他們的坚毅性。

真实的情况是：保守的欧洲——这个“秩序、财产、家庭和宗教”的欧洲，这个君主、封建主和資本家的欧洲（無論他們的相互关系在各个国家中怎样不同），——再一次暴露出它是完全虛弱无力的。即使欧洲腐朽了，战争也应该喚醒其中的健康因素，也应该重新发掘出潜在的力量。在25 000万人中間，当然会有人进行真正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双方都能取得在战场上运用智慧和力量所取得的那种荣誉。可是不然，不仅資產阶级的英国和波拿巴法国不能进行真正的、坚决的、頑强的战争，甚至俄国这个受“无神論的

和使人軟弱的文明”影响最少的欧洲国家，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土軍善于采取突然的进攻行动，也适于在防禦时进行頑强的抵抗，但是和大軍采取大規模的、复杂的联合行动，看来就不适合了。因此，一切都归結为虛弱无力，归結为双方相互承认自己虛弱，以致任何一方似乎都不再因此感到驚訝了。如果目前这样的政府存在下去，那末这个东方战争还可以繼續 30 年而仍然得不到什么結果。

但是，当整个欧洲的当权派表现出无能的时候，在这个大陆的西南部却兴起了一种立即表明毕竟还存在另外的更有积极作用的力量运动。無論西班牙起义的性质和結果如何，我們都可以肯定地說：它与未来的革命的关系将同 1847 年瑞士和意大利的运动与 1848 年革命的关系¹⁹⁹ 一样。在这次起义里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自 1849 年起实际上統治着大陆的軍隊从内部分裂了，它为了对抗政府，实现自己的主張，而拒絕执行維持秩序的使命。紀律教会軍隊認識自己的权力，而这个权力反过来又削弱紀律。第二，我們已經亲眼看到了成功的街垒战。自 1848 年 6 月起²⁰⁰，無論哪里筑起的街垒都沒有发生过作用。街垒战作为大城市居民抵抗軍隊的形式，似乎根本达不到目的。这种偏見現在已被駁倒了。我們再次看到了获得胜利的、不可攻破的街垒。咒語已被破除。新的革命时代已經有可能到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正当欧洲各国政府的軍隊在目前的战争中表现出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們又被起义的城市居民击败了。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7 月 29 日—8 月 1 日

作为社論載于 1854 年 8 月 17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15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埃 斯 帕 特 罗

一切革命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正当人民似乎临近一个偉大的开端、一个新时代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时候,他們却让自己沉湎于过去的幻想,自动地把自己好容易才爭得的权力、一切影响让給过去时代人民运动的真正的或者冒牌的代表。历史上有这样一些人,人民慣于在社会危机时刻把他們背在自己的背上,而以后就很难摆脫掉他們,就像航海家辛伯达^①很难摆脫掉用两腿夹着他的脖子的凶恶的老头子一样。埃斯帕特罗便是这样一类人。你要是問一个屬于所謂进步派的西班牙人,埃斯帕特罗有什么政治作用,那末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說:

“埃斯帕特罗是偉大的自由派的統一的化身;埃斯帕特罗之所以深得人心,是因为他来自人民;他的声望完全为进步派的事业服务。”

的确,他是一个工匠的儿子,一直爬到了西班牙摄政的职位;他参加軍队时是一个普通的兵士,离开軍队时是一个元帅。但是,如果說他也是偉大的自由派的統一的象征,那末,看来也不过是把一切极端中和起来的一个庸材。至于談到进步派的声望,那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当它由这个派的广大成員轉到他一个人身上时,便

^① “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的主人公,見“一千零一夜”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卷第301頁。——譯者注

再也不存在了。

到現在為止，沒有人能夠揭穿埃斯帕特羅的成功的妙訣。這個事實最好不過地证明了這種成功具有不清不白和異乎尋常的性質。雖然他的朋友們用含糊的諷喻來敷衍應付，而他的敵人們也只能暗示他的私生活上的某種特點，說他不過是一個幸運的賭徒。可見，不論朋友或敵人，都不能找出這個人本身與他的聲譽和名望之間的某種邏輯聯系。

埃斯帕特羅在軍事上的功績之成問題，正像他在政治上的失敗之不成問題一樣。在德·弗洛雷斯先生編著的一部篇幅很大的埃斯帕特羅傳記²⁰¹中，談了許多他在查爾卡斯、拉巴斯、阿雷基帕、波托西和科恰班巴等省在莫里耳奧將軍（他的使命是使南美各國回到西班牙國王的統治之下）指揮下作戰時所表現的英勇精神和指揮藝術。然而他本人得到的“艾阿庫裘將軍”的綽號以及他的黨羽得到的“艾阿庫裘派”的綽號——影射艾阿庫裘會戰的失敗使西班牙徹底喪失了秘魯和南美洲²⁰²，足以說明他在南美洲的武功在他的同胞的易于激動的頭腦中所留下的總印象。總之，他是一個與眾不同的英雄，他的這個歷史性的綽號不是由於勝利，而是由於失敗得來的。在同卡洛斯派的7年戰爭中，他從來沒有進行過一次類似他的對手納爾瓦艾斯借以迅速獲得鐵打勇士的聲譽的那樣的大膽攻擊而使他聲名卓著。他無疑具有一種最能利用細小的成功的天才，但是，如果說馬羅托把王位追求者的最後的軍隊出賣給了他，那也不過是一次純粹的偶然事件，而1840年加布雷臘的暴亂只不過是一次為時已晚的使卡洛斯派的僵尸復活的嘗試²⁰³。當代西班牙的歷史學家和埃斯帕特羅的崇拜者德·馬爾利安尼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認這7年的戰爭只可以同十世紀時高盧的小

領主之間的封建主義戰爭相比，那時成功並不是勝利的結果。²⁰⁴而且不幸的是，在埃斯帕特羅在西班牙的所有功勳中留下最鮮明的印象的，即使不是真正的失敗，至少也是對一個自由的英雄說來是非常奇怪的行動：他以炮擊一些城市——巴塞羅納和塞維爾——而聞名。一位著作家²⁰⁵說，如果西班牙人想把他描繪成瑪爾斯^①，他們就會賦予這個神以“城牆的摧毀者”的形象。

當 1840 年克里斯蒂娜被迫放棄攝政職位而逃出西班牙的時候，埃斯帕特羅不顧進步派非常大的一部分人的願望，接受了議會制範圍內的最高權力。他在自己周圍安置了一些類似權奸的人物，並且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軍事獨裁者，實際上不想超出普通立憲君主的水平。他對溫和派²⁰⁶的寵愛勝過對舊日進步派的寵愛，後者除少數例外，都被撤職了。他既不能平息他的敵人，又逐漸疏遠了他的朋友。他既沒有勇氣打碎議會的枷鎖，又不能接受它，利用它，把它變成行動的工具。在他獨裁的 3 年中，由於無止境的妥協，革命精神逐步受挫折，而誰也不加制止的進步派內部的分歧卻變得如此尖銳，以致溫和派只要發動一次 coup de main〔突然襲擊〕，就可以把全部政權奪回去。這樣一來，埃斯帕特羅的威望一落千丈，連他任命的駐巴黎大使也串通克里斯蒂娜和納爾瓦艾斯反對他；他變得如此軟弱無力，竟至無法對付路易-菲力浦的這些可憐的陰謀和渺小的詭計。他對自己的處境如此缺乏了解，以致輿論正要找尋口實來毀滅他的時候，他竟然輕率地去反對輿論。

1843 年 5 月，當他已經威信掃地的時候，他仍然讓林納赫、蘇巴諾和他的軍事權奸中的其他一些人員留在他們的職位上，儘管

① 即古羅馬的戰神。——譯者注

人們強烈要求他把這些人撤職；他解散了掌握着眾議院中的大多數的洛佩斯內閣，並且頑固地拒絕對流放的溫和派分子頒布大赦，而當時議會、人民和軍隊本身都一致要求大赦。對大赦的這種要求完全表明了所有的人對他的管理感到厭惡。於是，突然一陣反對“暴君埃斯帕特羅”的政變的風暴震撼了整個半島；這個運動，就其發展的速度來說，只有目前的運動可以同它相比。溫和派和進步派為了擺脫攝政這一共同目的而聯合起來了。這個危機使他措手不及，當決定性的時刻來到時，他却毫無準備。

納爾瓦艾斯同奧當奈爾、孔查和佩蘇埃拉一起，帶着很少的人在瓦倫西亞登陸。他們一開始就表現出行動迅速、有智有勇、精力充沛和決心很大。而埃斯帕特羅卻表現出束手無策、舉棋不定、致命遲緩、優柔寡斷、懈怠無力。當納爾瓦艾斯解除了對特魯韋耳的包圍而向阿臘貢進發時，埃斯帕特羅放棄了馬德里，在阿耳巴塞特莫名其妙地耽誤了好幾個星期。當納爾瓦艾斯在托列杭把塞奧昂奈和蘇巴諾所率的一個軍爭取過來并向馬德里挺進時，埃斯帕特羅才最後同范哈蘭會合，對塞維爾進行無濟於事的和令人憤慨的炮擊。然後，他迅速撤離一個個的障地，每退一步就損失一些部隊，一直到最後到達海邊為止。當他在加迪斯登船的時候，這個還殘存着他的黨羽的最後一個城市，也用反對來向它的英雄訣別。在這次災難期間住在西班牙的一個英國人，對埃斯帕特羅的成功“活動刻度盤”作了一個清晰的描述：

“這不是一場激戰後的倏忽間的大崩陷，而是從馬德里到勒阿耳城，從勒阿耳城到阿耳巴塞特，從阿耳巴塞特到哥多瓦，從哥多瓦到塞維爾，從塞維爾到聖瑪麗亞港，再從聖瑪麗亞港到遼闊的大洋的一步一步的、未經任何鬥爭的、緩慢的傾倒。他被人們崇拜為神降到熱誠擁護，從熱誠擁護降到愛慕，從

爱慕降到尊敬，从尊敬降到冷淡，从冷淡轉为輕蔑，从輕蔑轉为憎恨，而憎恨把他抛入了大海。”

埃斯帕特罗怎么会又变成人們所称的国家救星和“革命之劍”了呢？如果不是 10 年的反动統治使西班牙在納尔瓦艾斯的殘暴的独裁和取代埃斯帕特罗的女王寵臣們的桎梏下备受痛苦，这件事就会完全不可理解。漫长的殘酷的反动时期，具有恢复在革命中遭到失敗的声名狼籍的領袖們的声誉的令人惊異的特性。一个民族的想像力愈大——哪儿还有比南欧民族具有更大的想像力的呢，——他們用体现革命的人物来对抗体现专制的人物的願望就愈强烈。因为他們不能馬上凭空塑造出这样一个人物，所以他們就让他们們过去运动中已經衰亡的英雄們复活。难道納尔瓦艾斯本人不是差点儿靠薩尔托里烏斯赢得了声望嗎？7 月 29 日凱旋地进入馬德里的埃斯帕特罗并不是实在的人；他只是一个幽灵，一个虚名，一种回忆。

應該公道地回忆一下，埃斯帕特罗除自命为一个君主立宪主义者以外，从来没有自命过其他什么东西；如果对这点有过怀疑的話，那末在看到 he 流亡期間在温莎城堡和英国統治階級那里所受到的热誠接待，这种怀疑也就应当烟消云散了。当他到达倫敦时，以威灵頓和帕麦斯頓为首的全体貴族都成群地到他的寓所去。阿伯丁以外交大臣的身分邀請他去謁見女王；市长和市議會議員們在市长官邸举行盛宴欢迎他；当人們知道这位西班牙的辛辛納图斯从事园艺来消度余暇的时候，沒有一个植物学会、园艺学会或农学会不热心請他当名誉會員。他成了这个首都的真正的紅人。1847 年底，大赦使西班牙的流亡者回到祖国，而埃斯帕特罗被伊薩伯拉女王下旨任为參議員。但是，他只是在維多利亞女王邀請他和他

的夫人赴了宴，同时给了他空前的荣誉，让他在温莎城堡内度了一夜之后，才离开了英国。的确，应该认为，环绕他身上的这种荣光，部分是由于认为埃斯帕特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英国在西班牙的利益的代表者这个看法而来的。有一种看法也是对的，这就是对埃斯帕特罗所显示的尊敬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路易-菲力浦的示威。

他一回到西班牙，就被一个又一个的代表团，一个又一个的祝贺弄得应接不暇，而巴塞罗纳市还派出一个特使去取得他对巴塞罗纳 1843 年的不当行为的谅解。但是从 1846 年 1 月到最近事变的这一段灾难时期内，有谁听说过提到他的名字？在备受侮辱的西班牙的这个死寂的时期，他是否曾坚决说出自己的主张呢？谁知道他有过哪怕一次的爱国抵抗行动呢？他非常泰然地隐居在他在洛格罗尼奥的庄园内，栽花种菜，等待时机。直到革命本身找到他的时候，他才投奔了革命。他所作的超过了穆罕默德。他等待山岳向他走来，而山岳也果真走来了。不过，有一件例外的事必须提一下。当二月革命^①爆发，欧洲的普遍动荡随之而来时，他慫恿德·普林西佩先生和另几个朋友出版了一本名为“埃斯帕特罗，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²⁰⁷的小册子，其目的是提醒西班牙，它仍然是这个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人物的栖身之所。由于法国的革命运动很快低落下来，这位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人物又被人遗忘了。

埃斯帕特罗生于拉曼彻省的格腊纳土拉，而且像他的赫赫有名的老乡^②一样，他也有他的固定观念——宪法，和他的托波索之达辛尼亚^③——伊萨伯拉女王。1848 年 1 月 8 日，当他从英国流

① 即 1848 年的二月革命。——编者注

② 即拉曼彻的唐·吉珂德。——编者注

③ 即唐·吉珂德给他意中人起的名字。——译者注

亡回到馬德里的时候，受到了女王的接見，他向女王告別時說：

“当您无论是需要一只手来保护您，或者需要一颗心来爱您的时候，請陛下召喚我。”

現在女王陛下召喚他了，她的游俠騎士也真一叫就到，他出来平息革命的浪潮，以欺騙性的鎮靜麻痹群众的热情，在宮廷里給克里斯蒂娜、圣路易斯和亲信們以避难之地，并大声宣傳他对天真的伊薩伯拉所說的話坚信不移。

大家知道，这位非常可敬的女王——据說人們发现她的容貌和留下不好印象的斐迪南七世的容貌一年比一年更加惊人地相似——是在 1843 年 11 月 15 日宣布成年的。同年 11 月 21 日，她才滿 13 岁。受洛佩斯之命做了她 3 个月监护人的奧洛薩加，組成了一个为权奸和在納尔瓦艾斯初次胜利的影响下剛选出的議会所不喜欢的內閣。他想解散議会，并且爭取到了一道由女王签署但没有签具日期的授予他这样做的全权的敕令。11 月 28 日晚間，女王亲手把这个文件交給了奧洛薩加。29 日晚間，他又和女王会談了一次；但他剛一离开她，一位副大臣便来到他的官邸，通知他說他已被撤职，并且索回据說他是强迫女王签署的敕令。奧洛薩加原是一个律师，为人极其狡詐，他是不会这样輕易上当的。他只在第二天，当他把敕令至少給 100 个議員看过，证明女王签署的字迹是正常的以后，才把这个文件退了回去。12 月 13 日，新任首相岡薩勒斯·布腊沃召集两院的議长、馬德里的主要名流、納尔瓦艾斯、桑塔·克魯斯侯爵和其他人去謁見女王，使女王陛下得以就 11 月 28 日晚間她和奧洛薩加的会見經過作了一次說明。这位天真的小女王把他們带进她接見奧洛薩加的那个御室，并且为了訓誡他們，非常生动地但有些过火地表演了一幕小剧。她模拟奧洛薩加

怎样門上門,怎样扯住她的衣服,怎样逼她坐下,怎样执着她的手,怎样强迫她在敕令上签字,一句話,怎样侵犯了她的帝王的尊严。岡薩勒斯·布腊沃在她表演时記下了她的叙述,在場的人都仔細看了上述的敕令,敕令的签字看起来是由一只颤抖的手签上的,而且有塗改的痕迹。因此,根据女王的庄严的声明,应判奥洛薩加以 *laesa majestas* [侮辱皇上] 的重罪,不是处以四馬分尸之刑,至少也得終身流放到菲律宾群島。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奥洛薩加已經采取了預防措施。接着就是 17 天的議會辯論,辯論所引起的轰动,比英国有名的卡罗琳娜王后訴訟案件²⁰⁸ 所引起的轰动还要大。奥洛薩加在議會里的辯护詞有这么一段話:

“如果有人对我们說,女王的話应当毫无怀疑地相信,那我就回答說:不!罪状也許有,也許沒有。如果有,那末女王的話像其他任何話一样是証詞,而我也可以用我的話来加以反对。”

在議會討論这个問題时,奥洛薩加的話比女王的話更有分量。后来他逃到葡萄牙,以躲开被派去謀杀他的刺客。这就是伊薩伯拉在西班牙政治舞台上的初次的 *entrechat* [輕跃舞步], 是她的誠实的初次证明。也就是同一个女王,現在埃斯帕特罗呼吁人民相信她的話,并且他这位“革命之劍”在經過 11 年的“揚恶学校”^① 的熏陶之后,表示願意向她献出“援助的手”和“爱慕的心”²⁰⁹。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8 月 4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4 年 8 月 19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4161 号

① 即謝里敦的名喜劇的劇名。——編者注

弗·恩格斯 对俄国要塞的攻击²¹⁰

看来，联军（法军和英军）终于准备真正进攻俄国了。帝国的前哨据点（阿兰群岛上的和黑海岸塞瓦斯托波尔的据点）必定先后甚至同时遭到攻击。在西欧甚至传说，其中一个据点已经在短时间的炮击后被占领了。不过这些消息还需要证实，而且很可能是过早的估计。关于预料中的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还没有官方消息，但是伦敦“泰晤士报”肯定地说，这个攻击将要开始，首都的人们也都相信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在瓦尔那上船的只有法军和英军的两、三个师，虽然估计他们将编入克里木远征军，但是他们也完全可能被用来围攻亚洲的俄国要塞阿纳帕。随着最近一班轮船到达，这方面的疑团就可能消失。

从军事观点来看，对博马尔松德的攻击将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是对蒙塔郎贝尔体系的穹窿式城防工事的第一次考验。根据要图和平面图来判断，这些堡垒虽然比赫尔幸福斯、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堡垒小得多，但是它们抵御陆上攻击的能力并不比抵御军舰轰击的能力差，而且它们都是严格遵照蒙塔郎贝尔的原则构筑的。对付军舰的主要防御工事是一座爆炸弹所不能破坏的长堡，它配备大约一百门火炮，并有防止侧射的临时性土质工事作为掩护；有两座巨大的塔楼（一座配备30门火炮，另一座配备

10 門火炮) 來瞰制它, 並且從後方掩護它。軍艦通常主要是攻擊主堡, 而陸軍是進攻塔樓。根據最近的材料來看, 博馬爾松德的守軍比我們過去推測的要少得多: 計有三千人多一點。根據現有的材料, 我們還不完全了解, 海上和陸上的行動不僅在時間的配合上, 而且在互相的支援中能夠真正協調到什麼程度, 因為從海上進攻必須靠 *de vive force* [硬攻], 這要在極短的時間內決定勝負, 而從陸地上對石質工事的任何攻擊都必須預先進行工程作業, 構築至少一道平行壕和几座炮台, 因而就需要時間。總之, 這類問題只能在現地解決。無論如何, 從軍事觀點來看, 奪取博馬爾松德甚至比攻占塞瓦斯托波爾有意義得多, 因為這可能有助於解決多次討論過的問題, 而攻占塞瓦斯托波爾只不過是久已制定的軍事原則被順利實行而已。

預料中的對塞瓦斯托波爾的攻擊, 主要由陸軍進行, 而艦隊的行動幾乎只限於對港灣進行完全的封鎖。所以, 整個行動就是從陸地和海上兩方面封鎖這個在向陸的一面設防不夠堅固的海港。我們當然無法了解在城市和海灣的南面俄軍能構築什麼工事。但是他們已構築了多面堡和防綫, 聯軍只要不願作出特別重大的犧牲, 就必須對這些多面堡和防綫進行正規的圍攻, 這一點恐怕是不能懷疑的。無論如何我們知道, 在大海灣以北正對着市區的高地上, 構築了一座永備的而且從各方面看來都構築得很好的工事——一座巨大的四角形堡壘, 每一面都有寬而深的壕溝, 所有的突角上都配置臼炮。這個高地是該城附近唯一從其他高地炮擊不到、而本身又瞰制着海灣和對面斜坡的制高點。當然俄軍將在這里進行主要的抵抗。但是進攻者如果沒有奪下這一工事, 即使攻占了南區的全部岸防工事, 也未必能守住市區和港口。至少在這

里需要进行正规的围攻作业。大灣的长度（由康士坦丁角到海灣东端）约为 8 英里；即使认为塞瓦斯托波尔市区和工事所占的面积不大，可以从陆地上对它们进行封锁，联军仍然必须构成一个长达 22—24 英里的半圆形包围圈。而且，联军在所有各点都应有足够的兵力以抵御守军的出击和可能集中在联军后方的俄军的攻击。虽然我们不了解俄国直接和间接用于防守黑海要塞的兵力有多少，但是上述的一些细节仍然表明，要夺取这样一座要塞，将需要不少的部队。此外，克里木草原的致命的气候也将成为联军危险的敌人。在当前的行动中，岸防炮台对俄军未必有很大好处，这就大大缩小了整个这次行动的军事意义，它将是一次很大规模但决不是空前规模的围攻。直到目前为止，在确定远征军的数量时所提出的最大的数字是 10 万人，其中包括土耳其部队。如果考虑到上述全部情况，这样一支军队在我们看来是不足以达到预定目的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8 月 7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8 月 2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6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撤出多瑙河各公国。——西班牙
事件。——丹麦新宪法。
——宪章派

1854年8月8日星期二于倫敦

7月28日，哥尔查科夫公爵率領自己的主力軍穿过了离克魯格廉尼大約6英里的施拉瓦村，以便在29日繼續向福克夏尼推进。索伊蒙諾夫將軍指揮的前卫是由第十步兵师的8个营、托姆斯克和科累万的几个猎兵团和大公-皇太子的一个驃騎兵团組成的。这支前卫于8月1日在烏列什提和烏尔济琴渡过了雅洛米察河，这两个地方都已經架了桥。估計8月中可以到达福克夏尼。

土耳其軍隊分三路纵队前进。中央一路于7月29日到达克魯格廉尼；30日，在离布加勒斯特2英里的格利納附近发现了土軍前卫的偵察兵，按照預定計劃，8月1日以前，奧美尔-帕沙的大本营应当設在格利納。右翼沿阿尔哲什河往沃耳特尼察到布加勒斯特的方向运动。左翼于28日到达莫契納附近，它应当沿斯拉廷納到布加勒斯特的道路前进。

“軍报”說：“看来俄軍的撤退与其說具有政治性质，不如說具有战略性质。这样一来，俄国將軍就贏得了时机，能够把自己的軍隊集中在良好的陣地上，在多布魯甲吃了亏和在多瑙河左岸吃了土軍的苦头以后，他們在这里

能够得到休整。他既能靠近自己的給养基地，又能繼續占領去年占領的很大一部分土地。而且，他还占領着甚至对优势兵力說来都具有威胁性的障地。”

7月26日，布德貝尔格男爵发表了如下的告瓦拉儿亚居民书：

“全俄国皇帝，波兰王，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儿亚公国的保护者和一切信奉正教的人的保护者陛下，已經决定暂时把帝国军队从对健康不利的多瑙河地区撤回，使他們駐扎在对健康有利的高地。敌人目光短淺地认为，我們撤退是由于害怕他們，因此企图攻击我們撤退的军队。但是，最高統帥哥尔查科夫公爵剛剛发出反击的命令，他們就可耻地逃跑了，丢下了武器和弹药，这些武器和弹药都被我們英勇的兵士繳获了。随着比較有利的季节的到来，我們將提着武器回到你們这里来，以便永远把你們从土耳其生番手中解放出来。为了使敌人不至认为我們是在他們面前逃跑，我們將采取預防措施，不慌不忙地完成撤退。”

有趣的是，1853年，同样是在7月，俄国人根本不认为这个季节对占領瓦拉儿亚是不利的。

德国报纸上发表的一封加拉兹来信說：“保加利亚家庭从多布魯甲繼續不断地向外迁移。大約有1000个家庭和15万头牲畜在烈尼附近渡过了河。”

俄国人号召居民实行的这种“自願迁移”，似乎是为了使居民不受土耳其人的报复，按性质来看，这种迁移非常像奥地利的“自願”公債。“紀事晨报”駐維也納記者报道說，这些家庭

“知道了他們被派往莫尔达維亚修筑堡垒以后，都想回家，但是哥薩克用武力强迫他們到福克夏尼去，現在他們正在那里挖战壕”。

馬德里的街垒还没有按照埃斯帕特罗的要求清除掉，反革命就已經开始活动了。反革命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使克里斯蒂娜女王、薩尔托里烏斯和他們的同謀不受惩罚。接着成立了由温和派的奥当奈尔担任陆軍大臣的内閣，同时全部军队都交給納尔瓦艾斯的这位老友掌握。在内閣名单上有帕切科、路汉、唐·弗朗

西斯科·桑塔-克魯斯这样一些名字，他們都是納尔瓦艾斯的人所共知的拥护者，此外，帕切科还是臭名昭彰的 1847 年内閣²¹¹ 的成員。另一个是薩拉薩尔，他所以被任命仅仅因为他是埃斯帕特罗童年的朋友。为了奖励在街垒和广场上对人民的血腥屠杀，授予拥护埃斯帕特罗的將軍們和奥当奈尔的朋友温和派无数的勳章。为了給彻底制服報紙打好基础，恢复了 1837 年的出版法。据说，埃斯帕特罗不召开制宪議會，只打算根据 1837 年宪法（据一些人說，甚至是根据納尔瓦艾斯修改过的宪法）召开議院會議。为了充分保证这些措施和其他应该实行的措施获得成功，在馬德里附近集中了大批軍隊。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反动势力进攻的突然性特別值得注意。

街垒司令官們最初到埃斯帕特罗那里去就內閣选举問題向他提了几点意見。埃斯帕特罗喋喋不休地解釋他从各个方面遇到的困难，企图为他提出的任命进行辯护。但是，人民的代表显然很不滿意他的解釋。与此同时，傳来了在瓦倫西亚、卡塔卢尼亚和安达魯西亚发生了共和派騷动的“令人非常不安的”消息。从埃斯帕特罗的批准各省洪达繼續行使职权的命令中可以看出他的惊慌失措。他也不敢解散馬德里的洪达，虽然內閣已經組成，并且已經就职。

根据小拿破侖的要求，沙尔腊斯上校被赶出比利时。“比利时独立报”駐巴黎記者报道了炮彈国王^① 王位的追求者繆拉特亲王（他认为这个王位是繆拉特家族的法定遺產）所写的并由他发表的一篇抨击文。这篇文章被譯成了意大利文。

① 即斐迪南二世。——編者注

丹麦內閣仍然坚决拒絕向西方强国提供能使它們的軍隊在波罗的海过冬的港口和登陆地点。但是，这并不是丹麦政府对那些起来反对丹麦的保护者——俄国皇帝——的西方强国表示輕視的唯一方法。丹麦政府面对着西方强国的海陆軍，毫不动摇地实行了它策划已久的完全是为了俄国利益的 coup d'état [政变]。7月26日，在哥本哈根公布了一个政府文件，标题是：“丹麦君主国一般事务方面的宪法”。奇怪的是，英国报纸几乎完全没有理睬这个措施。因此，我现在把这个丹麦新宪法的最重要条款列举出来：

第一条 丹麦君主国的王位继承制度由1853年7月31日的法律規定。

第五条 凡沒有明确指出屬於某一部門的事务，均屬君主国的一般事务。

第六条 君主国的总支出超过收入时，按下列比例补偿：丹麦担負60%，什列斯維希担負17%，霍尔施坦担負23%。

第七条 君主国的一般事务由議會管理。

第八条 現届議會完全由国王任命的議員組成。将来的議會議員应当部分地由选举产生。

第十条 那时議會将由50名議員組成；其中20名由国王任命，30名按下列比例选举：18名由丹麦各界代表會議选出，5名由什列斯維希各州选出，6名由霍尔施坦各州选出，1名由劳恩堡貴族选出。

第十一条 1849年7月5日頒布的丹麦王国的根本法只涉及該王国的内部事务。

第十五条 議會議員的年薪为500塔勒。

第十六条 議會每两年至少召开一次，会期由国王的命令規定。

第十七条 議會會議在哥本哈根举行，但是国王可以改变会址。

第十八条 議會的工作由国王任命的主席主持。辯論可以使用德語或丹麦語；決議必須用丹麦文书写。

第十九条 議會會議是秘密的。

第二十一条 未經議會同意，不得征收、改变或廢除全君主国的任何共

同捐稅，也不得舉借任何國債。

第二十二條 除了聯合君主國的財政以外，議會對一切事務只有發言權。

同一天頒布的法令規定在1854年9月1日召開議會，而在另一個法令中公布了國王任命的議員，被任命的都是宮廷的達官顯貴和達涅勃羅格勳章獲得者。

通過這種新的 coup d'état [政變] 達到了以下幾個主要目的：廢除丹麥的根本法和代議機關，建立了一個便於宮廷和政府得到它們需要的任何數目款項的機構。

厄內斯特·瓊斯重新到各工業區去作宣傳旅行，以便把它們吸引到憲章運動中來。在他到過的哈里法克斯、貝凱普和其他地區，通過了如下的遞交議會的請願書：

“在1854年7月30日（星期日）舉行的群眾大會上，貝凱普的居民謹向在議會開會的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極可尊敬的下院議員呈遞請願書如下：

你們的請願者長時期觀察了現在女王政府各個大臣在對內和對外政策方面的活動，並且根據毫無偏依的觀察深信，在這兩方面大臣們都根本不值得國家的信任。

你們的請願者深信，只要這些人管理國家事務，就既不可能改進內部的管理，也不能夠對外顯其威力。

所以，你們的請願者請求你們極可尊敬的議院奏請女王，請女王陛下賜予解除她現在的顧問們的職務，並且邀請那些更符合時代進步精神更符合我們時代要求的人來輔佐她。

你們的請願者將堅持自己在請願書中提出的各點。”

星期天，在貝凱普的迪爾普利-摩爾舉行了群眾大會，鼓動家^①在會上發表了他生平所發表的一篇最出色的演說；其中有几

① 即厄內斯特·瓊斯。——編者注

段值得貴報予以轉載：

“行动的時刻終於到來了，我們現在進入了憲章運動自衰退以來不曾有過的復興時期。我們爭得憲章的時刻終於臨近了……”

你們進行過反對降低工資的鬥爭，但是徒勞無益；飢餓迫使你們舉行起義。如果飢餓教會你們去戰爭，那末貧困就給你們以啟發，每經過一次失敗，你們的覺悟就提高一步，你們的經驗就豐富一些。你們曾經採用的首要方法是組織聯合會和舉行罷工。你們以為這些方法會使你們獲得解放，但是你們忘記了，既然勞動資料不屬於你們所有，你們就經不起資本家的競爭，你們在忍飢挨餓，他們的錢袋可以萬無一失地放着，等着瞧誰堅持得最久。以後你們曾經希望不完全工作日，而且有人對你們說，如果每個工人少工作兩小時，就可以為失業者找到兩個小時的工作。但是，你們忘記了，當你們爭取到把工作時間縮短百分之一，壟斷資本家採用機器裝備的程度就增加了百分之一百。

以後，你們求助於合作社。你們了解到一個偉大的真理，勞動的解放應當依靠合作社，但是你們忽略了保證這種解放的手段。誰要進行生產，誰就需要市場；如果你們有什麼東西要賣出去，你們就需要一個想買這個東西的人，——但是你們忘記了，你們沒有這麼‘一個人’。合作社開始生產了，但是市場在哪裡呢？你們究竟在哪裡找到市場呢？怎樣才能使貧者變成富者，使他們能夠成為合作社生產的產品的購買者呢？依靠英國本土上的鑛，在地面上、在田野滾滾的麥浪中，你可以看到鑛含的金子。瞧瞧你們腳下吧！在這裡，在你們所坐的綠草如茵的斜坡上；在這裡，在你們所站的寬廣的田野上，——在這些地方隱藏着自由，在這些地方隱藏着合作社，在這些地方隱藏着高額工資，在這些地方隱藏着繁榮與和平！我們英國現在有 1500 萬英畝公有土地，有 2700 萬英畝牧場。根據希臘神話，當海格立斯同大地的兒子巨人安泰鬥爭時，海格立斯好幾次把他摔在地上，安泰每次都倒在母親懷裡，從母親身上汲取新的力量，因而跳起來比以前更加有勁。海格立斯窺破了這一點，就把他舉到空中，結果便戰勝了他。

勞動-巨人也正是這樣，按照壟斷組織-海格立斯的意志，他同產生了他的大地分離開來，他被競爭的魔爪緊緊摺住，變得軟弱無力，無依無靠，像穆罕默德的坟墓一樣吊在天堂與地獄之間——只是更接近後者！

究竟怎样才可以接近大地呢？有人对你们说，为了这个目的根本不需要政权。是谁这样说的呢？莫非是争取把工作日缩短 10% 的运动的领袖说的，或者是这样一些运动的领袖例如争取 10 小时工作日运动的领袖、争取不完全工作日运动的领袖、争取限制机器工作时间的运动的领袖、争取建立管丧葬的慈善机关的运动的领袖、争取政教分离的运动的领袖、争取实行国民教育的运动的领袖、争取地方自治的运动的领袖，或者是什么其他运动的领袖说的？‘运动’多么纷繁，而我们仍然原地不动。不需要政权！可是，为什么这些人又那样喜欢围绕政治的幻想国跳舞，为什么他们把哀求的代表团派到政客帕麦斯顿那里去并向政治性的议会呈递请愿书呢？为什么要向政治王位卑躬屈膝呢？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效法他们的榜样，也正应当争取这种政权！只有这些人才劝你们为你们的敌人争取政权。可是我要对你们说：争取自己的政权。我告诉你们一个伟大的真理：

宪章是使你们摆脱一切贫困的手段。

是谁反对你们呢？首先是联合内阁。联合内阁是什么呢？是那些一个也不能独立自主的派别的领袖。这十来个人极其软弱无力，根本不能自立，——因此，他们互相依存，他们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真正的人。所谓的联合不过如此而已。还有谁反对你们呢？反对派托利党。它也许会赶走内阁，可是不敢这样做，因为它知道，它自己也将被赶走，以后便会出现这样一个大洪流，在这个洪流的冲击下，连挪亚^①本人也不能挽救统治阶级。还有谁呢？土地贵族，他们把四分之三的领地按照大约三分之二的价格抵押出去，——这是能够镇压人民的多么强大的力量啊！38 000 名破了产的大地主和 30 万在高额地租、大地主的狩猎法和暴政的压迫下呻吟的农场主。还有谁呢？还有由于自己卑鄙地热衷于竞争而濒于破产的厂主，——他们很快就不能维持自己的工厂了。这是立意要从你们脚下把自由的柱脚打碎的不折不扣的势力！剩下的是什么人呢？工人和小店主。曾经不止一次地企图用什么妥协的办法把他们联合起来。我本人过去始终反对这种联合，因为在选举权范围内的妥协只能加强金钱利益的代表们和改善阶级立法。但是，现在实行这种联合的时候终于来到了，现在既不需要妥协，也不需要叛卖。小店主很快就会成为

^① 圣经中的神名，据说神降洪水于大地，要灭绝万物，挪亚带着他的妻子、儿子以及被他救出的活物乘坐方舟飘浮，人类和生物得以流传下来。——译者注

民主派。据说，通往工人头脑的道路必须经过他的胃。就算是这样吧！可是，通过小店主的心的道路却需要经过他的口袋。他每失掉一先令，就获得一种新的思想。破产向小店主揭示出真理…… 我们敌人的道义力量就这样被消灭，而我们则增加了新的同盟者。我们敌人的肉体力量也在消失。沙皇曾对这一点表示关怀！在爱尔兰还剩下不到 1 000 名英国兵士！在英国本土上已经没有正规军队了，可是还有民军！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民军中开小差现象之多弄得‘号叫’已经无济于事，于是把专门的通告分发到甚至逃兵曾呆过一星期的每一个小教区，每一个小市镇，企图用暴力和恫吓迫使他们归队。可以祝贺政府拥有这样一支新的军队。总而言之，战场是干净的，——对人民有利的时机到来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指的是暴力。不是，绝对不是！**我们指的是广泛的、和平的道义运动。**但是，从我们指的是道义力量这一点绝对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敌人也**指的是这种力量。

英国已经开始在考虑和倾听了。在这以前，它听到的是波兰的战鼓声和维也纳的马蹄声。在这以前，它听到的是米兰的叫喊声和巴黎的欢呼声！但是，在目前的暂时的沉寂中，英国开始听到它自己的骄傲的心脏的跳动，——并且高呼：‘我也要完成一桩事业，——我也应当粉碎敌人和夺取战场。’”²¹²

大会主席曾指出有监视人和其他警官到会，希望在这些政府僕从的报告中对会上的讲话不要进行任何歪曲。关于这个警告厄内斯特·琼斯说道：

“至于我个人，我丝毫不在乎他们说些什么，——随便他们说去好了。我对待鼓动就像战士对待战斗一样，——我在枪林弹雨之中迎接自己的命运，或者倒下、牺牲，或者活着、取胜，因为我是一个民主战士。”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8 月 8 日

载于 1854 年 8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62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馬克思

*撤出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
——波兰。——西班牙人民的要求

1854年8月11日星期五于倫敦

“通报”昨天刊載的一則消息說，

“俄国駐維也納大使通知奧地利內閣說，尼古拉皇帝下令全部撤出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尽管有了这一声明，布奥尔伯爵仍于8月8日跟德·布尔克奈男爵和威斯特摩兰勋爵交換了照会，而根据照会可以看出，奧地利同意法国和英国关于必須要求俄国保证不再引起冲突而破坏欧洲安宁的意見，并且答应在沒有获得这些保证、普遍和平沒有恢复之前不同彼得堡內閣締結任何协定”。

这些保证应当是什么样的，可以从今天的“泰晤士报”看出来。第一，撤出各公国；第二，以全欧的保护权代替俄国的保护权；第三，

“修改海峡条約并采取措施使俄国的海上优势縮减到不致威胁土耳其的生存和黑海和多瑙河口的航行自由”。

“通报”的消息基本上由克拉倫登勋爵在昨天上院會議上的声明证实了。从其他方面我們也了解到，俄軍的大本营已轉移到布澤烏，俄軍4个团已渡过普魯特河，奧地利政府方面也撤銷了以若干兵力加强在特兰西瓦尼亞和加里西亞边境上分散成梯队的各个軍团的命令。

战史上未必有过比俄军撤出多瑙河各公国更奇特的行动了。问题在于，这种行动只能从外交上，而决不能从战略观点上找到解释。正如“论坛报”已经讲过的，奥地利和俄国拟定了一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一旦沙皇的虚荣心由于夺取锡利斯特里亚而得到满足，奥地利就应当占领多瑙河各公国；在一项特别条款中已预计到俄国失败的可能，根据这项条款，奥地利就在俄国失败时也应当去占领多瑙河各公国。因此，在俄国解除对锡利斯特里亚包围的前一天，土耳其和奥地利签订了一项条约²¹³，规定奥地利有权进入瓦拉几亚。条约有三个目的：第一，不让土耳其进入多瑙河各公国；第二，“沿整个奥地利边境建立一道防止革命传染病的防疫线”，最后是保证俄军的安全退却。从克拉伦登勋爵的供认中可以确实地得出结论说，这个条约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强加于土耳其政府的；同时，御前会议颁布了一项决定，按照这个决定，应当让俄国人在撤离他们的部队时不受追击。可见，俄军从多瑙河的仓促撤退如果不是俄奥协定规定好的，那就无从解释了。奥地利人原定7月3日把军队开进瓦拉几亚。为什么他们又延期了呢？原来他们在争取土耳其政府一次又一次的让步：第一，关于应在瓦拉几亚建立的政体；第二，关于把土耳其人排挤出他们自己的领地。然后奥地利人声明，他们占领瓦拉几亚并不意味着宣战。克拉伦登勋爵说：

“6月底，当俄军准备撤出瓦拉几亚时，奥地利政府派了司令部的一位军官海斯将军通知联军总司令说，奥地利政府打算代表苏丹占领瓦拉几亚的一部分领土，而且是为了恢复苏丹在该地的权力；但是，奥地利人将不是作为交战的一方在该地出现，因为奥地利同俄国不处于战争状态，并且它目前还未收到它向俄国提出的要求的答复。”

奧地利的这种不明智的坦率引起一場混乱，于是需要再度延期。接着是嫉妒奧地利在多瑙河擴張势力范围的普魯士提出抗議。虽然这两个强国都是俄国的工具，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們經常互相嫉妒，而这一点在 1850 年“馬鈴薯战争”²¹⁴时表現得很明显。如果烏尔卡尔特先生仔細讀过当年的华沙議定书，他也就决不会产生把普魯士突然变为反对俄国的欧洲堡垒的妄誕念头。

已經开始撤退的俄軍一看到奧地利錯過有利的时机，便又折回来重新向多瑙河推进，因为，如果在奧地利采取行动以前就从瓦拉几亚撤退完毕，那末让奧地利随后进入这个公国的任何借口也就不存在了。可是魯舒克的一位土耳其將軍^①，据“泰晤士报”說，“想像”俄軍正在全部撤退，于是向茹尔日沃进军并彻底地打垮了他們，从而使他們不可能实现任何重新占領多瑙河一綫的企图。由于这次失敗，俄軍不得不認真考虑撤退問題；促使他們采取这一决定的还因为他們懂得：土耳其的所謂盟国不可能再消极下去，英国政府不得不照顾到它的軍隊和社会輿論，因而必将采取某些反对俄国的行动。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增强了俄軍在貝薩拉比亚和克里木的防御力量。因此，我們从一則电訊中得知，俄軍的一些团即将火速从貝薩拉比亚和赫尔松向克里木轉移，并由駐莫尔达維亚的一些团来接防。

可以預料到，土軍不会坐失良机。8月6日，他們的前卫在伊斯甘德-貝伊的指揮下进入布加勒斯特，土耳其將軍在土耳其的敌人 1853 年进入这个城市的一周年时接見了瓦拉几亚首都的代表团。

^① 即奧美尔-帕沙。——編者注

这样奥地利人又错过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并且丧失了进入瓦拉几亞的虛假借口。現在，再去占領必然会使他們同土耳其人发生冲突。虽然奥地利报纸痛斥土耳其人进入布加勒斯特，认定这个行动違反了条約，但英国官方报刊却痛斥奥地利人自己由于迟緩和愚蠢而使制訂得如此周密的計劃化为泡影。例如，星期四的“泰晤士报”就写道：

“奥地利人由于迟緩失去了在多瑙河各公国能够取得的地位的全部利益。奥美尔-帕沙利用了这个情况并且紧跟着撤退的敌人前进。瓦拉几亞的大部分土地現在已被苏丹的軍隊占領。多瑙河从沃尔肖伐到加拉茲已在他們的手中，同时沒有任何根据設想，哪一个强国能要求土耳其司令官退出他按照主人的权利并且依靠他的軍隊的英勇所占領的地区。”

現在留給奥地利人的，就只是占領莫尔达維亞。

7月30日从君士坦丁堡来的消息談的几乎全是計劃中的对克里木的远征。7月27日，一支由20艘舰艇組成的分舰队返回了。它是在布律阿海軍上将的指揮下并在布朗和康罗貝尔两位將軍的随同下，于7月21日离开巴耳契克去偵察从阿納帕到塞瓦斯托波尔一带的海岸的。返回后，康罗貝尔和布朗立即到瓦尔那，向圣阿尔諾和腊格倫勋爵报告他們执行任务的結果。英法軍隊都分散在瓦尔那和居斯坦杰之間的各个港口，以便于上船。看来，这次上船已在7月29日或30日完成了。土耳其舰队已經駛入黑海，而全部英法海軍显然是在8月1日以前在瓦尔那地区集中了，因为在这个时候以前該地集結了大批軍用运输船。关于这些軍隊的使命，“南方日报”說：

“一些人在談論阿納帕和附近的要塞，說要塞中駐有将近2万人，而攻占这个要塞立即就可以保障阿布哈茲、切尔克西亞同克里木之間的交通綫；这样一来，切尔克斯人就会很容易地参加对克里木的任何进攻。另一些人认为

正打算进攻敖德薩，目前該地的守軍約 4 万人；联軍可以在这里修筑工事过冬，而且使貝薩拉比亚和克里木处于打击之下。第三个方案指出尼古拉也夫作为进攻点，該地有俄軍的軍火庫；这个城市位于一个东面是德涅泊河、西面是布格河的三角形地区。”

俄軍完全放棄了多布魯甲，該地現已被 36 000 名土軍和法軍占領。土軍駐扎在巴巴达格，据报道它已接到进攻土耳其恰的命令，法軍也奉命进攻加拉茲。

据傳，俄軍在苏利納河口建設的一个小鎮先前就已經遭到部分破坏，在 7 月 16 日則被英国蒸汽舰“噴火号”和“維苏威号”完全摧毀，除一个灯塔和一所教堂之外，几乎沒有一座建筑物被放过。

在白海，英国人在奥涅加河岸的一个地点登陆并毀掉了一个村庄。

黑海的“弗拉基米尔号”事件²¹⁵引起了“泰晤士报”对邓达斯海軍上将的猛烈攻击，“先驅晨报”对此作了如下的回答：

“查理·納皮尔爵士在波罗的海上可以让斯維阿波尔格的舰队暢行无阻地开到它的停泊地，可以让汉古特修筑坚固的工事，然后使它遭到徒劳无益的轰击，可以容許浮标被去掉因而使船只失事，而对这一切，‘泰晤士报’不曾提出过任何指責。但是，对于邓达斯海軍上将的問題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們从 8 月 9 日巴黎的来信中知道，东方的軍团将增加 5 万人。如果战争不会带来任何别的結果，那末能使法国摆脱掉十二月政变的軍队也好。

你們也許已經注意到，俄皇在他对土耳其的計劃破产以后，又来利用波兰王的封号，而这一封号曾被他当廢物舍棄，因为他以为自己在匈牙利取得胜利之后，波兰的合并已經是既成事实。我們在維也納“新聞报”发表的 8 月 1 日的华沙来信中讀到：

“据说，沙皇行将前往华沙，是表示将在民族权利方面对波兰人作某些让步。预料要召见早在1832年的波兰王国组织法中提到过的那些名士。人们推测，将重新开办学校，将颁布在正式文件中使用波兰文、每年公布收支情况和波兰人有权批准直接税的命令。同时还传说，波兰军队将重新建立起来，但是由俄国军官指挥。第四次新兵招募工作刚结束。居民们还从来没有过这样重的负担。”

我们在8月7日的“杜塞尔多夫日报”上也读到：

“据华沙消息，波兰王国的总督里迪格尔将军曾召集波兰贵族首领，建议向国王呈递一份要求重建独立的波兰王国的请愿书。”

形形色色的党派提过不少解决波兰问题的办法，但是像这位俄国将军所建议和规定的这种解决办法，是从来没有任何人想到过的。

哥本哈根来的消息说，低能的丹麦国王在内务大臣德·梯利希先生的陪同下已乘船前往卡尔斯克伦纳和瑞典国王会晤。梯利希是俄国的最狂热的拥护者之一，可以预料，两国国王会晤的目的是要同俄国恢复以北方武装中立²¹⁶这个名称闻于世的友好同盟。如果丹麦和瑞典打算对俄国保持中立，那末不能从此得出结论说，它们对英国和法国抱有同样的打算，这一点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几天以前，丹麦军队的炮兵司令梅萨将军在检阅国民自卫军的炮队时发表了一篇非常激昂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暗示说，国民自卫军的炮队同大军的炮兵部队一起响应国王的号召来共同保卫斯堪的那维亚祖国的日子可能已经不远了。

明日将宣布议会暂时休会。

“这一次议会会议解决问题的拖拉，不亚于克里木战局的军事行动的迟缓。”

几天以前，“喧声报”²¹⁷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正在紧张作

战的西班牙人民和在他們上空互相拥抱的两个騎手——埃斯帕特罗和奥当奈尔。“喧声报”把仅仅作为革命的开始的東西錯当作革命的結束。奥当奈尔和埃斯帕特罗之間的斗爭已經开始了，而这个斗爭不仅仅是他們之間的，而且是軍事首領和人民之間的斗爭。任命斗牛士普切塔为屠宰場的总管、成立街垒战参加者的奖励委员会以及指定两个法国人浦若尔和德尔馬为当前革命的历史編纂者，都不能对政府有多大裨益。奥当奈尔希望根据 1845 年法律选举議會，埃斯帕特罗希望根据 1837 年宪法²¹⁸ 选举議會，而人民却希望根据普选权选举議會。人民拒絕在政府政綱发表之前放下武器，因为在曼薩那累斯宣布过的政綱^① 已經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了。人民要求取消 1851 年同羅馬教皇簽訂的条約²¹⁹、沒收反革命分子的財產、提出財政报告、廢除一切铁路建設的合同和其他有关公共工程的欺騙性的合同和成立审判克里斯亭娜的特別法庭。她两次試图逃走均因遭到人民的武装抵抗而失敗了。“政論家报”开出了她必須偿还国庫的如下賬目：从 1834 年到 1840 年期間她作为摄政女王非法窃取的 2 400 万，她出国 3 年从法国回来后窃取的 1 200 万和从古巴国庫提取的 3 500 万。这个賬目是相当客气的。要知道，当克里斯亭娜 1840 年离开西班牙的时候，她帶走了巨額款項和西班牙王国的几乎所有的珍宝。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8 月 11 日

載于 1854 年 8 月 25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166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見本卷第 364 頁。——編者注

卡·馬克思

*東方問題。——西班牙的革命。

——馬德里報刊

1854年8月15日星期二于倫敦

“科倫日報”報道：

“美國政府經過多年的談判後宣稱不願修訂它同丹麥之間的現存條約，如果該條約的第五款不改為允許一切美國船隻自由通過松德海峽的條款的話。同時美國政府拒絕給予任何補償。丹麥被美國人的行動吓壞了，於是向其他強國求援，據說普魯士政府表示願意派遣 2 萬兵士去保衛松德海峽。”

因為松德海峽徵收的關稅對哪個國家也沒有像對普魯士那樣重，所以普魯士採取的措施，是再符合普魯士政策的精神不過的了。總而言之，*se non è vero, è ben trovato* [即令這不是實情，也算想得好]。

法蘭克福議會經過長期討論公布了新的出版法和結社法。結社法干干脆脆禁止任何政治性的集會或會議，出版法則規定了巨額的保證金，規定任何出版物的出版均需經政府的許可並且取消了由陪審法庭審理有關破壞出版法的案件。

普魯士政府中止了對拖延已久的柏林革命者的密謀²²⁰案件的審理。因為檢察官宣布原告方面的主要證人——亨策先生——“值得懷疑”。這位亨策就是那個在科倫案件中，根據他的證詞而使我的許多朋友在 1852 年被判徒刑²²¹的人。但是 1852 年已經

过去了，普魯士政府可能也不願意冒險让它所有的警探再遭痛罵，以及让人們在反革命恐怖已經不能使人民畏惧的时候在首都追忆起科倫案件。

8月1日，塞爾維亞政府派了一个信使带着答复土耳其政府的指令的草案前往亚历山大公爵正在进行水疗的布列斯托瓦茨。这项答复經公爵签署后即刻发往君士坦丁堡。答复的内容是推說因为目前存在許多威胁着塞爾維亞的危險，所以不能裁軍，但是指出，为了尊重奧地利的願望和土耳其政府的命令，軍事演习已經停止。貝爾格萊德的总督伊塞特-帕沙根据本人的請求被召回國。他的继任者尚未公布。

据报道，有一万名土軍占領着布加勒斯特；但同时，我們在今天的“通报”上讀到，奧地利等奧美尔-帕沙对卡利克上校的最近通知的答复一到，就要命令奧地利軍隊进駐多瑙河各公国。当布奥尔伯爵接到哥尔查科夫公爵关于俄軍退出多瑙河各公国的通知时，他答复說：“多瑙河各公国将由奧地利軍隊占領，但这里并不包含对俄国的任何敌意”。

1854年議会的休会又使東方問題回到1853年議会休假期間所处的那个阶段。維也納會議又将开始工作，以便削弱积极的活動，迷惑社会輿論并让詹姆斯·格萊安爵士又有可能在議会复会时說：高貴的賢人是不爱怀疑的。应当指出，这次騙局不是出自奧地利，而是出自英国自己，这点你們可以从“泰晤士报”駐維也納記者的报道中看出：

“英国和法国的大臣通知布奥尔伯爵說，他們接到本国政府建議召开維也納會議的指示。答复据說是：再沒有能令帝国宮廷更高兴的事了。”

作为會議中新的談判的基础的是維也納照会²²²的一个新方

案，即德魯安·德·路易斯先生對涅謝爾羅迭先生的最近通知的復文；這個通知的要點與根據“泰晤士報”發表的條件而預料到的內容沒有多大的不同，對這些條件，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已經作了分析。新方案中沒有一字提到向土耳其、甚至是向盟國賠款的事。俄國所竊取的對莫爾達維亞、瓦拉几亞和塞爾維亞的保護權應當變為被歐洲篡奪的東西；對土耳其境內的基督徒的“保護權”也打算同樣處理；土耳其的勝利成果只應當是奧地利可以在多瑙河上的自由航行以及對 1841 年的條約²²³ 的有利於各強國而不有利於土耳其的修改。

克拉倫登勳爵星期四的發言（其要點我已經說過了）是對英國政府在東方問題上所奉行的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供詞。克拉倫登直言不諱地說：

“我想提醒你們，在 4 個多月以前，即 3 月 29 日就宣戰了，大家——我說大家不是指女王陛下的政府，而是指那些最有才幹、最有經驗的英國的和法國的軍官，——都以為當時俄國想發動侵略戰爭。誰也不認為，俄國既然在多瑙河以北集結了重兵，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並在這裡集中了大量的必需物資，却無意南進；相反地，大家都認為，俄國正打算這樣做。雖然我們也沒有懷疑過土耳其人的聞名的驕勇，但是我們仍然不能相信他們將會抵抗受過良好訓練而數量上又占優勢并由一些最有經驗的將軍指揮作戰的俄國軍隊，何況，我們只知其名的唯一的土耳其將軍——奧美爾-帕沙，當時還沒有遇到一個使他从那時起就非常勇敢地用來奠定他的不朽的光榮和聲譽的機會。法國政府和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抱有相當明確的看法，因此，約·伯戈因爵士和一個有經驗的法國工程部队的軍官才被派到君士坦丁堡去，尋求防衛這個城市和達達尼爾海峽的方法；他們的使命的意義是如此重大，整個戰局計劃和這次使命的結果是如此息息相關，以至腊格倫勳爵和聖阿爾諾元帥都耽擱下來，以便能夠親自和被派去執行這個使命的軍官們交談。當時聯軍已經開赴構築了龐大工事的加里波利。他們動身到君士坦丁堡去，時刻不忘必須保衛達達尼爾海峽。”

可見，當時盟國的全盤計劃不外是讓俄國長驅直入占領土耳其的歐洲領地，而讓聯軍占領奧斯曼帝國的首都和達達尼爾海峽。這就是英法軍隊按兵不動和被歪曲解釋的一切調動的原因。土耳其軍隊的英勇打亂了俄、英、法三國的巧妙計謀當然是“出乎意料的”。

在目前的西班牙革命爆發前幾個月，我曾告訴“論壇報”的讀者說，俄國的影響正用於挑起半島上的騷動。俄國做這事並不需要直接的代理人。它有突然對伊薩伯拉女王和西班牙宮廷的可怕的失道寡義表示憤怒的“泰晤士報”——這個炮彈國王、奧地利的“年輕的希望”^①、尼古拉和喬治四世的擁護者和朋友——為它效勞。此外，還有一些英國內閣的外交代表，而親俄派大臣帕麥斯頓給他們畫幾幅半島上的科堡王國的圖畫²²⁴，就能毫不困難地牽着他們的鼻子走。現在據可靠消息，不是別人，正是不列顛大使把奧當奈爾藏在自己的府邸，並說服現任財政大臣、銀行家科耳亞多支付一筆為奧當奈爾和杜耳塞策劃政變所需的款項。對於不相信俄國實際上已經插手西班牙事務的人，我以為可以讓他回想一下累翁島上的事件。1820年，在加迪斯集結了大批軍隊準備開赴南美殖民地。島上的軍隊突然宣布擁護1812年憲法，其他地方的軍隊也紛紛響應。我們現在從參加維羅那會議的法國代表沙多勃利昂那里知道²²⁵，俄國曾經慫恿西班牙遠征南美洲，而又勾引法國進軍西班牙。另一方面，我們從美國總統^②的咨文中知道，俄國曾向他保證防止對南美洲的遠征²²⁶。因此，不用太多的判斷力就可以發現累翁島上起義的主謀者。但我也可以舉出另外的俄國溫情

① 即弗蘭茨-約瑟夫。——編者注

② 即門羅。——編者注

脉脉地注目着西班牙半島上的騷动的例子。德·馬尔利安尼先生在他的“現代西班牙政治史”（1840年巴塞羅納版）一书中，为证明俄国沒有理由反对西班牙的立宪运动，他写道：

“在涅瓦河畔可以看到向宪法（1812年）宣过誓并从俄国皇帝的手中接受軍旗的西班牙兵士。拿破侖在向俄国的罕有的进军中，曾把拘留在法国的西班牙战俘編成一个特別軍团，法軍失敗后，这个軍团投到了俄国人方面。亚历山大盛情地接待了这些西班牙人，让他们駐扎在彼得哥弗，皇后常去看他们。有一天，亚历山大命令他们集合在封冻的涅瓦河上，領着他们宣誓效忠西班牙宪法，同时授给他们皇后亲手縫制的旗帜。从那时起命名为‘亚历山大皇帝’軍团的这个軍团，在喀琅施塔得登船开往加迪斯去了。这个軍团1821年在奥康尼亚举行了争取恢复宪法的起义，证明了他们对涅瓦河上的誓言的忠誠。”²²⁷

俄国在比利牛斯半島通过英国进行阴谋活动，同时却在法国面前誹謗英国。譬如，我們在“新普魯士报”上讀到：英国背着法国策动了西班牙革命。

引起西班牙的騷动对俄国有什么利益呢？俄国的目的是在西方进行佯攻，挑起英法之間的分歧，最后引誘法国进行干涉。英国的亲俄派报刊已經报道，法国六月起义者在馬德里修筑了街垒。在維罗那會議上也有人曾經对查理十世說过类似的話：

“西班牙軍隊所創造的先例，引起葡萄牙人的效法，也推广到那不勒斯和皮蒙特，并在各地树立了軍隊干涉改革和以武力强迫国家接受法律的危險榜样。皮蒙特发生起义后，法国（在里昂和其他地方）立即就发生了追求同样目的的运动。第四十五团的25名兵士在罗舍尔参加了貝尔頓的密謀。革命的西班牙使一些怪誕的搗乱分子返回了法国，于是两国的民主派便携手共同反对君主制度。”

我們根本不是要說西班牙革命是出自英国人和俄国人之手。絕不是。俄国只是在知道革命危机已經存在的时候促进混乱。但

是，以后发生的真正的人民运动反对俄国的阴谋总是不亚于反对本国政府的专制行为。1848年在瓦拉几亚曾是这样，现在1854年在西班牙又是这样。

英国的狡詐在英国駐馬德里大使豪登勋爵的行动中完全暴露出来了。他在离开英国返任之前召集了持有西班牙有价证券的人，号召他們要求政府滿足他們的要求，要他們宣称不如此就完全拒絕貸款給西班牙商人。他就这样給新政府制造了困难，而他到馬德里后，为了博得西班牙人民的好感，他向街垒战的死难者捐了款。

“泰晤士报”指責索尔先生說，正是他为了美国現政府的利益策动了馬德里的起义。可是，索尔先生沒有在“泰晤士报”上写过文章反对伊薩伯拉二世，对兼并古巴有利害关系的党派也沒有从革命中撈到什么东西。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倒是德·拉·孔查將軍之被任命为古巴島的軍事总督这件事。这位將軍曾經是阿尔巴公爵同索尔先生的儿子决斗时的监場人之一。如果以为西班牙自由派多少同意英国自由派科布頓先生的放棄殖民地的看法²²⁸，那就錯了。1812年宪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把选派代表的单一制列入新法典来保持对殖民地的統治²²⁹。1811年，西班牙人甚至在当时唯一沒有被法国占領的省份加利西亚招募几个团組成一支大規模的武装，以便把他們的南美政策同暴力結合起来。保存所有屬於西班牙的殖民地几乎是这个宪法的最重要的原則，而今天的革命者却同意这个立場。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社会活动家們的行为都沒有像在这次为了“道义”而发动的西班牙革命中表現得这样无耻。組成西班牙現政府的旧党派（埃斯帕特罗派和納尔瓦艾斯派）的联合，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分赃——职位，任命，薪俸，爵位和勋章——上

面。杜耳塞和埃查古埃已經到了馬德里，塞拉諾也請求允許他來，以便在掠奪中自己也得到一份。在溫和派和進步派之間爆發了一場大爭吵：前者的罪狀是委任了所有的將軍，後者的罪狀是委任了所有的政治領袖。為了平息“平民”的激憤，斗牛士普切塔從屠宰場總管提升為警察局長。就連十分溫和的“人民呼聲報”也不掩蓋自己的失望情緒。

“如果將軍們和領袖們拒絕升官，樹立大公無私和忠於革命所宣布的道義原則的崇高榜樣，他們的行為就會更加令人欽佩了。”

分贓時的卑鄙無恥也反映在大使的任命上。且不提奧洛薩加先生被任命為駐巴黎大使，他在1843年在這同一個府邸作為埃斯特羅的大使時，曾同路易-菲力浦、克里斯蒂娜和納爾瓦艾斯勾勾搭搭；也不用提亞歷山大羅·芒之被任命為駐維也納大使（他在1844年當過納爾瓦艾斯的財政大臣）以及里奧斯-伊-羅薩斯被任命為駐里斯本大使和帕斯托爾·狄亞斯被任命為駐都靈大使（他們兩個都是溫和派的極其低能的分子），只要舉出岡薩雷斯·布腊沃這個西班牙營私舞弊的化身被任命為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的例子就夠了。1840年，布腊沃創辦了“閑談”雜誌，這個雜誌像一種馬德里的“笨拙”²³⁰。他在这里激烈地攻擊了克里斯蒂娜。過了3年，對官職的追逐使他變成了一個轰动一時的溫和派的信徒。納爾瓦艾斯在需要一個靈活的工具時，曾利用布腊沃作西班牙首相，後來，一當不用這個人也行的時候，就一脚把他踢開。布腊沃作首相時，曾任命一個叫卡拉斯科的財政大臣，這個人簡直搶劫了西班牙的國庫。他讓他的父親這位先前在國庫中擔任過不大的職務、後來因盜竊國庫而被驅逐的人當了財政部副秘書長；布腊沃還讓他的妹夫普林西佩，一個劇院的常客，當了女王的侍從。當有人指

責他变节和貪污腐化时，他回答說：“始終是一个样子的人不可笑嗎？”而这个人竟然被选作“道义革命”的大使。

与当权派的这种玷污西班牙运动的卑鄙齷齪相反，令人高兴地听到，人民终于迫使这些英雄好汉們不得不把克里斯蒂娜交付議會审理并同意召开沒有参議院的、因而不是根据 1837 年或 1845 年的选举法召集的国民制宪議會。政府当时还不敢坚持它所拟定的选举法，而人民則一致要求普选权。在馬德里选举国民自卫軍时，选出的全是进步派。

各省都混乱不堪；各地都紛紛成立了洪达，并且在进行活动，每个洪达都頒布有利于本地方的法令：这个洪达取消烟草的专卖，另一个洪达廢除了盐税。走私者大肆活动，而且活动得比較順利，他們在西班牙是一支唯一沒有被瓦解的力量。在巴塞羅納，兵士們忽而发生內訌，忽而同工人毆斗。各省的这种混乱状态是极其有利的，因为它使首都无法控制革命的事业。

目前馬德里出版的报纸有“西班牙报”、“新聞报”、“民族报”、“时代报”、“人民呼声报”、“西班牙日报”、“政論家报”、“希望”、“伊比利亚日报”、“天主教徒”、“国民軍报”、“独立报”、“国民自卫軍报”、“埃斯帕特罗派”、“同盟报”、“欧罗巴日报”、“旁观者”、“自由党人报”和“革命回声报”。“先驅报”、“人民杂志”和“信使报”已經停刊。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8 月 15 日

載于 1854 年 9 月 1 日“紐約每日
論坛报”第 4172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坛报”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馬克思

*西班牙的革命。——博馬尔松德

1854年8月18日星期五于倫敦

从“国民議會报”、“泰晤士报”和“辯論日报”的社論中可以看出，無論是純粹俄国式的党派，或者是俄国-科堡式的党派，或者是立宪的党派都对西班牙革命的进程感到不滿。或許，从这里可以作出一个結論：西班牙有某些好机会，虽然外部情况好像与此相反。

8月8日同盟俱乐部²³¹代表团进謁埃斯帕特罗，把要求普选权的請願书交給他。同样內容的請願书紛至沓来。因此在內閣中进行了長時間的热烈的辯論。但是拥护普选权的人同拥护1845年选举法的人一样遭到了失敗。馬德里“日报”公布了11月8日召开議会的法令；在法令的前头有一段致女王的 *exposé* [說明]。选举将按略加修改的1837年选举法进行。議會应当是唯一的制宪議會，因为参議院的立法职能已經廢除了。1845年的选举法中有两点仍然有效，即关于建立选举 *mesas* (主持投票和公布选举結果的机构)的方法和議員人数(每5000人选举一名議員)。这样一来，議會将拥有420—430名議員。根据內务大臣桑塔-克魯斯的通令，选民登記工作应当在9月6日前完成。在各省的自治机关对选民名单进行审核后，登記工作将在9月12日停止。选举定于10

月3日在各选区的中心举行。从10月16日起开始在各省省会統計选票。凡对选举結果发生爭执而需要重新投票时，应于10月30日以前举行。在說明中毫不含糊地說：

“1854年的議会同前任1837年的議會一样，应当拯救君主制度；它应当使王位和国民之間发生新的联系；这些目的既不可能成为討論的題目，也不可能成为质詢的对象。”

換句話說，政府禁止討論关于王朝的問題；由此“泰晤士报”作出了相反的結論，它认为，問題的提法将是这样：或者要当今的王朝，或者根本不要任何王朝；不用說，后一种前途使“泰晤士报”无限伤心，并打乱了它的一切計劃。

1837年的选举法規定只有拥有或承租房产或地产、繳納 *mayores cuotas*（国家征收的船舶稅）和年滿25岁的公民才有选举权。此外，享有选举权的还有西班牙历史和自由艺术科学院的成員，神学、法学和医学科系的博士、碩士，神甫会會員，教区主教和他所轄的教士，有两年資历的法官和律师，服滿一定期限的現役或預备役的軍官，有两年服务期限的內外科医生和药剂师，身为某一科学院成員的建筑师、画家和雕刻家，官办学校的教授和教員。这个法律还規定剝夺不繳納国家或地方稅者、破产者、由于道德方面的缺陷或不够公民資格而被褫夺权利者和所有正受法庭审理的人的选举权。

这样，法令沒有規定普选权，反而取消了議会对王朝問題过問的权力。但是甚至就是这样一种議会看来还不見得能被接受。1812年西班牙議会沒有討論君主制度的問題，只是因为这种制度徒有其名，国王好多年来就在国外，而不在西班牙。1837年議会沒有討論這個問題，是因为首先必須廢除君主专制，然后才談得上对君

主立宪制的态度。至于谈到国内总的情况，“泰晤士报”完全有道理埋怨說，西班牙沒有法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因此只要那里繼續保持着“无政府”状态（沒有这种局面，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成功），甚至在首都打敗了革命也絲毫不能解决各省的問題。

不言而喻，西班牙革命有某些仅仅是它所特有的因素。例如，搶劫和反抗活动相結合——这个特点首先表現在反抗法国侵略的游击战中，后来，在 1823 年被“保皇派”和 1835 年以后被卡洛斯派承襲下来。因此关于下卡塔卢尼亚的托尔托薩发生大騷动的消息是毫不足奇的。这个城市的 Junta popular〔人民洪达〕在 7 月 31 日的呼吁书中說道：

“可憎的杀人匪帮，借口要求取消間接稅，占領了城市并蹂躪一切社会法規。它的行动就是掠奪和燒杀。”

不过，洪达迅速恢复了秩序：市民武装起来了，并及时赶来救助力量薄弱的守备部队。受命全权追究和惩办 7 月 30 日肇事者的軍事委员会举行了會議。自然，这个情况使反动报纸有借口来大唱慈悲的高調。但是这些报纸的理由多么不正当，这从“貝云信使报”的消息中就可以看出：卡洛斯派在卡塔卢尼亚、阿腊貢和瓦倫西亚等省，也就是在卡洛斯派战争期間他們的主要巢穴所在的那些邻近山区举起了旗帜。正是在卡洛斯派当中最先出現了 *ladro faccioso*，即自称是受政府当局迫害的政党的信徒的土匪。从維里阿特时期以来，西班牙游击队总有点土匪习气；但是最普通的土匪自封为游击队，这还是卡洛斯派的新发明。托尔托薩事件的参加者无疑就是这一类人。

列里达、薩拉哥沙和巴塞罗納的情况是严重的。列里达和薩拉哥沙拒絕同巴塞罗納联合起来，因为这两个城市被軍人統治着。

但是，看来，甚至孔查也不能对付那里的風暴，而他的位置应当由杜耳塞將軍接替，因为据估計，这位將軍不久前所获得的声誉对于克服困难能够提供更多保证。

秘密团体在馬德里恢复了活动；它們像 1823 年²³² 一样領導着民主派。人民由于他們的坚持而提出的首要的要求是，从 1843 年以来的所有大臣都应提出自己的报告。

政府正在收购在街垒战中被人民夺去的武器。它用这种办法获得了过去保存在起义者手中的 2 500 枝火枪。1843 年馬德里的 jefe politico [总督]“艾阿庫裘”唐·曼努埃尔·薩加斯蒂現在复职了。他发出了两份文告，一份致居民，一份致国民軍。他在文告中宣布将坚决鎮压一切騷动。解除薩尔托里烏斯走卒的各种职务的工作进行得很快。这或許是西班牙唯一进行得很快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所有各个党派都表現得同样干淨利落。

以前的傳聞不确，薩拉曼卡并未被监禁；他在阿兰惠斯被捕，但不久就被釋放，他現在馬拉加。

人民施用压力控制着政府，这在西班牙历史上是聞所未聞的事实，陸軍大臣、內务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所进行的頻繁的人事更动，以及各該部門的管理工作的簡化，都证明了这一点。

联合派，即科堡-布拉岡薩²³³ 派非常軟弱。不然它为什么要对来自葡萄牙的致馬德里国民自卫軍的唯一賀函这样大叫大嚷呢？只要稍微仔細一看就可以看出，这封賀函（从里斯本“进步报”发出的）同王朝問題沒有任何关系，它只不过是我們在 1848 年运动中已經熟悉的一种兄弟般的問候。

西班牙革命的主要原因是財政狀況，例如薩尔托里烏斯的关于提前 6 个月征收賦稅的法令。当革命爆发的时候，尽管任何一

个部門都沒有支款，但所有国家銀行都是空虛的；而且，有好几个月专款沒有专用。例如，在各个关隘征收的路捐，根本沒有用来維修道路。公共工程的专门撥款情况也是这样。在檢查公共工程方面的經濟情况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工程开支的收据而是宮廷寵臣的收据。大家知道，金融业务早就是馬德里最有油水的事業了。1853年西班牙的預算如下：

王室費和亲王年費·····	47 350 000	雷阿耳
立法·····	1 331 685	“ “ “
國債利息·····	213 271 423	“ “ “
內閣首相·····	1 687 860	“ “ “
外交部門·····	3 919 083	“ “ “
司法部門·····	39 001 233	“ “ “
陸軍·····	278 646 284	“ “ “
海軍·····	85 165 000	“ “ “
內務部門·····	43 957 940	“ “ “
警察·····	72 000 000	“ “ “
財政部門·····	142 279 000	“ “ “
撫恤金·····	143 400 586	“ “ “
教會·····	119 050 508	“ “ “
特別开支·····	18 387 788	“ “ “
共 計·····	1 209 448 390	雷阿耳

尽管有这样的預算，西班牙仍然是欧洲征稅最少的国家，而且任何地方的經濟問題都沒有这儿这样單純。因为西班牙各自治机关按照傳統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所以精簡官僚机构在这儿困难最小，在關稅改革和合理利用尚未出賣的 bienes nacionales〔国有土地〕方面情形也是一样。現代意义上的社会問題在西班牙这样一个資源还很少开发、人口也很稀少（总共 1 500 万居民）的

国家中是談不上的。

你們从英国报纸上可以知道英国军队在博馬尔松德的初步战績。还没有一次机会报道什么真正突出的事件的可怜的报刊，現在对 1 万法国兵士战胜 2 000 俄軍感到欣喜若狂了。我們不来談这些战績，最好看一看占領属于斯德哥尔摩 faubourg [郊区]，而不是圣彼得堡 faubourg 的島屿将会产生的后果。法国“世紀报”报道了而且許多报纸也都引用的一条消息說，瑞典将立即加入西方强国对俄国采取积极行动。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如何可以从下述事实判明：瑞典簽訂武装中立条約正是当它能够在芬兰的沼澤和森林中順利作战的时候。現在，当进行这些战斗的有利时机已經过去的时候，它会改变自己的政策嗎？英国和法国已經拒絕了国王奥斯卡尔要求提供金錢和領土方面的保证作为他同意的条件。此外，如果瑞典真的打算出兵的話，那末瑞典政府关于遣散整个分舰队的命令又怎样解釋呢？这次被遣散的有战列舰“查理十二世号”和“奥斯卡尔亲王号”，巡航舰“德吉列号”以及輕巡航舰“格弗勒号”和“托尔号”。

現在，当博馬尔松德所处的緯度的海面即将封冻的时候，占領博馬尔松德不会有什么意义。在汉堡公认继博馬尔松德之后将占領里加。这种看法的根据是“射手号”舰长希斯科特上尉写給英国駐默麦尔領事赫托列特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說，8 月 10 日以前一切外国船只都要离开里加灣。

普魯士显然正在大力支持同俄国接壤的国境綫上的軍火走私，同时准备同西方强国断絕关系。科尼斯堡、但澤、科尔貝克和施維訥謬德等港口的司令官已接到加强各該要塞的命令。

挪威和瑞典的最有权威的报纸声明說：

“在对于俄国一定被击潰、波兰一定恢复这一点还没有确定的絕對的把握的时候，加入盟国并冒巨大牺牲就是最狂妄的举动。而在有把握的情况下，甚至将芬兰交給瑞典也只是一种騙局和圈套。”

同时需要記得，所有这些北欧国家政府都同本国人民有冲突。例如，在哥本哈根情况是这样的：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人决定根本不参加議会的选举，而就在这个时候哥本哈根的选民們向上院議員馬德維博士递交了一封呼吁书，建議他不要接受出席議会的委托书，因为国王的敕令破坏了丹麦宪法和丹麦人民的权利。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8 月 18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4 年 9 月 4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174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弗·恩格斯

博馬尔松德的夺取²³⁴

(第一篇論文)

联軍終于采取了坚决的行动，夺取了博馬尔松德。8月3日和4日，法軍和英国海軍陆战队在阿兰群島登陆；10日包圍了要塞；在以后3天中构筑了炮台，架設了火炮；14日开始射击；15日以强攻夺取了两个圓形塔楼，一个是法軍攻下的，另一个是英軍攻下的；16日經過短促的战斗后，这个大型穹窿堡垒投降了，在这次战斗中，联軍几乎没有什么損失。毫無疑問，行动如此迅速則证明联軍是相当勇敢的。根据我們原先掌握的全部材料判断，本来认为夺取这个要塞必須通过正規圍攻，至少得构筑一道平行壕，还需要进行两星期左右的接近壕作业。甚至早就吹嘘联軍步兵只要用刺刀猛攻就足以使石墙粉碎的倫敦“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不圍攻毕竟是不行的，而且这种令人疲憊的行动大概要持續两个星期之久。

因此，既然在包圍要塞后約一个星期的時間，在开始掘壕后的第六天就攻击成功，那末自然就得出一个結論：圍攻者所遇到的困难比他們料想的小得多。究竟是什么帮助他們完成了任务呢？关于这一点，我們在未接到有关圍攻的詳細报告以前，当然只能猜测；不过，有一些情况可能是对他們有利的。很大一部分守軍是芬兰人，一部分甚至是阿兰群島的本地人。不用說，他們对俄国不会

抱有很高的爱国热忱。据逃兵供认,如果有可能,他們甚至决定根本不进行抵抗。看来,島上的居民在确信联軍肯定要攻击博馬尔松德以后,便把联軍当作使他們摆脱俄国桎梏的救星来欢迎,当然就給联軍提供各种情报,并从各方面給予帮助。但是,問題的实质应当是要塞本身在构筑方面存在某种严重的缺点。由于我們不可能得到要塞平面图,所有关于要塞的情况都是根据略图和要图以及一些外行人(無論如何不是工程师)的非常含糊不清的記述材料而来的,加之在略图和記述材料的細节又有許多互相矛盾之处,所以我們不打算分析这个缺点究竟是什么。

然而,按要图来看,两个圓形塔楼在一定程度上可用火力彼此从側面掩护;但由于在任何圓形工事中火炮必須作环形配置,火力必然非常分散,所以工事越小,因而容納的火炮越少,那末火力的分散程度就越大,射击效果就越小。因此蒙塔郎貝尔曾細心地警告說:应当避免采用这种塔楼,除非每一塔楼能得到左右相邻塔楼和后方主堡的有力支援而弥补火力分散的缺点。如果五六个这种塔楼能把火力集中于一点,那末原来非常分散而薄弱的火力就变得非常密集而有效了。此外,蒙塔郎貝尔知道得很清楚,在圍攻的最后阶段,即进行强攻时,对付攻击者最有效的火力是步兵火力。因此,他不仅規定在塔楼內要有步兵的防御設施,而且通常还构筑特殊的隐蔽路或塹壕把各个塔楼連接起来,这种塹壕不仅保障通行的安全,而且可供步兵射击时使用。我們剛好有阿拉伯堡的例子来证实这种塹壕的用处。阿拉伯堡的整个側面全靠这种塹壕来防护,从而保障了人数很少的阿尔納烏特人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俄軍的攻击。最后,蒙塔郎貝尔还尽量使塔楼完全避免遭受 coup de main [突然襲击]。他在塔楼的周圍挖掘了壕沟,构筑了隐蔽路,

有时干脆就把塔楼作为 réduit [内堡]，即作为坚固的大型多面堡的最后一道预备的障地来使用。这是他最成熟的、看来也是最正确的設計。近代一切筑有蒙塔郎贝尔式小型塔楼的工事差不多都采用了这种設計，只是多少作了一些修改。为了使攻击者更难于接近塔楼，他还极其巧妙地构筑了整个塔楼的底层或地窖以供步兵防御之用。

然而，正是在所有这些方面，俄軍显然有着严重的缺点。强攻火力的持續时间是 20—30 小时，这样的时间用来打开一个相当大的缺口，哪怕用三十二磅加农炮来轰击也显然是不够的，除非要塞石砌体的质量沒有达到一般工事的标准。因此可以认为，塔楼是由兵士利用云梯爬进炮眼，炸开塔門以后攻下的。而做到这一点的先决条件就是掩护塔楼翼側的火力非常薄弱，看来在后方，主堡附近并没有炮台支援塔楼，所以每个塔楼仅仅得到另一塔楼从側面的掩护。从要图上看得很清楚，堡垒附近的地形起伏极大，强攻部队可以利用地褶隐蔽地进到十分靠近的地方，因而上述缺点就显得更为严重了。其次，就要图和事实判断，俄軍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預防 coup de main。在塔楼的周圍，看来根本沒有多面堡，而俄軍构筑在塔楼前的那些多面堡又几乎沒有抵抗就放棄了。据说每一塔楼的四周都掘有壕沟，但是显然太淺，并且不适于步兵的防御。联軍只要一攻下塔楼，被塔楼控制的主堡就必然落于联軍之手。因而主堡很可能仅在形式上抵抗一下就陷落了。

如果就圍攻时间較短这一点来判断这些工事，可以认为，当初的建筑者根本沒有考虑过敌人从陆上大举进攻的可能性。他們在建筑这两个塔楼时，大概只注意到抗击敌人海軍陆战队的攻击，而海軍陆战队，充其量也不过 2 000 人，不足以进行强攻或进行什么

有效的正規圍攻。因此，防禦力最强的是向海的一面，而設有塔樓的向陸的一面的防禦力量則只是虛有其表。其實，根據經驗來看，甚至 1 000 名海軍陸戰隊就可能在好幾個月前以強攻奪占塔樓，從而迫使主堡投降了！

至於強攻，無論法軍或英軍，似乎都進行得很好。英軍是有名的強攻能手；強攻是他們慣用的方法，並且運用起來幾乎一貫得心應手。法軍比較喜歡平地的攻擊；而在圍攻時，由於他們思慮縝密，寧願遵循按步就班的、具有法國特點的沃邦圍攻法。但是這一次，就連他們也顯然被英國一員老將的毅力吸引住了。在博馬尔松德的英軍中有一位叫瓊斯的老上校，他賽過了沃邦，在攻擊巴達霍斯、羅德里哥城和聖塞瓦斯田的勇敢頑強的守軍時，竟在器材顯然不足的情況下巧妙地將預定的圍攻期限縮短了幾乎三分之一。瓊斯上校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師。同他的同行的見解相反，他不認為圍攻是一種考試儀式，要讓總工程師通過考試並在整個軍隊面前證明他對於正規圍攻的全部規定以及沃邦的“要塞圍攻法”²³⁵的一切原則記住了多少，理解了多少。他不認為整個軍隊只是為了一些工程師而集合到現地，在他們表演魔術時來保護他們。瓊斯上校首先是軍人，其次才是工程師。他非常了解英國兵，知道他們能做些什麼。這一次迅速、堅決而又沒有大事聲張地在規定期限的一半時間內攻下博馬尔松德，使人回想起打開西班牙要塞缺口和對它們進行強攻的情況，覺得當時除瓊斯老將以外，別人是不能指揮的。法軍從來不會想到用這種方法奪取要塞。這種方法同法國人的整個性格相反，它過於直截了當，太缺少溫文爾雅的風度了。但是，他們無法非議這個人的威望，因為早在 50 年前他就以他們為對手，試驗了非正規的攻取要塞的方法，並證實了這

种方法总是能够达到目的的。不过当战事发展到强攻时，法軍在坚决性方面看来并不亚于英軍。

有趣的是，以善于强攻而自豪的俄軍，从皮列柯普和奧查科夫到华沙和貝斯特里察河，每一次企图以强攻夺取野战工事都遭到了反击，而在錫利斯特里亚的战斗中，甚至用正規圍攻也未能夺下野战工事，而且还不得不撤退，尽管要塞中的土耳其守軍并没有得到任何支援。另一方面，在这次战争一开始，土軍就以强攻夺取了俄軍的永备工事——圣尼古拉堡垒，而現在著名的博馬尔松德要塞也被攻占了，它这一次发挥的作用只勉强抵得上一道暴露的塹壕。还必须指出，根据一切情况来看，英法舰队在这次胜利中没有发挥任何重大的作用。看来，舰队照例力求离穹窿炮台远些。

但是，联军这次胜利的性质却是这样：他們在即将到来的秋季里大概不会再采取什么行动。无论如何，向塞瓦斯托波尔进行大规模远征的部队还没有乘船出发，并且已经宣布将再推迟几个星期。而那样就会为时过晚，因此，联军威武的兵士們在瓦尔那兵营历尽艰难以后所迫切需要的冬季休整和喘息机会便有了保证。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8 月 21 日

作为社論載于 1854 年 9 月 4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17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博馬尔松德的夺取

(第二篇論文)

报刊上报道的关于夺取博馬尔松德的詳情仍然模糊不清和不够实事求是。这样，我們实际上就无法知道破城炮队的配置地点距堡垒有多远，舰只在海上攻击时停泊在何处。出乎意料之外，甚至在联軍攻占堡垒之后，我們也沒有得到有关堡垒构造的任何新的材料。对于几乎所有的重要問題都避而不談，供讀者欣賞的与其說是些技术上的細节，不如說是些繪声繪色的描述。甚至公报也是如此草率，以致不可能研究清楚，法軍在夺取一个除了指揮官以外大概誰也沒有抵抗的伊捷耶(当地写法)堡垒时是否进行了强攻。

我們所获得的有限材料正同我們根据要图所作的判断相同：两座塔楼都建筑在起伏相当大的地形上，因而雛谷、斜坡和岩壁形成了几乎直通到塔楼的壕沟边的天然接近壕。联軍可以方便地配置在这些雛谷里，而无須顾虑从头上飞过去的俄軍霰彈。这样一来，联軍便有了把炮队配置在目标附近的可能，因而从圍攻的第一日起就用上了通常在圍攻最后阶段才使用的那种炮队，即破城炮队。俄軍把工事构筑在这种地形上，而且又沒有把工事前至少600—800碼以內的地面加以平整，根据这种情况来看，他們并沒

有考虑到来自陆地的严重攻击的可能性。看来，破城炮配置在离堡垒不超过 500—600 碼的地方，因为法軍是用十六磅加农炮射击的，一般认为这种火炮即使从 100—150 碼的距离上发射也不足以在城墙上打开缺口。然而，在 36 小时的炮击之后，塔楼已遭到相当的破坏，再經 12 小时的轰击即可把整个正面破坏。英軍轰击諾提奇堡垒用的是 60 門三十二磅加农炮，每門炮重 45 英担。

根据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的“海軍炮兵”²³⁶一书所讲的，这种火炮使用規定的 7 磅装药，在 400—500 碼距离內发射的实心彈对坚实的橡树的貫穿力为 2—2.5 英尺。法軍十六磅加农炮的实心彈使用 5 磅装药时，在 400—500 碼的距离內对橡木工事的貫穿力为 1.5—2 英尺。如果英軍像所能推測的那样把装药量至少增大到 8 磅，那末，在火炮增加 1 倍并且口径增大 1 倍的情况下，英軍在不到 12 小时的时间內就打开了工事的一面，这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海上攻击，那不过是一种牵制行动。只有佩勒姆舰长一人利用机会进行了一次科学实验。他使用八英寸长管主炮，以破城射击所需的那种顽强精神和均匀速度，尽可能固定不变地向同一点射击。这种八英寸的长管炮是英国海軍中最好的火炮。它很重（95 英担），因而在用六十八磅的实心彈射击时可以使用十六磅的装药。甚至在 500—600 碼的距离上发射，其破坏作用也比破城炮队迄今通常使用的十八磅或二十四磅炮彈的作用大得多；只要使用得当，这种火力定会产生巨大的效果。佩勒姆舰长的顽强的火力很快就揭露了俄国花岗石要塞的秘密。只用几发炮彈就使圍墙的外层坍下了一大片，原先看来像是一整块的花岗石，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厚度同高度和寬度完全不相称的一块砌面板。再加几发炮彈，連旁边的石板也崩坍下来了，这时圍墙轰然一声坍下一大

堆乱磚碎石，暴露出要塞的心臟。于是一切都很清楚：“花崗石”只是外表；只要砌在內岸的比較薄的石板一被炮彈击碎，里面就再沒有任何堅固的石砌體能阻擋炮彈了。其實圍牆不過是一層夾牆，中間填的是碎石、沙子和其一些既不堅固又無附着力的東西。既然主堡是這樣筑成的，那末毫無疑問，塔樓的砌造質量也不會好，因此，塔樓如此迅速地被打開缺口，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可是，就是這些抵禦能力如此薄弱的圍牆，竟以其雄偉的外表使整個英法艦隊幾乎惊呆了4個月之久！不過，查理·納皮爾爵士看到這些工事原來是用什麼材料筑成的以後所感到的失望，恐怕還比不上沙皇在得知他那耗費巨資的“花崗石”竟是什麼東西以後所感到的失望吧。在陸地攻擊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我們已經談到過要塞周圍的起伏地形，它靠近要塞不僅是在火炮射程以內，而且還在步槍射程以內。文森團的獵兵就利用了這種地形，隱藏在樹樁、巨石、岩壁等等後面，爬到很近的地点，然後對穹窿的炮眼猛烈地射擊。在400—500碼的距離內他們的步槍百發百中；而且每發槍彈只要击中炮眼，就像打中隧洞一樣，順着傾斜的牆壁直到最深處的中央的洞孔；因此不難想像，這對裝填要塞炮的炮手們是多大的驚擾。

看來，俄軍並沒有採取最簡單的措施來防備這種步槍的射擊。他們也有獵兵。為什麼他們不把獵兵配置在塔樓頂的胸牆的後面而對敵人的獵兵進行射擊呢？顯然，博馬尔松德的芬蘭獵兵並不樂意為神聖的俄羅斯的榮譽而戰。而且，法軍除攻城炮以外還使用了几門臼炮和3門榴彈炮。臼炮對爆炸彈無法炸穿的塔樓頂進行曲射，以便使墜力和爆炸力結合起來摧毀它。但是這種射擊的效果顯然很差。法軍的榴彈炮則對炮眼進行平射。在400—500碼

这样近的距离上，用长管的二十四磅青铜榴弹炮发射直径六英寸的炮弹，每三发肯定有一发可命中像炮眼这样的目标；而每一发命中目标的炮弹就意味着一个炮手班和一門火炮失去作战能力。可见这种射击该是非常有效的。

总之，我们看到，博马尔松德的花岗石围墙无非是俄国人的骗局，是在薄薄的石砌层里面的一堆乱砖碎石，不可能在稍长的时间内经受住准确而顽强的射击。如果说建筑围墙的人欺骗了尼古拉，那末尼古拉也毕竟成功地利用了这些虚有其表的工事欺骗了联军，迫使联军放弃了整个战局。总的说来，俄军防守得不够好，其原因可能是芬兰部队十分公开表现出来的情绪。联军的特点是他们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坚决性，这一点大概应归功于琼斯将军。在火炮的转移和架设方面所必须克服的一些困难，虽然被查理·纳皮尔爵士过分夸大了，但无疑也是巨大的。法军在攻击中使用了口径太小的攻城炮和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有很大用处的臼炮，但是他们用火炮和步枪对炮眼进行的平射却值得大加赞扬。英军和往常一样使用了能运到战场的最重的火炮，进行了暴露的、直接而有效的射击，克服了困难，并以其素有的顽强精神在敌人的火力下坚持作战，没有无谓的忙乱，但也沒有特别新奇的表现而达到了目的。

博马尔松德被攻下了，但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处理它？根据来自汉堡的最后消息来看，在海军将领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远征军的司令官们和高级军官们已经决定，如果瑞典不愿以向俄国宣战为代价占领博马尔松德，联军就将破坏一切工事而撤离该岛。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末阿兰群岛的远征就决非“通报”所断言的那样，是战略性的步骤，而是纯外交性的措施，目的是把瑞典

拖进来同这样一些强国結成危險的同盟,这些强国的友誼,按布萊特先生說,“在一年內帶給土耳其的災難,是俄国即使在野心最大的时候也未曾夢見过的”。瑞典的宮廷正猶豫不決,瑞典的報界在号召人民謹防那些 «Danaos et dona ferentes» [“即使是帶來禮物的希腊人”]①,但是瑞典的农民已經通过了請願书,內容是議院应当請求国王永不再使阿兰群島重新落入俄国手中。农民的請願书未必会引起注意,很可能我們不久就会得到要塞被炸毀的消息。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8 月 28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4 年 9 月 13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4182 号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①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編者注

卡·馬克思
—
革命的西班牙²³⁷

卡·馬克思寫于 1854 年 8—11 月

載于 1854 年 9 月 9 日和 25 日，10 月
20、27 日和 30 日，11 月 24 日，12 月
1 日和 2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一

目前西班牙的革命看来具有持久的性质,于是,正像本报駐倫敦記者所报道的,有产階級和保守階級的代表人物开始离开国家到法国去避难。这也不奇怪,因为西班牙从来没有采取过1848年風行一时的在3天之內从头到尾完成一次革命的最新法国方式。西班牙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比較复杂而持久的。三年,看来是它給自己規定的最短期限,虽然西班牙的革命周期有时甚至延长到九年。例如,本世紀第一次西班牙革命从1808年延續到1814年,第二次革命从1820年延續到1823年,而第三次革命从1834年延續到1843年。这次革命將延續多久,將如何結束,就是最有远見的政治家也难預測;但是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整个欧洲,甚至包括土耳其和正在进行战争的俄国在內,沒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西班牙这样使善于深思的观察家感到如此濃厚的兴趣。

西班牙的起义正像它們向来反对的宮廷寵臣的权势一样,是由来以久的現象。例如,十五世紀中叶,貴族举行叛乱反对国王璜二世和他的寵臣唐·阿尔瓦罗·德·卢納。在十五世紀还发生过更严重的变乱,反对国王亨利四世和他的权奸头子維尔埃納的侯爵唐·璜·帕切科。十七世紀里斯本人民把瓦斯康謝尔奥斯这个西班牙駐葡萄牙总督手下的薩尔托里烏斯碎尸万段了,菲力浦四世在薩拉哥沙的寵臣桑塔-科洛馬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同一世紀末叶,在查理二世統治时期,馬德里人民起义反对伯勒普什伯爵夫

人、奥罗佩薩伯爵和梅耳加尔伯爵一伙的王后权奸，因为权奸对运入首都的一切貨品都課以重稅，然后分吞稅款。人民前往王宮，强迫国王走到阳台上公开斥責王后权奸。然后群众又涌向奥罗佩薩伯爵和梅耳加尔伯爵的官邸，把这些官邸搶劫一空，燒个干淨，同时要捉拿官邸主人，但是他們逃走了，以終身流亡的代价保住了生命。十五世紀起义的原因是亨利四世的寵臣維尔埃納侯爵同法国国王路易十一訂立了卖国条約，把卡塔卢尼亚割让給法国。3个世紀以后，查理四世的寵臣、他的王后的情人“和平公爵”曼努埃尔·戈多伊同波拿巴勾結簽訂（1807年10月27日）的关于瓜分葡萄牙和允許法国軍队开进西班牙的楓丹白露条約，引起了馬德里人民反对戈多伊的起义，接着就是查理四世退位、他的儿子斐迪南七世即位、法国軍队入侵西班牙以及爆发独立战争。可見，西班牙独立战争从反对以唐·曼努埃尔·戈多伊为代表的权奸的人民起义开始，是同十五世紀的内战从反对以維尔埃納侯爵为代表的权奸的起义开始一样的。而1854年的革命同样是从反对以圣路易斯伯爵为代表的权奸的起义开始的。

尽管西班牙不断爆发起义，但直到本世紀沒有出現重大的革命，如果不算查理一世或者說查理五世（德国人这样称呼他）統治时期的神圣同盟战争²³⁸的話。一般說来，后者是在西班牙摄政阿德里安紅衣主教（佛来米人）庇护下的一个宮廷集团的行为直接引起的，这个集团进行无耻敲詐，使加斯梯里亚人到了絕望的地步，而且还向出价最高的人卖公职，公开以法庭判决做买卖。反抗佛来米人的权奸，只是运动的表面。这个运动在根本上是要保住中世紀西班牙的自由不受当代专制制度的侵犯。

阿腊貢、加斯梯里亚和格拉納达的合并天主教徒斐迪南和

(Two persons & two letters)

London. 1859. May 2nd 1859.

- 1) Sancho (X. X.) 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Spain, London. 1858.
- 2) Alonso of Asturias, Madrid, the person who provided the 2nd ed. vol. Jan 1858.
- 3) Jose Blanda who lived in Seville & C. P. de la Cruz, Madrid. 1846.
- 4) Ricardo D'Espinoza Com. 1840-56 Jan. 1856.
- 5) Antonio of Spain & 2nd ed. London. 1853.
- 6) Antonio of Spain in 1848. vol. London. 1848.
- 7) Don de Asturias, Y. de la Cruz & C. de la Cruz, Madrid. 1849.
- 8) Antonio of Spain & 2nd ed. Madrid. 1848.

伊薩伯拉一世統治之下为西班牙的君主国創造了物质基础，在这以后，查理一世企图把这个还是封建的君主国改变成专制的君主国。他立刻向西班牙自由的两根支柱，即議會和地方自治机关²⁴⁰进攻；議會是古哥特人的 concilia [諮議會] 的改变形式，地方自治机关几乎直接由羅馬时代傳下来，具有羅馬自治市所固有的世襲原則和选举原則相結合的特点。关于地方自治，意大利、普罗凡斯、北高卢、大不列顛的城市和一部分德国城市同西班牙当时的城市很相似；但是無論法国的三級會議或者中世紀英国的議會都不能同西班牙的議會相比。在西班牙王国形成中有过特別有利于限制王权的条件。一方面，在同阿拉伯人的长期斗争中，土地是一小块一小块地在不同时期收复并成为独立的王国的。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人民的法律和习俗。土地的逐渐收复主要是由貴族进行的，这就大大加强了貴族的势力，同时削弱了王权。另一方面，国内居民点和城市获得重大意义，因为居民不得不共同住在設防的地方，在那里寻求保护以免遭受摩尔人的不断侵犯；同时西班牙的半島地形以及同普罗凡斯和意大利的經常来往，促进了沿海地区第一流商埠的形成。早在十四世紀，城市代表就成为議會中最有势力的一部分，議會中也有僧侶和貴族的代表参加。也应该指出，半島經過了将近八百年的頑强斗争才緩慢地从阿拉伯人的統治下解放出来，这就使半島到完全肃清領土上的敌人的时候具有了与当时的欧洲完全不同的特点；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北部盛行的是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風俗习惯，南部盛行的是阿拉伯人的風俗习惯。

当查理一世从德国（他在德国登极）返回西班牙的时候，議會便在伐利亚多利德召开，以接受他效忠于古法典的宣誓并給他加

冕²⁴¹。查理拒絕前往，却派了自己的代表去，要他們去接受議會效忠于国王的宣誓。議會不准这些代表参加会议，并通知国王說，假如他不出席，不对国家法典宣誓，将永远不被承认他为西班牙的国王。查理对这个要求让步了；他到了議會，用历史家的話來說，他带着很不愉快的臉色宣了誓。这时候議会对国王宣布：“陛下，您要知道，国王不过是領薪俸的国民公僕。”这就是查理一世同城市互相敌对的开端。查理阴谋活动的結果是，在加斯梯里亚爆发了許多次起义，成立了阿維拉神圣同盟，联合起来的城市在托尔特西利亚斯召开了議會會議。1520年10月20日，从这里向国王发出了“反对濫用职权的抗議书”，查理对这个抗議的回答是，剝夺所有出席托尔特西利亚斯會議的代表的人身权利。內战已不可避免，起义的市民号召拿起武器；他們的兵士在帕迪利亚的指揮下占領了托列洛巴頓要塞，但是最后在1521年4月23日在維利雅拉尔会战中被优势的兵力击败。首要“謀叛者”的头滾落在断头台上，西班牙古老的自由也从此不复存在了。

当时各种情况都有利于剛誕生的专制政体的巩固。各省之間不够团結，使得它們的分散的努力失去了作用；但是，給了查理最大帮助的是貴族和市民之間的尖銳的階級对抗，它帮助查理削弱了貴族和市民双方。我們已經談到，从十四世紀起，城市在議會中的势力就很大了，而从天主教徒斐迪南的时代起，圣友会(Santa Hermandad)²⁴²就成为城市用来反对那些責备城市破坏了古老的貴族的特权和司法权的加斯梯里亚貴族的有力武器。因此貴族热心地支持查理一世的消灭神圣同盟的意图。查理摧毀了同盟的武装反抗后，就开始縮小城市的自治特权；城市居民减少，很快就失去它們的財富和重要性，不久也失去了它們在議會中的影响。于是

查理掉轉武器來對付曾經幫助他壓制城市自由而本身還具有不小政治作用的貴族。由於欠發軍餉而引起的兵變，使查理不得不於1539年召開議會，為的要議會同意給他一筆錢。議會對於他以前把補助費濫用於違反西班牙利益的目的而感到非常憤慨，因此拒絕撥款。查理一怒之下解散了議會；而當貴族依仗特權堅決要求免稅時，查理宣布，要求這種權利的人沒有理由參加議會，而且真的把這些人開除出議會。這對於議會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以後議會會議純粹是舉行宮廷儀式。古代議會的第三個組成部分——僧侶，早從天主教徒斐迪南時代起就站在宗教裁判所的旗幟之下，並且早就不把自己的利益同封建的西班牙的利益看做一體了。相反地，由於有了宗教裁判所，教會已成為專制政體的最牢固的工具。

如果說在查理一世統治以後，西班牙政治和社會的衰落表現出可恥的長期的腐化所具有的一切徵兆（這些徵兆使人聯想起土耳其帝國的最壞時期），那末在這個皇帝的統治時期，古代自由的遺骸至少已經安葬在華麗的墳墓中了。這是華斯哥·努涅斯·巴爾博亞在達里安海岸、科爾特斯在墨西哥、皮薩羅在秘魯升起加斯梯里亞國旗的時代，這是西班牙的勢力獨霸歐洲的時代，是伊比利安人的熾烈想像為埃爾多拉多、騎士功勳和世界君主國的燦爛幻景所迷惑的時代。也就在這個時代，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劍的鏗鏘聲中、在黃金的急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的凶焰中消失了。

在經過了先是哈布斯堡王朝以後又是波旁王朝的將近三百年的統治以後（要壓制人民有這兩個王朝中的任何一個就足夠了），西班牙的地方自治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保留着，怎樣解釋這個奇怪的現象呢？在這個比任何其他封建國家都更早地產生了純粹的君主專制的國家里，中央集權制却一直不能生根，這又怎樣解釋呢？

回答這些問題並不困難。十六世紀正是大的君主國家形成的時代，它們在每個地方都是隨着兩個相互敵對的封建階級——貴族和市民的削弱而產生的。但是在歐洲其他大國里，君主專制是作為文明中心、社會統一的基础出現的。在那里，君主專制是一個洪爐，在這個洪爐里各種社會成分被摻合在一起，受到開導，這就使得城市認為資產階級的普遍統治和市民社會的公共政權比自己的中世紀地方自治更好。在西班牙則恰恰相反，貴族政治雖趨于衰落，卻保持自己的最惡劣的特權，而城市雖已喪失自己的中世紀的權力，卻沒有得到現代城市所具有的意义。

自從君主專制建立以來，這些城市就在不斷衰落，苟延殘喘。這裡不打算說明那些破壞西班牙商業、工業、航海業和農業的政治條件或經濟條件。對於解決我們目前的任務，指出事實本身就夠了。隨着城市工商業生活的衰落，國內交換縮小了，各省居民的來往減少了，交通工具被棄置了，大路也是人迹罕到。這樣一來，西班牙的地方生活，各省和各個公社的獨立性，社會發展的不一樣（這種不一樣最初是由西班牙的地形造成的，後來又由於各省獨立地從摩爾人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並組成獨立的小國而歷史地發展起來），——所有這些現象現在都由於經濟上發生的使全國性活動源泉枯竭的變革而最終地固定起來。君主專制不僅在西班牙遇到了本性就同中央集權抵觸的物質因素，而且盡力阻礙取決於全國性的分工和國內交換的多样性的共同利益的產生，而這種共同利益正是建立統一的管理體系和統一的法律的唯一可能的基礎。因此西班牙的君主專制同歐洲的一般君主專制只有純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實，它應該列入亞洲的政體。西班牙和土耳其一樣，仍舊是一堆共有一個挂名君主的治理不善的共和國。在不同的省份里，

专制制度具有不同的性质，统一的法律由总督和省长任意解释；尽管存在专制制度，政府并不禁止各省保存不同的法律和习惯，不同的币制，不同颜色的军旗和各自的税制。东方式的专制制度只有当地方自治和它的直接利益发生冲突时才触动地方自治，但是当地方自治使它不必亲自做某些事情并使它省却实际管理的麻烦的时候，它是乐意让这种制度存在的。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拿破仑像所有他的同时代的人一样，原认为西班牙是一具没有生命的死尸，但是他发现，如果说西班牙国家死亡了，那末西班牙社会却充满生气，它的每一部分都洋溢着反抗力量，这使他非常不快地大吃一惊。根据枫丹白露条约，他争取到让他的军队开进马德里；为了进行谈判，他把王室一家引诱到贝云，强迫查理四世收回退位诏书，接着又强迫查理四世把领地让给他；拿破仑又威胁斐迪南七世，强迫他发表了同样的声明。查理四世和王后以及“和平公爵”被送到贡比昂，斐迪南七世和他的弟兄们被幽禁在瓦兰斯城堡，至于西班牙的王位，拿破仑则授予自己的哥哥约瑟夫。在这以后，拿破仑在贝云召集了西班牙洪达，并把他准备好的一部宪法²⁴³ 赐给洪达。他在西班牙的君主国中只看到被他牢牢关在城堡里的可怜的王朝而没有看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波拿巴完全相信，他已经把西班牙攫为己有了。但是在他的 coup de main [大胆袭击] 以后不几天，他就接到了马德里起义的消息。的确，穆拉特屠杀了近 1 000 人，把这一次爆发的怒潮压下去了。但是当这次大屠杀的消息在全国传开的时候，在阿斯土里亚又爆发了起义，并且很快就席卷了全国。我们要指出，这个第一次自发的运动是从人民中间产生的，而“上等”阶级却温顺地屈从于外国的压迫。

西班牙就这样准备好了它的現代革命历程，并进入了标志着本世紀西班牙发展特征的斗争。以上我們簡單列举的事实和影响，現在仍旧决定着西班牙的命运并振奋着西班牙人民的精神。我們已經指出，它們不仅对于評价目前的危机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評价西班牙在被拿破侖侵占以来所做的和忍受的一切，評价这将近五十年的悲剧性的事件和可歌可泣的斗争——的确，这是現代史中最激动人心、最有教益的一章——也是必要的²⁴⁴。

二

我們已經簡單地向讀者介紹了西班牙过去的革命史，以便帮助讀者更好地了解和评价那些使得这个国家目前为全世界瞩目的事件。更令人感到兴趣的而且对于了解当今时代也許具有同样意义的，是保证把波拿巴主义者驅逐出去并使西班牙王位重归于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它的这个王朝的偉大的民族运动。为了正确地評論这一运动和运动中的英勇事迹以及被认为几乎气数已尽的人民所表现的令人难忘的生命力，我們应当回溯到拿破侖进攻西班牙民族的最初时期。产生整个事件的真正原因，显然首先是 1807 年 7 月 7 日簽訂的而且据說是在庫拉金公爵和达来朗又簽訂了密約以后才臻于完成的提尔西特条約。条約发表于 1812 年 8 月 25 日馬德里“日报”上，其中包括下列条款：

第一条 俄国应当占有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并且根据需要擴張它在亚洲的領土。

第二条 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和葡萄牙的布拉岡薩王室退位，两国王位将让給波拿巴家族的亲王。”

这个条約只要是真实的(它的真实性是沒有什么人反駁的，甚至从不久前发表的約瑟夫·波拿巴国王回忆录²⁴⁵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那它就是 1808 年法国侵入西班牙的真正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当时的暴風驟雨般的事变就是靠秘密的綫索同土耳其的命运联結在一起的。

紧接着馬德里大屠杀和貝云协定以后，阿斯土里亚、加利西亚、安达魯西亚和瓦倫西亚同时爆发了起义，而法国軍隊占領了馬德里，在这时候，波拿巴假借口实占領了北部的四个要塞——潘普洛納、圣塞瓦斯田、菲盖腊斯、巴塞羅納；一部分西班牙軍隊早已調往芬宁島参加进攻瑞典的战役；最后，各当局——軍事的、宗教的、司法的和行政的——和貴族都劝諭人民順从外国占領者。但是有个情况抵銷了这一切困难处境。当时多亏拿破侖，国家摆脱了国王、王室和王国政府。这样一来，那些在相反情况下会阻碍西班牙人民表現自己天生的毅力的枷鎖被打碎了。在自己国王的統治下和在平常的情况下，西班牙人民是怎样无法抵抗法国人，已經由1794年和1795年的不光彩的战争²⁴⁶证明了。

拿破侖把西班牙最显要的人物召到貝云，以便亲自把新的国王和宪法交給他們。除了极少数例外，全都来到了。1808年6月7日，国王約瑟夫在貝云接見了西班牙大貴族代表团，斐迪南七世的亲密朋友印范塔多公爵代表大貴族对約瑟夫說了这样的話：

“陛下，西班牙大貴族一向以效忠于自己的国王出名，現在陛下也会同样得到他們的忠心和爱戴。”

加斯梯里亚的王政會議要可怜的約瑟夫相信“他是上帝派来登王位的那一家族的主要后裔”。率領軍隊代表团的德尔·帕尔凱公爵的頌詞是同样卑賤不堪的。第二天，同样是这些人发表了文告，諭令全体人民忠順于波拿巴王朝。1808年7月7日，91个出身于最大的貴族門第的西班牙人在新宪法上簽了字，其中有公爵、伯爵、侯爵和各教团的首領。在討論这个宪法时，引起他們反对的仅仅是廢除他們的古老特权和利益一項。以前在斐迪南七世的內閣中任职和担任宮廷官吏的全体人員都参加了約瑟夫的第一

届內閣和担任第一批宮廷官吏。上层階級的一些代表把拿破侖看成上天賜來復興西班牙的人物，另外一些人則把他當反對革命的唯一支柱；誰也不相信民族抵抗會取得勝利。

因此，從西班牙獨立戰爭一開始，上层貴族和旧官員就失去了對資產階級和人民的任何影響，因為從鬥爭一開始，他們就背棄了資產階級和人民。一方面是 Affrancesados (親法派)，另一方面是民族。在伐利亞多利德、卡塔黑納、格拉納達、哈安、桑盧卡爾、拉卡羅利納、羅德里哥城、加迪斯和瓦倫西亞的最著名的旧官員(總督、將軍和其他被認為是法國代理人 and 民族運動的障礙的著名人物)都成為激憤的人民的犧牲品了。各地原來的政權都被改換了。在 1808 年 3 月 19 日起義幾個月以前，馬德里就發生過騷動，要把 El Chorizero (香腸販子——戈多伊的綽號)和他的可恨的走狗趕下台。這個目的現在在全國規模內達到了，這樣，國內革命就按照人民群眾所希望的那樣并在與反對外國侵略的鬥爭沒有任何聯繫的情況下完成了。看起來，整個運動與其說是**擁護**革命的，不如說是**反對**革命的。這個運動是民族運動，因為它宣布西班牙脫離法國而獨立；同時這個運動又是王朝的，因為它擁護“受愛戴的”斐迪南七世而反對約瑟夫·波拿巴；這個運動是反動的，因為它擁護旧的制度、習慣和法律而反對拿破侖的合理的革新；這個運動是迷信的和充滿宗教狂的，因為它擁護“聖教”而反對所謂法國無神論，或者說，反對取消羅馬教會的特權。被自己的法國教友的命运吓坏了的僧侶，為了自保便激起人民的這種情緒。

沙賽說：“愛國主義火焰因加上迷信的聖油而燃燒得更旺了。”²⁴⁷

所有反法的獨立戰爭都具有復興性質和反動性質相結合的特

点,但是这种两面性在任何地方也沒有像西班牙表現得那么明显。在人民的想像中,国王是童話中被大盜虐待和幽禁的王子。民族过去的最令人神往、最得人心的时代,是同十字架对新月^①的战争的神奇的傳說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很多下层人民都习惯于穿貧僧的袈裟,靠教会吃飯。一个西班牙作家唐·霍賽·克利門特·卡尔尼塞罗在1814和1816年发表了以下著作:“拿破侖——欧洲真正的唐·吉訶德”、“光荣的西班牙革命的主要事件”、“恢复宗教裁判所是合理的”²⁴⁸。看一看这些书的名字就可以抓住西班牙革命的特点(这个特点在各省洪达的宣言中也表現出来了),所有这些书籍都歌頌国王、圣教和祖国,有一些甚至对人民这样說:

“他們对彼岸世界的希望面临破灭,受到不可避免的威胁。”

但是,如果說浸透了宗教和政治偏見的农民、內陆小城市的居民和无数穿袈裟和不穿袈裟的平民,构成了民族派的大多数,那末在这一派中还有一个把人民反对法国侵略的斗争看成西班牙政治和社会复兴的信号的活跃的、有势力的少数。这个少数是由港口、商埠和某些省会的居民組成的,这些地方在查理五世統治时期现代社会的物质条件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貴族和資產階級中的优秀分子、作家、医生、律师甚至僧侶(比利牛斯山脉也沒有阻擋住十八世紀哲学对他們的影响)支持这个少数派。1795年发表的根据加斯梯里亚王政會議的命令而草拟的关于改进农业和关于土地法的著名的霍韦利亚諾斯备忘录²⁴⁹可以看做这一派人的真正宣言。最后,还有資產階級青年,例如大学生,他們热烈地接受了法

① 奧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教的象征和旗帜。——譯者注

国革命的理想和原则，有一个时期甚至希望依靠法国的支持来复兴祖国。

在只涉及共同保卫祖国的问题的时候，民族派的两大组成部分还能十分和谐。在他们还没有在议会、在争取新宪法（当时即将制定新宪法）的斗争舞台上相遇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对立也没有表现出来。革命的少数派竭力支持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毫不动摇地求助于旧的人民的信仰所具有的民族偏见。如果说这种策略对于民族反抗的直接目的是适当的，那末到了旧社会的保守派开始利用这种偏见和人民热情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反对革命者的真正的、最终的计划的时候，这种策略终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少数派的致命伤。

斐迪南在按照拿破仑的要求离开马德里的时候，成立了以唐·安东尼奥亲王为主席的最高政府洪达。但是就在5月这个洪达就不存在了。那时中央政府没有了，起义城市成立了自己的洪达，这些洪达受各省成立的洪达领导。其实这些省洪达就是独立的政府，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组织了自己的军队。奥维耶多的代表洪达宣布主权完全转入它手中，它对波拿巴宣战，派代表团到英国去签订停战协定。以后塞维尔洪达同样做了这一切。有趣的是，这些狂热的天主教徒在形势的逼迫下同英国结成了同盟，虽然西班牙人一向把英国看成比土耳其苏丹好不了多少的最坏的异端的化身。为了逃脱法国无神论的攻击，他们竟投入大不列颠新教的怀抱。因此也不奇怪，斐迪南七世回到西班牙后，在恢复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的命令中说：

“那些同样地感染了仇恨神圣的罗马教会的情绪的各个不同教派所属的外国军队留驻在西班牙是西班牙宗教的纯洁性受到玷污”的原因之一。

这么突然出現的各自完全独立的各省洪达，曾承认塞維尔最高洪达有某种权威(誠然，是极微小的、极不肯定的权威)，因为自从馬德里被外国人占領，塞維尔就被认为是西班牙的首都。这样就建立了一种极端无政府状态的联邦政府，由于对立利益的冲突、地方的互相猜忌和竞争势力的存在，这种政府对于集中軍事指揮和統一战斗行动的要求是很不适合的。

这些独立的洪达所发表的告人民书反映了突然从长期沉睡中醒来、像受了电流的作用似地投入狂热的活动的人民的十分强大的英雄力量；但同时这些告人民书仍然不能摆脱曾使西斯蒙第有理由給西班牙文学加上“东方的”这个形容詞²⁵⁰的那些毛病：过分夸張的詞藻，过分的做作和吹嘘以及夸夸其談。这些告人民书同样明显地表现了西班牙性格所特有的幼稚的虛荣，难怪洪达成員都自封为“殿下”，都穿上华美的制服。

說到这些洪达，还应当指出两个情况：一个情况表明到起义开始时人民的觉悟水平是很低的，另一个情况給革命的发展带来了損失。洪达是由普选产生的；但是“下层阶级的高度热誠表现为順从”。在一般情况下，他們是选他們的当然上司，即省的显貴人物和小地产貴族，其次是选僧侶，很少的場合选资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人民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是沒有力量的，自己的主动性仅仅表现为迫使上层阶级抵抗法国人，而不要求亲自参与领导这个抵抗运动。例如在塞維尔，“人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求教区僧侶和修道院院长开会选举洪达代表”。因此洪达里面全是些凭过去的社会地位选举出来的、完全不像革命領袖的人物。另一方面，人民在委任这些代表时，根本沒有想到限制他們的权力和确定任期。而洪达，当然只考虑扩大权力和延长任期。正因为如此，在革命发

展的整个过程中，每当革命洪流有溢出河岸的危险的时候，这些迸发的人民热情在革命初期的第一批产物都成为阻挡革命洪流的堤坝。

1808年7月20日，也正是约瑟夫·波拿巴进入马德里的这一天，卡斯坦尼约斯迫使杜邦将军和韦德耳将军指挥的14000名法国兵士在拜兰放下武器，又过了几天，约瑟夫不得不从马德里撤退到布尔果斯。此外还发生了两件大大鼓舞西班牙人的事情：一件是帕拉福克斯将军把勒弗夫尔赶出了萨拉哥沙，另一件是德·拉·罗曼纳侯爵率领一支7000人的军队到达拉科鲁尼亚，这支军队不顾法国人的阻挠，从芬宁岛开来援救祖国。

在拜兰会战以后，革命达到了顶点，承认了波拿巴王朝或者聪明地保持沉默的那一部分上层贵族，现在都参加了人民事业，而这对人民事业的好处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三

各省洪达分掌政权使西班牙沒有被拿破侖侵犯的第一个浪潮淹沒，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这使国家的抵抗能力加强了好几倍，而且因为这使侵略者不知道应当打击的方向；实际上，法国人在发现到处都是西班牙人的反抗中心的时候，已經完全摸不着头脑了。在拜兰投降和約瑟夫从馬德里撤退以后不久，各地就开始感到必須建立一个中央政府。在取得初步胜利以后，各省洪达之間的爭执达到了異常剧烈的程度，例如，卡斯坦尼約斯將軍費了很大的力气才阻止了塞維尔向格拉納达进军。結果法国軍隊取得了恢复元气和占据坚固陣地的机会，尽管当时法国軍隊除去貝西埃尔元帅的那个軍以外都潰退到了埃布罗河一綫，只要奋力追击，可以很容易地击潰它，至少是把它赶出国境。但是，全国对洪达之間的猜忌的抗議以及对指揮官的 *laissez faire*〔漫不經心、玩忽职责〕的抗議，主要是由梅尔兰將軍对比尔巴鄂的起义的殘酷鎮压²⁵¹引起的。迫切需要使軍事行动配合一致；相信拿破侖馬上会率领从尼門河、奧得河和波罗的海沿岸募集的常胜軍卷土重来；需要有一个中央政权来同大不列顛和其他国家訂立同盟条約以及維持同西班牙的美洲屬地的联系并从那里征收賦稅；在布尔果斯有一个法国中央政权，以及必須以自己的圣坛来对抗外国的圣坛，——就是这些原因迫使塞維尔洪达勉勉强强地放棄了自己的不肯定的、实际上是虛有其名的最高权力，并建議各省洪达各选两名代表，由代表們的会

議組成中央洪达,同时各省洪达应保持对有关地区的内部管轄权,

“但是以必須服从中央政府为条件”。

这样在 1808 年 9 月 25 日即恰好是俄国君主和德国各邦君主在爱尔福特向拿破侖屈膝的前夕²⁵²,由各省洪达 35 名代表(西班牙本土 34 名,卡內里群島 1 名)組成的中央洪达在阿兰惠斯召开了會議。

軍队的命运在革命时期比平时更鮮明地反映国民政府的真正本质。負有把敌人驅逐出西班牙的使命的中央洪达,自己却被法国武装力量从馬德里赶到塞維尔,又从塞維尔赶到加迪斯,在那里得到不光彩的下場。中央洪达的政績就是打了一系列可耻的敗仗、西班牙各軍团被消灭以及正規的軍事行动变成个别的游击活动。西班牙貴族烏尔基霍于 1808 年 4 月 3 日曾这样对加斯梯里亚軍区司令官庫埃斯塔說:

“我們西班牙是由不同种类的材料建造起来的歌德式建筑;在西班牙有多少省就有多少不同的势力、特权、法律和习惯。西班牙根本没有欧洲称为社会精神的那种东西。这些原因将永远阻碍我国建立起一个相当巩固的、能够把我国一切民族力量联合起来的中央政权。”

这样,如果說西班牙在法国侵略时期的实际情况給建立革命中心造成了最大障碍,那末中央洪达的組成情况本身使得洪达不能克服国家所遭到的可怕危机。洪达要成为一个执行机关,它的人数是太多了,它的人員的組成太偶然了;同时,洪达要想具有国民公会²⁵³那样的权威,它的人数又太少了。单单中央洪达的权力是从各省洪达授予的这个情况就使得它不能克服各省洪达的野心、恶念和任性的利己主义。省洪达的成員正像我們在前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是根据他們在旧社会的地位,而不是根据他們建立新

社会的能力选举出来的。而省洪达派到中央洪达的也是一些西班牙大贵族、高级僧侣、加斯梯里亚显贵、过去的大臣和高级文武官员，而不是革命选拔出来的人物。由于力图做到合法和保持身分，西班牙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

中央洪达的两个最卓越的成员是弗洛里达布朗卡和霍韦利亚诺斯，当时的两大派就是分别聚集在他们的旗帜下。他们两人都曾遭到戈多伊的迫害，过去都当过大臣，而现在都成了羸弱不堪的人，在保守的西班牙制度的刻板 and 拘泥的成规中老迈衰朽了，而西班牙制度的那种拘守礼仪的、繁文缛节的迂缓早在培根时代就很闻名了，培根有一次曾感叹地说：“让死神从西班牙来找我，那它就会来得很晚的。”²⁵⁴

弗洛里达布朗卡和霍韦利亚诺斯是对立面，而这种对立是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以前就开始了的；前一个是平民官吏，后一个是贵族慈善家。弗洛里达布朗卡是以庞巴尔、弗里德里希二世和约瑟夫二世为代表的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和执行者；霍韦利亚诺斯是“人民之友”，他希望通过对经济法令的缜密的改变和对崇高学说的文字宣传来使人民得到解放。两人都反对封建传统，因为一个竭力使君主制摆脱封建传统，另一个则竭力使市民社会摆脱封建传统的桎梏。他们每一个在国家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也和他们的观点一样，是不同的。弗洛里达布朗卡曾以查理三世的首相资格执掌国家政权，他的统治随着他所遭到的反抗的增强而越来越专横暴虐。霍韦利亚诺斯在查理四世时曾任过很短时期的大臣，但他不是以大臣资格而是以学者资格，不是用法令而是用书本来取得他在西班牙人民中的影响的。弗洛里达布朗卡在政治风暴把他推上革命政府的首席的时候，已经是 80 高龄的老人，他原封不

动地保存着的唯一东西就是对专制制度的信仰和对人民創造力的怀疑。弗洛里达布朗卡在去馬德里的时候，曾給木尔西亚的自治机关留下秘密抗議书，宣称他只是由于害怕人民謀害才向强力让步，他还特地在抗議书上签了字，以便在約瑟夫国王面前替自己接受人民的委任状的行为辯白。他没有满足于恢复自己过去的傳統，而修改了一些过去他的政府采取的现在看来过于輕率的措施。例如，当初他曾把耶穌会教徒驅逐出西班牙²⁵⁵，现在他剛成为中央洪达的成員，就使他們获准“以私人資格”回来。如果他也认为从他統治以来发生了某些变化，那末这种变化只在于：赶走了弗洛里达布朗卡大伯爵并剥夺了伯爵的全部权力的戈多伊，现在就由这个弗洛里达布朗卡伯爵代替了自己的职位，而輪到自己被赶走了。被中央洪达选出来作主席，被洪达的多数派承认为毫无缺点的領袖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中央洪达中的有影响的少数派的領袖霍韦利亚諾斯也已經衰老了，也已在当年戈多伊使他受到的长期痛苦的监禁中丧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但是，就在他精力最旺盛的年代，他也不是一个进行革命活动的人，确切些說，倒是一个过于讲究手段因而不能把事业进行到底的好心的改良主义者。如果在法国，他会同穆尼哀或者拉利-托朗达尔一致行动，但决不会多前进一步。如果在英国，他会是一个有声望的上院議員。在起义的西班牙，他可以供給热情的青年一些观念，但在实际活动方面，甚至連弗洛里达布朗卡的温順的頑强精神他都远远談不上。这位貴人沒有完全摆脱貴族的偏見，因而具有强烈的像孟德斯鳩那样崇尚英国的傾向；他似乎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在证明，如果西班牙也可能出現能够提供普遍观念的智者的話，那只会是例外，而且要以損害西班牙人只有在

本地事业中才表现出来的个人毅力为代价。

然而，在中央洪达里还有以薩拉哥沙的代表唐·洛倫索·卡尔沃·德·罗薩斯为首的一些人，他們贊同霍韦利亚諾斯的改良主义观点，同时他們也推动革命活动。但是，由于人数太少，其中又沒有知名人士，他們沒有力量把洪达这一辆沉重的国家大車从西班牙礼仪的深轍中拖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組織得十分粗糙、内部暮气沉沉、以一些旧时代的活化身为首領的政权机构，担负着完成革命和战胜拿破侖的使命。如果說它的宣言的語言气势磅礴，同时它的行动又十分无力，那末原因在于西班牙的詩人唐·曼努埃尔·金塔納，在于中央洪达表现了文学鉴赏力，委托他这位秘书来起草了洪达的宣言。

卡德龙笔下的高傲的英雄把世襲的封号当成真正的偉大，在通报自己时，令人討厭地列举了自己的一切封号；洪达也是这样，它首先忙于取得与自己高貴地位相称的头銜和荣誉。洪达主席得到了“殿下”的尊称，其他成員得到了“閣下”的尊称，而 *in corpore* [包括全部成員] 的整个洪达得到了“陛下”的尊称。洪达成員都穿上了好像將軍服一样的化装舞服，佩上画有新、旧大陆的胸章，并給自己規定年俸为 120 000 雷阿耳。完全具有西班牙旧傳統的起义的西班牙的領袖，认为只要穿上戏装，就可以神气十足地、体面地走上欧洲历史舞台。

叙述洪达内部历史和它的施政細节，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們这里只回答两个問題。洪达对西班牙革命发展以及对保卫祖国究竟起了什么影响？回答了这两个問題，就能够說明十九世紀西班牙各次革命中很多直到目前神秘难懂的問題。

中央洪达的多数成員起初曾把鎮压最初的革命爆发当成自己

的首要任务。因此洪达加强了过去对付报刊的严格制度，并委任了一位新的大宗教裁判者，幸好，法国人没有让他去执行自己的职务。虽然当时西班牙的大部分不动产因有“死手”权不能买卖（贵族的财产只能继承，教会的土地不可转让），洪达还是下令中止已经开始了的出售“死手”财产的现象，甚至扬言要废除买卖教会土地的私人契约。洪达承认国债，但不采取任何财政措施来使预算摆脱由于轮流上台的卖国政府的长期统治所造成的庞大债务，来改革人人皆知的不公平、不合理、负担沉重的财政制度，以及粉碎封建制度枷锁而为民族开辟生产活动的新源泉。

四

早在菲力浦五世时代，弗朗西斯科·貝尼托·索勒达就說过：“西班牙的一切不幸都起源于西班牙的 togados (法官)”²⁵⁶。而加斯梯里亚王政會議 [Consejo Real] 是西班牙的有害的司法等級中的最高一級。王政會議是在唐·璜和亨利的动乱时代产生的，菲力浦二世发现它是 Santo officio [宗教裁判法庭] 的一个应有的补充机构，因而加强了它的作用。这个王政會議利用了这个时期的灾难和后来几个国王的軟弱无能，把各种各样的权力都集中到它的手中，并把当时西班牙各个王国的立法者和最高行政机关的职权都并在自己的最高司法职权之内。因此按权力來說，王政會議甚至超过了法国的議會，——除了它从来沒站到人民这边以外，在很多方面同法国議會是相似的。王政會議既然是当时旧西班牙最有威力的政权机关，当然也就是新西班牙和不久前产生的有削弱王政會議最高权威的危險的人民政权的死敌。王政會議既然领导法官这一等級并成为法官們濫用职权、享受特权的具体保障，自然也拥有全部由西班牙司法制度产生的无数具有权威的利益。因此它是革命决不能同它妥协的一种力量；革命本身要想不被这个力量消灭，就必须消灭这个力量。正像我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說过的，王政會議已經把自己出卖給拿破侖，由于这种叛变行为，它在人民的心目中已經威信扫地。但是中央洪达在开始执政这一天，竟愚蠢地把它成立一事通知王政會議，并要求王政會議宣誓效忠

于自己；同时洪达宣布，在得到王政會議的誓詞以后，要把誓詞散发給王国的其他所有政权机关。这种引起整个革命派公开譴責的輕率步驟向王政會議表明：中央洪达需要它的支持；于是王政會議振作起精神来，在几天假装犹豫之后，便心怀恶意地表示服从洪达，但在它宣誓效忠的同时就表现出它的反动怀疑，具体說就是建議洪达根据第三法規第二节第十五条²⁵⁷把机构成員减少到3—5人，从而自己解散自己，并下令封禁各省洪达。在法軍回到馬德里，并解散了王政會議以后，中央洪达还不以自己的第一次失策为滿足，竟輕率地恢复这个會議，成立了 Consejo Reunido〔联合會議〕，也就是把王政會議同古代历届王政會議的殘余結合起来。这样一来，洪达自己为反革命建立了一个中央机关，这个机关同洪达本身的影响相抗衡，一直用阴謀詭計来給洪达制造困难和障碍，挑唆洪达进行最反人民的活動，然后又摆出一副激于义憤的姿态，在憤激的群众面前侮辱洪达。必須指出，先是承认然后是恢复王政會議的中央洪达，是沒有能力在西班牙的司法体制方面或在完全不适用的民事立法和刑事立法方面进行任何改革的。

尽管参加西班牙起义的主要是民族分子和宗教分子，然而在起义的头两年曾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傾向；这一点从当时所有省洪达的宣言中都可以看出来，这些甚至大部分是由特权階級代表人物草拟的宣言也沒有忽略譴責旧制度和許諾进行根本改革。这一点从中央洪达的宣言中也可以看出来。中央洪达在1808年10月26日第一个告人民书中說：

“存在了20年的最庸碌无能的暴政，把国家帶到灭亡的边緣；仇恨和爭执使国民脫离了政府。不久前还受压迫、受屈辱的人民，意識不到自己力量的强大，而在制度方面和法律方面又都找不到防止政府为非作歹的保障，便

认为外国人的統治还没有这个有害的暴政那样可恨。这种总是反复无常而且几乎总是不公正的任性的統治，拖延得太久了；人民的耐性、人民对秩序的热爱和人民的渾厚的忠义之忧，长期被当局濫用；現在到了让建立在共同幸福基础上的法律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因此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必須进行改革。洪达将要建立各种主管部門委员会，一切有关政府和当局的书面建議应当送交这些委员会。”

洪达 1809 年 10 月 28 日在塞維尔发表的宣言中說：

“低能腐朽的专制制度为法国人的暴政开辟了道路。听任在这个国家里重复以前的种种恶行，就等于把你們送到波拿巴手中一样，是一种滔天罪行。”

中央洪达看来进行了一种最新奇的分工：霍韦利亚諾斯派宣告民族的革命意图并記錄成文，而弗洛里达布朗卡派有权直接否定这些意图，并以反革命行动抵制革命空想。不管怎样，对我们重要的是，根据省洪达对中央洪达的承认，可以证明一个經常被否认的事实，即在第一次西班牙起义时期是有革命意图存在的。

至于中央洪达是如何地利用了由于人民的善良意志、形势的逼迫和直接危險的存在而形成的有利于改革的形势，可以根据中央洪达派到各省去的专員对各該省的影响来判断。一位西班牙的作家²⁵⁸直率地告訴我們，中央洪达苦于人才不足，因此竭力把优秀的成員留在中央，把那些能力很差的人派到外地去。这些专員被授权主持各省洪达和代表中央洪达全部职能。关于这些专員的活动，我們只举几个例子：罗曼納將軍，因为他永远来回行軍，并且总是在他剛好不在的时候才发生战斗，所以西班牙兵士称他为 Marques de las Romerías〔朝拜圣地侯爵〕。这个被苏尔特击潰、并被赶出加利西亚的罗曼納，以中央洪达专員的資格来到了阿斯土里亚。他的第一步就是找借口同奧維耶多省洪达爭吵，因为奧

維耶多省洪达采取的坚决的革命措施引起了特权阶级的仇恨。他毫不犹豫地解散了省洪达，以自己的走卒取而代之。奈元帅听到这个一向同心协力抵抗法国人的省份里发生了这些争执，就立刻进军阿斯土里亚，把 Marques de las Romerías [朝拜圣地侯爵] 赶出去，进入奥维耶多，并把这个城市洗劫了 3 天。1809 年底法国人撤出加利西亚以后，我们的这位侯爵和中央洪达专员便进入拉科鲁尼亚，攫取了整个国家政权，撤销了大部分是在起义进程中出现的区洪达，任命了军事总督来代替他们，并且威胁说要追究这些洪达成员，实际上的确对爱国者进行了追究，同时又对那些投靠敌人的家伙非常宽大，最后，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他是一个恶毒的、无能的反复无常的蠢货。究竟加利西亚省洪达和区洪达的过错在哪里呢？它们曾下令毫无例外地在一切阶级和一切人中进行普遍征兵；它们向资产阶级和地主征税；它们降低国家官员的薪俸；它们命令宗教团体把自己金库中的现款交由洪达支配。总之，它们采取了革命措施。自从这位大名鼎鼎的 Marques de las Romerías 来到以后，阿斯土里亚和加利西亚这两个以普遍抵抗法国人著称的省份，只要没有受到直接侵略的危险，就不再参加独立战争了。

在瓦伦西亚，当人民和他们选举出来的领袖可以处理自己一切事务的时候，似乎出现了一些新的远景，但是这里的革命精神也被中央政府的势力摧残了。中央洪达不满足于把这个省置于一个叫做唐·霍塞·卡罗的将军领导之下，又派去了“自己的”专员拉巴索拉男爵。这位男爵指控省洪达不服从上级的某些命令，并撤销了省洪达的一个法令（根据这个法令，曾经合理地停止了对空缺的主教、圣职和骑士首领的任命，而把这里省下的收入拨归军医院使用）。因此中央洪达和瓦伦西亚洪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因此瓦倫西亞后来在苏舍元帅的自由主义治理时代就不再有所作为，而在斐迪南七世回来以后，竭力拥戴斐迪南七世为国王，以对抗当时的革命政府。

在加迪斯这个当时西班牙最革命的地方，中央洪达专员愚蠢的爱虚荣的德·維耳埃耳侯爵的到来引起了1809年2月22日和23日的起义，这次起义如果不是及时地转变为独立战争，就会造成极惨痛的后果。

中央洪达任命自己的专员之高明，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派洛桑諾·德·托勒斯先生作为去威灵頓那里的代表，此人一面自甘卑賤地对英国將軍阿諛逢迎，一面又秘密地通知洪达說，將軍抱怨粮食不够是完全沒有根据的。威灵頓发现这个卑鄙家伙的两面手法以后，就羞辱他而把他赶出了自己的軍营。

中央洪达所处的条件极有利于执行它在告西班牙人民书中所宣布的任务：

“在这可怕的危机中，你們向独立迈进一步就不能不同时间向自由前进一步，这是天意。”²⁵⁹

当洪达掌握政权的时候，法国人还没有占领西班牙三分之一的領土。旧的政权或者不存在了，或者投敌了，或者由于敌人的命令解散了。在拯救祖国的名义下，任何把财产和政权从教会和貴族手中轉移到资产階級和农民手中的社会改革，洪达沒有不可以实行的。洪达有着同当年法国的 *Comité du salut public*²⁶⁰ 一样的幸运，即国内的震蕩恰好同防御外来侵略的必要性結合在一起；不仅如此，中央洪达面前还摆着某些省洪达在形势逼迫下表现出大胆的主动精神的范例。但是中央洪达不仅仅成为西班牙革命的累贅，而且实际地起了支援反革命的作用：它恢复旧的政权，重新

鑄造已被打断的鎖鏈，扑灭它所到达的地方的革命火焰，它自己没有作为，又妨碍别人有所作为。中央洪达在塞維尔的时候，甚至英国托利党政府都认为需要在1809年7月20日向洪达发出照会，坚决抗議洪达采取反革命方針，“担心洪达会窒息公众的热情”。有人說过，西班牙忍受革命的一切苦难而得不到革命的力量。假如这个說法还有一部分真理的話，那就是它对中央洪达作了致命的判决。

由于还没有一个欧洲历史学家了解这个问题的决定性意义，我们就更加认为有必要来詳細談談这个问题。只有在中央洪达的政权下，才有可能把保卫民族的迫切问题和任务的解决同西班牙的社会改造、民族精神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做到这一点，任何政治机构只要一同实际生活发生微小的抵触就必然垮台。議會所处的环境完全相反：被赶到了比利牛斯半島的尖角上、被法国占領軍割断同王国的主要部分的联系有两年之久的議會，是一个想像中的西班牙，而真实的西班牙已被占領或在进行战斗。在議會治理期間，国家分成了两部分。在累翁島有思想而无行动，在另一部分西班牙則有行动而无思想。反之，在中央洪达时期，需要有最高級政府的特殊軟弱、无能和恶意，才能使西班牙战争同西班牙革命脱离。同法国和英国作者所說的相反，議會遭到失敗并不是因为它们进行革命，而是因为它的先行者是反动派，放过了革命时机。現代的西班牙作者虽然也責怪英国和法国批評家，但是看来无力駁倒他們；他們直到今天还得忍着痛苦去听神甫德·普腊德的 bon mot [刻薄話]：“西班牙人民很像喜欢挨揍的斯加納列尔的妻子。”²⁶¹

五

中央洪达不能保卫祖国，因为它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它既然意識到本身的軟弱、它的政权的不穩固和它的极其不得人心，那末除了采用不体面的詭計和微賤的陰謀以外，还能采取其他什么手段去克服將軍們在一切革命时代所共有的勾心斗角、互相妒忌和驕橫自負呢？既然洪达对自己的軍事指揮官經常怀有恐惧和猜疑的情緒，我們就沒有理由不相信威灵頓于 1809 年 9 月 1 日写給他的哥哥威尔斯里侯爵的話：

“就我对中央洪达的行动的观察，我开始担心它在使用自己的力量时，主要不是根据軍事防御和战斗行动，而是根据政治陰謀和微小的政治目的。”

在革命时期一切从屬关系都松弛了，只有使將軍們严格服从国民紀律才能恢复軍紀。正如中央洪达和它的不合理的体制从来无法使將軍服从自己一样，將軍也无法使兵士服从自己，因此直到战争結束，西班牙軍隊甚至还不能达到一般的紀律水平和服从水平。軍隊的紀律松懈現象又因經常缺乏粮食、被服和一切軍需物資而更加严重了，因为軍隊的士气，按拿破侖的說法，完全取决于它的物质条件。中央洪达不能按时給軍隊供应，因为可怜的金塔納的詩一般的宣言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而除了法令以外再采用强制手段，就意味着采用曾被中央洪达譴責过的各省所采用的最革命的措施。甚至宣布无人特殊和无人例外的普遍征兵制和准許一切西班牙人担任各級軍官，也是省洪达的功劳而不是中央洪

达的功劳。如果说西班牙军队的失败是由中央洪达的无能和反革命性造成的，那末这些灾难又转过来使政府更加沮丧，并使政府招致人民的鄙视和怀疑，从而使人民更加依赖骄横而又无能的军事首领。

西班牙的正规军虽然到处失败，还是到处都有。它被溃散了二十多次，却永远准备着迎击敌人，而且在失败以后往往以更大的力量出现。打它是没有用的，因为它很快就跑掉，人员伤亡很少，而丢失战场又不在于。当队伍溃退到山谷中的时候，他们坚定地相信，他们一定会重新集合起来，在得到新的增援之后，又会在出其不意的时刻出现，他们即使不能抵抗法国军队，至少也能使他们经常保持紧张，使他们耗尽力气。西班牙人比俄国人幸运，他们甚至不必死去以求死而复生。

1809年11月19日奥康尼亚附近的溃败是西班牙人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正规战；从这时以后他们就只进行游击战了。放弃正规战的事实本身就证明，全国政府中心在地方中心面前黯然失色了。在正规军的失败成为经常现象的时候，各地都出现了游击队，人民群众也不理会全国范围内的失败，而去赞赏自己的英雄在地方上的胜利。在这一点上，至少中央洪达有一种普遍的错觉，认为“日报”“对游击队的一个小战斗都比奥康尼亚会战报道得更详细。”

游击队抵抗拿破仑就像唐·吉珂德用矛枪抗议采用火药一样，只是成绩不同。

“奥地利军事杂志”（1821年第1期）说：“这些游击队真像是把自己的作战基地带在身边，每一次对他们作战都因作战目标不知去向而结束。”

游击战的历史应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整省整省的

居民拿起武器进行游击战，如加利西亚和阿斯土里亚。在第二个时期，被击潰的西班牙軍队的殘部、从法軍中开小差的西班牙人和走私者等等加入了游击队，他們根据自身的直接利益，不管任何外国势力，甘願冒險进行战斗。幸运的机会和情况的凑合經常使整个整个的区集合在他們的旗帜下。只要游击队是这样組織起来，他們整个說来并不显得可怕，但是对法国人仍然是非常危险的。他們为真正地武装人民奠定了基础。每当出現繳获战利品的机会或計劃好一次复杂行动的时候，人民群众中最积极和最勇敢的分子便出来参加游击队。游击队根据自己当前的任务，或者神速地扑向俘获对象，或者严陣以待。經常可以看到，他們整天窺伺着警戒的敌人，想要截获一个通訊兵或者夺取輜重。小米納就是这样抓到了約瑟夫·波拿巴任命的納瓦腊总督，而胡尔揚就是这样俘擄了罗德里哥城司令。战斗剛一結束，就各走各的路，武装的人們馬上向四方散走，参加战斗的农民鎮靜地回到自己平常的工作上去，“甚至他們不在都沒有被人发觉”。結果所有道路的交通都断絕了。敌人成千上万，但是不可能发现他們。派通訊兵出去沒有不落到敌人手中的，运送粮食沒有不被截获的，总之，法国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有几百只眼睛盯着。同时又不可能一下子打散这种組織形式。法国人不得不时刻准备着对付这些出沒无常的敌人，这些敌人看不見，又到处存在，因为每一个山头都是他們的掩蔽所。

德·普腊德神甫說：“把法国人弄得精疲力尽的不是会战，也不是小战，而是看不見的敌人的不断的小型攻击，这些敌人遭到追击就立刻在人民群众中消失，不久又以新的力量出現。寓言中被蚊子折磨得要死的獅子，就是法国軍队的真实写照。”

在第三个时期，游击队仿效了正規軍的方式，他們的队伍增加

到3 000—6 000人，失去了同全区的紧密联系，而落入几个利用游击队来达到个人目的的首領手里。游击队体制上的这些变化使得法国人在战斗中得到很大的好处。人数增长了队伍已經不能像以前那样神出鬼沒，現在游击队經常遭到意外的襲击，經常被打敗，被打散，而且在长时期內无力騷扰法軍。

把游击战的三个时期同西班牙的政治史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三个时期是同人民热情在具有反革命情緒的政府的抑制下所經歷的不同阶段相适应的。游击战是以全体居民群众的起义开始的，然后由依靠整个区的游击队的力量繼續进行，最后則导致非正規部队的形成，这些非正規部队或者淪为强盜匪帮，或者变成正規团队。

同最高政府失掉联系，紀律松懈，經常失敗，6年間骨干不断形成、解散而又形成，这一切情况必然使整个西班牙軍队具有御用軍的特性，并且同样地可以使它变成領导者手中的工具或鞭子。將軍們自己由于环境的关系或者参加中央政府，或者公开地、秘密地反对它，而且总是用武力来左右政治。例如，庫埃斯塔（似乎随着他在决定祖国命运的各次会战中的潰敗越多而越受到中央洪达的信任）就是靠与王政會議共同策划阴謀和拘捕洪达中的累翁代表起家的。中央洪达的成員摩尔拉將軍把馬德里棄給法軍以后，自己就投到波拿巴主义者的陣营中去了。无賴 Marques de las Romerías〔朝拜圣地侯爵〕也是中央洪达的成員，他同吹牛家弗朗西斯科·帕拉福克斯、恶棍蒙蒂霍以及兴風作浪的塞維尔洪达共同密謀反对中央洪达。卡斯坦尼約斯、布拉克、拉比斯巴（奥当奈尔家族中的一員）三位將軍輪流起着摄政的重要作用，并在議会的治理期間不断玩弄阴謀，最后，瓦倫西亚軍区司令官唐·哈維埃

尔·埃利奥干脆把西班牙交给了斐迪南七世去随意支配。毫无疑问，御用军的要素，在将军中比在他们的军队中表现明显得多。

另一方面，在战争期间游击队从基干军的优秀军官中得到了一部分像玻利埃尔、拉西、埃罗勒斯和维耳亚康帕这样的指挥官，正规军也从过去的游击队的领袖中得到了像米纳、恩佩西纳多等等这样的指挥官；因此军队和游击队又是西班牙社会的最革命的部分，因为他们来自一切阶层，包括来自没有受过中央政府的使人软化的影响的、摆脱了旧制度的桎梏的热情的勇往直前的爱国青年；这些青年中的一部分人如里埃哥等已经在法国当过几年俘虏。因此对于西班牙军队对后来运动中的事件所起的影响——无论是在它发起革命的时候或者是在它以自己的御用军特性损害革命的时候——我们都不必感到奇怪。

至于游击队，显然他们经过了多年流血斗争，养成了流浪的习惯，有强烈的仇恨心，好报复，爱劫掠，因而在和平时他们必然成为最危险的暴徒，随时准备以任何政党或任何原则的名义支持那些能够慷慨酬劳或提供抢劫机会的人。

六

1810年9月24日在累翁島召开了非常議會；1811年2月20日會議迁往加迪斯举行；1812年3月19日議會頒布了新宪法；1813年9月20日議會會議結束，距會議開幕已經3年了。

这屆議會是在历史上很少見的情况下召开的。从来沒有一个立法議會的代表是来自世界上这样不同的地区，从来沒有一个立法議會妄想控制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如此广大的領土，控制利益如此錯綜复杂的形形色色的居民；但是，整个西班牙几乎都被法軍占領着，实际上被敵軍切断了同全国的联系并被赶到一小块土地上去的議會，当时應該在包圍着它、圍困着它的軍隊面前來頒布法律。議會当时應該在累翁島上的遙远的角落为新西班牙奠定基础，就像他們的祖先过去在卡瓦丹加和索勃拉尔貝高山区所做的那样²⁶²。1812年的宪法，后来在維罗那會議上被全欧洲戴皇冠的人物痛斥为雅各宾主义的最煽惑人心的发明的这部宪法，正是僧侶的和专制的古老西班牙在似乎完全投入反对革命的神圣战争时期的产物，这个奇怪的现象如何解釋呢？这个宪法又突然不見了，它同波旁王朝的一个活的人物一接触就像怪影（西班牙历史学家說像 «sueño de sombra» [“梦幻”]）一样消失了，这个现象又該如何解釋呢？如果說这个宪法的产生是一个謎，那末它的死亡同样是一个謎。要想揭开这个謎，我們就要简单地考察一下西班牙人曾两次（最初是1820—1823年，以后是1836年）企图实施的这个

1812 年宪法。

1812 年宪法共有 384 条,包括以下 10 章:(1) 西班牙国家和西班牙人;(2) 西班牙領土、宗教、政府和西班牙公民;(3) 議會;(4) 国王;(5) 民事和刑事的法庭和司法部門;(6) 省和公社的内部管理;(7) 賦稅;(8) 国家武装力量;(9) 国民教育;(10) 宪法的遵行和修改宪法的程序。

宪法虽然根据以下原則:

“最高权力的体现者实质上是国民,因此制定根本法的特殊权力只属于国民”,

但是宪法又宣布分权制,根据这个分权制,“立法权同时属于議會和国王”,“执行法律权属于国王”,而

“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方面执行法律权完全属于司法机关,在任何情况下,无论議會或国王都无权行使司法职能,无权干涉待判决的案件,或命令重判已经确定的判决”。

国民代表的选举以人口为基础,每 7 万居民选 1 名代表。議會由一院即众議院組成,議員由普选产生。全体西班牙人除了家僕、破产者和罪犯以外,都享有选举权。1830 年以后,不会閱讀书写的公民不得享受选举权。但是选举的程序是間接的,因为选举分三級:教区、区、省。議員沒有一定的財產限制。誠然,根据第九十二条,“当选为議員必須具有从私人不动产中取得的一定的收入”,但是第九十三条把第九十二条的实行日期推迟到議会在将来的會議上宣布这一条开始实行的时候。国王沒有解散議會和推迟議會会期的权利;議會每年于 3 月 1 日在首都开会,不需要召集,會議至少連續开 3 个月。

議會每两年选举一次,任何議員不得連續在两屆議會中連任,

也就是說只有間隔两年后才能再度当选为議員。議員不得請求并接受国王的奖金、津貼和荣誉称号。国务大臣、樞密官和一切宮廷官員不能当选为議員。担任政府职务的国家官員不能被他执行职务所在的省选为議員。为了抵补議員的开支，各省应当按照本屆議会在任期的第二年为下屆議員規定的数目支付議員出差費。議會不得在国王在場时进行辯論。如果大臣代表国王要向議會傳達某种意見，他們可以在辯論期間在議會认为适当的时候并以議會认为适当的方式到場，还可以参加辯論，但举行表决时不得在場。国王、阿斯土里亚亲王和摄政者都必須在議會面前宣誓遵守宪法，議會决定王位继承制度方面可能产生的一切实际上和法律上的問題，必要时还确定摄政者。一切有关攻守同盟、援外补助金和通商的条約，在批准前都要經議會同意，議會可以准許或禁止外国軍隊进入王国境內，議會明令設置或撤銷宪法所規定的司法机关中的职务，以及設置或撤銷国家官职；議會每年根据国王的建議确定平时和战时陆海軍的員額；向陆軍、海軍和国民軍的一切部門发布命令；确定国家管理費用，按年确定賦稅，必要时可以举借國債，决定一切有关貨幣和度量衡的問題；規定国民教育的总計劃，保障出版的政治自由，采取措施监督大臣切实尽职等等。国王只有中止否決权，他可以在前后两次議會會議期間行使这种否決权，但是如果同一法案被下一年的議會第三次提出并且通过，那末就等于得到了国王的同意，而国王也必須同意。每次會議結束前，議會任命7人組成常設委員會，常設委員會在議會下一次會議召开以前在首都进行工作，有监督是否严格遵守宪法和执行法律的全权；常設委員會应向議会的下一次會議报告一切被发现的違法事件，在紧急时期有权召开議会的非常會議。国王沒有得到議会的同意不得离

开国家。国王結婚也要得到議会的許可。王室的每年收入总額由議會規定。

樞密院是国王下面的唯一的私人會議，大臣不得参加，樞密院共有 40 名成員，其中有 4 名僧侶代表，4 名西班牙大貴族，其他是重要的行政官員，同时，这些人全部都是国王从議會提出的 120 人名单中挑选出来的；但是任何一个議員都不能担任樞密官，任何一个樞密官都不能接受国王給的职务、荣誉称号或任命。沒有最高法院認可的理由不能解除樞密官的职务。議會規定樞密官的薪俸。国王在一切重要問題上必須听取樞密官的意見，教会职务和司法职务的人选由樞密官提名。撤銷司法部門中一切旧的 consejos [法院]，建立新的司法机构，成立最高法院以审理被控的大臣和处理一切有关樞密官、法官等的免职和停职的案件。任何案件沒有預先证实已經經過調解都不得审理。廢除刑訊、强迫罰款和沒收财产。除軍事法庭和宗教法庭以外，撤銷一切特別法庭，但对軍事法庭和宗教法庭的判決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訴。

为了进行城市和公社的内部管理(凡是沒有公社的地方，应由至少拥有 1 000 人口的区組成公社)，成立由警察局长(corregidor)担任主席并由一名或几名执政官、市政官和参事官組成的地方自治机关，同时这些人員全部由普选产生。任何一个由国王任命的国家官員都不能被选为执政官、市政官或参事官。市政职务是社会义务，沒有正当理由任何人也不能加以摆脱。市政机关在省代表团的监督下执行自己的职务。

各省政务由国王任命的省长(jefe politico)进行。省长同代表团是結合在一起的，他担任代表团的主席，代表团由各区在普选应届議會时选出。省代表团由 7 名委員組成，有 1 名議會支薪的

秘书协助他們。代表团每年会期不得超过 90 天。按照代表团的权力和职责的性质来看，它們相当于議会的常設委员会。地方自治机关和省代表团的全体成員在就职时都要宣誓忠于宪法。至于納稅，全体西班牙人毫无例外地都要根据自己的財產按比例地納稅，以应国家开支。除港口和边境外，一切稅关都撤銷。所有西班牙人毫无例外都要服兵役，并且除正規軍外，各省还根据人口和条件由各省居民組成国民軍。最后，1812 年宪法从生效之日起 8 年内甚至在細节上都不得更改、增添或修正。

議会在編制这一幅西班牙国家的新藍图时，自然了解到，这部最现代的政治宪法同旧的社会制度是完全不相容的，因此，議会公布了一整套从根本上改造市民社会的法令。例如，議会廢除了宗教裁判所，取消了封建主司法权和一切与之有关的独占、禁止和剝夺的封建特权，例如：狩猎权、捕魚权、森林和磨房的使用权等等，只有当初通过购买而取得的以及可以贖回的权利例外。議会廢除了全国的什一稅，停止任命一切与执行神职无关的教会职务，采取了步驟来取消寺院和沒收寺院土地。

議会曾打算把西班牙的广大荒地、王室領地和公社土地变为私有財產：出賣这些土地的一半以清償國債，把另一部分分成小块分給参加过独立战争的退伍軍人作为爱国酬金，第三部分也是分成小块无偿地分給那些渴望得到土地但又无力购买土地的貧农。議会准許在牧場和其他土地上圍籬(以前是禁止这样做的)。它廢除了禁止把牧場变成耕地、把耕地变为牧場的不合理的法律，普遍地使农业摆脱了以往专橫的不合理的規章。議会廢除了一切有关租佃契約的封建法律，也包括这样一条法律：有长子继承权的继承者可以不承认前輩所訂立的租佃契約，因为契約在承諾者死去后

就被认为失效了。它取消了所謂 voto de Santiago〔圣地亚哥的禱礼〕，一种古老的貢稅，就是由某些省的农民貢納一定数量的上等粮食和上等酒，主要是用来供养大主教和圣地亚哥神甫会。議會頒布了实施高額累進稅的法令，如此等等。

保住对已經开始起义的美洲殖民地的統治是議會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議會承认美洲和欧洲的西班牙人在政治上完全平等，宣布沒有任何例外的大赦，頒布了反对压迫美洲和亚洲土人的命令，廢除了所謂 mitas, repartimientos²⁶³ 等等，取消了水銀壟斷权，并且在欧洲第一个廢除了奴隶販賣。

1812年宪法遭到各方面的攻击。有一些人，例如斐迪南七世本人（見他1814年5月4日的敕令），責备宪法是由一批不顾西班牙的历史傳統的幻想家移植到西班牙土地上来的1791年的法国宪法²⁶⁴的分毫不差的复制品。另一些人，例如德·普腊德神甫在“現代的西班牙革命”²⁶⁵一书中，认为議會毫无必要地死抓住从西班牙古法典²⁶⁶抄来的、屬於国王权力受到大貴族的非常特权限制的那一封建时代的陈旧条文。

实际情况是：1812年宪法是翻版的古法典，但这是按法国革命的精神理解的、适合于現代社会的需要的古法典。例如起义的权利一般认为是1793年雅各宾党的宪法²⁶⁷的最大胆的創造之一，其实起义权在索勃拉尔貝的古法典中就出現了，那里起义权叫 Privilegio de la Union〔結社权〕。这种权利在加斯梯里亚的古宪法中也有。根据索勃拉尔貝法典，国王沒有事先得到議会的同意，不得宣战，不得締結和約或同盟条約。应当在立法議會休会期間监督严格遵守宪法的7人組成的議會常設委員會，在阿腊貢早就有了，在王国各主要議會联合成一个議會时在加斯梯里亚也建立

过。直到法国人入侵的时候，在納瓦腊王国还有类似的委员会。至于成立由国王从議會提出的 120 人名单中确定人选并由議會支薪的樞密院，那末这个 1812 年宪法的特殊产物是宪法的制訂者在回忆西班牙君主国各个时代的宫廷权奸的致命影响的过程中想到的。樞密院按照設想是宫廷权奸的代替品。此外，过去也存在过类似的机关。例如在斐迪南四世时代，总有加斯梯里亚各城市指派的 12 名代表在国王身边担任樞密官，而在 1419 年，城市代表抱怨說，他們的全权代表不再被准許参加王政會議了。高級官員和宫廷官員不得参加議會以及議員不得接受国王的荣誉称号或者职务，初看起来似乎是从 1791 年宪法抄襲来的，并且似乎是从 1812 年宪法所承认的現代分权制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实际上我們不仅在加斯梯里亚古宪法中見過类似的先例，而且我們知道，起义的人民不止一次地打死过那些接受国王的称号和职务的議員。至于議会在国王年幼时指定摄政的权利，加斯梯里亚的古議会在十四世紀长期有未成年国王在位的时期就經常行使。

誠然，加迪斯議會取消了一向屬於国王的召开和解散議會以及推迟議會会期的权力，但是竭力扩大自己特权的国王正是使用了这些手段，結果使議會实际上等于不存在，取消国王的这种权力的必要性就十分明显了。以上举出的事实足以证明，1812 年宪法的最明显的特点——竭力限制王权的傾向（这种傾向完全是正确的，因为戈多伊的可鄙的专制使人記憶犹新，一想到它就令人厌恶），是淵源于西班牙的古法典。加迪斯議會不过把这一监督权从特权等級的手中轉到国民代表机关的手中。古法典如何使西班牙国王恐惧，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来：当 1805 年需要新編一部西班牙法律全书时，国王发出一道敕令，命令删除前一版本中所包含的

以及由于君主国軟弱而国王不得不同自己的諸侯訂立損害国王主权的協議的那一时代所保留的一切封建权利的遺迹。

假如由普选产生議員是新事物，那末不應該忘記：1812年議會和所有的洪达都是由普选产生的；因而限制普选就是侵犯人民已經爭得的权利；最后，也不應該忘記，在西班牙几乎所有不动产都受到“死手”权限制的时代，实行財產資格上的限制，实际上就会剝夺大部分居民的选举权。

把人民代表集中在一个单一的議院中，絕對不是像好嘮叨的英国托利党人所要证明的那样，是1791年法国宪法的翻版。我們的讀者已經知道，从查理一世（德皇查理五世）的时候起，貴族和僧侶就失掉了他們在加斯梯里亚議會中的席位。但是甚至在議會分为代表不同等級的 *brazas*（支派）的时期，議會除了席位不同也是在一个共同會場里开会，而且在一起表决。在直到法国入侵时議會还在起实际作用的少数几个省份中間，誠然納瓦腊还保持着按等級召开議会的旧习惯，但是在巴斯克各省就是十分民主的會議，連僧侶代表也不准参加。而且，即使僧侶和貴族还保持自己的可憎的特权，他們也早已不是作为古議会的結構的基础的那种独立政治团体了。

加迪斯議會規定把司法权同行政权分开，这早在十八世紀就是西班牙最开明的国家活动家所要求的；由于对王政會議的共同憎恨，人們从革命一开始就了解到，必須把司法机关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

宪法中有关地方自治的一章，正像我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純粹是西班牙的产物。議會只是恢复了旧的地方自治的制度，但是消除了它的中世紀的特点。至于說到省代表团（它在

省的內部管理方面具有像地方自治机关在市政管理方面那样的权力)，議會是仿照法国入侵时期在納瓦腊、比斯开和阿斯土里亚还存在着类似机关而設立的。議會廢除免服兵役权，不过是承认了独立战争时期已經普遍流行的慣例。廢除宗教裁判所同样不过是認可了既成事实，因为宗教裁判法庭虽然由中央洪达恢复了，但是它不敢恢复自己的职权，而法庭的成員在識时务地等待更好的时机，薪俸到手也就心滿意足了。至于取締封建性弊端，議會甚至連霍韦利亚諾斯于 1795 年代表馬德里經濟协会向王政會議提出的著名的报告书中所主張的改革都沒有完全做到。

十八世紀末开明专制政府的大臣弗洛里达布朗卡和康波曼內斯早在这方面采取了某些步驟。此外也不應該忘記，与議會同时活动的，还有馬德里的法国政府，它在所有被拿破侖軍隊占領的省份里彻底消灭了一切寺院的和封建的机构，建立了現代管理制度。波拿巴派的报纸把起义完全說成是英国利用僧侶和宗教裁判所的支持而进行的陰謀和收买的結果。同外国政府抗衡对議會的決議起了怎样的良好影响，可以从以下一点看出来：甚至中央洪达在 1809 年 9 月宣布召开議会的法令中也对西班牙人这样說：

“誹謗我們的人硬說我們在維護腐敗政府的积弊和根深蒂固的恶习。你們要讓他們看到，你們是在为祖国的幸福和独立而斗争，从現在起，你們不願意再听命于独夫的专橫和任性了”等等。

另一方面，在 1812 年宪法中，我們可以看出十八世紀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教权派橫行时期的黑暗傳統实行妥协的明显迹象。只要引证第十二条就够了。根据这一条

“西班牙国家的宗教現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天主教的、圣徒的和羅馬教的教，即唯一的真正的宗教。西班牙国家以英明的、公正的法律保护它，禁止信

奉其他任何宗教”。

第一七三条要求国王在即位时向議會作如下的宣誓：

“叨蒙上帝恩澤并根据西班牙君主国的宪法而为西班牙的国王，我，凭着万能的主和神圣的福音书起誓，我将保卫和維護天主教的、羅馬教的和圣徒的教，而絕不容許在西班牙王国有其他任何宗教。”

这样，根据对 1812 年宪法的比較詳細的分析，我們就得出以下結論：1812 年宪法絕對不是 1791 年法国宪法的盲从的摹仿，而是西班牙精神生活的独特的产物，它恢复了古老的民族的制度，进行了十八世紀最著名的作家和国家活动家大声疾呼地要求的改革，并且对人民的偏見作了必要的让步。

七

許多情况促使西班牙最进步的人士在加迪斯会合。当举行选举的时候，运动还没有平静下来，而由于中央洪达不得人心，选民都把視線轉向中央洪达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有很大一部分是民族的革命少数派。出席議會第一次會議的几乎都是卡塔卢尼亚和加利西亚这两个最民主的省份的代表，因为累翁、瓦倫西亚、木尔西亚和巴利阿里群島的代表至少要在3个月以后才能到达。在最反动的內地各省，除了个别例外，不准进行議會选举。在旧西班牙的各个王国、城市和小鎮，法国軍隊不准举行选举，而在新西班牙的海外各省，議員又不能及时来到，因此就从許多为了躲避战争而逃难到加迪斯的人中間，从許多南美商人、西班牙殖民地的土人以及由于好奇和办理私事来到这个城市的人們中間，补选了一些人作为上述地方的代表。这样一来，这些地方的代表就是一些要比在当地举行选举所能选出的代表更傾向革新，更富有十八世紀思想的人。最后，議会在加迪斯召开这一情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个城市早就以西班牙王国中最激进的城市著称，它与其說像西班牙城市，不如說像美国城市。本地居民挤滿了議會大厅的走廊，每当反动派的反对立場表現得太可恶的时候，他們就从外面施加道义上的影响和压力，加以抑制。

如果认为議會的大多数都是拥护改革的人，那毕竟是非常錯誤的。議會分为三派：奴才派、自由派（这些派別的名称已从西班牙

牙傳到了整个欧洲)和“美洲派”²⁶⁸;美洲派依自己的最狹隘的利益为轉移,有时同这一派一起投票,有时同那一派一起投票。奴才派人数最多,但是酷爱自由主义少数派的积极、奋发和热情。占奴才派多数的僧侶代表随时准备牺牲国王的特权,一則由于他們沒有忘記教会同国家对立,一則也是想猎取声望,从而保住本階級的特权和权利。在辯論普选权、一院制、取消财产資格限制和中止否决权等問題时,教会派每次都是联合自由派中最民主的部分来反对英国宪法的拥护者。教会派的成員之一康涅多神甫,即后来的布尔果斯大主教和无情压迫自由派的人物,对蒙尼奥斯·托雷罗先生(也是神甫,不过是自由派的成員)說了以下的話:

“您容許国王保持极大的权力,但是您身为僧侶,就必須維護教会的利益,而不是維護国王的利益。”

自由派不得不同教会派妥协,这一点我們在 1812 年宪法的某些条款中已經看到了。当討論出版自由的时候,神甫們宣称出版自由是“違反宗教”的。經過热烈辯論并宣布任何人都无权不經特別許可而公开表示自己的信念的原則以后,議會一致通过了加有“政治的”一詞的修正案,結果这项自由被削去一半,同时一切有关宗教問題的作品根据特里延特會議²⁶⁹的决定仍旧由教会檢查。1813 年 8 月 18 日,在通过了惩办一切謀叛宪法的人的法令后,又通过一項法令,宣布任何旨在迫使西班牙民族放棄羅馬天主教的陰謀活动将被看做叛国行为而处死刑。在 voto de Santiago〔圣地亚哥的禱礼〕被取消后,又通过了一項宣布圣泰莉莎-德-赫苏为西班牙的庇护女神的決議作为弥补。此外,自由派只是在宪法頒布以后,才注意到提出和通过关于廢除宗教裁判所、什一稅、寺院等的法令。但是正是从这时起議會內的奴才派和議會外的僧侶的反

对立場，已經变得不可抑制了。

在了解了决定 1812 年宪法的产生和特点的情况以后，我們現在應該来揭开这个謎：为什么斐迪南七世一回来，宪法就不經反抗而突然銷声匿迹了。世界上很少見到这样可耻的景象。1814 年 4 月 16 日斐迪南来到瓦倫西亚，

“欢騰的人們把他們自己套在他的馬車上，用各种言語和动作表示自己情願戴上旧的枷鎖。他們高呼：‘国王的絕對权力万岁！打倒宪法！’”

所有大城市的所謂大廣場，在革命时期都改名为宪法廣場；同时把这些字刻在石碑上。在瓦倫西亚，这块石碑被換上一块“临时的”木牌，上面写着斐迪南七世王家廣場等字样。在塞維尔，群众罢免了全部政权代表，而推选其他人担任旧政权所設的职务以代替他們，并且要求新的当局恢复宗教裁判所。从阿兰惠斯到馬德里，斐迪南的車子都是被人民拉着走。当国王下車的时候，群众把他举起来，得意洋洋地让聚集在王宮前面的广大人群看，然后把他抬进王宮。在馬德里議會大厦的大門頂上，原来有“自由”两个大銅字；群众急忙向大厦跑去，要挖掉这两个字；他們拉来了梯子，动手把字从壁上挖下来，并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把它們一个一个地扔到街头。接着群众又把大量的議會記錄、自由派的报纸和小册子集中起来，同时他們排成游行队伍，以宗教团体、黑衣僧和白衣僧为前导；所有这些文件都堆在市內一个廣場上焚化，作为对政治上異端邪說的火刑，以后大家作禱告唱《Te Deum》〔“贊美我主”〕作为教会取得胜利的感恩表示。但是，应当承认，也許比城市平民（他們一部分是被收买的，而且像那不勒斯的拉查罗尼²⁷⁰一样宁願接受国王和僧侶的堂皇的統治，而不願接受資產階級的朴素的制度）的这些无耻示威更重要的事情是，奴才派在第二次普选中取

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早在1813年9月20日制宪議會就改为普通議會，并于1814年1月15日将会址从加迪斯迁往馬德里。

在前几篇文章中我們表明了革命派自己怎样唤起并加强了人民的旧有偏見，企图利用这些偏見作为反对拿破侖的武器。以后我們又看到，中央洪达怎样在唯一能把社会改造和保卫民族的措施結合起来的时期，竭力阻止二者結合，并压制各省的革命願望。加迪斯議會的情况則相反，它在自己的存在期間有很长一段时期同西班牙失掉了一切联系，在法国軍隊离开以前，甚至不可能使自己的宪法和带根本性的法令让人民知道。議会的出現可以說是 *post factum* [事后] 了。它发现社会处于疲憊、衰竭、虛弱的状态，——这是完全在西班牙領土上进行的曠日持久的战争的自然結果。在这个战争中，軍隊老是在运动，今天的政府很少能維持到明天，而在整个西班牙，从加迪斯到潘普洛納，从格拉納达到薩拉芒卡，几乎6年沒有停止流血。决不能期望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对任何政治宪法的抽象的优点特別敏感。但是当1812年宪法第一次在馬德里和其他法軍撤出的省份公布的时候，人民群众毕竟还是“欢欣鼓舞”地欢迎了它，因为人民群众总是希望只要更换一下政府他們就可以一下子摆脱社会灾难。一旦发现宪法并没有这种神奇的力量，迫切的期望也就变成了失望，而这些热情的南方人从失望到仇恨只不过一步之隔。

此外还有一些局部情况特別使人民对立宪制度失去好感。議會頒布了懲办 *affrancesados* [亲法派] 即 *josephites* [約瑟夫派]^① 的严厉的法令。議會采取这一措施一部分是迫于人民群众和反动派

① 即約瑟夫·波拿巴的拥护者。——編者注

(后者当他們逼出来的法令刚一实行，就立刻轉过来反对議會) 渴望复仇的压力。当时一万多个家庭因此被放逐。一大批小霸主急忙地进到法軍撤出的各省，在那里建立起他們的专橫政权，开始用偵查、起訴、逮捕、宗教裁判法庭等手段来对付每一个由于同法国人来往而名誉敗坏，接受法国人的职务和向法国人购买国家財產等等的人。摄政者不是想方設法使法国制度易于过渡到民族制度，而是竭力制造困难，挑起在这种政权变化时必然产生的激动情緒。但是为什么摄政者这样做呢？为的是制造口实要求議會停止实行 1812 年宪法，他們說这部宪法起了极其有害的作用。我們要 en passant [順便] 指出，所有摄政，这些議會任命的最高行政机关，往往都是議會和議會宪法的最坚决的敌人。产生这个奇怪事实的原因很簡單：在任命行政机关的时候，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代表总是同奴才派联合起来，因为他們认为削弱这个机关是美洲殖民地脱离宗主国而赢得独立的必要条件。他們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光有行政机关和主权議會之間的一般的意見分歧是不够的。議會对地租以及对工商业收入实行单一直接稅也在人民中引起很大的不滿。引起更大不滿的是禁止約瑟夫·波拿巴时代鑄造的一切西班牙硬币流通和持有者必須兌換国币的不合理法令；同时禁止法国貨幣流通，并公布了法国貨幣兌換国币的汇率。由于这一汇率同 1808 年法国人規定的法国貨幣和西班牙貨幣的汇率相差太大，許多人蒙受了很大的物质損失。这项不合理的措施也刺激已經高漲的生活必需品价格更加上漲。

对推翻 1812 年宪法和恢复旧制度最关切的階級——大貴族、僧侶、修道士和法官——不放过机会把当时人民的憤慨情緒(这是因为不滿西班牙实行立宪制度所造成的不幸局面) 推向頂点。这

就是为什么奴才派在 1813 年普选中取得胜利的原因。

国王預料只有軍隊会有某些严重的反抗，但是埃利奧將軍和他的軍官違背了他們对宪法所作的誓言，在瓦倫西亚宣布斐迪南七世为国王而一字不提宪法。其他軍事指揮官很快就效法了埃利奧的榜样。

斐迪南七世在 1814 年 5 月 4 日的敕令中宣布解散馬德里議會，并廢止 1812 年宪法，同时他声明自己非常厌恶专制政体，答应按照旧的合法的形式召开議會，規定出版的合理自由，等等。他履行諾言采用的是西班牙人民接待他所应得的唯一方法：他廢除了議會的一切法令，恢复了过去的一切制度，恢复了神圣的宗教裁判所，号召被他祖父赶走的耶穌会教徒回来，判处洪达和議會的最著名的成員和他們的拥护者到战船上做苦工、去非洲監獄或者被驅逐出西班牙，而且下令枪决最著名的游击队領袖玻利埃尔和德·拉西。

八

1819 年間，在加迪斯近郊集中了一支远征軍，它的使命是为西班牙重新征服起义的美洲殖民地。西班牙現任大臣列奥波多·奥当奈尔的叔父恩利克·奥当奈尔——拉比斯巴伯爵被任命为指揮。过去几次对西班牙美洲的远征，由于从 1814 年以来曾葬送了 14 000 人，并且是以最齷齪、最殘忍的方式进行的，曾引起軍队的极端反感，而且常常被看做是除去不滿部队的巧妙手段。有一些軍官如基罗加、洛佩斯·巴尼約斯、圣米格尔（当前西班牙的拉斐德）、奥达利和阿尔科·阿古埃罗等便决定利用兵士的不滿情緒，摆脱专制的桎梏并宣布 1812 年宪法。密謀曾透露給拉比斯巴，他答应領導这个运动。密謀的首領們和他共同約定 1819 年 7 月 9 日举行远征軍的总檢閱，在这个时候发动一次决定性的突击。拉比斯巴真的出席檢閱了，但是他沒有履行諾言，反而下令将参加密謀的部队解除武装，逮捕了基罗加和其他首領并派信使給馬德里送报告，夸說他防止了一場最惊人的灾难。于是他升了官并获得了勳章，但是后来当宮廷得到事件的更确切的情报时，他被撤了指揮官的职务，并得到命令要他回首都。此人正是那位在 1814 年国王回到西班牙时派自己的參謀带着两封信去見斐迪南的拉比斯巴。他当时距离国王太远，无法观察到国王的动向以使自己的行动同国王一致，因此，拉比斯巴在一封信中从假定国王会宣誓效忠 1812 年宪法出发，把这部宪法大事頌揚一番。相反地，在第二封

信中他把立宪制度描繪成一种无政府的混乱不堪的制度，他支持斐迪南廢除这个制度的打算，并表示他和他的军队願意为反对叛乱分子、煽动分子以及王权和宗教的敌人而斗争。軍官递上了第二封信，波旁王朝欣然接受了。

尽管在远征軍中已經显露出暴动的征兆，以当时的內閣首相兼外交大臣圣費南多公爵为首的馬德里政府，仍然执意保持一种莫名其妙的冷漠态度和无所作为的态度，不采取任何措施来加速远征或者把军队分散到各港口城市去。然而，当时駐扎在拉斯-卡貝薩斯-德-圣璜的第二阿斯土里亚营的指揮官唐·拉斐尔·德里埃哥同監獄里逃出的基罗加、圣米格尔和累翁島上的其他軍事长官双方約好同时开始革命行动。里埃哥的处境是最困难的。拉斯-卡貝薩斯这个小鎮三面紧靠着远征軍的大本营：在烏特雷腊有騎兵，在累夫里哈有第二步兵师，而在阿尔科斯有一个偵察营，总司令和司令部也在这里。尽管阿尔科斯的那个营在人数上比阿斯土里亚营多一倍，里埃哥仍然在 1820 年 1 月 1 日出其不意地举行了襲击而逮捕了总司令及其司令部人員。当天，里埃哥就在这个小鎮宣布了 1812 年的宪法，推举了临时鎮长，他不滿足于完成他所担負的任务，还把偵察兵爭取到了自己方面来，而且出其不意地襲击了在博尔諾斯的阿腊貢营，从博尔諾斯进击赫雷斯，又从这里进击圣瑪丽亚港，每到一处都宣布了宪法，直到他打到累翁島（1 月 7 日）为止，在累翁島，他把战俘收容在圣彼得堡垒。基罗加和他的拥护者沒有按照事先約定用同样出其不意的襲击夺取苏阿索桥和累翁島，而若无其事地一直等到 1 月 2 日里埃哥的使者奧尔特腊給他們送来关于攻克阿尔科斯和俘获司令部人員的正式情报。

由基罗加担任总指挥的革命军的全部兵力不过5000人，它在进攻加迪斯城門受挫后，就被圍困在累翁島上了。

圣米格尔說：“我們的处境是異乎寻常的；革命25天来毫无进展，沒有喪失也沒有贏得一寸土地，它成了政治上最奇特的現象之一。”²⁷¹

各省似乎都处于昏睡之中。1月就是这样过去了。1月底，里埃哥担心累翁島上的革命火焰似乎会熄灭，于是不顾基罗加和其他首領的劝告，組織了一支1500人的机动纵队，一直在比它强大十倍的军队的追击下在安达魯西亚活动；并且在阿耳黑西腊斯、龙达、馬拉加、哥多瓦和其他城市宣布了宪法；所到之处，居民都亲切欢迎他，但是任何地方他都沒有能够促成重大的起义。可是，追击他的军队化了整整一个月的時間，在毫无結果地来回行軍，看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避免同他的小股军队接触。政府军的行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里埃哥从1820年1月27日开始的远征在3月11日結束了，这时他被迫遣散了还跟着他的为数不多的一批人。他的小股部队的瓦解不是因为决战，而是因为疲憊、同敌人的頻繁的小冲突、疾病和开小差造成了損兵折将。同时，島上起义军的情况也极为不妙。他們一直受到海上和陆上的封鎖，而在加迪斯城里，每一个有利于他們的运动都被当地守軍鎮压下去了。3月11日，里埃哥在摩勒納山解散了他的曾为宪法而斗争的队伍，而3月9日，斐迪南七世在馬德里被迫宣誓效忠宪法，这样一来，里埃哥恰好在对自己的事业最后絕望两天之前真正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里埃哥纵队的进軍重新引起了人們的关心，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各省都滿怀希望，热切地注視着他的一举一动。人們的心被里埃哥的英勇、他的行动的神速和他对敌人的頑强抵抗所激动，

便认为他得到了胜利、援兵和人民大众的参加，实际上这些都不是事实。关于里埃哥进军的传说，传到最远的省份就更夸大了，于是这些距离举事地点最远的省份首先表示支持 1812 年宪法。西班牙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到就连假消息都足以引起革命的程度了。要知道，1848 年的大风暴也完全是假消息引起的。

在加利西亚、瓦伦西亚、萨拉哥沙、巴塞罗纳和潘普洛纳等地相继爆发了起义；恩利克·奥当奈尔，也就是被国王派去镇压里埃哥的拉比斯巴伯爵，不仅表示愿意去武装征讨里埃哥，而且表示要消灭他的小股军队，活捉里埃哥本人。他只请求任命他为拉曼彻驻军指挥官并供给他个人需要的钱。国王亲自交给他一小口袋金币和给拉曼彻驻军的相应的命令。但是，拉比斯巴一到达奥康尼亚就当军队的指挥官并宣布了 1812 年宪法。他倒向起义军的消息使马德里的舆论大为振奋，这里一得到这个消息，就立刻爆发了革命。于是，政府开始跟革命方面谈判。在 3 月 6 日的敕令中，国王提出召开 in Estamentos（按等级）组成的古议会，但是这道敕令任何人——旧君主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不满意。因为他从法国回国时也许过同样的诺言，但没有兑现。3 月 7 日夜間，马德里举行了革命的示威游行。“日报”在 3 月 8 日发表了斐迪南七世答应宣誓效忠 1812 年宪法的敕令。国王说：

“让我们全体，首先是我，真心诚意地走上宪法的道路。”

3 月 9 日，人民占领了王宫，国王只是在恢复了 1814 年的马德里地方自治机关并在它面前宣誓效忠宪法之后，才保全了自己。他毫不犹豫地作了假的誓言，因为他身旁永远有一个听受懺悔的神甫，准备彻底宽恕他的一切可能的罪孽。与此同时，成立了諮詢

洪达。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释放政治犯并号召政治流亡者回国。首届立宪内阁从监狱里出来(现在监狱都打开了)走向王宫。组成首届内阁的卡斯特罗、埃雷罗斯和奥·阿尔奎列斯等就是1814年的蒙难者和1822年的代表²⁷²。由于斐迪南的父亲查理四世退位而产生的高兴是在斐迪南即位时出现的热情的真正源泉,同样的,由于斐迪南七世被黜而引起的高兴是宣布1812年宪法时万民欢腾的源泉。至于宪法本身,正如我们知道的,当宪法刚拟定好,就已经没有可以宣布它的国土了。对大多数西班牙人民来说,宪法好像古代雅典人所崇拜的未知神一样。

目前,英国作家在直接影射当前的西班牙革命时,一方面断言1820年运动仅仅是一种军事阴谋,另一方面又断言它完全是俄国阴谋的产物。这两种说法都是同样荒谬的。关于军事暴动,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它遭到失败,革命却赢得了胜利。另外,应当揭开的谜并不在于5000名兵士的密谋,而在于这个密谋得到了拥有35000人的军队和拥有1200万人口的最忠厚的民族的拥护。革命所以从军队中开始,道理是非常简单的;要知道,在西班牙君主国的一切机构中,只有军队在独立战争中受到了根本的改造和革命的熏陶。至于说俄国的阴谋,不能否认,俄国曾经在西班牙革命中插过手。在所有欧洲国家当中,俄国第一个通过1812年7月20日在韦利基耶鲁基签订的条约²⁷³承认了1812年宪法,它第一个支持了1820年革命,第一个把革命出卖给斐迪南七世,第一个在半岛各地点燃反革命的火炬,第一个在欧洲面前郑重地对革命提出抗议,最后还迫使法国发动了对这次革命的武装干涉。当时俄国大使塔提舍夫先生无疑是马德里宫廷中最显赫的人物,是宫廷权奸的秘密首领。他把一个下流的恶棍安东尼奥·乌加尔特引

进了宫廷，并使他成为那些以斐迪南七世的名义在朋党密室中操纵王权的僧侣和侍从的头目。烏加尔特依靠塔提舍夫的帮助被任命为南美远征軍总指揮，圣費南多公爵又依靠烏加尔特的帮助被任命为內閣首相兼外交大臣。烏加尔特向俄国购买了一批破旧船只供远征南美之用，为此他获得一枚圣安娜勳章。危机刚开始时，烏加尔特阻撓斐迪南和他的弟弟唐·卡洛斯亲自到軍隊中去。他是圣費南多公爵采取莫名其妙的冷漠态度的幕后指使者，也是引起一位在巴黎的西班牙自由主义者于1836年作出如下评价²⁷⁴的那些措施的幕后策划者：

“人們很难摆脱这样的印象：政府本身已經成为推翻現存制度的原因。”

如果再加上美国总統在他的咨文中²⁷⁵贊揚俄国向他保证不容許西班牙干涉南美殖民地事务这一件怪事，那末俄国在西班牙革命中起的作用就沒有絲毫疑問了。然而，所有这些事实說明了什么呢？这些事实是否說明1820年革命是俄国挑起的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些事实只說明，俄国阻止了西班牙政府去抵抗革命。革命迟早必将推翻斐迪南七世的专制的教权的君主制度，这可以从下面得到证明：（1）从1814年起一个接着一个的密謀；（2）正統主义者向西班牙进軍时期，昂古列姆公爵手下的法国专員德·馬丁雅克先生的证詞；（3）另一个不容忽視的证詞——斐迪南七世本人的证詞。

1814年，米納打算在納瓦腊发动起义，曾經发出了第一个反抗的信号，号召拿起武器，并且打进了潘普洛納要塞，但是他不相信他自己的追隨者，逃到法国去了。1815年，独立战争时最光荣的游击英雄之一玻利埃尔將軍在拉科魯尼亚宣布了宪法。他被斬

首了。1816年，理查打算在馬德里以暴力逮捕国王。他被絞死了。1817年，律師納瓦罗因为宣布1812年的宪法而和4个同謀者在瓦倫西亚的断头台上牺牲了。同年，无畏的拉西將軍在馬利奧尔卡島以同样的罪名被枪决。1818年，維达尔上校、索拉上尉和其他一些在瓦倫西亚宣布宪法的人受尽拷打并被处死。累翁島上的密謀只不过是1808—1814年多少英雄好汉抛头顛洒热血而进行的連續不断的斗争的最后一曲罢了。

德·馬丁雅克先生在1832年，即死前不久发表的“西班牙及其革命”一书中說道：

“自从斐迪南七世恢复专制政权以来已經两年了，而由于人类渣滓所构成的权奸的作怪，剝夺人权的現象还繼續存在。整个国家机器完全顛倒过来：到处是漫无秩序，凋敝和混乱——捐稅十分不公平，財政状况非常糟糕，借債不讲信用，国家最急迫的需要无法滿足，軍隊沒有給养，法官收入依靠外快，腐敗无能的行政当局无力改善什么东西，甚至无力挽救什么东西。因此，人民怨声載道。新的立宪制度受到大城市、工商階級、自由职业者、軍隊和无产階級的热烈欢迎。表示反对它的只有僧侶，而农民对它莫名其妙。”²⁷⁶

这就是在破坏这个新制度上出过大力的人物之一的死前供状。斐迪南七世在1817年3月1日、4月11日、6月1日和1819年11月24日等敕令中完全证实了馬丁雅克先生的話，而且他这样来結束他的哀叹：

“响彻我們耳际的人民的怨声一浪高过一浪。”

这說明，用不着什么塔提舍夫去发动西班牙的革命。

卡·馬克思 西班牙的反动²⁷⁷

1854年9月1日星期五于倫敦

由于維卡耳瓦罗的軍隊進駐馬德里，政府的反革命活动更加囂張。被1842年补充法令的一切苛刻的規定裝飾起来的1837年出版法的恢复，絞杀了出版者无力支付規定的 cautionnement [保证金] 的那一部分“煽动性”报刊。8月24日，“街垒之声报”以«Ultimas Barricades» [“最后街垒”] 的标题出版了最后一号，因为該报的两个出版者被捕了。同一天，一家名为“議會报”的新的反动报纸代替了它。

这家报纸的发刊詞說：“軍事总督唐·圣米格尔閣下对我們的友誼使我們深感荣幸，他惠然表示願意为本报撰文。他的文章将用他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署名。本报领导人将努力保卫已战胜腐敗政权的弊端和暴政的革命，但是他們只在制宪議会的範圍內豎立自己的旗帜。只有这里才会进行一場大战。”

这里指的是为伊薩伯拉二世和埃斯帕特罗而打的大战。我們記得，就是这位圣米格尔，曾經在各报刊代表的宴会上說，报刊除了它自身、健全的理性和教育国民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准則，它是刀劍、苦役、流放以及世界上其他任何力量所不能消灭的机构。可是就在他表示願意为报刊撰文的那一天，他也沒有对剝夺他所

如此珍贵的出版自由的法令，說过一句反对的話。

在廢除出版自由之后，紧接着也是根据女王的敕令廢除了集会自由。馬德里的俱乐部被解散了，各省的洪达和公安委员会，除內閣承认为“代表团体”的以外，也一律被解散了。尽管几天前埃斯帕特罗接受过同盟俱乐部的名誉主席的名义，但根据內閣的法令它被封閉了，——这是倫敦“泰晤士报”妄想否认的事实。这个俱乐部曾經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見內务大臣，指責馬德里总督薩加斯蒂先生侵犯了出版自由和集会的权利，要求把他撤职。桑塔-克魯斯先生答复說，他不能指責一个国家官員采取了內閣所认可的措施。結果掀起了一場大風波；但是国民自卫軍占据了宪法广场，事情因而也平息下来。一些小报剛被查封，那些至今一直維護薩加斯蒂的大报就开始同他爭吵。为了堵住“人民呼声报”的嘴，就任命它的主編科拉第先生为大臣。但是这种做法并不圓滿，因为不能把所有的編輯都安插到內閣里去。

然而，反革命派的最大胆的做法是在內閣答应将克里斯蒂娜女王交由制宪議會会审理之后竟然允許她到里斯本去——这是他們企图在法庭判决之前用沒收克里斯蒂娜在西班牙的領地的办法来掩盖的一种背叛行为。大家知道，这些領地只是她的财产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样，克里斯蒂娜很便宜地逃走了，現在我們得知圣路易斯也安全地到达了貝云。在这件事情上最有趣的是作出上述决定所采取的方法。8月26日，一些爱国者和国民自卫軍人員集会討論如何保障社会的安宁，指責政府搖摆不定和敷衍搪塞，并且决定派代表团找內閣，要求把克里斯蒂娜赶出宮去，当时她正在宮中策划反对人民自由的陰謀。非常可疑的是，埃斯帕特罗的两个侍卫长和薩加斯蒂本人也支持这个提議。結果內閣召开了会

議，而會議的結果却是克里斯蒂娜悄悄地溜走了。

8月25日，女王由她的所謂丈夫和阿斯土里亞的親王陪同在普拉多^①散步時，第一次公開露面。但是看來人們對她是非常冷淡的。

受命起草薩爾托里烏斯內閣倒台時的財政狀況報告的委員會，在“日報”上發表了這個報告，而財政大臣科耳亞多先生的說明作了這一報告的前言。根據財政狀況的報告，西班牙現在負的債務相當於3300萬美元，赤字總額達5000萬美元。看來，甚至連政府的特別資金也提前使用了好幾年，而且已經用完了。哈瓦那和菲律賓的收入已經提前兩年半支用了。從強制公債收得的款項已經無影無蹤了。阿耳梅達的水銀礦已經提前抵押了多年。應當存放在金庫的現金餘款也光了。用於軍隊輪換的經費也沒有了。購進煙草應付而未付的款項達7485692雷阿耳。用於公共工程的5505000雷阿耳賬款也應當清付。按科耳亞多先生的聲明，必須立即償還的債務為252980253雷阿耳。他所提出的彌補這個虧空的辦法是道地的銀行家的辦法；他提出要恢復平靜和秩序，繼續徵收所有的舊稅和舉借新債。埃斯帕特羅聽從了這個意見，以答應嚴格奉行溫和派的政策為條件，從馬德里的主要銀行家手里得到了250萬美元。從他最近採取的措施來看，他是多么願意履行這個諾言。

不應當認為這些反動的措施完全沒有遭到人民的反抗。當8月28日人們知道克里斯蒂娜出走之後，街壘又築起來了；但是，如果法國“通報”刊載的從貝云來的電訊可靠，那末

^① 馬德里的街心花園。——編者注

“军队和国民自卫军一起冲击了街垒，并把运动镇压下去了”。

这就是早产的革命政府注定要走的 *cercle vicieux* [恶性循环]。这些政府承认它们以前的反革命政府所借的债务为国家债务。为了能够偿还这些债务，它们必须继续征收旧税和举借新债。为了能够举借新债，它们必须保证“秩序”，就是说必须亲自采取反革命的措施。这样，新的人民的政府就一变而为大资本家的奴僕和人民的压迫者。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正是这样，它为了偿付它欠资本家的利息，不得不征收恶名昭著的四十五生丁税和没收储蓄银行的存款^①。

“西班牙真相”一书的英国作者说：“西班牙革命政府至少还没有堕落到采取像美国所实行的声名狼藉的拒不偿付主义。”²⁷⁸

问题在于：如果先前任何一次西班牙革命哪怕有过一次拒绝偿付债务，声名狼藉的圣路易斯政府就会找不到任何一个银行家肯让它预支。我们这位作者也许是认为，借债是反革命的特权，而还债则是革命的特权。

看来，薩拉哥沙、瓦倫西亚和阿耳黑西腊斯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它们那里取消了使它们感到负担的一切捐税。

政府不以任命布腊沃·穆里洛为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而满足，还派岡薩勒斯·布腊沃赴維也納担任同样的职务。

8月27日，星期日，馬德里区召开了竞选大会，以便通过市民投票任命监督首都选举的代表。在馬德里有两个选举委员会——自由派联合会和商业联合会。

上述种种反动征象，在熟习西班牙历次革命历史的人看来，并

① 关于这两项措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5、27页。——译者注

不像肤淺的观察家看来那样可怕，因为西班牙革命总是从召开議會开始，而召开議會往往是解散政府的信号。另外，在馬德里只有少数軍隊，国民自卫軍也至多不过 2 万人，其中有武装的不到一半，而大家知道，人民并没有响应交出武器的号召。

尽管女王流泪，奥当奈尔还是解散了她的禁卫軍，因为正規軍嫉妒这个部队的特权：一个以擅长彈吉他和演奏 seguidillas graciosas y pycantes [优美而風趣的賽吉迪利亚舞曲] 見称的戈多伊从这个部队青云直上而成为国王的侄婿，一个仅以个人品质見称的蒙尼奧斯成了太后的丈夫。

在馬德里，共和派散发了如下的**伊比利安联邦共和国宪法**。

第一章 伊比利安联邦共和国的組織

第一条 西班牙和它的島屿同葡萄牙联合組成伊比利安联邦共和国；国旗的顏色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現用国旗結合而成；共和国口号将为自由、平等、博爱；

第二条 最高权力屬於全体公民；它是不可轉让和剥夺的；任何个人或任何集团均不得擅自加以行使；

第三条 法律是国民意志的表現；法官由人民普选任命；

第四条 凡年滿 21 岁的公民均享有选举权；

第五条 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死刑一律廢除；一切案件均应由陪审法庭审理；

第六条 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流亡者被沒收的地产，应予归还；

第七条 按收入比例征税；实行单一稅，即普遍直接稅；廢除一切間接稅、入市稅和消費稅；同样廢除政府对盐和烟草的专卖，廢除印花稅、营业執照捐和兵役捐；

第八条 保障出版、集会、結社的自由，住宅不受侵犯，保障受教育、經商和信仰的自由；每一宗教的教徒自己支付本教教士的薪俸；

第十三条 共和国的行政分为联邦、省、市三級。

第二章 联邦行政

第十四条 联邦行政由执行委员会执行，执行委员会由中央联邦会议任免；

第十五条 联邦行政的范围：国际关系和商务关系，保证度量衡和币制的统一，邮政，武装力量；

第十六条 中央联邦会议由各省选出 9 名代表组成，代表由普选产生，并受选民的指示的约束；

第十七条 中央联邦会议是常设机构；

第二十条 每当颁布一项法律时，认为此项法律必要的行政机关须将草案送交联邦审查：由中央联邦会议审查者须在 6 个月以前送交，由省立法机关审查者须在 3 个月以前送交；

第二十一条 人民代表，如不遵守他所接受的指示，即交付审判。

第三章是关于省和市的行政的，其中规定了同样的原则。这一章的末一条规定：

“不得再有殖民地，将殖民地改变为省，并依省的同一原则治理。奴隶制度应予废除。”

第四章 军队

第三十四条 武装全体人民，组成国民自卫军，其中一部分为别动队，一部分为地方国民军；

第三十五条 别动队由 21 岁至 35 岁的独身男子组成；其军官由军事学校学员中选拔；

第三十六条 地方国民军由 35 岁至 56 岁的全体公民组成；军官由选举任命；他们的任务是地方自卫；

第三十八条 炮兵部队和工程部队以志愿兵的方式征募，它们是常备部队，驻守沿海和边境的要塞；内地不得设置要塞；

第三十九条是有关海军的，包括类似的规定。

第四十条 撤銷各省的司令部和軍区；

第四十二条 伊比利安共和国擯棄一切征服性战争,并将爭端交給同爭執問題无利害关系的各国政府裁決；

第四十三条 不得設置常备軍。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9 月 1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54 年 9 月 16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185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署名: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
*馬志尼被捕的傳說。——
奧地利的強制公債。——西班牙。
——瓦拉几亞的狀況

1854年9月12日星期二于倫敦

報紙紛紛報道馬志尼在巴塞爾被捕的各種傳說。我從一位友人那里得到如下一個消息：馬志尼的確在蘇黎世被兩名憲兵逮捕了，但是僅過幾小時，他又逃掉了。幫助他逃跑的也是一個意大利人，他在同一個時間在另一個地方冒充馬志尼讓人抓起來了。當局被這個巧計弄得糊里糊塗，就連德律埃先生本人也從伯爾尼打電報到日內瓦，命令停止繼續搜捕，因為馬志尼已經被監押了。有人揣測代替馬志尼被捕的人可能是薩菲，但有人認為是一位名叫圖爾的匈牙利軍官。

8月31日的“米蘭報”滿意地指出，帕維亞市政委員會在8月28日的會議上決定認購20萬弗羅倫的國民公債。跟這個消息相反，一家非官方報紙發表了該委員會如下的決議本文：

“帕維亞市政委員會已經認購為帕維亞市規定的必須認購的數額，但它不作為市政委員會的代表，也不單純作為一個認購者，而只是作為從屬於行政權（它根據1830年通令必須無條件地服從行政權）的一個管理機構，並且為了執行總督8月7日給它的命令才認購的。”

在特雷維佐，自願公債也完全是在直接胁迫下认购的。从的里雅斯特委员会的通告中可以看出，甚至在这个对奥地利充满忠臣感情的城市里，对公債的认购既不是自願的，也不是十分普遍的，这种情形奥地利报纸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們市政委员会又认购了 100 万国民公債。市政委员会特此宣布：本数额将由至今毫未认购或认购额不符本人财产状况的人分摊。同时，规定 9 月 6 日为自願认购的最后限期。委员会希全体市民从速享受公債提供的利益，况且委员会在上述期限过后还将被迫采取强制手段。”

反动报刊对西班牙政府最近的措施仍然不满；它們抱怨又在跟革命妥协。例如，“政治和文学辯論日报”写道：

“埃斯帕特罗还在 8 月 7 日就宣称：‘按照馬德里人民的願望，里安薩雷斯公爵夫人不得离开首都，不管是白天或者夜間，或者采取任何一种秘密方式。’并且只是在 8 月 28 日，克里斯蒂娜女王在被捕 21 天之后才获准在大白天，甚至在較為盛大的仪式中离开了。然而，政府表现了如此的軟弱，竟然同时下令沒收她的财产。”

“辯論日报”現在希望撤銷这个命令。但是，該报的这次希望恐怕比它那次对波拿巴不要沒收奥尔良王族的财产²⁷⁹ 的微小希望更难实现。奥維耶多的总督已經将克里斯蒂娜在阿斯土里亚省的煤矿收归国家暂时管制。西罗、朗格雷奥和比埃罗-科里尔等地的矿場經理已經接到要他們呈递报告和行政方面隶属于政府的命令。

至于說到“大白天”，——按“辯論日报”的說法，克里斯蒂娜是在这样的時候离开的——那就說明这家报纸的消息非常不灵通。克里斯蒂娜女王离开她的住处后，在死一般寂靜中走过了走廊，因为曾經采取了一切措施不让任何人碰見她。駐扎在王宮院內的国民自卫軍也沒有怀疑她会离开。整个計劃制定得如此机密，就連

奉命护送女王的卡里哥也是在离开的时刻才接到命令。已经离开马德里 12 英里，才告诉护送队它的使命的性质，这时卡里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阻止住他的部下没有辱骂女王和立即返回马德里。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只是在蒙尼奥斯夫人离开两小时后才获悉所发生的事情。“西班牙报”断言克里斯蒂娜在 9 月 3 日上午到达了葡萄牙边境。这家报纸说，她一路上情绪很好，但她的公爵有点 triste [忧郁]。克里斯蒂娜和这位蒙尼奥斯的的关系只有想起唐·吉珂德对桑科·判扎的答话才能理解。桑科·判扎问唐·吉珂德，为什么他，唐·吉珂德，既然能够使公主为之倾倒，却要去爱达辛尼亚这样一个低贱的村妇。

尊敬的骑士回答说，有人问一位被一群高贵的、闊綽而又聰明的崇拜者包围的太太，为什么她挑了一个普通庄稼汉作她的情夫。这位太太回答说，要知道，我看上他，是因为他懂的哲学比亚里士多德懂的还多。^①

根据从“科伦日报”和“比利时独立报”上摘来的材料一般地可以看出反动报刊对西班牙形势的看法。前一家报纸写道：

“根据一位消息灵通而又可靠的记者，而且是奥当奈尔和温和派的拥护者的说法，形势是令人焦虑的，因为各派之间并未停止深刻的冲突。工人阶级在鼓动者的影响下处于不断激动的状态。”

“独立报”写道：

“西班牙君主制的未来正受到严重威胁。所有西班牙的真正爱国者都一致认为必须结束革命的狂热。诽谤者和街垒战士对埃斯帕特罗和他的政府的激愤，并不亚于对圣路易斯和银行家萨拉曼卡的激愤。但是，老实说，不能把这类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归罪于这个狭义的民族。不能把马德里的人民同喊叫‘处死克里斯蒂娜！’的无知之徒等量齐观，不能让他们对居民中间流

^① 见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第一部第二十五章。——编者注

傳的所謂‘圣路易斯、克里斯亭娜及其同謀者盜竊行為’的卑鄙的流言蜚語負責。1 800 个馬德里街垒和巴塞羅納的極端共產主義的示威游行暴露了外國民主主義在西班牙農神節里的作用。總之，不用懷疑，許多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流亡者參加了目前還激動着半島的令人遺憾的事件。不用懷疑，社會的烈火眼看就要在西班牙燃燒起來；它的直接後果將是喪失安的列斯的明珠，寶島古巴，因為西班牙將無力同美國人的陰謀或者任何一個索爾和桑德斯的愛國精神進行鬥爭。是西班牙恍然大悟的時候了，是文明歐洲的一切正派人們共同努力敲起警鐘的時候了。”

當馬德里政府 8 月 28 日違背了 8 月 7 日許下的諾言時，當它廢除集會自由並恢復要每個出版者交納 4 萬雷阿耳保證金和支付 300 雷阿耳直接稅的 1837 年出版法時，當然完全用不着外國民主主義出面來激起馬德里居民的憤怒。如果說各省還在繼續發生不確定的不堅決的騷動，那末，這除了說明還缺少一個革命運動的中心，還能說明什麼呢？自從所謂的革命政府落入埃斯帕特羅的手中之後，沒有出現過一個有利于各省的法令。各省都會看到，這個政府已被圣路易斯時代的那種阿諛、傾軋和爭名奪利的气氛包圍。圍着政府打轉的仍然是一幫走狗——從菲力浦時代²⁸⁰起就一直折磨着西班牙的禍患。

我們不妨看一看最近一號 9 月 6 日的馬德里“日報”。該報刊載了奧當奈爾的報告，報告中說，由於軍銜和爵位多如牛毛，每三個將軍中只能有一個擔任實際職務。將軍的這種生產過剩——真正的災難——從 1823 年起就是對西班牙的一種懲罰。本來期望會頒布一項法令消除這種災禍。但結果什麼也沒有。在這個報告後頒布的法令是成立一個咨詢性的軍事洪達，由政府任命一些目前不在軍隊中擔任任何職務的將軍們組成。這些先生們除了平常的薪俸之外，還應領到：中將是 5 000 雷阿耳，元帥是 6 000 雷阿

耳。曼努埃尔·德·拉·孔查将军被任命为这个领干薪的军事洪达的主席。同一号“日报”报道了又一次大发奖赏、退休金等等，似乎第一次的慷慨施舍还没有完成使命。圣米格尔和杜耳塞获得了查理三世大十字勋章；萨拉哥沙洪达拟定要奖的一切奖赏和奖章都得到确认和补充。但是，这一号“日报”的最出色的部分是宣布9月11日恢复对国债的偿还。如果西班牙人民对自己革命政府的这些成就还不感到心满意足，那就未免狂妄！

不久前从瓦拉几亚回来的旅行者报道了这个公国的极为艰难的状况。大家知道，多瑙河各公国为了偿付俄国1848年至1849年的占领费，已经负债1400万法郎。在最近一次占领期间，这笔款项由俄国将军们征收去了。俄国人是在把所有金库（教区的、修道院的和市政委员会的金库）抢掠一空之后才撤退的。他们用这些金库的现金偿付他们按合同从瓦拉几亚的土地占有者和农民那里得到的产品。但是对于一个农业国中关系十分重大的交通工具，对于木柴、煤炭和干草等等却根本不付钱，而是干脆征用。结果，多瑙河各公国的国库非常空虚，以致某些教区濒于破产。而且，许多被改作军医院的房屋和由于贵族害怕土耳其人抢劫而交由俄国人保存的大量财产还未算在内。

8月29日雅典来信说：

“国王继续拒绝付给土耳其任何赔款。对西方国家军队的仇恨日益增长，有些法国兵士已被人民打死。”

不妨向读者讲一讲关于希腊村社怎样由于英国的影响而解体、人们怎样把卡波第斯特里亚强加于它们以及全体希腊人民怎样被帕麦斯顿勋爵的鬼蜮伎俩弄得斗志沮丧的一段离奇古怪的历史。不列颠政府的真实意图甚至在目前它对希腊进行武装干涉的

时候，在英国对卡利尔吉斯將軍的支持中充分暴露出来了。卡利尔吉斯將軍同卡波第斯特里亚一样，在俄国出生、长大并且长期居住。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和不列颠政府终于盼到了他們蓄謀已久的事件——在土耳其境內，如果不是在其欧洲部分至少也在安那托里亚煽起暴动。我們已經从来自罗茲島的消息获悉，在該島对岸爆发了善战的土耳其山地部族崔別克人的暴动。“君士坦丁堡日报”8月20日报道說，这个地区的混乱状况日益发展。因为沒有正規軍隊，所以叛乱者不断从山上下来进行襲击，闖入村庄，征收什一稅，搶劫居民和商队，奸污妇女并且打死一切反抗他們的人。他們在馬斯特沙克省胡作非为得最厉害。省长被迫从艾頓逃到泰尔。德尼茲利已落入他們手中，而出发去向总督报告情况的伊斯兰教高僧薩希布-埃芬蒂被抓了，和他的同行者一起被砍了头。参加暴动的有成千上万的人。有人认为这种紊乱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把責难土耳其政府压迫土耳其人并屈从俄国的巴希布祖克从卡尔斯和巴雅澤特調回。

我們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欧洲，就可以看到在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多瑙河各公国、希腊和土耳其亚洲部分的革命的征兆；甚至在瓦尔那的法軍部队里，也响起了«A bas les singes!»〔“獼猴們滾蛋！”〕的号召。

卡·馬克思写于1854年9月12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54年9月30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4197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卡·馬克思

*联軍艦队的活动。——多瑙河
各公国的局勢。——西班牙。——
英国的对外貿易

1854年9月15日星期五于倫敦

昨天的“通报”登載了以下一則电訊：

“特拉皮亚9月7日訊。法軍和土軍已于9月5日由瓦尔那出发。英国艦队将在蛇島附近同他們会合。天气好极了。”

这第一批远征軍所以迟迟不能出发，是因为博斯普魯斯海峽出現强烈的風暴，这次風暴一直刮到8月27日。8月27日当东北風轉向的时候，运输船才离开君士坦丁堡进入黑海。蛇島(伊拉德-阿德西)是一个峭壁重叠的小島，它离貝薩拉比亚海岸不远，几乎正对着多瑙河口；方圓不过3英里。9月5日才出发的軍隊大概在9月9日以后才登陆。

在“通报”上一篇分析这次远征的前景的文章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話：

“通报”写道：“如果，如果克里木俄軍的数量比我們根据迄今得到的消息所能估計的要大得多；如果塞瓦斯托波尔的現有兵力能够进行持久防御；如果遇到秋季所产生的困难；最后，如果能够从俄国抽調大量援軍来支援克里木，那末，这一次我們就只好重新上船，等到春天再来进攻塞瓦斯托波尔了。”

簡單說來，如果這支“擁有大量的毀滅手段的强大艦隊”在途中碰到稍微严重的障碍，它就立即返回博斯普魯斯海峽。如果碰不到这些障碍，那末这无论如何不是联軍的过错，因为关于这次早已准备妥当却一直拖到有利季节的最后几天才举行的远征，早在好几个月前沙皇就知道了。至于水兵們是否信任自己的指挥官，这一点可以从“奥格斯堡报”上刊登的君士坦丁堡来信的下面这段话看出来：

“在艦隊中，人們通常都把圣阿尔諾称为弗洛里瓦尔——这是他在巴黎安比居剧院初次登台扮演一个滑稽演員时所用的假名。”

根据汉堡和哥本哈根的最后消息，有一部分法国軍艦和运兵船已經过貝耳特駛回法国。波拿巴派的“立宪主义者报”发表了有关博馬尔松德战斗的揭露材料：

“拿破侖第三皇帝陛下不希望取消对效忠于他的艦隊的奖励，这种奖励是艦隊在波罗的海經過这样长久而艰辛的航行之后所应得的。”

因而，博馬尔松德遭到炮击仅仅是为了供水兵們的娱乐和对軍官們的煩躁不安和渴望消遣的心情的让步。“通报”和“立宪主义者报”上的这两点簡短的暗示，比英国官方报纸的所有那些夸夸其談的社論更能揭示战争的性质。

根据沙皇的命令，所有参加修建博馬尔松德堡垒的工程师都被逮捕了。他們将交付法庭审判。他們被控的罪名之一是，工事本应全部用花崗石修建，然而，在堡垒塌陷以后发现，圍牆中間填的完全是沙子和碎石。芬兰灣沿岸所有要塞的司令官都接到圣彼得堡的命令，要求最仔細地檢查这些要塞的构筑方法，并立即将檢查結果上报。現在已經查明，汉古特海角的古斯塔夫斯維恩堡垒

是进行偵察的巴拉盖·狄利埃和琼斯將軍正在了望它的时候，由俄軍自己炸毀的。俄軍担心敌人会攻击亚波，于是他們炸毀古斯塔夫斯維恩堡垒以便利用堡垒的守軍来加强亚波的城防。

在从波罗的海轉到其他課題之前，我想在这里引述“晚报”上的下面一条消息：

“一位哥本哈根的記者断定說，丹麦政府于8月16日准許特·普·沙弗涅尔先生安設从北美經格陵兰、冰島、法罗群島和挪威通向哥本哈根的电报綫路。8月26日从斯德哥尔摩到馬尔摩的綫路已經开辟，全长68 670碼。”

倫敦的一部分報紙今天登載了一則关于沙米尔在离梯弗里斯不远的某地获胜的电訊。法国和德国的報紙沒有提到这个事实。9月4日土軍在曼成渡过多瑙河，并占領了位于这个要塞和布来洛夫之間的一个島屿。多瑙河上土耳其区艦队的很大一部分艦船也在曼成拋錨。土軍应在9月5日占領布来洛夫。8月30日敖德薩張貼的克魯津什特恩將軍的告示很值得注意；告示中預告居民說，如果軍隊认为必須燒毀城市以保卫国家，屆时全市居民不得阻撓，違者严惩不貸。此外，貝薩拉比亚所有各县的俄国当局都发布命令說，一旦敌人逼近，应将城市和乡村燒毀。这道命令尤其可笑的是，俄国人知道得很清楚，貝薩拉比亚的羅馬尼亚人对俄国人撤退不会比对羅馬尼亚人从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維亚撤退更感到惋惜。

我已經写过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維亚民团被編入俄軍服役时的情况。今天英国報紙报道了8月28日在布德貝尔格先生和羅馬尼亚民团的軍官之間所发生的事件的詳細經過；菲力佩斯科上尉在談話結束时当面向俄国將軍声明說，瓦拉几亚人认为苏丹是自己的唯一的宗主国君主。当然，他被逮捕了，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

两个敢于用同样方式进行反抗的軍官。下面是今天巴黎“新聞报”发表的关于8月29日(这一天俄国对多瑙河各公国的远征终于如此光荣地完成了)事件的报道：

“菲力佩斯科上尉和其他两名敢于違抗布德貝尔格將軍命令的軍官的被捕，引起了莫尔达維亞民团的强烈憤慨，使他們更加不願在俄軍中服役。8月29日在快到規定檢閱的时间，統領馬夫罗科尔达托来到政府宮对面的騎兵兵营。当他发现兵营里一个人也沒有，他感到多么惊奇和恐惧。兵士們不但沒有給馬备鞍去接受檢閱，反而把武器和軍需品扔在原地，全都从馬厩中逃跑了。这位碰壁的統領急忙赶到炮兵兵营，在那里等待他的是新的意外。火炮在操場上原地不动地架着，但是人不見了。馬夫罗科尔达托已經絕望地看到自己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了。然而他集合起了三十来个炮兵，他一面气憤和吓得发抖，一面命令他們套馬把火炮运到原定檢閱的廣場。但他們喊叫道：‘讓他們用武力把我們拖到那里去吧，我們不服从俄国人的命令。’他們一面这样喊叫，一面把兵营的大門鎖起来了。这时廣場上响起了一陣陣的鼓声。这是奧斯坦-薩肯的全师人馬，包括有12个步兵营，1个龙騎兵团和3个炮兵营。在各条街道都布置崗哨后，全师在廣場上整好队，然后把政府宮和莫尔达維亞騎兵兵营完全包圍起来。60名被追回来的莫尔达維亞騎兵队站在兵营前面。他們的对面站着12000名俄国兵士，有步兵、騎兵和炮兵。奧斯坦-薩肯在布德貝尔格將軍和一大队卫队的陪同下出現了。俄軍散开成纵队，上好刺刀，高呼‘烏拉’而在自己的將領面前隆重地列队行进。然后他們在离莫尔达維亞騎兵150碼远的地方排成一个方队。发出了装子弹的口令。俄国兵士画了画十字执行了。然后又命令他們瞄准60名莫尔达維亞兵士。在他們都瞄准好之后，奧斯坦-薩肯带着卫队走近一群莫尔达維亞民兵，号召他們跟着他的队伍前进，并威胁說，如果他們拒絕，就把他們通通枪毙。对他的号召的回答是长时间的沉默。聚集在廣場上的人群都異常激动。于是一名莫尔达維亞人从队伍中跑出来，用沉着的声調向俄国將軍說話。他說：‘我們是莫尔达維亞兵士，我們的職責就是保卫我們的祖国，而不是为外国人作战。你們想把我們怎样就怎样吧。我們决不跟你們走。’‘可以打死我們，但是我們决不跟你們走’，——60名兵士異口同声地重复着。奧斯坦-薩肯听到这个大胆的回答后命令他們下馬并放下武器，好像要立刻下令处死。

他們宁願死去，就听从了。刹那间成千兵士把他們包圍起来，向他們扑去并把他們俘擄了。在完成这件战斗的功績以后，他們便到莫尔达維亞炮兵兵营，那里还有 30 个人躲在鎖着的大門后面。兵士們搗毀了大門，冲进营里；于是展开了一場搏斗，占压倒优势的敌人把炮兵也俘擄了。炮兵被匆忙地押走，并不断遭到凌辱和死亡的威胁。但是他們处之泰然。只有其中一个 22 岁的年輕騎兵少尉，两眼冒着怒火走近弗兰格尔將軍，把胸膛一挺，喊道：‘这儿是我的胸膛，如果你敢，就用子彈射穿它吧。’將軍不敢。騎兵少尉和他的战友們被解除了武装，并在两排刺刀的押送下解往雅西門外的奧斯坦-薩肯兵营。后来如何对付他們，誰也不知道。至于头一天晚上被捕的 3 名軍官的下落，很多人都担心他們将被枪毙。同一天晚上俄軍包圍了一个莫尔达維亞步兵团駐扎的营地，但是那里只遇上 150 个兵士，其余都躲起来了。雅西居民大声痛罵自己的保护者。配备有 3 个炮兵連的 12 000 名俄軍，俘擄了 60 名騎兵、30 名炮兵和 150 名步兵并把他們解除了武装——这就是俄軍远征多瑙河各公国唯一值得紀念的胜利。”

我在过去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奧美尔-帕沙关于禁止散发海斯將軍的奧地利宣言的命令。現在才弄清禁止散发的原因：在这个宣言中曾建議瓦拉几亞当局凡事都同奧軍統帥部磋商。奧美尔-帕沙让海斯將軍知道，他不应当干涉屬于他（奧美尔-帕沙）权限內的瓦拉几亞的民政管理問題。因为海斯將軍发表宣言的目的不过是試探一下他的权力可以伸展多远，所以他对引起異議的地方就表示道歉，并且为了向奧美尔-帕沙证明原来是发生了錯誤，就給奧美尔-帕沙看了宣言的德文原文，在德文原文中建議瓦拉几亞当局只就同奧軍有關的問題同他的侍卫长商量。奧美尔-帕沙也制止了奧地利將軍波波維奇的行动。波波維奇于 9 月 3 日率領奧軍先头部队进入布加勒斯特并立即在那里仿照海瑙行事。瓦拉几亞的居民究竟有几分欢迎奧軍占領，这可以从今天的“每日新聞”摘来的一段消息中看出：

“奧軍沿途經過的許多村庄，居民都攜帶自己的全部財物离开了，因為他們擔心，他們將不得不提供糧食或運輸工具來交換實際價值只等於票面價值一半的紙幣。結果奧軍的糧食只好從 20 甚至 30 英里外的布加勒斯特運來。”

毫無疑問，正是在多瑙河各公國所干的蠢事——英國外交的成果——給清醒的“經濟學家”提示了一篇文章，該文作者根據美國外交在歐洲所犯的某些無足輕重的錯誤，對英美兩國外交的不同作了如下比較：

“我們並不懷疑，美國也同我國一樣不乏善於表現崇高感情、嚴守行為規則和深知對他人義務的人。但是我們之間的差別，我們的美國弟兄的不幸就在於，在大西洋彼岸，這樣的人材不能選舉政府，對整個民族不能發生影響，不能決定報刊的語言。在我們這裡政權掌握在有教養的上層階級手中。在美國是群眾在統治；那裡平民篡奪了代表民族說話的權利；平民在左右言論和行動，平民選舉政府，並且這個政府必須為他們效勞；他們支持報刊，而報刊也要迎合他們；簡單地說，凡是所做所寫的都要符合平民的愛好和願望。”

英國證券交易商的走狗就是這樣寫的，好像英國外交不是十足愚蠢的，好像那些靠“經濟學家”編輯威爾遜先生和他的上司格萊斯頓先生的幫助而得到任命的“紳士們”，在議會上並沒有被揭發從事詐騙、賭博作弊和盜竊的勾當。

從西班牙來的只有非常少的一些消息。9月8日馬德里諮詢洪達終於解散了。塞維爾洪達在解散以前對中央政府的反動政策表示堅決抗議。卡塔盧尼亞的民主派發表了一個反對普里姆將軍的宣言，後者由於不願在瓜分獵物中失掉自己的一份，就從土耳其發表聲明擁護現政府。普里姆在 1843 年圍攻菲蓋斯城堡曾招來卡塔盧尼亞人的仇恨。在圍攻中由於阿美特勒指揮的一小隊守軍英勇保衛要塞，圍攻部隊非常惱火，因而對守軍採取了令人

发指的暴行。談到普里姆，当时人們說他是一个“被偶然成就和他所获得的伯爵称号和中将官銜冲昏头脑的可笑的受虛荣的人物”。

“时代报”报道說，9月7日在阿兰惠斯国民自卫軍同不知是卡洛斯派还是共和派的队伍发生了武装冲突。尽管乍一看反动派的胜利是多么迅速、多么确定，但反革命派报刊仍然流露出忧心忡忡：西班牙的情况可能还没有順利解决。

在刚刚发表的关于貿易和航运的报告中值得注意的有下述材料²⁸¹：

1831、1842年和1853年英国和爱尔兰产品和

工厂制品出口申报价值一覽

(单位：英鎊)

	1831	1842	1853
輸 往 国 家			
俄国，北部和黑海沿岸港口……	1 195 565	1 885 953	1 228 400
瑞典和挪威……	115 707	334 017	556 183
丹麦……	92 294	194 304	569 733
普魯士……	192 816	376 651	579 588
汉諾威和汉撒同盟……	3 642 952	6 202 700	7 565 493
荷 兰 和 比利时} ……	2 082 536	3 573 362	4 482 955
法国……	602 688	3 193 939	2 636 330
葡萄牙……	975 991	947 855	1 210 411
亚速尔群島和馬德拉島……	80 698	64 909	124 971
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島……	597 848	322 614	1 360 719
卡內里群島……	33 282	54 554	107 638

(續)

	1831	1842	1853
意大利:			
撒丁			1 112 447
托斯卡納公国			639 794
教皇国	2 490 376	2 494 197	207 491
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島			639 544
奧地利屬地			637 353
希腊			135 315
土耳其	899 100	1 489 826	2 029 305
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維亞			179 510
叙利亞和巴勒斯坦	—	375 551	306 580
埃及	122 832	221 003	787 111
摩洛哥	426	41 952	75 257
法屬塞內加尔岡比亚	—	—	1 725
非洲西岸	234 768	459 685	617 764
爪哇和苏門答腊	285 296	306 132	558 212
菲律賓群島	39 513	47 019	386 552
中国	519 443	969 381	1 373 689
古巴	663 531	711 938	1 124 864
海地	376 103	141 896	133 804
美国和加利福尼亚	9 053 583	3 585 381	23 658 427
墨西哥	728 858	374 969	791 940
新格拉納达			450 804
委內瑞拉	248 250	231 711	248 190
巴西	1 238 371	1 756 805	3 186 407
烏拉圭			529 883
布宜諾斯艾利斯	339 870	969 791	551 035
智利	654 617	950 468	1 264 942
秘魯	409 003	684 013	1 246 730

(續)

	1831	1842	1853
其他国家.....	215	7 223	912 662
出口总值.....	26 909 432	34 119 587	65 551 579
輸往英国屬地			
諾曼底群島.....	324 634	364 350	470 107
直布罗陀.....	367 285	937 719	670 840
馬尔他.....	134 519	289 304	297 906
伊奥尼亚群島.....	50 883	83 600	116 567
南非.....	257 245	369 076	1 212 630
毛里求斯島.....	148 475	244 922	385 879
东印度.....	3 857 969	5 169 888	8 185 695
剛果.....	—	—	357 908
澳大利亚.....	403 223	998 952	14 513 700
北美殖民地.....	2 089 327	2 333 525	4 898 544
西印度.....	2 583 949	2 591 425	1 906 639
其他屬地.....	39 431	18 675	347 787
輸往英国屬地总值.....	10 254 940	13 261 436	33 382 202
輸往英国屬地和外国总值.....	37 164 372	47 381 023	98 933 781

“經濟学家”挑选 1842 年来強調这一年开始实行的貿易自由²⁸² 的优点，但是，它以素有的天真忘記了，1842 年是貿易蕭条的一年，而 1853 年才是最繁荣的一年。如果英国出口的增长归功于貿易自由的魔法，那末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应当是英国向执行严格保护关税制度的国家，例如俄国和法国的出口数字的比較，尤其是俄国向英国的出口比其他国家都增加得多，受英国自由貿易的影响也比其他国家的大。然而事实上，向这两个国家的出口都縮減了。

向俄国出口 1853 年是 1 106 776 英鎊

1831 年是 1 195 565 英鎊

向法国出口 1853 年是 2 636 330 英鎊

1842 年是 3 193 933 英鎊

英国在 1854 年 8 月 5 日前 7 个月的出口总值比 1853 年同期增加了, 因为五金的价格上涨了; 但是英国的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出口却大大縮减了, 这可以从下表看出来:

	1853 (单位: 英鎊)	1854 (单位: 英鎊)
亚麻織品.....	2 650 150	2 456 953
亚麻紗.....	646 578	581 752
絲織品.....	965 345	834 275
卷絲.....	132 689	120 890
毛織品.....	3 741 261	3 731 453
棉織品.....	15 515 224	14 762 981
棉紗.....	3 897 080	3 838 393

有关棉織品的数字更有說服力, 因为棉織品的出口数量增加了, 然而貸款收入减少了。1854 年出口了 981 994 130 碼棉織品, 还不算花边和綢布, 而 1853 年总共出口了 969 293 663 碼。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9 月 15 日

載于 1854 年 10 月 2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4198 号

署名: 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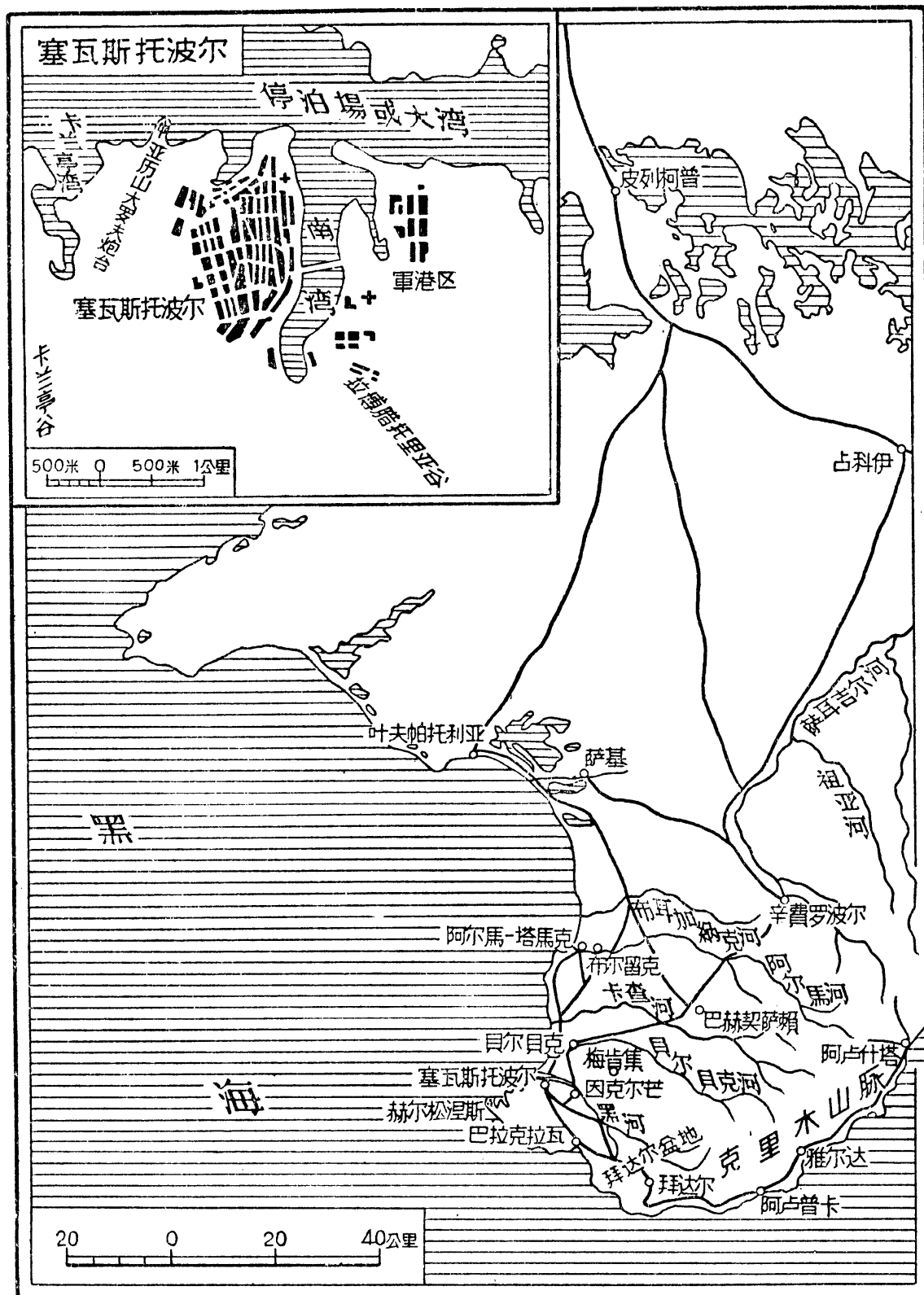
弗·恩格斯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

看来，法軍和英軍终于有了給俄国的实力和威望以严重打击的机会，因而我們怀着新的兴趣来注視联軍向塞瓦斯托波尔推进（今天本报刊载了有关的最近消息）。当然，法国和英国报纸正大肆吹嘘这次行动，如果相信这些报纸的話，那末这次行动就是軍事学术史上空前的壮举了；但是这是欺騙不了那些了解事实、記得这次远征开始时莫名其妙的拖延和毫无意义的遁辞以及远征前和远征中所发生的一切情况的人們的。即使这次行动的結局是光荣的，它的开端也是非常可耻的。

让我们看看联軍在土耳其活动的經過吧。起初，这些十分英勇但又极其謹慎的勇士們打算在达达尼尔海峽西面的埃內茲登陸，而且要在查明毫无危險以后才接近半島。可是，在他們建立这个英勇功績之前，他們竟鼓起出乎意外的勇气，冒險在色雷斯的赫尔松涅斯附近的加利波利登陸了。他們这样做只是为了在最短期間內筑好橫断半島的防御工事，从而給自己建立起最必需的东西——作战基地。在这期間，土軍却在多瑙河上一一直同那个一在瓦拉几亞出現就成为联軍玩弄巧妙手段的借口的可怕的敌人对峙着，并且應該說，相当成功地抵御了敌人。随着船只和部队的陸續到达，发现达达尼尔海峽和半島不能全部容納下他們。这样一来，

在倫敦和巴黎所拟定的高明計劃就出現了新的缺陷。一部分軍隊這時不得不冒險在最受威脅的地点——君士坦丁堡登陸！為了改善處境，他們立刻着手構築這個城市的防禦工事。幸好，他們在這方面花費了不少時間，因而也就達到了主要目的：不是爭取時間，而是消磨時間。後來又發現，不冒很大的危險就可以把一個師派到瓦爾那去駐防，因為在 1828 年光榮地保衛過瓦爾那的土軍從那時起想必已相當成功地掌握了歐洲軍隊的訓練內容，以致不能再信賴他們保衛這樣一個地点了。於是派了一個師到瓦爾那去，接着又派去了一兩個師。最後，當再沒有借口可以把軍隊留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時候，聯軍的全部大軍才從容不迫地集中到瓦爾那。這正是發生在奧地利軍隊像醞釀着暴風雨的烏雲一般突然在俄軍的翼側和後方出現的時候，因此也正是聯軍的作戰基地由於政治陰謀突然由君士坦丁堡轉移到特蘭西瓦尼亞和加里西亞的時候。如果不是這樣，可以斷言，在保加利亞決不會看到聯軍。這可以由聯軍在錫利斯特里亞被圍期間的行動來證明。誰都知道，那里是整個戰局的轉折點。當雙方都已經把全部力量發揮到最大限度的時候，一方稍占優勢就可以十拿九穩地取得勝利。而在這個有決定意義的圍攻時刻，2 萬英國兵和 3 萬法國兵——“兩軍的精華”——却停留在距這個要塞僅數日行程的地方，安詳地銜着煙斗，準備同霍亂作鬥爭。如果不是這種疾病在俄軍中造成了可怕的死亡，如果不是一小群掘壕頑抗、在四面受到炮擊的壕溝中死守並表現了驚人的勇敢的阿爾納烏特人，錫利斯特里亞也許已經落在敵人手裡了。一支軍隊，本來可以輕而易舉地援救自己的盟友，却這樣胆怯地見危不救，這在戰史上是無前例的。對克里木的任何遠征、任何勝利都不能夠洗去法英兩軍統帥身上的這個污點。試問，如果

1854年克里木战区



老布呂歇爾在到達滑鐵盧的兩天前于利尼遭受失敗以後，表現得不比賈格倫和聖阿爾諾認真負責的話，那末在滑鐵盧的英軍會得到什麼結果呢？²⁸³

在阿拉伯堡戰壕中作戰的一小群阿爾納烏特人，在靈活、機智和勇敢上完全可以同俄國人媲美。俄軍不是被前來解救要塞的什麼軍隊擊退到多瑙河以北的。他們本身的愚蠢、保衛者的英勇、熱病、奧軍在德涅斯特河和聯軍在迭夫年斯卡河的消極的壓力（因為誰能預料他們會這樣行動呢？）——這才最後迫使俄軍撤除圍攻，中止整個戰局，放棄多瑙河各公國和多布魯甲。聯軍的將軍們在得到這樣巨大的勝利以後，當然想利用這種勝利來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不過必須符合他們迄今運用得很成功的戰略方針的要求。因此，卡迪根勳爵便率領不列顛騎兵向多瑙河一帶作偵察性的進軍。在這次進軍中，他的騎兵沒有見到俄軍，卻損失了許多馬匹，而且除了疾病和嘲笑以外一無所獲。那位主要是由於1851年12月2日背叛國民議會而出名的埃斯潘納斯將軍²⁸⁴，則率領自己的一個師去多布魯甲，而他的全部成績，就是幾個精銳步兵團有一半死於霍亂并把病菌帶到聯軍兵營里來。從此以後，霍亂就在瓦爾那聯軍兵營里廣泛地流行起來，這是聯軍巧妙的戰略手法應得的懲罰。成千的兵士還沒有見到敵人便死去了；他們像蒼蠅一樣倒斃在他們曾經安閑平靜地度過比較舒適的生活的兵營里。這一切後果就是士氣低落、對指揮官不信任和組織渙散，——這種情況在英軍中不像在法軍中那樣嚴重，因為英軍受害較輕，抵抗力較強，而法國的民族性格使法軍比較容易接受這種影響，在他們的長官使他們無所作為的時候更是如此。不過，目前在法軍內部發生的騷動中暴露出來的那些情況，是1849年以來軍隊處於不正常

情况下的自然结果。资产阶级教导那些曾把它从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拯救出来的法国兵，要把自己看做整个民族和社会的救星。路易·波拿巴把他们看做恢复帝国的力量，娇纵他们。兵士一贯受到纵容，学会了发号施令，而忘记了应当服从。他们被灌输了一种意识，好像自己比普通人高一等，于是他们很快就自负起来，认为自己至少在哪一方面都不比自己的长官差。人们曾经不惜一切努力要把他们变为御用军队，但历史总是教导人们，御用军队就是蜕化了的军队。他们始则对普通人发号施令，然后就企图使自己的将军服从他们的意志，而最后是得到沉重的教训。

现在让我们看看瓦尔那的情况。整营整营的兵士躺在灼热的沙滩上，辗转于霍乱痛苦之中，于是老兵开始拿现在指挥他们的这些冒险家同当年如此成功地率领他们进行非洲远征的老长官相比较，尽管今日没落帝国²⁸⁵的英雄们现在非常看不起这些远征。非洲比保加利亚更热，撒哈拉沙漠甚至比多布鲁甲令人讨厌得多。但是在征服非洲的整个时期，从来没有达到在迭夫年斯卡河上安适驻军时或者在居斯坦杰周围进行轻松的侦察性进军时那样高的死亡率。卡芬雅克、貝多、尚加尔涅、拉摩里西尔曾经在危险得多的情况下指挥过他们，但遭受的损失却小得多；诚然，这是在埃斯潘纳斯和勒卢阿·圣阿尔诺还默默无闻（他们后来所以能闻名，也只是由于政治上的卑劣无耻）时发生的事情。因此，非洲部队的主要代表者朱阿夫兵，这些打得最好而火药味又闻得最多的人们，就群情激愤，一致高呼：«A bas les singes! Il nous faut Lamoricière!»（“狒猴们滚蛋！我们要拉摩里西尔！”）。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这位装腔作势模仿伟大的过去的主角，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许已经感到朱阿夫兵的喊声是自己“灭亡的开始”。这个喊

声在瓦尔那产生了魔力。可以说，它便是克里木远征的主要原因。

经过了这次夏季战局，或者更正确地說，经过了由加利波利到斯庫塔里、由斯庫塔里到瓦尔那、由瓦尔那到迭夫尼亚和阿拉丁以及由这里返回瓦尔那的游覽以后，不可能希望我们会真正相信联軍統帅部用来解釋为什么拖延了这么久的远征最后又这么仓卒地开始的那一套托詞。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說明这些托詞的价值如何。据说，拖延時間是因为法国的攻城炮兵沒有来到。但是，当霍乱引起騷动，勒卢阿·圣阿尔諾看到他必須立刻毫不迟延地攤出王牌来的时候，他便要求君士坦丁堡調撥土耳其的攻城炮兵和彈药，而且这一切在极短的时间內就都准备妥当，并装上了船；如果这时法軍的攻城炮兵纵列还没有到达，那也会不等它就启航。但是，要知道土耳其的攻城炮兵整装待发已經不止一个月了，这就证明，过去的一切拖延都是不必要的。

由此可見，这次 600 艘輪船、6 万名兵士、3 个攻城炮兵纵列以及天知道有多少門野炮的大吹大擂的克里木远征，根本不是什么深思熟虑和事先經過科学研究的高明行动的結果，只不过是為了使勒卢阿·圣阿尔諾逃避自己兵士的制裁而仓卒决定的 coup de tête [輕率行为]。善良軟弱的老腊格倫勳爵不能反对这个計劃，因为再有任何拖延都会使他的軍队也陷入法軍目前那种紀律松弛和悲观失望的状态。

一位德国著作家^①說过的**历史的諷刺**不仅过去出現过，而且在現代事件中也出現了，現在可怜的老腊格倫勳爵成了它的牺牲品。至于勒卢阿·圣阿尔諾，从来就沒有人把他看成一位总司令。他

① 即黑格尔。——編者注

早已就是众所周知的半上流社会的代表人物，賊巢的常客，是那个受“債務而不是义务”逼迫而进行布倫远征²⁸⁶的人的真正同謀者。尽管有檢查机关的禁令，巴黎好議論是非的人們对他的品格和历史还是了解得很透彻。人們非常熟悉这位曾两度被貶职的中尉，这位在非洲当財務官时曾盜窃团部金庫的上尉。无论他在克里木有什么建树，他的最光荣的功勋永远还是窃取女房东的毯子向倫敦当鋪順利地远征以及接着向巴黎巧妙地退却。但是威灵頓公爵的將軍銜侍卫长，这位长期致力于理論著作和深入钻研參謀勤务的可怜的腊格倫，无疑是真正相信了圣阿尔諾替自己行为所作的辯解。于是責任全都落到他的身上：一个責任是，根据非常科学的原則所計劃的整个战局进行得如此巧妙，以致一万人（几乎占总数的七分之一）还没有見到敌人就送了命；另一个責任是，所有这些經過周密考虑的行动的结果，仅仅是在不利的季节即将来临之前向克里木进行仓促的远征。确实，再沒有任何东西比这个“历史的諷刺”更辛辣的了。

远征毕竟是可能成功的。联軍几乎是应该得到这种报酬的，因为再沒有任何可以比联軍迄今所采取的作战方法更令人輕視了。为了对付在这一次战局（这次战局的目的不是消灭敌人，而是保存进攻的軍隊）中吃敗仗的敌人，竟然那么大叫大嚷，作了那么多准备步驟，进行了那样无穷的研討策划！这也許就是联軍对自己作出的最无情的判决。但他們現在还没有到达塞瓦斯托波尔。他們已在叶夫帕托利亚和旧堡登陆。从叶夫帕托利亚到塞瓦斯托波尔，他們还要走 50 英里，从旧堡到塞瓦斯托波尔还要走 20 英里。他們的重炮应在上述的后一个地点的附近卸載，以免陆上轉运困难；因此卸載工作还远沒有結束。虽然还没有得到关于俄

軍兵力的确切情报,但是俄軍的兵力相当大,足以在塞瓦斯托波尔四郊的許多地点造成对联軍兵力的优势,这一点是可以不必怀疑的。丘陵地和伸入陆地几达十英里的港灣使联軍刚一企图包圍要塞便不得不把战綫拉得很长。一个坚决的指揮官要突破这样的战綫是不难的。我們当然不知道,要塞的陆上防御工事如何;但是根据我們对老緬施科夫的了解,可以設想他沒有白白浪費時間。

从英国报纸的报道和联軍所选的作战方向来看,我們可以預料,首先攻击的目标将是北面山崗上瞰制着城市的堡垒,俄国人把它叫做北部要塞,也就是北堡。

这个堡垒只要构筑得稍許坚固一些,那它就可以进行长期抵抗。这是一个大型四角堡,是根据蒙塔郎貝尔的多边形筑城体系即側防暗堡体系筑成的;它的兩側由低的穹窿工事防卫,这些穹窿位于四角形每一边的中央附近,筑在壕沟深处,可以向左和向右对壕沟射击。这类工事的优点,是在敌人把塹壕挖到壕沟边以前,不会受到敌人炮火的直接轰击。由于这种工事紧靠主塞,可以作为用于进攻的强有力的出击据点和基地,而这种工事的存在本身,就迫使联軍把主要行动局限于港灣的北岸。

博馬尔松德的經驗告訴我們,在俄国要塞真正經受考驗之前,对它們是无法作任何肯定的評述的。因此目前还完全不能推測克里木远征的胜利把握究竟多大。但是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如果战事形成持久局面,如果冬季的到来又引起疾病流行,如果联軍也像俄軍过去在錫利斯特里亚那样,把兵力消耗在輕率的、未加准备的攻击上,那末法軍,很可能还有土軍,都将瓦解,就像法軍在瓦尔那曾經經歷的和土軍在亚洲屢次經歷的那样。英軍可能維持得久些,但是,就是訓練最好的軍队也不能坚持的时刻正在到来。这是

联军的真正危险，并且如果由于俄军的抵抗，情况的确发展到这一地步，那末在胜利的敌人面前撤退上船，将是十分危险的事。远征很可能是成功的，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第二次伐耳赫伦²⁸⁷。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9月18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10月14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09号

弗·恩格斯 克里木的消息

今天本报充满了惊人的消息：克里木血战，攻占塞瓦斯托波尔，它最重要的堡垒被破坏，俄国舰队大部分被歼灭，緬施科夫公爵完全投降，他那支被击溃并几乎全部被歼灭的军队的残部也已被俘。如果这些消息属实，那末几乎40年以来世界上还没有过如此惊人的血战，也没有过引起这样严重后果的军事事件。至于这些消息的确实程度如何，让我们仔细地将从官方的和确实可靠的消息中得知的与非官方的和值得怀疑的消息中得知的加以甄别，尽量地弄清这一问题。

因此我们就必须把这些消息分为两部分：有关9月20日阿尔馬河会战的消息和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根据腊格倫勋爵和圣阿尔諾元帅的报告，9月20日联军攻击了阿尔馬河南岸高地上的俄军营垒，并迫使俄军退却。英军缴获两门火炮，而法军在报告中丝毫没有提到战利品。法军损失约1400人，英军损失的人数相同。俄军总数为45000—50000人，损失4000—6000人。这些报告显然是在刚获得的胜利的直接影响之下写成的。关于俄军有50000人参加阿尔馬河会战的报道，同较早的关于俄军在克里木最多不过45000人的消息大有出入。如果考虑到在野战工事被攻占时火炮几乎不可能撤走的这一情况，那末在这样一座装备“大

量重炮”的营垒中缴获的两门火炮，看来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战利品。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圣阿尔诺元帅没有提到法军缴获火炮的这个事实。

就算緬施科夫在阿尔马河的营垒内集中了45000—50000人，这又证明什么呢？或者是他拥有比原来预计的多得多的军队，因而能够把这样大的兵力用在平地上；或者是塞瓦斯托波尔的向陆一面的工事非常薄弱，以致他除了在平地上击败联军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保卫要塞；最后，或者是他犯了极大的错误，竟在平地上作战，以致部队受到惨重失败而士气涣散。

根据较早的报道，阿尔马河营垒内的俄军不超过10000人。他们可能得到增援，但要使他们的数量达到25000—30000人，俄军必须作出很大的努力。既然在阿尔马河附近，即距登陆地点15英里处有50000俄军，那末，他们在联军登陆时却不攻击，这又怎么解释呢？

在联军登陆的旧堡和塞瓦斯托波尔之间有三条小河，这三条小河连同它们的河谷构成了军事上重要的障地。距塞瓦斯托波尔最近的是黑河，它流入塞瓦斯托波尔湾的东部。北堡防护着海湾的北岸，而这条小河，更确切地说，这条小河的很深的河床在城东形成一道天然的壕沟。显然，这里是最后一道重要的防御障地。第二条小河——卡查河，在北堡以北数英里处由东向西流；最后，从这里再往北约12英里是阿尔马河。不论这三道防线在战术上能提供什么优越条件（这不在当地是无法判断的），很难想像俄军会从中选定第一道，亦即最远的那道防线作为可能决定塞瓦斯托波尔命运的决战场所。但是联军没有骑兵主力部队，这也可能促使俄军向阿尔马河营垒派出一支大部队，因为他们在骑兵方面拥有

暫時的優勢，可以不必擔心敵人騎兵對翼側的攻擊。此外，關於塞瓦斯托波爾被圍後無法使用騎兵的想法也可能促使他們這樣做。

在進一步分析時，俄軍在阿爾馬河的失敗就更沒有什麼戰術意義了。俄軍不喜歡背面敞開的工事。他們在有時間的情況下比較喜歡在打算進行頑強抵抗的地点構築閉合的方形堡。只要攻擊已經開始，要從這種方形堡內撤出火炮是不可能的。甚至在那些背面敞開的、術語稱為眼鏡堡的工事里，也幾乎不可能在強攻的敵人面前撤走火炮。因為如果正當敵人攻擊時撤走火炮，那末防禦就失去武器，如果敵人已經沖過壕溝，那就沒有人能在敵人近距離的火力下把火炮拖過土堦和炮座並且套馬運走。

“只要工事不能繼續堅守，配置在工事中的火炮就算損失了。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迫使敵人為它們付出最高的代價。”

杜福爾將軍在他的野戰築城教科書中就是這樣說的。俄軍只損失兩門火炮這一事實說明，他們並沒有堅守營壘到最後一人，而且說明最多不過一、兩座工事真正是聯軍用白刃沖擊攻占的。其餘的工事未必用刺刀防守過，而且看來都是在敵人強攻縱隊到達壕溝以前就放棄的。俄軍顯然是在騎兵掩護下秩序井然地退却的，他們利用了聯軍的騎兵部隊不能迅速渡過阿爾馬河、越過各雛谷的這一有利條件。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保存了全部騎兵這一事實充分證明，在敵人以猛烈的攻擊在他們的隊伍中造成混亂以前，他們就已經停止作戰了。

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關於在阿爾馬河南岸高地上所獲得的勝利的全部情況，這是 10 月 1 日英國在禮炮齊鳴和鐘聲震響中鄭重宣告的勝利，是 9 月 30 日星期六晚 10 時市長在銅號聲中在交易所宣布的勝利，也是在各劇院所慶祝的、被倫敦“泰晤士報”說成是

由于坎特布里大主教祈禱而得来的胜利，不过这次祈禱是在会战后才举行的。記者們报道說，圣阿尔諾曾經爬不上馬。历史学家說，拿破侖在滑铁卢会战中的情况也是这样。可能，阿尔馬河的胜利正是导致滑铁卢会战失败的那些情况造成的。

現在談談第二部分有关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的更加惊人的消息。倫敦收到的关于这一事件的第一个消息是9月28日从布加勒斯特用电报发来的。这个电訊說，联軍从海陆两方面进行联合攻击后，攻占了塞瓦斯托波尔。这个消息好像是由塞瓦斯托波尔开往君士坦丁堡的一艘法国輪船带出的，这艘輪船把这个消息轉告給它在海上遇到的开往瓦尔那的另一艘法国輪船。如果像人們所說的那樣，要塞是在9月25日攻占的，这一消息在26日夜間可以带到瓦尔那，28日中午可以送到布加勒斯特，因为瓦尔那和布加勒斯特相距大約100英里，信使24小时就能赶到。波拿巴就是根据这一消息編写告布倫兵营书的（告兵营书我們另外发表）。但实际上，9月30日以前沒有一个信使到达过布加勒斯特。关于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第二个消息，虽然从地理上来看有点合理，但它只是在波拿巴宣讀告布倫兵营书的那一天才从布加勒斯特发出。奥地利政府在10月1日晚6时收到并由奥地利駐倫敦大使在10月3日轉交“泰晤士报”的这份电訊，在同一天登在“通报”上，并附有說明：

“这个消息是由德·布奥尔先生轉告法国政府的，他并委托許布納尔先生以奥地利皇帝的名义向法国皇帝祝賀法軍在克里木的輝煌胜利。”

应当指出，这个重要的消息完全是根据从君士坦丁堡派往奥美尔-帕沙处的信使的口述，这个信使在布加勒斯特沒有見到奥美尔-帕沙，就前往当时奥美尔-帕沙司令部所在地的錫利斯特里

亞。据这个信使說，塞瓦斯托波尔已被占領，俄軍 18 000 人被击毙，22 000 人被俘，康士坦丁炮台被毀，其余炮台都被占領，800 門火炮被繳获，6 艘俄国軍艦被击沉，而緬施科夫公爵率領保全下来的軍艦退向海灣深处，并声称他宁可炸毀它們，也决不投降。联軍似乎給他 6 小时的考虑時間。君士坦丁堡將張灯結彩庆祝 10 天。

根据我們对阿兰群島上的俄軍筑城工事，以及在联軍取得阿尔馬河胜利后所了解的情况来判断，塞瓦斯托波尔在短短的一昼夜內就投降也不是不可信的。但是，难道能够想像，这是一支在打了敗仗后仍能幸运地把几乎全部火炮保存下来，并且由这个战局中最勇敢的俄国指揮官中的一个率領的 5 万人的軍队嗎？难道可以想像，这样的軍队在城市受到第一次攻击后就会放下武器嗎？不过，这次战争也确实有这样一些令人难信的和不寻常的特点，因而我們应当准备好“应付一个接一个的意外情况”，就像拿破侖本人在 1807 年接到塞巴斯提昂尼从君士坦丁堡写来的报告时一样。联軍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做了能做的一切来为自己准备一次空前的失敗。为什么命运不可以賜給他們一次无可比拟的輝煌胜利呢？历史总是捉弄人的。它可能想給世界留下一个奇聞，即那个剛剛在一年前离开“快死的人”的首都时还驕傲地自信可以吞下整个帝国的年老的俄国罗多芒特²⁸³，現在却被监禁在波斯普魯斯海峡的一个簡陋的小塔楼里。对于这次战争的主謀者和发起人，这个驕傲自負的緬施科夫來說，作为俘虏被送回到君士坦丁堡，这又是多么无情的懲罰！

如果土耳其信使的話是真的，克里木战局的經過用几句话就可以說清楚了：9 月 14 日和 16 日联軍沒有遇到抵抗就在旧堡附近

登陆；19日开始进军；20日在阿尔馬河会战胜利，并于25日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

从利物浦开出的班輪“阿非利加号”沒有繞道哈里法克斯而直接駛往紐約。它在星期五以前未必能够到达，因此在这以前，我們沒有希望得到任何有关这个非常有趣的問題的确实消息。也許，暫時相信土耳其信使所說的全部情况是最适当的，不过我們希望，这样做的人們不要陷入我們的朋友路易·波拿巴因此在布倫陷入的那种有失体面的处境。讀者們可以在本报另一栏里²⁸⁹看到，这位皇帝在最近举行的一次閱兵时，非常富于戏剧性地用明确而肯定的語言宣布了这一事件：Sébastopol est prise [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占了]。当时他可能把自己当作真拿破侖在向自己的部队宣布一次巨大的胜利。但是使这位侄儿遺憾的是，他的伯父从来不需要宣布自己的胜利，因为他亲自率領部队作战，而且他的兵士們亲眼看到敌人怎样逃跑，因而并不需要任何证实。更加遺憾的是，路易·波拿巴不肯不公布的这个消息，当晚就被布倫兵营的司令官作了另一种估价，后者在墙上張貼通告說，收到了关于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占的报告，但是否确实，不能保证。这样一来，法国皇帝陛下的布倫司令官竟糾正了皇帝本人的話！还有一点值得特別注意，我們最近收到的10月3日法国政府的官方报纸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报道并没有证实。可是，这可能是真实的，因而我們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确实的消息。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10月2日

作为社論載于1854年10月17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421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騙局

英国人說：“捉住韃靼人！”原来不仅英国人，而且法国人和奥地利人都反被韃靼人轻而易举地捉住了^①。如果我們現在对“論壇报”和它那些注視目前克里木战局进程的讀者們沒有跟別人一道被捉住这一点表示有些滿意的話，我們是会得到原諒的。

起初，当塞瓦斯托波尔被占領的似是而非的消息傳來时，我們仔細研究了这个消息的各个来源，并以軍事科学的資料为根据，企图证明^②，继阿尔馬河胜利（不管这个胜利具有多么大的决定意义）之后，这个作为整个战局主要目标的設防城市未必会那样快投降。我們觉得，我們当时判定了这一事实：联軍根本沒有取得什么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俄軍带着自己所有的火炮秩序井然地撤退了。而且最后我們还特別強調指出，这个消息的全部細節并不是出自关于阿尔馬河会战的官方报告，只不过是根据一个給奧美尔-帕沙送秘密报告的信使的口述而已。因此，“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惊人消息對我們來說一点也不突然，它无非是一則由一个爱开玩笑的信使送到布加勒斯特的被假想所歪曲的关于阿尔馬河胜利的消息。

① 双关語：《Catch a Tartar》——“捉人反被捉”；《tartar》——“韃靼人”，土耳其人对軍人或外交信使的称呼。——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545—550 頁。——編者注

息，喜欢戏剧性效果的路易-拿破侖便在布倫宣布了它，而英国的小店主——这些人类杰出的标本——便盲目地信以为真。英国报刊一向表明自己不愧为这个阶级的喉舌，因此可以想像得到，在英国只要一提起塞瓦斯托波尔这个名字，就会使得大家欣喜若狂。我們的讀者也許記得，在最近一次議會會議結束時，約翰·羅素勛爵曾聲明，摧毀塞瓦斯托波尔原屬英國政府的計劃；雖然這個聲明在同一次會議上就被收回了，但是它在5個鐘頭里，用迪斯累里先生關於這件事情的說法，曾使極可尊敬的議員們興奮不已。倫敦“泰晤士報”至少發表了九篇社論，在這些社論里，不管是出於 bona fide [誠心] 還是 mala fide [假意]，都洋溢着那股喜悅的氣息；看來，這種作法的唯一目的就是慫恿查理·納皮爾爵士對喀琅施塔得或斯維阿波尔格採取鹵莽行動。這家報紙似乎在榮譽和成績的鼓舞之下，已經開始向波羅的海的普魯士沿岸，以及向那不勒斯的炮彈國王和利伏諾的托斯卡納大公進行連續轟擊，——自然，用的是假想的炮彈。這家報紙真的在準備同全世界開戰，當然也要同“其餘的人類”開戰。

關於塞瓦斯托波尔岸防工事的真實情況知道得太少，所以無法預測，這座要塞究竟還能堅持多久。阿爾馬河的勝利使人有正當的理由認為，塞瓦斯托波尔將被攻占；因為這次勝利必然會提高聯軍的士氣，同時也是他們預防疾病的良藥，因為有消息說，聯軍已經碰上了在克里木最危險的敵人——疾病。但是，如果把聯軍能夠攻入塞瓦斯托波尔想像得如同進咖啡館那麼容易，就未免太可笑了。

在散布攻占這座要塞、斃傷 30 000 人、俘擄 22 000 人的消息這一史無前例的大騙局之後，人們原來指望真正官方文件出現時

至少将会提供一些清楚的和完备的情报。然而 10 月 5 日倫敦“官报”的号外上刊登的、今天本报好几栏轉載的报告，归根到底仍然是言辞含糊。其实，报告中有很多值得怀疑的东西，应当說这是因为这个报告是由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帕麦斯顿外交学校的毕业生）发出的。首先，报告注明是在 9 月 30 日下午 3 时 30 分从布加勒斯特发往英国，可是雷德克利夫勋爵从君士坦丁堡发出这个的日期却是 9 月 30 日晚上 9 时 30 分；这样一来在从君士坦丁堡发出报告以前 6 个小时布加勒斯特便收到了报告。其次，消息中連一个字也沒有提到 9 月 20 日至 28 日之間在克里木发生的事情，只是說：

“9 月 28 日早晨联軍各部在巴拉克拉瓦建立了作战基地并准备立即向塞瓦斯托波尔进军。‘亚加米农号’（海軍上将萊昂斯在此舰上）和其他軍舰停泊在巴拉克拉瓦海灣。在这个地方卸下攻城炮非常方便。”

英国报纸认为这个消息是可靠的，便自然地作出这样的結論：联軍通过貝尔貝克和北区后攻克了塞瓦斯托波尔灣后面的一些高地，沿直綫进入巴拉克拉瓦海灣。这里應該指出，軍队在占領了瞰制塞瓦斯托波尔的高地以后安稳地順另一面斜坡下去，向距离 11 英里的另一港口挺进，以實現“在那里建立作战基地”的唯一目的，从軍事观点来看这种做法是不能容許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則是完全可以容許的：海軍上将萊昂斯以一部分軍舰包圍赫尔松涅斯角，以保证联軍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有一个港灣来停泊舰艇，同时便于卸下我們一直认为仍未卸掉的攻城炮。不言而喻，卸火炮时必须要有—支部队进行掩护，而这支部队不是由主力在旧堡附近登陸后抽出，就是由那些从君士坦丁堡和瓦尔那渡海过来的預备队抽調一部分組成。

报告接着說：

“緬施科夫公爵亲率 22 000 人作战部队并等待援軍的到来。”

英国报纸由此得出結論：从 9 月 20 日到 28 日俄軍在战斗中損失了 25 000—30 000 人。这是由于报纸和腊格倫勳爵都同样认为俄軍有 45 000—50 000 人参加了阿尔馬河会战。我們以前就已說过^①，我們 *prima facie* [一开始] 就不相信这些数字，并且一直认为緬施科夫公爵指揮的野战軍兵士不超过 25 000 人；現在查明，我們的看法是和俄国人自己公布的数字相符合的。

报告中还說，“阿納帕要塞已被俄軍焚毀，其守軍已开往战区”。我們不认为这个消息是正确的。假如緬施科夫公爵想要援軍及时赶到的話，那末最恰当的做法是从皮列柯普調遣，而不是从距离克里木将近 200 英里的阿納帕調遣；假如他不能指望从皮列柯普得到援軍，而隔海抽調阿納帕的守軍，那就是很大的冒失行为，因为这样一来为了增援塞瓦斯托波尔，把俄軍在高加索的最后一个堡垒也牺牲了。总之，我們认为，不管这个官方报告中的全部“情报”怎样，我們仍然要把阿尔馬河会战看做是一个确实可靠的重要事件。但是，直到現在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事件的詳細記載，而紐卡斯尔公爵已經預先通知英国公众，在 10 月 9 日星期一以前不要等候这种記載。我們除腊格倫勳爵的官方电报报告以外所知道的情况可归結如下：倫敦当鋪的英雄圣阿尔諾元帅在作战那天“不舒服”（其他英雄是否也有类似情形？），——主要指揮权落在腊格倫勳爵手中，——英軍損失了不是 1 400 人，而是 2 000 人，其中有

^① 見本卷第 545—546 頁。——編者注

96 名軍官，目前已有 6 船伤兵运到君士坦丁堡。

奥美尔-帕沙的軍隊从布加勒斯特和瓦拉几亚經過魯舒克、錫利斯特里亚和沃尔特尼察向黑海沿岸地区移动，显而易见，这证实了克里木的联軍統帥部要求增援的傳說。但是土軍这次撤离瓦拉几亚，也可以說是因为奥地利想让他们們远离通往貝薩拉比亚的各条大道，只給他們留下經過多布魯甲的那条不能通行的道路。

虽然英国公众确实表现了空前的輕信态度，但是应该指出，这种普遍的热情很少触及倫敦的交易所，股票上漲沒有一次超过 0.625%。当时巴黎的国家证券一下子上升了 1.5%，即使是这样的上升，同滑铁卢失敗后出現的 10% 的上升比較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由此可見，如果这场騙局是有人为了进行投机而制造的，——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那末这场騙局絲毫沒有滿足它的制造者們所抱的美好希望。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0 月 5—6 日

作为社論載于 1854 年 10 月 21 日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421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騙局。——概評

1854年10月6日星期五于倫敦

英国人在本周內所經受的激动和緊張是难以形容的。星期六，市长在銅号声中在交易所宣讀了关于阿尔馬河会战胜利的報告，而在全國則流傳着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假消息。全世界都受了騙。拿破侖在布倫向自己的軍隊宣布了这个值得庆幸的事件，英国和法国的報紙也为这件事发表了社論，奥地利皇帝向法国皇帝和英国女王祝賀胜利，但是他謹慎地避而不談塞瓦斯托波尔；节日的灯火通明，礼炮轰响。不久我們就知道了是什么消息引起这样的兴奋和欢跃；其实消息的来源是很值得怀疑的。有一个“韃靼人”（土耳其人对信使的称呼）来到了布加勒斯特，他从君士坦丁堡給奥美尔-帕沙送来一份報告，这位將軍不在，公文原封未拆地轉給他了，因此，我們无从知道它的內容。但是据信使說，在他离开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城里正装置彩灯并有命令連續悬挂10天。他由此得出結論說塞瓦斯托波尔已被攻占，还讲了一些只有土耳其或倫敦的信使在小酒館里才会讲出的詳細情节。他說击毙了18 000名俄軍，繳获了200門炮，——虽然在要塞內共有500多門炮；不用說，还有22 000名俄軍被俘擄了——因为大家知道，守备部队总共有4万人左右。起初舰队被包圍，然后一部分被击沉，而緬施科夫公爵打算把自己同其他一部分軍艦一起炸毀，如此

等等。

可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雷德克利夫勋爵并没有把这样重要的事件通知驻布加勒斯特的领事，而法国政府也没收到任何报告。然而消息实在是太好了，不能不相信它，因此人们也就相信它了。虽然，第二天从圣彼得堡发来一则消息，提到了緬施科夫公爵9月26日的报告内容，即在阿尔馬河会战后他往辛費罗波尔方向撤退，但是各报不但没有立即放棄关于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令人惬意的誤解，反而断定这是打印上的錯誤，说什么实际上报告注明的日期是9月20日。今天英国輿論清醒过来了：关于没有圍攻就占領了大要塞的似是而非的消息原来是一场无情的騙局，它使得报纸以后要謹慎从事。

在西班牙，不仅在馬拉加（我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共和派在这里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甚至在埃斯帕特罗住过很多年的洛格罗尼奧也发生了騷乱；一則电訊报道說，在哈安破获了一桩共和派的密謀，因而唐·恩利科王子（女王低能的丈夫的兄弟）被派往巴利阿里群島去了。但是，关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所引起的激动情緒是如此强烈，以致誰也不去注意西班牙的事件。

在丹麦，10月2日議會开幕。国王发表了向會議挑衅的御前演說。这个演說引起了表示維護宪法的口哨声和呼喊声。“法兰克福报”再次报道說，盟国决定修改1852年5月8日簽訂的声名狼籍的条約²⁹⁰，根据条約，丹麦王位的继承权始終屬於俄国皇帝。烏尔卡尔特不断引誘公众注意这个破坏欧洲外交威信的文件，看来，他的努力現在終於成功了。假使这則消息一般是可信的話，西方强国这一計謀便包含着这样一个目的：通过重新談判使普魯士加入盟国，因为当时普魯士没有同意上述条約。值得注意的是，帕麦

斯頓过去把这个条約（像 1840 年的条約一样）看做是对付俄国的一种手段，而目前修改条約又應該理解为对俄国的一种敌对行为。

有消息說，奥地利給圣彼得堡送去了一份照会，再次提出四个条件作为和談的基础，并指出沙皇拒絕接受这些条件将被弗兰茨-約瑟夫看做是 *casus belli* [战争的理由]。这是在克里木获得的胜利的結果之一。

下面的評語是針對“經濟学家”不久前所載的一篇文章发表的，我們把它从斯密斯先生和查理先生的商业通告中摘引出来：

“从对俄貿易的观点来看，战争开始后所作的种种声明或暗示中，最重要的是‘經濟学家’上星期六所提出的論点。必須注意到：这家周刊是屬於財政部秘书长之一（威尔逊先生）所有，因此我們想提起大家注意的那些意見，应当看做是半官方性的。‘經濟学家’首先闡述了彼得堡交易所里的情况，并指出由于我們和普魯士进行貿易的結果，普魯士必然会把不列顛的黄金提供給俄国作軍費；它說，我国政府預料到了这一切，但认为事情的这种状况毕竟是两害之中的輕者；接着它报道說，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我們將独占黑海及其沿岸，并成为多瑙河的主人。但在这个时候俄国也許会占据我們武力所不及的能够賴以考驗英国的耐性的障地，因为只要通过貿易就使这个障地易于攻破。可能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問題：我們的民族利益是否会要求我們現在实行不同于我們过去所实行的另一种政策？我們可能发现我們封鎖港口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我們的貨物需要由邻国中介才能运抵市場，普魯士可以靠当經紀人而发财，結果我們对俄国海岸的封鎖会被輕而易举地打破等等。因此，如果根据最高政策考虑’——‘經濟学家’带极郑重的警告的口吻总结說，——‘必須重新研究有关加强封鎖和限制陆上与海上貿易的問題等等……那末誰願意从事这样的冒险事业（如供給俄国資本以便在冬季购买应在来年送到那里的貨物），願意考虑到，在俄国战局的第二年可能要采取和在第一年被认为最明智和最合适的政策截然不同的政策，倒也不坏。’

未必需要着重指出由此得出的結論（我們郑重地建議朋友們仔細研究一下全文的內容）：盟国決定在明年封鎖陆上貿易作为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唯一

途徑，而为了阻止資本家从事即将被禁止的貿易，政府极其关切地允許財政部的一位秘书长非常及时地使我国商人了解政府的意图，以免这件事給他們帶來严重的后果。星期六脂油的价格比星期五稍微低些。很可能，要不是我們所談到的‘經濟学家’上的这篇文章，今天的价格会受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影响而跌落。有一种意見认为，这个重要要塞的陷落会使俄国皇帝同意締結協定，而我們的意見正好相反：这个災难只能激怒沙皇，迫使他在別的方面寻求报复。十分明显，在他还没有被迫放棄自己的大城市的时候，他可以认为自己不完全是战敗者，因此在他未陷入絕境以前，他宁願孤注一擲也不会让步。所以我們认为，只要不是真正地把‘經濟学家’认为盟国打算施行的那个方針付諸实现的話，这个战争可能要延續好几年。”

10月5日的“通报”报道，根据波拿巴的命令，最近三年来被囚在貝耳島的巴尔貝斯被无条件釋放了，因为他写了一封信，表示强烈地希望十二月政变的文明战胜俄国的文明²⁹¹；順便指出，前一文明不久前在雅典表现为1848年6月的日子的重演，当时法兰西暴兵在那里把一位“思想危險的”報紙出版者逮捕起来，并焚毀了他的書籍和文件，最后把他投入了監獄。巴尔貝斯今后不再是法国的一个革命領袖了。他声明同情法国軍隊，不管他們是为了什么事业和在誰的指揮下作战，这样一来，他就坚决地使自己向俄国人看齐，同他們一样对本国参战的目的采取不审慎的态度。长时期以来巴尔貝斯和布朗基一直在相互爭夺对革命法国的真正的領導权。巴尔貝斯不断地污蔑布朗基，指責他勾結政府，借以破坏他的声誉。关于他們两人中誰是和誰不是革命者的問題，巴尔貝斯的信和波拿巴的命令就可以提供答案²⁹²。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年10月5—6日

載于1854年10月21日“紐約
每日論壇報”第421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阿尔馬河会战

关于阿尔馬河会战的官方消息终于收到了，在今天本报上我們刊載了司令官們的报告和目睹这次会战的英国記者和一些海軍軍官的詳細报道。所有这些材料基本上证实了我們根据有关这次会战的最初的一些电訊所得出的結論。看来，事实是这样的：

在距海岸約3英里的地方，阿尔馬河弯成半月形，两角指向北方。河的南岸，大部分是高約300英尺的悬崖，在这里像一个半圓形的劇場，稍稍向河面方向傾斜。俄軍選擇了这个左右都有台地边缘的断崖掩护的斜坡作为陣地。必要时，俄軍的优势騎兵在任何場合都可以掩护部队沿平坦的台地退却，同时这上面几乎到处都可以撤走炮兵。从台地到河流的半路上，斜坡构成了梯形的阶地，俄軍在这里配置了步兵主力，左面有險峻不可攀越的悬崖作掩护，右面也有同样險峻的悬崖，还有阶地上的多面堡、制高点上进行纵射的重炮队作掩护。海軍上将安梅林断定这个炮队是由12門三十二磅炮組成的，但是这样重的火炮在退却时如何运走（无疑是运走了），却是这位軍官所未能解釋的一个謎。

俄軍陣地前面的葡萄园和岩崖构成的起伏地形，对防御是有利的，加上 abattis〔鹿砦〕和其他人工障碍物，防御的任务更易完成；不过由于这个地区树木不多，这些障碍物未必特別可怕。在俄

軍背后的高台地上和两翼配置了他們的預备队和騎兵。在正面，先驅兵配置在阿尔馬河的对岸，占据着阿尔馬村和布尔留克村。

联軍在9月20日向这个坚固的陣地前进，法軍在右，英軍在左。清晨，法軍博斯凱將軍的一个师(第二师)，連同土軍8个营被派沿海岸前进，任务是在舰炮掩护下从那里攀登悬崖，从而迂迴俄軍的左翼。英軍本应对敌人右翼采取同样的行动，但舰船无法进行掩护，而且在台地上他們对面是敌人的騎兵主力，因而，这部分攻击計劃沒有实现。但是博斯凱指揮的法軍却成功地攀登了台地的峭壁，而且当这个高地上的俄軍遭到舰船上的重炮轰击时，拿破侖亲王指揮的法軍第三师向俄軍左翼运动。不久，俄軍的中央和右翼都遭到了英軍的攻击。同拿破侖亲王的师并肩前进的是德·雷希·伊文思爵士(曾在西班牙卡洛斯派战争时期指揮过英籍軍团²⁹³)指揮的英軍第二师，支援他的是英格兰將軍(第三师)。联軍的极左翼是乔·布朗爵士指揮的英国輕步兵师，支援該师的是劍桥公爵指揮的近卫师。預备队(乔·卡瑟克特爵士的第四师和卢肯伯爵的騎兵师)在左翼的后卫內机动使用，以便粉碎敌人迂迴翼側的一切企图。

看来，这次会战的特点是：会战的开始时期，即全綫进行互射并在射击的掩护下进行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机动的时期，非常短促。事实上，俄軍陣地已經判断得很清楚，并且俄軍强大的炮兵又如此配置，以致稍长时间的互射对联軍來說不仅无益而且簡直有害。既然英軍走在法軍后面，看来法軍一度不得不处在这种扰乱性射击下；但是，后来法軍纵队和英軍散兵綫开始緩慢而稳步地通过了他們面前难以通行的地段，把俄軍从阿尔馬村和布尔留克村驅逐出去(退却部队把布尔留克村燒光，使联軍不能利用它作为掩

蔽地点), 渡过了河, 并且毫不迟延地冲向高地。在葡萄园内以及在断崖和鹿砦之间的许多地方发生的战斗很像 1848 年在维罗那和卡斯提奥涅之间发生的战斗²⁹⁴。正规地前进是不可能的; 密集而不成队形的、行动大都互不联系的大批散兵给自己打开了通向俄军防守的第一个阶地的道路。这时, 博斯凯将军使他的一个旅在台地上站住了脚, 从这里威胁了俄军的左翼; 为了援助他, 派出了第四师(福雷师)的一个旅, 同时以福雷师的另一个旅增援拿破仑的师。这样, 法军占领了严重威胁俄军左翼的阵地。在俄军的右翼, 乔治·布朗爵士夺取了俄军的多面堡——这是阶地上俄军这一部分阵地的锁钥。虽然俄军预备队从高地上发动攻击, 一度逐走了英军, 但由于苏格兰兵士(剑桥公爵的师)进行了攻击, 最终还是守住了这个工事。因此, 俄军的左翼被迂回, 右翼被突破。中央遭到正面的攻击后, 只好沿坡而上向台地方向退却; 俄军在到达台地以后, 由于拥有骑兵和骑炮兵, 又处于特别适于这两个兵种行动的地形, 也就不怕任何严重的攻击了。但是俄军的左翼在遭到博斯凯迂回的时候大概发生过某些混乱。法国对这个问题的报道是一致的, 同时, 缅施科夫的马车在那里落入法军之手这个事实也完全证实了他们的报道。另一方面, 俄军能够运走了他们的全部火炮, 甚至包括右翼炮队的重攻城炮(法军连一门火炮都没有缴获, 英军只缴获 3 门, 并且可能是已被击毁的), 这个情况说明退却总的说来是井然有序的, 同时证明缅施科夫在优势刚刚转到对方就立即停止战斗的决定是英明的。

看来, 联军作战是很勇敢的。历史上很少有几次会战像这次那样, 军队几乎是不间断地、缓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 而且完全没有通常那些使大多数大会战具有戏剧味的意外情况和偶

然事件。单单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不管怎样，联军在兵力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同时也证明联军的将军们在报告中极端夸大了俄军的人数。我们现在回轉来談談这个问题。

联军的指挥艺术是不坏的，但是他们与其說依靠了将军们的才智，不如說依靠了军队的勇敢和舰队的支援。这可以說是一次简单的、寻常的、具有純粹战术性质而特別缺少任何战略特点的会战。博斯凱的翼側机动是一个很自然的主意，而且由那些在阿特拉斯峡谷里学会这种机动方法的非洲軍团的兵士很好地完成了。英軍突破了俄軍的右翼，战斗得率直而頑强，看来各团和各旅的良好机动也促进了这一任务的完成。不过，英軍成前后两道散兵綫进攻的单一形式所以被破坏，只是由于天然障碍，而不是由于目的要欺騙敌人或者使敌人措手不及的复杂机动。

緬施科夫公爵很好地選擇了自己的陣地。但是，看来他沒有像他能够做到的那样去利用自己的騎兵。为什么在左翼不配置騎兵，趁孤立的博斯凱旅刚开始整队时就把它从悬崖上赶下去呢？停止会战、部队撤出火力圈、撤走炮兵和整个退却，看来都进行得非常巧妙，这些行动給他的指挥才能所带来的荣誉比胜利給联军将军们的指挥才能所带来的荣誉还要大。

至于参加会战的兵力，联军方面除炮兵外在戰場上有3个法国师和4个英国师，同时1个法国师和1个英国师以及全部騎兵留作預备队，派去增援博斯凱但在战斗結束后才到达的8个土耳其营沒有計算在內。因为法軍把較强的部队留在瓦尔那，而且在那里遭受的損失比英軍大，所以可以认为在会战当日英法各师的兵力几乎相等——每个法国师約6000人，而每个英国师約5500人。这样，实际上作战的步兵将近4万人，并有預备队約16000

人,其中包括土軍;看来,这同关于远征軍兵力的报道是相符的(除去病員和外出的部队)。按圣阿尔諾元帅的說法,俄軍的兵力为两个基干师(第十六和第十七师)和两个預备旅(由召回的归休兵組成,即第十四和第十五旅),此外还有猎兵第六营。如果各旅所屬的营数齐全,总共应有49个营。每营以700人計算(在这次战争中每营一般不多于此数,虽然在匈牙利战争中每营多50人),总共有34300人。这个数字和我們的資料提供的駐在塞瓦斯托波尔及其四郊的正規陆軍的总数相近,并且很可能至少有五、六个营留作这个要塞的守軍,因此俄軍参加会战的兵力可能是3万名步兵,这个数字可以說是大致可靠的。据說,俄軍有騎兵6000名,当然其中有許多不过是些哥薩克。联軍兵力的这一明显优势,使胜利失去过分的荣誉,而讀者从我們引自英国报纸的材料中看到,人們正企图把这种过分荣誉看做是这次胜利造成的。看来,双方都表現了同样的勇敢;当然,無論联軍的將軍們怎样夸耀自己的胜利,但他們也决不会設想他們在胜利后能够既不遇到障碍,也不遇到抵抗而旌旗招展、軍乐喧天地直接开进塞瓦斯托波尔。

会战的結果虽然在精神上对联軍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未必能够使俄軍产生严重的沮丧情緒。这次退却同呂特岑或包岑会战后的情况相似;如果緬施科夫能够像布呂歇尔在卡茨巴赫河会战²⁹⁵前所作的那樣,巧妙地 from 巴赫契薩賴的側防陣地拖住联軍,那末联軍还会相信,这种毫无結果的胜利不会給胜利者带来多大的好处。緬施科夫仍然会以雄厚的兵力威胁他們的后方,而在他們沒有再一次把他打敗和最后把他赶走以前,他仍然是可怕的敌人。現在几乎一切都决定于双方援軍能不能到来,一方面联軍从預备队中抽調,另一方面俄軍从皮列柯普、刻赤和阿納帕的部队中抽調。誰

能够首先取得数量上的优势，誰就能够給对方严重的打击。但是緬施科夫有一个优越的条件：他可以在任何時間放棄进攻而退却，而联軍却被束縛在他們的仓库、兵营和輜重所在的地方。

目前，塞瓦斯托波尔虽然一面被圍，但看来並沒有危險，因为联軍的兵力优势还不足以在两条战綫上作战。但是，如果联軍能在緬施科夫的补充部队开到以前，先得到一支两万人的援軍，——根据昨天晚上我們从哈里法克斯的电訊中得到的“尼亚加拉号”輪船带到的消息来看，这差不多是可靠的^①，——那末許多問題都可能在数日內得到解决。不能希望像塞瓦斯托波尔这样的要塞，在遭到严重的、坚决的攻击时能面对暴露的塹壕坚持两星期之久。全部預备队都已由瓦尔那乘船出发，并且应在10月4日或5日到达，但是由哈里法克斯发出的电訊沒有提到到达的日期，因此，不管怎样，塞瓦斯托波尔未必会在10月16日或18日以前陷落。也許积极进行平地战，使它多坚持一些时候；但是，如果緬施科夫及其在联軍后方的机动部队不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如果联軍不因时疫而受到損失，那末塞瓦斯托波尔必将陷落。根据俄軍的准备情况和士气来看，可以相信，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只有在拚命的抵抗和惊心动魄的血战之后才会失守。当然，强攻和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殘酷情况从某些方面說将会胜过阿尔馬河惨象。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10月9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1854年10月26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4219号

① 哈里法克斯在加拿大；这句插入語是报纸編輯部加的。——編者注

弗·恩格斯 俄国的兵力

我們完全可以暂时让約翰牛和雅克佬²⁹⁶为阿尔馬河会战的“光荣胜利”而狂欢，为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而預祝。多瑙河和克里木的軍事行动，不管对盟国和欧洲資产階級自由派陣营有多大关系，对俄国是沒有很大意义的。这个国家的重心决不会受到这些軍事行动結局的影响，然而对于联軍，在克里木失敗和被迫退却可能意味着陆战长期中断和士气受挫，他們只有經過极大的努力才能重振士气。

最近，我們收到了有关俄軍兵力区分和最近調动的可靠消息，把这些消息汇集在一起，看一下已經作战的俄軍兵力同俄軍总数相比占多小的一部分，其余的兵力又可能采取什么行动，这也許是有意义的。

大家知道，俄軍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一、主力軍隊

近卫軍和擲弹兵組成的精銳部队 2 个軍，有 76 个步兵营、92 个騎兵連、228 門火炮。

6 个基干軍，有 300 个步兵营、192 个騎兵連、672 門火炮。

3 个騎兵軍，有 176 个騎兵連和 96 門火炮。

共計 376 个步兵营，460 个騎兵連，996 門火炮。

二、地区军队

芬兰军,有 12 个步兵营。

奥连堡军,有 10 个步兵营。

西伯利亚军,有 15 个步兵营。

高加索军,有 55 个步兵营、10 个骑兵连、180 门火炮。

高加索军的预备部队,有 36 个步兵营、2 个骑兵连。

高加索基于军,有 47 个步兵营。

共计 175 个步兵营, 12 个骑兵连, 180 门火炮。

三、哥萨克和其他非正规部队

约 700 个骑兵连, 32 个步兵营和 224 门火炮。

四、预备部队

1. 内勤部队约 50 个营(不包括残废兵)和 77 个惩戒队。

2. 主力军队的预备部队: 近卫军和掷弹兵 24 个团的第四、第五和第六营(每团 3 个营), 基于军 72 个团的第五和第六营(每团 2 个营); 共计 216 个营。

所有这些预备部队已经征召服役并已全部编成, 因而已经开始用最近一次征召的 30 万人给各团编组第七和第八营; 因此, 上述 216 个营可以列入总数, 这样就有 726 个步兵营、472 个正规骑兵连、700 个非正规骑兵连和大大超过 1 000 门的火炮。关于骑兵和炮兵预备部队的编组情况, 在俄国国外知道得很少, 所以没有包括在这个总数里。

幸好, 这个数目实际上并没有表面上那么骇人。要确定俄国真正能用于欧洲战争的军队人数, 就必须从总数中除去西伯利亚军、内勤部队和至少一半的哥萨克; 那末, 剩下的约有 650 个步兵

营、472 个正规騎兵連和 350 个非正规騎兵連以及約 1 200 門火炮。这些部队至少有 52 万名步兵、62 000 名騎兵和 3 万名哥薩克，也就是 60 万人多一点，他們分布在从里海沿黑海和波罗的海到白海的整个边界上。

从对土耳其的战争开始以来，在帝国南部边界陆續参加作战以对抗联軍的有下列部队：

1. 第三、第四和第五基干軍及其部分預备部队，但大部分預备部队还在途中。
2. 3 个高加索軍的全部。
3. 第一基干軍的 2 个师(該軍兵力的三分之二)，預备部队不在內。
4. 在克里木的第三騎兵(龙騎兵)軍的一部。

战局开始前，这些部队共計为 24 万人，但是現在至少已減到 184 000 人；其中 84 000 人可以算它是貝薩拉比亚軍团，54 000 人在克里木或正向那里調动，46 000 人在高加索。

到 8 月底，在波罗的海地区有：

在芬兰的第六軍的預备部队.....	16 800 人
芬兰軍.....	12 000 人
近卫軍及其預备部队.....	66 800 人
在列維里的擲彈兵軍的一部分.....	10 000 人
共 計.....	105 600 人

在波兰或向那里調动的有：

擲彈兵軍的其余部分及其預备部队.....	55 000 人
第一軍和第二軍及其預备部队.....	120 000 人
哥薩克和各軍的騎兵.....	30 000 人
各种預备部队.....	25 000 人
共 計.....	230 000 人

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约为 575 000 人，这个数目加上奥連堡軍（在阿斯特拉罕）、1 个預备队騎兵軍以及駐在白海地区和其他地方的部队，就得出上面所說的总数。駐波兰的部队中，約 3 万人在行軍途中，約 2 万人担任华沙的守备部队，約 10 万人占領了旧波兰王国境內的維斯拉河右岸，并且約有 8 万人作为預备队駐在沃倫和波多利亚的布格河和德涅斯特尔河沿岸地区。因此，俄軍的主力，包括穿戴讲究的近卫团和擲彈兵团在內，都集中在彼得堡—霍亭一綫，即沿帝国西部边界一綫。但是这同时也表明，部队并不是駐扎在最重要的陣地上。由一个近卫师替換下来的擲彈兵部队离开了列維里，并同其余两个近卫师一起开往波兰；这两个近卫师所屬的每个团有 4 个营，只有第五和第六营留在彼得堡。所以，西部的軍队已經超过 27 万人，并且开来同他們会合的还有 3 个預备队騎兵軍，他們还根本沒有参加过作战；这使西方軍团增加到 30 万人。

現在，軍队的配置已經改变。占領波兰王国东南部的 10 万人渡过維斯拉河沿奥地利边界占領了陣地。駐沃倫的 8 万人派往波兰，使軍队沿这个界境构成綿亘的一綫。近卫軍、擲彈兵（随着部队到达的情况，可能还有各騎兵軍）則在后方占領中央陣地。在冬季，由于波罗的海結冰，可以从那里再临时抽出一些部队。到 5 月，用来編成各团第七和第八营（即新編营，共計 192 个营，13—14 万人）的新兵，就会受到足够的訓練来接替他們的位置。

因此，很明显，尼古拉很少为帝国南部发生的事担心，因为他已在波兰最好的战略陣地上集中了 30 万人。这也确实是最好的陣地。它像楔子一样插在普魯士和奥地利的中間，从翼側包圍着它們，而它本身又有軍事学术同自然相結合所能提供的最坚强的

防禦手段作为掩护。拿破侖深知被維斯拉河及其支流环抱的这个地区的軍事价值。他在1807年战局中曾把这个地区当作自己的作战基地，直到夺得了但澤为止。但是他一直沒有注意在这里設防，結果在1812年退却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俄国人，特別在1831年以后，却做了他們前人所忽視的事情。莫德林（即諾沃-格奧尔基也夫斯克）、华沙、伊万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构成一个完整的要塞体系，它在战略的配合方面是举世无双的。潰敗的部队只要获得給养，便可利用这一体系抵抗比自己强大一倍的敌人，而要切断整个这一地区的补給綫，那还是从来沒有人試图解决的問題。熟悉这个地区的一位德意志軍事著作家說过：整个这一复杂的要塞体系，证明俄国人的企图与其說是防禦的，不如說是进攻的。建立这一体系的目的是为了所在地区的防禦，而主要是为了利用它作为向西方进攻的基地。

仍然有人相信，如果塞瓦斯托波尔尔失守，尼古拉将請求議和！但是俄国連三分之一的王牌都还没有用上，暂时失去塞瓦斯托波尔尔和舰队，对这个巨人來說算不了什么，因为塞瓦斯托波尔尔也好，舰队也好，对他都不过是小玩意。俄国完全明白，对它有决定意义的战区不是敵軍能登陆的沿海地区，而是大陆內地，因为在这里可以調动大軍集中作战，而不致在徒劳无益的海岸防禦中分散兵力去对付随时都能逃逸的敌人。俄国可以丧失克里木、高加索、芬兰、圣彼得堡和别的边区，但是只要不触及它那个以莫斯科为心臟而以設防的波兰为右臂的軀干，它是絲毫用不着让步的。

可以說，1854年的主要軍事行动不过是載入1855年編年史的民族大战的小小序幕而已。只有当俄国主要的西方軍团和奧地利軍隊彼此对抗或者互相携手出現在舞台的时候，我們才会看到

Handwritten notes at the top left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word "Handwritten notes" and some illegible scribbles.



弗·恩格斯的“俄国的兵力”一文的准备材料的一页

同拿破侖的历次大战相似的真正的大規模战争。并且还有可能，这些战争只是其他更激烈的、更有决定意义的战争的序幕，即欧洲人民群众反对那些目前胜利的和自以为巩固的欧洲专制暴君們的战争的序幕。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10月16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1854年10月31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4223号

弗·恩格斯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圍攻

在阿尔馬河会战以后，联军在克里木的主要成就就是腊格倫勋爵由阿尔馬河向巴拉克拉瓦的著名的側敌行軍；由于这一行軍，战局的明显任务——攻占塞瓦斯托波尔——就縮小为对俄国要塞的一部分(而且是最薄弱的一部分)进行 coup de main [突然襲击]；固然，这次行动預定要消灭俄国舰队、破坏造船厂和軍火庫，但是規定联军在完成这个任务后必須立刻撤退。整个行动表明，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放棄对要塞的北部正面，即瞰制整个要塞和唯一能使攻击具有决定意义的北部正面的攻击；因而，这就是远征軍公开承认沒有能力完成自己計劃中規定的任务：完全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然而，像我們以前所报道的，人們正是用了无数充滿夸張詞句和含糊空話的篇幅，把这次行軍吹嘘成指揮艺术的杰出表現。就連在当地派有記者的倫敦各大報紙，也只是在一个月以后，而且看来是得到政府的暗示以后，才透露了真情。例如，倫敦“泰晤士报”只是在10月28日才公布了真实情况，它謹慎地暗示：到目前为止，整个战局的任务看来只解决了一小部分，而海灣北面的堡垒，如不自願投降，就未必能够攻下。当然，“泰晤士报”希望这些堡垒会彬彬有礼地投降，因为一旦要塞的主要部分被攻占，一切附屬工事就一定要投降。事实上，不是北堡依靠塞瓦斯托波尔，相反地，是塞瓦斯托波尔依靠北堡，而且我們很担心，单凭我們同行

的想像，是不足以攻取这样坚固的要塞的。

不管怎样，自从上面談到的这次“光荣的行軍”以来，联軍沒有作出一点多少值得夸耀的事情，因此我們不能够責难我們的英国同行对这次行軍如此大吹大擂。至于这次圍攻的經過，目前还屬於大概連他們自己也宁願尽量少談的話題。但是，既然我們首先应当态度公正，也就不必那样客气。事实是，在这場本来已經够奇怪的战争中，这次圍攻是最奇怪的事情之一。看来，这次战争中的特点，就是深信野战工事是不可攻占的。首先从沃耳特尼察說起，俄軍在那里用旧式的炮击法进行了几小时的轰击，然后才试图以强攻夺取工事，但是沒有成功。在卡拉法特，俄軍甚至不敢攻击。在錫利斯特里亚，简单的土质工事擋住了进攻者的主要突击，并且当这种工事几乎已被夷为平地时，它仍然在抵御敌人猛烈的攻击。还有，現在在塞瓦斯托波尔，简单的野战工事綫竟荣幸地看到自己面前架設着大量的破城炮队和比攻打最完善的要塞所用的还要多得多的重火炮。这次圍攻非常突出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就落后了多少。假如拿破侖看見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架起八英寸和十英寸口径火炮的炮队，他定会哈哈大笑。但是，这还远不是事情的全部。

联軍約在10月1日占領了陣地，但是在10月8日或9日才开始挖掘塹壕，而且到10月17日还一炮未发。这次拖延的原因是火炮未能更早地运到当地。它們总共只需要通过四、五英里的路程，而且地面坚硬，只有一些起伏不大的斜坡，有一段还是已經鋪好的不坏的道路。但是沒有馱載的牲口。在牲畜比任何地方都多的克里木，竟然沒有馱載的牲口！在拜达尔谷地，从黑山頂可以看見許多犍牛，其数量之多足以把整个联軍舰队拖过高山而有余。

但是拜达尔谷地是哥薩克自由通行的地方，联軍騎兵去襲击时可能遇到这些可怕的敌人。此外，联軍应当与当地居民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不去侵犯他們的财产。英国报纸企图以这些遁辞来避免承认事实的真相：腊格倫和康罗貝尔虽然从南面封鎖了塞瓦斯托波尔，但本身又被緬施科夫的警戒部队封鎖在黑河旁边。情况正是如此，这一点只要用下述事实就可以证明了：根据所有的报道，包括最近的报道，联軍被迫食用咸肉，因为他們不可能得到鮮肉了。

10月3日，俄軍5个营在因克尔芒附近渡过黑河，而且他們被允許自南面进入要塞，“因为这对联軍只会有利”。多么別开生面的战法！我們所說敌人已經被击潰、被瓦解、被歼灭，但他們却在联軍眼皮下面把3000人派进塞瓦斯托波尔。敌人是否有某种理由这样作呢？如果敌人有理由把这些部队派进要塞，那末腊格倫也有他自己的理由客客气气地讓他們进去。他认为城市会过于拥挤；有什么根据，現在还不清楚。不管怎样，俄軍除了防綫以內有4平方英里的地区外，还有整个北岸和在它后面的全部地区，在10分钟內便可以把一切多余的部队調往那里。把仅有一面被封鎖的城市說成已經过于拥挤，这无論如何是荒謬透頂的。

在最初得知登陆的消息时，我們曾預言过，如果战争拖延下去，时疫将是联軍最凶恶的敌人。現在时疫正在猖獗，至少就英軍而言，由于工作做得很糟，情况更加严重。的确，由于这一原因，病員很少得到照顾，以致腊格倫勋爵不得不对医务人员严厉申斥。但是情况还不仅如此。医官在君士坦丁堡，药品的儲备在瓦尔那，而病員在巴拉克拉瓦。对于路易·波拿巴不久前在布倫所讲的新軍事論点，即一支軍队要占領良好的障地，必須配置成三角之势，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实例嗎？随着季节轉冷，疾病加剧了，团队人数逐

漸減少，——英軍一个团出征时是 1 000 人，現在有战斗力的兵士不会超过 600 人，——而軍事行动仍然那样迟緩地进行。最高統帥部的陈規旧套——40 年和平环境中訓練的成果，是不可能被这些小事动搖的。让軍隊毀灭吧，只要能根据女王陛下的条例夺下塞瓦斯托波尔就行了！

在通常的圍攻中，圍攻者总是竭力使先头炮队尽量接近敌人的工事，600—700 碼就算是很远的距离了。然而根据腊格倫的說法，在像这一次这样的大規模圍攻中，并且圍攻的又多半是簡單的野战工事，就应当用相反的方法。敌人让我们接近到 700 碼，但是我们决不应当做敌人所希望的事情，这便是腊格倫的說法。于是他把自己的炮队配置在 2 500—3 000 碼的距离上；如果战报在这一方面留有哪怕最細微的可疑之处，我們就会认为这一事实是不可能的。以后，他接近到 1 500—1 200 碼，并且对于为什么不开火这个問題，他终于說：破城炮队要想进行有效的射击，应配置在距准备打开缺口的工事 300 或 400 碼的距离上！在远距离的炮队內一定有朗卡斯特炮²⁹⁷ 和十英寸的远射程炮，因为英国炮兵显然有这样的見解，即这些火炮像望远鏡一样，只适用于远距离。的确，完全适用于海軍炮兵的这种远距离射击，在应用于陸軍炮兵时造成的混乱超过了它带来的好处；这些可笑的炮队便是例子。

引起这种种天才的巧妙战法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向陆一面的工事，是由下列几部分組成的：在西面（法軍在这一面攻击）有卡兰亭炮台凸出的一个或两个正面。它的后面是带射孔的垒墙，这道垒墙一直延伸到卡兰亭灣的尽头，它的終点是筑在山崗上的圓形塔楼，这个塔楼是周圍土质工事的內支撑点。从这里到港灣的尽头筑有約 3 英尺厚的垒墙，它从西南面环繞着塞瓦斯托波尔。这段垒墙尽

管很容易整修好,但据说完全不适宜于防御,因此在它前面另有不大的土质工事作掩护。由港灣的尽头向东到軍港(英軍攻击的正面),如果不算和上述塔楼相类似的周圍有眼鏡堡作掩护的两个塔楼,总的說没有什么正规的防御工事。此外,这里还有一些不正规的土质工事,如果相信比达耳夫上尉发表的在当地繪制的草图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那末这一切只构成了一个极寻常的营垒。不管怎样,这些草图中只标出了一道由一些背面敞开的工事构成的防綫;这里沒有俄軍非常喜欢的閉合式多面堡。但是很难相信,全部情形就是这样。如果的确只需要夺取这一道防綫的話,英軍也許早就用白刃战把它攻下了。必須考虑到,后面还有第二道多面堡防綫。

俄軍在全部工事里都配有海軍重炮,这是他們能够为这些火炮找到的最好的使用場所。但是他們的射击技术极差。他們日夜不停地用这些火炮射击敌人,而一百发炮弹只有一发命中目标。可能正是这种拙劣的射击促使腊格倫勋爵把塹壕挖在3 000碼远的安全距离上。据报道,經過联軍舰队和陸軍3天的炮击后,英軍在自己的攻击正面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而法軍在攻击正面上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一当他們打开缺口,就应开始强攻。如果我們不是从可靠方面得知联軍在多远距离上配置他們的炮队,那末用200門如此大口徑的火炮需要三、四天才能粉碎这些防御工事的抵抗,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这就是我們对迄今获得的结果所能报道的一切,不管这些行动的結局如何,可以肯定地說,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圍攻在战史上将是独一无二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10月30日
作为社論載于1854年11月15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423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局²⁹⁸

今天本报刊载了“波罗的海号”輪船昨天带来的克里木战区的消息，它們充滿一种新的情緒，这无疑将使本报讀者感到震惊。在这以前，英国报刊的評論和英法記者对战争进程和前景的論述，一貫带有傲慢和过分自信的特色，而現在却流露出惶惶不安的感情，甚至有些惊慌失措。現在大家都承认联軍过去宣揚的那种对敌优势已不存在。塞瓦斯托波尔比預料的要坚固，緬施科夫作为一位將軍比預料的更有才干，而他的軍隊也比預料的要多得多。法軍和英軍現在不是一定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是有可能遭到可耻的失敗。本报駐利物浦記者——一位有爱国热情和抱有本国人的偏見的英国人——所描写的是这种情緒，英法两国政府十分坚决的行动中所表現出来的也是这种情緒。它們拚命地努力，以求加速向塞瓦斯托波尔增援。联合王国已經派出了最后的一兵一卒；許多輪船用于运输。5万名法軍开赴前綫，并希望都能及时赶到战区，参加最后的决战。

本报在星期六曾刊登大量文件，主要是有关圍攻的起初各阶段以及舰队之間的局部成功的、但总的說則是不順利的合作等問題；今天我們补充发表关于利普兰迪对巴拉克拉瓦的联軍猛烈攻击的公报和战斗行动进一步发展的綜合报道，应当承认，这些战斗

行动对联軍都是很不利。仔細研究这些文件就可以看出，联軍处境虽然困难，甚至令人担忧，正像我們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那样，但是未必像本报駐利物浦記者所感到的那样严重。我們并不认为有比被迫撤退和登輪回国更糟的情况在威胁他們。从另一方面看，他們仍然沒有失去以死拚的强攻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可能性。但是不管怎样，我們认为应当在英法本土的援軍到达克里木以前就解决問題，战局显然到了轉折点；由于已經进行的机动以及造成的錯誤和疏忽，战局的性质已經明确，它的結局也已經預先注定。我們已經有了关于主要事件的不容爭辯的可靠情报，現在可以对战局的整个进程作一簡要的叙述。

現已查明：当联軍在旧堡附近登陆时，緬施科夫指揮的部队共有 42 个步兵营和 2 个騎兵团（还有一定数量的哥薩克沒有計算在內）；塞瓦斯托波尔的守軍則是由海軍陆战队和水兵組成的。这 42 个步兵营屬於第十二、第十六及第十七步兵师。假定每营滿額时是 700 人，那就共有步兵 29 400 人，連同 2 000 驃騎兵以及哥薩克、炮兵、工兵和地道爆破兵，这支部队共有 32 000 人。緬施科夫以这样的兵力是不能阻撓联軍登陆的，因为如果阻撓登陆就会使自己預备兵力不足的部队处于联軍舰队炮火之下。只有可以牺牲一部分兵力的大軍，才能派出一些部队进行小規模的軍事行动：襲击和夜襲敌人正在登陆的部队；但是俄軍在这时却需要每一个兵士去进行当前的决战。此外，俄軍的步兵又最不适于小規模的軍事行动，他們成纵队以密集队形作战时才能發揮威力。至于哥薩克，則适宜于那种通常以俘获某些战利品为目的的更小規模的战斗。同时，看来克里木战局表明：最近 30 年来使哥薩克逐漸轉变为正規部队的做法挫伤了他們个人的进取精神，并且把他們弄得

已經既不适于非正規勤務，又不适于正規勤務。看来，他們現在既沒有在前哨內或独立部队內执行勤務的能力，也沒有在队列內向敌人攻击的能力。因此，俄軍动用每一刀每一枪来进行阿尔馬河会战是正确的。

在这个河岸上，32 000 俄軍遭到了 55 000 联軍的攻击。兵力对比几乎是一比二。当联軍已有将近 3 万人投入战斗时，緬施科夫便下令退却。当时参加战斗的俄軍不到 2 万人，如果企图繼續扼守陣地，俄軍勢必要将全部預备队投入战斗，結果就不是退却，而是被粉碎。当联軍由于巨大的兵力优势已胜利在握时，緬施科夫就停止了会战，用預备队掩护退却，并克服了博斯凱的迂迴运动在他的左翼所引起的一度混乱，“秩序井然地”撤离了戰場，既未受到追击，也未受到惊扰。联軍辯解說他們沒有騎兵可以用来追击，但是，俄軍总共也只有两个驃騎兵团，——無論如何比联軍的騎兵要少，——所以应当承认这种辯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像措尔恩多夫、埃劳、博罗迪諾等会战²⁹⁹一样，俄軍步兵虽然已被击败，但仍然证明卡瑟克特將軍對他們的評價是正确的，这位曾指揮一个师同俄軍作战的將軍公开說：俄軍“是不会惊慌失措的”。

但是，如果說俄国步兵保持了沉着和鎮定，緬施科夫自己却完全惊慌失措了。联軍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加上攻击时出乎意料的坚决勇猛精神，一度打乱了緬施科夫的計劃，使他打消了向克里木內地退却的念头，而向塞瓦斯托波尔以南运动，准备扼守黑河地区。这是一个不可原諒的大錯誤。如果他从阿尔馬高地观察联軍的全部陣地，就完全可以准确地估計出敌人的兵力，最多也不会有 5 000 人的誤差。他应当知道：虽然联軍在数量上占有相对的优势，但是还不足以既留下軍隊監視塞瓦斯托波尔，又同时向克里木

內地追擊。他應當知道：如果在沿海一帶聯軍同他的兵力對比是二比一，那末在辛費羅波爾附近，他便能以兩倍於敵的兵力對抗敵人。儘管如此，正如他自己承認的，他却退向塞瓦斯托波爾以南。不過在他沒有遇到聯軍半點阻礙而完成了這次退却，並使部隊在黑河南岸的山崗上休息了一兩天以後，他決定糾正自己的錯誤，其辦法就是由黑河向巴赫契薩賴進行冒險的側敵行軍。這種做法違背了戰略上的一個基本原則，但有希望獲得很大的成果。既然已經在戰略上犯了錯誤，那就很難避免錯誤的後果。這時，問題只在於對這種後果忍受到底有利呢，還是再來第二次然而已經是有意識地進行的不正確的运动來避開這種後果有利？我們認為，在這種場合，緬施科夫在敵人活動範圍內大膽地進行側敵行軍，從而終止在塞瓦斯托波爾周圍不合理的“集中”配置，是完全正確的。

但是，由於平庸的戰略家和墨守陳規的將軍們的努力，兩個敵對軍隊的运动都採取了在實戰中從未見過的形式。側敵行軍癩像霍亂流行似的，蔓延了對壘的雙方。在緬施科夫決定從塞瓦斯托波爾向巴赫契薩賴側敵行軍的同時，聖阿爾諾和腊格倫也想從卡特希向巴拉克拉瓦运动。俄軍後衛和英軍前衛在梅肯集農莊（它是用後來成為俄國海軍上將的一個蘇格蘭人的名字命名的）附近遭遇，很自然的，前衛擊潰了後衛。因為我們已經在“論壇報”對聯軍的側敵行軍從戰略觀點進行了評述，所以現在沒有必要再來重復。

10月2日或3日，塞瓦斯托波爾被圍，聯軍占領了緬施科夫剛剛放棄的那些陣地。從此，著名的塞瓦斯托波爾的圍攻便開始了，戰局也隨之進入新階段。在這以前，聯軍占有無可爭辯的優勢，可以為所欲為。他們的艦隊掌握着制海權，保障了登陸。登陸

以后，他們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无疑有較高的战斗素质，这就保证了在阿尔馬河取得胜利。但是，現在已开始形成軍队脱离自己的基地在敌国作战时迟早不可避免的那种均势。誠然，緬施科夫的軍队仍然沒有露面，但是它的存在使联軍不得不把預备队正面向东配置在黑河。因此，圍攻部队本身便大为削弱，在数量上只比塞瓦斯托波尔的守軍稍占优势。

缺少毅力、沒有系統（特別是英国陆海軍各主管部門的协作方面）、地形困难，而主要的是英国各軍事部門——不論是后勤部門还是作战部門——那种无法克服的墨守陈規的习气，使真正的圍攻战推迟到10月9日才开始。在这一天，終於在距俄軍工事1500—2500碼的远距离上挖掘了塹壕。这个在圍攻史上从来沒有看見过也沒有听到过的事实证明，俄軍仍然能够固守要塞四周至少一英里以內的地区，而且的确扼守到10月17日。17日早晨，圍攻作业已推进到使联軍可以开炮的距离。本来炮击很可能还要再拖延几天，因为联軍在这一天根本沒有做好开炮的准备，但是来自英国和法国的消息推动了他們，这些消息說：由于将在10月25日攻下塞瓦斯托波尔，現在举国欢騰。这当然激起了軍队的斗志，并且为了安定軍心，便不得不开炮。結果是联軍以126門火炮对抗200—250門火炮。但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屡次用来稳定輿論的沃邦的著名原理却說：

“圍攻是一种可以像数学那样精确地計算出結果的軍事行动，如不受外来因素的妨碍，它只是時間問題。”

这个著名原理是以这位工程师的另一原理为基础的，那就是：

“在圍攻时，攻击的火力是可以取得对防御火力的优势的。”

然而在这里，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情况恰恰相反：在开始射击时攻击的火力绝对弱于防御的火力。后果立刻显示出来：俄军在几个小时内就迫使法军炮队沉寂了，并且整日同英军炮队进行了几乎是势均力敌的战斗。为了转移俄军的注意力，联军进行了海上攻击，但是进行得并不比陆上好，也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法国军舰攻击卡兰亭炮台和亚历山大罗夫炮台，以支援对这些炮台的陆上攻击；如果没有这种支援，法军无疑会遇到还要激烈得多的回击。英国军舰攻击了海港的北部，其中包括康士坦丁炮台、电报局炮台和在康士坦丁炮台东北临时构筑的炮台。邓达斯海军上将，这个谨慎的人，命令自己的舰队在距炮台 1 200 码处抛锚，——他显然是赞成远距离射击的。但是，在军舰同岸防炮台的战斗中，军舰如不能进到距炮台 200 码或者更近的距离，以便准确地击中目标并获得最大的效果，就一定要打败仗，这是早就明确的问题。总之，邓达斯把自己的舰队置于毁灭性的炮火之下，如果不是艾德蒙·莱昂斯爵士赶来援救，他一定会遭到相当大的损失；看来当时莱昂斯几乎是违背了命令而率领 3 艘战列舰尽可能地接近康士坦丁炮台，使炮台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同时他自己也受到了损失。由于英法海军将领们的报告直到现在只字不提炮台的实际破坏情况，我们不得不认为，在这里，也和博马尔松德一样，蒙塔郎贝尔式岸防工事——堡垒与穹窿炮台——能够经受住数量多一倍的舰炮的轰击。这一点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炮台暴露的石砌体就同现在已为大家确知而且部分地已在博马尔松德表明的那样，经不住架设在岸上的海军重炮 24 小时的破坏射击。

在这件事情以后，法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射击好几天。英军因为炮队配置得距俄军防线较远，同时比起他的盟友来拥有口径较

大的火炮，所以能够继续射击，并且迫使俄军一个石质多面堡的上层火炮停止射击。海上攻击没有继续进行，这是对穹窿炮台表示敬畏的最好证据。俄军在阿尔马河会战中的防御使胜利者大为清醒。在每门被击毁的火炮的位置上换上了新的火炮。白天被敌人破坏的每个射孔，在夜间又修好了。在土工作业方面，当联军没有采取措施以获得优势以前，双方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腊格伦勋爵发出的“顾惜城市”的可笑的命令取消了，于是炮击开始了，对集结的部队的集中轰击和它所起的疲惫作用，看来使守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此外，在炮队前面还派出了猎兵，利用各种掩蔽物瞄准射击俄军的炮手。同在博马尔松德一样，米涅式步枪起了很大的作用，重炮和米涅式步枪在几天内杀伤了大部分俄军炮手。水兵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而他们是守军中使用重炮最熟练的人。于是，不得不采用被围守军的常用手段，即步兵在幸存的炮手指导下使用火炮。但是很容易设想，他们的射击几乎毫不起作用，因此围攻者就有可能使塹壕越来越接近要塞。据报道，他们在距外圍工事300码的地方挖掘了第三道平行壕。我们还不知道，在这道平行壕里配置了什么样的炮队；现在只能指出：在正规围攻中，第三道平行壕总是挖掘在被攻击的工事的斜堤脚附近，也就是距壕沟50或60码左右的地方。如果这个距离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被加大了，那末我们只能认为这证实了某些英国报纸的看法，即防线的没有规则不但使英国工程师们无法发挥创造才能，而且把这些绅士们弄糊涂了，因为这些绅士们虽然能够按照所有的现成规则摧毁正规棱堡的正面，但是一旦敌人不按照在这个问题上公认的权威所制定的规则行事时，他们便束手无策了。

既然决定从南面攻击，就必须使平行壕和其中的炮队指向一

个或者至多两个明确规定的正面。应当集中力量攻击两个（最多三个）相邻的外堡。这几个堡垒一经破坏，其余的外围工事就会失去作用。如果联军采用这种方法，集中全部炮兵轰击一点，那就会立刻很容易地取得巨大的火力优势，并且大大缩短围攻的时间。根据平面图和地图来判断：从卡兰亭炮台起到内湾末端止的正面，也就是法军现在攻击的正面，可能是最适于进攻的正面，因为破坏这一正面以后城市本身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联军拥有的 130 门火炮本来可以保证在这个有限地段上很快造成火力优势。但是，联军没有这样做，他们希望英军和法军都能独立行动，结果形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围攻法，就是使长达 3 英里多的垒墙都同时受到炮击。这种攻击方法是从来没有看见过也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它使防御者有可能在寻常的棱堡工事和眼镜堡内让全部 250 门火炮同时参加战斗。要知道，一个棱堡正面未必能够容纳 20 门以上的火炮，而在一般的围攻中能够参加防御的正面不会超过 3—4 个。可能，联军的工程师们以后能够为自己这种奇怪的战法找出很有力的论据，但是，现在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不能找出防御方面最弱的地点，为了不使这些地点漏掉，只好对全綫进行射击。

在这期间，双方都开来了援军。利普兰迪对联军前哨进行的而且局部成功的猛烈攻击表明：俄军还拥有比缅施科夫带到巴赫契萨赖去的更雄厚的兵力。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雄厚到足以进行一次胜利的会战。考虑到围攻者所取得的胜利，考虑到随着围攻者向城墙接近，防御者的损失将按几何级数日渐增大，考虑到防御者仍然坚守着外围工事，而要塞围墙的防御显然已经削弱，我们可以期待在 11 月 9 日到 15 日之间出现决定性的结果：不是城市的南区陷落，就是联军遭受决定性的失败而被迫放棄围攻。

但是必須指出,这样的預言总是随情况而定的,而这些情况在离开战場这样远的地方是无法完全估計到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1 月 9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4 年 11 月 27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246 号

弗·恩格斯 巴拉克拉瓦会战³⁰⁰

从欧洲来的“阿非利加号”輪船便給我們带来了3天的消息，但其中除談到許多伤病員被活活燒死在一个医院里的慘事和其他聞所未聞的災難以外，沒有任何重要的战区新聞。关于11月5日那次激烈而沒有明确結果的会战，“波罗的海号”輪船曾带来过簡短的消息，現在我們又得到了腊格倫勛爵的簡短的報告，但還沒有得到参与会战和目击实况的記者的詳細的和生动的报道。由于战争中的困难增多，而且还在繼續增多，在英国和法国不安的情緒很严重——比表面上所能看到的严重得多。塞瓦斯托波尔在互相比賽勇敢和牺牲精神的联軍的猛攻之下的頑强防御、不願投降，被认为是很大的凶兆。今天本报所載的摘自倫敦“泰晤士报”的消息，证明情緒已在变化，疑慮开始滋长，这种疑慮甚至可以看做是絕望的最初征兆。因为缺乏有关11月5日会战的詳細材料，我們对这次会战还无法評論，所以今天只能談談这次会战以前有关圍攻的一些事件。

10月25日，塞瓦斯托波尔圍攻战的緩慢單調局面第一次被戏剧性的事件打破。在这一天，俄軍攻击了掩护圍攻部队的联軍陣地；并且由于这一次双方比較勢均力敌，結果和阿尔馬河会战完全不同：这次参加战斗的几乎全是騎兵，而在阿尔馬河会战中騎兵事实上根本沒有参加。俄軍这次是进攻者而不是防御者，联軍則

拥有障地坚固这一个优越条件。誠然这次会战也几乎和阿尔馬河会战一样，双方不分勝負，但优势屬於俄軍。

在塞瓦斯托波尔灣以南的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半島和克里木草原之間，有一片丘陵地从流入塞瓦斯托波尔灣的黑河口向西南伸展。这片丘陵地的西北面緩緩朝塞瓦斯托波尔傾斜而下，朝巴拉克拉瓦的东南面則大部是峭壁悬崖。对于占領赫尔松涅斯的联軍來說，这个丘陵地是天然的防御障地，可以用来对付任何企图解圍的俄軍。但是不幸得很，英軍的“作战基地”，舰队用的主要港口和补給品的集中地都在巴拉克拉瓦，而巴拉克拉瓦則位于这个丘陵地东南約 3 英里处。因此必須把巴拉克拉瓦包括在防御体系內。巴拉克拉瓦周圍是一連串极为参差不齐的高地，这些高地从上述丘陵地的南端沿着海岸向正东和正西伸展，并且几乎同所有的克里木丘陵一样，向西北的一面逐漸傾斜，而向东南的一面則是陡峭的悬崖。在这两群高地形成的夹角里是一片略带起伏的平原，平原向东逐漸隆起，以陡坡終于黑河河谷。

这片平原的最显著的特点是丘陵和小高地相交錯，它們向西北和东南伸展，把我們称为格拉克列亚的山巒同南海岸的山地連接起来。在巴拉克拉瓦以东和东北約 3 英里处的那块高地上，联軍构筑了由 4 个多面堡組成的第一道防綫，这些多面堡掩护着通往巴赫契薩賴和黑河上游的道路，它們是由土軍防守的。第二道防綫是正对着巴拉克拉瓦构筑的，一直伸展到由沿海丘陵和格拉克列亚山巒构成的夹角的頂点，而格拉克列亚山脉由駐扎在附近的法国博斯凱將軍的师防守。由此可見，如果說英軍步兵、海軍陆战队和水兵所防守的第二道防綫轉为从翼側掩护这一綫的法軍多面堡防綫，那末突出在前面約 2 英里处由土軍防守的第一道防綫

則不僅得不到任何支援，而且令人奇怪的是，這道防綫的位置還不同可能出現敵人的道路相垂直，而是幾乎在這條道路的延長綫上，這樣俄軍就可能逐一奪取這4個多面堡，奪一個就占住一個，不會遭到尚未奪取的多面堡的特別猛烈的抵抗。

聯軍在巴拉克拉瓦這一面的障地由土軍駐守，他們在多面堡即第一道防綫內進行防禦；和巴拉克拉瓦相鄰的高地由英國海軍陸戰隊占領；在巴拉克拉瓦以北的谷地內駐有第九十三蘇格蘭步兵团和幾支由痊愈的傷病人員組成的部隊。再往北是英國騎兵的營地，而在格拉克列亞高地上則駐有博斯凱將軍的步兵師的前衛。

10月25日晨6時，利普蘭迪將軍率領俄軍對上述障地進行攻擊。他指揮的混成師內有6個步兵团（德涅泊團、阿速夫團、烏克蘭團、敖德薩團、弗拉基米爾團、蘇茲達爾團、第六獵兵營和1個黑海哥薩克營，共26個步兵營）、3個騎兵团（第十一和第十二驃騎兵团和槍騎兵混成團，共24—26個騎兵連）、約2個哥薩克團和70門火炮，其中包括30門十二磅火炮。

利普蘭迪將軍派格里貝將軍率領德涅泊團3個營通過左方的峽谷去占領科馬雷村，在這個村的前面便是第一個也是最堅固的一個多面堡。格里貝將軍占領了這個村，看來他的3個營極為平靜地在那裡度過了一天，至少在以後關於會戰的報道中一次也沒有提到他們。

起先順着黑河沿鄉村道路前進的主力縱隊到达了由巴赫契薩賴通往巴拉克拉瓦的大道，在這裡遇到了土軍占領的多面堡。因為第一個多面堡非常堅固，所以利普蘭迪將軍首先進行炮擊，然後派出強攻部隊。散兵綫掩護着成連縱隊進攻的阿速夫團第一、第二和第三營，這3個營還得到了在兩翼成密集縱隊進攻的阿速夫

团第四营和德涅泊团 1 个营的支援。在猛烈的抵抗之后，多面堡被攻克了；土军死伤 170 人，这个事实，同英国报纸上恶意的论断相反，证明土军对这个多面堡的守卫是英勇的。而仓促构筑的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多面堡则几乎未经战斗就被俄军占领，到早晨 7 点钟，联军的第一道防线便完全落到了俄军手中。

土军放弃这些多面堡可能带来好处，因为这就能消除自沃耳特尼察和锡利斯特里亚会战以来就深信土军英勇非凡的荒谬观念；不过英国将军和英国报纸在这一次的做法还是不体面的，他们突然对土军大发雷霆。其实应受叱责的与其说是土军，倒不如说是那些竟这样不合理地构筑防线又不注意及时完工的工程师们，和那些使第一道防线处于毁灭性的打击之下而不予以任何援助的指挥官们。

像苏格兰人那样坚定沉着但是动作缓慢的第九十三苏格兰步兵团的兵士，是逐渐投入战斗的，而且在多面堡已被攻占之后才通过丘陵前来援助。被俄军骑兵追歼的土军终于能够在苏格兰人的两翼重新整好队形，后者力求避开俄军火力，卧倒在尚为联军占领全部阵地之前的一个不大的地褶的棱线后面；土军只是在左翼得到一个骑兵师的支援。这时，俄军在筑有多面堡的高地上展开成战斗队形；左翼是阿速夫步兵团，它的右面是乌克兰步兵团，再右是敖德萨步兵团。这 3 个团占满了多面堡中间的空地，占领了联军过去的第一道防线。在敖德萨团右面，略带起伏的平原有利于骑兵行动。俄军把两个骠骑兵团派到了这里，他们正面对着调到这里来的英国骑兵，双方相距约 2 英里。苏兹达尔团、弗拉基米尔团、部分炮兵和刚刚到来的枪骑兵留作预备队。

当得到一营痊愈的伤病人员和土军的加强的第九十三苏格兰

团开始抵抗俄軍的时候，俄軍的驃騎兵就向它攻击。但是在驃騎兵还没有来得及前进时，英軍的重騎兵旅就向他們猛扑过来。七八百英国龙騎兵奔向俄軍，击潰了他們；如果考虑到俄軍数量上的优势，这一次攻击就是我們所知的最出色和最成功的攻击之一。数量比英軍多一倍的俄軍驃騎兵瞬間便被冲散了。被派来攻击第九十三苏格兰团的几个俄軍騎兵連，遭到了沉着的苏格兰兵士在50步距离上的齐射而四散逃窜。

如果說土軍敗逃了，那末英軍則暫時得到了荣誉。苏格兰兵士甚至还沒有列成方队便迎击騎兵的勇敢精神，以及英軍重騎兵勇猛的攻击，——这的确是可以自豪的事情，何况还是在援軍到达以前作的。但是这以后，第一师（由劍桥公爵指揮）和第四师（由卡瑟克特指揮）以及法国的博斯凱师和非洲猎騎兵旅开到了。部队列成战斗队形，只有这时才說得上是两軍相遇。当博斯凱师在格拉克列亚高地摆好陣势以后，利普兰迪把弗拉基米尔团和苏茲达尔团派到极右翼的丘陵上，配置在騎兵后面。

两軍相距在射程以外，因此射击差不多停止了，但突然某种还没有弄清楚的誤会使英国輕騎兵投入了沒有意义的最后遭到了失敗的攻击。当时卡迪根伯爵曾接到进攻的命令，几秒钟后他便率領輕騎兵旅沿陣地对面的谷地而上，这个谷地兩側都有丘陵作掩护，而丘陵上配置了已經对下面的地区集中火力的炮队。全旅共有700名騎兵；当他們接近丘陵斜坡而进入射击距离时，就遭到那里的火炮和步枪的射击。于是，騎兵旅就向谷地上端的炮队冲锋，冒着20碼距离內的火力，砍倒了炮手，击潰了再次冲锋但来势不猛的俄軍驃騎兵；当他們开始折回时，俄軍枪騎兵却突然从翼側向他們冲锋。这些枪騎兵剛剛靠近，就立即攻击已經疲乏的英軍騎

兵。英軍虽然曾获得局部胜利，这一次却不得不退却，并完全被俄軍击潰，当然，这是俄軍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和英軍疏忽大意因而毫无目的地直接进入大量炮兵的交叉火力之下的結果。700名英軍騎兵中，生还而保持战斗力的恐怕不到200人。在沒有得到生力軍补充以前，这个輕騎兵旅可以认为已被歼灭了。

如果沒有从两翼支援輕騎兵的两次战术机动，英軍的失敗可能还要惨重，也許无一人生还。在右翼，卢肯勋爵曾命令龙騎兵旅从右面对俄軍炮队进行佯攻。該旅向前馳騁了几分钟，在俄軍火力下大約伤亡了十多人后就迅速折回。但在左翼，屬於世界上优秀騎兵之列的两个法国非洲猎騎兵团看到他們的盟軍受挫，就赶去援助。他們向高踞在弗拉基米尔步兵团对面的丘陵上从翼側射击英国輕騎兵的俄軍炮队冲鋒，瞬間就突入炮兵陣地，砍死了炮手，然后在完成任务以后就撤退了；即使弗拉基米尔团的步兵不立即向他們冲来，他們也是会撤走的。

这一次，大家又看到了在这次战争中所表現出来的、并且是我們不只一次地指出过的英軍作战方法。英軍起初犯了錯誤，以后又沒有决心采取違反战术規則的、但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錯誤后果的那种行动。但是，法軍猎兵却立即感到需要如何行动。在他們守卫的那个翼側上俄軍騎兵沒有冲鋒，因为法国猎兵已搶先进行了勇猛的攻击。斯卡利特龙騎兵旅的謹慎的騎兵則只进行了佯攻，这当然不足以阻止俄軍枪騎兵对驃騎兵翼側的攻击。如果他們也像法軍一样进行冲鋒，俄軍枪騎兵很快就会退回去的。但是当英軍輕騎兵奉命勇敢作战的时候，重騎兵却奉命謹慎行事，結果輕騎兵旅便复灭了。

战斗到此告終。俄軍破坏了距联軍最近的两个多面堡，并固

守住其余的两个。他们保住了夺得的地区，而腊格倫勋爵则不敢向俄军进攻，命令加强第二道多面堡防线，并只限于防守这些多面堡。第一线就这样失守了。

在这次会战中，第九十三苏格兰团的行动值得大加赞扬。正像他们所做的那样，在展开成横队的情况下迎击骑兵，只把右翼的一个连向后调动构成 en potence [拐子形]，不到决定时刻不射击，然后又如此沉着地进行射击，——这只有极少数的、具有步兵所需的最优良素质的部队才能做到。奥军和英军大概是唯一能够经受这种考验的军队；也许还有一些经过多年服役受到必要锻炼的俄国部队可以算在里面，虽然我们记不得，他们曾在什么时候遇到这种考验，并光荣地经受住了这种考验。

上述会战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英法骑兵对俄国骑兵的优势。联军3个旅在人数上和俄军3个团几乎相等；如果他们不是陆续地而是同时投入冲锋，并能得到调到前面的炮兵和全部进行攻击的步兵的支援，那末利普兰迪和他的部队就有从陡坡上被赶下黑河的危险，会遭到布吕歇尔在卡茨巴赫河给法军安排的那种命运。

两军人数大致如下：俄军有25个步兵营，最多只有14000人，其中大部分参加过阿尔马河会战；骑兵24个连，大概不超过2400人，大部分由莫斯科和卡卢加调来；此外，尚有大约1000名哥萨克和70门火炮。

联军步兵由英军第一、第四师的主力 and 法军博斯凯师的主力组成；此外，还有一些土军。土军的数量只能根据关于已登陆的土军步兵营的材料粗略地估计，一开始有10个土军步兵营参加克里木远征，根据10月18日腊格倫勋爵的报告，以后又有6个营在巴拉克拉瓦登陆。因为这些兵力没有编入围攻的部队而且又未远离

巴拉克拉瓦，所以他們应当是全部参加了上述会战，尽管在退出多面堡以后在报告中就沒有再提到他們，并被认为不值一提。总之，如果我们认为英軍是 6 500 人，法軍是 3 500 人，土軍至少是 6 000 人，那大概不会有很大出入。这里还要加上巴拉克拉瓦的多面堡內約 1 000 名英国海軍陆战队和水兵。由此可見，全部步兵为 17 000 人；如果不算土軍，則为 11 000 人。至于騎兵，两个英国騎兵旅約为 1 400 人（在英国战报中仅公布了兵士的数目），非洲猎兵不少于 800 人，共約 2 000 人。炮兵数量不詳，无论如何比俄軍要少，但是质量上远远超过他們。

整个說来，我們认为，这次联軍无论如何不弱于俄軍，他們占有便于撤退的有利障地，并且本来可以用騎兵和步兵同时进行勇猛的攻击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是阿尔馬河会战那样沒有結果的胜利，而是可以使他們避免 11 月 5 日那次血战的胜利。而現在，联軍甚至沒有弥补他們所受到的全部損失；由于过分的勇敢和过分的謹慎的奇怪的結合，由于不适当的勇猛和不适当的怯懦的奇怪的結合，由于忽視軍事学术原則的冲动和放过有利战机的学究式的謹小慎微的奇怪的結合，由于联軍一切行动所特有的那种所行非所需和所行非其时的奇怪做法，他們在巴拉克拉瓦会战中完全被打敗了。

根据 11 月 5 日会战的材料，我們暫時只能作出这样的結論：这次会战是我們认为应在 11 月 5 日至 10 日之間到来的那种危机的开始。正像我們早已說过的，——倫敦“泰晤士报”現在也这样說了，——現在一切都取决于給养和援軍的輸送。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1 月 16 日
作为社論載于 1854 年 11 月 30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24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弗·恩格斯 因克尔芒会战³⁰¹

这一場血战发生在11月5日，但是倫敦在11月23日才收到联軍統帥和主要報紙記者的报告。关于会战的非常簡短的报道是最近两艘輪船带到美国的，但这些报道都不够詳細，不能使我們对战斗的性质作出較为滿意的判断。但是今天由“太平洋号”輪船带来的邮件，使我們有可能刊载有关整个会战的最詳細的报道，其中包括腊格倫、康罗貝尔和緬施科夫的报告，以及倫敦“泰晤士报”和“先驅晨报”特派記者的出色的、清晰的通訊（这两家報紙在战地都有很能干的撰稿人）。由于有了这一切和其他一些文件，我們便可以分析会战的进程，使讀者能够对这次会战有一个公正的有根据的看法。

像普魯士軍队在耶拿一样，在因克尔芒对面的英軍，配置在只有沿着几条隘路才能从正面接近的高地上。英軍像普軍一样，沒有注意占領自己极左翼的高地，而緬施科夫像拿破侖在耶拿会战时一样，向这个高地派出了他的一部分軍队，于拂曉前占領了面对着敌人翼側的陣地。显然，俄軍企图利用这种情况以其主力向英軍翼側猛攻，在占領的高地上展开，并在英軍进行十分危險的、但为变换正面所必不可免的机动时，随着英軍各师的接近，逐个地将它們消灭，或者用術語來說，逐个对它們进行“卷击”。拿破侖当时

就是利用这种机动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战败了虽然行动笨拙迟缓而且指挥恶劣、但在当时仍然是大陆旧军队中最好的一支军队。掌握了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战争过程中出现的以及拿破仑本人运用的新作战方法的军队在行动上的迅速，促成了这一大胆攻击的胜利。而这一次，在因克尔芒，施科夫却企图以行动笨拙、迟缓的军队按同样的方法袭击行动积极、运动迅速的英法军队，因此得到了同耶拿会战相反的结果。

英军在占领阵地时所表现的疏忽对于他们的指挥官来说是非常可耻的。既不占领黑河南岸的山岗，又不在这个重要的阵地上构筑野战工事（英军指挥官完全了解，俄军正集中几千人准备向这个阵地进攻），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已经指出，俄军毫不迟疑地利用了这种疏忽，在山脊的北端占领了山岗，并用重型野炮轰击英军的阵地。英国报纸断言，俄军在战场上有二十四磅和三十二磅炮，但是这只能证明这些报纸在炮兵问题上十足无知。英军将自己的火炮从巴拉克拉瓦运到塹壕里的经验应使它们明白：二十四磅和三十二磅加农炮不能用于野战，何况还是为了突然的夜间袭击。事实上，它们所说的二十四磅和三十二磅炮是榴弹炮，它们的口径与二十四磅和三十二磅加农炮相似，但实际上是轻型野炮，并不比英军的野战榴弹炮重。用小装药发射空心弹，并且主要靠增大射角来增加射程的榴弹炮，其口径能够大于发射实心弹的加农炮。二十四磅的榴弹炮在重量和射击效果上相当于六磅的加农炮，而所谓三十二磅榴弹炮（口径约六英寸）则相当于十二磅加农炮；这两种榴弹炮在俄军中是属于这两种口径的加农炮连的。这就表明：无知和民族虚荣心在编造英雄事迹和民族战功方面是同样起作用的。

到这时为止，一切都还是有利于俄军的。他们的指挥才能远远胜过腊格伦勋爵。他们的计划是出色的，并且执行得也很好。他们占领了一个重要的据点并迂回了敌人的翼侧。准备向英军拉得很长的和薄弱的防线的最弱处进攻的俄军，在数量上拥有巨大的优势，看来这可以使他们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俄军还不完全清楚，他们在同什么样的兵士作战。英军受到突然袭击后，镇静地变更了正面，由面向东转而面向北，并且以猛烈的火力迎击攻击的纵队。于是开始了阿耳布埃拉会战³⁰²以来欧洲所未有过的会战，在前一会战中英军坚毅果敢，以损失四分之三兵力的代价在指挥官的刚愎自用几乎使英军遭到失败的情况下赢得了胜利。的确，在因克尔芒进行的白刃战，比过去两支最勇敢的军队彼此厮杀了6年的整个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期间进行的白刃战还要多。从6点半到9点半，英军约八千人抵抗住俄军的猛攻，而根据俄军自己报道，他们至少有3万人参加这次猛攻。英军在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俄军的常以生力军进行的攻击的时候所表现的那种坚毅精神，是值得大加赞扬的；除拉德茨基的军队中最优秀的几营以外，在欧洲恐怕没有其他任何军队能够作到这一点。应当指出：有利的阵地更鼓舞了这种勇敢，因为阵地朝东的正面上是无法攀登的高地。而北面，在俄军占领的山岗同这些高地之间也隔有几条峡谷，这些峡谷形成通往英军阵地的许多险路。因此，任何一支进攻的俄军纵队都必须通过受到英军炮兵猛烈射击的地区，必须以密集的队形前进，并且只有到达山顶时才能展开。原来已被炮兵火力削弱、而在向敌接近时又被步兵火力削弱的俄军纵队，爬上了山顶，但是在他们还没有能够展开以前，射击和白刃冲击就又把他们赶下去了。在这次战斗中发现：在近距离上米涅式步枪的子弹比

一般步枪子弹有巨大的优越性；一般的步枪子弹的侵彻力只能勉强射死一个人，而米涅式步枪的一发子弹却常常射死四、五个人，使俄军的大纵深的纵队遭受极大的损失。

当英军各师开到的时候，会战就全面展开，正面也更宽了。未能迅速前进的俄军以其左翼攻击英军阵地的最初的正面，而右翼试图冲到塞瓦斯托波尔。他们有一部分占领了英军的高地，但是他们不能形成正规的战线。他们企图包围并各个歼灭英军的小部队。战斗很激烈，虽然英军艰苦奋战，但如果不是法军的博斯凯师赶到，他们就会在这场众寡悬殊的战斗中被歼灭了。法军的朱阿夫兵和外籍军团攻击了并粉碎了俄军的左翼，而非洲猎兵则趁机猛冲，于是俄军步兵被迫退却了。就这样，14 000 人的联军，虽然丧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却战胜了 3 万人的俄军；不过大家公认，俄军每一个兵士都打得很好，并且我们看到，就进攻计划来讲，他们的指挥能力比联军高明得多。

那末他们为什么失败了呢？应当指出，参加会战的俄军大部分是由曾经在围攻锡利斯特里亚时被击溃而士气低落的残部编成的，而且丹年别尔格军，继过去的奥斯坦-萨肯军以后，当然是目前俄军中最糟的一个军。但并不是这种情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次会战失败，不仅仅是由于英军的勇敢，而主要的是由于俄军进行这次会战的方法。这是欧洲的作战方法对俄国的作战方法的胜利。这就是这次会战的特点。

俄军指挥官是从制订一个很好的、采用拿破仑最有名的会战的经验（要知道，任何一个俄国将军，甚至连苏沃洛夫在内，都没有独创的思想，而苏沃洛夫的唯一的独创精神就是直接的进攻）的进攻计划开始的。然后，他就以最稳靠的方法着手实现这个计划。

他在敌人翼侧占领了阵地。战略机动完成后，开始战术动作。这时，科学的、在研究过去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制订的作战方法，根据西方文明制订的作战方法，一下子都被抛弃了，于是就公然蛮干起来。这一支拥有许多服役 25 年的老兵的出色军队，这个阅兵操练方面的模范，竟然如此笨拙、如此不善于散开队形和以小部队进行战斗，以致它的军官只能使这个笨拙的人群向敌人猛冲。一切战术机动的思想都放弃了：前进，前进，前进，——这就是所能作的一切。这一个稠密的人群，由于非常密集，当然就成了炮兵求之不得的最理想的射击目标；与此同时，成稀疏的横队卧倒在山顶后面的英军，却遭不到敌人的射击，他们用球形炮弹向俄军大纵深的纵队猛烈射击，每次齐射都打死三、四十人，而米涅式步枪的子弹则像雨点一样飞向敌人，几乎没有一发子弹不射中这样大的靶子。这个笨拙人群的简单的猛攻本来足以突破联军的队列。但是在这里俄军遇见了惯于对付这种作战方法的敌人。英军在印度战争时期学会了如何抵挡密集的人群、甚至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密集人群的猛攻。虽然俄军比锡克教徒或俾路支人高明得多，但是既然俄军采用锡克教徒的战术，那末惯于战胜拥有 6 倍或 8 倍优势的锡克教徒或俾路支人的军队，当然就能抵挡住 3 倍优势的俄军的攻击。当俄军纵队爬上山顶时，他们的队形已经被炮火破坏，所以英军在 50 码距离上的又一次齐射和白刃冲击就把他们打乱了。以后，当俄军人数增多时，英军就像拿破仑的方队在金字塔附近屹立在马木留克兵中间一样，屹立在包围他们的俄军人群中间。英军由于充满了只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的兵士才能具有的自信心而表现得毫不动摇，又加上占有装备和火力的优势，这就决定了会战的结局。俄国兵的射击技术比任何国家的兵士都坏，他们已经在这里表明

了这一点，否則他們准能把这里的英国兵全部击毙。

因克尔芒会战的特点和它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表明，俄軍步兵的荣誉正在消失。它表明，不管俄国怎样进步，西方无論如何仍以比它快一倍的速度前进，而且它不可能战胜西方軍隊，不仅在兵力相等时如此，甚至在占有像因克尔芒会战中这样的优势时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联軍的运输船只在黑海遭到惨痛的損失，那末在英国和法国的将領不犯很严重的錯誤的条件下，这次会战便足以使联軍在克里木取得彻底胜利。我們还没有关于这次运输船只惨遭不幸的詳細材料，而我們知道这个消息仅仅是根据本报駐利物浦代理人恰好在“太平洋号”輪船启航前接到的倫敦电訊。我們还不知道，最后一批船只是載运部队还是只載运粮食和軍火，但是既然电訊沒有提起，也就可以推想它們沒有載运部队。但是，如果在這次風暴中派往克里木的大量部队复沒，那末，自然势力給予联軍的打击的确要比敌人給予他們的打击沉重得多，而塞瓦斯托波尔城下的联軍在能够給他們派遣新的援軍以前，就可能由于疾病和敌人不断的襲击而复灭。

德意志的两强国所采取的立場，对于联軍是另外一个同样严重的威胁。現在奥地利似乎第一次真正有意同西方强国决裂而同沙皇联合，而整个德意志将跟着它走。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无須怀疑的，这就是战争具有巨大的惊人的規模并席卷整个欧洲的时刻現在已經临近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1 月 27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54 年 12 月 14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坛报”

“紐約每日論坛报”第 4261 号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局

自从激烈的因克尔芒血战以来，在克里木战场上，没有发生过一次从军事观点看来多少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不过，冬季已经到来，而塞瓦斯托波尔尚未攻占，这个事实改变了战争的整个特点；现在，将整个战争过程上溯到远征军登陆时起加以综合分析，来判断这次战争将在何种情况下进入当前的新阶段以及它的前景如何，这将是适时的。不过，首先必须对我们以前所作的关于最近一次难忘的会战的评论稍加补充。在这个事件的官方消息（已全部刊登于本报）中，充满着不寻常的矛盾，并且缺乏深刻的分析。腊格伦勋爵的报告显然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写成的。他在报告里混淆了自己部队面向黑河的正面和面向塞瓦斯托波尔的正面，把自己阵地的同一翼侧，时而称为右翼，时而称为左翼，因此根据这个文件根本无法弄清事实的真相。康罗贝尔的报告含糊不清，又简单，因此什么问题都看不出来。至于“俄国残废者”³⁰³刊登的所谓緬施科夫的报告，只要将它同緬施科夫公爵以前的报告加以比较，任何人都立即可以看出这个报告是出自另一个人的手笔。显然，尼古拉认为过去给报界的自由已经足够了，而且发现像正人君子那样讲实话丝毫不能防止军队的失败，所以他认为还是恢复说谎的老办法为妙。根据皇帝的意志，普通的事件也被任意歪曲。他的野战军队向围攻者发动的失败的进攻变成了被围者的胜利的

出击。原因很明显：任何出击的部队完成任务后必然要返回自己的工事；因此，退却就可以理解，并且是自然的事，但是如果正确地叙述事实的真相，那末，失败的耻辱就会无法掩盖了。

应当說，尼古拉有一切理由掩盖这次会战的真相不使人民知道。自納尔瓦会战以来，俄軍还从来没有遭到这样严重的失败。如果考虑到納尔瓦会战时的俄軍和因克尔芒会战时的俄軍之間，即1700年的沒有受过訓練的一群烏合之众和1854年的受过严格訓練的軍隊之間有很大的区别，那就应当承认，相比之下納尔瓦会战还算是俄軍战史上光輝的一頁。納尔瓦会战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民族所遭到的第一次严重的失败，这个民族的果敢精神使它甚至在失败中学习如何取得胜利。而因克尔芒会战是彼得大帝时期以来俄国在温室发展中正在衰退的某种征兆。在一个不开化的国家里为了維持堂皇的文明外貌所作的人为的进展和不断的努力，看来已經使俄国筋疲力尽，使它染上了类似肺癆的病症。在近百年来的所有会战中——从奥斯特利茨和埃劳³⁰⁴到錫利斯特里亚，俄軍一直显示出他們是优秀的兵士。他們無論何時何地遭到的失败，都是完全可以解釋的；这些失败可能玷污統帥們的声望，但决不能玷污軍隊的荣誉。現在的情况則完全不同了。如果說巴拉克拉瓦会战显示了联軍騎兵的优越性，如果說塞瓦斯托波尔的圍攻战总的說来显示出联軍炮兵的巨大优越性，那末俄国的步兵則一直到最近还保持着自己的荣誉。但是，**因克尔芒会战使这个問題也清楚了。**非常令人奇怪，在每个俄国兵奋战得可能比任何时候都勇敢的这次会战中，俄国步兵却丧失了自己的声誉。無論是俄軍方面还是联軍方面，极端平庸是这次战争中一切行动的基本特点，而这一特点从沒有像这一次表现得这样明显。每次行动和每个步骤都

导致与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打算进行的是 *coup de main* [突然袭击], 但变成了整个战局, 甚至还是冬季战局。进行了会战, 但胜利的果实像曇花一现, 不到一个星期就从胜利者手中溜掉了。要进行的是使用重攻城炮夺取未设防的城市的战斗, 但在攻城炮运到以前, 未设防的城市却变成第一流的营垒。发动了围攻, 但在快要胜利的时机, 又不得不放弃围攻, 因为开来了一支野战军, 一支以吃败仗代替打胜仗的军队。为了与这支野战军作战而占领的筑垒阵地, 由于面积狭小, 反而成为野战军变围攻者为被围者的手段! 这一系列的努力、战斗、土工作业、计划和改变计划竟花费了 10 个星期; 冬季来临了, 而双方的军队, 特别是联军, 却完全没有做好过冬的准备。所有这一切的唯一的結果, 便是双方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而战争的結局仍然是遥遥无期和胜负未定。

联军从第一次登陆到 11 月 5 日为止, 投向克里木的兵力不超过 25 000 英军、35 000 法军和 10 000—15 000 土军, 即总数 70 000—75 000 人。当远征开始时, 就不能期望从英国和法国再调出更多的补充兵力; 几个步兵营和骑兵连正在途中, 但已包括在上述数字里。即使在短時間內还可能调来一些部队, 那也只能是土军; 而土军尽管经过了切塔特和锡利斯特里亚会战, 无论是联军的军官还是兵士, 仍然对他们毫不信任。因此, 远征军中真正可靠的只有 6 万法军和英军, 实际上, 只有他们才应当算在数内。但是对整个战局来说, 这支军队为数太少了, 而对 *coup de main* 来说, 又过多了。当时, 不可能很快地把他们装上舰船, 而花费了几个月的時間进行准备, 又足以使俄军預有戒备。如果说奥军的存在使多瑙河各公国和保加利亚不致遭到俄国的侵犯, 那末奥军的存在同样使貝薩拉比亚和敖德薩不致受到任何严重的威胁; 因为奥军的阵地就在这两

个作战方向的翼侧和后方，所以任何军队要想向前推进，都不可能不处于奥军的打击之下。这样一来，俄军似乎相信，所有这一切准备都是为了进攻塞瓦斯托波尔；除了它以外，只有赫尔松和尼古拉也夫这两个俄国海军造船基地还受到多少有些严重的威胁。所以很清楚，俄军在克里木的准备必然是步步紧跟着联军的准备而进行的。在这次预定的 coup de main [突然袭击] 终于变成目前的极端错误的（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明显）战局以前，事实正是如此。

尽管俄军在阿尔马河地区受到优势极大的兵力的攻击，联军仍然不得不让它秩序井然地撤离战场，这时联军才初次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最初的计划被打破了，突然的袭击失败了，必须作好应付另一类意外事件的准备。这时，联军开始犹豫不决；时间白白地浪费了；最后才决定向巴拉克拉瓦进军，于是以占领坚固防御阵地为有利的想法战胜了认为可能迅速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北区的想法（北区瞰制着整个城市，因而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点）。同时，施科夫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仓促地向塞瓦斯托波尔进军，又同样仓促地折向巴赫契萨赖。随后是联军的围攻。过了19天，第一道平行壕的炮队才开始射击，而从此以后，双方始终是大致上势均力敌的。围攻进行得十分缓慢，而且丝毫不认真。塹壕内繁重的作业和使人疲劳的战斗警戒勤务，严重地折磨着那些被异乡的气候和致命的疾病削弱了的人们，因此，联军的队伍在非常迅速地缩小。他们的将军们本来只估计到至多不过会遭到战争中不可避免的那种通常的损失，现在已经由于损失惨重而意志沮丧了。卫生和军需勤务，特别是英军的卫生和军需勤务混乱不堪。联军从自己的阵地上即可看到富饶的拜达尔谷地，那里有他们所急需的丰富的物资，但是，他们不敢冲进该地。他们不可能迅速获得增

援，而俄軍却从各方面开来。就在这时候发生了10月25日的会战。俄軍占了上風，联軍三分之一的騎兵被歼。接着是11月5日的会战，結果俄軍被击退，但联軍也遭到了他們不能再次經受的那样的損失。在这以后，無論是俄国的野战部队还是盟国的圍攻部队都行动消极。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圍攻如果說还在进行，那也不过是pro forma〔形式〕而已。沒有人会相信，联軍自11月5日以来那种軟弱无力而又毫无計划的射击能使城防工事受到什么破坏，或者甚至能阻碍俄軍修复被毀的工事。如果恢复圍攻，那末就得从头做起，所不同的只是联軍的炮队可能比第一次圍攻开始时向俄軍工事多推进几百碼而已，但是，这也只有同来自因克尔芒方向的俄軍不断的攻击相配合的要塞火力不比联軍火力强、并且沒有摧毁突出在前面的炮队的时候才有可能。

現在，在12月初，联軍已面临严寒的冬季。他們缺少为度过这寒冷多雨的季节所必需的衣服和設備；尽管已得到援軍，而且援軍还在繼續开来，但是他們的兵力仍然很弱；他們在人員方面已經受到巨大的損失；他們已被卷入对所要达到的目的和采用的方法事先既未料到而又毫无准备的斗争中；他們除了感到自己的兵士在个人方面和战术方面都优于敌人以外，什么也沒有得到，簡直是毫无所得。目前，他們大概已經得到2万人的援軍，主要是法軍，而且还在等待新的补充；但是，回想一下第一次向土耳其运输联軍时曾有过多少困难和拖延了多长时间，同时也回想一下，运输第一批部队的船只几乎全部被留下，而目前向东方运输部队又必須另找船只，那末就可以得出結論：在上述2万人到达以后，克里木的联軍在一段时期內不会再得到大量的补充。因此，联軍目前的兵力約为55 000—60 000人，其中有三分之一就在不久以前还过着

舒适的守备部队的生活，他们还必须经受严重的考验，然后才会习惯于克里木的冬季艰苦的野营生活。事实上，自英法的运输船只在11月14日惊人的风暴中遇险后，这些补充兵力与其说是对联军的加强，还不如说是一种负担。但是，决不能肯定说，这次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最周密的计划之下也是不能预见和无法防止的。11月14日的风暴，完全是这个季节中极为自然的现象，而联军舰队所遇到的灾难可以说也是这样。经过3个月令人苦闷和无法理解的拖延以后，克里木远征军开航的时间本身就预示着暴风雨和灾难，预示着船只、乘员、兵士和物品的复没。不仅如此，人们还会不只一次地警告过这次不寻常的军事行动的策划者，指出这种季节在黑海航行必然会遇到不幸。因此，他们应对所有这一切负责，甚至对11月14日的遇险负责，这次遇险使联军恐怖地记起拿破仑的军队向莫斯科进军时所遭到的命运。据伦敦“泰晤士报”推测，11月14日在克里木的各个地点联军损失近千人，其中“落入哥萨克手中的人数尚未计算在内”。该报还报道说：

“排水量为2700吨的最好的螺旋推进式新轮船‘亲王号’最近开往巴拉克拉瓦，船上载有第四十六团、为围攻部队准备的全部冬服（其中包括4万件军大衣、法兰絨军服、内衣、袜子和手套）、牛肉、猪肉和其他食品、斯库塔里用的医疗器材以及继续围攻用的大量炮弹。所有这一切全部沉没。载有900吨火药的‘坚毅号’也已沉没。看来，继续围攻和保障部队度过严冬所需的一切在一瞬间都遭到毁灭。即使我们仅以坚守塞瓦斯托波尔前面高地上的障地为满足，那也无法应付最凶恶的敌人——即将到来的严冬，这是十分明显的。”

虽然克里木几乎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孤立部分，虽然派去抵抗联军的军队在联军只有35000人时没有能够把他们击退，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肯定地说，这6万联军足够抵挡住将来俄国可能用来与他们作战的全部兵力。俄国在克里木有6个步兵师和1个

預备师，即大約 100 个营的兵力（海軍陆战队和水兵除外，双方的这两种兵力我們都沒有計算在內）。这 100 个营中有一半在多瑙河地区經過了 18 个月的艰苦奋战，因此其总数未必超过 5—6 万人。俄国的全部野战部队，包括騎兵、野战炮兵和哥薩克在內，比联军大約只多 10 000—15 000 人。但是如果利迭尔斯的一个軍，即 49 个营計 20 000—25 000 人（因为他們也留有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多瑙河）开往皮列柯普的消息屬实，如果在該方向上还在集結一些新編成的預备部队，那末俄軍很快就会得到进行坚决的突击的有利时机；而且，在指揮能力大致相同的条件下对抗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时，精神、体力和战术的优势只能保持很短的时间，所以，战争的結局如何，还非常值得怀疑。另一方面，如果異常寒冷的冬季将使一切軍事行动停止的話，那末，联军对它显然也将不能忍受。

对克里木形势的这个綜合分析只是证明我們在听到奥地利已与西方强国联合的消息时的怀疑和不相信是有根据的。很明显，我們所詳細說明的情况，并不能使維也納內閣摆脱它通常所持的犹豫不决的态度。另一方面，英國內閣的地位不巩固，加之在东方的巨大失敗又必須以某些像样的表面成績来掩飾，这些便是为什么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协定吹嘘为一个了不起的攻守同盟³⁰⁵的十分充足的理由。可能，在这方面我們錯了，但是我們的讀者知道我們所以坚持这种看法的原因，而且时间也将表明，这种大肆吹嘘的奥地利与盟国的联合究竟是事实，还是专门为了在最近这次議會會議上使用的一种手段。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2 月 4 日

作为社論載于 1854 年 12 月 27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27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战况的进展

奥斯特利茨的太阳已經西沉了。在紀念十二月二日那天³⁰⁶，塞瓦斯托波尔本应有一場大会战；这事是秘密透露出来的，巴黎也等候过这事的消息。但是，根据康罗貝尔將軍12月3日的报告：

“雨水成河，交通已經中断，塹壕积滿了水，圍攻作业和一切其他作业均已停止。”

迄今是俄軍在采取攻势，而联軍采取守势，其中，前者在黑河占有数量上的优势，而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則恰恰相反。換句話說，俄軍在黑河有足够的力量掌握主动权，而联軍則不然，虽然它們能够守住自己的陣地；然而，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有足够力量进行圍攻的联軍却面对一支在数量上和自己相等的守备部队，因此圍攻部队虽然沒有停止軍事行动，但是沒有什么显著进展。看来，力量的对比会很快发生变化；显然，联軍很快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把俄軍从黑河赶走。在这种情况下，丧失了自己在因克尔芒上游陣地的俄軍只有两个办法可行。他們或者采取迂迴，到北堡附近的有战壕防护的营地駐扎下来，或者将主力退入本国腹地，在那里联軍不可能长驅直入地追击他們。联軍在2月以前未必能集結必要的兵力包圍北方营地或者追击向巴赫契薩賴以北退却的俄軍。联

軍未必有力量对在辛費罗波尔一带进入战壕的軍隊发动第二次会战。無論在哪种情况下,联軍都不能不退回黑河,而且只要塞瓦斯托波尔不因南区的强攻而陷落,这样的拉鋸战大概要繼續整整一冬。但是,因为“大西洋号”輪船給我們带来的有关圍攻的消息十分貧乏,所以对于这个問題我們只能說: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是不大可能的。实际上,从巴黎“通报”发表的和倫敦各报轉載的12月7日的消息中,我們只知道联軍突然占了上風并在洪水以后仅仅两天就“几乎完成了对城市的包圍”。这个令人怀疑的消息显然是捏造的,为的是轉变有关12月2日的未能兌現的預言所造成的印象。

不久前,我們发表过关于俄軍的总数和俄軍配置的消息^①。当时我們指出,在这将近75万人的兵力中,目前未必有三分之一在作战,其余三分之二的絕大部分都用于威胁奥地利。从那时起,尽管向克里木派了增援部队,但形势并未发生大的变化;調去援救塞瓦斯托波尔的第四軍,即丹年別尔格軍,是从多瑙河軍团中抽調的,在这之前,它在这里得到过补充。我們可以称之为軍团的集結在奥地利边境附近的将近30万人的俄軍西綫主力部队在位置上发生的唯一重大变化就是:它的左翼向貝薩拉比亚和德涅斯特尔河中游延伸了一些;在这样的位置上,如果必要的話,它可以在多瑙河軍团余部从貝薩拉比亚撤退的时候給予接应。此外,西綫的主力部队或許派了两个师到克里木以及少数增援部队加强多瑙河軍团,但是,总的說来,它的兵力依然如故;看来,从列維里抽調的第三近卫师和某些預备部队的开到,已經补上了这个缺額。

^① 見本卷第566—571頁。——編者注

然而，多瑙河軍团可以說是完全瓦解了，并且降低为一支純粹示威性的軍隊，它配置在貝薩拉比亚，是为了尽可能久地保持俄国占領的外观。由于利普兰迪以及随后的丹年別尔格被調走，这个軍团失去了整个第四軍（第十师、第十一师和第十二师）；如果从余下的 5 个师（第七师、第八师、第九师、第十四师和第十五师）中除去駐守沿岸地区和守卫从本德雷和伊茲馬伊尔到赫尔松和尼古拉也夫一带的要塞所必需的兵力，再算上两次多瑙河战局中所遭受的重大伤亡，可以推測，这 5 个师所能提供的作战兵力不超过 15 000 人。他們配置在沿岸附近，而在沿岸的任何地方俄国防御力量（在大陆内部十分强有力）都显得非常薄弱。必須保卫为数众多的要塞和仓库不受敌军舰队的襲击，这也就是从这 5 个师的 3 万或 35 000 人中未必能用一半来作战的原因。

多瑙河軍团的解散，就像俄軍所采取的大多数重大的战略措施一样（因为通常只是在**实行**这些措施时才开始发生錯誤），是非常成功的一步。自从英軍和法軍深深陷进克里木起，多瑙河上就沒有任何力量与俄軍对峙了。奥美尔-帕沙的軍隊，由于两次战局的伤亡，現有兵力已不到 4 万人，又沒有得到过一次补充，它已經被西欧的外交活动瓦解到这种地步，以至未必足以用来包围伊茲馬伊尔；它更不能調出一个軍去充分掩护这次圍攻或在野战中击退俄軍。此外，对貝薩拉比亚的进攻，几个月前曾是非常有效的牵制行动，現時在軍事上将毫无意义，因此，奥美尔-帕沙的軍隊現在被調到克里木。这样一来，唯一能够在西南威胁俄軍的力量，是为数将近 27 万人的奥地利軍隊；它占領着加里西亚、特兰西瓦尼亚和莫尔达維亚。对这支軍隊必須特別留意，因为如果它起而反对俄国，那末俄国就不得不放棄貝薩拉比亚，甚至是布格河以西的整个

地区，并且从波兰要塞区的进攻基地或者从基輔和德涅泊河地区的防御基地出发作战。在这两种情况下，在多瑙河的军队都有可能被截断并不得不在南部草原上为自己寻找基地，而这在能够饲养大批牛羊但不能供养很多人的地方是难以做到的。另一方面，如果奥地利站到俄国方面或者将它的中立的刺刀指向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那时，或者波兰的军队预先把一个强有力的军调到多瑙河，然后作为奥地利人的预备部队开进德国，或者奥地利的大批兵力开向多瑙河并大胆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无论是哪种情况，在多瑙河上保持一支比单纯的示威性军队更加强大的独立的军队都是多余的。

至于奥地利是否参战，那末我们当然只能说不一定。大肆宣扬的同盟条约（据说奥地利是在12月2日和英法两国缔结的）不过是为英国议会设下的圈套，这是当这个条约一公布我们就向读者们指出的。

女王在御前演说中谈到这个条约时指出：

“我满意地告诉诸位，我和法国皇帝一起同奥地利皇帝签订了一项条约。我预期它会给共同事业带来莫大的益处。”

但是，阿伯丁迫于得比勋爵的再三质问，只好说：

“我们只想指出，议院满意地获悉女王陛下签订条约一事。她（显然，应当是指老阿伯丁）期望条约会带来重大的好处。”

阿伯丁的答复并没有能给人更大的满足。在下院，迪斯累里先生迫使约翰·罗素勋爵向前跨了一步，坦率地承认：被说得天花乱坠的同盟条约既不是条约，也不是同盟。他公开承认，这个条约没有让奥地利承担任何义务，却要西方强国与奥地利结成攻守同盟，如果后者想对俄宣战的话；此外，还要西方强国承担必须在

年底前根据著名的四项条款向俄国提出媾和条件的义务。这样一来，奥地利最后可以“毫不背信弃义地”摆脱同盟，只要“在最后时刻”宣布它不同意西方强国对四项条款所作的解释。约翰·罗素勋爵对12月2日的著名条约作了这番解释之后，伦敦和巴黎的股票即刻跌价了。

一年以前，联合内阁硬说它容忍西诺普大屠杀是为了取得同德意志各邦的联盟。现在，同它们之中的一个邦签订一个假条约，作为对不列颠军队的复没，而不是对土耳其舰队的复没的赔偿。最近几天的德国报纸甚至向我们证明，不列颠议会的开会是维也纳会议的幽灵再现的信号，维也纳会议准备再次开动它的笨重的机器。

然而，按约翰·罗素勋爵的说法，既然奥地利宣布它可能参加对俄国的战争，既然俄军陈兵奥地利边境附近的事实也指出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也就可以暂且认为，奥地利和德意志其他各邦，甚至包括普鲁士，有意参加到西方强国这边来。俄国对这种可能性有多少准备呢？

如果1812年进攻俄国的大陆军队比俄国在4月或5月在它的国境上可能看到的军队要软弱得多；如果那时英国是它的盟国，而不是它的敌国，那末俄国现在可以安慰自己的是这种想法：深入它的国土的军队越多，他们迅速复没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方面，它现有的作战部队为当时的3倍。

我们完全不是想用这点来说明“神圣的俄罗斯”是不可摧毁的。相反，我们认为，就军事力量来说，光一个奥地利就完全可以和俄国较量，而奥地利和普鲁士一起，如果光从军事胜利的可能性来看，完全能够迫使俄国接受不光彩的和约。像德意志这样面积

不大、但人口稠密到有 4 000 万人的国家是能够赛过幅員辽阔但人口分散、只有 6 000 万臣民的俄国的。拿破侖当年十分明确地規定了从西面进攻俄国的战略計劃，如果他不是迫于各种非战略性的情况而放棄了这个計劃，俄国的統治和它的完整便会在 1812 年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个計劃就是：向德維納河和德涅泊河挺进，在該地构筑一道防綫（包括修筑工事、倉庫和交通綫），夺取德維納河上的俄国要塞，而把进军莫斯科推迟到 1813 年春天。由于政治上的考虑，他在年底就被迫放棄了这个計劃，这是因为軍官們不滿冬季駐扎在立陶宛，同时也是因为他盲目地相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于是他向莫斯科进军了，而結果是人所周知的。法国軍需部的組織不善和兵士缺乏寒衣分外加重了这次惨敗。如果当时对这些事情予以更多的注意，拿破侖在敗退时仍然会在維尔諾集結起一支在数量上比俄国能用来追击他的軍队多一倍的軍队。他的錯誤是明显的；这些錯誤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他到达了莫斯科的事实以及查理十二世向波尔塔瓦的进军都证明，这个国家是能够攻入的，虽然攻入这个国家是困难的。至于說到在俄国維持一支常胜軍的問題，那全要由作战綫的长短，基地的远近和安危而定。从萊茵河到埃劳和弗里德兰德的拿破侖的作战綫，如果从漫长的作战綫給軍队的积极活动带来的損失的观点来看，則相当于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我們假定在第一年內就占領了波兰的各个要塞）到莫斯科的作战綫。而在这一假定中还没有算进直接作战基地将推进到維切布斯克、莫吉廖夫和斯摩棱斯克的情况；沒有这些准备工作，向莫斯科进军当然是冒險的。

俄国无疑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但是我們不应当忘記，中心省份——俄罗斯民族的心臟和支柱——的人口和欧洲中部的人口

相等。在波兰,也就是在組成俄屬波兰王国的 5 个省內,人口的平均密度也是同样的。俄国人口最稠密的部分——莫斯科省、土拉省、梁贊省、下新城省、卡卢加省、雅罗斯拉夫里省、斯摩棱斯克省和其他省——构成大俄罗斯的心臟并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繼續向南,是人口同样稠密的小俄罗斯的一些省份——基輔省、波尔塔瓦省、切尔尼果夫省、沃龙涅什省和其他省。这样的省共有 29 个;这些省份的人口密度比德国小一半。人口稀少的只是东部和北部的一些省份和南部草原,在西部,即在旧屬波兰的一些省份——明斯克省、莫吉廖夫省和格罗德諾省——的部分地区,由于布格河(波兰的)和德涅斯特尔河之間的广闊的沼地,人口也很稀少。但是进攻軍队在后方有波兰、沃倫和波多利亚的盛产粮食的平原,在前面和戰場上有俄罗斯中部的田野,只要把供应工作安排得稍微好一点并从俄国人那里学会怎样使用当地的运输工具,給养是絲毫不用担心的。至于 1812 年所发生的退却軍队实行坚壁清野的問題,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沿作战方向一带及其紧邻地区;如果拿破侖当时不企图在极短时期內結束战局,不是仓忙地从斯摩棱斯克发动进攻,他就会在他的四周找到丰足的粮食。但是,因为他操之过急,所以未能在距离进軍綫路不远的地方取得足够的粮食,而当时他的粮秣队看来的确害怕深入到村落稀少的針叶树的大森林里去。他的軍队只要派出强大的騎兵部队去筹集粮食并利用当地为数众多的各种兽力車,就可以保证自己有各种必要的粮食;这样,莫斯科也未必再次焚毀。但就在后一种情况下,也不妨碍向斯摩棱斯克撤退,而在那里軍队会找到一个有着一切必要供养的准备良好的作战基地。

但是这里必須研究的不仅是軍事問題。类似的战争必定由政

治活动来收尾。德国向俄国宣战可能是俄国重建波兰的信号。尼古拉当然不会放棄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各省；但是，波兰王国、加里西亚、波茲南，也許还有西普魯士和东普魯士可以組成一个幅員相当大的王国。但是誰敢說这样重建起来的波兰会有多长的寿命呢？有一点毋庸置疑：所有自命为自由主义的和进步的活动家的人近40年来所夸耀的那种对波兰的表面的热情是会完結的。继之而来的必定是俄国对匈牙利的呼吁；即使馬扎尔人会动搖，我們也不应当忘記，匈牙利的三分之二的居民是斯拉夫人，他們把馬扎尔人視為当政的和独攬大权的貴族。另一方面，奥地利在这种情况下会毫不动搖地恢复匈牙利的旧宪法，以便把匈牙利从革命欧洲的地图上勾銷。

这一切充分說明，奥地利加入西方同盟和发生全欧反对俄国的战争的可能性会打开多么广闊的具有軍事和政治意义的前景。如果作相反的設想，那末明年春天也許会看到整队向西方强国进军的一支150万的大軍，以及用行軍队形向法国边境挺进的奥普軍队。而那时，战争必将不再是它的現在的領導者所能掌握的了。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年12月14—15日

作为社論載于1855年1月1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427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弗·恩格斯 奥地利的兵力

有趣的是，最近6个月专门研究奥地利的态度的英国报刊，竟然从未给我们报道什么确实的材料来说明奥地利在认为需要确定它的政治路线时能够投入交战一方起决定作用的实际兵力。伦敦各家日报在同奥地利结盟还是同它公开决裂的问题上的意见是有分歧的。但是这些报纸虽然代表着自认为世界上最讲求实际的民族的舆论，却从来不屑于研究细节和统计数字，而这些细节和统计数字不仅在贸易和政治经济方面，而且在国家政策方面都是采取一切明智决定的基础。事实上可以认为，领导英国报刊的人，就像那些认为买到军阶就已尽了军人天职的英国军官一样，都是些不称职的人。有一家报纸肯定说，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如何都必须同奥地利保持同盟，因为奥地利拥有巨大的军事威力。另一家报纸宣称，同奥地利结盟毫无益处，因为它的全部兵力都要用去镇压匈牙利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但是无论哪一家报纸都不愿费力去了解奥地利的实际兵力究竟如何。

原来指挥管理机构十分庞大和极其落后的奥地利军队，于1849年彻底改组了。它在匈牙利的失败或在意大利的胜利对于这次改组起了同样的促进作用。军队的指挥管理摆脱了旧的传统的限制。刚刚在首都镇压了革命和在地方上结束了内战的军队，完

全轉入了战时状态。部队成功地区分为固定的旅、师、軍，就像过去的拿破侖軍隊和目前俄国的基于軍隊的做法一样。在意大利战争和匈牙利战争时期，77个步兵团（猎兵部队除外）和40个騎兵团的配置得非常分散，以致同一个团的一部分营，（甚至同一个营的一部分連）在意大利，而另一部分却在匈牙利。現在已將它們合編为固定的部队，以免再出現类似的混乱情况，并保障对部队进行正常的指揮。根据这一新的計劃，由12个軍和2个騎兵軍組成的奥地利軍隊共編为4个軍团。每一个軍团不仅包括所有3个兵种，而且还有完全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和足以保障战备所需的武器装备。第一軍团由第一、二、九軍編成，通常配置在奥地利帝国的德意志各省；第二軍团由第五、六、七、八軍和騎兵第二軍編成，第三軍团由第十、十一、十二軍和騎兵第一軍編成，它們通常駐防匈牙利和斯拉夫各省；第四軍团仅由第四軍一个軍編成，駐意大利。

每个軍有2—3个步兵师、1—2个騎兵旅、4个預备队炮兵連和必要的架桥队、軍需和医务人员。騎兵軍有2个师，相当于4个騎兵旅或8个騎兵团，并附有适当数量的輕炮兵連。步兵师有2个旅和2—4个騎兵連，每旅有5个营和1个步炮連。

因此，根据我們上面所述，奥地利全部兵力是77个步兵团（猎兵部队除外）、40个騎兵团和14个野炮团（要塞炮兵除外）以及工兵等。步兵共有62个基于团和14个边屯团、1个猎兵团和25个猎兵营。每个基于团包括5个野战营和1个后备营，即28个野战連和4个后备連。每个野战連220人，每个后备連130人。这样，每个基于团的5个野战营总共应为5964人，而62个团，包括后备部队在內，共計369800人。边屯步兵共14个团，每团2个野战

营和 1 个后备营，即 12 个野战连和 4 个后备连。野战连有 242 人，其中有 22 名猎兵。因此，一个边屯步兵团有 3 850 人，全部 14 个团共计 55 200 人。猎兵编成 1 个七营制团（共 32 个连，其中包括后备连）和 25 个营（共 125 个连，其中包括后备连），每连 202 人，共为 32 500 人。因此步兵总数为 47 万人。

奥地利的骑兵由 16 个重骑兵团（8 个胸甲骑兵团和 8 个龙骑兵团）和 24 个轻骑兵团（12 个骠骑兵团和 12 个枪骑兵团）组成。在骑兵的编组方面很成功地利用了奥地利帝国内各民族的特点。胸甲骑兵和龙骑兵几乎完全是德意志人和捷克人。骠骑兵都是匈牙利人，枪骑兵都是波兰人。在步兵中这样区分则并不是特别有利的。通常是以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编成精锐的掷弹兵营，以提罗耳地区的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和施梯里亚地区的人编成猎兵营；边屯步兵绝大部分由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组成，他们也同样非常适于当轻步兵。

重骑兵每团有 6 个野战连和 1 个后备连，每连 194 人。轻骑兵每团有 8 个野战连和 1 个后备连，每连 227 人。全部骑兵如不算后备连，共计 62 500 人，如把它们计算在内，则为 67 000 人。

炮兵由 12 个野炮团、1 个岸防炮团和 1 个火箭团组成。奥军没有骑炮兵。在他们称为骑炮兵的部队中，炮手是乘马车转移的。每个野炮团有 4 个骑炮连（六磅炮）和 7 个步炮连（4 个六磅炮连和 3 个十二磅炮连），后备连没有计算在内。每连 8 门火炮。岸防炮团不编成固定的炮兵连，只区分为普通的营和连，用来在海岸要塞担任警备勤务。火箭团有 18 个连，每连有 8 个火箭发射管。这样，奥地利的炮兵总共有 1 056 门火炮和 144 个火箭发射管。除此以外，要塞炮兵的 8 个营约有 10 400 人，技术部队有 4 500 人。工

兵約有 16 700 人。

除上述野战部队、后备部队和守备部队外，奥地利还有一种为执行专门勤务而编成的独立部队。虽然它们不当作野战部队使用，但有了它们，就不需要抽调野战部队来担任辅助勤务，而以前就是由于这样抽调兵士，常使步兵营减员为步兵连，骑兵团减员为骑兵团。3 个卫生营、辎重部队和各个军内作为传令兵使用的骑兵团就是这种部队。不久以前，英国军队在编成司令部直属骑兵团时，也采取了这种办法。奥地利军队的野战部队共约 476 000 人，拥有 1 140 门火炮。再加上后备连、技术部队、司令部、守备部队和警察部队（宪兵队）等，奥地利军队的总数约为 62 万人。

奥地利的兵士服役期限为 8 年，然后还要服两年预备役。采取这种制度，可以经常保持预备兵员，一旦发生战争，几乎有 12 万人可以征召入伍。每个边屯区居民³⁰⁷ 从 20 岁到 50 岁都要服兵役。因此，基干部队为 55 000 人的边屯步兵，可以扩充到 15—20 万人。1849 年，至少有 15 万边屯区居民在军队中服役。因而当时边屯区所剩的人数很少，一切农活都得由妇女去做。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担保这些材料都是正确的）可以说，奥地利的军事组织使它有可能在战争开始时就拥有 60 万军队，而且可把多达 30 万的兵力集中在任何一点，同时无须紧急征召，也不会对国家生产力有什么特别损害，便可再提供约 20 万老兵的预备兵员。

就俄国军队的组织来说，原来考虑可以征召多得多的兵力。不过俄国的人口是 6 000 万，奥地利的人口是 4 000 万，而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奥地利只要征召预备兵员就可以把军队扩充到 80 万人以上，但是俄国要达到这一数字，则不仅动用了全部预备兵员，

而且又进行了一次征兵，征召的人数相当于正常情况下4年征兵的总和。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12月21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1月8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81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克里木战局的回顾³⁰⁸

一

倫敦 12 月 29 日。

“布奧尔伯爵、布尔克奈先生和哥尔查科夫公爵在英国駐維也納大使威斯特摩兰伯爵府邸的会晤，唯一目的是向俄皇提供**所希望的**关于 12 月 2 日簽訂的三国同盟的意义和三大国准备在四項条款的基础上举行談判的先决条件的情报。哥尔查科夫公爵立即向彼得堡报告了他搜集的消息。沙皇接受先决条件或拒絕先决条件不日当見分晓。新的一年开始将标志着事态发展中的决定性的轉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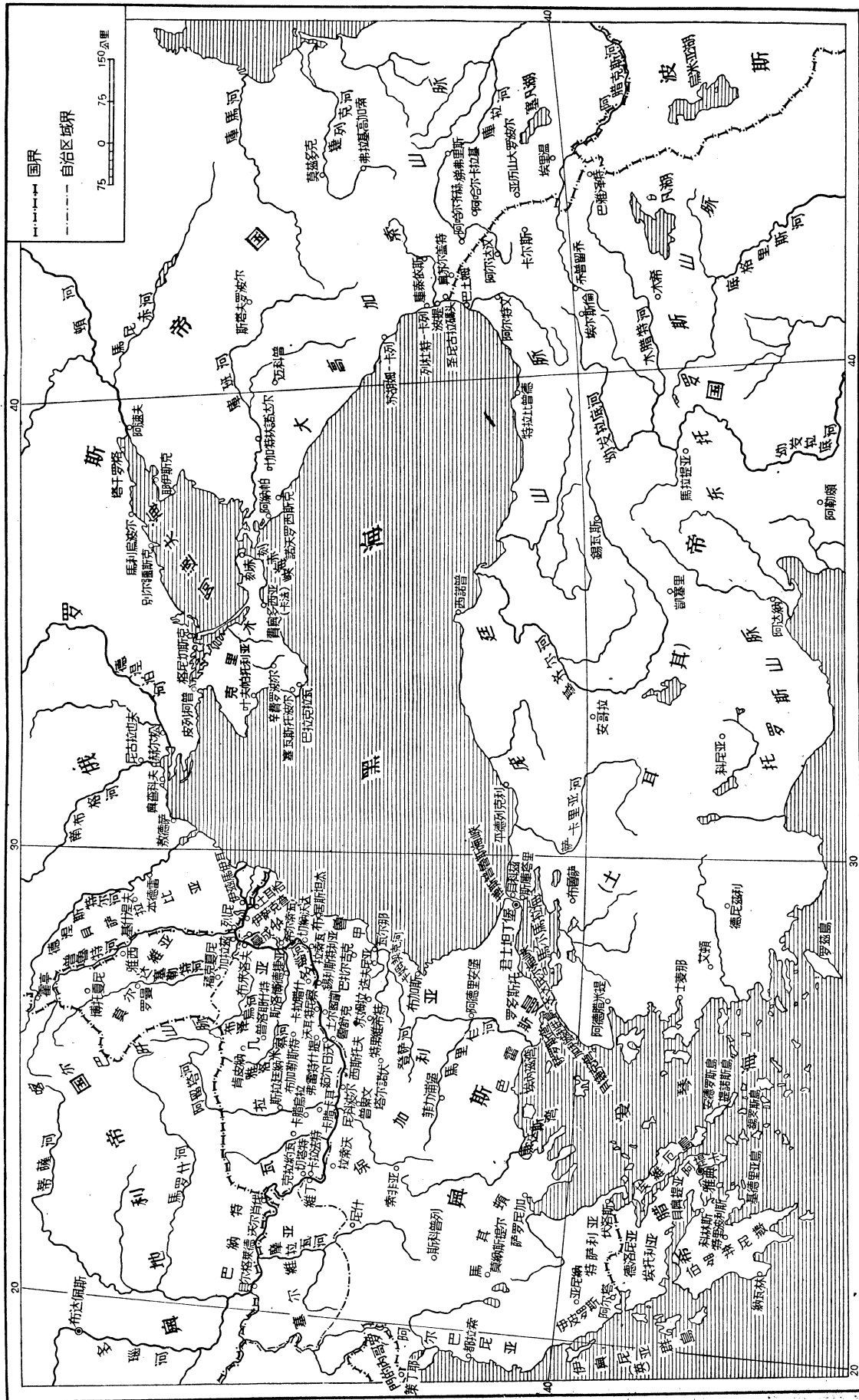
这是帕麦斯顿勋爵的私人 *moniteur* [通报]“晨邮报”报道的。而托利党机关报“新聞报”写道：

“維也納会談的使命是让奥地利有新的借口拖延对西方强国作出关于 12 月 2 日条約所規定的期限問題的最后答复。”

然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当政治家在日报和周报的社論中就新的維也納會議³⁰⁹ 显示自己治理国政的聪明才智的时候，实业家却在同一报纸的交易所的文章中干脆把这个會議叫做“无耻的把戏”。例如，金融評論員，即 *money article* [金融市場記事]的作者，在今天的“晨邮报”上就是这样說。事实上倫敦交易所对維也納的

克里木战争 (1853—1856年)

多瑙河、克里木、高加索三战区



事件是这样漠不关心，以致它的消息无论是对 stock exchange [交易所] 的“狗熊”或“吠喇狗”，无论是对悲观主义者或乐观主义者都不能给予甚至进行微不足道的交易的动因。近 3 天来国家证券的行情出现微小的波动，与此有关的不是维也纳的外交活动，而是巴黎的预算。据推测，英国资本家一定参与 5 亿法郎的新巴黎公债，因而引起金融市场的紧缩，而金融市场的情况由于北美的危机（其规模比 1837 年的危机大得多）、最近关于东印度情况的不妙的报告、粮价上涨以及伦敦和利物浦两地的若干起出乎意料的大破产，本来就令人不安。如果不是俄国皇帝，那就是英国内阁无论如何正被和平幻想俘掳。过去的 100 年中，英国人民曾被本国的寡头政体拖入同法国进行大战。目前同俄国的作战是人民迫使英国寡头政体发动的。目前寡头政体所采取的一切外交、军事和财政的措施都反映出它不愿意进行这场迫使它进行的战争。甚至内阁最近的一项措施——成立外籍军团法案³¹⁰——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打消”英国人对这次战争的“兴趣”。根本不能说这个国家兵源已经枯竭，因为它每年都有 10 万以上的健康的男人迁居外国，并且这种迁居对工资水平只发生短暂的影响。也根本谈不上突然需要紧急增派辅助部队的问题，因为内阁的措施既不是为突然的援助也不为紧急的援助而采取的。议院 5 月通过的民军法案³¹¹使内阁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就可以征集 8 万名民军，而且经验说明，在春季编组的各个团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志愿兵转入了现役；不过，到 12 月初政府只编成了 18 个民军团（约 13 500 人）。大家知道，英国人向来——不论在查理一世时代，在威廉三世统治时代，乔治前几世当政时期或反雅各宾大战时期——反对把外国雇佣兵运入大不列颠。但是，在英国国外使用外国兵竟然引起了这样大

的憤懣，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一种罕見的新現象。正是这个事实证明了目前这场战争具有不同于英国当代曾經进行的一切战争的**完全独特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当政的貴族故意求助于过去时代的幽灵，求助于旧的招募者在**最廉价的市場上招买兵士**的作法。虽然它根本不相信——正如悉尼·赫伯特在下院所承认的——它所提出的措施会成功，它还是这样做。可見，它这样做，不是为了进行战争，而是为了准备媾和。为了建立合乎要求的英国军队，政府目前本应当提高兵士的薪餉、廢除体罰、保证从普通兵士起晋級，簡言之，应当使军队民主化，把军队由政府所有变为民族所有。

今天的“泰晤士报”写道：“不論战时或平时，军队至今都不过是政府用来提升貴族和支持历届內閣的一个机构。”

我們現在要来談一談主要的一点。对英国貴族來說，**同俄国作战意味着丧失它对政府的壟断权**。英国貴族虽然从1830年以来，被迫奉行了仅仅有利于工商业資產阶级的国内政策，但是，由于它保持着对**外交政策和军队的壟断权**，仍然占据着政府的一切要职。然而，它只有在人民战争——**只有反俄战争才可能是这样的战争**——把外交政策变为人民的事业以前，才能保持这种壟断权。因此英国从1830年到1854年的全部外交活动归結起来不外是一个原則：**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同俄国发生战争**。英国近24年来在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丹麦以及地球的各个角落不断向俄国让步就是这个道理。今天的事实证明，英国貴族的打算是正确的。同俄国的战争剛一开始，“泰晤士报”自己就指出：

“貴族沒有能力領導我們的战争，寡头政体的国家机器同我国社会結構具有尖銳的矛盾。”

二

倫敦 1 月 1 日。

“我国所有的軍事指揮管理部門都在目前战争的重担下垮台了。”

这是今天的“泰晤士报”写的。实际上，如果看一看英国軍事指揮管理的組織或其他任何管理机构的組織，就会觉得人們显然要在这里表明所謂宪法的均势原則。各式各样的机构彼此牵制，以致互相使对方完全癱瘓，从而使整个机构无所作为。因此，在当前的战争中才会出現伤員在巴拉克拉瓦，軍医在君士坦丁堡，而药品在斯庫塔里的事情。这就是克里木軍隊起来暴动，反对給他們带来牺牲的制度的原因；既然各級軍人，从上校到普通兵士，都在破坏紀律，每周給倫敦報紙投寄上千封信，并大声疾呼地向社会輿論控訴他們的长官的行为，我們难道不能把它叫做暴动嗎？因此把制度本身所造成的情况要腊格倫勳爵負責是不公正的。他負有責任，但只是軍事指揮方面的責任。

回顾一下克里木战局，我們就会明白，腊格倫勳爵在阿尔馬河会战中犯了第一个錯誤，因为他不是下令迂迴俄軍的右翼，而是下令迂迴靠海的左翼。迂迴右翼就会把一部分俄軍逼向海里，把另一部分俄軍逼向北要塞，而俄軍現在实际上是被击退到辛費罗波尔，也就是退到對他們最有利的退却綫上。如果联軍在阿尔馬河会战中曾經沒有必要地和盲目地企图抓住敌人要害的話，那末恰恰在情况有利于这样做的时候，他們却不够坚决了。轰动一时的“向巴拉克拉瓦的側敌行軍”就是放棄对要塞北区进攻。但是北区

是居于瞰制地位的一面，因而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据点；北要塞是打开塞瓦斯托波尔的钥匙。所以，联军为了取得巩固的防御地位竟放棄了一次更大胆的、因而实际上胜利在握的进攻。

当奥美尔-帕沙在卡拉法特固守下来而没有从沃耳特尼察向布加勒斯特进军并突破敌人的拉得很长的战线的时候，他也犯同样的错误。随后开始围攻塞瓦斯托波尔。这次围攻无论如何证明了长期的和平使得军事学术的倒退同作战方法的改进（由于工业的发展）形成正比。在以往的任何一次战争中，普通的土堡都没有起过这样大的作用。起初俄军在沃耳特尼察沿用旧的一套办法——炮击这些土堡达数小时，然后发起强攻。但没有成功。卡拉法特附近的土堡使俄军无能为力，他们不敢对它们发起攻击。锡利斯特里亚的半被毁坏的土堡使俄军的全部努力化为乌有，最后，塞瓦斯托波尔的土堡仅承受了比以往进攻最完备的要塞所使用过的更多的攻城炮队和更重的火炮的轰击。但是，在攻城炮还没有设置之前，不设防的城市早已成为第一流的营垒了。大家知道，10月25日，在巴拉克拉瓦会战中，英国骑兵由于违反了一切军事学术原则，遭到了完全无谓的牺牲。最后，我们谈一谈克里木战局中最大的事件，即因克尔芒会战。像普鲁士人在耶拿会战一样，在因克尔芒附近的不列颠军队占领了一系列只有沿着几条隘路才能从正面到达的高地。英军像普军一样，没有注意占领自己极左翼的高地，而施科夫像拿破仑在耶拿会战³¹²时一样，向这个高地投入了他的一部分军队，从而在拂晓前在敌人的翼侧设防固守下来。一般不主张独创的俄国人，抄袭了拿破仑的这个作战计划，但是，当战略机动刚刚完成和战术动作应当开始的时候，西欧文明的假面具就掉下来了，并且露出了韃靼人的本色。这支拥有

許多服役 25 年的老兵的出色的俄国军队，——这个阅兵操练方面的模范——竟然如此软弱无力、如此笨拙、如此不善于用散开队形和以小部队进行战斗，以致他們的军官除了用这个笨拙的人群向敌人猛冲之外，沒有任何別的办法。这个笨拙人群的简单的猛攻本来足以突破英军密集的队列；然而，一方面，这些人体密集的纵队为英国枪炮火力的毁灭性的威力創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当俄军依靠数量上的优势轉入白刃冲击时，英军以拿破侖的方队在金字塔会战中迎击馬木留克兵时的同样的优越性迎击了他們。14 000 名联军仅伤亡三分之一，就击潰了 3 万俄军，尽管人們公认俄军在战斗中表现了个人的勇敢和俄军的进攻计划比联军的计划高明。自納尔瓦会战以来，俄军还从来没有遭到这样的失败。如果考虑到納尔瓦会战时的俄军和因克尔芒会战时的俄军之間，即 1700 年的沒有受过训练的一群烏合之众和 1854 年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军队之間有很大的区别，那末納尔瓦会战比因克尔芒会战就显得更加出色。納尔瓦会战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民族的第一次严重的失败，这个民族善于甚至把失败变成胜利的武器。因克尔芒会战是从彼得大帝时期以来俄国在温室发展中正在衰退的确实的征兆。在半野蛮的国家里，为了在国家半野蛮的水平上保持堂皇的文明外观所作的人为的加速进展和巨大努力，看来已經使这个民族精疲力尽并使它害上了类似肺癆的病症。因克尔芒会战之对俄国步兵正如罗克魯阿会战³¹³之对西班牙步兵一样。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12 月
29 日和 1855 年 1 月 1 日

載于 1855 年 1 月 2 日和 4 日
“新奧得报”第 1 号 and 第 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卡·馬克思 報刊和軍事制度

倫敦 1 月 3 日。

“泰晤士報”記者從塞瓦斯托波爾營地報道：“據說，俄皇自願用**唯一的一艘軍艦**把我軍 5 月初以前殘留的東西全部送還英國。”

接着是對籠罩英國兵營的一片死亡、窮困、混亂和瓦解景象的鮮明的描寫。軍隊的狀況現在幾乎成了倫敦各報社論的唯一課題。

“泰晤士報”寫道：“不列顛軍隊從軍事意義上說已經不成其為軍隊。這是一群勇敢的人，同時不過是普普通通的一群，甚至更壞，因為指揮它的是一些不配指揮它的人，並且因此它失去了它所固有的戰鬥力…… 塞瓦斯托波爾的英軍統帥部純粹是虛有其名；不但如此，優秀的軍官們肯定地說，即使是下級軍官來指揮軍隊，其所獲得的成績也不會比那些被認為是軍隊司令官的人遜色。我們認識到，要把那些年高德劭、忠誠正直的人一脚踢開並不那麼容易。”

但是，à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 [打仗就應當像個打仗的樣子]。

“如果有過某個內閣曾經有可能採取這類強制辦法的話，那就是現屆內閣。”

為什麼？

“因為它是這樣頑強地反對宣戰”。因此“大權在它手里，它就不應當因人事問題而束縛自己”。

獅子，你吼叫的好！因為現屆內閣對俄國進行的戰爭並非出於自願，所以作戰當中的錯誤不應當歸之於內閣，而只能由總司令負責，並且公眾應當明白，不是內閣妨礙了腊格倫勳爵，而是腊格倫勳爵妨礙了內閣。

雖然“泰晤士報”為了給內閣解圍用這樣方式攻擊腊格倫勳爵，皮爾派機關報“紀事晨報”卻攻擊“泰晤士報”，表面上是為了袒護腊格倫勳爵，而實際上是感謝“泰晤士報”承認內閣沒有過失，然後利用這種承認，同時串演一通兩家政府報紙間的論戰把戲，以達到聲東擊西的目的。

規矩的“紀事報”寫道：“我們痛心地指出，近日籠罩輿論界的灰心情緒要完全歸罪於‘泰晤士報’的影響。用陰暗的色彩描寫每一事件，誇大災難，敗壞我國將軍們的應得的聲譽，把英國人不背後議論人的這種家喻戶曉的寬宏大量置之腦後，這一切都只是為了聳人聽聞，為了嘩眾取寵！其實，全部仇恨，全部惡毒的攻擊主要都是對准腊格倫元帥……克里木軍隊從12月初以來所處的悲慘狀況（雖然最近的消息還比較令人安心一些），首先應當歸咎於11月14日的可怕的狂風暴雨。”

內閣如此之寬宏大量，竟然不要腊格倫勳爵負11月14日的狂風暴雨的責任。這樣一來，除了“泰晤士報”的追求嘩眾取寵之外，再沒有留下別的了。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代表內閣內部一定的特殊利益的那部分倫敦報刊——從某一時候起就暗中是帕麥斯頓的喉舌的“每日新聞”和多年來一直是他的正式喉舌的“晨郵報”。

“每日新聞”說：“我國的行政主管部門幾乎沒有改變，好像它們屬於米太人和波斯人時代一樣。任何意外的危機都使它們措手不及。即使面臨人類

生命和财产的最可怕的浩劫，它們也很少被改造得将来能应付类似的大灾难…… 軍事部門也是这样。不久前任命首席陸軍大臣时，人們曾經抱过多大的期望！但是情况并未因此而有絲毫改善。在这一点上我們应当責怪紐卡斯尔公爵呢，还是我們宁可着手改革这个处于瘫痪状态的制度本身（这个制度把国家职权完全交到具有令人难忍的势力的貴族手里）？無論紐卡斯尔公爵有怎样的功勋，他毕竟不是那个能粉碎这个制度的**官方的海格立斯**①。但是，英国人民会坚决作到这位公爵所作不到的事情。”

“每日新聞”在充当內閣的喉舌方面还是个新手。况且，它不能不顾及到它的資產階級讀者。不过一眼就可看出，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說需要一个“官方的海格立斯”。但是誰是这个官方的海格立斯呢？又怎样找到他呢？“晨郵报”回答了这个问题。它說：

“从攻击腊格倫勋爵开始就是开始得不对头。‘泰晤士报’的攻击伤害不了腊格倫勋爵…… 还是无须去怀疑政府在国内工作的缺点…… 就拿軍事部門來說。它今后是否还应当用9个月来用过的精神和样式办事呢？…… 必須記住，在国外的軍隊完全依赖于英国国内的行政机关…… 因此，特別重要的是要使軍事机关的首脑成为绝对的主人并能像主人那样行事…… 据說，旧的制度妨碍了这点。但是，一个真正的主人，早就会負起責任把这个制度打碎了…… 实际上，秘密在于：現届政府的首脑像一个鉛錘一样压抑着各个部門的一切努力。阿伯丁的脉搏的微弱跳动傳到各个管理机构，并对整个制度发生影响…… 改变整个制度并把一个真正的結实的头安在它的肩上吧。”

換句話說，让帕麦斯頓当首相吧。他就是“每日新聞”所幻想的那个**官方的海格立斯**，——就是那个帕麦斯頓，他在1830年由墨尔本勋爵根据俄国利文公爵夫人的提議任命为外交大臣；就是

① 希腊神話中的英雄，宙斯与凡女所生，力气非凡，屡建功勋。——譯者注

那个帕麦斯顿，他在阿富汗战争³¹⁴中如此令人不解地使英军遭受牺牲，以致罗伯特·皮尔爵士在议会会议上公开用“揭底”来威胁他，如果他再继续用他的吹牛触怒他的话；就是那个帕麦斯顿，他把1839年由法国提出的并似乎已经安排好了的反俄的进攻同盟引导得如此巧妙，使它在1840年的一个早晨就变成了反法的英俄同盟³¹⁵。虽然帕麦斯顿也是现政府的一个最有势力的成员并且在议会人士面前作为而且也必然作为政府的热心卫护者出现，但是，他在报刊上却不断使用外交艺术的一切手段来表明他同阿伯丁的严重的不和，从而在联合内阁一旦垮台时保全自己的威信。同时，人们阻止反对派采取断然措施并且继续使它在内阁的纠纷上处于毫无结果的紧张状态中。例如，托利党的机关报“先驱晨报”今天是第一百次陷入圈套，因为它宣布联合内阁的倒台是注定了，并且不遗余力地散布帕麦斯顿和罗素对阿伯丁、纽卡斯尔和格莱斯顿的出自爱国热忱的愤懑。Ad vocem [关于] 格莱斯顿，还应当指出，正如从今天“纪事报”一篇论述法国公债的社论所得出的结论，格莱斯顿不打算采用公债，而决定用直接征税的方法，也就是采用一种最不受欢迎的、负担沉重的和非经济的税收形式来进行战争。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1月3日

载于1855年1月6日“新奥得报”

第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弗·恩格斯

英軍在克里木的災難

自从倫敦“泰晤士報”发表了激烈的社論以后，看来英国公众对英軍在克里木的处境都怀着非常激动和不安的心情。的确，英軍由于一切軍事指揮管理部門前所未聞的拙劣領導，英軍正在迅速地趋于彻底瓦解，对于这一事实再也不能否认和掩飾了。無論对印度的酷暑或者对俾路支人和阿富汗人的凶猛攻击都毫不畏惧的那些老兵，現在备尝冬季作战的艰辛，受着潮湿和寒冷的折磨，为不間断的繁重的野战勤务所苦，沒有被服和粮食，沒有帳篷和掩蔽所，因而每天成百地死亡，而增援部队在开到后，又相继毀于致命的疾病。这种状况究竟是誰的罪过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英国广泛流傳的答案是：这一切都是腊格倫勳爵的罪过。但这是不正确的。我們并不贊揚这位极可尊敬的勳爵的作战方法，而且我們公开地批評过他的严重失策，但是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应当說，造成兵士在克里木死亡的可怕災難的原因，不是他的錯誤，而是英国軍隊整个指揮管理系統的弊病。

英軍設有总司令，这对于几乎所有的其他文明国家的軍隊來說都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要是认为这位总司令真能指揮些什么，那就錯了。步兵和騎兵在某种程度上隶属于他，可是炮兵、工兵和地道爆破兵却完全不受他管轄。他在某种程度上掌管軍褲、

上衣和袜子，可是軍大衣却又不归他管。他能使每名步兵背两个子彈盒，可是不能发給他們步枪。他可以把所有的部屬送交軍事法庭并施以无情的鞭笞，但是不能指揮他們移动一步。軍队的調动不屬於他的职权範圍，粮食的供应也同他完全无关。

此外，还設有“軍械总工长”。这一职务是旧时代的可怜殘余，那时认为科学同兵士无关，并且在各专业兵种——炮兵和工兵——中服务的不是兵士，而是既非学者又非工匠的这些难以确定名称的人，由他們組成特别的行会或团体，归“軍械总工长”管轄。这位軍械总长除了管轄炮兵和工兵外，也掌管軍大衣和枪械。这样一来，一切軍事行动，不論性质如何，就都与他有关。

其次是軍务大臣。假如上面两位人物的作用等于零，那末他的作用便小于零。軍务大臣不能給任何一个部队下达命令，但是他可以阻碍每个部队的任何行动。因为他管轄軍事財政部門，又因为一切軍事行动都需要錢，所以如果他拒絕付錢，就等于完全否定一切軍事行动。但是即使他同意出錢，他的作用仍然等于零，因为軍队的給养不由他負責，这已經是他职权以外的事了。此外还补充一点，就是实际上負責軍队給养并在必要时提供运输工具保障軍队調动的軍需部是隶属財政部的。因此，首相兼財政首席大臣可以直接影响任何一次軍事行动，并按照自己的意願加速或延緩其进程，或根本停止这一行动。大家知道，軍需部几乎是比兵士更为重要的軍队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大不列顛的集体的智慧认为，使軍需部脱离軍队完全独立并把它置于完全不相干的部門的监督之下是合适的。最后，从前由殖民大臣負責的軍队的調动，現在則由不久前新設的陸軍大臣負責。后者掌管从英国到中国以及印度到加拿大的軍队部署。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本身的权力

同上述 4 个军事长官一样，并不起什么作用；军队即使采取某种微不足道的行动，也必须取得 5 个人的全体同意。

英国就是在这种惊人的制度的庇护下开始当前这场战争的。在本国 40 年和平时期内给养充足、供应良好的不列颠军队精神饱满地开始了远征，并且深信不论敌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英国都不会使自己勇敢的兵士缺乏任何东西。但是当他们在第一个停泊地加利波利刚一登陆，同法军一比较，就暴露了自己整个准备工作的水平低得可笑，全体负责官员无能得可怜。虽然那里一切必需品都比较容易得到，一切必要的指示也都预先下达了，而且登陆的部队数量并不多，但是一切都弄得很糟。每个人都忙于自己份内的事，谁也不想把在英国和平时期内没有履行过的职责承担起来。这样一来，没有一个人去完成那些直接由于战争而产生的任务。因此，轮船运来的储备品就在最初卸载的海岸上腐烂了，而军队却因住房不够不得不开到斯库塔里去。出现了无可争辩的混乱的迹象，但是既然战争刚刚开始，还可以期待在取得经验之后情况将会好转。

军队开到了瓦尔那。同英国的距离增大了，军队的数量增加了，指挥管理方面的混乱也更严重了。分别由专门的大臣掌管的 5 个军事指挥管理部门各自为政，在这里第一次引起了公开而明显的纠纷。野战部队感到一切都非常缺少，而瓦尔那的守备部队却应有尽有。军需部极其迟缓地征集了当地的运输工具，但是因为总司令没有为辎重队派遣护送队，所以保加利亚的车夫几乎是刚刚召集起来便又四处逃散了。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座中心仓库——有点像主要作战基地，——但是它并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却成了无穷的困难、拖延、争权以及军队、军械部门、财政部、军需部

和陸軍部之間的糾紛的新源泉。一旦需要作某件事情時，每個人都力圖把工作推給別人。擺脫一切責任，這就是每個人所竭力追求的。結果是一團糟，沒有採取任何適當的措施。厭惡這些工作方法並且意識到軍隊因閑散無事而日趨瓦解，這大概對腊格倫勳爵決定冒險進行克里木遠征起了一定的作用。

這次遠征是約翰牛整個軍事制度的傑作。這個制度正是在克里木非常出色地顯示了自己。當軍隊實際上還處於平時狀態，就像在加利波利、斯庫塔里和瓦爾那時那樣，他們的無秩序、混亂、驚惶失措未必能夠充分表露出來。但是現在，在敵人面前，在真正的戰鬥中，情況就不同了。俄軍的抵抗使英國官員有充分的机会來表現自己的全部才幹。應當承認，從來還沒有一種目的在於瓦解某一軍隊的努力會像這些老爺們的努力這樣卓有成效。從去年2月起派往東方去的6萬多軍隊中，目前有戰鬥力的不超過17 000人；其中每天死亡60—80人，因病離隊的200—250人，並且很少有歸隊的。在43 000名死者和病員中間，直接遭受敵人殺傷的還不到7 000人！

最初傳到英國的消息說，軍隊在克里木缺衣、缺食、缺住處，總之缺乏一切，說沒有藥品、沒有外科醫療器材，說傷病員不論任何天氣都是躺在潮濕寒冷的地上或者被送到停在外停泊場的擁擠的船上，沒有任何照顧，也沒有最簡單的醫療設備；成百的人由於缺乏必需的物品而死亡。當聽到這些消息的時候，大家都認為政府不關心作戰軍隊的必要保障。但是很快就弄清了：如果起初事情的確有些這樣，那末現在情況已不同了。運去了一切必需品，甚至還有剩餘，但是不幸的是，什麼也沒有送到需要的地方去。藥品在瓦爾那，而傷病員却在克里木或斯庫塔里；被服和給養已運到克里

木海岸，但是沒有人去卸；偶然被卸下来的一些东西也在海岸上烂掉了。同舰队协作的必要性成了原来就存在矛盾的各部門領導机构之間产生糾紛的新借口，这些部門必然是以爭吵来保障英軍的胜利的。到处都可以看到被那些仅在平时适用的条例掩盖起来的碌碌无能的現象。在欧洲一个最富庶的地区，在其掩蔽的海岸附近，停泊着成百只滿載粮食的运输船，而英国兵却只能得到半份口粮；他們由于只能吃到咸肉而患坏血病，而附近却有无数的牲畜群；船上有大量的煤和木柴，而岸上燃料非常少，以致兵士不得不吃生的口粮，并且无法烘干被雨淋湿的衣服。想一想看，发的咖啡不仅沒有磨成粉，而且沒有炒过！粮食、飲料、衣服、帳篷、彈药等儲备品成吨、成百吨地放在那些船上，船桅都几乎碰到設有营地的陡岸了，然而英軍却像唐达魯士^①一样，什么也不能得到。大家都感到怨恨，坐臥不宁，詛咒和責备每一个瀆职的人，但是誰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用俗話說就是“莫名其妙”。因为根据为每个人专门制訂的并經過相应机关批准的全部工作守則来看，正好是現在需要做的，却沒有包括在他的职权範圍內，而他由于沒有这种权力，就不能整頓秩序。

除了所有这些以外，阴雨連綿，天气越来越寒冷，暴雨把整个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变为一片澤国，泥水至少深达膝盖；兵士們四个夜晚至少有两个夜晚在战壕里度过，其余两个夜晚就干脆睡在沼澤地上，渾身湿透，沾滿污泥，甚至連一块垫板都沒有，只勉强得到帳篷的遮盖；加之整天惶恐不安，根本得不到正常的休息和

^① 古希腊神話中呂底亚的国王，因得罪了神，被罰在冥府永受饥渴的苦难。他立在齐頸的水中，头上悬有熟透的果子，但是他一要喝水，水即退去，一要吃果子，果子即上升离去。——譯者注

睡眠；长期的潮湿和寒冷引起了痙攣、腹瀉和其他疾病；为数本来就不多的医务人员分散于整个营地；医疗站的帳篷內住滿了 3 000 名病員，他們都躺在湿地上，几乎同在露天一样。請想想这一切，你就不难得出結論：英軍在克里木正处于完全瓦解的状态，按照倫敦“泰晤士报”的說法，就是变成了“一群勇敢的人”；兵士們都宁願被俄軍的子彈打死来摆脱这一切不幸。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好吧，假如你不想等到議会的半打法令由皇家法官郑重其事地制定出来并且經過討論、修改、表決而列入法典，然后再將指揮管理軍隊的一切事務集中到一个名副其实的陸軍大臣手里，再等这位新陸軍大臣——假如他称职的話——重新組織自己的机构并发布新的指令；換句話說，假如你不想等到英軍在克里木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話，那末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授予远征軍总司令以独断独行的全权，一切由他个人負責，由他統管同他爭权和作对的各軍事指揮管理部門的工作，而这种全权是任何別国的总司令所享有的，沒有它，总司令将必然一事无成。如能做到这一点，一切便会得到迅速糾正。但是，哪里会有这样一位英国將軍願意以古羅馬人的精神办事，并且当受到責難时能用羅馬人的話为自己辯護說“是的，我承认我的過錯就是拯救了祖國”呢？

最后，我們应当給自己提出一个問題，是誰发明并保持了这一种惊人的指揮管理制度呢？不是別人，正是已故的威灵頓公爵^①。

① 本文經卡·馬克思修改并发表于 1855 年 1 月 8 日和 9 日的“新奧得报”，其中有以下一段是英文原文所沒有的：“显然，这一制度产生于防范常备軍的立宪措施。它以縮小軍隊的机动能力到最低限度的分权来代替可使軍隊具有最大灵活性的分工。但是，保持这一制度决不是由于議會或宪法的關係，而是另有

他维护了这一制度的每个细节，好像他个人所关心的是尽量给自己的继承人多制造些困难，因为他的继承人可能是他的军事荣誉的未来竞争者。威灵顿以其健全的思想而著称，但是没有什么军事才能；当他不仅是伟大天才拿破仑的同时代人，而且是战场上的对手的时候，他极其痛心地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因此，威灵顿非常嫉妒别人的成就。大家都非常知道，他在贬低自己的助手和盟友的功绩方面做得很卑鄙；甚至对曾在滑铁卢救过他的布吕歇尔，他都没有饶过。威灵顿深知，西班牙战争期间，假如不是他哥哥当大臣的话，他便不能胜利地结束那场战争。难道威灵顿不是担心后人的战功将淹没他的荣誉，并且不正是因此他才丝毫不动地保留了这架最适于束缚将军们的手足和毁灭军队的军事机器吗？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1 月 4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1 月 22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93 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原因，即在改革指挥管理制度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的同时，寡头政体的势力至少在这一领域中也会被消灭。在议会的上次会议上，大臣们除了同意把陆军部同殖民部分开外，拒绝进行任何革新。威灵顿从 1815 年起到死为止，一直顽固地维护这一制度，虽然他深知，假如恰巧他哥哥威尔斯里侯爵不在内阁任职，那末他在**这种制度下**是绝不能把比利牛斯半岛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1832 年和 1836 年，威灵顿在议会为改革旧制度而成立的委员会面前，全力维护旧的制度。他不正是担心这种改革会给自己的继承人取得荣誉开方便之门吗？”——编者注

卡·馬克思

工 商 业 危 机

一

倫敦 1 月 8 日。倫敦的俱樂部和報紙正在郑重其事地大談其“內閣危机”，却找不出時間来指出一件无比重要的事实，这就是：一次巨大的工商业危机又来到了英国，而且这次危机的破坏性就其規模來說，比 1847 年和 1836 年的危机还要大。如果說最近 3 个月来偶尔发生的破产（其数目和影响最近又增加了）还没有使人們承认这个事实，那末，現在在关于貿易的年度报告和 Board of Trade [貿易部] 編制的关于 11 个月进出口的統計公报发表以后，終于无法否认危机的存在了。这些公报表明，出口比 1853 年同期的 11 个月减少了 1 710 677 英鎊，如果仅仅拿这两年的最后一个月——从 11 月 5 日到 12 月 5 日——来比較，則减少了 1 856 988 英鎊。我們現在从商品輸出表中抄出下列表明某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門产品輸出减少的詳細数字。

	1853 年 (单位: 英鎊)	1854 年 (单位: 英鎊)
棉織品.....	23 757 155	22 877 050
棉紗.....	6 322 639	6 055 640
亚麻織品.....	4 379 732	3 735 221

亚麻紗·····	1 069 812	852 763
毛織品·····	9 470 413	8 566 723
絲織品·····	1 492 785	1 144 506
机器輸出·····	1 368 027	1 271 503

当然,关于貿易的报告企图把 1854 年的危机的責任推到战争身上,就同他們把早在 1847 年就已开始的危机推到 1848 年的革命身上一样。但是这一次連倫敦的“經濟学家”杂志,——它根据自己的原則总是用与工商业无关的偶然情况来解釋危机的,——也不得不承认,1854 年的破产和貿易的减少是 1853 年的“痙攣性的繁荣”的合乎自然的反作用的开始。換句話說,就是經濟周期已經达到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投机为危机代替的阶段。北美合众国就是最好的证明,东方战争涉及美国的只是在这一方面,即东方战争造成了美国的造船业和船只貿易的空前发展,保证美国的某几种原料有了銷路,而过去这些原料主要是或者完全是由俄国提供的。美国的危机已經延續了 4 个多月,現在还在繼續发展,虽然在 4 208 家銀行当中有 109 家,即約占总数 2.5% 已經破产,而且在东部各工业州里,一种使工資大大降低的工业停滞已經到来,以致上月有 4 000 多欧洲移民又“迂回”祖国。美国 1837 年的危机是跟着英国 1836 年的危机而来的。而这次事件的进程正好相反。美国首先开始破产倒閉。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充斥了英国的商品。下列数字表明了这个事实对于英国的貿易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在 1853 年,大不列顛大約輸出了 1 亿英鎊的商品,其中 2 500 万輸出到美国,1 500 万輸出到澳大利亚。除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以外,最重要的銷售市場就要算东印度了。但是早在 1852 年东印度市場上就已經商品过剩,只有采取一种全新的办法,即經過旁遮普和信德省

轉到布哈拉、阿富汗和俾路支，再从这里一面进入中亚細亚，一面进入波斯来扩大貿易，才勉强使出口額保持住旧有的水平——800万英鎊。而現在，那里所有的銷路都堵死了，以致最近只好把商品从印度斯坦轉运到澳大利亚去，这样一来就成了“把猫头鷹运到雅典去了”³¹⁶。在一个时期內，人們由于东方战争而“非常謹慎地”把商品运去的唯一市場是列万特市場。但是在西蒂区，下面这一点对誰也不是秘密了：自从美国的危机和澳大利亚的停滯迫使商人竭力探寻哪里还有商品沒有过剩的市場的时候起，君士坦丁堡就成了堆存各种需要推銷的商品的地方，而現在这条路应当算是已經“堵住了”。至于利用最近西班牙的騷动搞走私，把西班牙所能吞下的英国商品运到那里的这条道路，同样走不通了。現在又企图在南美各国采取这种办法，虽然这些国家购买力很小是不用证明的。

因为英国的危机对整个世界的社会情况和政治局势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必須比較詳細地談一談英国1854年以前的貿易史。

二

倫敦1月9日。关于1849年到1853年这段时期英国工商业的增长情况，可以从下列数字来判断。不列顛港口进出的租用船只总吨位，1846年为9 499 000吨；1850年增加到12 020 000吨，1853年已經不下15 381 000吨，即比1843年增加了1倍。不列顛工业品和原料輸出的价值，1846年为57 786 000英鎊，1850年已經达到了71 367 000英鎊，1853年則超过了98 000 000英鎊，即超

过了 1842 年输出的总值 1 倍多。在这个输出額的增加上北美合众国和澳大利亚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1842 年，不列颠对澳大利亚的输出額还不到 100 万英鎊；1850 年几乎达到了 300 万英鎊，而在 1853 年居然达到了 14 513 000 英鎊。1842 年对美国的输出額为 3 582 000 英鎊，1850 年几乎达到了 1 500 万英鎊，而到 1853 年已不下 23 658 000 英鎊。

从这些数字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1854 年也同 1825、1836、1847 年一样，是现代貿易史上轉变的一年；第二，美国的危机只是英国产生危机的因素之一；第三，1854 年的战争——“祖国报”（*Journal de l'Empire* [帝国的机关报]）称这个战争为 *une guerre pacifique* [和平战争] 是十分正确的——决沒有对这次社会性的灾难起什么影响，如果說起了影响的话，那也只是起了一点阻碍的作用。个别的工业部門，如制革业、制铁业、毛織业以及造船业，都由于战争所引起的需求而得到了直接的支持。在 40 年的和平时期之后的宣战所引起的恐惧心理，在短时期內限制了投机規模。欧洲各国为了战争而签订的貸款使利率变得如此之高，以致阻碍了工业活动的过分发展，从而延緩了危机的到来。但是，和平协会³¹⁷問道，难道战争沒有使粮价上漲嗎？难道粮价的上漲不等于 *domestic trade* [国内貿易] 的縮减，也就是英国国内工业品消費的縮减嗎？难道国内市場的縮小不是危机产生的主要因素嗎？首先应当回忆一下，1853 年，即英国最繁荣的一年，是粮价高昂的年头，1854 年的粮价平均比 1853 年低；因此，无论是 1853 年的繁荣，或者是 1854 年危机的征兆，都不能用粮价的高低来解釋。这里我們把粮价对工业的影响問題撇开不談；但是战争对粮价的影响是什么呢？換句話說：粮价的上漲是不是因为从俄国运入的粮食减

少了呢？在大不列颠输入的谷物和面粉的总额中，俄国约占 14%；由于全部进口只能满足国民消费的 20% 左右，所以从俄国进口的粮食约占这个消费额的 2.5%。

1854 年 11 月初公布了一个最近的官方报告，其中列举了大不列颠从世界各洲和各国输入的谷物和面粉的比较数字，并且列出了 1853 年头 9 个月同 1854 年头 9 个月的比较表。根据这个报告，1853 年小麦的输入总额为 3 770 921 夸特，其中从俄国输入的为 773 507 夸特，从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输入的为 209 000 夸特。面粉的输入总额为 3 800 764 英担，其中从俄国输入 64 英担，而从多瑙河各公国输入的 1 英担也没有。在 1854 年这个战争年份，大不列颠从俄国输入的小麦是 505 000 夸特，从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输入的小麦是 118 000 夸特。谁也不敢断言，输入额减少这样一个数目（况且从其他国家输入的面粉增加额已抵补了这个数目）就会使丰收的 1854 年的粮价几乎上涨到歉收的 1852 年和 1853 年的水平。相反，即使完全停止从俄国输入粮食，也不会产生这样的影响。从多瑙河各公国输入的减少仍然是个谜，虽然从经济上来看，这个事实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不过这个谜是很容易猜破的。如果说联军对俄国的黑海港口的封锁仅仅是名义上的封锁，那末恰好相反，对波斯普鲁斯海峡和多瑙河口的封锁是实际上的封锁；它们不是封锁俄国，而是封锁了土耳其和多瑙河各公国。谁不知道俄国在 1812 年、1828 年³¹⁸、1848 年（当时是以镇压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的叛乱者为借口的）和 1854 年对新月的十字军征讨，部分地是由俄国南部各省同多瑙河各公国和在多瑙河一带从事贸易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贸易竞争引起的。英国内閣想这样来惩罚俄国：让敖德萨和塔干罗格自由地贸易，而压制在

多瑙河一帶的俄國競爭者，封鎖他們，并使英國自己得不到輸入，這是多么英明！

三

倫敦 1 月 16 日。關於目前的工商業危機，倫敦的“經濟學家”雜誌指出：

“不管其他商品的輸出減少到什么程度，機器輸出却沒有受到影響。出口機器的價值不但沒有減少，1854 年反而比 1853 年有所增加。因此，別的国家現在都使用我國出產的機器。在這方面，我們已經沒有什麼比它們優越的地方。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瑞士和美國現在都是大工業國，其中有些国家甚至超過了我們。我們面臨着一場競賽，但是如果我們把自己的手脚束縛起來，那末我們就不能夠勝利。現在大家從經驗中都認識到，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實行的那些限制，反而給大地主帶來了損失；為了廠主的利益而實行的那些限制，反而限制了廠主；工廠工人們也逐漸發覺，為了他們的利益而由法律規定的那些限制只能使他們受到損害。因此，應當希望他們在上述的那些国家利用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把英國從它們國內市場和其他国家的市場上排擠出去，从而使我國的工廠工人陷入極端貧困的境地之前，就能發覺這一點。”

威爾遜先生是“經濟學家”雜誌的發行人和那個口是心非的、殷勤獻媚的格萊斯頓的財政部的代言人，他是一個自由的使徒，同時又是一個鑽營者；此人在其雜誌的一個地方根本否認國家的必要性，而在另一個地方則證明說，具體說來，決不能沒有聯合內閣。於是，威爾遜先生就從故意歪曲事實起，開始了自己的說教。在 1854 年的輸出表中，有兩欄是關於機器輸出的。關於鐵路機車的第一欄表明，1853 年機車的輸出總值為 443 254 英鎊，而在 1854 年為 525 702 英鎊，確實增加了 82 448 英鎊。正相反，包括工廠使

用的机器和其他各种机器的第二栏（机车除外）表明：1853年的输出总额为1 368 027 英镑，1854年为1 271 503 英镑，即减少了96 524 英镑。因此，把这两笔数字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输出额减少了14 076 英镑。这个详细数目使曼彻斯特学派³¹⁹先生们露出了破绽。他们认为现在正是应该取消现行的那些对工厂工人有利的“限制”，即废除法律规定的妇女、18岁以下的少年和12岁以下的儿童的工作时间的限制的适当时机。为了达到如此崇高的目的，捏造一些数字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根据教友派信徒布莱特的私人刊物“曼彻斯特观察家”³²⁰的材料以及来自工厂区的各种商业概况的材料来看，通常是我国的剩余产品的销路的国外市场，现在正在我国过度生产和过度投机的沉重压力下呻吟。

如果说尽管出人意外地出现了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这两个新的黄金市场，尽管电报已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证券交易所，尽管铁路和轮船使得交通因而也使得交换扩大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世界市场上仍然是商品过剩，那末请问：要是允许厂主实行十八小时的工作日来代替十一小时的工作日，危机是否要等很久才会到来呢？这是很容易计算的，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但是这不仅会相应地加速危机的到来，而且整整一代工人的体力、智力和生命力就将失去一半。对于我们这种说法，曼彻斯特学派可能拿这样的话来回答：

如果痛苦是欢乐的源泉，

谁还会为痛苦而忧伤？^①

然而正是这个学派使整个英国充满了感伤的怨言，埋怨对俄战争

① 歌德“致祖莱卡”。——编者注

同任何战争一样要牺牲人！过几天我们将会在这里听到科布頓先生抗議基督徒相互殘杀。过几个星期我們又会听到他在議會中抗議那些不使工厂儿童的生命过快燃尽的“限制”。他是否认为在所有的英雄的功績中，只有伊罗德^①的功績是唯一无罪的呢？

我們同意曼彻斯特学派的想法：法律上对工作时间的限制絕不能证明社会发展的水平很高。但是，我們认为禍根不在于法律，而在于使得法律成为必要的那些条件。

四

倫敦 1 月 22 日。由于工商业危机的到来，我們不妨回忆一下，1825 年財政大臣罗宾逊在宣布議會开幕的时候，曾发表了一次兴高采烈的演說，指出工商业有了空前的繁荣。可是过了几个星期，英格兰銀行就有不得不停止現金支付的危險。从那时起，由于科貝特的倡导，罗宾逊得到了一个“繁荣的罗宾逊”的綽号。在英国，历史先例是受到尊重的，所以繁荣的罗宾逊不可能沒有追随者。在議会的最近一次非常會議开幕的时候，国王发表御前演說祝賀国家在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有了特別的繁荣。其实，現在連过去在某种程度上能迷惑住罗宾逊的那些**外部迹象**都沒有了。大臣們的祝賀显然是英国通常用来宣布世界市場发生震蕩的傳統方式。比大臣們的发言更使人惊奇的是目前报刊的沉默。报刊是不是认为它能够像巴黎的文人集团用沉默的阴谋“扼杀”不合乎他們心意的书籍那样把商业危机“压下”呢？但是，行市表說明了危机，“官

^① 即公元前 40—4 年的犹太国王，常用来比喻暴君。——譯者注

报”上发表的破产名单说明了危机，“业务通訊員”的来信说明了危机。很快报纸也会谈起危机来的。在最近一周内，西蒂区有很多貿易公司已經停止支付了；其中最大的几家是：同西班牙和西印度做生意的洛涅尔甘公司；同曼彻斯特及其附近的工厂区有商业来往的罗杰斯—劳里公司；同美洲做生意的科特林格頓公司以及作为最老最殷实可靠的公司之一的奥伯提烏斯兄弟公司。这些商行的債務平均为 10—15 万英鎊。在本周内西蒂区至少又有 7 家大商行要宣告停止支付。

在 1 月 20 日北明翰寄来的一封有关实业方面的信件里，我們看到对斯泰福郡南部的工业状况詳述如下：

“除了根据政府的訂貨生产軍用物資的制铁企业以外，只有少数几个企业还有訂貨，而且价格极低。現在 8 英鎊 10 先令就可以买 1 吨扁铁，而在仲夏，每吨的价格是 12 英鎊；但是即使价格这样低，也很难找到买主，因此，生产只得縮減。在北美合众国各个大的經濟部門中，遭受商业危机之害最大的要算制铁业。在美国，投資額巨大的各大铁工厂几乎家家都把自己的工人抛向街头，而且沒有很快再把他們招回来的希望。因此应当认为，在美国铁的消費几乎完全停止了，不能再指望从那里得到新的定貨。——上星期六錫工厂（在北明翰）有很多工人被解雇，今天晚上（1 月 20 日）又要有更多的工人被解雇。炼銅厂和鑄銅厂工人們的处境也不比他們好一些，因为这里大多数的大企业都是开工不足。——現有的时新貨品的定貨非常之少，到各地去寻找这方面的春季定貨的推銷員寄来了非常不妙的消息。——金融市場的情况繼續給各商业部門以有害的影响。銀行抬高利率产生了极有害的影响，而現在兴隆的只有貸款这一种业务。在各小貸款处的門前人潮滾滾，期票貼現获利极大。”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1 月 8—22 日
載于 1855 年 1 月 11、12、20 日和 25 日
“新奧得报”第 17、19、33 号 and 第 4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卡·馬克思

*四項條款

一

倫敦 1 月 9 日。維也納發出的關於俄國接受四項條款³²¹ 的電訊，一方面使此間交易所的統一公債券上漲——曾經比星期六的利率提高 2.5%，另一方面在脂油、植物油和糧食供應者中間造成真正的驚慌，因為對他們來說迅速締結和約就意味着破產和失掉大批款項。今天西蒂區實業界的緊張氣氛又緩和下來了，而且相當一致地把四項條款的談判看做是維也納照會³²² 的談判的再版。在完全忠於內閣的“紀事晨報”看來，現在談論俄國真正同意作出要它作的那些保證，未免為時過早。俄國只不過表示願意在三個強國所解釋的那樣一個基礎上進行談判。“泰晤士報”認為可以慶祝西方外交的勝利了，因而宣稱：

“我們堅決反對這樣的推測：目前的戰爭勢必由於那些根本不能使我國得到好處的征服或革命而引起所謂歐洲地圖的修訂。”

“晨郵報”說：“盟國已經作了足夠的努力以便在它們的條件被接受的時候，光榮地離開戰場。”

在“每日新聞”看來，俄國恢復談判的目的是要使普魯士更加相信俄國是溫和的，是要煽起德意志各邦之間的仇恨、破壞西方強國同奧地利之間的關係。該報認為四項條款中只有補充條款才有

意义，根据該項條款，1841年7月13日的达达尼尔海峽條約³²³应当“在限制俄国的黑海海軍方面”加以修改；西蒂区已經傳說政府打算拒絕這項補充條款。最后“晨報”斷言，俄国使自己的最后步調同奧地利一致，为的是让它有可能摆脱对西方强国承担的义务。从新近收到的電訊可以看出，談判不应意味着軍事行动的中止。

二

倫敦1月12日。关于俄国无条件接受“四項條款”——即“三个”强国所解釋的“四項”條款——的傳說，現在看来純粹是“晨郵報”和“泰晤士報”所設的hoax〔騙局〕。我們所以特別听信这个謠言，是因为我們从波茨措-迪-博尔哥的一份最初是秘密的、但是由于华沙起义而成为众所周知的紧急報告³²⁴中得知这位外交能手規定了如下一項原則：

“俄国应当做到：在任何冲突中欧洲各强国强迫它接受的是它自己的条件。”

因此在上述“四項”條款中我們能看到的不过是“四條”俄国的原則。然而即使俄国沒有接受它們，我們也可以在外交能手波茨措-迪-博尔哥那里找到解釋。他解釋說，俄国只能从得胜的营地上对西方做出这种虛假的让步。这是保持它的威力所在的威望所必需的。然而俄国至今虽然也扩大了“营地”，但是还没有取得“胜利”。如果錫利斯特里亚陷落，“四項條款”早就会被提出来了。正如“泰晤士報”和“晨郵報”肯定說的，这“四項條款”按照“三个强国”的意图是作为談判的基础的最低条件，可以以它为起点。現在弄清了，哥尔查科夫公爵是把它們了解为某种可以商議的最高条件，要

降低它，还必須經過一番认真的討价还价，或者根本认为它們不过是用來作为第二次“維也納會議”的借口。今天“晨郵報”在一篇以外交預言的誇張調子写成的 leader〔社論〕中向我們保证，在維也納目前召开的外交會議不过是在2月1日才召开的真正的會議的准备，当然，真正的會議必定在某种程度上使整个世界震惊。

昨天在勞埃德氏大廈貼出了一張海軍部的通告：

“我在11月8日〈1854年〉的信中的最后一段會通知說，黑海的法英海軍將領奉本國政府之命把对多瑙河口的封鎖扩大到对黑海和阿速夫海的所有尚在敌人手中的海港的封鎖；据此，海軍部部務委員責成我通知你們，使商界知道英法政府已決定自2月1日〈1855年〉起开始上述封鎖，而有关每个海港的封鎖情况，一俟此种封鎖实施，当在‘倫敦官報’上另作通知。——署名：W. A. B. 汉密爾頓。”

可見，这里公开承认了联軍艦隊迄今在多瑙河口只封鎖了自己的盟國，而絕不是黑海和阿速夫海的俄國海港。而內閣却一再——在4月、8月和10月——在議會中宣布它已“严令”封鎖俄國的海岸和海港。早在12月21日格蘭維耳勳爵就在上院代表內閣宣布說：

“敖德薩已由5艘軍艦封鎖，軍艦不断在这个海港的入口處巡航，政府是定期收到这方面的报告的。”

英国一个有名的評論作者在写給一家日報的信中对联軍在实施封鎖方面所采取的，或者更确切些說，沒有采取的措施作了这样的总结：

“(1)英国政府从英国供給英国的敌人以繼續对英国作战的費用。(2)封鎖多瑙河为的是破坏多瑙河各公國的經濟并使我們自己不能輸入粮食。(3)敖德薩、塔干罗格、刻赤和其他地点仍然沒有受到侵犯，因而得以向克里木的俄軍輸送增援部队、弹药和給养。(4)虛假的封鎖使我国商人破产，同时却让希腊、俄国和奧地利的商人大发其財。”

“泰晤士報”也利用漢密爾頓先生的通告對內閣的“封鎖外交”進行激烈的攻擊。印刷所廣場³²⁵的雷公的特点是他的雷總是 post factum [事後]才響。從 1854 年 3 月 26 日到今天，“泰晤士報”一直為“封鎖外交”辯護。現在當它掀起的喧聲已經不可能阻礙內閣的措施，同時又給自己帶來聲望的時候，它突然變得有先見之明了。

海軍大臣，或者像這裡所稱的海軍首席大臣詹姆士·格萊安爵士，因為暗檢室的轰动一時的事業——它使邦迪埃拉兄弟被送上斷頭台——而聞名大陸³²⁶。大概很少人知道這樣一件事實：正是這個格萊安爵士，在 1844 年沙皇尼古拉登上英國海岸時，不敢握沙皇向他伸出的手，而僅是鼓起勇氣吻了吻它。（見“公文集”1844 年版第 2 部）

三

倫敦 1 月 15 日。關於“四項條款”的意義問題：

“2 月 1 日以前〈“泰晤士報”駐維也納記者說在 2 月 5 日或 6 日以前〉在外交方面不會發生什麼新鮮事。這樣一來，沙皇有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可以隨心所欲地調動自己的軍隊。如果對四項條款的每一條款都進行細節上的爭論（關於這點，大概俄國大使已經收到有關的指示），那末俄國由於接受四項條款而贏得的一個月時間也可能延長到兩個月；同時完全可能非常堅決地企圖以法國和英國所不能接受的條件來滿足奧國的要求。拆散三國同盟看來就是所追求的目的。”

這就是“晨郵報”的評論。

但是，比不列顛報刊對俄國的秘密意圖所做的這些猜測更重要的是，英國報紙（當然，內閣的機關報除外）公開承認，作為談判基礎的四項條款不值得討論。

“星期日时报”³²⁷写道：“当战争开始时，人们企图使全世界相信进行战争是为了摧毁俄罗斯帝国，或者至少是为了获得欧洲和平的物质保障。如果必须以所谓的**四项条款**为基础締結和約，也就意味着过去沒有做过什么而且将来也不会做什么来达到上述任何一个目的。如果这里也有胜利可言，那也仅仅是俄国所取得的胜利。”

“先驅”³²⁸写道：“庸才內閣越不出这四项条款的框子；它应当作为四项条款的內閣載入史册。結束这出无目的的战争的无聊喜剧吧——簡直够了！只有因为害怕人民在战争的喧囂中取得过大的影响，也可能是为了阻碍英国人爭回克倫威尔为他們爭得的那些权利，才会在四项条款的基础上締結和約。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釋为什么同俄国策划的旧陰謀又重新縫补起来，为什么要让俄国在和談的借口下恢复它对欧洲的野心。”

“观察家”³²⁹——它在資產階級周刊中无可爭辯地占着首要地位——刊載了一篇論和談“基础”的詳尽的文章；这篇文章的要点可归結如下：

例如，文章写道：“如果必須认为那些甚至是按照对四项条款的最細致最苛求的解釋而能作出的让步，可以抵偿英国在这次战争中所耗的巨額开支和它所流的全部鮮血，那末俄国沙皇在发动战争时就不失为一个杰出的国家活动家。俄国甚至不必賠償它違反維也納條約而每年从我国榨取去的巨額款項…… 从不久前公布的一封官方函件中看出，俄国曾經千方百計地封鎖起来不許英国貿易的多瑙河口，仍然在俄国手里。关于多瑙河航行自由的条款实际上是导致早已存在的 *status quo*〔状态〕，因为俄国从来沒有否认維也納條約有关內河航行的条件对多瑙河也是有效的。凱納吉條約和阿德里安堡條約的廢止沒有使形势发生变化，因为公认这些條約絕不能成为俄国向土耳其提出要求的根据。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注意到俄国应当是負責共同保护多瑙河各公国和苏丹的基督教臣民的五强国之一，那末我們认为，期望从这个变化中得到好处純粹是幻想，因为这个变化会使俄国瓜分土耳其的陰謀合法化，而这种情况无疑只会帶來极大的害处。当然有人会提醒我們說，四项条款也包括关于修改 1841 年條約的原則，也就是关于修改條約以利于欧洲强国的均勢的原則。但是这个原則的措詞相当含糊和費解，此外，在不久前

发生过的那一切事件之后，我們決不相信預想中的变化对你們的盟国〈土耳其〉的独立的威胁会比对我們的敌人的霸权的威胁小一些…… 如果約翰·罗素勋爵在回答科布頓的发言时沒有庄严地在議會中宣布政府决不剝夺俄国的任何領土，那我們就会像否认絕不可信的事物一样来否认目前大概正在維也納討論的那个‘基础’的一切可能了。”

其实，最后一条是最重要的，因为，甚至多瑙河的航行自由也只有剝夺了俄国在多瑙河口的“領土”的情况下才有保障。这些“領土”部分是由于阿德里安堡条約和破坏 1827 年的倫敦条約获得的，部分是由于 1836 年的二月敕令和破坏阿德里安堡条約获得的³³⁰。“观察家”所避而不談的一条是同 1841 年达达尼尔海峡条約有关的。这个条約跟 1840 年帕麦斯頓勋爵所簽訂的条約的区别，仅在于在这个条約中法国也是締約的一方。两个条約的内容則是相同的。还在几个月以前，帕麦斯頓勋爵就宣布 1840 年的条約，当然还有 1841 年达达尼尔海峡条約是英国对俄国的胜利，而他自己則是这个条約的制訂者。标志着英国对俄国的胜利的条約被廢止，怎么又突然变为同一个英国帶給俄国的失敗呢？既然那时英国被自己的大臣們迷惑，在它拥护俄国的时候还认为它是在反对俄国，那末为什么不认为現在正是同样的情况呢？在議会的最近一次非常會議上，迪斯累里大叫：“用不着四項條款！”从上面引证的报刊的言論中可以看出，迪斯累里的叫喊在自由派报刊上也得到了响应。人們对俄国接受四項條款（帶保留条件或不帶保留条件）而产生的惊異正开始让位給对英国提出四項條款而产生的惊異。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1 月 9—15 日

載于 1855 年 1 月 13、15 日和 18 日

“新奧得报”第 20、23 号和第 2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卡·馬克思

英国工商业的危机

在我們的报上早已指出过英国工商业的危机的最初的一些預兆,現在危机已經成了事实,这方面的最可靠的材料——不列顛貿易局和王国的最大的貿易公司的每年概况——公开地說明了这一点;許多企业破产倒閉、工厂改行不完全工作周以及表明輸出减少的表报也都证明了这一点。根据最近官方的“关于貿易和航运的报告”,在12月5日截止的一个月內各項輸出物資的申报价值是:

1852年	1853年	1854年
(单位:英鎊)	(单位:英鎊)	(单位:英鎊)
6 033 030	7 628 760	5 771 772

1854年比1852年减少了261 258英鎊,比1853年减少了1 856 988英鎊。

毫不奇怪,英国自由貿易的正式理論家竭力想证明,似乎現在的危机不是英国現存制度的正常作用的产物,它同那些大約从十八世紀末叶起經過一定的时期就出現一次的危机毫无共同之处,而相反地是偶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根据自由貿易学派的信条,既然谷物法廢除了,英国的立法机构也承认了自由貿易的原則,就根本談不上什么工商业危机了。然而現在摆在自由貿易派面前的,不但有丰收情况下的粮价高漲,而且有工商业的危机。而且这

还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候：除了原有的世界市場以外，又增加了像河流一样地傾瀉出黄金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电报已經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輪船已經把交通和交换扩大了一百倍。如果說自由貿易派的灵丹妙药应当經受一次考驗，那末，恐怕再找不到比工商业史上从 1849 年到 1854 年这段时期的条件更为有利的考驗条件了。

自由貿易派的諾言并没有兌現，自然，現在他們企图用战争来作替罪羊，就同他們在 1848 年用革命来作替罪羊完全一样。然而他們无法否认：第一，东方的冲突抑制了企业家的难以約束的钻营精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危机的到来；一部分游資則激剧集中到最近大多数欧洲强国所簽訂的貸款上面去了；第二，某些工业部門，如制铁业、制革业和毛織业，由于战争引起的对它們产品的異常的需求而得到了某些支持；第三，造船、顏料等工业部門——过高估計宣战的后果，造成了大西洋两岸在这些部門中的非常厉害的投机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已經表現出来的工商业活动过分发达的总趋势的一种出路。然而自由貿易派的主要理由是：战争引起了各种粮食价格的提高，正是这些高昂的价格造成了危机。

然而应当回想一下，1853 年粮价平均比 1854 年高。如果这种高昂的价格不能說明 1853 年的空前繁荣，那它們同样不能說明 1854 年的危机。1836 年发生了工商业危机，虽然这一年的粮价是低的；1824 年同 1853 年一样，都是非常繁荣的年头，然而各种粮食的价格是高的。問題在于虽然高昂的粮价使国内市場縮小了，可能使工商业的繁荣受到損失，但是如果所有的国外市場的貨物沒有堆积如山，在大不列顛这样一个国家里，国内市場的行情决不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粮价的高昂能

够加深和延长危机，但是不能引起危机。而且，不应当忘記，根据曼彻斯特学派的正統学說，粮价的高昂如果是自然进程造成的而不是保护关税制的措施、禁制法律和調节制^①造成的，那末它就会完全失去自己的破坏力量，甚至可能产生良好的影响，給农場主带来好处。由于无法否认 1852 年和 1853 年的歉收是自然現象，自由貿易派也就轉到 1854 年，并断言东方的战争起了同保护关税制同样的作用，造成了粮价的高漲，虽然这一年是丰收。因此，我們撇开粮价对工业的一般影响問題，而来研究現在的战争对粮价的影响問題。

从俄国輸入的小麦和面粉約占联合王国整个粮食輸入的 14%；由于全部进口只能滿足国民消費的 20% 左右，所以俄国供給英国的只占这个消費額的 2.5% 多一点。根据官方的最近一个仅仅关于 1853 年头 9 个月的报告，大不列顛的小麦輸入总額为 3 770 921 夸特，其中从俄国輸入的为 773 507 夸特，从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維亚輸入的为 209 000 夸特。面粉的輸入总額为 3 800 764 英担，其中从俄国輸入 64 英担，而从多瑙河各公国輸入的 1 英担也沒有。战争开始前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 1854 年同期，直接从俄国各港口輸入的小麦为 505 000 夸特，而 1853 年为 773 507 夸特，从多瑙河各公国輸入的为 118 000 夸特，而 1853 年为 209 000 夸特，也就是說减少了 359 507 夸特。如果注意到 1854 年是丰收，而 1853 年是歉收，就不会有誰硬說这种减少会对粮价起比較显著的影响了。相反地，从官方的关于英

① 調节制是英国在实行谷物法时期的一种規定谷物稅的制度。按照这种制度，谷物稅在国内谷物价格上涨时則降低，而在谷物价格下跌时則提高。——譯者注

国市場上本国出产的小麦出售情况的每周报告（这些报告只包括全国全部交易的一小部分）可以看出，在 1854 年 10 月和 11 月，售出了 1 109 148 夸特，而 1853 年同期售出了 758 061 夸特，这就绰绰有余地补偿那似乎是对俄战争引起的輸入的减少了。还可以指出，如果不是亏得英国內閣的好主意而使儲存的大量土耳其小麦烂在多瑙河各公国的谷仓里（因为联军由于愚蠢或者背叛封鎖了多瑙河口上的苏利納河支流，使英国得不到供应。），那末，对俄战争甚至还不会使小麦輸入額有像已經发生的这种少量的减少。在运到倫敦港口的面粉总数中，几乎有三分之二来自美国，因此应当承认，对粮食商品的貿易来說，1854 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从美国輸入的縮减，要比对俄战争更严重得多。

如果有人問我們，为什么英国粮食丰收而粮价仍然高昂，我們會想起 1853 年“論壇报”曾屢次指出的³³¹，自由貿易派的錯誤看法造成了不列顛粮食交易的极其严重的脫銷和錯誤，使得粮价在夏季下降到正常的水平以下，然而只有提高粮价才能保证有必要的儲备和足够的訂貨以滿足将来的粮食供应。这样一来，在 1854 年的 7、8、9、10 四个月里輸入的只有 75 万夸特，而 1853 年同期却有 2 132 000 夸特。再加上由于廢除了谷物法，英国有大量的耕地变成了牧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大丰收也可能不够吃。

赫尔貿易局的概評中說：“这样一来，联合王国在 1855 年开始的时候，儲存的进口的小麦非常少，而价格几乎同 1854 年初一样高，因此直到春天，联合王国几乎要完全依靠本国农场主供应。”

1854 年英国工商业的危机未必会在今年春天以前达到高潮。这次危机的原因可以由下面不多的数字來說明：不列顛輸出的原料和成品的价值，在 1846 年为 57 786 000 英鎊，在 1853 年竟达到

9 800 万英鎊的龐大数字。在这 9 800 万英鎊当中，澳大利亚（它在 1842 年购进的貨物不到 100 万英鎊，而在 1850 年大約为 300 万英鎊）在 1853 年几乎吞下了 1 500 万英鎊的貨物；美国（它在 1842 年仅仅消費了 3 582 000 英鎊的英国貨，在 1850 年消費了将近 1 500 万英鎊的英国貨）在 1853 年购买的英国貨达到 2 400 万英鎊的龐大数字。不用說，美国的危机和可能有的澳大利亚市場的商品过剩的事实必然会反过来影响英国的貿易。美国 1837 年的危机是跟着英国 1836 年危机而来的，而現在是英国的危机跟着美国的危机而来；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危机都是同一个原因——英国現存的工业制度的作用，这种制度必然会造成大不列顛本国的过度生产和所有其他国家的过度投机——的必然产物。澳大利亚和北美的市場絕不会例外；它們都同样地依赖于英国，它們不过是整个世界市場的总情况的最鮮明的标志而已。

曼彻斯特的一个关于棉紡織业的报告写道：“我們面临着国外市場商品过剩和利潤微薄——只有少数例外——的事实”。另一个关于絲紡織业的报告中写道：“通常吸收我們工业的剩余产品的大多数国外市場正經受着商品积压的沉重后果。”关于布萊得弗德毛紡織业的报告写道：“生产已經扩大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有一个时期，我們的商品在国外市場是找得到銷路的。簽訂了許多冒險的交易协定而輕率地把貨物运到国外，自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产生了极不能令人滿意的結果。”

这是从我們所收到的几份由“太平洋号”輪船带来的关于大貿易公司概述中摘录下来的，这样的話我們还可以摘录許許多多。

西班牙的革命和随后在这个地区的走私的加强，給不列顛的农产品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市場。由于东方战争引起的种种顾虑，近东市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內曾是唯一的沒有商品过剩的市場，但是，正如我們曾經知道的，郎卡郡在三个来月以前就着手

在这个地区捞回过去的损失，而在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消息：君士坦丁堡也被大量的棉織品、絲織品、小五金、刀类和其他的英国商品压得喘不过气来。政治事件对商业危机的发展大概起过显著影响的唯一国家就是中国。

曼彻斯特的一家公司写道：“期待我国对中国的出口貿易能逐渐发展的希望，现在几乎完全破灭了，目前在这个国家发展开来的暴动初看来似乎是有利于对外联系的，而现在人们认为这次暴动是这个国家經濟崩潰和商业完全凋敝的开端。我们对于同中国的出口貿易的发展曾寄予很大的希望，而现在这种出口貿易几乎完全停止了。”

我们的讀者大概还记得，当中国革命³³²刚具有相当大的规模的时候，我们就曾預言过今天英国出口公司所抱怨的那些破坏性的后果。

我们否认战争同工商业危机有任何联系，这次危机的征兆，当谁也没有想到战争的时候就已經出现了，但是我们当然懂得，战争会大大加深大不列顛将要經過的艰苦考驗。战争的延續意味着捐稅的增加，而增加捐稅决不是防止收入减少的手段。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1 月 11 日

作为社論載于 1855 年 1 月 26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29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啤酒店主和禮拜日例假。 ——克蘭里卡德

倫敦 1 月 19 日。目前“晨報”上正非常熱烈地討論這樣一個問題：指責聯合內閣“遲鈍”是不是公正？烏爾卡爾特從確信內閣和俄國之間訂有密約出發，成功地維護着內閣而沒有使它被指責為庸碌無能。

“晨報”是倫敦報界的一個特殊現象。這家報紙是那個為了慈善目的，即為了扶助孤兒、老弱和破產者而成立的“專利的小酒店主互助會”的財產，同時無疑又是倫敦除“泰晤士報”外發行最廣的日報。這決不是那個姓格蘭特的、曾作過速記員的人所領導的編輯部的功勞。這位格蘭特娶了“互助會”的一位要人的女兒，也就是娶了荷馬的或者如聯合起來的小酒店主所稱呼的偉大的荷馬的女兒。偉大的荷馬讓自己的渺小的女婿作了“晨報”的主編。因為“晨報”靠着這個互助會進入了所有的小酒店，甚至很大一部分 parlours [客廳]，所以報紙蒸蒸日上的物質基礎也就奠定了。然而，這家報紙之所以有這樣大的影響應歸功於這樣一種情況，即實際上報紙並沒有經過什麼編輯，它倒像是個辯論俱樂部，每個讀者都可以在上面發表自己的意見。因為倫敦“可敬的”報紙的代表們不許“晨報”的編輯參加自己的行列，認為他們不夠資格，所以“晨

報”編輯部为了报复，除了給自己的讀者外，有时也給那些不投靠任何党派的較著名的作家騰出一些篇幅。

从“晨报”自然就要談到啤酒和最近的威尔逊-派頓啤酒法令上去。不久前由教士发动的这个政变引起了不少笑話，并且表明莎士比亚塑造的典型在十九世紀下半叶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然而这件事情的严重方面是因教会橫蛮地企图干預并且控制世俗生活而引起人民群众的疑虑。群众对教会已經如此冷淡，以致认为教会的这类企图只不过是 practical jokes [恶作剧]，而当它們令人厭膩的时候，就应当加以結束。教会派并不了解自己的处境，昨天竟橫蛮地在諾定昂召开群众大会，会上建議向議會請願，要小酒店每逢禮拜日不仅在威尔逊-派頓法令不久前規定的那几小时，而且在全天停止营业。广大的工人听众經過热烈的討論之后，以絕大多數的票通过了一个由名叫哈頓的工厂工人提出的如下的修正案：

“請求議會每逢禮拜日关闭所有教堂和小禮拜堂。”

据說，林德赫斯特勋爵打算在議會复会后就在上院发表演說，逐条叙述对政府提出的一切非难。大家知道，在 1853 年至 1854 年的會議期間，克蘭里卡德侯爵曾扮演过貴族当中反俄的反对派的首領的角色。但是，他和他的儿子登克林勋爵——在后者从俘虏营中釋放出来的时候——写給沙皇尼古拉的信当然不允許再玩这样的把戏。著名的幽默作家道格拉斯·杰罗尔德在“劳埃德氏报”上評論登克林的信說：

“登克林勋爵宣称尼古拉是一个真正的偉人所根据的惊人的理由就是尼古拉釋放了他登克林勋爵！女巨人在談到 Tom Thumb ① 时說，我之所以

① 大拇指小人，童話里的人物。——譯者注

把他称作偉人，是因为他甚至制服了我，而这里是侏儒把沙皇宣称为偉人。”

誰熟悉 1841 年由于土耳其-埃及事件³³³而发表的藍皮书，并且从中知道克兰里卡德侯爵任駐彼得堡大使时在彼得堡宮廷中所占的地位，誰也就明白克兰里卡德侯爵在上院所讲的那些激昂慷慨的反俄廢話，完全屬於每个道地的輝格党人在上帝不給他一个政府职务的时候所醉心的那一类反对派活动。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1 月 19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1 月 22 日“新奧得报”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第 35 号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評塞瓦斯托波爾的圍攻

倫敦 1 月 19 日。霍華德·道格拉斯爵士再版了他的名著“海軍炮兵”³³⁴，增補了對這次戰爭的某些事件的評論。例如，他根據最新的材料和只有他才能弄到的官方資料證明：如果穹窿炮台構築得好，防守得法，單靠艦隊來對付它是不夠的；用爆炸彈轟擊堅固的石砌體是無效的；要想在博馬松爾德和塞瓦斯托波爾所構築的那種棱堡和穹窿炮台上打開缺口，就只能使用重炮，至少是三十二磅的攻城炮，並且按照老方法進行轟擊，而軍艦由於瞄準困難，不冒必然被擊沉的危險，便不可能打開缺口。至於談到克里木戰局，盡管道格拉斯偏袒克里木遠征軍的司令官，並且由於所處的官方地位不能暢所欲言，但他得出的結論還是認為克里木遠征終究是一個錯誤。然而，雷公“泰晤士報”難道不是發表過轟動一時的~~消息~~，說什麼在 40 小時炮擊後將以**強攻奪取**塞瓦斯托波爾嗎？

“消息是從可靠方面得來的，只是為了使這個情報不被俄國人得到，本報對於將在最近數日內發生的事件沒有加以詳盡報道（見 12 月 26—31 日“泰晤士報”）。毫無疑問，塞瓦斯托波爾日內即可攻占。”

事情的真相是這樣的。大家知道，“泰晤士報”曾經激烈地反對關於外籍軍團的法案，因為它只是在和一般老百姓同一個時候才得知這項措施的。於是它開始埋怨起來，既發牢騷，又找內閣的

麻煩。而內閣表現得十分怯懦，為了堵住這家報紙的嘴，便扔給它一塊吃的——一則強攻塞瓦斯托波爾的消息，並且把將軍們所提出的只適用於一定條件和情況的意圖變成了最後的作戰計劃。至於法國報紙——同樣是一些半官方的機關報——也刊載了類似的新聞，這並沒有使人們感到驚奇，因為當時正是發行 5 億法郎公債³³⁵的前夜。而“泰晤士報”上了當也是可以理解的。它對於比其他報紙早一天獲得的任何消息都是深信不疑的。

克里木的情況並沒有很大的好轉。法軍病死的人數較少，騎兵有足夠的馬匹，步兵足額，戰鬥力強；而英軍仍同過去一樣，每天都有 150 人住醫院，40—50 人死亡；英軍的炮兵沒有馬匹，因此騎兵不得不用自己的馬匹從巴拉克拉瓦運送重炮，這樣，馬匹便變成全不能用的了。天氣每隔兩三日就要變化，雨後天氣轉寒，而且泥濘程度絲毫未減。幾乎全部運輸工具都在運送給養，——這仍然是當前的首要任務，——所以不論是火炮還是彈藥都不能運到發射陣地。同時，塹壕已挖掘到敵人的工事附近；第三道平行壕已掘成，雖然無法配置火器，卻必須防守以阻止敵人出擊。塹壕距離最近的攻擊目標有多遠，無法說出，因為這方面的消息有矛盾，當然也不是官方消息。有些消息說，它們的距離是 140 碼或 150 碼，但根據法國的消息說，距離最近的攻擊點還有 240 碼。而法國的炮隊，儘管陣地現在就已經全部構築完畢，並已做好戰鬥準備，卻不得不閑着沒事做，因為，11 月份毫無效果的亂射，使炮彈消耗殆盡，再這樣亂射就未免太荒誕了。這樣，俄軍不論過去和現在都有足夠的時間，不僅用來修復在以往敵人攻擊時被破壞的全部工事，而且用來構築新的工事。俄軍工作得非常努力，因而目前塞瓦斯托波爾的工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堅固。現在，當各道防綫已逐

一由俄軍占領，并且這個城市最後一道圍廓內的全部大型石質建築已改建成多面堡的時候，進行堅決的強攻已完全不可能了。如果仍然要恢復圍攻戰，那末一切都必須從頭做起，不同的只是現在炮隊離城近多了，因而射擊效果可能較好。然而花了多少代價才換得這種優勢啊！由於必須防守如此長的塹壕而造成過度疲勞，這正是英軍中出現大量病員的原因，因為兵士睡眠時間太少了。況且俄軍經常出擊，儘管不是每次都成功，然而足以使本來就已疲憊不堪的敵人更加疲勞。

同時，土耳其軍隊正陸續開到葉夫帕托利亞，將從該地進攻辛菲羅波爾，同時監視塞瓦斯托波爾的北區。這一行動又是一次戰略上的錯誤，結果使土耳其軍隊和英法軍隊完全隔開，形成兩支完全孤立的軍隊，給俄軍造成各個擊破的機會。然而這次錯誤是無法避免的。如果把這樣多的軍隊繼續集中在不大的格拉克列亞的赫爾松涅斯半島，那末錯誤也許更大。

這便是著名的“巴拉克拉瓦側敵行軍”的後果^①。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寫於

1855年1月19日

載於1855年1月23日

“新奧得報”第37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奧得報”

① 1855年2月3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發表的英文原文中，對這個問題敘述得比較詳細：“因此我們看到，接二連三的錯誤便是著名的巴拉克拉瓦側敵行軍的後果。土軍很可能遭受嚴重的失敗；要知道它已經不是在卡拉法特和錫利斯特里亞作戰時的土軍了。紀律鬆弛、玩忽職守、各種裝備缺乏，使土軍的士氣完全瓦解，而土耳其又沒有另一支能代替它的軍隊。在這種情況下，和談將因塞瓦斯托波爾的陷落而中斷的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自從聯軍登陸以來，這種事件還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渺茫。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全部戰史中，再沒有比克里木戰局更糟的了。”——編者注

卡·馬克思
維也納談判的真正目的。
——反普魯士的辯論。
——雪球暴動

倫敦 1 月 23 日。西方強國宣稱：它們的軍事行動將不因維也納談判而片刻停止。俄國究竟能從這種虛假的談判中獲得什麼**純軍事利益**呢？對於“太陽報”³³⁶提出的這個問題，可以給以完全確定的回答。最初克里木的守軍是由（俄國的）第六軍以及第五軍的一部組成的。第四軍在巴拉克拉瓦會戰的前幾天開到該地；現在第三軍也在这个半島上；12 月 18 日第八師開到了巴赫契薩賴；第七師、第八師連同第一龍騎兵師和將近 240 門火炮和 4 個哥薩克團配置在皮列柯普。第三軍的一個輕騎兵師已開往叶夫帕托利亞，該地已在它監視下。這樣一來，大約有一半俄國**作戰軍隊**（不算預備隊）被配置在克里木或者敖德薩、赫爾松和尼古拉也夫的駐防區內，而第二軍（由帕紐亭指揮）的一部分也要開來增援它。當然無法確定這 12 個步兵師和 6 個騎兵師由於戰局失利和長途行軍而遭到損失後的實際人數，因為不知道這些損失是否已由新的增援部隊補足。不管怎樣，它們總不會下於 10 萬名適合軍事勤務的人員，還不算可能還在塞瓦斯托波爾的海軍陸戰隊的兵士和水兵。在克里木集結了至少占俄國全部武裝部隊四分之一的這樣大

量的軍隊，表明當沙皇尼古拉的沃倫-波多爾斯克軍隊在最近幾次戰役中遭到的一切損失還沒有獲得補充的時候，爭取奧地利參加新的談判對他來說是多么重要。

現在，在議會召開例會的前夕正在利用最近公布的普魯士、奧國和法國的報告，就像在議會召開非常會議的前夕曾經利用過 12 月 2 日的條約一樣³³⁷。內閣的機關刊物得到了一個方便的機會，用對普魯士外交的攻擊來反擊對英國作戰方法的攻擊。兩家最熱心的政府報紙，“地球報”和“紀事晨報”，在反普魯士的辯論中調子特別高。

上禮拜日這裡發生的“雪球暴動”是又一個實例，說明英國人民對教會派的糾纏不已的要求和他們暗中使議會通過關於更嚴格地遵守禮拜日例假制的法案的抗議採取了多么奮激、尖銳、嘲笑的形式。在上禮拜日早禱的時候，聖馬丁教堂附近的特拉法加廣場上聚集了近五百人；人群向公共馬車、出租的四輪馬車、行人投擲雪球取樂。由於教堂門口的喧鬧聲，祈禱不得不停止。當警察來到的時候，警察便成了攻擊的主要對象，幾分鐘以後，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的頭已經不能左右轉動，因為他們的肩上、帽上等等地方都堆滿了雪。一些企圖走出教堂回到營房去的兵士也被迫立即退回去，他們的英國式的恬靜性格受到了嚴重的考驗。在交戰的地点不得不又增派了 100 名警察。最後警察動用了棒子，於是開始了一場激烈的搏鬥。4 個首領被抓起來了，並且被押送到警察派出所，儘管在契安多斯街和羅素街人們曾多次試圖把他們從警察的手中搶救出來。昨天這些人在彎街的治安法庭受到審訊。聖馬丁教堂的教會理事會的代表也出庭作證控告他們。每個主犯被判罰款 40 先令或兩周的監禁，“雪球暴動”的史篇也就此結束。不管怎

样，这次暴动駁倒了利奈公爵的論断。这位公爵在尼德兰暴动时不願协助約瑟夫二世的借口就是：現在是冬天，而雪和暴动是互相排斥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55 年 1 月 2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55 年 1 月 26 日“新奧得报”
第 43 号

俄文譯自“新奧得报”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遺稿

卡·馬克思

“革命的西班牙”一組論文中 未发表过的片断³³⁸

……把巴列斯帖罗斯军队[召回]到革命的旗帜[下面来],这支军队在其长官投降之后,仍然集中在馬拉加以北 10 里約^①的普里埃果。

他^②在第二次加迪斯远征³³⁹时,被莫利托尔将军部队的一个兵士俘擄,并被交给圣徒匪帮押解到馬德里,在 11 月 7 日斐迪南返回首都前 4 天被处决。

«Non por suo culpa caja Riego,
Por traicion
D'un vil Borbon»

(“里埃哥之死,不是由于自己的疏忽,而是由于无耻的波旁分子的出卖。”)

当斐迪南到了馬德里,“信軍”³⁴⁰匪帮的军官曾去进谒致意;他们走后,斐迪南向他的内侍臣感叹说:“这还是那些狗,只是脖套不同罢了。”

修道士的人数在 1822 年达 16 310 人,而在 1830 年已增到

① 法国旧长度单位 1 里約等于 4.5 公里。——譯者注

② 即里埃哥。——編者注

61 727 人；这就是說 8 年中增加了 45 417 人^①。从馬德里“日报”上，我們看到，从 1824 年 8 月 24 日到 9 月 24 日的一个月間，就有 1 200 人被枪杀、絞死、肢解，而且对付康姆尼罗斯³⁴¹、共济会会员等的野蛮法令当时还未公布。塞維尔的一所大学被封閉許多年，起而代之的是一所訓練斗牛的国立学校。

弗里德里希大帝对陆軍大臣談話時問道，在他看来，欧洲哪一个国家是最难摧毀的？当大帝看到这位大臣有些惶惑时，就替他回答說：

“那就是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政府多年以来就千方百計地想摧毀它，但总是枉然。”

弗里德里希大帝似乎預見到了斐迪南七世王朝。

1820—1823 年革命的失敗是容易解釋的。这是資產階級革命，更确切地說，是城市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愚昧无知、因循守旧、崇尚豪华的礼拜仪式的农村居民，大概不了解各派別之間的斗争的意义，所以只是这一斗争的消极的旁观者。有少数省份，农村居民破例积极参加了斗争，但是他們往往站在反革命一方。在西班牙，在这个“古旧風俗的仓库，在这个保存着別处早已成为破烂古董的一切东西的儲藏所”里，在这个在独立战争时期还有农民带着从阿尔汉布拉宫的軍火庫中取来的馬刺、使用远在十五世紀战争时使用过的精美的古式的鉞和矛的国家里，这种事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外，西班牙的特点就是，每一个农民只要自己那可怜的茅舍門口上头有一块石刻的貴族徽記，就自命是貴族，因此一般的农村居民虽然遭受掠夺、一貧如洗，却从沒有感到那种使封建欧洲其他各国农民感到痛恨的强烈的屈辱之情。在革命中起过最出

^① 在手稿中，后面塗去了“职业乞丐”的字样。——編者注

色的作用的两个人——莫里耳奥和圣米格尔都承认革命派沒有能够把农民的利益和城市的运动联系起来。对革命确有好感的莫里耳奥从加利西亚写信給昂古列姆公爵說：

“如果議会通过封建主权利法，从而剝夺大貴族的領地以利平民，殿下就会同为数众多的具有爱国情緒的声势浩大的軍队发生冲突，这些軍队将是自发地組織起来的，像法国在同样情况下发生过的那样。”

另一方面，圣米格尔（見他的“西班牙內战”1836年馬德里版³⁴²）說：

“自由派的最大的錯誤，是他們沒有估計到大多数人民对新法律所抱的冷漠甚至是敌对的态度。議会所頒布的許多旨在改善人民物质状况的法令，不能像客观形势所要求的那样迅速奏效。無論减少一半教会的什一稅，或者变卖寺院的田产，都无助于改善下层农民的物质状况。相反，后一个措施由于把土地从能寬容体察的僧侶手里轉到精打細算的資本家手中，引起了地租的提高，倒使老佃农的状况恶化。因此，这个已經因教会财产的轉让而感到受辱的人数众多的階級的迷信偏見，在遭受侵犯的物质利益的影响下就更加深了。”

革命的市民們既然这样脫离了基本的人民群众，所以在反对大貴族、农村宗教势力、僧侶和代表所有这些社会腐朽分子的国王的斗争中，便不得不依靠軍队和他們的领导人。单是軍队在革命陣营中这样篡夺来的地位本身，加上这个軍队脫离群众，就已經把他們变成一种对利用他們的人有危險而对他們所应打击的敌人无害的工具。最后，上层資產階級，即所謂的温和派，不久便对革命冷淡了，后来也就背叛了革命，他們幻想可以經由法国的干涉而取得政权，从而不費什么努力坐享新社会的成果，不让平民染指。

1820—1823年革命的积极成果，不应仅仅归結为一个帮助相当广泛阶层的人民扩大了眼界并使他們具有新的特性的偉大的酝酿过程。第二次复辟³⁴³也是革命的产物，社会的腐朽分子在这次

复辟中采取了同西班牙的民族生存已經不相容的形式。复辟的主要事业是把敌对局面推进到如此尖銳的地步，以致任何妥协已經毫无可能，一場歼灭战争勢在必行。用利物浦勋爵本人的話來說，从来沒有一次重大的政治变革比 1820—1823 年西班牙革命更温和，更少流血。因此，当我们看到 1833—1843 年的內战³⁴⁴用火和劍消灭了西班牙社会中的腐朽分子^①，从而背上了凶狠殘暴的恶名时，我們不应当把这个时代的殘酷凶暴归咎于西班牙民族的某种特性，而应当归咎于曾在法国造成恐怖統治的同一环境力量。当法国人集中了，从而縮短了恐怖統治的日期的时候，而忠于自己傳統的西班牙人却分散了，因而延长了恐怖統治的日期。由于西班牙的傳統，革命派就是把王位推翻了，也未必能取得胜利。在西班牙，革命要想获胜，就应当以王位追求者的身分出現。两种社会制度之間的斗争要采取两个敌对王朝利益的斗争形式。十九世紀的西班牙当它能够使革命具有十四世紀內战的形式时，就輕而易举地完成了革命。当斐迪南七世把他的弟弟唐·卡洛斯，这个神圣宗教裁判所的唐·吉訶德，遺贈給了反革命的时候，也就是他把一面君主制的旗帜——伊薩伯拉的名字——給了革命。斐迪南七世的本性是至死不改的。既然他一生中都用虛伪的諾言欺騙自由派，他能在临死的床上放棄欺騙奴才派的快乐³⁴⁵？在宗教方面他永远是一个怀疑論者！他怎么也不能相信，天下竟有人——哪怕是圣灵——会愚蠢到說出真話来。

卡·馬克思写于 1854 年 11 月 21 日
俄譯文第一次載于 1957 年第 3 期
“近代史和現代史”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手稿

① 在原稿中后面塗去“封建主和君主的政权”字样。——編者注

弗·恩格斯

喀琅施塔得要塞³⁴⁶

从查理·纳皮尔爵士得到海軍首席大臣的“宣战的绝对许可”然后开往波罗的海的时候起，英国社会上比较乐观的人士就不断盼望很快传来炮击喀琅施塔得、占领通向圣彼得堡的要冲、也许（谁知道？）甚至是俄国海軍部大楼的金光闪闪的尖顶上升起不列颠国旗的消息。

这些希望是根据一种非常正确的想法；这种想法就是：喀琅施塔得，对于从波罗的海一带海上向俄国发动的任何进攻来说，都是取得胜利的锁钥。攻下喀琅施塔得，圣彼得堡就在你的脚边，俄国舰队也就不再存在，而俄国就会降到彼得大帝以前那样的地位。尽管英国在波罗的海拥有树立这种功勋所必需的力量，如果它在小事上消耗的力量多过进攻只有次要意义的据点所绝对必需的力量，那末它就会犯最大的错误，错误的致命的后果可能表现在最近的两三次战局上。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喀琅施塔得的决定作用，那末俄国人同样明白这种作用，他们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个通向俄国的咽喉已被竖着上千门火炮的层层钢甲护卫着。

大家知道，喀琅施塔得位于一个长约五英里的小岛的东南角上；这个岛掩护着芬兰湾的狭窄部分的入口，离涅瓦河口约十六英里。岛两侧大海几乎到处都很浅，只有两条航道可供海船航行。

一条在島以北，离它的北岸約两三英里，有4海沙绳^①多深；航道在离島的东端4英里处折向該島，离东端只1400碼，但这里的深度减少了1海沙绳。可見，在这条航道上航行的任何軍艦的火炮都打不到島的东北岸；只有島的西端和东端例外。所以只有島的这两端构筑了工事，西端是叶卡特林娜堡垒、亚历山大堡垒和米哈伊尔堡垒，东端則是喀琅施塔得要塞的垒墙和垒墙前面約一千碼的沙滩上构筑的两个炮台；然而其中較大的一个炮台据說已成廢墟。在島北岸的高度上，在它的东部和西部防御工事之間，离岸足有1英里的沙滩上还构筑了一个炮台，然而，这个炮台始終处于4沙绳深的航道上的軍艦的射程以外。

因此，北面这条航道由于离防御工事遙远，由于它造成航行上很大的困难，并且由于它的东南部分的深度大大变淺，应当认为不适于用来对喀琅施塔得进行任何严重的攻击的。在力量作某种分散而不致引起致命后果的条件下，可以派遣几艘較輕型的舰船利用这条航道对島进行迂迴；它們在压制了不太带威胁性的东面的炮台之后，就可能取得炮击喀琅施塔得城的有利陣地。在这个城内不仅有波罗的海俄国海軍的主要的帆纜仓库和造船厂，而且有許多私人的建筑木材，因此城内充滿了易燃物，只要有几发炮弹命中就可能引起熊熊大火，在一夜之間把多年中不断充实的海軍仓库化为灰烬。有沒有实际可能用足够数目的輕型舰船占领这样的陣地呢？只有結合重新測量水的深度来对情况作仔細的实地研究才能断定这个問題。值不值得采取这样的步驟？这一点将取决于力量的对比。我們在这里只应当作一些在远距离外根据我們掌握

① 1海沙绳等于1.83米。——編者注

的最可靠情报的对照研究所能作出的結論。

这样一来，只有通向大停泊場和小停泊場（或叫做隘路）的南面航道才是主要的攻击方向。这条 4 沙绳深的航道在島的西北端有几英里寬，在离內港 2 英里地方突然縮小到 1 英里寬，然后就成为一个銳角，角頂对着軍港。在这地方，从奥兰尼印鮑姆沙滩直通到島边的一个狹窄的淺滩横过航道，使航道的最大深度减到 3.5 海沙绳。虽然只要挖泥船稍微动一动就足以除去这个淺滩，但是俄国人竭力保存着自己軍港的这个天然工事。因此，这条 4 沙绳深的航道（它的中部到处都不下 4.5 海沙绳，能保证最大的軍舰通过）是到喀琅施塔得的主要接近路，而决战应在銳角的頂部展开，那里有一段 1.5 英里长的水路寬度不到四百碼。

掩护这条航道的筑城工事は五花八門的，从彼得大帝时代的太古建筑到最新式的、有上下两三层火炮的威力巨大的工事。值得注意的是，最重要的地点是由过时的而且极不完善的筑城工事来掩护的：**这正是喀琅施塔得的弱点。**这些古老的工事は一些不大的棱堡工事；火炮配置在敞开的胸墙后面，而穹窿的火炮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棱堡非常狹小，因此配置在上面的火炮的数量同它們的正面的寬度比起来显得太少。此外必須指出，这些火炮的半数基本上是对着淺水处的，从这些地方来的最多不过是炮艇的攻击。但是对于这样的工事來說，即使炮艇也是危险的。

与此不同，現代化工事は按照蒙塔郎貝尔初次宣布的原理修建的，这些原理基本上已取得普遍的承认，并且被特別广泛地运用在岸防工事的修筑上。除喀琅施塔得以外，瑟堡和塞瓦斯托波尔也是广泛采用这些原理来修筑上述工事的实例。这些工事的特点是有上下两三层火炮，下层火炮配置在穹窿里，也就是說配置在不

大的拱形室里，这里是火炮和炮手防御敌人炮火的最可靠的掩蔽部。只有上层火炮配置在沒有掩盖的胸墙后面，但是由于它們的位置高于最大的三层甲板舰的上层甲板，所以能很好地防御炮弹。第一次攻击就会证明这些堡垒是否修筑得足够坚固，經得住自己火炮发射时的震动和敌人炮火的破坏力；如果是这样，它們就会是砸不破的硬胡桃了。

可以认为，在喀琅施塔得的航道区有三道筑垒綫。

第一道綫，即外綫，呈半圓形，掩护着大停泊場的入口，也就是說掩护着 4 沙绳深的航道上的寬度为 1 英里至半英里寬的那一段的入口。这个陣地的右翼，即北翼是由下列工事构成的：**彼得堡垒**，这是位于島上的离深水航道約一千四百碼的一个不大重要的眼鏡堡；**白炮台**，也是在島上，在往东半英里的地方，这个炮台可以看做几乎是无用的；**康士坦丁堡堡垒**，这是一个有威力的、背面閉合的眼鏡堡，修筑在沙滩上，离航道的边沿 1 000 碼，在白炮台的正前方。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堡垒，有两层火炮共 50 門。它的作用是掩护外接近地；它能扰乱正在变换成战斗队形的舰队；但是，只要駛过这个堡垒，它的半数火炮就会失去效用。

在第一道筑垒綫的中央有**亚历山大堡垒**（不是我們上面所說的在島北端的那个堡垒）；这是一个半圓形的建筑，它奠基在 3 海沙绳深的海中，离航道寬度变狹成半英里的地方 400 碼。这样一来，这个堡垒能橫射整个航道，尽管在平面图和地图上它显得很小，但是恰恰有三层火炮，共 72 門。如果这个塔形堡垒修筑得足够坚固，如果它的穹窖的通風設備良好而不致阻碍硝烟的排出，那就最少需要有两艘三层甲板舰才能对付它。

这座堡垒后面有一座古老的**卫城**——眼鏡堡，它之无关重要，

从有了新堡垒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新堡垒遮断了眼镜堡的火炮的半个射击扇面。

最后，左翼，即南翼是由里斯班克堡垒和炮台构成的，它们修筑在大停泊场口以南。这座堡垒是上世纪修筑的，后又经过现代化的改建，因此现在它的部分火炮配置成两层，炮的总数增加到50门。但是，尽管如此，它占的面积比现代化的堡垒占的面积大得多，而它的对着停泊场方向的正面宽约有三百码，并且受到纵射火力的扫射，其中包括来自航道区的部分火力和来自吃水浅的舰只在靠西半英里的3至3.5海沙绳深的海上所可能占领的阵地上发射的全部火力。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在它的背后600码的地方修筑了里斯班克炮台，但是它的位置并不很适于达到这个目的。里斯班克堡垒正好在亚历山大堡垒南面1英里的地方，这两座堡垒的交叉火力控制着大停泊场的入口。

要攻克第一道筑垒线本身并不是那么困难的，如果它背后的第二线不用炮火支援它的话。第二道筑垒线掩护着整个大停泊场，也掩护着小停泊场的入口。它是由两座侧射防御工事构成的：彼得一世堡垒（旧式的、修筑得不好、像一种冠堡的堡垒，位于亚历山大堡垒以东半英里，在250码的正面上总共只有24门火炮）、喀琅施罗特堡垒（旧式的棱堡工事，有5个正面，其中两面对着浅海，因此是没有用的；尽管最长的对角线有400码，但火炮最多不过36门），最后，还有在中央的商港的西防护墙。这道防护墙由喀琅施塔得岛伸展出来直达航道，与航道形成一个直角，航道在这里只有300码宽。在这道防护墙上配置了70门加农炮和12门臼炮，然而，看来有一部分已经拆除，因此它很少能阻碍舰船行动。这道防护墙上的火炮同彼得一世堡垒的主要正面和喀琅施塔得的两个正

面結合形成的交叉火力非常有效地掩护着大停泊場的內部；由于第一道綫的火力和航道的狹窄，除了螺旋推进式蒸汽舰，任何舰船要占領良好的陣地并保持充分的力量看来是极端困难的。

直接掩护小停泊場或者說內停泊場的第三道綫，在航道南面是由喀琅施罗特的第三个(东北的)正面，在航道东北面是由商港、中港和軍港的壘牆构成的。軍港同中港的东端形成鈍角，它可以用纵射火力控制整个小停泊場，而商港和中港的南牆則用正面火力掩护它。在两牆的翼側有几座棱堡、壘門和其他凸起部。由于航道在这里的寬度都不超过 250 碼，战斗会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毫无疑问，不等到舰船深入这样远，喀琅施塔得就会不得不投降了。

緬施科夫堡壘是第三道綫的中央工事和唯一可能在某个时候取得实利的工事。它是商港南牆上西起的第一个棱堡。这个棱堡已經改建为一个規模巨大的塔楼，塔楼上的 44 門火炮分成为上下 4 层，这些火炮的半数以纵射火力控制小停泊場和大停泊場的大部分，但是另一半从它們的炮眼的方向来看，几乎毫无用处。4 层火炮对这个建筑物的不很坚固的基础來說是否过于沉重的問題，那是很明显的。

还必须指出，喀琅施塔得的向陆一面是由几个正规的棱堡的正面掩护的，要攻克这些棱堡，就需要組織一次认真的圍攻；如果仅仅以舰队为作战基地，在小島的沼澤地上作这种圍攻是有很大困难的。只能从海上占領喀琅施塔得。

不言而喻，我們只能根据最近的地形測量和軍事报告的材料說明这些永备工事。近几年內也許有了某些变动，但是这些变动未必很大。

現在把上面所說的总结一下。对喀琅施塔得的任何攻击的成

敗都必須在大停泊場上決定，而在這個地段能順利反擊艦隊進攻的工事只是亞歷山大堡壘、彼得一世堡壘、里斯班克堡壘、喀琅施羅特堡壘的兩個正面、軍港的西牆和緬施科夫堡壘。它們總共可以用 350 門火炮同時向進攻的敵人開火，大多數火炮都有圍牆和拱頂作很好的掩護，並且通過狹窄的炮眼進行射擊。其他的炮台，或者是对着攻擊區的其他地段，或者是沒有特大作用，或者是需要射擊的目標將在它們的射程以外。問題是這樣擺着的：

如果艦船本身要遭到來自軍港的圍牆上、緬施科夫堡壘和喀琅施羅特堡壘的側射，那末能不能通過這條狹窄的、很複雜的航道調遣足夠數量的艦隻來頂住防禦工事的北正面和南正面的炮火並壓制住它們呢？也許海軍專家將回答這個問題，如果他們不甘心等待由實踐來回答這個問題的話。根據我們在海軍戰術方面的有限的知識，我們說這裡正是這樣一種情況，即螺旋推進式戰列艦的優點能產生帆力艦和明輪式蒸汽艦所不可能達到的效果。

再說一遍：喀琅施塔得的最薄弱的地方是那些舊式的堡壘。它們所處的地勢最有利，並且占着大部分的空間，遠不能保證火力的必要效果。如果說里斯班克堡壘經過了現代化的改建，那末彼得一世堡壘和喀琅施羅特堡壘的水平仍然極低。也許，相當容易地壓制它們的火力，甚至占領它們，從而利用它們來轟擊城市。但是艦船只要突入亞歷山大堡壘和里斯班克堡壘一綫，就可以炮擊這個城市並造成巨大的損失，如果它們的注意力不過多地被各堡壘轉移的話。

弗·恩格斯寫於 1854 年 3 月底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手稿

附 录

英国资产阶级³⁴⁷

由于英国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的增长，自然就会设想，他们以往对贵族阶级的态度也会逐渐改变，两个阶级之间的现存关系事实上会变得不能容忍。这种设想已为近 5 年的某些值得注意的事实所证实。5 年以前，一个豪富的银行家琼斯·劳埃德升为贵族，获得奥维尔斯顿勋爵封号。他用他那巨额财富的一部分在北安普顿郡购置了大片领地。遵奉自己的老一套作法的贵族阶级决定让他加入到他们中间来；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百万富翁，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土地占有者。然而，他们向琼斯·劳埃德提出了哪些条件呢？他必须同银行业务和商业断绝一切联系。琼斯·劳埃德接受了这些条件。由此可见，贵族阶级对于成为贵族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的传统看法丝毫没有改变。但是，是不是所有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都像琼斯·劳埃德那样好说话呢？大概不是所有的代表。不但如此，我们知道这样一件事情：一位重要官员在一生中拒绝接受贵族称号，而且不许他的儿子们在他死后接受这种称号。我们所说的就是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令人难忘的榜样。他这个郎卡郡工业家和厂主的后裔，晚年一心想当大资产阶级的首领；虽然他早就可以成为贵族，但是他宁愿留在下院作第一名议员，却不愿意在上院占一个席位而脱离社会活动。他的一生令人信服地证明，政权的重心就在资产阶级的阶级内部。罗伯

特·皮尔在遺囑中告誡他的兒子們，即使將來因他們的父親的社會功績而提出授予他們貴族封號，也不能接受它；他的遺囑中的這一點，如果從人們記憶猶新的 1848 年事件的角度來看，真不愧為革命精神的榜樣和先例！他臨死時狠狠地報復了世襲貴族因他出身平民而賞給他的嘲笑，從他幼年來到了哈羅時起，這些嘲笑便深深地傷害了他的敏感的心。約翰·羅素勳爵也仿效了羅伯特·皮爾爵士的榜樣。他雖然是培德福德公爵們的子弟，早就可以成為貴族，但他也沒有這樣做。許多年以後，他的這個決心經受了一次嚴重的考驗。樞密院院長的職務幾乎總是由貴族擔任的，在最近一次內閣改組時，羅素擔任了這個職務，所有的人都深信，他將接受貴族封號。但是沒有！他寧肯繼續當下院議員，拒絕了新的職位，他把他的心願告訴了倫敦市的選民，結果再次被一致選入下院。威廉·摩耳斯沃思爵士似乎將被列為上院議員的謠言傳開來的時候，他認為這是對他這個政治家的污辱並堅決地駁斥了謠言，宣布他根本不打算接受貴族封號。

這些全談的是貴族封號。但是也許會覺得，騎士的稱號——因為這個稱號不致牽扯到政權上去——是用來滿足資產階級的暴发戶的。戴文郡公爵的主管園丁約瑟夫·帕克斯頓爵士以及約翰·福克斯爵士的承包商升上這個等級的事實，就可以這樣來解釋。可是，騎士的稱號是否在一切情況下都能滿足資產階級的自尊感呢？看來，不盡然。工程師斯蒂芬遜輕蔑地拒絕了這種徒有虛名的稱號，而且不久以前鐵路承包商達爾根也仿效了他的榜樣，因為他無疑認為，接受這個稱號會使他陷入令人可疑的處境。女王徒勞地到他的富麗堂皇的私邸去拜訪他，而以前只有上層貴族階級的代表才能取得這樣的榮譽。這個謙遜的市民拒絕向女王陛

下低头，于是維多利亞女王抓住这位固执己見的公民的胳膊，居然說，目前封建制度需要当代工业首領的支持。

如果资产阶级从貴族阶级手里夺得一点权力，人們自然就会問，它怎样运用它新取得的影响呢？这个问题不应当从阶级观点，而应当从广泛的人文主义立場来加以考察。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是，这个变化将对英国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命运和社会条件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

某些属于所謂自由派的政治家大談其“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盟”，但是这种思想是荒謬的，不切实际的。雇主和工人，主人和奴僕之間橫着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沟。

至于說到家僕，达尔福特的最近的箴言就讲得很透澈：

他說：“想到那些照管我們的舒适和需要的男男女女，我們住宅的常住戶，——我們對他們的情感和性格就像對另一行星上的居民一樣了解得很少——竟同我們住在一起，就不免令人伤心。”

为了不把“两个行星的居民”混同起来，资产阶级太太們忘記了她們自己不久前也屬於下层等級，竟迫使自己的女僕戴上标志她們的下等身分的“包发帽”，并且很少允許女僕穿得漂亮些，因為她們担心不这样就会失去她們作为**土地**或是**金錢**的所有者的特征。

至于各种短工，他們和雇主的关系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企业主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作了怎样的抵抗。因不久前廢除“谷物法”而遭到損失的心怀不滿的托利党人，帮助工人阶级赢得了这个法案；但是法案通过以后，人們便无耻地施用各种巧計、下流手段和暗中叛卖来規避它，区視察員的报告就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代表在議會里用关于共产主义的号叫，来迎击想为劳动者取得

比較人道的生存条件的一切进一步的尝试。科布頓先生很多次就是这样做的。在企业里，多年以来，雇主們的目的就是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人所能忍受的一切极限，并通过无耻地采取合同制和挑撥一部分工人反对另一部分工人的办法，把熟练工人的工資压低到杂工的工資水平。这种制度终于逼得联合机械工人协会起来暴动。在这些日子里已經成为企业主們的家常便飯的粗魯言詞，证明企业主們是没有什么人情的。企业主們的十足无知还表现在：企业主联合会雇了一个三流文人悉尼·斯密斯，要他在报刊上替企业主說話，并发起一次反对暴动工人的文字战争。这个雇佣文人的風格和他必須完成的任务完全相称；战斗一結束，因为企业主不再需要文学作品，也不再需要报刊了，就把他們的走狗一脚踢开。如果說资产阶级的目的不在学习古典学科，那并不就是說，它在研究現代科学和現代文学。总賬、賬房和买卖——它认为这个教育已經够了。尽管在资产阶级小姐們的教育上花費了不少錢，但是她們得到的只是“世俗教育”的片鱗只爪，根本談不上真正的智育或以科学丰富头脑。

現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說家，他們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書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論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們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資本家到小商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狄更斯、沙克萊、白朗特女士和加斯克耳夫人把他們描繪成怎样的人呢？把他們描繪成一些驕傲自負、口是心非、橫行霸道和粗魯无知的人；而文明世界用一針見血的諷刺詩印证了这一判决。这首詩就是：“上司跟前，奴性活現；对待下屬，暴君一般。”

他們活动范围的狭窄性和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制度——他們构成这个社会制度的一小部分——造成的。俄国贵族一方面深感上面的沙皇的压迫，而另一方面又害怕下面的被奴役的群众，同样，英国资产阶级也是被箝夹在贵族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从1815年媾和以来，每当资产阶级想要反对贵族阶级的时候，它总是使工人阶级相信，工人阶级的穷困是贵族阶级的某种特权或壟断造成的。资产阶级就这样鼓动工人阶级帮助它在1832年赢得了改革法案，可是它在为自己争得了这个法案之后，却从此不许工人阶级为自己争得类似的法案；不仅如此，1848年资产阶级还用特别警察的木棍武装起来反对工人阶级。后来，废除谷物法被宣布为工人阶级当前摆脱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从贵族阶级手里赢得了这一点，但“大好时光”还没有来到，就在去年，贵族阶级好似为了消除将来重复类似政策的最后可能性，不得不同意对继承的不动产实施征税，而贵族阶级在1793年把继承的不动产变为继承的动产之后，就自私地自行摆脱了这种税收。想让工人阶级相信贵族建立的立法制度是它困苦境况的原因，这种欺騙的最后可能性，也跟贵族阶级的这个最后的微不足道的特权一起消失了。现在工人阶级睜大了眼睛，它开始說：“我們的圣彼得堡是在普雷斯頓！”的确，近8个月来，这个城市是一些奇異事件的見证人：14 000名男女常备軍在联合王国各地的工联主义者和工厂工人的物质支援下，开始了向资本家争取权力的偉大的社会斗争，而普雷斯頓的资本家也得到郎卡郡资本家的帮助。

不管这个社会斗争将来会采取哪种新形式，我們现在看到的只是它的开端。看来，它注定会变成全国規模的斗争，并且要经过历史上还不曾有过的某些阶段。应当指出，尽管工人阶级还可

能遭到一些暫时的挫敗，但是保证它取得最后胜利的偉大的社会的和經濟的規律已經在发生作用了。工业的发展过去迫使資产階級起来反对貴族階級，而現在——移民現在和将来都在部分地促进这一点——它又在推动工人階級去反对資产階級。正像資产階級正在打击貴族階級一样，資产階級也将受到工人階級的打击。对这一事实的本能的理解已經約束了資产階級反对貴族階級的行動。工人階級不久前在政治上的露面使資产階級学会了仇恨公开的政治运动，并且害怕这种运动。用这个階級的行話來說，“正派人是不参加公开的政治运动的，先生”。上层資产階級像獼猴一样模仿着貴族階級的生活方式并竭力去巴結它。因此，在英国，封建主义不会灭亡，而将在已經开始腐朽的資产階級的庇护下保存下来。最后战胜封建主义的光荣将屬于工人階級。只要时机一成熟，公开登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将是三个强大的敌对階級：第一个代表地产，第二个代表金錢，第三个代表劳动。第二个階級正在战胜第一个階級，同样，第二个階級将来也不能不在政治和社会斗争舞台上让位于它的后继人。

作为社論載于 1854 年 8 月 1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414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注 釋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釋

- 1 弗·恩格斯的“欧洲战争”一文是因1854年1月3日夜英法舰队进入黑海而写的。在这一事件之前，土耳其在俄軍占领多瑙河各公国（1853年6月）之后，于1853年10月向俄国宣战。俄軍和土軍之間的第一次大会战于1853年11月4日（10月23日）发生在沃耳特尼察附近（見注31）；不久，俄国軍艦于1853年11月30日（18日）在西諾普附近的海战中歼灭了土耳其分舰队。英法舰队在黑海出現，实际上意味着英法对俄国軍事行动的开始。

“欧洲战争”一文是恩格斯应馬克思的請求給美国“紐約每日論壇报”撰写的許多軍事評論中的一篇。这家报纸于1841年至1924年出版，由著名的美国記者霍拉斯·格里利創辦，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輝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成为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該报采取进步的立場，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該报工作的有許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記者，从四十年代末起，曾經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納是該报的編輯之一。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紐約每日論壇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历时10年多；寄給这家报纸的大量文章是恩格斯应馬克思的請求而写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文章，包括了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經濟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最重要的問題。在欧洲的反动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家銷路很广的美国报纸，通过具体材料揭露了資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和它所固有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并且指出了资产階級民主的局限性。

“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常常任意对待馬克思寄去的文章，有时把某些文章不加作者的署名作为編輯部的社論发表，有时篡改原文。

因此，該報刊載的最有意義的、最重要的文章都沒有馬克思的署名。馬克思對編輯部的這種作法曾經不止一次地提出抗議。1854年3月底，馬克思堅決地向編輯部提出，或者只把軍事評論作為社論發表，或者把他寄去的全部材料都不加署名發表。於是，“論壇報”編輯部便開始經常用多半是由恩格斯撰寫的軍事評論作為社論。在1854年秋天，幾乎所有馬克思寄去的文章都不加署名發表，其中有許多文章作為社論發表。

從1857年秋天起，美國發生了經濟危機，該報的經濟狀況也因此受到影響，編輯部要求馬克思減少通訊稿的數量。在美國國內戰爭開始時，馬克思完全停止了給該報寫稿；“紐約每日論壇報”同馬克思的決裂，主要是由於編輯部中主張與實行奴隸占有制的各州妥協的人增多以及該報離開了進步的立場而引起的。——第3頁。

2 馬克思指的是1796—1799年拿破侖·波拿巴征討意大利時期法國政府所採取的政策。當時，法國政府利用意大利人民為反對奧地利的壓迫所進行的共和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在意大利建立了許多實際上藩屬法國的國家；意大利的某些地區則直接併入了法國。——第4頁。

3 指1849年7月根據路易·波拿巴政府的決定，法國對羅馬共和國進行了武裝干涉，結果羅馬共和國被消滅，教皇恢復了世俗的權力。

路易·波拿巴有意扶持拿破侖的元帥約阿希姆·繆拉特（1808—1815年時期那不勒斯國王）的兒子拿破侖·律西安·沙爾·繆拉特為那不勒斯國王。——第4頁。

4 在奧地利和普魯士之間爭奪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權戰爭時期（1778—1779年），普魯士指望沙皇政府的援助，避免決戰。這就加強了俄國的地位，俄國在簽訂和約時充當了調停人，獲得了干涉德意志聯邦內部事務的權利。在這以後（1780年）俄國和奧地利之間締結的防禦同盟，使普魯士的全部計劃遭到了極其沉重的打擊。

1800年奧法戰爭時，普魯士企圖以調停人自居，但結果它自己被孤立了。

1805年第三次反拿破侖法国的同盟(奥地利、英国和俄国)战争时,普魯士坐观事态的发展,采取中立态度。拿破侖軍队在粉碎了同盟以后,于1806年也击潰了普魯士。——第5頁。

- 5 滤出蠅虫吞下駱駝 是引自聖經的一句英国諺語,意思是說,注意小事而忽略了主要的事情。——第5頁。
- 6 佩克桑重炮 是法国佩克桑將軍在1822年发明的一种海軍用的加农炮;这种炮发射的是爆炸彈。——第6頁。
- 7 1806年10月14日,普魯士軍队在耶拿会战中被歼灭,这使得普魯士向拿破侖法国投降,并且证明霍亨索倫封建王朝的社会政治制度已經腐朽透頂。——第7頁。
- 8 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失敗后,科苏特及其拥护者将斯蒂凡国王的王室宝物藏在沃尔肖伐地区,其中包括斯蒂凡国王那頂历代奥地利皇帝即位匈牙利国王时加冕用的王冠。1853年9月8日奥地利政府发现了秘藏宝物的地方,于是到处紛紛謠傳某某人泄露了宝物的隱藏地点。1853年10月19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根据該报駐倫敦記者阿·普尔斯基的意見,錯誤地把这件事归罪于匈牙利革命家貝·瑟美列。
本文第一段的俄譯文第一次发表。——第9頁。

- 9 群賢內閣 是对阿伯丁联合內閣(1852—1855)的諷刺性称呼。参加这个內閣的有輝格党和皮尔派的代表。这个內閣之所以能够在执政党和托利党反对派在下院中席位彼此相等的条件下存在,是因为得到了所謂爱尔兰旅,即在英国議會中拥有六十多人的爱尔兰議員团的支持。阿伯丁組閣时,給予3个爱尔兰議員以大臣职位,因而引起了爱尔兰旅的分裂(見注116)。——第10頁。
- 10 1854年1月6—9日,因粮价暴漲,戴文郡的一些城市发生了搶粮風潮,以后几乎扩大到全郡。参加騷动的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他們搗毀了粮店。風潮遭到武装鎮压。——第10頁。
- 11 “祖国报”(«*La Patri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創刊;1850年

- 該報反映聯合保皇派，即所謂秩序黨的利益，1851年12月2日政變後成為波拿巴派的報紙。——第10頁。
- 12 指英、法、奧、普四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1853年12月12日簽署的并于1853年12月15日遞交土耳其的照會。四強國向土耳其政府表示願意進行調停以恢復俄國與土耳其之間的和平，並提出如下幾項最重要的條件作為談判的基礎：俄軍撤出多瑙河各公國，恢復俄土之間先前一些條約的效力，以敕令保障基督徒在土耳其的特殊權利。——第10頁。
- 13 指1841年7月13日土耳其同俄、英、法、奧、普五國簽訂的關於黑海海峽的倫敦公約。公約規定，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在和平時期禁止所有強國的軍艦通行。公約廢除了1833年簽訂的對俄國有利的安吉阿爾-斯凱萊西條約。——第11頁。
- 14 “泰晤士報”（《*The Times*》）是英國保守派最大的日報，1785年在倫敦創刊。——第11頁。
- 15 “旗幟報”（《*The Standard*》）是英國保守派日報，1827年在倫敦創刊。——第12頁。
- 16 “紀事晨報”（《*The Morning Chronicle*》）是英國資產階級日報，1770—1862年在倫敦出版；是輝格黨的機關報，五十年代初是皮爾派的機關報，後來成為保守黨的機關報。——第12頁。
- 17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是英國自由派的報紙，工業資產階級的喉舌。1846—1930年用這個名稱在倫敦出版。——第12頁。
- 18 “新聞報”（《*The Press*》）是英國週報，托利黨機關報；1853—1866年在倫敦出版。——第12頁。
- 19 指1833年7月8日（6月26日）在安吉阿爾-斯凱萊西簽訂的俄土友好共同防禦條約的秘密條款；根據這個條款，土耳其事實上承擔了按照俄國的要求禁止外國軍艦進入黑海的義務。——第12頁。
- 20 “新普魯士報”（《*Neue Preussische Zeitung*》）是極端反動的德國日報，從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宮廷權奸和普魯士容

克的喉舌。这个报纸又称为“十字报”(«Kreuz-Zeitung»), 因为在报头上面印有十字。——第 12 頁。

- 21 英国政論家，前外交官戴維·烏尔卡尔特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起通过他的杂志“公文集”(«Portfolio») (見注 40) 和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了有关欧洲强国秘密外交的文件，其中有許多揭露多年来一直是英国对外政策的实际领导人的帕麦斯顿的外交活动的文件。

馬克思在揭露統治階級的秘密外交方面进行了不倦的斗争，1853 年他在他的一組揭发性文章“帕麦斯顿勋爵”(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387—461 頁) 中除了其他史料外，还引用了烏尔卡尔特发表的文件。而馬克思关于帕麦斯顿的某些文章也被烏尔卡尔特印成单行本。同时，馬克思尖銳地批評了烏尔卡尔特，并且坚决駁斥了把他說成是“烏尔卡尔特分子”的資產階級报刊的誣蔑性言論。馬克思經常強調指出他的立場和烏尔卡尔特的立場的原則性的区别。烏尔卡尔特要求保存并巩固封建的土耳其帝国，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則竭力主張通过革命的道路来解决所謂东方問題，并且认为必須使处于土耳其压迫下的各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获得民族独立。在本卷刊載的許多文章(第 283 頁及其他几頁) 中，馬克思指出烏尔卡尔特本人是最害怕革命的反革命者，是同无产階級政党——唯一能够消除英国寡头政权的腐朽透頂的議會基础的政党——背道而馳的人。——第 13 頁。

- 22 指帕麦斯顿短期辞退內务大臣职务(1853 年 12 月 16—24 日)。帕麦斯顿采取这种蠱惑性作法是企图以內閣首脑身分重新掌权(見馬克思“帕麦斯顿辞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609—612 頁)。——第 19 頁。

- 23 “东方战争”一文是卡·馬克思專門为“南非人报”写的。該报在卡普施塔德(开普敦)用英文和荷兰文两种文字出版。馬克思于 1853 年 12 月通过他的妹夫約·卡·尤特被邀为該报撰稿。馬克思寄去的三篇文章，只刊載了一篇。——第 20 頁。

- 24 关于土軍击沉俄国战列舰“罗斯提斯拉夫号”的消息刊載于 1854 年 1 月 9 日的“泰晤士报”。据俄国的官方文件(“巴·斯·納希莫夫給亞·

謝·緬施科夫的关于西諾普海战的报告”和“巴·斯·納希莫夫分艦隊在西諾普海战中的艦船損傷报告表”),“羅斯提斯拉夫号”在西諾普會战后安全回到塞瓦斯托波爾停泊場进行修理。——第 23 頁。

25 指 1850 年路易-菲力浦死后法国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正統派和幼系的拥护者奥尔良派进行联合的一次嘗試。1853 年底,法国王位追求者正統主义者尙博爾伯爵和奥尔良派的代表奈穆爾公爵举行会晤,在这以后不久,1854 年初尙博爾拜訪了路易-菲力浦的遺妻。——第 27 頁。

26 «*Entente cordiale*» (“誠意协商”)是在十九世紀用来表示 1830 年七月革命后法英之間亲近的說法。尽管說“誠意协商”,但無論在三十年代或是以后时期,英法两国在一系列国际問題上,其中包括在东方問題上的矛盾不止一次地尖銳化。——第 27 頁。

27 指 1853 年 12 月 5 日英、法、普三国代表和奧地利外交大臣布奧爾在維也納會議上簽訂的議定书。在这个議定书和以后的几次照会中,四强国一再表示要調停俄土之間的冲突。

馬克思提到的法英駐君士坦丁堡大使 1853 年 12 月 12 日給土耳其外交大臣列施德-帕沙的这封信指出,法英艦隊出現在博斯普魯斯海峽,证明法英政府对土耳其的友好願望,一旦沙皇政府試图派兵在土耳其領土登陸,这两个强国的艦隊将起而保卫奧斯曼帝国。——第 27 頁。

28 根据庫楚克-凱納吉条約(1774 年),俄国获得了南布格河和德涅泊河之間的黑海北部沿岸地区(包括金布恩要塞在內)以及阿速夫、刻赤、叶尼卡列等城市,并赢得了对克里木独立的承认。俄国商船得到了自由通过博斯普魯斯海峽和达达尼尔海峽的权利。根据这个条約,苏丹必須給予正教教会一系列特权,特別是在第十四項条款中,規定在君士坦丁堡修建正教教堂。

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約(1829 年),多瑙河口和附近島嶼以及黑海东岸自庫班河口以南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划归俄国。根据这个条約,土耳其必須承认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自治,給予它們自选国君的权利。

这种自治由俄国負責保证，这等于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的国家，并頒布敕令使塞爾維亞的自治合法化。

根据 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1833年），俄国和土耳其一旦和任何国家发生战争，双方有互相援助的义务。关于这个条約的秘密条款，見注 19。——第 28 頁。

29 “奧格斯堡报”（《*Augsburger Zeitung*》）是人們对德国反动日报“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的称呼；1798年創刊；从1810年到1882年在奧格斯堡出版。——第 33 頁。

30 后备軍是普魯士軍隊的一部分，包括在常备軍和預备队中服役期滿的那些年齡較大而又有服役义务的人。按照普魯士法律，只有战时才能征集后备軍。——第 37 頁。

31 1853年11月1日（10月20日），土軍从土尔图凱（多瑙河右岸）渡河到一个島上，从那里威胁俄軍占領的沃耳特尼察檢疫所。然后，土軍又趁指揮駐守多瑙河的俄軍的一个軍的丹年別尔格將軍按兵不动的机会，从該島渡河到多瑙河左岸，占領了沃耳特尼察檢疫所并建立了有島上和河右岸的炮火掩护的坚固的桥头堡。11月4日（10月23日），俄軍企图把土軍赶出他們所占領的陣地，結果失败了。——第 40 頁。

32 指 1853年12月15日四强国給土耳其的照会（見注 12）。土耳其在 1853年12月31日的复照中提出它同意在英、奧、法、普四国的調停下举行和平談判的先决条件：（1）維護和保障土耳其領土的完整；（2）俄軍撤出多瑙河各公国；（3）恢复和遵守 1841年的条約；（4）尊重苏丹的主权。1854年1月13日召开的新的維也納大使會議同意了这些条件，然后将这些条件通知了沙皇政府。——第 42 頁。

33 指緬施科夫在以特使的身分在君士坦丁堡期間（1853年2月28日—5月21日）代表沙皇政府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沙皇要求承认他对土耳其的所有正教臣民的保护权，并且力图使这一点用适当的外交条約肯定下来。——第 43 頁。

- 34 “旁观者”（《*The Spectator*》）是英国自由派的周刊，从1828年起在倫敦出版。——第45頁。
- 35 馬克思引用1854年1月21日宪章派的周报“人民报”的材料来評述反女王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运动。
“人民报”是革命宪章派的領袖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1852年5月在倫敦創办的。从1852年10月到1856年12月，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該报撰稿，并且帮助进行編輯工作。除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人民报”写的文章外，該报还从“紐約每日論壇报”轉載他們的最重要的文章。在这期間“人民报”始終不渝地捍卫工人階級的利益，宣傳社会主义思想。由于琼斯同資產階級激进派接近，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且一度同琼斯断絕了联系。1858年6月該报轉入資產階級商人手中。——第45頁。
- 36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日报，1794年在倫敦創刊；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是激进資產階級的喉舌。——第46頁。
- 37 指瑞典和丹麦关于波罗的海发生軍事行动时保持中立的声明（1853年12月）。——第49頁。
- 38 曼彻斯特学派 是反映工业資產階級利益的英国經濟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貿易派，主張貿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經濟生活。自由貿易派的宣傳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領導这一运动的是1838年組織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紡織厂厂主——科布頓和布莱特。在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自由貿易派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这个集团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50頁。
- 39 指沙皇政府1836年3月2日（2月19日）頒布的命令。这个命令規定在多瑙河的支流苏利納河上設立俄国檢疫所，檢疫所实际上起着控制这一段河流船只来往的关卡的作用。——第50頁。
- 40 “公文集”（《*Portfolio*》）是戴·烏尔卡尔特在倫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的汇编的簡称。“公文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丛刊在1835—1837年出版。新的

- 从刊以“公文集。外交評論”(«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的名称在1843年至1845年期間出版。——第50頁。
- 41 亞·索麦維尔“科布頓政策——英国内部敌人。和平协会和它的好战性。科布頓先生和他的隱衷。以及历史事件的故事”1854年倫敦版第36頁(A. Somerville. «Cobdenic Policy the Internal Enemy of England. The Peace society, its combativeness. Mr. Cobden, His secretiveness. Also, a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Incidents». London, 1854, p. 36)。——第51頁。
- 42 指科布頓的一本匿名的抨击性小册子“俄国。曼彻斯特一厂主,‘英国、爱尔兰和美国’一书的作者著”1836年爱丁堡版(«Russia. By a Manchester manufacturer; author of «England, Ireland, and America»», Edinburgh, 1836)。——第51頁。
- 43 反谷物法同盟是由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頓和布莱特在1838年創立的。同盟要求貿易的完全自由,力求廢除谷物法,以达到降低工人的工資,削弱土地貴族的經濟和政治地位的目的。1846年谷物法廢除后,該同盟即不再存在。——第52頁。
- 44 根据英国以前的慣例,在当时的大約100个爱尔兰貴族(1801年合并前在爱尔兰領到土地的英国地主)中有26人选入上院,其余的人可以选入下院。——第52頁。
- 45 “經濟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的經濟和政治周刊,1843年在倫敦創刊;大工业資產階級的喉舌。——第53頁。
- 46 “通报”(«Moniteur»)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簡称,政府的正式机关报;1789年在巴黎出版。——第55頁。
- 47 1854年1月底到2月初,阿·費·奥尔洛夫奉尼古拉一世之命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約瑟夫举行了談判。奥尔洛夫的使命是以俄国保证絕對不侵犯奥地利的領土并負責敦促普魯士和整个德意志联邦也同意提供这一保证作为条件,換取奥地利在克里木戰爭中保持友好的中立。另外,沙皇建議奥地利共同保护土耳其一旦解体而在巴尔干可能建立

的国家。由于在东方問題上俄国和奥地利之間存在矛盾，奥尔洛夫的使命沒有胜利完成。——第 56 頁。

48 指 1833 年 5 月至 7 月間阿·費·奥尔洛夫以特使和俄軍(前去帮助土耳其苏丹馬茂德二世鎮压叛乱的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的总司令的身分在君士坦丁堡进行的談判。談判的結果，于 1833 年 7 月 8 日(6 月 26 日)簽訂了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見注 28)。俄国在外交上的胜利使英俄矛盾更加尖銳化了。——第 57 頁。

49 馬克思指 1853 年 6 月 22 日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刊載的他的一篇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32—142 頁)。——第 57 頁。

50 指在 1854 年初討論的并在 1854 年 7 月頒布的丹麦王国的新的根本法(見本卷第 415—416 頁)。它用削弱王国的各組成部分(丹麦本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和劳恩堡)的自治权的办法加强了它們对丹麦王权的依附。这个根本法遭到强烈的反对，1863 年，由于通过了新宪法，它就被廢除了。

本文最后一段的俄譯文第一次发表。——第 60 頁。

51 藍皮书 是英国議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資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藍皮书因藍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紀开始发表藍皮书，它是英国經濟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資料。

此处馬克思是指藍皮书“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奉女王陛下之命提交議会两院。1854 年倫敦版(«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54)。——第 61 頁。

52 1839 年，关于英国駐喀布尔全权代表白恩士和阿富汗王多斯特-穆罕默德之間的談判的报告提交議会。1838 年，英国政府曾經根据这个报告并按照帕麦斯頓的要求向阿富汗宣战。后来查明，一些最重要的公文被从文件專輯中抽掉了，这就使人有可能把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政策

說成是明显反英的政策。——第 62 頁。

- 53 1839 年爆发土埃战争。战争结果，在四十年代初东方问题尖锐化了，各强国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1839 年，苏丹军队进入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利在 1831—1833 年占领的叙利亚，但被击溃。西方强国由于害怕俄国单独干涉土埃冲突，坚持于 1839 年 7 月 27 日向苏丹提出联合照会，建议土耳其政府接受所有大国的援助。但是，由于英法争夺在近东，特别是在埃及的势力范围，英、俄、奥、普四国于 1840 年 7 月 15 日背着法国签订了关于各国在军事上援助苏丹的若干措施的伦敦公约。真正想指望穆罕默德-阿利的法国不久就被迫让步，把穆罕默德-阿利丢开不管了。——第 62 頁。
- 54 指开往墨尔本的英国轮船“泰勒号”的沉没；这次灾难是 1854 年 1 月 21 日发生在朗贝岛一带（都柏林附近）；审讯表明，“泰勒号”的全体船员都是从外行的技术不熟练的水手中招来的。——第 66 頁。
- 55 唐宁街是伦敦中心的一条街，英国政府的所在地。
爱尔兰旅是大不列颠议会里的爱尔兰议员团。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爱尔兰旅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是反映爱尔兰上层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利益的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即妥协派的代表。同时，它的成员还有依靠富裕佃农的爱尔兰自由派活动家。在托利党和辉格党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爱尔兰旅加上曼彻斯特学派就能改变议会里的力量对比，影响议会内部斗争的进程，有时还能够决定政府的命运。——第 67 頁。
- 56 指领导议会里的爱尔兰旅的爱尔兰资产阶级民族运动领袖奥康奈尔和辉格党领袖们在 1835 年 2 月签署的协定。因为谈判是在伦敦利奇菲耳德勋爵的府邸举行的，所以这个协定被称为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第 67 頁。
- 57 “艺术和骗术协会”是马克思对 1754 年成立的带有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的艺术和手工业协会的称呼；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这个协会的领导人阿尔伯特亲王。该会冠冕堂皇地宣布它的宗旨是：“鼓励艺术、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帮助“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

- 国家富足等等的人”。1853年，艺术和手工业协会为了达到阻撓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发展和宪章派酝酿成立工人議會(見注 92)的目的，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間的調停人。1854年1月，协会举行會議，与会的約有二百个屬於各个派別的人。厄·琼斯企图提出一个承认工人有罢工权利和譴責同盟歇业的決議案，但琼斯被禁止发言。在这以后，他和他的同伴退出了會場。結果，會議成为空談同盟歇业、罢工、工資水平等問題的會議。——第 67 頁。
- 58 指所謂的卢森堡委员会——由路易·勃朗主持在卢森堡宮开会的政府工人問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1848年2月28日法国临时政府在要求建立劳动部的工人的压力下成立的。这个由工人和企业主的代表組成的委员会的实际活动是調解劳动糾紛，由于路易·勃朗的妥协政策，这些活动常常对企业主有利。在1848年5月15日人民群众发动后，政府于1848年5月16日撤銷了卢森堡委员会。——第 67 頁。
- 59 1849年奥俄两国政府要求土耳其政府引渡1848—1849年革命被鎮压后逃亡到土耳其的匈牙利和波兰的革命者。由于害怕俄国在土耳其的势力增强的英法两国施加压力(英国分舰队于1849年12月进入达达尼尔海峡)，这个要求当时被撤回了。——第 70 頁。
- 60 特惠条例(来源于拉丁字 capitulare)是規定給予东方国家(其中包括土耳其)中的欧洲各国臣民以商业上的优惠和特权的文件(見卡·馬克思“宣战。——关于东方問題产生的历史”，本卷第178—187頁)。——第 71 頁。
- 61 教皇因阿拉貢的国王斐迪南(1479—1516)从西班牙驅逐摩尔人有功而賜予的一个封号，后来被羅馬教皇經常用來称呼西班牙的国王。馬克思在这里譏諷地使用这个封号。——第 71 頁。
- 62 指萊·弗·辛普森的著作“东方問題：萊宁根伯爵和緬施科夫公爵使团訪問君士坦丁堡以来所发生的历次事件的始末”。1854年倫敦版(L. F. Simpson. «The Eastern Question: a Connected Narrative of Events from the Missions of Count Leiningen and Prince Menschikoff to Constantinople,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854)。馬克思在下面引证的有关奥土爭奪門的内哥罗而发生的冲突的材料,見該书第3—6頁和第8—10頁。——第72頁。

63 指1821年春爆发的希腊起义。这次起义是由希腊爱国者的各秘密协会(赫特里)准备的。1821年3月亚历山大·伊普西朗蒂——曾领导过敖德薩的一个赫特里的在俄軍中供职的希腊籍軍官——的部队渡过普魯特河进入多瑙河各公国,企图潜入希腊。这是这次起义的信号。伊普西朗蒂部队的进軍結果失败了,但是推动了不久以后席卷全国的群众性起义。1822年1月,在厄皮达夫尔召开的国民議會宣布了希腊的独立,并且通过了宪法。土耳其苏丹由于光靠自己的力量对付不了起义的希腊人,便求助于它的藩臣,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利。穆罕默德-阿利的軍队在伊布拉吉姆-帕沙的指揮下侵入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到处殘杀希腊居民。在起义之初,神圣同盟各强国,其中包括沙皇俄国对起义抱有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是英国、沙皇俄国和法国看到希腊人的斗争到处获得极大的同情,而主要是可以利用这个斗争来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島南部的影响,于是承认了希腊为交战的一方,并給予它以軍事援助。俄国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对希腊赢得独立具有决定的意义。由于俄国的胜利,土耳其不得不承认希腊为独立国家。但是根据欧洲各强国的統治集团的決定,把反动的君主制度强加給了希腊人民。——第73頁。

64 指1854年1月29日拿破侖第三給尼古拉皇帝的信。該信載于2月14日“总汇通报”,1854年3月6日轉載于“紐約每日論壇报”。——第77頁。

65 第一次維也納照会 是恩格斯对俄土之間的折衷协定草案的称呼。这个草案为奥地利大臣布奥尔拟定,1853年7月底在維也納法、英、普三国大使會議上通过。照会規定苏丹必須遵守庫楚克-凱納吉条約(1774)和阿德里安堡条約(1829)并維護奧斯曼帝国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不可侵犯性。按照會議的決定,照会应先送交給沙皇,如果沙皇同意,再送交苏丹。尼古拉一世同意照会的內容,但保留按照自己的意見解釋这个照会的权利。土耳其苏丹則提出一系列修正意見和附带条件作

- 为同意签署这个照会的先决条件，而沙皇政府认为这些修正意見和附帶条件都是他不能接受的。——第 78 頁。
- 66 恩格斯指的是 1793 年至 1815 年的英国对法国的战争。——第 79 頁。
- 67 本文最后原有“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加的一段：“在另外的地方，本报駐倫敦記者暗示他不願相信这种背叛行为，但是事实胜于雄辯，理智最終必須承认这些事实。在西方强国采取这样絕望的措施以求摆脱战争以后，很难設想，还有什么事情它們做不出来。”編輯部这里所說的駐倫敦記者指的是阿·普尔斯基。——第 81 頁。
- 68 本文中所刊載的消息是斐·拉薩尔在 1854 年 2 月 10 日的一封信中告訴馬克思的。馬克思认为把普魯士政府的計劃，其中包括逮捕民主主义者的意图公布于世，可以阻止这些計劃的实现。——第 82 頁。
- 69 馬克思在本文和后面几篇分析英国議會关于战争的辯論的文章里利用了“泰晤士报”的速記記錄，这些記錄有时在事实上有出入并有刊誤的地方。馬克思多半是利用倫敦出版的汉薩德的“議會辯論”（«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来分析前几年的議會辯論的。
本文第一段的俄譯文第一次发表。——第 85 頁。
- 70 根据英国議會沿用的議事程序，在討論某些重大問題时，下院可以宣布自己为全院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这等于不公开的會議；在这种會議上，执行主席（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s）职务由下院議長专门指定主席名单中的一人担任。在討論有关抵补国家开支的一些重大問題时，下院的會議即为筹款委员会（Committee of Ways and Means）。——第 85 頁。
- 71 1844 年，英国内务大臣格萊安为了討好奥地利政府，命令邮政主管部門把意大利流亡革命家的信件交給警察当局秘密檢查。在其他一些信件中发现了邦迪埃拉兄弟写給馬志尼的信，信中叙述他們远征卡拉布里亚的計劃。在实现这次远征时，参加者被逮捕，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第 86 頁。
- 72 1851 年 5 月，法国大使拉瓦累特到达君士坦丁堡，向苏丹轉达了法兰

- 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侖关于尊重耶路撒冷天主教会的一切权利和特权的要求。苏丹于1852年2月9日頒布敕令承认从前一系列法土条约所规定的法国的权利。而俄国外交也在为正教教会争取同样的特权；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实际上是俄法两国在东方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这样就使得俄法关系日趋尖锐，而成为以后的克里木战争的起因之一。——第88頁。
- 73 1827年10月20日，在納瓦林（现在的皮洛斯——希腊的城市和港口）附近，土埃舰队同英国海軍上将爱·科德林頓指揮的英、法、俄联合分舰队发生了会战，这支联合分舰队是欧洲列强派往希腊海面武装調解土耳其和希腊起义者之间的战争的。这次会战是因土耳其統帅部拒絕停止殘杀希腊居民而开始的。結果，土埃舰队全軍复沒，并且加速了俄国贏得胜利的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爆发。在納瓦林会战中，俄国分舰队，特别是米·彼·拉扎列夫所指揮的“阿速夫号”旗舰起了出色的作用。——第92頁。
- 74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72年至1937年在倫敦出版。十九世紀中叶是糾集在帕麦斯顿周圍的輝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102頁。
- 75 指1825年10月16日（4日）俄国駐法国大使波茨措-迪-博尔哥給总理大臣涅謝尔罗迭伯爵的紧急报告。这个紧急报告是对1825年8月18日（6日）涅謝尔罗迭按亚历山大一世的指示草拟的通令的答复，通令征詢俄国駐外使节对西方强国在东方問題上所采取的对俄政策的实质和对俄国外交路綫的意見。波茨措-迪-博尔哥在他的紧急报告中分析了各强国在东方問題上的立場，进而建議俄国对土耳其直接采取軍事行动。这个紧急报告載于“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經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年巴黎版（《*Recueil de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Paris, 1854）。这个文件集于1853年7月在巴黎第一次出版，标题是“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未

經发表的文件和其他历史文件是有益的(1853年7月)。”(«Recueil des documents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 et d'autres pièces historique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 (juillet 1853)»)。——第103頁。

- 76 見卡拉姆律“俄罗斯国家历史”，1835年圣彼得堡版第11卷第1章第23頁(«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 XI, Спб. 1835, гл. I, стр. 23)。——第103頁。
- 77 馬克思这里說的反对法国的神圣同盟是指1840年英国孤立法国的外交活动(見注53)。
达达尼尔海峡条約(見注13)。——第105頁。
- 78 指1854年1月爆发的希腊居民的暴动。这次暴动席卷了許多并入土耳其帝国版图的希腊地区。暴动者力爭同希腊合并，希腊會派兵到暴动地区去。土耳其政府依靠英法的支持，于1854年6月鎮压了这次暴动。——第108頁。
- 79 1788—1790年奥土战争期間，奥地利軍队占領了塞尔維亚(1789)。在英国和普魯士的压力下，奥地利于1791年在西斯托夫(斯維施托夫)和土耳其締結和約。根据这个和約，奥地利必須撤出它所占領的一切地区。——第108頁。
- 80 *Nervus belli* 是羅馬諺語：*pecunia est nervus belli* (金錢是战争的神經)之略。——第110頁。
- 81 指 *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 ——貝列拉兄弟在1852年开办的一家法国大股份銀行。該銀行同拿破侖第三政府有密切联系，它在政府的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破产，1871年倒閉。——第110頁。
- 82 1846年2月在波兰各地准备举行以波兰民族解放为目的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由于貴族階級分子的背叛和起义领导人被普魯士警察当局逮捕，总起义被破坏了，只有个别地方爆发革命。2月22日起义者仅仅在从1815年起由奥地利、俄国和普

- 魯士共管的克拉科夫共和国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該政府发表了廢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同时加里西亚的乌克兰农民也举行了起义。克拉科夫起义于1846年3月被鎮压下去，接着，奥地利政府又鎮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魯士和俄国簽訂了关于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約。——第113頁。
- 83 根据1849年8月6日奥地利与撒丁王国(皮蒙特)簽訂的和約，皮蒙特应付給奥地利7500万弗罗倫的賠款。
1853年奥地利政府在倫巴第和威尼斯沒收了流亡在外的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的财产。——第114頁。
- 84 边屯区——十六至十九世紀时期奥地利帝国南部地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斯拉窩尼亚和巴納特)被称为边屯区，那里的居民(边屯区居民)必須服边防兵役才能使用土地。——第115頁。
- 85 1789年在奥屬尼德兰(比利时)发生了反抗奥地利統治的民族起义，即所謂布拉班特革命。起义于1791年被奥地利軍隊鎮压。——第116頁。
- 86 見注26。——第117頁。
- 87 沙多勃利昂。“維罗那會議。西班牙战争。談判。西班牙的殖民地”1838年布魯塞尔版第1、2卷(Chateaubriand, «Congrès de Véronne, Guerre d'Espagne. Négociations. Colonies espagnoles». T. I—II. Bruxelles, 1838)。——第122頁。
- 88 指1834年4月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所謂四国同盟)之間簽訂的条約。这个条約表面上反对专制的“北方强国”(俄国、普魯士和奥地利)，而实际上却使英国有可能借口在軍事上援助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反对葡萄牙的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和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来巩固它在这两个国家的地位。这是英法关系恶化的原因。——第122頁。
- 89 指1846年西班牙女王伊薩伯拉二世同唐·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的婚姻，以及路易莎-斐迪南的公主同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儿子蒙

潘西埃公爵的婚姻。由于伊薩伯拉沒有直系继承人，蒙潘西埃公爵便成了第一批西班牙王位追求者中的一个。法国外交的这一胜利引起当时支持法国反路易-非力浦政府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英国强烈不满。——第 123 頁。

- 90 1838 年，由于多斯特-穆罕默德（阿富汗的艾米尔）拒絕同英国結成反对伊朗和俄国的同盟，英国不能把阿富汗变成执行自己的政策的工具，于是决定用軍事干涉的办法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并且扶植自己的走狗舒扎沙赫为王。英国軍隊侵入阿富汗，几乎把阿富汗全国搶劫一空，俘擄了多斯特-穆罕默德；但是，英国人的統治并没有繼續多久。由于 1841 年 11 月的人民起义，英国軍隊被击潰并被歼灭。1842 年，英国人又作了一次征服阿富汗的尝试，結果仍然彻底失败了。——第 123 頁。
- 91 1851 年，中国发生了带有强大的农民战争性质的反封建的解放运动。在战争过程中，起义者建立了“太平天国”，从此这一运动被称为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起义者消灭了統治中国的滿清封建主，廢除了賦稅，取締了大封建所有制。这次起义还具有农民运动特别是东方农民运动特有的宗教色彩，打击了作为滿清王朝的支柱的佛教僧侶和寺院。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制度和異族侵略者的广泛斗争奠定了基础，但没有能够消灭中国的封建生产方式。在太平天国内部形成了同統治阶级妥协的封建上层，这是运动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英、美、法的公开干涉給这次革命以重大打击，在 1864 年这些国家的武装力量同中国封建主的軍隊一起把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了。——第 124 頁。
- 92 由于 1853 年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漲，以琼斯为首的宪章派提出了成立广泛的工人組織“群众运动”的思想，这一組織的任务是把工联以及未加入組織的工人联合起来，而首先是使全国各地的罢工协调起来。这一組織应当由定期召开的工人議会领导，工人議会由没有加入組織的工人的群众大会和参加“群众运动”的工联的會議选出的代表組成。工人議会于 1854 年 3 月 6 日在曼彻斯特开幕，1854 年 3 月 18 日閉幕。工人議会討論并通过了“群众运动”綱領，成立了由 5 人

組成的執行委員會。被選為議會名譽代表的馬克思曾給議會寫了一封信（見本卷第 133—134 頁），在 3 月 10 日的會上宣讀了這封信。馬克思在信里提出英國工人運動的首要任務就是建立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群眾性政黨。馬克思認為工人議會的召開具有重大意義，把它看做是使英國工人運動擺脫工聯主義的狹小框子的一種嘗試，是向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結合前進了一步。

但是，組織“群眾運動”的嘗試沒有成功，因為工聯的大多數領袖反對政治鬥爭，不支持建立一個統一的群眾性工人組織的主張。同時，1854 年夏季罷工運動的低落也對廣大工人群眾參加運動起了不利的影響。1854 年 3 月以後，工人議會再沒有召開會議。——第 125 頁。

93 見注 58。——第 125 頁。

94 憲章派全國協會於 1840 年 7 月成立。這個協會是工人運動史上第一個群眾性工人政黨，在憲章運動高漲的年代參加的人數達到 4 萬人。在協會的活動中，表現出協會會員中缺乏思想上和策略上的統一，表現出大多數憲章派領袖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憲章派在 1848 年遭到失敗後，先進的、嚮往科學共產主義的革命憲章派的代表，首先是厄·琼斯，在五十年代初曾試圖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組憲章運動。這一點在 1851 年憲章主義公會通過的綱領中可以看出。在五十年代後半期，由於機會主義在英國工人運動中取得暫時的勝利和憲章運動的低落，這個協會實際上停止了自已的活動。——第 126 頁。

95 指 1854 年 2 月 21 日（9 日）尼古拉一世同法英斷絕外交關係的宣言；尼古拉一世在 1854 年 2 月 9 日（1 月 28 日）給拿破侖第三的信里拒絕在東方問題上作任何妥協。——第 127 頁。

96 南海公司是 1712 年前後在同南美和太平洋各島進行貿易的幌子下在英國成立的；其真正目的是進行國家證券的投機。該公司從政府那里得到許多特權和壟斷權，包括國家有價證券的發行權，並展開了大規模的投機活動，結果公司在 1720 年宣告破產。破產的結果欠下了巨額國債，格萊斯頓在 1853 年曾試圖用收購該公司貶值的股票的办法抵償一

部分國債。——第 132 頁。

97 希臘獨立戰爭——見注 63。——第 140 頁。

98 弗·恩格斯所寫的“俄軍從卡拉法特撤退”一文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
他一些文章一樣，同時載於兩個報刊上。像在其他類似場合下一樣，由
於手稿失落，因此俄譯文只能根據現有的已刊登出來的文章中最完整、
最可靠的文章翻譯出來，而遇重大異文，則在腳注中注明。本篇俄譯文
是根據憲章派機關報“人民報”上所刊登的原文翻譯的。——第 143
頁。

99 崩采耳維茨(即維爾本)營壘是在七年戰爭期間根據普魯士國王弗里德
里希二世的命令於 1761 年建立的。

托列斯-維德拉斯工事(在葡萄牙境內塔霍河和大西洋海岸之間)
是 1810 年為了掩護里斯本免受法國進攻，根據威靈頓的命令而修築
的。

奧地利大公卡爾的軍隊在第三次反拿破侖法國的同盟戰爭(1805
年)時期所修築的工事，位於離維羅那不遠的地方。

在上述三次戰爭中這些障地都沒有被敵人攻占。——第 145 頁。

100 指英國駐彼得堡公使西摩爾勳爵同英國外交大臣關於西摩爾和尼古拉
一世於 1853 年初就土耳其問題所進行的談判的秘密往來的公文。對
談判的進程和英國政府在談判中所採取的模稜兩可的立場，馬克思在
本文和本文後面的一篇文章“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來”(見本卷第 160—
177 頁)中作了詳細的分析。——第 148 頁。

101 “聖彼得堡報”(«*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是俄國外交部的
機關報，它以這個名稱於 1825 年至 1914 年在彼得堡用法文出版。

這裡指的是 1854 年 3 月 2 日(2 月 18 日)“聖彼得堡報”就約翰·
羅素 1854 年 2 月 17 日在下院的發言(見本卷第 87 頁)所發表的一篇
文章。文章暗示沙皇政府和英國政府在土耳其問題上狼狽為奸，並引
1853 年西摩爾的秘密往來的公文和 1844 年的備忘錄作為證據。——
第 148 頁。

- 102 馬克思指普魯士政府对他經常进行的監視。在五十年代，普魯士駐倫敦大使本生在英國當局的某種幫助下曾是這種監視的組織者之一。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來往信件中會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們的信件遭到暗中檢查。——第 159 頁。
- 103 本文寫成的日期是根據馬克思的筆記本確定的。“紐約每日論壇報”誤刊為“1854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第 178 頁。
- 104 按照英國從 1662 年起實施的法律，對於向任何教區濟貧所申請救濟的貧民，可以根據法院的決定強迫他們返回原居住地。1854 年 2 月 10 日曾向下院提出了禁止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實行強迫貧民遷移的法案。——第 179 頁。
- 105 1854 年 3 月 12 日法國、英國和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簽訂了一項條約，根據這項條約，盟國有義務在海軍和陸軍方面給予土耳其軍事援助，而土耳其未經英法同意不得同俄國進行和談和簽訂和約。——第 179 頁。
- 106 烏列瑪——中近東伊斯蘭教國家中的最高等級：神學家和法學家，它掌握着訴訟程序和一切宗教機關和學校的管理權；烏列瑪在奧斯曼帝國的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影響。——第 179 頁。
- 107 貝爾貝萊國家——在十九世紀文獻中採用的對於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國家（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摩洛哥等）的稱呼。——第 180 頁。
- 108 斯·法明“基督敎會在東方的競爭和對它們進行保護的歷史”1853 年巴黎版（C. Famin. «Histoire de la rivalité et du protectorat des églises chrétiennes en Orient», Paris, 1853），第 13 頁；下面引自第 15、49、50 頁和 54—55 頁。——第 180 頁。
- 109 «Capitulations, ou Traités anciens et nouveaux entre la cour de France et la Porte ottomane, renouvelés et augmentés l'an de J. C. 1740, et de l'hégire 1153; traduits à Constantinople par le sieur Deval, secrétaireinterprète du roi et son premier drogman à la cour ottomane, 1761».——第

183 頁。

- 110 伏尔泰在为悲剧“塞米拉米达”(1748)所写的题为“論古代悲剧和現代悲剧”一篇序言中談到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时說：“可以认为，这部作品是喝醉的野人的幻想产物。但是在这些对現在仍然使英国戏剧变得如此荒謬和野蛮的形式的粗暴破坏中間，你会发现在‘哈姆雷特’中除了稀奇古怪的东西以外，还有一种无愧为最偉大的天才的崇高思想。”——第 188 頁。
- 111 潘塔隆——意大利民間假面喜劇中的人物之一，他表現一个威尼斯商人——有錢的、吝嗇的、愚蠢的老头的形象。——第 188 頁。
- 112 潘多拉的盒子 是裝滿罪恶和糾紛的盒子；这是一个文学典故，源出于古希腊神話中潘多拉的故事。潘多拉由于好奇打开了关着各种各样災禍的盒子，就把这些災禍散布出来了。——第 191 頁。
- 113 唐宁街——見注 55。——第 192 頁。
- 114 指 1854 年 4 月 3 日“泰晤士报”的社論。編輯部在这篇社論中尖銳地批評了累亚德在下院的发言，并对他作为亚述考古学家的活动表示怀疑。累亚德在考古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 1848—1849 年在倫敦出版的“尼尼微遺址”(«Nineveh and its Remains»)和 1853 年在倫敦出版的“尼尼微和巴比倫”(«Nineveh and Babylon»)。——第 193 頁。
- 115 馬克思在 1853 年 10 月至 12 月初写的一組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387—461 頁)中对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作了詳尽的分析。——第 198 頁。
- 116 1852 年 12 月成立联合內閣时，阿伯丁首相給予爱尔兰旅的三个成員——克奧、薩德勒和蒙塞耳大臣职位，因而引起了一些爱尔兰議員的激烈抗議，使該旅发生分裂。站在支持政府的爱尔兰議員背后的是天主教上层僧侶、爱尔兰資产階級和害怕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高漲的大地主。以达菲为首的爱尔兰旅的另一部分人所依靠的是爭取政府在

- 爱尔兰实行新土地租佃法的爱尔兰富裕佃农阶层。——第 201 頁。
- 117 关于俄国人撤出阿兰群島的錯誤报道載于 1854 年 4 月 7 日“泰晤士报”。——第 201 頁。
- 118 指英、法、普三国的代表(三国駐奥地利大使)和奥地利外交大臣布奥尔于 1853—1854 年在維也納举行的一系列會議。第一次會議是 1853 年 7 月召开的,这次會議还邀請了俄国大使,但俄国大使拒絕参加;會議的正式目的是因俄土关系緊張而出面調停俄国和土耳其之間的关系。在多次召开的會議上意見逐漸一致,并拟定了四国对俄国和土耳其的要求;后来这些要求成为 1855 年維也納會議和 1856 年結束克里木战争的巴黎和約的基础。——第 206 頁。
- 119 1853 年初,奥地利政府把五千多名原籍为瑞士德森州的人赶出倫巴第。它采取这一措施的借口是: 1853 年 2 月的米兰起义是在德森住过的意大利流亡革命家策划的。經過长期外交談判,直到 1855 年 3 月,奥地利政府才允許被赶出的德森人返回原地。——第 213 頁。
- 120 馬克思所說的意大利立宪党是指以卡富尔为首的自由派(所謂 moderatti——温和派);該党代表保皇派自由大资产階級和资产階級化了的貴族的利益,在薩瓦王朝的庇护下力爭自上而下地达到意大利的統一。該党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因而把它的策略建立在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和其他国家的援助上面。1853 年至 1854 年,該党促使皮蒙特站在英法一边参加克里木战争,从而希望在意大利統一事业中取得英法两国的支持。皮蒙特于 1855 年参战。
都灵的“同盟报”(«Unione»)是这一派的左翼的机关报。——第 215 頁。
- 121 指 1854 年 4 月 19 日“泰晤士报”的社論,該报在社論中批評了內閣在战争問題上的犹豫不决的态度。——第 219 頁。
- 122 “劳埃德氏报”(«Lloyd»)——英国自由派报纸“劳埃德氏倫敦新聞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的簡称,1843 年至 1918 年間該报用此名出版。——第 221 頁。

- 123 奧普條約于1854年4月20日在柏林簽訂。——第223頁。
- 124 指1854年4月9日英國、法國、普魯士和奧地利的代表在維也納舉行的例會上簽署的議定書。議定書簽字國不得在調停俄國和土耳其的沖突的問題上單獨行動。擬定了以下幾點作為未來協議的基礎：土耳其帝國的完整，俄軍撤出多瑙河各公國，給予蘇丹的基督教臣民以不妨害蘇丹獨立和主權的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以及尋求在調整土耳其政治關係時保證歐洲的均勢的必要保障。——第225頁。
- 125 從馬克思的筆記本中可以看出，1854年5月2日和5日，馬克思先後寄給“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兩篇文章。可是，該報編輯部把這兩篇文章合而為一，用馬克思的署名在1854年5月16日的報上發表。本卷中的這篇文章是按報紙發表的形式刊印的。編輯部把馬克思寄去的材料的一部分（關於普魯士政策）篡改得面目全非，並作為它的社論在1854年5月19日的報上發表。——第228頁。
- 126 “比利時獨立報”（《L'Indépendance belge》）是資產階級日報，1831年在布魯塞爾創刊；自由派的機關報。——第229頁。
- 127 “新聞報”（《Die Presse》）是奧地利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日報，1848年至1894年在維也納出版；1861年至1862年期間，該報採取反波拿巴主義的立場，曾經刊載馬克思的文章和通訊。——第233頁。
- 128 “阿格拉姆報”（《Agramer Zeitung》）是從1826年起在阿格拉姆（薩格勒布）出版的一家日報，奧地利政府的半官方報紙。——第233頁。
- 129 指德意志人民在拿破侖軍隊在俄國潰敗後展開的反對法國統治的民族解放鬥爭。在這個鬥爭中，統治階級和執政王朝千方百計地燃起沙文主義情緒並利用人民的鬥爭來鞏固德意志的封建反動制度。——第233頁。
- 130 忠實者聯盟（*Treubund*）是1848年底普魯士保皇派在柏林建立的反動沙文主義組織。——第233頁。
- 131 馬克思指的是他在1853年春天寫的一組關於格萊斯頓的財政預算的

- 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9—95頁）。——第237頁。
- 132** 指俄国、英国和尼德兰的代表1815年5月19日（7日）在倫敦簽訂的关于賠償俄国把拿破侖軍隊驅逐出荷兰和比利时各省的軍事費用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英国和尼德兰政府必須以賠償的形式向荷兰霍普公司的銀行家清償俄国借的一部分債款（各付2500万荷兰盾）和1816年1月以前尚未偿还的这一債款的利息。但协定的一項特別条款規定，一旦比利时的一些省脱离尼德兰，就将停止还債。1830年革命和独立的比利时国家成立后，尼德兰政府停止了付款。但是，帕麦斯顿代表英国政府于1831年11月16日（4日）同俄国簽訂了一項承认英国过去的財政債務的新协定。——第242頁。
- 133** 此处与事实不符：德·叶·奥斯坦-薩肯將軍是駐守多瑙河的第三軍指揮官，后来（从1853年12月起）他又担任防守从布格河到多瑙河的沿岸地区的軍隊的指揮官；他的司令部設在敖德薩。——第244頁。
- 134** 1849年4月5日的埃克思弗尔德战斗是1848—1850年丹麦和普魯士的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戰爭中的一次战役。——第246頁。
- 135** 馬克思写的关于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对領土的清扫的两篇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69—576頁和第9卷第177—183頁）。
馬克思接着引用的是厄·琼斯在1854年5月13日“人民报”的社論中发表的事实材料。——第250頁。
- 136** 指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英国工人的一次大罢工。1853年8月，普雷斯頓和四郊的棉紡織厂的織布工和細紗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資百分之十；其他行业工人支持了他們。企业主联合会为了对付罢工，1853年9月宣布了同盟歇业。在三万名普雷斯頓工人中大約有二万五千人停止工作。1853年罢工运动的特点是其他城市的工人支援了罢工工人，普雷斯頓工人由于这种支援，坚持了三十六周之久。1854年2月同盟歇业已停止，但罢工还在繼續。为了破坏罢工，企业主联合会开始把爱尔兰和英格兰习艺所的工人运到普雷斯頓。1854年3月，罢工的領導人被捕。工人由于基金耗尽而被迫复工。5月罢工結束了。关于普雷

- 斯頓罷工的起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54頁。
- 137 本文原載于“人民報”，以后又以“波羅的海和黑海上的軍事行動。英法的作戰方法”為題載于“紐約每日論壇報”。
- “人民報”編輯部在文章的正文前加了一段話：“為了騰出篇幅刊載目前僑居英國的一位著名的歐洲政治活動家寫的這篇天才作品，我們不得不放棄一般性的時事報道。”——第255頁。
- 138 指安梅林海軍上將在1854年5月1日和5日給法國政府的關於聯軍艦隊炮擊敖德薩後在黑海的行動的報告。報告的摘要載于1854年5月21日的“總匯通報”。——第258頁。
- 139 指1853年6月21日至8月20日為了準備對俄戰爭而在離倫敦不遠的喬賓城郊外舉行的大規模的野營集訓和軍事演習。——第265頁。
- 140 梅費爾激進派——一小撮冒牌激進分子（摩耳斯沃思、貝爾納·奧斯本等人）的綽號，他們實際上代表向民主派獻媚的那一部分英國貴族。“梅費爾”一詞從倫敦的豪門區之一的名稱——梅費爾而來，這個區是貴族私邸所在地。——第267頁。
- 141 指1854年5月23日在維也納舉行的英、法、奧、普四國代表例會的議定書。——第269頁。
- 142 “先驅晨報”（《*The Morning Herald*》）是英國保守派的日報，1780年至1869年在倫敦出版。——第275頁。
- 143 “地球報”（《*The Globe*》）是英國的一家晚報“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的簡稱，從1803年起在倫敦出版；輝格黨機關報，輝格黨人執政期間是政府的報紙；從1866年起是保守黨的機關報。——第278頁。
- 144 “曼徹斯特衛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國資產階級報紙，自由貿易派的機關報，後來是自由黨的機關報；1821年在曼徹斯特創辦。——第281頁。

- 145 指土耳其軍隊 1683 年 9 月 12 日在維也納附近被奧、德、波三國軍隊歼灭。在楊·薩比斯基指揮下的波蘭軍隊在這個會戰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個會戰制止了土耳其人向中歐推進。——第 282 頁。
- 146 約·哈麥爾“奧斯曼帝國史，根據以前未曾利用的手稿和檔案編寫的”1827—1832 年佩斯版第 1—10 卷 (J. Hammer.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grossentheils aus bisher unbenützten Handschriften und Archiven». Bd. 1—10, Pest, 1827—1832)。——第 282 頁。
- 147 皮爾派是聯合在羅·皮爾周圍的一些溫和的托利黨人，他們支持皮爾在保持大土地占有者和金融家的政治統治的前提下在經濟政策方面向工商業資產階級讓步的政策。1846 年，皮爾為了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廢除了谷物法，結果引起了托利黨的保护關稅派的強烈不滿并導致托利黨的分裂和皮爾派的孤立。1850 年皮爾死後，皮爾派便成為一個沒有明確綱領的政治集團。皮爾派參加了阿伯丁的聯合政府 (1852—1855)。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皮爾派加入了自由黨。——第 283 頁。
- 148 從馬克思的筆記本中看出，1854 年 6 月 6 日，馬克思寄給“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一篇關於聖阿爾諾的文章。這篇文章沒有發表。——第 285 頁。
- 149 指 1830 年法國七月資產階級革命。——第 285 頁。
- 150 “自助者天助之”是 1827 年在法國成立的溫和的自由派的政治團體的名稱。許多後來的七月王朝的活動家 (基佐、巴羅和拉斐德等人) 參加了該團體；一批資產階級共和派分子 (弗洛孔、戈德弗魯阿和卡芬雅克等人) 也參加了該團體。
- 十二月十日會是 1849 年成立的波拿巴派的秘密團體。它的成員多半是游民。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著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73—176 頁) 中對十二月十日會作了詳盡的評述。——第 286 頁。
- 151 指 1851 年 12 月 2 日的路易·波拿巴政變。——第 288 頁。

- 152 莫尔特克“1828年和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第206頁(Moltke. «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 Berlin, 1845, S. 206)。——第297頁。
- 153 巴希布祖克是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土耳其军队的非正規部队的名称。这个部队以缺乏紀律、殘忍和搶劫成性而著称。——第299頁。
- 154 本文是弗·恩格斯在1854年6月14日应馬克思的請求写的。馬克思对該文作了补充并于6月16日寄給“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將該文作为社論发表,并給它加上了下面一段按語:“昨日‘亞美利加号’輪船帶給我們的欧洲通訊和几捆报纸,完全证实了关于俄軍已被趕出錫利斯特里亚一帶的塹壕以及他們后来从瓦拉几亚退往塞勒特河一綫的消息。我們获悉,根据上月14日在君士坦丁堡簽訂的条約,奥地利人无疑地即将进入俄軍撤出后的瓦拉几亚。就我們所知,这个在当前情况下对沙皇具有重大的意义的条約,是根据实际上重新指导哈布斯堡王朝对外政策的梅特涅公爵的直接指示簽訂的。”
- 从馬克思的筆記本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在本文中還插进了有关圣阿尔諾的材料,以此来結束他在1854年6月9日的一篇文章(見本卷第285—288頁)中对这个波拿巴派活动家的評述。編輯部把这一部分刪去了。——第303頁。
- 155 指沙俄軍隊1849年参加鎮压匈牙利革命。——第305頁。
- 156 “維也納医学周刊”(«*Wi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是从1851年起在維也納出版的杂志。显然这里馬克思是指1854年上半年在該杂志刊登的未署名的一系列瓦拉几亚通訊和一篇多布魯甲通訊。——第306頁。
- 157 指1854年6月19日上院討論东方問題时阿伯丁为回答林德赫斯特的講話而作的发言。林德赫斯特是当时的托利党反对派的代表,他尖銳地抨击了沙皇政府在对土耳其的关系上的对外政策,并指責联合政府作战不坚决。阿伯丁在发言中替沙皇政府的政策辯护。——第316頁。

- 158 馬克思这里引用的是俄国駐英大使利文公爵和馬士舍維奇伯爵1829年6月13日(1日)給涅謝尔罗迭伯爵的緊急报告。报告全文載于1843年“公文集”第1期第17—19、21頁。——第318頁。
- 159 四国同盟——見注88。——第322頁。
- 160 指1854年6月28日在馬德里发生的軍事政变。从1854年春天起,西班牙国内經濟状况恶化和反动势力橫行霸道激起了人民的不滿情緒;在議會因企图反对政府所頒发的关于提前6个月繳稅的法令而被解散之后,群众的不滿情緒就特別强烈了。軍事政变的领导人奥当奈尔將軍和杜耳塞將軍抱着个人目的力图推翻圣路易斯的專政,他們企图利用群众的这种不滿情緒而不得不答应在征稅方面进行某些资产阶级的改革;他們还答应肃清权奸,召开議會,組織国民軍和进行其他的改革。人民群众参加斗争引起了1854—1856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过程中,以埃斯帕特罗为首的进步派在1854年重新取得了政权。但是,被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吓破胆的资产阶级轉到反革命方面,1856年,极端反动集团又重新执政。——第324頁。
- 161 馬克思看来是指1854年2月在薩拉哥沙的守备部队中发生的起义。——第324頁。
- 162 所謂“著名的布隆采耳战斗”是馬克思对1850年11月8日普奥两国前进部队之間的一次小战斗的諷刺。为爭夺德意志领导权而斗争的普魯士和奥地利,彼此爭夺干涉庫尔黑森内部事务的权利以鎮压那里爆发的起义;由于奥地利得到了沙皇政府的外交支持,普魯士被迫让步。——第326頁。
- 163 維也納照会——見注65。——第327頁。
- 164 俄土两国的阿德里安堡条約(1829年)中的一条規定,俄国軍隊占領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直到土耳其支付賠款为止(占領繼續到1834年)。土耳其必須承认多瑙河各公国的自治权并給予他們自选国君的权利。1831年,莫尔达維亚和瓦拉几亚的貴族和僧侶會議根据沙皇政府所拟

- 定的方案通过了組織規程。按照这个規程，把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給了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議會，而把行政权交給土地占有者、僧侶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終身国君。从前的各种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都保存了下来，政权集中在大地主—农奴主手中。同时，規程列入了若干資產階級的改革：廢除国内关稅，实行貿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允許农民从一个占有者轉到另一个占有者，禁止刑訊。1848年革命时，組織規程被廢除。——第 330 頁。
- 165 巴尔塔利曼尼条約是1849年5月1日(4月19日)俄国和土耳其在两国軍隊前往莫尔达維亞和瓦拉几亞鎮压革命运动时簽訂的公約。按照这个公約，占領制度一直保持到革命的危險完全被消除时为止(外国軍隊直到1851年才撤出多瑙河各公国)，暫時实行苏丹根据同沙皇的協議任命国君的原則，并由俄国和土耳其規定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一旦发生革命，重新实行軍事占領的措施。在这两个公国又恢复了組織規程(見注164)。——第 331 頁。
- 166 从馬克思在1854年7月7日給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多瑙河战争”(在馬克思的筆記本中写为“对錫利斯特里亞的圍攻。續完”)一文曾被馬克思耽擱了几天，7月11日才寄出。——第 334 頁。
- 167 “泰晤士报”記者查·奈斯密斯的6月2日的报道“对錫利斯特里亞的圍攻”載于1854年7月3日“泰晤士报”。——第 335 頁。
- 168 “日报”(«Gaceta»)是西班牙的報紙“馬德里日报”(«Gaceta de Madrid»)的簡称，1661年創刊；是政府的正式机关报。——第 340 頁。
- 169 資產階級自由主义进步派形成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进步派依靠城市的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一部分軍官。他們的基本要求是实现有限的君主制。1854年，由于爆发了資產階級革命(1854—1856年)，以埃斯帕特罗为首的进步派取得了政权。在革命过程中，被人民群众运动的发展吓破胆的进步派，向反革命作了让步，为在西班牙建立反动制度扫清了道路。——第 343 頁。

- 170 指西班牙政府关于提前 6 个月繳納土地稅和工业稅的法令 (1854 年 5 月)。——第 344 頁。
- 171 “科倫日报” (《*Kölnische Zeitung*》) 是德国的日报, 該报从 1802 年起即以此名在科倫出版; 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間以及在后来的反动年代, 該报反映了普魯士自由資產階級的怯懦的和叛賣的政策; 它激烈地反对“新萊茵报”。——第 344 頁。
- 172 指 1854 年 6 月 12 日普魯士首相兼外交大臣曼托伊費尔給駐彼得堡公使威爾特爾男爵的急件。——第 344 頁。
- 173 “施本納报” (《*Spenersche Zeitung*》) 即“柏林政治和学术問題新聞” (《*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 因該报出版者施本納得名, 1740 年至 1874 年在柏林出版。該报遵循君主立憲的方針。——第 346 頁。
- 174 “世紀报” (《*Le Siècle*》) 是 1836 年至 1939 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日报。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 該报反映一部分只要求溫和的立憲改良的小資產階級的观点; 五十年代成为溫和的共和派报纸。——第 347 頁。
- 175 在 1834—1843 年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期間, 1837 年 6 月 18 日通过了新宪法。这个宪法是一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和自由派貴族之間妥協的結果。1837 年的宪法賦予議會独立召开會議的权利, 但同时保留了国王的否決权和解散議会的权利。下院选举資格被放寬, 下院的議員由直接选举产生; 參議院由国王从專門选举团向他提出的名单中任命。宪法承认天主教是西班牙国教。1837 年的宪法存在到 1845 年。——第 352 頁。
- 176 指涅謝尔罗迭伯爵 1854 年 6 月 29 日 (17 日) 給俄国駐維也納的代表哥尔查科夫公爵的急件; 这个急件是俄国政府对奥地利坚决要求俄軍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答复。根据 1854 年 6 月 14 日奧土条約, 这两个公国应由奥地利軍隊占領。馬克思引用的是“比利时独立报” 1854 年 7 月 12 日关于这个急件的报道, 当时这个急件尚未全文发表。——第 352 頁。

- 177 指 1854 年 4 月 20 日的奧普條約。馬克思在“希臘人暴動。——波蘭僑民。——奧地利—普魯士條約。——關於俄國武裝的文件”一文(見本卷第 221—227 頁)中對這個條約作了詳盡的分析。——第 354 頁。
- 178 “奧地利通訊”(«*Oesterreichische Correspondenz*»)是奧地利政府的半官方的石印報紙;1850 年至 1863 年在維也納用這個名稱出版。——第 354 頁。
- 179 指 1854 年 4 月 17 日(5 日)“塞爾維亞政府就奧地利軍隊侵入本公國問題給土耳其政府的備忘錄”。1854 年 6 月 20 日,在下院提出備忘錄的問題,1854 年 6 月 22 日要求公布這個文件的書面質問被送交下院。——第 354 頁。
- 180 德意志聯邦 是根據 1815 年維也納會議的決議成立的。參加聯邦的除了德意志各邦之外,還有藩屬丹麥王國的霍尔施坦公國和尼德蘭國王的領地盧森堡。丹麥國王以霍尔施坦公爵的身分,尼德蘭國王以盧森堡大公的身分參加了德意志聯邦的聯邦議會。——第 356 頁。
- 181 本文最後關於佩特曼案件這一部分以及本卷第 367 頁和第 393 頁馬克思文章的有關部分都是第一次譯成俄文發表的。——第 356 頁。
- 182 馬克思指 1854 年 5—6 月參加在班堡召開的代表會議的許多德意志邦(巴伐利亞、薩克森、漢諾威、維爾騰堡、巴登、庫爾黑森、黑森-達姆斯塔特和拿騷)的代表。他們在這次會議上決定參加 1854 年 4 月 20 日的奧普條約(見本卷第 223 頁)。——第 360 頁。
- 183 “觀察家報”(«*The Observer*»)是英國保守派的日報,1791 年起在倫敦出版。——第 361 頁。
- 184 “辯論日報”(«*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國資產階級日報“政治和文學辯論日報”(«*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簡稱,1789 年在巴黎創刊。七月王朝時期是政府的報紙,是奧爾良派資產階級的喉舌。1848 年革命時期,該報反映所謂秩序黨的反革命資產階級的观点。1851 年政變後是溫和的奧爾良反對派的喉舌。——第 363 頁。

- 185 白厅是倫敦的一个街坊区，是許多政府机关的所在地。——第 366 頁。
- 186 斯庫伊尔斯是狄更斯的小說“尼古拉斯·尼克尔貝的生平和奇遇”中的主人公，是殘忍、貪婪无知和虛伪的典型。——第 366 頁。
- 187 1843 年的政变是納尔瓦艾斯將軍、孔查將軍和其他一些人为了反对进步派領袖埃斯帕特罗的独裁在 5 月发动的反革命軍事叛乱。他們得到一部分不滿意独裁者的政策的进步派的支持。1843 年 7 月 30 日，埃斯帕特罗逃出西班牙；温和派的領袖之一納尔瓦艾斯依靠大土地占有者，当了独裁者。从此在西班牙建立了长期的反动統治，直到 1854—1856 年的革命。——第 368 頁。
- 188 所謂比利牛斯半島的战争或西班牙战争，是英国和法国在 1808 年至 1814 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領土上进行的战争。同时，在整个半島上展开了西班牙人民和葡萄牙人民爭取独立、反对法国占領的战争。——第 368 頁。
- 189 馬克思指 1812 年通过的加迪斯宪法(見注 191)。
1822 年是 1820—1823 年資產階級革命发展中的頂点。在階級斗争日益尖銳的情况下，在 1822 年夏天保皇派的陰謀被粉碎后，革命运动的左派——激进派 (exaltados) 的代表取得了政权，里埃哥是激进派的領袖之一。得到有民主主义傾向的一部分軍官，城市的中、小資產階級，手工业者和工人支持的激进派上台执政，证明了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关于革命軍隊的作用，見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一組文章(本卷第 453—511 頁)。——第 368 頁。
- 190 卡洛斯派是西班牙的反动的教权派专制集团，支持斐迪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卡洛斯派依靠軍閥和天主教僧侶，并利用西班牙某些地区落后农民的支持，在 1833 年至 1840 年发动了国内战争，这个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封建天主教分子和自由資產階級分子之間的斗争，而且导致了第三次資產階級革命。1872 年至 1876 年，卡洛斯派再一次发动了战争，要求由唐·卡洛斯的后裔继承西班牙王位。这次战争也是以他們的失敗而告終。——第 369 頁。

- 191 1812年宪法（加迪斯宪法）是1810—1813年的議會通过的。宪法限制了君主制度，宣布国民是最高权力的体现者，赋予由普选产生的一院制的議會以立法职能。議会在內政和外交方面获得了广泛的权利。宪法規定实行地方自治、累进稅和普遍义务兵役制。各省都組織了地方国民軍；整个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造。宪法虽然实行了西班牙国内生活的民主化，但保持了西班牙对殖民地的統治。在1814年，由于反动派取得胜利，加迪斯宪法被廢除。在十九世紀上半叶，1812年宪法是許多欧洲国家的自由主义立宪运动的一面旗帜。——第369頁。
- 192 关于巴塞罗纳事件的消息于1854年7月19日載于拿破侖第三政府的正式机关报法国“总汇通报”。——第371頁。
- 193 1848年3月，由糾集在“国民报”周圍的温和的資产階級共和派所操纵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巴黎筹办了一些国家工厂，企图使这些工厂的工人成为它在反对革命无产階級的斗争中的支柱。这种分裂工人階級的企图并没有得逞，国家工厂的工人成了1848年六月起义的起义者的核心。——第372頁。
- 194 英国蒸汽巡航舰“老虎号”在偵察黑海海岸时于1854年5月12日在敖德薩附近触礁；該舰遭到炮击，損伤严重，水兵被俘，舰身焚毀。——第388頁。
- 19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和第6卷刊載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 文章。——第392頁。
- 196 暗示帕麦斯頓在1850年英希两国关于英国籍的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事件的冲突中帕麦斯頓所采取的立場。帕西菲科在雅典的住宅被焚毀，当时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頓为此派出一支英国舰队到希腊并向希腊政府提出强硬的最后通牒。帕麦斯頓在議会所作的侵略性发言中，把英国国民比作古羅馬公民，用必須維護英国国民的威信来为他的行动辯解。帕麦斯頓当时所使用的这句话 «civis romanus sum»（“我是羅馬公民”）成了标志特权和羅馬公民所享有的那种崇高地位的公式。——第393頁。

- 197 指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法国殖民者为了征服阿尔及利亚在这个国家所进行的侵略性战争。法軍入侵阿尔及利亚引起了阿拉伯居民的长期的頑强的反抗。法国人以极其殘酷的手段进行战争。到1847年,阿尔及利亚已基本上被占領了,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爭取独立的斗争并未停止。——第399頁。
- 198 錫克教徒 是十六世紀在旁遮普地区(印度北部)产生的教派。錫克教徒关于人类平等的教义成了从十七世紀末叶展开的农民反对印度封建主和阿富汗掠夺者的斗争的思想体系。后来,錫克教徒分化出封建的上层,它的代表领导着这个在十九世紀初包括整个旁遮普和一系列邻近地区的錫克教徒国家。在1845年至1846年和1848年至1849年,英国两度对錫克教徒进行血腥的侵略战争,結果建立了英国在旁遮普的統治,从而使整个印度淪为英国殖民地。
从1811年起,英国断断续續地在开普兰对科薩各部族进行掠夺性的“卡弗尔战争”(卡弗尔人是在十九世紀所通用的对居住在非洲东南部的各部族的統称)。1853年,科薩各部族根据和約被迫割让一部分領土給英国殖民者。——第399頁。
- 199 指1847年瑞士和意大利的运动。它是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先声。見弗·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05—515頁)。——第400頁。
- 200 指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起义。这次起义遭到法国资产阶级的殘酷鎮压。六月起义的失敗是欧洲各国反革命到来的信号。——第400頁。
- 201 西班牙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霍賽·塞貢多·弗洛雷斯的四卷集著作“埃斯帕特罗。他的軍事和政治活动以及他当前的巨大成就的历史”(«Espantero. Historia de Su vida Militar y Política y de los grandes Sucesos contemporáneos»)于1843年在馬德里出版。馬克思引用的是这部著作的第2版;第2版的第1卷和第2卷出版于1844年,第3卷和第4卷出版于1845年。——第402頁。
- 202 艾阿庫裘平原(秘魯)会战是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1810—

- 1826) 中最大的一次会战, 发生在 1824 年 12 月 9 日。在这次会战中, 哥伦比亚和秘魯的軍隊几乎全部消灭了西班牙軍隊。結果建立了独立的玻利維亞共和国并保证了南美洲的独立。——第 402 頁。
- 203 1839 年 8 月 31 日, 卡洛斯派軍隊总司令馬罗托將軍和王国軍隊的統帥埃斯帕特罗在韦尔加拉签订了協議, 結束了西班牙內战。当时卡洛斯派的軍隊被解散了, 而唐·卡洛斯則在 1839 年 9 月 14 日迁居到法国。由于卡洛斯派的加布雷腊將軍企图繼續頑抗, 1840 年 7 月卡洛斯派被彻底击潰。——第 402 頁。
- 204 馬克思显然是指 1840 年在巴塞羅納出版的馬尔利安尼“現代西班牙的政治史”(«Historia política de la España moderna») 一书。——第 403 頁。
- 205 馬克思引证的是休斯的匿名书“1845 年西班牙真相。一个久居西班牙的英国人的作品”1845 年倫敦版第 1 卷第 14 頁(«Revelations of Spain in 1845. By an English resident». London, 1845, v. I, p. 14)。后面馬克思引自同书的第 15—16 頁。——第 403 頁。
- 206 温和派 (*moderados*) 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一派, 它代表大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的利益, 出現于 1820—1823 年資產階級革命的初期。四十一五十年代, 該派的領袖之一是 1843 年反革命軍事叛乱(見注 187) 的組織者和后来为西班牙事实上的独裁者的納尔瓦艾斯將軍。在第四次資產階級革命时期(1854—1856), 温和派反对任何資產階級改良并同最反动的势力妥协。——第 403 頁。
- 207 M. A. Principe, R. Giron, R. Satorres, A. Ribot. «Espantero: su pasado, su presente, su porvenir». Madrid, 1848. ——第 406 頁。
- 208 指 1820 年在英国发生的国王乔治四世和被控告为对丈夫不忠实的卡罗琳娜王后的离婚案。——第 408 頁。
- 209 下面原有“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加的一句話: “让我们的讀者来判断一下, 西班牙革命是否会有积极的結果。”馬克思在 1854 年 11 月 10

日的信中告訴恩格斯，這句話是編輯部加的。——第 408 頁。

- 210 本文是恩格斯應馬克思的請求而寫的一篇軍事評論，是馬克思 1854 年 8 月 8 日寄往紐約的一篇長文章的一部分。然而“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將這一評論作為 8 月 21 日該報的社論發表，而將其餘部分以卡·馬克思的署名發表在同一天的報紙上（見本卷第 412—419 頁）。在本版中，這兩篇文章是按該報原來的形式刊印的。——第 409 頁。
- 211 指 1847 年 10 月成立的極端反動的內閣。這個內閣是西班牙事實上的獨裁者、溫和派的領袖納爾瓦艾斯領導的。——第 414 頁。
- 212 馬克思引證的是 1854 年 8 月 5 日“人民報”登載的厄內斯特·瓊斯的演說。——第 419 頁。
- 213 奧土條約規定奧地利有權在戰時，在俄軍撤出莫爾達維亞和瓦拉几亞後占領這兩個公國。這個條約簽訂於 1854 年 6 月 14 日。——第 421 頁。
- 214 “馬鈴薯戰爭”是人們對奧普之間爭奪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權的戰爭（1778—1779）的諷刺性稱呼。因為，在這次戰爭中幾乎所有的軍事行動都不外是想剝奪對方的糧食儲備。
馬克思在這裡把 1850 年秋天因爭奪德意志的領導權而發生的奧普衝突稱為“馬鈴薯戰爭”（見注 162）。——第 422 頁。
- 215 指俄國軍艦“弗拉基米爾號”在黑海的行動。1854 年 8 月初，“弗拉基米爾號”從塞瓦斯托波爾駛往博斯普魯斯海峽時襲擊了英國輪船“塞克洛普號”，擊沉了幾只土耳其船，它沒有遭到英法艦隊的反击，安然返回了塞瓦斯托波爾。——第 424 頁。
- 216 武裝中立宣言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1775—1783 年）叶卡特林娜二世在 1780 年 3 月 11 日（2 月 28 日）針對英國發表的。宣言中宣布中立國船只在海上以武裝保衛自己免受交戰國的攻擊的權利，中立國與交戰國自由進行貿易的權利，懸挂中立國國旗的敵方財產不可侵犯的原則，宣布只有在被封鎖的港口的入口確已被海軍封閉的情況下，封鎖才有效。這個宣言成了俄國和一系列國家簽訂協定的基礎。從 1780—

- 1783年，丹麦、瑞典、荷兰、普魯士、奥地利、葡萄牙和两西西里王国先后参加了这个宣言。——第425頁。
- 217 “喧声报”（《Le Charivari》）是法国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諷刺性报纸；从1832年起在巴黎出版；七月王朝期間，曾对政府进行过辛辣的抨击；1848年轉入反革命陣营。——第425頁。
- 218 1845年，議會批准关于修改1837年宪法（見注175）的法律；根据新法律，选举資格的限制更为苛刻，王权享有任命参議員的无限权利，廢除了議會毋須君主的特別准許而召开會議的权利，并且議會所审查的問題的範圍由国王确定。——第426頁。
- 219 羅馬教皇庇护九世和西班牙女王伊薩伯拉二世之間的条約簽訂于1851年3月16日并于1851年10月經議會批准。按照这个条約，西班牙王国必須从國庫开支天主教僧侶的經費，停止沒收教会的土地并归还修道院在第三次資產階級革命时期（1834—1843）被沒收的但尚未出賣的那一部分土地。——第426頁。
- 220 所謂“柏林革命者的密謀”是警察当局的挑衅（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1—34頁）。——第427頁。
- 221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魯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組織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的11名成員被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謀”。控告的物证是普魯士警探們假造的中央委员会會議的“原本記錄”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維利希—沙佩尔冒險主义宗派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根据伪造文件和虛假証詞，7名被告人被分別判处3年到6年的徒刑。这个案件的組織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魯士警察国家用来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被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穿了（見恩格斯的“最近的科倫案件”一文和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頁，第457—536頁）。——第427頁。
- 222 維也納照会——見注65。——第428頁。

- 223 指 1841 年 7 月 13 日的倫敦公約(見注 13)。——第 429 頁。
- 224 暗示 1845 年提出的英国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堂弟列奥波特·薩克森-科堡-哥特亲王和西班牙女王伊薩伯拉二世結婚的計劃。这个計劃將加强英国在比利牛斯半島的地位。帕麦斯頓 1846 年担任外交大臣后积极支持这个計劃。这个計劃未能实现(見注 89)。——第 430 頁。
- 225 Chateaubriand. «Congrès de Vérone. Guerre d'Espagne. Négociations. Colonies espagnoles». Bruxelles, 1838, t. I, pp. 112, 119—120, 132—133; t. II, pp. 220—221, 225. ——第 430 頁。
- 226 指美国总統詹姆斯·門罗 1823 年 12 月 2 日向美国国会提出的著名的咨文。这个咨文宣布了旨在反对欧洲强国侵犯美洲国家的所謂門罗主义。后来，門罗主义被美国擴張主义者利用来建立美国在美洲大陆的霸权。——第 430 頁。
- 227 Marliani. «Historia politica de la España moderna». Barcelona, 1840. ——第 431 頁。
- 228 自由貿易派(科布頓是該派的領袖之一)为了英国工业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縮減国家的一切非生产性的行政管理費用。他們认为与占領殖民地和管轄殖民地有关的費用也屬於此类費用。科布頓和其他一些人认为，英国是一个工业最发达的强国，可以用較廉价的商品排挤自己的竞争者，夺取任何市場。——第 432 頁。
- 229 根据 1812 年西班牙宪法第四章規定，西班牙殖民地居民除黑人外，均可取得西班牙国籍并享有和西班牙本国居民同等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本地的代表参加議会的权利。制定宪法的西班牙自由派，企图用殖民地和宗主国的表面上的平等来阻撓当时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日益扩大的独立战争。——第 432 頁。
- 230 “笨拙”(«Punch»)是英国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倫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簡称。1841 年起

在倫敦出版。——第 433 頁。

231 同盟俱樂部是在西班牙 1854—1856 年資產階級革命初期產生的最民主的組織之一。參加這個組織的有共和主義者，而且還有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非格拉斯、彼-依-馬爾格里和奧倫斯等人。這個組織要求普選權和信仰、出版、集會、請願的自由，廢除間接稅和死刑，同時要求武裝全體人民。然而這個綱領完全忽略了土地問題。1854 年底隨着反動勢力的猖獗，俱樂部被封閉（見本卷第 513 頁）。——第 435 頁。

232 1820—1823 年資產階級革命期間，在西班牙除民主俱樂部之外還出現了許多聯合城市資產階級、軍官和城市下層代表人物的秘密協會。這些協會在全國各地擁有善于進行秘密活動的組織和分會，對政府和議會的政策的影響有很大的影響；它們的最著名的活動家有里埃哥、聖米格爾和阿尔普恩特等人。——第 438 頁。

233 科堡-布拉岡薩是葡萄牙的執政王朝。

聯合派是指那些主張在比利牛斯半島建立統一的君主國的人。——第 438 頁。

234 恩格斯在寫關於博馬爾松德的奪取這兩篇文章時，正如他本人所指出的那樣，他掌握的關於戰事的進程的消息很有限，同時關於阿蘭群島上的這個俄國要塞的材料也極不完備。因而關於奪取博馬爾松德的許多情節在恩格斯的這兩篇文章中都沒有提到。

儘管要塞工程尚未完工（只完成全部工程的五分之一），而且敵人在兵力和火炮方面擁有近十倍的優勢，但要塞圍攻戰仍繼續了一個多月左右。要塞的守軍在 6 晝夜內擊退了一切猛烈的攻擊，使圍攻的英法軍隊遭到巨大的損失，只是在接到統帥部的命令後才投降。攻擊這個要塞的行動證明英國軍方已放棄直接進攻喀琅施塔得的計劃。1854 年 8 月 16 日（4 日）攻克博馬爾松德只是聯軍暫時的戰術勝利，這對波羅的海軍事行動的進程並不發生重大的影響，總的說來，波羅的海的戰事仍然勝負未分。

本文和下一篇文章以同一個標題載於“紐約每日論壇報”，副標題是蘇聯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加的。——第 442 頁。

- 235 沃邦“要塞圍攻法”(Vauban. «Traité de l'attaque des places»)。
該書于 1739 年在巴黎出版，是“要塞的圍攻法和防守法”(«Traité de l'attaque et de la défense des places»)兩卷本的第一部分。——第 445 頁。
- 236 道格拉斯“海軍炮兵論”(Douglas. «A Treatise on naval gunnery»)。
1820 年在倫敦發行第一版。——第 448 頁。
- 237 “革命的西班牙”這一組文章是馬克思在 1854 年 8—12 月給“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写的。馬克思當時密切注視着歐洲革命運動的一切征兆，他非常注意 1854 年夏季在西班牙發生的事件；他認為西班牙的革命鬥爭能夠推動歐洲其他國家革命運動的發展。為了更好地了解新的西班牙革命的特殊性質和特點，馬克思仔細地研究了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西班牙革命歷史；馬克思摘錄英國、法國和西班牙作者的著作的 5 本筆記本被保存下來了。從馬克思的筆記本可以看出，他共寄給“紐約每日論壇報”11 篇涉及第一次(1808—1814)、第二次(1820—1823)和第三次(1834—1843)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文章。“紐約每日論壇報”只刊載了其中的前 8 篇(1820 年以前的)。其餘 3 篇論述 1820—1822 年事件和 1833 年事件的文章沒有發表。在沒有發表的文章中目前保存下來的只有論述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失敗原因的手稿片斷，載于本卷第 669—672 頁。——第 453 頁。
- 238 神聖同盟戰爭(1520—1522)是加斯梯里亞城市(自治城市)反對查理一世專制制度的起義。起義最初帶有爭取保持城市的封建特權的性質，從 1521 年起，由於城市下層群眾和部分農民被吸引到運動中來，起義具有反封建的性質。1520 年 7 月在阿維拉成立了起義城市的神聖同盟(即洪達)，9 月同盟被迫遷到托爾特西亞斯，11 月又遷到伐利亞多利德，在那裡成立了議會。參加議會的有 10 個城市的代表。——第 456 頁。
- 239 在馬克思摘有西班牙問題的材料的一本筆記本的首頁上，馬克思會親筆記下了他所研究過的部分著作。現將能辨認出的原文刊在下面并譯成中文：

(Campomanes. Jovellanos)

London. 1854. May. June. July.

- (1) *Parish* (H. H.)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Monarchy of Greece. London, 1838.
- (2) *Thierry*. (A.)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formation et du progrès du Tiers Etat. 2nd ed. 2 vol. Paris 1853.
- (3) *Una Plumada sobre la Indole y Tendencia de la Revolucion en España*. Madrid. 1846.
- (4) *Révolution d'Espagne. Examen critique, 1820—1836*. Paris. 1836.
- (5) *The Crisis of Spain*. 2^d edit. London. 1823.
- (6) *Revelations on Spain in 1845*. 2 vol. London. 1845.
- (7) *Señor de Marlioni*. Historia Politica de la España Moderna. Barselona. 1849.
- (8) *Principe. Espartero, su Passado etc*. Madrid. 1848.

(康波曼內斯。霍韦利亚諾斯)

1854年5、6、7月于倫敦

- (1) 帕里什(H. H.)。希腊君主国的外交史。1838年倫敦版。
- (2) 梯叶里(奥·)。第三等級的形成和发展史。1853年巴黎第2版第2卷。
- (3) 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性质和趋向的札記。1846年馬德里版。
- (4) 西班牙革命, 評論。1820—1836年。1836年巴黎版。
- (5) 西班牙危机。1823年倫敦第2版。
- (6) 1845年西班牙真相。1845年倫敦版第2卷。
- (7) 德·馬尔利安尼先生。現代西班牙政治史。1849年巴塞羅納版。
- (8) 普林西佩。埃斯帕特罗, 他的过去等等, 1848年馬德里版。——第457頁。

240 西班牙地方自治机关(Ayuntamiento), 在雷允吉斯达——西班牙推翻阿拉伯人統治的斗争(八一十五世紀)——时期曾起过很大的政治作用。在十六世紀自治城市起义被鎮压以后(見注238), 地方自治机关基本上被取消了。恢复地方自治机关是十九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时期提出的民主要求之一。1812年的宪法和1820年議會會一度恢复地方自治机关。——第459頁。

241 指 1518 年 1—2 月在伐利亚多利德召开的加斯梯里亚議會，这个議會应当批准查理为加斯梯里亚国王，宣誓效忠于查理，同时接受查理遵守法典(見注 266)的誓言。

这里是馬克思的笔誤：議會是在查理被选为国王(1519)和他去德国即位(1520)以前召开的。——第 460 頁。

242 圣友会，即神圣的埃尔曼达德是十五世紀末叶由西班牙王权建立的西班牙城市联盟，目的是利用資產階級来反对大封建主，以維護专制制度的利益。从十六世紀中叶起，神圣的埃尔曼达德的武装力量执行警察的职能。——第 460 頁。

243 1808 年 7 月西班牙貴族的代表在法国貝云城召开會議(貝云議會)，通过拿破侖第一为西班牙制訂的宪法。根据宪法，国王(約瑟夫·波拿巴)得到了几乎无限的权力。他指定西班牙貴族代表参加新建立的參議院并任命了近半数的議會議員。根据宪法規定，实行公开审讯，廢除刑訊，取消国内关税。天主教被承认为唯一的国教。由于通过了使波拿巴王朝在西班牙的統治得到巩固的貝云宪法，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領者的解放斗争加剧了，資產階級革命(1808—1814)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个革命过程中，加迪斯的革命議会在 1812 年通过了資產階級的自由主义宪法(見注 191)。——第 463 頁。

244 下面有一句“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加的話：“我們希望，西班牙人民載入史册的新的一頁，将无愧于西班牙人民，而且将会給西班牙人民，以至于給全世界带来良好的結果。”(見 1854 年 11 月 10 日卡·馬克思給弗·恩格斯的信)——第 464 頁。

245 “約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軍事問題的回忆录和通信集” 1853—1854 年巴黎版(«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Paris, 1853—1854)。秘密条約据說是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侖第一在提尔西特簽訂的，第 4 卷(第 246—247 頁)引用的秘密条約的原文是从 1812 年 8 月 25 日馬德里“日报”引来的。

無論 1807 年 7 月 7 日(6 月 25 日)俄法簽訂的提尔西特条約或是补充这个条約的秘密公約，都沒有这样的条文。——第 465 頁。

- 246 指西班牙参加第一次反共和制法国的同盟战争 (1793—1795)。1793年西班牙军队在取得某些胜利以后,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西班牙因而被迫于1795年7月同法国签订了单独和约。——第466页。
- 247 罗·沙赛:“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史”三卷集,1823—1832年伦敦版(R. Southey. «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War», 3 vol., London, 1823—1832)。马克思引的是第1卷第301页。——第467页。
- 248 卡尔尼塞鲁“拿破侖,即欧洲的真正唐·吉珂德,即对拿破侖和他的哥哥約瑟夫的各种敕令的批判的、爱国的、諷刺的評論,共分两部分,五十章,一个热爱祖国的西班牙人的著作”1813年馬德里版第1—6卷(Carnicero: «Napoleón o El verdadero D. Quixote de la Europa, o sean Comentarios critico-patriotico-burlescos a varios decretos de Napoleón y su hermano José, distribuidos en dos partes y cincuenta capitulos y escritos por un español amante de su patria». V. 1—6. Madrid, 1813); “評光榮的西班牙革命的主要事件的历史”1814—1815年馬德里版第1—4卷(«Historia razonada de los principales sucesos de la gloriosa revolucion de España». V. 1—4, Madrid, 1814—1815); “合法地恢复宗教裁判所和駁廖倫特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大事記’一书”1816年馬德里版第1、2卷(«La Inquisición justamente restablecida e impugnación de la obra «Anales de la Inquisición en España» por Llorente». V. 1—2, Madrid, 1816)。——第468页。
- 249 指1795年在馬德里第一次出版的霍韦利亚諾斯写的报告“馬德里經濟协会致加斯梯里亚最高王政會議的关于土地法的备忘录”(«Informe de la sociedad económica de esta corte al real y supremo Consejo de Castilla en el expediente de ley agraria»)。马克思引用的是1839—1840年在巴塞罗纳出版的霍韦利亚諾斯8卷文集的第7卷。——第468页。
- 250 西斯蒙第“論南欧文学”,1813年巴黎—斯特拉斯堡版第4卷第258—

- 259 頁 (Sismondi. «De la Littérature du Midi de l'Europe», t. 4, Paris—Strasbourg, 1813, p. 258—259)。——第 470 頁。
- 251 反对法国占領者的比尔巴鄂人民起义发生在 1808 年 8 月。起义遭到梅尔兰將軍的殘酷的鎮压，他的軍隊曾以强攻夺下这个城市。——第 472 頁。
- 252 拿破侖和亚历山大一世于 1808 年 9 月 27 日—10 月 14 日在爱尔福特会晤。巴伐利亚、薩克森、維尔騰堡的国王和其他許多討好拿破侖的德国君主出席了談判期間举行的庆祝会。——第 473 頁。
- 253 馬克思指的是法国国民公会式的代表會議，国民公会是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在 1792 年 8 月 10 日人民起义之后建立的。国民公会是由全国所有男性居民(家僕除外)选举的，共有 750 个代表。在雅各宾党专政时期(1793 年 6 月 2 日—1794 年 7 月 27 日)，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国民公会廢除了法国的封建关系，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执行了革命的恐怖政策。1794 年 7 月 27 日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公会变成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工具。1795 年 10 月国民公会被解散。——第 473 頁。
- 254 这句被认为是培根說过的話引自西班牙历史学家托雷諾“西班牙起义，战争和革命的历史” 1838 年巴黎版第 1 卷第 278 頁 («Historia del levantamiento, guerra y revolucion de España», t. I, Paris, 1838, p. 278)。——第 474 頁。
- 255 耶穌会教徒在 1767 年被驅逐出西班牙；这个决定是根据西班牙王政會議檢察长弗洛里达布朗卡的建議而采取的。——第 475 頁。
- 256 馬克思引自 1703 年在維也納出版的西班牙僧侶貝尼托·索勒达的著作“历史和政治紀要，揭示篤信基督教的路易十四的思想，以使西班牙摆脱因合法国王查理三世而蒙受的不幸” («Memorial historico y politico, que descubre las ideas del Christianissimo Luis XIV, para librar a España de los infortunios, que experimenta por medio de su legitimo Rey Don Carlos

- III)》。——第 478 頁。
- 257 馬克思指十三世紀西班牙制訂的共分 7 部分 (las Partidas) 的法典的有关的章节; 从十四世紀起这个法典被称为“巴尔吉特”。——第 479 頁。
- 258 Toreno. «Historia del levantamiento, guerra y revolucion de España», Paris, 1838, t. I, p. 374. ——第 480 頁。
- 259 馬克思引自中央洪达 1809 年 10 月 28 日的告西班牙人民书。——第 482 頁。
- 260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社会拯救委员会) 是 1793 年 4 月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在雅各宾党专政时期 (1793 年 6 月 2 日—1794 年 7 月 27 日), 社会拯救委员会在同国内外反革命进行斗争中和用平民的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热月 9 日反革命政变后, 委员会丧失了自己的领导作用, 并在 1795 年 10 月被解散。——第 482 頁。
- 261 普腊德“西班牙革命史回忆录” 1816 年巴黎版第 224 頁 (Pradt, «Mémoires historiques sur la révolution d'Espagne», Paris, 1816, p. 224)。后面引自该书 202—203 頁。——第 483 頁。
- 262 718 年西班牙军队在卡瓦丹加山谷 (阿斯土里亚山区) 打败了阿拉伯人。这一胜利的结果, 在阿斯土里亚山区出现了一个不大的独立国家, 它成为反对阿拉伯占领者的堡垒之一。
在索勃拉尔貝, 即阿拉貢北部山区的一块不大的地方, 继阿斯土里亚之后, 不久也出现了一个反抗阿拉伯占领者的地区。——第 489 頁。
- 263 *Mita* ——强迫印第安人到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的金矿和银矿劳动。
Repartimiento ——以抽签的方法定期重新分配村社土地; 1813 年 1 月 4 日的法令废除了 *repartimiento*, 村社的土地因而变为私有财产。——第 494 頁。
- 264 资产阶级制宪议会通过的 1791 年宪法确立了法国的君主立宪制并保证了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利益。宪法给予国王全部行政权和否

- 决权；宪法把公民划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这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居民的政治权利。这个宪法被 1792 年 8 月 10 日的人民起义所废除。人民起义曾推翻了王权。——第 494 頁。
- 265 普腊德 “現代的西班牙革命及其后果” 1820 年巴黎—卢昂版第 177—178 頁(Pradt. «De la révolution actuelle de l'Espagne, et de ses suites». Paris—Rouen, 1820, p. 177—178)。——第 494 頁。
- 266 法典 是中世紀的西班牙規定在自治、司法、課稅和兵役等方面給予城市和村鎮特殊权利和特权的文献。法典限制了封建的专橫，同时促进了地方割据的发展。——第 494 頁。
- 267 指 1793 年 4 月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3 年雅各宾党宪法的导言——第三十五条。这一条規定：“如果政府破坏人民的权利，起义即为全体人民和任何一部分人民的最神圣的权利和最必要的义务。”——第 494 頁。
- 268 奴才派 (*serviles*) 是西班牙反动的教权派专制集团的綽号。这个集团在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1808—1814)期間反对任何資產階級的改革并維護专制的君主政体；以后，奴才派成为斐迪南七世的宮廷权奸，而在斐迪南七世的晚年，該派又把自己的利益和斐迪南七世的弟弟唐·卡洛斯結合在一起。
- 自由派代表西班牙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的利益，提出以 1812 年宪法(見注 191)为綱領。
- “美洲派”是对居住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在議會里的一小撮代表的称呼。“美洲派”在議會里时而支持奴才派，时而支持自由派，不起什么重大作用。——第 500 頁。
- 269 天主教会的 特里延特會議 于 1545—1563 年在特里延特和博洛尼亚开会。會議譴責新教并通过一系列有关天主教会的決議，其中包括宣布教皇的权力高于會議的权力并加强了主教的权力。这个會議的決議成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封建的天主教反动派的拥护者的綱領。——第 500 頁。

- 270 拉查罗尼是意大利游手好閑的流氓无产階級分子的綽号；他們不止一次地被反动的君主专制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第 501 頁。
- 271 埃·圣米格尔“西班牙內战”1836 年馬德里版 (E. San Miguel. «De la guerra civil en España», Madrid, 1836)。——第 507 頁。
- 272 斐迪南七世回国后,自 1814 年 5 月起,在西班牙建立了反动統治,消灭了 1808—1814 年資产階級革命的一切成果；革命志士被投入監獄,部分革命志士被处死。
1822 年 3 月 1 日,在 1820—1823 年資产階級革命过程中,根据 1812 年宪法选出的議會召开了會議；資产階級激进派的代表在議會里占多数(見注 189)。——第 509 頁。
- 273 1812 年 7 月 20 日(8 日),俄国政府和加迪斯議會代表在韦利基耶魯基就俄国和西班牙在反对拿破侖法国的战争中的友好同盟关系以及恢复和发展两国之間的貿易关系問題簽訂了一个条約。俄国在这个条約上簽了字,从而也就承认了加迪斯議會和它制訂的宪法的合法性。——第 509 頁。
- 274 指匿名书“对 1820—1823 年和 1836 年西班牙革命的批判的分析”(«Examen critique des révolutions d'Espagne de 1820 à 1823 et de 1836»)的作者,該书于 1837 年在巴黎出版,共两卷。——第 510 頁。
- 275 見注 226。——第 510 頁。
- 276 引文摘自馬丁雅克“1823 年西班牙革命和干涉的历史概述”1832 年巴黎版第一卷 (Martignac. «Essai historique sur la révolution d'Espagne et sur l'intervention de 1823», Paris, 1832)。“西班牙及其革命”一书是馬尔利安尼著的。——第 511 頁。
- 277 本文的标题是采用“紐約每日論壇报”的标题。在馬克思的筆記本中,本文的标题是“西班牙的革命”。——第 512 頁。
- 278 馬克思引证休斯的一本书(見注 205)。——第 515 頁。

- 279 1852年1月22日路易·波拿巴下令沒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第520頁。
- 280 馬克思把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1556—1598),菲力浦三世(1598—1621),菲力浦四世(1621—1665)的統治时期称之为菲力浦时代。——第522頁。
- 281 統計材料引自1854年9月9日“經濟学家”杂志第576期。——第531頁。
- 282 指1842年在英国实行的有利于工业资产阶级的稅率改革。这次改革降低了粮食和許多其他进口商品的进口稅。——第533頁。
- 283 1815年6月16日,拿破侖的軍隊和普魯士元帅布呂歇爾統率的普魯士軍隊在利尼(比利时境内)附近发生了会战。普軍虽然战敗,但布呂歇爾率領他的軍隊摆脱了法軍的追击,与在滑铁卢和法軍主力进行激战的英荷联軍会合。法軍本已胜利在望,但由于普軍的来到终于失敗。——第539頁。
- 284 1851年12月1日午夜,埃斯潘納斯指揮的团的一个营奉命担任国民議会的警卫;埃斯潘納斯受了波拿巴主义者的賄賂,于12月2日派兵占領了国民議會开会的大厦,从而促成了路易·波拿巴的政变。——第539頁。
- 285 原稿上的 Lower Empire [沒落帝国]一詞在历史文献上是指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羅馬帝国,現在已泛指处于沒落腐朽阶段的国家。——第540頁。
- 286 指路易·波拿巴企图在1840年8月6日发动政变。他利用在法国波拿巴主义情緒的某种程度的抬头,率領一小撮阴謀家在布倫登陆,企图在当地守軍中煽起暴动。这个企图結果破产了,波拿巴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在1846年逃往了英国。——第542頁。
- 287 指第五次反拿破侖法国的同盟战争期間英国舰队于1809年远征些耳德河口。英軍在占領伐耳赫倫島以后,未能扩大战果,四万名登陆部队因飢餓和疾病損失了一万人左右,因而被迫从伐耳赫倫島撤退。——

第 544 頁。

- 288 罗多芒特 是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一詩中的主人公之一，善于吹牛。——第 549 頁。
- 289 在这一号“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刊登了拿破侖第三对軍隊講話的消息。本段可以证明“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篡改过恩格斯所写的文章。——第 550 頁。
- 290 指 1852 年 5 月 8 日由俄、奥、英、法、普、瑞典等国代表和丹麦代表共同簽訂的关于丹麦君主国的領土完整的倫敦議定书。条約的基础是 1850 年 7 月 4 日上述倫敦會議参加国（除普魯士以外）通过的議定书，該議定书規定了丹麦王室的領地（包括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在內）的不可分割的原則。倫敦議定书中提到，俄国皇帝（作为曾經以彼得三世这个名字統治过俄国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的卡尔·彼得·烏尔利希公爵的后裔）是丹麦王位的合法追求者之一，这些追求者放棄了自己的权利，让位給那个被宣布为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格呂克斯堡王朝的克里斯提安公爵。这給俄国沙皇在将来一旦格呂克斯堡王朝中断时要求继承丹麦王位提供了口实。——第 557 頁。
- 291 指拿破侖第三于 1854 年 10 月 3 日发布的命令。按照这个命令，因参加 1848 年 5 月 15 日巴黎群众的革命活动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法国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阿·巴尔貝斯（从 1850 年起他就被关入貝耳島上的監獄）被无条件釋放。发布这个命令的理由是截获了巴尔貝斯在 1854 年 9 月 18 日所写的一封私人信，巴尔貝斯在信中表示欢迎对俄国作战并“为了文明”而祝願法軍胜利。1854 年 10 月 5 日的“总汇通报”刊登了命令的全文和信的摘要。巴尔貝斯获釋后在 1854 年 10 月 11 日給“通报”編輯部写了一封信，他承认那封信确实是他写的，同时声称“法兰西的偉大始終是他的信仰”，但是又說他过去和現在始終都是波拿巴政体的敌人。此信曾載于民主派的报刊，例如 1853—1855 年由小資产階級流亡者先后在澤梭島和倫敦出版的周报“人。世界民主主义报”（«L'Homme. Journal de la democratie universelle»）也于 1854 年 10 月 18 日刊載了此信。此后不久巴尔貝斯离开法国，不再

参加政治活动。——第 559 頁。

- 292 “塞瓦斯托波尔的騙局。——概評”这篇文章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4 年 10 月 5—6 日写的一篇文章的一部分；文章的另一部分作为社論載于同一天的“紐約每日論壇报”（見本卷第 551—555 頁）。“塞瓦斯托波尔的騙局。——概評”一文登載时没有署名，因为报纸編輯部从 1854 年 9 月起登載馬克思的所有文章都不署名，馬克思在 1854 年 9 月 29 日写信給恩格斯談到过这一点。

“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在这篇文章最后加了一段：“关于一支美国舰队，即两艘巡航舰、三艘輕巡航舰和两艘蒸汽舰为了贏得对美国的让步而进入薩馬納海湾，以及关于另一支舰队从紐約开赴格雷敦的消息是英国人从牙买加島获悉并刊登在倫敦‘泰晤士报’上。200 名被囚禁的俄国軍官、兵士和他們的家眷被押送到戴文郡的一个監獄。海軍陆战队的兵士，不論在海上或陆上，現在都允許留鬍子。女王和她的宮廷現在在苏格兰群山中的巴尔莫拉尔。10 月 4 日特派信使把一份关于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电报送到巴尔莫拉尔，这个消息轰动了王宮。在博馬尔松德附近繳获的可供 2 000 名兵士使用的武器已交到倫敦塔軍火庫。”——第 559 頁。

- 293 西班牙的英籍軍团 是卡洛斯派战争期間（見注 190）在英国招募来援助瑪麗·克里斯亭娜政府的部队的名称，共約有一万人，在伊文思將軍的指揮下参加了 1835—1837 年的軍事行动。——第 561 頁。

- 294 指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皮蒙特軍队和奥地利軍队在意大利北部进行的战斗。——第 562 頁。

- 295 拿破侖第一的軍队和俄普联軍之間的呂特岑（薩克森地区）会战发生在 1813 年 5 月 2 日（4 月 20 日）。联軍和法軍在包岑城（薩克森地区）会战发生在同年 5 月 20—21 日（8—9 日）。在这两次会战中，拿破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迫使俄普联軍退却；正像在其他場合一样，这次退却秩序井然。

法軍和俄普联軍的卡茨巴赫河会战发生在 1813 年 8 月 26 日（14 日）。由于布呂歇尔采取了巧妙的策略，法軍遭到慘敗。——第 564 頁。

- 296 恩格斯在这里使用英国资产者和法国农民的諷刺性綽号来諷刺英法两国的庸俗的居民阶层。——第 566 頁。
- 297 朗卡斯特炮 是以其发明者的名字命名的英国八英寸橢圓形螺旋膛火炮。朗卡斯特炮首次被英国人用于克里木战争；以后没有被广泛使用。——第 575 頁。
- 298 本文开头和許多其他地方均被“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直接篡改过，其目的是要使在該报作为社論发表的恩格斯的軍事論文具有在美国所写的文章的特点。馬克思 1854 年 4 月 22 日写信給恩格斯时早已指出过这一点。他說：“用你写的軍事論文来自我吹嘘已經成了編輯部的‘合法的’做法。”——第 577 頁。
- 299 这里例举的是几次最激烈的会战，在这些会战中俄国軍队表现了高度的勇敢和坚强。
- 1758 年 8 月 25 日(14 日)俄普軍队的措尔恩多夫会战是七年战争(1756—1763)中的大会战之一。普軍的多次进攻都因俄軍的頑强反击而失敗。俄軍以反攻和炮兵的火力使敌人遭到严重的損失。
- 1807 年 2 月 7—8 日(1 月 26—27 日)法俄軍队的普略西什-埃劳(东普魯士)会战是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争中最殘酷的会战之一。拿破侖虽然損失惨重，但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 1812 年 9 月 7 日(8 月 26 日)的博罗迪諾会战是 1812 年卫国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会战。俄国軍队在这次会战中表现了高度的战斗素质并使法軍遭到重大損失；会战的結果为战争向有利于俄国的方向发展 and 拿破侖軍队失敗准备了条件，尽管俄軍当时被迫放棄了莫斯科(在当时条件下这种做法是适宜的)。——第 579 頁。
- 300 本文以“东方战争”的标题載于“紐約每日論壇报”。
- 文章的第一段被編輯部篡改过。——第 586 頁。
- 301 本文的第一段和結尾被“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篡改过。——第 594 頁。
- 302 阿耳布埃拉(西班牙)会战是 1811 年 5 月 16 日貝雷斯福德率領的圍攻被法軍占領的巴达霍斯要塞的英軍和前去援救要塞的苏尔特元帅的法

軍之間發生的戰爭。這次會戰以拿破侖軍隊的失敗而結束。——第 596 頁。

303 “俄國殘廢者”是陸軍部的機關報，從 1813 年至 1917 年在聖彼得堡出版，從 1816 年起為日報。——第 600 頁。

304 1805 年 12 月 2 日(11 月 20 日)俄奧軍隊(第三次同盟)和法軍之間的奧斯特利茨會戰以拿破侖第一的勝利而告終。

普略西什-埃勞會戰。見注 299。——第 601 頁。

305 從馬克思的筆記本中可以看出，本文結尾原有一節論述 1854 年 12 月 2 日簽訂的英、法、奧三國同盟條約的文字。根據這個條約，三國不得單獨同俄國談判和不允許俄軍佔領多瑙河各公國。同俄國談判的基礎應當是著名的四項條款(見本卷第 646—651 頁)。——第 606 頁。

306 1854 年 12 月 2 日是路易·波拿巴政變三周年和他稱帝的二周年；路易·波拿巴把以上事件正好安排在拿破侖·波拿巴宣布為法國皇帝的紀念日(1804 年 12 月 2 日)和同它重日的奧斯特利茨會戰紀念日(1805 年 12 月 2 日)。——第 607 頁。

307 關於邊屯區居民 見注 84。——第 618 頁。

308 卡·馬克思從本文開始為德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日報“新奧得報”撰稿。這家報紙從 1849 年至 1855 年用這個名稱在布勒斯勞(弗羅茨拉夫)出版。

由於從 1846 年開始出版的反對派天主教的“奧得總匯報”的編輯部發生分裂，1849 年 3 月創辦了“新奧得報”，它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傾向。五十年代，它被認為是德國最激進的報紙並遭到政府機關的迫害。

五十年代初，編輯部的領導人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埃爾斯納、泰梅和施泰因等人，摩里茨·埃爾斯納從 1855 年 1 月起是“新奧得報”的編輯之一，從 9 月起是該報主編；報紙的出版者是德國政論家，斐·拉薩爾的表兄弟麥克斯·弗里德蘭德。馬克思通過拉薩爾的介紹為該報撰稿。1855 年，馬克思作為倫敦通訊員每周寄給“新奧得報”兩三篇通訊。在反動年代幾乎沒有工人的報刊的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

重視利用資產階級民主派報刊來和反動勢力進行鬥爭；給“新奧得報”撰稿使馬克思有可能同德國保持聯繫，并向德國讀者介紹國際和國內政治、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以及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是英國和法國的經濟發展的最重大的問題。在克里木戰爭時，馬克思經常寄給“新奧得報”有關戰事進程的文章；在闡述戰爭進程時，馬克思有時把恩格斯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軍事評論全部譯成德文加以利用；有時，馬克思把恩格斯的文​​章加以壓縮後寄給“新奧得報”，有時還對這些文章作一些修改和補充。

本卷刊載了“新奧得報”發表過的十二篇馬克思的文章和一篇恩格斯的文​​章；這家報紙發表過的絕大部分文章載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

本文以“回顧”(«Rückblicke»)為標題載於“新奧得報”。——第 620 頁。

- 309** 指沙皇接受向它提出的四項條款(見注 321)後，英、法、奧、俄四國代表於 1854 年 12 月至 1855 年 1 月在維也納召開的會議。談判因沙皇拒絕接受西方國家在會上提出的關於限制俄國在黑海的海軍力量的要求而失敗。——第 620 頁。
- 310** 招募外國人服役的法案規定要建立 15 000 人的軍團。這個法案是陸軍大臣紐卡斯爾為了補充克里木的英國軍隊於 1854 年 12 月 12 日向議會提出的。這個法案於 12 月 22 日被議會通過並得到女王的批准。但是，由於國內人民紛紛起來反對在戰爭中使用外國僱傭軍隊，外籍軍團未能建成。——第 621 頁。
- 311** 1854 年 5 月，議會通過了關於將民軍服役期延長到戰爭結束的法案。在英國，民軍是按郡征集的志願部隊，服役期為 6 年。1907 年，民軍經過改組而成為正規軍的一部分。——第 621 頁。
- 312** 普軍和法軍的耶拿會戰發生於 1806 年 10 月 14 日，以普軍的潰敗而結束。——第 624 頁。
- 313** 1643 年 5 月 19 日，在三十年戰爭(1618—1648)時期的羅克魯阿(比利時邊境上的法國要塞)會戰中，圍攻要塞的西班牙軍隊全軍覆沒。一

- 向被认为是无敌的西班牙步兵的失败使战争进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第 625 頁。
- 314 見注 52 和 90。——第 629 頁。
- 315 指英、俄、奧、普四国于 1840 年 7 月 15 日簽訂的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反对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利(見注 53)的倫敦公約。簽訂这个公約并没有让支持穆罕默德的法国参加,这使法国面临形成反法同盟的威胁,而不得不放棄了对埃及执政者的支持。——第 629 頁。
- 316 “把猫头鷹运到雅典去了”是希腊的諺語,同俄国諺語“带茶炊到土拉”意思相近。在雅典及其城郊猫头鷹非常之多。——第 639 頁。
- 317 和平协会是教友会派于 1816 年在倫敦成立的资产階級和平主义組織。这个协会得到自由貿易派的积极支持。自由貿易派认为,英国在和平的条件下可以借助于自由貿易更充分地發揮它的工业优势并取得經濟和政治的霸权。——第 640 頁。
- 318 指 1806—1812 年的俄土战争和 1828—1829 年的俄土战争。——第 641 頁。
- 319 曼彻斯特学派——見注 38。——第 643 頁。
- 320 馬克思指的是在曼彻斯特出版的英国自由派报纸“观察家时报”(«Examiner and Times»)。該报是 1848 年由“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和“曼彻斯特观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两家报纸合并成的。在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該报支持自由貿易派;以不同的名称出版到 1894 年。——第 643 頁。
- 321 指西方强国在 1854 年 8 月 8 日的照会中向俄国提出的作为开始和談的先决条件的要求。俄国应当放棄对莫尔达維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維亚的保护权,代之以全欧的保证;允許多瑙河上的航行自由;同意修改 1841 年倫敦海峽公約并放棄对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沙皇政府最初拒絕接受这四項条款,1854 年 11 月终于被迫同意把这四項条款作为以后和談的基础。——第 646 頁。

- 322 見注 65。——第 646 頁。
- 323 見注 13。——第 647 頁。
- 324 在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时期，波兰革命者曾在华沙夺得康斯坦丁大公的档案庫，其中有許多沙皇外交的秘密文件。一部分載于 1835—1836 年出版的“公文集”，一部分載于 1854 年在巴黎出版的 «Recueil de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 一书。1825 年 10 月 16 日（4 日）波茨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載于該书第 4—47 頁。——第 647 頁。
- 325 印刷所广场 是倫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总編輯部所在地。——第 649 頁。
- 326 見注 71。——第 649 頁。
- 327 “星期日时报” («*The Sunday Times*») 是英国的一家周报，从 1822 年起在倫敦出版；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是輝格党的机关报。——第 650 頁。
- 328 “先驅” («*The Leader*») 是英国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周报；1850 年在倫敦創刊。——第 650 頁。
- 329 “观察家” («*The Examiner*») 是英国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周刊，1808 年至 1881 年在倫敦出版。——第 650 頁。
- 330 根据俄、英、法三国针对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于 1827 年 7 月 6 日簽訂的倫敦公約的第五條，締約国不得进行任何的領土擴張，不得单独設法取得其他两国所沒有同时得到的貿易上的权利或特权。
- 根据 1829 年簽訂的結束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的阿德里安堡条約，俄国得到了多瑙河口的島屿，这个条約还保证了各强国的船舶在多瑙河的航行自由。
- 1836 年 3 月 2 日（2 月 19 日）沙皇政府命令在多瑙河的苏利納河口建立檢疫所，它实际上执行海关的任务。——第 651 頁。

- 331 指 1853 年 9—11 月“紐約每日論壇報”刊載的馬克思的文章“政治态度。——歐洲缺糧”、“西方列強和土耳其。——經濟危機的征兆”、“戰爭。——罷工。——生活費用上漲”。(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341—349、360—371、491—500 頁)。——第 655 頁。
- 332 見注 91。——第 657 頁。
- 333 見注 53。——第 660 頁。
- 334 Douglas. «A Treatise on Naval Gunnery», London, 1855. ——第 661 頁。
- 335 指 1854 年 12 月 30 日法國立法團通過的發行 5 億法郎公債以彌補戰爭開支的決定。——第 662 頁。
- 336 “太陽報”(«The Sun») 是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日報, 1798 年至 1876 年在倫敦出版。——第 664 頁。
- 337 見注 305。——第 665 頁。
- 338 從馬克思的筆記本中可以看出, 馬克思在 1854 年 11 月 14 日、21 日和 12 月 8 日先後把“革命的西班牙”一組文章中的三篇文章寄給“紐約每日論壇報”, 它們的標題是“1820—1822 年 7 月的西班牙”、“西班牙。武裝干涉”和“西班牙。1833 年”。這三篇文章都沒有見報。這裡發表的片斷是 1854 年 11 月 21 日寄出的文章的一部分。——第 669 頁。
- 339 馬克思把里埃哥 1823 年的進軍稱之為第二次加迪斯遠征。1823 年 8 月, 里埃哥從被法軍包圍的加迪斯到達馬拉加, 打算從這裡衝到卡塔盧尼亞, 當時米納將軍正在那裡和干涉者進行頑強的鬥爭。里埃哥試圖將已經停止抵抗的巴列斯帖羅斯軍隊帶走, 但未能成功, 於是他率領一小支部隊向卡塔黑納且戰且走。在赫雷斯城下, 他的部隊被兵力強大得多的法軍擊潰; 9 月 15 日, 里埃哥被捉住并被交給法軍。
- 第一次加迪斯遠征是里埃哥在 1820 年的進軍。這次進軍是革命的開端(見本卷第 507—508 頁)。——第 669 頁。
- 340 “信軍”是天主教專制主義集團(阿波斯托爾教派)所組織的部隊的稱

- 号，这支部队 1822 年在卡塔卢尼亚、納瓦腊和比斯开发动反对革命政府的叛乱；1823 年，法国武装干涉时期，“信軍”站在干涉者方面作战。——第 669 頁。
- 341** 康姆尼罗斯 是对 1820—1823 年資產階級革命期間建立的西班牙的秘密政治联盟(西班牙康姆尼罗斯联盟)的成員的称呼。康姆尼罗斯代表城市居民中最民主的阶层——手工业者、工人、一部分知識分子、一部分軍官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共有 7 万人。康姆尼罗斯主張与反革命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在革命被鎮压之后，康姆尼罗斯遭到最殘酷的迫害并停止了活动。——第 670 頁。
- 342** E. San Miguel. «De la guerra civil en España», Madrid, 1836. ——第 671 頁。
- 343** 指斐迪南七世的专制制度在 1820—1823 年革命被鎮压后在西班牙复辟。斐迪南七世政权的第一次复辟是在 1814 年拿破侖第一失敗之后。——第 671 頁。
- 344** 指 1833—1840 年的卡洛斯派战争和 1834—1843 年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第 672 頁。
- 345** 1832 年 9 月，患重病的斐迪南七世撤銷了 1830 年关于西班牙王位必須由其幼女伊薩伯拉繼承的敕令；斐迪南病愈后，又恢复了她的繼承王位的权利，从而使支持斐迪南的弟弟唐·卡洛斯的奴才派(見注 268)的期望落空。——第 672 頁。
- 346** “喀琅施塔得要塞”手稿第一次在本卷发表，它是恩格斯打算为給倫敦出版的“每日新聞”写的軍事論文之一。恩格斯在 1854 年 3 月提出为該报撰稿。恩格斯打算当該报的通訊員，希望以此摆脱曼彻斯特商业办事处的工作并迁到倫敦馬克思那里去。这篇手稿沒有刊出，而在 4 月底恩格斯就已告訴馬克思說，“同‘每日新聞’的交道垮台了”(見 1854 年 3 月 30 日恩格斯致“每日新聞”編輯的信和他 1854 年 4 月 20 日給馬克思的信)。

恩格斯在一系列問題上的看法，如关于喀琅施塔得对俄国的战略

意义、要塞攻击战中使用螺旋推进式舰队的可能性等等，从軍事理論观点来看具有很大的意义。恩格斯文章中有关喀琅施塔得工事的火炮配备的数字材料，有几处与俄国指揮部的材料不符，这是由于缺少完整的情报的緣故，恩格斯本人也談到过这一点。——第 673 頁。

- 347 “英国資产階級”一文可能是馬克思在 1854 年 3 月 31 日寄到紐約的。本文刊載于本卷的附录，是因为“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把它作为社論发表时曾作过重大的篡改。文章的第一部分显然被歪曲了，有許多論点不符合馬克思的观点。例如，关于考察資产階級政策不能从階級观点，而必須从一般的人道主义观点着眼的說法便是如此。另一方面，文章里还有許多重要的思想和論点无疑是馬克思的。这首先是对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的評价和关于 1853 年至 1854 年普雷斯頓罢工的部分。馬克思的許多文章都談到过这次罢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和本卷第 254 頁）。——第 683 頁。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54年1月—1855年1月)

1854

1—12月

馬克思繼續研究政治經濟學，系統地收集有关具体經濟的統計資料和其他資料，他在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写的文章中利用了其中的一部分。

恩格斯加緊研究軍事理論問題和具体分析軍事事件，并在应馬克思的請求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写的軍事評論中加以系統的闡述。

1月1日

恩格斯在倫敦馬克思处逗留几天之后返回曼彻斯特。

1月2日

馬克思接到“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查·德納 1853年 12月 16日的來信說，他寄去的“多瑙河戰爭”一文，和他更早以前寄去的軍事評論一样，已經作为社論发表，沒有署名。

1月5日

馬克思通知恩格斯，說恩格斯应他的請求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写的評論在美国引起强烈的反应，并且这些評論被认为是出于著名的司各脫將軍的手笔。

1月8日

針對英法分舰队进入黑海，恩格斯写文章分析战争的前途和因战争而在欧洲引起革命的可能性。該文以“欧洲战争”为題在 2月 2日“紐約每日論壇報”上作为社論发表。該文的德譯文 2月 3—4日在紐約出版的德国旅美工人联盟（美国工人同盟）的机关报“改革报”上发表。

- 1月10日** 馬克思收到倫敦出版商塔克尔关于抨击性小册子“帕麦斯顿和俄国”第一版已經售完需要再版的建議。馬克思表示同意。
- 馬克思把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改革报”記者阿·克路斯的信轉給恩格斯。馬克思經常同克路斯通信，对他在美国傳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活动提出各种建議。馬克思經常从克路斯那里得到关于在美国的德国小資产階級流亡者的情况。
- 1月14日** 根据自己的亲戚約·卡·尤特的建議，馬克思給在卡普施塔德(开普敦)出版的“南非人报”写“东方战争”一文。該文在3月6日发表。馬克思在2月14日和3月14日寄給該报的其他两篇文章沒有发表。
- 1月中旬** 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高尚意識的騎士”在紐約出版，馬克思在这本小册子中通过維利希的实例揭露了小資产階級流亡者的領袖所特有的宗派主义、清談习气和玩弄革命的蠱惑手法。这本小册子由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約·魏德迈出版。
- 1月18日** 馬克思把自己对切塔特会战的意見告訴給恩格斯，并且請他就这个題目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一篇文章。
- 1月19日** 恩格斯写一篇专门論述切塔特会战的文章“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該文作为社論在2月8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
- 1月20日** 馬克思写“东方的軍事行动。——奥地利和法国的財政。——君士坦丁堡的設防”一文。該文在2月8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
- 1月下旬** 馬克思交涉出版新的論帕麦斯顿的小册子的問題。这本小册子是由他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的文章編成的。

- 1月27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君士坦丁堡的設防。——丹麦的中立。——英国議会的成分。——欧洲的歉收”一文。馬克思在英国議会的組成一节中指出，英国現行的选举制度保证貴族寡头政体的統治。該文发表在2月16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馬克思收到从美国寄来的他的小册子“高尚意識的騎士”100本。
- 2月初** 馬克思的小册子“帕麦斯顿和俄国”再版。另一本小册子“帕麦斯顿和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同时在同一书局出版，这本小册子翻印了1853年底馬克思在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
- 2月初—2月10日** 馬克思研讀藍皮书中关于东方問題的文件并撰写“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問題的藍皮书。——門的内哥罗”一文。該文在2月27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
- 2月3日** 馬克思写“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俄国的战时財政”一文。該文在2月20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
- 2月6日—3月7日** 馬克思注視英国議會关于东方問題和軍事預算問題的发言，并且写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来揭露英国执政的寡头政体的政策。这些文章分別在2月21日，3月9日、13日和24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
- 2月7日** 馬克思非常注意琼斯和其他革命的宪章派筹备召开工人議会的活动，在他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文章中揭露了資產階級激进派破坏这次工人代表會議召开的企图。該文在2月21日发表。
- 2月9日** 馬克思寄給恩格斯几本“高尚意識的騎士”和小册子“帕麦斯顿和俄国”，并且請他轉交給威·沃尔弗和恩·德朗克各一本；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們像同其他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一样保持着經常的联系。

- 2月13日** 恩格斯写“欧洲战争問題”一文。該文在3月6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作为社論发表。
- 2月17日左右** 馬克思从斐·拉薩尔那里得知普魯士政府打算大規模逮捕民主主义活动家的消息以后,决定揭露这些計劃,以阻止其实现;为此他写了“普魯士內閣的声明。——波拿巴的計劃。——普魯士的政策”一文。該文在3月9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作为社論发表。
- 2月底—3月** 恩格斯为了实现他給倫敦自由派报纸“每日新聞”写一組关于俄国兵力的文章的計劃,开始写“喀琅施塔得要塞”一文。他希望担任該报軍事专栏的固定通訊員,并且希望通过給該报撰稿这一工作使他能够摆脱掉他在曼彻斯特“欧門和恩格斯”公司的办事員的工作,并迁居到倫敦馬克思那里去。
- 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德国民主派政論家格·盖扎(1848—1850年期间担任在加塞尔出版的諷刺性报纸“大胡蜂”的編輯)在曼彻斯特定居。
- 3月3日** 馬克思写关于奥地利的財政的文章。該文以“奥地利的破产”为題在3月22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作为社論发表。
- 馬克思把“法国和英国的軍事計劃。——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一文寄給“紐約每日論壇报”。該文于3月18日发表。
- 3月6日** 在曼彻斯特开幕的工人議会的第一次會議上一致通过了邀請馬克思博士作为名誉代表参加會議的決議。
- 3月7日和10日** 馬克思在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一些文章中闡述了工人議会的活动。“工人議会开幕。——英国的軍事預算”和“工人議会”两篇文章分別于3月24日和29日在該报上发表。

- 3月9日** 馬克思寄賀信答謝曼徹斯特工人議會要他作为名譽代表参加會議的邀請，信中提出英国工人当前的任务是建立独立的群众性的工人階級政党。馬克思給工人議会的信在3月10日的會議上宣讀，并在3月18日“人民报”上发表。
- 3月10日** 恩格斯接到琼斯要恩格斯到他那里去了解馬克思給工人議会的信的内容的邀請。
- 3月13日** 恩格斯写“俄軍从卡拉法特撤退”一文；該文在3月30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作为社論发表。馬克思繼續对厄·琼斯在出版和編輯“人民报”方面加以支持，并把这篇文章寄給他。文章于3月18日在該报上发表。
- 3月21—24日** 馬克思在閱讀了藍皮书中发表的英国駐彼得堡大使同英国外交大臣在1853年秘密往来的公文之后，写“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两篇文章。文章分別在4月5日和1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
- 3月23日**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对拉薩尔关于进行克里木战争的看法提出批評；拉薩尔在他給馬克思的信中曾闡述过他的这些看法。
- 3月27日** 馬克思在給德納的信中抗議“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对他的文章所采取的无礼态度。他坚决反对用他的文章(軍事論文除外)作为社論，否則他就提議在发表他的文章时一律不署名，因为他不願意把他的名字只是署在沒有多大意义的材料下面。
- 3月28日** 馬克思写“宣战。——关于东方問題产生的历史”一文，在写这篇文章时，馬克思利用了官方文件以及法明的“基督教会在东方的竞争和对它們进行保护的历史”一

- 书。該文发表在4月15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3月30日** 恩格斯把“喀琅施塔得要塞”一文寄給“每日新聞”。該报編輯部由于得知恩格斯进行革命活动和信仰共产主义而拒絕让他撰稿。該文一直沒有发表。
- 3月底—4月初** 馬克思因研究东方問題而閱讀哈麦尔的“奥斯曼帝国史”一书。
- 4月4日** 馬克思写“議会的战争辯論”一文，該文詳細地談到1844年沙皇同英国外交官們就瓜分土耳其問題进行的秘密談判。該文发表在4月17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德譯文則发表在4月20—22日“改革报”上。
- 4月6日—6月1日** 馬克思在同拉薩尔辯論克里木战争的性质时指出，英国統治階級由于害怕欧洲革命运动的加强而不願意使沙皇政府在軍事上遭到潰敗，因而他們不能始終不渝地坚决地对俄作战。
- 4月7日** 馬克思写“俄国和德意志强国。——粮食价格”一文。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认为，由于奥地利和普魯士参战而使战争具有全欧性质并且可能加速全欧革命危机的到来。該文发表在4月2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4月13日** 恩格斯写“双方軍队在土耳其的态势”一文，該文在4月28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作为社論发表。
- 4月18日** 馬克思写“列施德-帕沙的照会。——意大利报纸論东方問題”一文。馬克思在該文中指出，东方問題的正确解决对德意志、匈牙利和意大利的人民有着特别的利害关系；他指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靠牺牲他民族的独立而为自己爭得自由。該文在5月2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
- 4月20日** 恩格斯在接到“每日新聞”編輯部拒絕发表他的軍事論

文的通知之后告訴馬克思說，他打算把关于俄国兵力的論文寄給倫敦最大的一家報紙“泰晤士報”。恩格斯的文章並沒有在“泰晤士報”上发表。

4月28日

馬克思写“希腊人暴动。——波兰侨民。——奥地利—普魯士条約。——关于俄国武装的文件”一文，文中援引了一系列說明沙皇俄国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性质的俄国官方文件。該文发表在5月15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4月底

恩格斯帮助盖扎写一篇文章批評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同在美国的維利希分裂集团有联系的亚·席梅尔普芬尼希的軍事冒險計劃。該文本来是給在紐約出版的“改革报”写的，但由于該报停刊，沒有发表。

4月底—5月

馬克思研究西班牙文——閱讀卡德龙的原著，塞万提斯的“唐·吉訶德”以及其他書籍。

5月—6月初

馬克思閱讀“从庇护九世即位到放棄威尼斯的三年期間意大利問題文献”中有关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的文件。他认为公布包括各种不同文件和截获的信件的文獻，对研究意大利革命是很有价值的。

5月初

由于加入土耳其帝国的特薩利亚和伊皮罗斯的希腊居民暴动，馬克思研究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独立的希腊国家形成的历史，閱讀帕里什的“1830年以来希腊君主国的外交史”一书，并且作了摘录。

5月2日和5日

馬克思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两篇关于当前事件的文章。該报編輯部把这两篇文章合为一篇——“炮击敖德薩。——希腊。——門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費尔的演說”，于5月16日发表。該文尖銳地批評了普魯士在東方問題上的政策和整个普魯

- 士国家制度。編輯部把一部分材料篡改得面目全非后以“普魯士的政策”这个标题作为該报的社論在5月19日发表。
- 5月9日** 馬克思写“不列顛的財政”一文，揭露了格萊斯頓的財政措施的蠱惑性。文章在5月23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后，在紐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被轉載于5月25日“紐約时报”。
- 5月10日左右** 馬克思接到克路斯的来信說，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打算在倫敦出版一份英文报纸，并且請馬克思参加編輯部工作。这个計劃沒有实现。
- 5月10日左右—5月底** 馬克思患重病。因此寄給“紐約每日論壇报”的大部分文章是恩格斯写的。
- 5月12日左右** 馬克思接到克路斯的通知說，由于資金不足，“改革报”于4月26日停刊。
- 5月22日** 恩格斯写定期的軍事評論，这篇評論以“战争”为題在5月27日“人民报”上发表，同时还在6月9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作为社論发表。
- 5月24日** 恩格斯在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一篇文章中对陈旧的英国軍事制度作了全面的批評。該文以“英国軍队的現狀及其战术、服装置备、軍需部等等”为題发表在6月10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署名馬克思。
- 5月30日** 馬克思写“奥地利—普魯士条約。——五月二十九日的議會辯論”一文，指出英国的外交极力使奥地利和普魯士中立，以便保持克里木战争的局限性。該文在6月12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
- 5月底** 由于警察局監視馬克思的通信，馬克思不得不借用別人的通信地址；他有两个可以同德国通信的地址。

- 6—7月** 鑒于西班牙革命事件的迫近，馬克思着手研究西班牙历史。他閱讀弗洛雷斯、普林西佩、馬尔利安尼、休斯和其他作者的書籍并且从中作了大量的摘录。
- 6—11月** 恩格斯研究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战争的历史，預計在冬季就這個問題写一本书。
- 6月3日左右—
6月21日左右** 馬克思的妻子患病，馬克思沒錢請医生。恩格斯和往常一样来帮助自己的朋友。
- 6月6日** 馬克思寄給“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一篇开始揭露波拿巴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总司令圣阿尔諾的文章。該文沒有发表。
- 6月9日** 馬克思在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英国軍事部門的改組。——奧地利的要求。——英国的經濟状况。——圣阿尔諾”一文中指出，因为法国和英国的統治階級力图保持由維也納會議在欧洲建立起来的反动秩序，害怕沙皇制度被彻底粉碎，所以决不能把盟国同俄国的战争看做是自由同专制的战争。馬克思在批評英国政論家戴·烏尔卡尔特的立場时着重指出，能够消灭英国的腐敗的政府制度的唯一政党是工人階級的政党。該文在 6 月 24 日发表。
- 6月10日** 恩格斯写关于俄軍圍攻土耳其要塞——錫利斯特里亚的文章。这篇文章包括大量的軍事历史材料，并以“对錫利斯特里亚的圍攻”为題发表在 6 月 26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6月16日** 馬克思对恩格斯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俄土战場的形勢”一文作了补充并将該文寄往紐約。文章于 7 月 8 日在該报上发表。
- 6月23日** 馬克思利用恩格斯給他寄来的材料为“紐約每日論壇

- 报”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俄軍的撤退”，7月10日在該报上发表。
- 6月27日** 馬克思写“战争。——議會辯論”一文。文章对英国的秘密外交作了揭露，发表在7月10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7月6日** 恩格斯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定期的軍事評論。該文以“多瑙河战争”为題在7月25日作为社論发表。
- 7月7日** 馬克思在細心地观察了西班牙事件之后写“馬德里起义的細节。——奥地利和普魯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債。——瓦拉几亚”一文，文章除了闡明一些其他問題之外指出，在西班牙业已开始的軍事叛乱在人民群众的不滿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可能变成普遍起义。該文在7月2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
- 7月14日** 馬克思写“意大利的緊張。——西班牙事件。——德意志各邦的立場。——英国法官”一文。該文发表在7月28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7月20日**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根据德朗克所述告訴关于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璫特、丹尼尔斯、貝克尔和其他人的一些消息。
- 7月下半月** 馬克思讀1853年出版的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奥·梯叶里的“第三等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一书（馬克思从前會讀过他的其他著作），并且从該书中作了很多摘录；他在7月27日給恩格斯的信中对这本书提出批判性的分析，指出該书作者是能够在历史过程中最先发现階級斗争存在的人之一，虽然他没有从这一点在理論上作出相应的結論。
- 7月21日** 馬克思写“西班牙的革命。——土耳其和希腊”一文，指出在西班牙已經开始的革命运动正在超出普通的軍事

叛亂的範圍，並且由於人民群众的參加而具有民主性。該文發表在8月4日“紐約每日論壇報”上。

7月24—25日

馬克思到英國議會會議旁聽，會議對戰爭問題進行了辯論；他在“議會的戰爭辯論”和“奧地利的政策。——下院的戰爭辯論”兩篇文章中敘述了自己的感想；這兩篇文章分別在8月7日和9日“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

7月27日

馬克思把塔克爾關於把“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出版單行本的建議告訴給恩格斯。馬克思打算同恩格斯合寫一本關於英國人從宣戰以來的外交和軍事行動的抨擊性小冊子，並且還打算把“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來”一文和論帕麥斯頓的小冊子交給塔克爾重印。他尋求恩格斯對這個問題的意見。

7月29日—8月1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無聊的戰爭”一文，指出西班牙的革命事件可以開辟歐洲革命的新紀元。該文發表在8月17日“紐約每日論壇報”上。

8月—12月初

馬克思繼續在英國博物館研究西班牙歷史。他閱讀大量的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書刊，從托雷諾、普腊德、霍韦利亚諾斯和其他作者的著作中作了大量的摘錄。

8月4日

馬克思根據他已經研究過的有關西班牙進步派領袖的傳記的材料寫“埃斯帕特羅”一文。這篇文章揭露埃斯帕特羅是一個沒有能力領導人民群众進行解放鬥爭的人。該文作為社論發表在8月19日“紐約每日論壇報”上。

8月8日

馬克思認為使美國工人了解革命的憲章運動的鬥爭經驗有很大意義，因而在他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一篇定期的文章中援引了瓊斯在1854年夏天在英國各地作宣傳旅行的材料。文章在8月21日發表。

- 8月25日—12月8日** 馬克思写“革命的西班牙”一組文章。他写的11篇文章中只有8篇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9月9日和25日,10月20、27日和30日,11月24日,12月1日和2日)。在这些文章中闡述了1808—1814年和1820年西班牙革命事件的历史。最后3篇論述1820—1823年和1833年的事件的文章沒有发表。
- 9月8—13日** 馬克思接到厄內斯特·琼斯的兩封来信,談到“人民报”的困难情况并請馬克思給他以可能的帮助。
- 9月13日** 馬克思把自己經常保持联系的、流亡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皮佩尔和斯特芬的物质上的困难情况告訴恩格斯。
- 9月15日** 馬克思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联軍舰队的活动。——多瑙河各公国的局勢。——西班牙。——英国的对外貿易”一文,文中除了闡述一些其他問題之外,还根据他所收集的統計材料对英国对外貿易的动态作了闡述。該文发表于10月2日。
- 9月18日** 針對英法开始进攻塞瓦斯托波尔,恩格斯写了一篇評論盟国的軍事行动的文章。文章以“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为題在10月14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作为社論发表。
- 至迟9月29日** 馬克思接到“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的通知說,該报由于物质上的困难不得不把馬克思的稿酬削減一半,請他每周只寄一篇文章并且在发表这些文章时不署名。
- 10月2日** 恩格斯写“克里木的消息”一文,对当时得到的关于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消息作了詳尽的分析,并且对消息的可靠性表示怀疑。該文发表在10月17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10月5—6日** 由于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消息不可靠,馬克思和恩格

斯写一篇文章揭露法国和英国政府利用謠言来达到蠱惑性目的的手法。在这篇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批評了法国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巴尔貝斯所持的沙文主义立場，并且指出奧·布朗基是革命的法國的真正領導者。“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部把這篇文章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以“塞瓦斯托波爾的騙局”為題在10月21日作為社論發表，另一部分以“塞瓦斯托波爾的騙局。——概評”為題在該報同一號上發表，沒有署名。

10月9—30日

恩格斯写“阿尔馬河會戰”、“俄國的兵力”、“对塞瓦斯托波爾的圍攻”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作為社論分別發表在10月26日和31日以及11月15日“紐約每日論壇報”上。文章在紐約产生很大的影响。

10月29日以后

馬克思被邀請参加因拿破侖第三拟來英國訪問而由倫敦的宪章派組織的反波拿巴委員會的工作。根据琼斯的提議，馬克思同馬志尼、維·雨果、路易·勃朗等資產階級民主运动活动家一起被选为这个委員會的名譽委員。馬克思表示拒絕；他向琼斯說明，如果这种发动具有純粹英國的性質，将有更大得多的效果；琼斯同意馬克思的意見，并且后来他在委員會的工作中遵循这一点。

11月9日—12月4日

恩格斯根据馬克思的請求繼續定期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写关于塞瓦斯托波爾战役进程的軍事評論。他的“克里木战局”、“巴拉克拉瓦會戰”、“因克尔芒會戰”和“克里木战局”等文章分別在11月27日和30日、12月14日和27日發表。

11月22日

馬克思告訴恩格斯：布林德以及其他在倫敦的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首領企图組織有德國流亡者一切派別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馬克思)参加的抗議俄國和抗議德意志各邦君主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場的群众大会。由

于不同意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首領們对克里木战争的立場，馬克思拒絕参加，并且打算在必要时組織有英国宪章派参加的反群众大会。

1854年12月—
1855年1月

馬克思重讀他前几年作的有关政治經濟学的筆記本，“如果不是为了把它們加工，那末至少是为了掌握材料并且把材料准备好以便整理”。他作了簡單的綱要，并且加上了“貨幣，信貸，危机”的标题，同时在每一个条目之后都援引了摘有不同作者（吉耳布雷思、桑頓、图克、哈巴德、約·斯·穆勒、富拉頓等）的文章的有关筆記本，标出作者、著作名称和自己筆記本的頁碼。他后来在写“政治經濟学批判綱要”和“資本論”第三卷时利用了这份材料。

恩格斯研究一系列有关俄国和斯拉夫人民的历史的德文、俄文和其他文字的书籍和材料。他閱讀哈克斯特豪森、赫尔岑（“来自对岸”、“俄国和旧世界”、“往事和追思”）以及帕頓、兰克、沙法里克、馬切奧夫斯基、恩格尔等人的书籍。

12月初

恩格斯在和德朗克通信中談到送递从德国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瑞特那里收到的65—70份用紅油墨印的最近一号“新萊茵报”的問題。

12月2日左右

馬克思接到由拉薩尔轉来的要他給德国資產階級民主派报纸“新奧得报”撰稿的建議；該报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并有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摩·弗里德兰德和摩·埃尔斯納参加。

12月15日

馬克思对恩格斯寄来的文章作了补充，該文再一次強調这样的思想，即奥地利和普魯士参战会有助于欧洲革命的开始。文章以“战况的进展”为題发表在1855年1月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12月20日 馬克思把他同意为“新奧得报”撰稿一事告訴恩格斯。
- 12月21日 恩格斯写“奧地利的兵力”一文，該文作为社論发表在1855年1月8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1854年12月22日左右—1855年1月初 恩格斯在倫敦馬克思处。
- 1854年12月29日—1855年1月1日 馬克思写两篇总标题为“克里木战局的回顾”的文章，馬克思从这两篇文章开始給“新奧得报”撰稿。文章在1855年1月2日和4日发表。

1855

- 1月—2月初 馬克思繼續閱讀自己的政治經濟学筆記本。他主要是按照地租和人口論問題編制这些筆記本的索引，其中包括多年的“經濟学家”杂志的摘录和戴夫南、艾利生、配弟、布阿吉尔貝尔、洛克、斯图亚特等人著作的摘录。
- 1月4日 恩格斯一回曼彻斯特就写了一篇激烈批評整个英国軍事制度的文章。文章以“英軍在克里木的災难”为題在1月22日“紐約每日論壇报”上作为社論发表。
- 1月5—6日 馬克思把恩格斯写的“英軍在克里木的災难”一文譯成德文寄給“新奧得报”，并作了一些修改。文章于1月8日和9日在該报上发表。
- 1月8—22日 馬克思給“新奧得报”写一組以“工商业危机”为題的文章，文章根据对英国商业的分析得出結論：經濟周期又达到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投机为危机代替”的阶段。这一組文章分別在1月11、12、20日和25日发表。馬克思把一篇同样題目的文章寄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并于1月26日发表。
- 1月9—23日 馬克思繼續定期給“新奧得报”寄关于英国内政問題的

文章以及利用恩格斯寄給“紐約每日論壇报”的文章中的材料所写的軍事評論；这些文章分別在1月13、15、18、22、23日和26日发表。

1月16日

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誕生。

1月23日

馬克思在給拉薩尔的信中答复一系列經濟問題，其中包括关于廢除谷物稅对工业品价格和工資数量的影响問題。馬克思答应一有机会就从自己的經濟学筆記本中把拉薩尔感兴趣的問題的一些确切数字材料收集給他，現在提供的只限于一般的資料。

人名索引

四 画

- 巴罗, 奥迪隆 (Barrot, Odilon 1791—1873) ——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年2月前是自由主义王朝反对派首領, 1848年12月—1849年10月领导以各保皇派組成的反革命联盟为支柱的内閣。——第71頁。
- 巴特, 伊薩克 (Butt, Isaac 1813—1879) ——爱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 在七十年代是爱尔兰自治运动的組織者之一。——第66、92、394頁。
- 巴林頓, 威廉·克佩耳 (Barrington, William Keppel 生于1793年) ——英国貴族, 議會議員。——第52頁。
- 巴特勒, 詹姆斯·阿默尔 (Butler, James Armar 1827—1854) ——英国軍官, 1854年錫利斯特里亚防御战的組織者之一。——第390、395頁。
- 巴腊伊班 (Baraiban) ——西班牙軍官, 曾参加1854—1856年的资产阶级革命。——第372頁。
- 巴尔貝斯, 阿尔芒 (Barbès, Armand 1809—1870) ——法国革命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領導人之一; 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 制宪議會議員, 因参加1848年5月15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 1854年遇大赦被釋, 赦免后侨居国外, 不久便脱离政治活动。——第559頁。
- 巴尔博亚, 华斯哥·努涅斯 (Balboa, Vasco Nuñez 1475—1517) ——西班牙航海家和征服者, 第一个橫穿巴拿馬地峽到达太平洋海岸的欧洲人。——第461頁。
- 巴腊斯帖基 (Barastequi) ——西班牙軍官, 埃斯帕特罗的拥护者。——第371頁。
- 巴拉盖·狄利埃, 阿希尔 (Baraguay d'Hilliers, Achille 1795—1878) ——法国將軍, 1854年起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駐君士坦丁堡大使 (1853—1854); 1854年統率波罗的海的法国远征軍。——第10、28、65、75、78、107、121、217、348、363、527頁。
- 巴列斯帖罗斯,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 (Ballesteros, Francisco Lopez 1770—1833) ——西班牙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曾参加独立战争 (1808—1814), 在反动年代任陸軍大臣 (1815); 曾参加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第669頁。
- 比伯斯庫——見施梯尔貝。
- 比达耳夫, 迈克尔·安东尼 (Biddulph, Michael Anthony 1823—1904) ——英国軍官, 后为將軍, 克里木战争的参

- 加者,塞瓦斯托波尔的圍攻一书(1854年出版)的作者。——第576頁。
- 比列-布腊赫,亨利(Bille-Brahe, Henrik 生于1798年)——伯爵,丹麦外交家,五十年代为駐維也納公使。——第360頁。
- 孔查,霍賽·古蒂埃勒斯·德·拉(Concha, José Gutiérrez de la 1809—1895)——西班牙將軍,反动分子,古巴的軍事总督(1850—1852、1854—1859),曾殘酷鎮压古巴的民族解放运动,政府首腦(1868)。——第432頁。
- 孔查,曼努埃尔·古蒂埃勒斯·德·拉(Concha, Manuel Gutiérrez de la 1808—1874)——西班牙將軍,属于溫和派,1854年为軍事洪达主席,鎮压1854—1856年資產階級革命的組織者之一。——第404、438、523頁。
- 邓科布,托馬斯·斯令斯比(Duncombe, Thomas Slingsby 1796—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資產階級激进分子,四十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議會議員。——第254頁。
- 邓达斯,詹姆士·威特利·迪恩斯(Dundas, James Whitley Deans 1785—1862)——英国海軍上将,自1852年至1855年1月为参加克里木战争的英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第3、93、107、245、247、308、424、582頁。
- 丹年別尔格,彼得·安得列也維奇(Данненберг, 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1792—1872)——俄国將軍,1853—1854年在多瑙河和克里木任軍長。——第144、597、608、609頁。
- 丹尼洛·涅哥什(Danilo Negoš 1826—1860)——門的内哥罗国君(1852—1860)。——第233、234頁。
- 天王——見洪秀全。
- 天主教徒斐迪南五世(1452—1516)——加斯梯里亚国王(1474—1504)和执政者(1507—1516),阿腊貢国王,称斐迪南二世(1479—1516)。——第456—460頁。
- 戈多伊,曼努埃尔(Godoy, Manuel 1767—1851)——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的大臣,实际上是西班牙的执政者(1792—1798和1801—1808),1795年起受封为“和平公爵”;曾帮助法国人占領西班牙,1808年被人民起义打倒。——第456、463、467、474、475、495、516頁。
- 韦德耳,多米尼克·奥諾萊·瑪麗·安都昂(Vedel, Dominique-Honoré-Marie-Antoine 1771—1848)——法国將軍,1808年在西班牙作战时,在拜兰附近率本师投降。——第471頁。
- 厄斯特德,安德斯·桑戴(Ørsted, Anders Sandøe 1778—1860)——丹麦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53—1854年为首相。——第49頁。
- 扎莫伊斯基,弗拉基斯拉夫(Zamoyski, Wladyslaw)——伯爵,波兰大地主,曾参加1830—1831年的起义,起义被鎮压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之一;克里木战争时,企图組織波兰軍团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第222頁。
- 切奥达也夫,米哈伊尔·伊万諾維奇(Чеодаев,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死于1859年)——俄国將軍,曾参加1812年战争,克里木战争时期任軍长和預备部队的指揮官。——第144、146、147頁。

五 画

布朗,乔治(Brown, George 1790—

- 1865)——英国將軍, 1854—1855 年任克里木英軍師長。——第 423、561、562 頁。
- 布萊, 詹姆斯 (Bligh, James)——五十年代憲章運動的積極活動家之一。——第 125、139 頁。
- 布塞塔 (Buceta)——西班牙陸軍上校, 溫和的自由主義者, 曾參加 1854—1856 年的資產階級革命。——第 365、372 頁。
- 布雷迪, 約翰 (Brady, John 生于 1812 年)——英国醫生, 議會議員。——第 53 頁。
- 布萊特, 約翰 (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廠主, 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 自由貿易派領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創始人之一; 自六十年代初為自由黨左翼領袖之一; 曾多次擔任自由黨內閣的大臣職務。——第 44、50、88、198、272、273、451、643 頁。
- 布拉克, 華金 (Blake, Joaquin 1759—1827)——西班牙將軍和政治活動家, 曾參加獨立戰爭 (1808—1814), 1810 年被任命為攝政會議主席, 在 1814 年斐迪南七世回國後他反對專制制度。——第 487 頁。
- 布坎南, 安得魯 (Buchanan, Andrew 1807—1882)——英国外交家, 1853—1858 年任駐哥本哈根公使。——第 49 頁。
- 布魯姆, 亨利·彼得 (Brougham, Henry Peter 1778—1868)——男爵, 英国法學家和文學家, 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輝格黨的著名活動家, 大法官 (1830—1834); 五十年代起在政治生活中不起重大作用。——第 30、189、323 頁。
- 布魯克, 卡爾·路德維希 (Bruck, Karl Ludwig 1798—1860)——男爵, 奧地利國家活動家和外交家; 大企業主; 曾任工商和公共工程大臣 (1848—1851), 駐君士坦丁堡公使 (1853—1855), 財政大臣 (1855—1860)。——第 217、384、385 頁。
- 布魯土斯 (馬可·尤尼烏斯·布魯土斯) (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 85 左右—42)——羅馬政治活動家, 貴族共和派的反尤利烏斯·凱撒密謀的發起人之一。——第 46 頁。
- 布律阿, 阿爾芒·約瑟夫 (Bruat, Armand-Joseph 1796—1855)——法國海軍上將, 1854 年為黑海分艦隊司令, 1855 年為黑海艦隊總司令。——第 70、363、423 頁。
- 布朗基, 路易·奧古斯特 (Blanqui, Louis Auguste 1805—1881)——法國革命家, 空想共產主義者, 許多秘密團體和密謀活動的組織者, 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積極參加者; 法國無產階級運動的最傑出的領導者; 曾多次被判處徒刑。——第 559 頁。
- 布朗尼埃, 安那托爾 (Brenier, Anatole 1807—1885)——男爵, 法國外交家, 外交部長 (1851), 駐那不勒斯公使 (1855—1856 和 1859—1860), 1861 年起為參議員。——第 82、83 頁。
- 布萊克特, 約翰·芬威克·伯戈因 (Blackett, John Fenwick Burgoyne 1821—1856)——英国議會議員。——第 269 頁。
- 布隆諾夫, 菲力浦·伊萬諾維奇 (Бруннов, 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1797—1875)——男爵, 俄國外交家, 駐倫敦公使 (1840—1854、1858—1860), 後為駐倫敦大使 (1860—1874)。——第 27、43、

- 77、155、191、353 頁。
- 布呂歇爾，格布哈爾德·勒勃萊希特 (Blücher, Gebhardt Leberecht 1742—1819)——普魯士元帥，曾參加反對拿破侖第一的戰爭。——第 263、539、564、592、636 頁。
- 布腊提昂諾，伊昂 (Bratiano, Joan 1822—1891)——羅馬尼亞政治活動家，1848 年革命時期瓦拉几亞臨時政府的成員，革命失敗後流亡巴黎；1866 年起為羅馬尼亞民族自由派領袖之一，曾任首相 (1867—1868 和 1876—1888)。——第 331 頁。
- 布莱克伍德，亨利·史蒂文森 (Blackwood, Henry Stevenson 生于 1819 年)——英國外交信使。——第 178 頁。
- 布德貝爾格，亚历山大·伊万諾維奇 (Будберг,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798—1876)——俄國將軍；1853—1854 年為駐多瑙河各公國的特派專員。——第 327、349、384、413、527 頁。
- 布腊沃·穆里洛，璜 (Bravo Murillo, Juan 1803—1873)——西班牙國家活動家，屬於溫和派，政府首腦 (1851—1852)。——第 515 頁。
- 布尔韦尔-利頓，爱德华·乔治·利頓 (Bulwer-Lytton, Edward George Lytton 1803—1873)——英國作家和政治活動家，初為輝格黨人，1852 年起為托利黨人，議會議員。——第 53 頁。
- 布奥尔-紹恩施坦，卡尔·斐迪南 (Buol-Schauenstein, Karl Ferdinand 1797—1865)——伯爵，奧地利國家活動家和外交家，駐彼得堡公使 (1848—1850)，後為駐倫敦公使 (1851—1852)，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 (1852—1859)。——第 30、171、352、360、428 頁。
- 布拉塞-伊-圣馬丁，安賽爾莫·德·西格 (Blaser y San Martin, Ancelmo de Ciga 1813—1872)——西班牙將軍，反動分子，薩爾托里烏斯政府 (1853—1854) 的陸軍大臣。——第 340、341、352、373 頁。
- 布尔昂的哥特弗利德 (Godefroi de Bouillon 約 1060—1100)——下洛林公爵 (1089—1100)，第一次十字軍遠征 (1096—1099) 的首領之一。——第 91 頁。
- 卡罗，霍賽·文士腊 (Caro, José Ventura 1742—1809)——西班牙將軍，曾參加獨立戰爭 (1808—1814)。——第 481 頁。
- 卡洛斯，唐 (Carlos, Don 1788—1855)——斐迪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王位的追求者，曾領導反動的封建教權派發動西班牙內戰 (1833—1840)。——第 510、672 頁。
- 卡利克，安东 (Kalik, Anton 生于 1818 年)——奧地利陸軍上校，1854 年夏負特別使命赴多瑙河各公國。——第 428 頁。
- 卡富尔，卡米洛·本佐 (Cavour, Camillo Benso 1810—1861)——伯爵，意大利國家活動家、思想家以及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了的貴族的領袖；撒丁政府首腦 (1852—1859 和 1860—1861)，依靠拿破侖第三的幫助，奉行在薩瓦王朝領導下自上而下地統一意大利的政策，1861 年主持第一個意大利政府。——第 82 頁。
- 卡里哥，安东尼奥·馬利阿 (Garrigò, Antonio Maria)——西班牙軍官，曾參加 1854—1856 年資產階級革命。——第 521 頁。

- 卡罗琳娜 (Caroline 1768—1821) —— 英国女王 (1820—1821), 乔治四世的妻子。——第 408 頁。
- 卡斯特罗——見佩雷斯·德·卡斯特罗, 埃瓦里斯托。
- 卡瑟克特, 乔治 (Cathcart, George 1794—1854) —— 英国將軍, 1854 年任克里木英軍师长。——第 561、579、590 頁。
- 卡德威尔, 爱德华 (Cardwell, Edward 1813—1886) —— 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派領袖之一,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貿易大臣 (1852—1855), 爱尔兰事务大臣 (1859—1861), 殖民大臣 (1864—1866) 和陸軍大臣 (1868—1874)。——第 243 頁。
- 卡拉斯科, 奧古斯丁 (Carrasco, Agustín) —— 十九世紀上半叶西班牙經濟學家。——第 433 頁。
- 卡芬雅克, 路易·欧仁 (Cavaignac, Louis Eugène 1802—1857) —— 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48 年 5 月起为法国陸軍部长, 极端殘酷地鎮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 曾任政府首腦 (1848 年 6—12 月)。——第 540 頁。
- 卡拉姆津, 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 (Карамзин,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766—1826) —— 俄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作家, 亚历山大一世的御用历史学家。——第 103 頁。
- 卡拉多克, 約翰·侯伯特, 豪登男爵 (Caradoc, John Hobart, Baron Howden 1799—1873) —— 英国外交家, 駐馬德里公使 (1850—1858)。——第 373、430、432 頁。
- 卡利尔吉斯, 德米特利 (Kalergis, Demetrios 1803—1867) —— 希腊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曾参加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解放斗争 (1821—1829), 曾任陸軍大臣 (1854—1855)。——第 524 頁。
- 卡尔尼塞罗, 霍賽·克利門特 (Carnicero, José Clemente) —— 十九世紀初西班牙作家, 著有許多西班牙历史著作。——第 468 頁。
- 卡迪根伯爵, 詹姆斯·托馬斯·布魯德內耳 (Cardigan, James Thomas Brudenell 1797—1868) —— 英国將軍, 1854 年任克里木英軍騎兵旅长。——第 539、590 頁。
- 卡尔沃·德·罗薩斯, 洛倫索 (Calvo de Rozas, Lorenzo) —— 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資產階級中的民主派的代表人物, 曾参加 1808—1814 年和 1820—1823 年的資產階級革命, 1808 年英勇的薩拉哥沙防御战的組織者之一, 中央洪达委員, 加迪斯議会的倡导者之一。——第 476 頁。
- 卡德龙·德·拉·巴卡, 彼得罗 (Calderon de la Barca, Pedro 1600—1681) —— 杰出的西班牙剧作家。——第 476 頁。
- 卡斯特尔巴雅克, 巴特爾米·多米尼克·雅克·阿尔芒 (Castelbajac, Barthélemy Dominique Jacques Armand 1787—1864) —— 侯爵, 法国將軍, 正統主义者; 1850—1854 年任駐彼得堡公使, 1856 年起为第二帝国的參議員。——第 44、77 頁。
- 卡尔·路德維希·約翰 (Karl Ludwig Johann 1771—1847) —— 奥地利大公, 元帥, 在历次对法战争 (1796、1799、1805 和 1809) 中任总司令; 曾任陸軍大

- 臣(1805—1809)。——第 145 頁。
- 卡斯坦尼約斯-伊-阿拉貢尼, 弗朗西斯科·哈維埃爾(Castaños y Aragoni, Francisco Xavier 1758—1852) ——西班牙將軍, 曾參加獨立戰爭(1808—1814), 在拜蘭會戰中任西班牙軍隊指揮官。——第 471、472、487 頁。
- 卡波第斯特里亞, 約翰(Kapodistrias, Ioannes 1776—1831)——伯爵, 希臘國家活動家; 1809—1822 年在俄國供職, 曾任俄國外交副大臣(1815—1822); 1827 年當選為希臘總統(1827—1831)。——第 523 頁。
- 弗萊明(Flemming)——伯爵, 普魯士外交家, 駐維也納大使館秘書(1854—1859 左右)。——第 360 頁。
- 弗洛雷斯, 霍賽·賽貢多·德(Florez, José Segundo de 生于 1789 年)——西班牙資產階級自由派歷史學家和政論家, “埃斯帕特羅的歷史”一書的作者。——第 402 頁。
- 弗蘭茨一世(Franz I 1768—1835)——奧地利皇帝(1804—1835), 所謂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稱弗蘭茨二世(1792—1806)。——第 115、116 頁。
- 弗朗斯瓦一世(François I 1494—1547)——法國國王(1515—1547)。——第 182、373 頁。
-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魯士國王(1740—1786)。——第 120、145、373、474、670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普魯士國王(1840—1861)。——第 57、83、158、201、205、284、379 頁。
- 弗雷德里克七世(Frederik VII 1808—1863)——丹麥國王(1848—1863)。——第 425、441、557 頁。
- 弗洛里達布朗卡伯爵, 霍賽·蒙尼諾(Floridablanca, José Moñino 1728—1808)——西班牙國家活動家和外交家, 開明專制制度的擁護者, 曾任大臣(1777—1792), 實行過一系列進步的改革; 反對十八世紀末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 1808 年為中央洪達主席, 曾企圖阻止 1808—1814 年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第 474、475、480、497 頁。
- 弗蘭茨-約瑟夫一世(Franz-Joseph I 1830—1916)——奧地利皇帝(1848—1916)。——第 75、111、116、284、310、397、430、556、558 頁。
- 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 馬利阿·費南多(Francisco de Acis, Maria Fernando 1822—1902)——西班牙女王伊薩伯拉二世的丈夫。——第 514、557 頁。
- 聖羅曼(San Román)——西班牙將軍, 1853—1854 年任陸軍副大臣。——第 352 頁。
- 聖路易斯——見薩爾托里烏斯, 路易斯·霍賽, 聖路易斯伯爵。
- 聖海倫斯——見菲茨赫伯特, 阿倫, 聖海倫斯男爵。
- 聖阿爾諾, 阿爾芒·雅克·勒盧阿·德(Saint-Arnaud, Armand-Jacques-Leroy de 1801—1854)——法國元帥, 波拿巴主義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參加佔領阿爾及利亞,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變組織者之一, 曾任陸軍大臣(1851—1854), 1854 年任克里木法軍總司令。——第 78、260、266、276、285—288、304、307、350、397、398、423、526、539—542、545、546、548、554、564、580 頁。
- 聖費南多公爵, 華金·霍賽·梅耳加雷霍

- (San-Fernando, Joaquin José Melgarejo 死于 1835 年)——西班牙的反动政治活动家, 政府首脑(1819)。——第 506、510 頁。
- 圣米格尔-伊-瓦尔埃多, 埃瓦里斯托 (San Miguel y Valledor, Evaristo 1785—1862)——西班牙將軍, 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和 1820—1823 年资产阶级革命, 曾任自由派內閣首脑(1822), 后参加温和派, 任陸軍大臣(1840—1842)。——第 343、505—507、512、523、671 頁。
-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温和派的領袖, 曾任內务大臣(1822—1827 和 1828—1830), 首相(1834—1835 和 1841—1846),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廢除了谷物法(1846)。——第 67、86、150、190、191、629 頁。
- 皮薩罗, 弗朗西斯科 (Pizarro, Francisco 1475 左右—1541)——西班牙征服者, 十六世紀三十年代征服印加人的国家(秘魯)。——第 461 頁。
- 皮达尔, 彼得罗·霍賽 (Pidal, Pedro José 1800—1865)——西班牙反动国家活动家, 属于温和派, 曾任議會議长(1843), 內务大臣(1844—1848), 外交大臣(1848—1851)。——第 343 頁。
- 加斯克耳, 伊丽莎白 (Gaskell, Elisabeth 1810—1865)——英国女作家, 她的优秀作品表明, 她是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第 686 頁。
- 加布雷腊-伊-格里尼約, 拉蒙, 莫雷利亚伯爵 (Cabrera y Griño, Ramon, conde de Morella 1806—1877)——西班牙將軍, 反动分子, 卡洛斯派的首領之一。——第 402 頁。
- 加尔西亚·德·拉·庫埃斯塔, 格萊哥里奧 (Garcia de la Cuesta, Gregorio 1741—1811)——西班牙將軍, 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第 473、487 頁。
- 汉利, 約瑟夫·沃訥 (Henley, Joseph Warner 1793—1884)——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貿易大臣(1852 和 1858—1859)。——第 393 頁。
- 汉密尔頓——見西摩尔, 乔治·汉密尔頓。
- 卢納, 阿尔瓦罗 (Luna, Alvaro 1388—1453)——加斯梯里亚和累翁的国王璜二世的大臣。——第 455 頁。
- 卢肯伯爵, 乔治·查理·宾加姆 (Lucan, George Charles Bingham 1800—1888)——英国將軍, 托利党人, 1854—1855 年初任克里木英軍騎兵师长。——第 561、591 頁。
- 叶卡特林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第 58、120、153、334 頁。
- 叶列娜·巴甫洛夫娜 (Елена Павловна 1806—1873)——俄国大公妃, 尼古拉一世的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維奇大公的妻子。——第 151 頁。
- 瓦斯康謝尔奧斯, 米格尔 (Vasconcellos, Miguel 死于 1640 年)——西班牙在葡萄牙的执政者薩瓦的瑪格丽特的大臣, 在反对西班牙統治的人民起义中被杀死。——第 455 頁。
- 瓦列夫斯基伯爵, 亚历山大·弗洛里安·約瑟夫·科倫納 (Walewski, Alexander-Florian-Joseph Colonna 1810—1868)——法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 拿破侖第一和波兰的瓦列夫斯卡娅伯

爵夫人的儿子；曾参加1830—1831年波兰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外交大臣（1855—1860）；曾主持巴黎会议（1856）。——第165頁。

本生，克利斯提安·卡尔·約西亚斯（Bun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1791—1860）——男爵，普魯士外交家，政論家和神学家，曾任駐倫敦大使（1842—1854）。——第159、217頁。

白朗特，夏綠蒂（Brontë, Charlotte 1816—1855）——英国女作家，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第686頁。

古里也夫，德米特利·亚历山大罗維奇（Гурьев, 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751—1825）——俄国国家活动家，曾任財政大臣（1816—1823）。——第58頁。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第3、4、11、12、20、22、23、27、34、35、37、43、44、49、51、52、56、57、59、62、65、69—72、77—79、87—91、96、108、117、120、122—124、127、148、150—155、158—173、176—178、188、190—192、198、203、204、219、224、229—232、242、244、259、279、304、305、310、313、315、335、344、349、364、366、378、379、386、415、421、424、430、449、450、526、558、569、570、600、601、614、621、649、659、665頁。

兰斯唐侯爵，亨利·配第-菲茨莫里斯（Lansdowne, Henry Petty-Fitzmaurice 1780—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曾任財政大臣（1806—1807），樞密院院长（1830—1841、1846—1852），不管部大臣（1852—1863）。——第189頁。

印范塔多公爵，彼得罗·阿尔康塔腊·德·托勒多（Infantado, Pedro Alcántara de Toledo 1773—1841）——西班牙將軍和反动的政治活动家，1823年任摄政會議主席，1824年为政府首脑。——第466頁。

六 画

米涅，克劳德·埃蒂耶納（Minié, Claude-Étienne 1804—1879）——法国軍官，新式步枪的发明者。——第265、268、583、596—598頁。

米納，弗朗西斯科·哈維埃尔（Mina, Francisco Xavier 1789—1817）——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家，独立战争（1808—1814）时期游击队領袖之一；1814年发动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的企图失败后，前往美洲，在美洲参加墨西哥独立战争时陣亡。——第486、488、510頁。

米納（埃斯波斯-伊-米納），弗朗西斯科（Mina (Espoz y Mina), Francisco 1781—1836）——西班牙將軍，独立战争（1808—1814）时期为游击队領袖之一，1820—1823年資產階級革命的积极参加者，1833—1836年曾参加反对卡洛斯派的战争。——第488頁。

米尼希，布尔哈德·克利斯托夫（克里斯托弗尔·安东諾維奇）（Миних, Бурхард Кристоф (Христофор Антонович) 1683—1767）——俄国元帅、筑城工程师，在1735—1739年俄土战争时任总司令；德国人。——第399頁。

米耳恩斯，理查·蒙克頓（Milnes, Richard Monckton 1809—1885）——英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十九世紀下半叶为自由党人，議會

- 議員。——第 53、141、271 頁。
- 米洛什·奧布廉諾維奇 (Милош Обренович 1780—1860)——塞爾維亞公爵 (1817—1839 和 1858—1860)，奧布廉諾維奇王朝的奠基人。——第 26、35 頁。
- 米哈伊爾·奧布廉諾維奇 (Михаил Обренович 1823—1868)——塞爾維亞公爵 (1839—1842 和 1860—1868)。——第 26、35 頁。
- 米哈伊爾·尼古拉也維奇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32—1909)——俄國大公，尼古拉一世的第四個兒子。——第 168 頁。
- 伊文思，喬治·德·雷希 (Evans, George de Lacy 1787—1870)——英國軍官，1846 年起為將軍，自由派的政治活動家，議會議員，1854 年任克里木英軍師長。——第 561 頁。
- 伊塞特·帕沙 (Izzet Pasha)——1853—1854 年為貝爾格萊德的土耳其軍事總督。——第 355、428 頁。
- 伊斯土里斯，弗朗西斯科·哈維埃爾 (Isturiz, Francisco Xavier 1790—1871)——西班牙政治活動家，自由主義者，曾參加獨立戰爭 (1808—1814) 和 1820—1823 年資產階級革命；曾任政府首腦 (1836、1846 和 1858)，駐倫敦大使 (1848 和 1858)。——第 365 頁。
- 伊薩伯拉一世 (Isabella I 1451—1504)——加斯梯里亞女王 (1474—1504)。——第 459 頁。
- 伊薩伯拉二世 (Isabella II 1830—1904)——西班牙女王 (1833—1868)。——第 123、340、343、352、368、369、405—408、430、432、433、435、512、514、557、672 頁。
- 伊斯甘德-貝伊 (亞歷山大·伊林斯基) (Iskender Beg (Alexander Ilinski) 1810—1861)——土耳其將軍，波蘭人，三十至四十年代先後在西班牙、葡萄牙、波斯、法國的軍隊中供職，曾參加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革命失敗後流亡土耳其，加入土耳其國籍；曾任多瑙河土軍指揮官 (1853—1854)，克里木土軍指揮官 (1855) 和高加索土軍指揮官 (1855—1856)。——第 422 頁。
- 伊斯馬伊耳-帕沙 (Ismail Pasha 1805—1861)——土耳其將軍，切爾克斯人；1853—1854 年任多瑙河土軍指揮官。——第 144、145 頁。
- 伊斯馬伊耳-帕沙 (喬治·克美蒂) (Ismail Pasha (György Kmety) 1810—1865)——土耳其將軍，匈牙利人；曾參加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革命失敗後流亡土耳其，加入土耳其國籍；曾任多瑙河土軍指揮官 (1853—1854)，高加索土軍指揮官 (1854—1855)。——第 57 頁。
- 安斯利，威廉·理查 (Annesley, William Richard 1830—1874)——英國貴族，托利黨人，議會議員。——第 52 頁。
- 安梅林，弗朗斯瓦·阿爾丰斯 (Hamelin, François Alphonse 1796—1864)——法國海軍上將，1853—1854 年是地中海和黑海艦隊總司令，後為海軍大臣 (1855—1860)。——第 3、97、107、228、245、258、279、560 頁。
- 安烈普-厄爾姆普特，約瑟夫·羅曼諾維奇 (Андрей-Эльмпт, Иосиф Романович 1798—1860)——伯爵，俄國將軍，1853—1854 年初任多瑙河駐軍的司令官。——第 35 頁。

- 安东尼奥·帕斯庫阿耳·波旁(Antonio Pascual Bourbon 1755—1817)——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的儿子,馬德里最高洪达(1808年4月奉斐迪南七世之命成立的)主席。——第469頁。
- 休斯,特·姆·(Hughes, T. M.)——十九世紀上半叶英国作家,长期侨居西班牙。——第403、404、515頁。
- 休謨,約瑟夫(Hume, Joseph 1777—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資產階級激进派領袖之一,議會議員。——第100、101、380頁。
- 休森-帕沙(Hussein Pasha)——土耳其將軍,1854年錫利斯特里亚防御战的指揮者之一。——第337頁。
- 多納,卡尔·弗里德里希·艾米尔(Dohna, Karl Friedrich Emil 1784—1859)——伯爵,普魯士將軍,曾参加反对拿破侖第一的战争,1812—1815年在俄軍中供职,1842—1854年为駐科尼斯堡的普軍軍長。——第233頁。
- 多特扎克,阿道夫(Dotézac, Adolphe 1808—1889)——法国外交家,駐哥本哈根公使(1848—1869)。——第49頁。
- 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Muhammad 1793—1863)——阿富汗的艾米尔(1826—1839和1842—1863)。——第123頁。
- 列施德-帕沙(Reschid Pasha 1802—1858)——土耳其国家活动家;历任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第27、29、107、213、222、347、349、383—385頁。
- 列奧波特二世(Leopold II 1747—1792)——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的皇帝(1790—1792)。——第116頁。
- 列奧波特二世(Leopold II 1797—1870)——托斯卡納大公(1824—1859)。——第552頁。
-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第59頁。
-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第163頁。
- 亚历山大·卡拉格奧尔基耶維奇(Александр Карагеоргиевич 1806—1885)——塞爾維亞公爵(1842—1858)。——第35、428頁。
- 吉卡,格里哥里·亚历山大(Ghika, Gregor Alexander 1807—1857)——莫尔达維亞国君(1849—1853和1854—1856)。——第385頁。
- 吉比奇,伊万·伊万諾維奇(Дибич,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85—1831)——伯爵,俄国元帥,1828—1829年俄土战争时为总司令;鎮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軍总司令。——第165、166、293、295、322頁。
- 考威尔,乔治(Cowell, George)——英国工人,宪章运动活动家,1853—1854年普雷斯頓大罢工领导人之一。——第254頁。
- 考萊男爵,亨利·理查·查理·威尔斯里(Cowley, 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1804—1884)——英国外交家,駐巴黎大使(1852—1867)。——第95、97頁。
- 乔斯林,罗伯特(Jocelyn, Robert 1816—1854)——子爵,英国軍官,議會議員。——第87頁。
- 乔治四世(George IV 1762—1830)——英国国王(1820—1830)。——第262、430頁。

迈克尔, 威廉 (Michell, William)——英国医生, 議會議員。——第 53 頁。

迈奥尔, 爱德华 (Miall, Edward 1809—1881)——英国政論家和非国教宣傳家, 資產階級激进派, 四十年代傾向宪章运动, 曾积极参加反对英国国教的斗争; 議會議員。——第 53 頁。

西摩尔, 乔治·汉密尔顿 (Seymour, George Hamilton 1797—1880)——英国外交家, 1851—1854 年任駐彼得堡公使。——第 23、62、77、95—97、122、151—156、160—172、175、176、231、232、237、648、649 頁。

西斯蒙第, 让·沙尔·列奥納尔·西蒙·德 (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經濟学家, 資本主义的小資產階級批評家。——第 470 頁。

艾釋黎, 安东尼·庫伯, 舍夫茨別利伯爵 (1851 年受封) (Ashley, Anthony Cooper, Earl of Shaftesbury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为議會里的托利党人慈善家集团首領, 1847 年起为輝格党人。——第 141 頁。

伏尔泰, 弗朗斯瓦·瑪丽 (Voltaire, François-Marie) (本姓阿魯埃 Arouet de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論哲学家, 諷刺作家, 历史学家, 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 反对专制政体和天主教。——第 188 頁。

华尔希, 約翰·貝恩·奥尔馬特威特 (Walsh, John Benn 1798—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托利党人, 后为保守党人; 議會議員。——第 105 頁。

托雷諾伯爵, 霍賽·馬利阿·凱波·德·

利亚諾·魯伊斯·德·薩拉維阿 (Torreño, José Maria Queipo de Llano Ruiz de Saravia 1786—1843)——西班牙資產階級自由派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曾参加 1808—1814 年和 1820—1823 年的資產階級革命, 加迪斯議會議員, 曾任財政大臣和首相 (1834—1835), 1814—1820、1823—1833 年和从 1835 年起侨居国外。——第 480 頁。

毕若·德·拉·比貢利, 托馬·罗伯尔 (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omas Robert 1784—1849)——法国將軍, 1843 年起为元帅; 奥尔良派, 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議院議員, 1848—1849 年是阿尔卑斯山駐軍总司令, 立法議會議員, ——第 286、287 頁。

达来朗-貝里戈, 沙尔·莫里斯 (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 Maurice 1754—1838)——公爵, 著名的法国外交家, 外交大臣 (1797—1799、1799—1807、1814—1815), 法国出席維也納會議的代表 (1814—1815), 駐倫敦大使 (1830—1834), 其特点是在政治上毫无原則性和唯利是图。——第 322、465 頁。

七 画

貝利, 亨利·詹姆斯 (Baillie, Henry James 生于 1804 年)——英国議會議員, 托利党人。——第 61 頁。

貝多, 瑪丽·阿尔丰斯 (Bedeau, Marie Alphonse 1804—1863)——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的副議長, 1851 年十二月二

- 日政变后被逐出法国。——第 287、288、540 頁。
- 貝尔格 (Bepr)——俄国外交家，駐倫敦大使館一等秘書。——第 63 頁。
- 貝克萊，莫里斯·弗雷德里克·菲茨哈丁 (Berkeley, Maurice Frederick Fitzhardinge 1788—1867)——英國海軍上將和政治活動家，輝格黨人，議會議員，曾任海軍部部務委員 (1833—1839 和 1846—1857)。——第 387、390、391 頁。
- 貝西埃爾，讓·巴蒂斯特 (Bessières, Jean-Baptiste 1768—1813)——法國元帥，曾參加拿破侖第一的遠征，1808 年和 1811 年曾參加西班牙戰爭。——第 472 頁。
- 貝爾納·奧斯本，拉爾夫 (Bernal Osborne, Ralph 1808—1882)——英國政治活動家，自由黨人 (屬於所謂梅費爾激進派)，議會議員，海軍部秘書長 (1852—1858)。——第 267、268 頁。
- 貝里公爵夫人，瑪麗·卡洛琳·斐迪南·路易莎 (Berry, Marie-Caroline-Ferdinande-Louise 1798—1870)——正統派法國王位追求者尚博爾伯爵的母親；1832 年企圖在萬第發動暴亂推翻路易-菲力浦。——第 286、287 頁。
- 蘇舍，路易·加布里埃爾 (Suchet, Louis-Gabriel 1770—1826)——法國元帥，曾參加西班牙戰爭 (1808—1814)，1812—1813 年為瓦倫西亞的法國軍事總督。——第 482 頁。
- 蘇巴諾，馬丁 (Zurbano, Martin 1788—1844)——西班牙將軍，資產階級革命家，獨立戰爭 (1808—1814) 時期游擊隊領袖之一，因企圖宣布 1837 年憲法而被處死。——第 403、404 頁。
- 蘇爾特，尼古拉·讓 (Sault, Nicolas Jean 1769—1851)——法國元帥，國家活動家，1808—1814 年為駐西班牙的法軍司令官，七月王朝時期任陸軍大臣 (1830—1834、1840—1845)，外交大臣 (1839—1840) 和首相 (1832—1834、1839—1840 和 1840—1847)。——第 480 頁。
- 蘇沃洛夫，亞歷山大·瓦西里也維奇 (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30—1800)——偉大的俄國統帥。——第 300、302、399、597 頁。
- 蘇里曼-帕沙 (Suleiman Pasha)——土耳其將軍，1854 年統率在多瑙河的非正規軍隊。——第 330 頁。
- 蘇里曼大帝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見蘇里曼一世·坎努尼。
- 蘇里曼一世·坎努尼 (Suleiman I Elkanuni 1494—1566)——土耳其蘇丹 (1520—1566)。——第 182 頁。
- 利文，達麗婭 (多羅苔婭)·赫里斯托弗羅夫娜 (Ливен, Дарья (Доротея) Христофоровна 1785—1857)——公爵夫人，俄國外交家赫·安·利文之妻；她在歐洲外交生活中，作為倫敦和巴黎的政治沙龍的女主人起着顯著的作用。——第 628 頁。
- 利文公爵，赫里斯托弗·安得列也維奇 (Ливен, Христофор Андреевич 1774—1839)——俄國外交家，曾任駐柏林公使 (1810—1812)，駐倫敦大使 (1812—1834)。——第 317 頁。
- 利奈公爵，卡爾·約瑟夫 (Ligne, Karl Joseph 1735—1814)——奧地利將軍，外交家和作家，1809 年起為元帥。——第 666 頁。
- 利普蘭迪，巴維爾·彼得羅維奇 (Лип-

- ранди, 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1796—1864) — 俄国將軍, 1853—1854 年在多瑙河和 1854—1855 年在克里木任师长。——第 325、577、584、588、590、592、609 頁。
- 利迭尔斯, 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維奇 (Лидерс,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0—1874) — 俄国將軍; 1853—1854 年任多瑙河俄軍軍长, 1855 年任南方軍团司令官, 1856 年初为克里木駐軍总司令。——第 144、303、325、350、606 頁。
- 利物浦伯爵, 罗伯特·班克斯·詹金森 (Liverpool, Robert Banks Jenkinson 1770—1828) —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領袖之一, 多次担任大臣职务, 曾任首相 (1812—1827)。——第 672 頁。
- 沙賽, 罗伯特 (Southey, Robert 1774—1843) — 英国詩人和作家, 托利党人。——第 467 頁。
- 沙米尔 (Шамиль 1798 左右—1871) — 十九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領導达格斯坦和彻岑的山民反对沙皇殖民主义者, 反动的狂信派 (曾被苏丹土耳其利用来实现侵略野心) 思想家之一。——第 259、311、312、374、527 頁。
- 沙克萊, 威廉·麦克皮斯 (Thackeray, William Makepeace 1811—1863) — 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686 頁。
- 沙尔腊斯, 让·巴蒂斯特·阿道夫 (Charras, Jean-Baptiste-Adolphe 1810—1865) — 法国軍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 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 曾参加鎮压 1848 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會和立法議会的議員, 反对路易·波拿巴;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逐出法国。——第 414 頁。
- 沙多勃利昂子爵, 弗朗斯瓦·勒奈 (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 — 著名的法国作家, 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外交大臣 (1822—1824), 法国出席維罗那會議的代表 (1822)。——第 122、430 頁。
- 杜科, 德奧多 (Ducos, Théodore 1801—1855) — 法国政治活动家, 溫和的保皇派, 第二共和国时期归附波拿巴派, 曾任海軍大臣 (1851—1855)。——第 256 頁。
- 杜福尔, 吉約姆·昂利 (Dufour, Guillaume Henri 1787—1875) — 瑞士將軍, 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1847 年率領联邦軍队击潰宗得崩德軍队; 著有許多筑城学、炮兵和战策方面的著作。——第 547 頁。
- 杜加美尔, 亚历山大·奧西波維奇 (Дюгамель, Александр Осипович 1801—1880) — 俄国將軍, 1848 年負特別使命赴多瑙河各公国。——第 331 頁。
- 杜邦·德·勒坦, 比埃尔·安都昂 (Dupont de l'Étang, Pierre-Antoine 1765—1840) — 法国將軍, 1808 年于西班牙作战时在拜兰附近率本师投降。——第 471 頁。
- 杜耳塞-伊-加腊伊, 多敏古 (Dulce y Garay, Domingo 1808—1869) — 侯爵, 西班牙將軍, 屬於溫和派; 曾領導 1854 年馬德里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 1854—1856 年資產階級革命的序幕。——第 324、340、352、364、430、433、438、523 頁。

- 克里斯亭娜——見瑪麗亞-克里斯亭娜。
- 克魯津什特恩，尼古拉·伊萬諾維奇 (Круженштерн,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俄國將軍，克里木戰爭時為敖德薩軍事總督。——第 527 頁。
- 克拉倫登伯爵，喬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韋利爾斯 (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1800—1870) ——英國國家活動家，輝格黨人，後為自由黨人；曾任愛爾蘭總督 (1847—1852)，殘酷鎮壓 1848 年愛爾蘭起義；曾任外交大臣 (1853—1858, 1865—1866 和 1868—1870)。——第 62、63、88、89、95—98、108、120、121、160、164、171—176、188、189、193、200、323、366、377、420、421、429 頁。
- 克蘭里卡德侯爵，烏利克·約翰·德·巴勒 (Clanricarde, Ulick John de Burgh 1802—1874) ——英國政治活動家和外交家，輝格黨人；曾任駐彼得堡大使 (1838—1841)。——第 11、62、317、321、322、377、659、660 頁。
- 克耳納·馮·克倫施坦，弗里德里希 (Kellner von Köllenstein, Friedrich 生于 1802 年) ——男爵，奧地利將軍，1849 年起為皇帝弗蘭茨·約瑟夫一世的侍衛長。——第 75 頁。
- 伯戈因，約翰·福克斯 (Burgoyne, John Fox 1782—1871) ——英國將軍，軍事工程師，1868 年起為元帥；1854—1855 年在克里木任英軍軍事顧問和工程長官。——第 66 頁。
- 伯勒普什，瑪麗·約瑟法·蓋爾特魯黛 (Berlepsch, Maria Josephe Gertrud 死于 1723 年) ——西班牙女王紐堡的瑪麗-安娜的宮中御前女官，1699 年人民起義之後，被逐出西班牙。——第 455 頁。
- 伯恩施托爾夫，阿爾勃萊希特 (Bernstorff, Albrecht 1809—1873) ——伯爵，普魯士外交家，曾任駐倫敦公使 (1854—1861)，外交大臣 (1861—1862)，駐倫敦大使 (1862—1873)。——第 217 頁。
- 亨策，阿·(Hentze, A.) ——德國軍官，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1850 年同盟分裂後，參加維利希-沙佩爾的冒險主義宗派集團，是科倫共產黨人案件 (1852) 原告證人。——第 427 頁。
- 亨利四世 (Heinrich IV 1425—1474) ——加斯梯里亞國王 (1454—1465 和 1468—1474)。——第 455、456 頁。
- 亨利四世 (Heinrich IV 1553—1610) ——法國國王 (1589—1610)。——第 182 頁。
- 里扎-帕沙 (Riza Pasha 1809—1859) ——土耳其將軍和國家活動家，四十至五十年代，曾多次擔任陸軍大臣職務。——第 29、107 頁。
- 里埃哥-伊-努涅斯，拉斐爾·德 (Riego y Nuñez, Rafael de 1785—1823) ——西班牙軍官，曾參加獨立戰爭 (1808—1814)，1820—1823 年資產階級革命的最著名的領導人之一。——第 488、506—508、669 頁。
- 里奧斯-伊-羅薩斯，安東尼奧 (Ryos y Rosas, Antonio 1812—1873) ——西班牙政治活動家，屬於溫和派，議會議員，曾任內務大臣 (1856)。——第 433 頁。
- 沃邦，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爾 (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1633—1707) ——法國元帥，軍事工程師，著有許多築城學和圍攻方面的著作。——

- 第 445、581 頁。
- 沃龙佐夫，米哈伊尔·謝明諾維奇 (Воронцов,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1782—1856)——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將軍，1844—1854 年为高加索駐軍总司令和高加索总督。——第 309、311、312、315、388、392 頁。
- 辛普森，萊昂納德·弗兰西斯 (Simpson, Leonard Francis)——十九世紀中叶的英国作家。——第 72、75 頁。
- 辛辛納图斯 (魯齊烏斯·昆克提烏斯·辛辛納图斯) (Lucius Quinctius Cincinnatus 公元前五世紀)——古羅馬貴族，执政官 (公元前 460 年)，独裁者 (公元前 458 年和 439 年)，据傳說，他生活儉朴，亲自耕种。——第 405 頁。
- 麦金倫，威廉·亚历山大 (Mackinnon, William Alexander 1789—1870)——英国政治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議會議員。——第 53 頁。
- 麦克格萊哥尔，約翰 (MacGregor, John 1797—1857)——英国統計学家和历史学家，自由貿易論者，議會議員，不列顛皇家銀行的創始人并为該行董事之一 (1849—1856)。——第 53 頁。
- 狄更斯，查理 (Dickens, Charles 1812—1870)——偉大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366、686 頁。
- 狄亚斯·玻利埃尔，璜 (Diaz Porlier, Juan 1788—1815)——西班牙將軍，自由主义者，独立战争 (1808—1814) 时曾指揮游击队，因企图发动起义反对斐迪南七世的专制制度而被处死。——第 488、504、510 頁。
- 芒，亚历山大罗 (Mon, Alejandro 1801—1882)——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曾任財政大臣 (1837、1844—1846)，政府首腦 (1864)。——第 343、433 頁。
- 坎宁，乔治 (Canning, George 1770—1827)——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托利党領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 (1807—1809、1822—1827)，首相 (1827)。——第 156、319 頁。
- 庇护九世 (Pius IX 1792—1878)——羅馬教皇 (1846—1878)。——第 71、188 頁。
- 呂利埃尔，約瑟夫·馬爾塞倫 (Rulhières, Joseph-Marcelin 1787—1862)——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曾参加拿破侖第一的远征，三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1849 年为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和陸軍部长，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退职。——第 288 頁。
- 希耳德亚德，罗伯特·查理 (Hildyard, Robert Charles)——英国議會活动家，托利党人。——第 391 頁。
- 邦迪埃拉兄弟，阿提利奧 (1810—1844) 和埃米利奧 (1819—1844) (Bandiera, Attilio ed Emilio)——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奧地利艦队的軍官，“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員；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被处死 (1844)。——第 86、649 頁。

八 画

- 阿尔丹，保尔·約瑟夫 (Ardant, Paul Joseph 1800—1858)——法国陸軍上校，1855 年起为將軍，軍事工程师；1854 年負軍事使命赴土耳其。——第 66 頁。
- 阿尔宁，亨利希·弗里德里希 (Arnim, Heinrich Friedrich 1791—1859)——

- 伯爵，普魯士外交家，勃兰登堡反动內閣的外交大臣（1849），駐維也納公使（1845—1848、1851—1858）。——第360頁。
- 阿梅莉亚——見瑪丽-阿梅莉亚。
- 阿尔伯特(Albert 1819—1861)——薩克森-科堡-哥特亲王，英国女王維多利亞的丈夫。——第29、44—46、56、367、393頁。
- 阿耳科克，托馬斯 (Alcock, Thomas 生于1810年)——英国政治活动家，初为輝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議會議員。——第380頁。
- 阿勃迪-帕沙 (Abdi Pasha 生于1801年)——土耳其將軍，1853年任高加索土軍司令官。——第25、33頁。
- 阿巴斯-帕沙 (Abbás Pasha 1813—1854)——埃及的帕沙 (1849—1854)。——第23頁。
- 阿集斯-帕沙 (Aziz Pasha) ——1854—1857年是貝尔格萊德的土耳其軍事总督。——第355頁。
- 阿伯丁伯爵，乔治·戈登 (Aberdeen, George Gordon 1784—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50年起为皮尔派領袖，曾任外交大臣 (1828—1830、1841—1846) 和联合內閣首相 (1852—1855)。——第4、7、10、49、97、146、148、150、151、178、188—191、194、199、257、313—323、375、376、378、392、405、610、628、629頁。
- 阿里欧斯托，洛多維科 (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杰出的詩人，长詩“疯狂的罗兰”的作者。——第549頁。
- 阿尔奎列斯，奧古斯丁 (Argüelles, Agustín 1776—1844)——西班牙国家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08—1814年和1820—1823年資產階級革命的著名参加者，曾任內务大臣 (1820—1821)，議會議員 (1822—1823)。——第509頁。
- 阿罕默德一世 (Ahmed I 1589—1617)——土耳其苏丹 (1603—1617)。——第182頁。
- 阿罕默德-帕沙 (Ahmed Pasha)——土耳其將軍，1853年底任高加索土軍司令官。——第25、33頁。
- 阿卜杜-麦吉德 (Abdul-Medjid 1823—1861)——土耳其苏丹 (1839—1861)。——第11、29、75、120、160、161、168、175、179、269、285、330、331、385頁。
- 阿尔科·阿古埃罗，菲力浦 (Arco Agüero, Felipe)——西班牙軍官，曾参加1820—1823年資產階級革命；革命激进派領袖之一。——第505頁。
- 阿美特勒-伊-德·卡布勒，納西索 (Ametller y de Cabrer, Narcis 死于1877)——西班牙陸軍上校，1843—1844年是共和派和进步派在卡塔卢尼亚起义的領袖人之一，曾参加1854—1856年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第530頁。
- 帕金頓，約翰·索美塞特 (Pakington, John Somerset 1799—188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曾任陸軍和殖民大臣 (1852)，海軍首席大臣 (1858—1859 和 1866—1867) 和陸軍大臣 (1867—1868)。——第367頁。
- 帕切科，璜，維尔埃納侯爵 (Pacheco, Juan, marqués de Villena 1419—1474)——加斯梯里亚国王亨利四世的大臣。——第455、456頁。
- 帕紐亭，費多尔·謝尔盖也維奇 (Па-

- нютин, Федо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0—1865)——俄国將軍, 在克里木战争初期任軍长, 1855—1856年为俄国西南部的后备軍团司令官。——第 325、339、664 頁。
- 帕伊科斯 (Paikos, A.)——希腊国家活动家, 1851—1854年任外交大臣。——第 232 頁。
- 帕迪利亚, 璜 (Padilla, Juan 1490 左右—1521)——西班牙貴族, 1520—1522年加斯梯里亚各城市起义 (自治城市起义) 的領袖之一, 起义失敗后在維利雅拉尔附近被处死。——第 460 頁。
- 帕斯凱維奇, 伊万·費多罗維奇 (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1782—1856)——公爵, 俄国元帥, 1831年夏起为鎮压 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軍总司令, 1832年起为波兰王国的总督, 1849年为参加鎮压匈牙利革命的俄軍总司令; 1854年为俄国西部和南部边境的駐軍总司令, 5—6月任多瑙河俄軍指揮官。——第 58、222、300、301、303、312、325、336、349、399 頁。
- 帕斯托尔·狄亚斯, 尼科梅德斯 (Pastor Diaz, Nicomedes 1811—1863)——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 属于溫和派, 参議員, 曾任駐都灵大使 (1854)。——第 433 頁。
- 帕麦斯頓子爵, 亨利·約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年起依仗輝格党右翼分子的支持, 成为該党的領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 內务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1859—1865)。——第 4、17、19、45、46、52、61—63、99—102、121、123、128、179、191、194、198、199、242、243、257、275、283、316、318、321、322、332、366、367、380—383、393、394、405、430、523、553、557、620、627—629、651 頁。
- 帕尔馬的瑪丽-路易莎 (Maria Luise von Parma 1751—1819)——西班牙女王 (1788—1808), 查理四世之妻。——第 456、463 頁。
- 帕拉福克斯-伊-梅耳西, 霍賽 (Palafox y Melci, José 1776—1847)——西班牙將軍, 曾参加独立战争 (1808—1814), 領導了 1808—1809年薩拉哥沙防御战。——第 471 頁。
- 帕拉福克斯-伊-梅耳西, 弗朗西斯科 (Palafox y Melci, Francisco 生于 1774年)——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曾参加独立战争 (1808—1814), 中央洪达委員 (1808—1809), 后因反对召开議会和企图在西班牙設立攝政而被开除出洪达。——第 487 頁。
- 帕尔凱-卡斯特里耳奧公爵, 迪埃哥·卡尼亚斯-伊-波尔托卡雷罗 (Parque-Castrillo, Diego Cañas y Portocarrero 1755—1832)——西班牙將軍, 曾参加独立战争 (1808—1814) 和 1820—1823年资产階級革命, 1820年为議會議长。——第 466 頁。
- 帕切科-伊-古提埃雷斯·卡德龙, 华金·弗朗西斯科 (Pacheco y Gutierrez Calderon, Joaquin Francisco 1808—1865)——西班牙法学家、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溫和派, 曾参加 1854—1856年资产階級革命, 曾任外交大臣 (1854)。——第 413 頁。
- 拉西, 路易斯·德 (Lacy, Luis de 1775—1817)——西班牙將軍, 独立战争

- (1808—1814)的著名参加者,因企图在
卡塔卢尼亚发动起义反对斐迪南七世
的专制制度而被枪决。——第 488、
504、511 頁。
- 拉腊,璜(Lara, Juan)——西班牙將軍,
曾任陸軍大臣(1851—1853),1854年
任新加斯梯里亞的軍區司令官。——第
340、341、372 頁。
- 拉斐德,瑪麗·約瑟夫·保尔(Lafayette,
Marie-Joseph Paul 1757—1834)——
法國將軍,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
命和 1830 年資產階級七月革命時期大
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第 505 頁。
- 拉巴索拉(Labazora)——曾參加西班牙
獨立戰爭(1808—1814),中央洪達委
員。——第 481 頁。
- 拉瓦累特,沙尔·让·瑪麗·費里克斯
(Lavalette 或 La Valette, Charles-
Jean-Marie-Félix 1806—1881)——
法國國家活動家,波拿巴主義者;1851
—1853年任駐君士坦丁堡大使;曾任內
務大臣(1865—1867),外交大臣(1868
—1869)。——第 87 頁。
- 拉德茨基,約瑟夫(Radetzky, Joseph
1766—1858)——伯爵,奧地利元帥,
1831年起為意大利北部的奧軍指揮官,
1848—1849 年曾殘酷鎮壓意大利革命
民族解放運動;1850—1856 年為倫巴
第-威尼斯王國的總督。——第 209、
350、596 頁。
- 拉·馬爾摩拉,阿尔丰梭·費勒罗(La
Marmora, Alfonso Ferrero 1804—
1878)——意大利將軍和國家活動家,
曾任皮蒙特陸軍大臣(1848、1849—
1855、1856—1859),1855年在克里木任
撒丁軍軍長,後為首相。——第 350 頁。
- 拉摩里西尔,克利斯托夫·路易·萊
昂(Lamoricière, Christophe-Louis
Léon 1806—1865)——法國將軍和政
治活動家,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
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參加侵占阿尔及
利亚,1848 年積極參加鎮壓六月起義,
後為卡芬雅克政府的陸軍部長(6—12
月),對路易·波拿巴政府採取反對立
場,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變後,被驅逐
出國。——第 540 頁。
- 拉利-托朗达尔,特罗菲姆·热拉尔
(Lally-Tollendal, Trophime-Gérard
1751—1830)——法國政治活動家,十
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屬於
代表大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了的貴
族階級的溫和的保皇派。——第 475
頁。
- 拉比斯巴伯爵,恩利克·霍賽·奧當奈尔
(La Bisbal, Enriqui José O'Donnell
1769—1834)——西班牙將軍,曾參加
獨立戰爭(1808—1814);善於玩弄權
術;在反動年代(1814—1820)一面和自
由派保持聯繫,一面向政府出賣革命
者;1820 年被派去鎮壓里埃哥起義時,
又站到革命者一邊,企圖利用起義以達
到個人目的。——第 487、505、506、508
頁。
- 拉罗什雅克兰,昂利·奧古斯特·若尔日
(La Rochejaquelein, Henri-Auguste-
Georges 1805—1867)——侯爵,法國
政治活動家,貴族院議員,正統派領導
人之一,在第二共和國時期為制憲議會
和立法會議員;後為第二帝國的參議
員。——第 44 頁。
- 波拿巴,路易——見拿破侖第三。
- 波拿巴,約瑟夫(Bonaparte, Joseph
1768—1844)——拿破侖第一的哥哥,
西班牙國王(1808—1813)。——第

- 122, 463—467, 471, 472, 475, 486, 503 頁。
- 波拿巴, 拿破侖·約瑟夫·沙尔·保尔 (Bonaparte, Napoléon-Joseph-Charles-Paul 1822—1891) ——拿破侖第三的堂弟, 1854 年任克里木法軍師長。——第 561, 562 頁。
-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 (1589—1792, 1814—1815 和 1815—1830) 和西班牙王朝 (1700—1868 和 1874—1931)。——第 30, 44, 286, 461, 489 頁。
- 波波維奇, 季莫費 (Popovič, Timotheus 1795—1867) ——奧地利將軍, 1854 年奧地利占領多瑙河各公國時為布加勒斯特軍事總督。——第 529 頁。
- 波門特男爵, 迈尔斯·托馬斯·斯特普尔顿 (Beaumont, Mails Thomas Steypeltone 1805—1854) ——英国貴族, 上院議員, 自由黨人。——第 321 頁。
- 波茨措-迪-博尔哥, 卡尔·奧西波維奇 (Пощ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1764—1842) ——伯爵, 俄国外交家, 科西嘉人, 1814—1821 年任駐巴黎公使, 1821—1835 年任駐巴黎大使, 后来是駐倫敦大使 (1835—1839)。——第 103, 153, 647 頁。
- 罗素, 約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黨領袖, 曾任首相 (1846—1852 和 1865—1866), 外交大臣 (1852—1853 和 1859—1865), 樞密院院長 (1854—1855)。——第 43, 53, 63, 76, 87, 94, 96, 99, 104, 106, 108, 121, 127, 151, 153, 156, 160—165, 169—171, 178, 193, 200, 242, 243, 269—273, 283, 315, 316, 323, 366, 367, 375, 378—382, 386, 387, 391, 392, 552, 610, 611, 629 頁。
- 罗斯, 休·亨利 (Rose, Hugh Henry 1801—1885) ——英国軍官, 1854 年起為將軍, 后為元帥; 駐君士坦丁堡代辦 (1852—1853); 克里木戰爭時期為駐克里木法軍司令部代表; 印度民族解放起義 (1857—1859) 的鎮壓者之一。——第 97, 237, 242 頁。
- 罗巴克, 約翰·阿瑟 (Roebuck, John Arthur 1801—1879)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資產階級激进分子, 議會議員, 1855 年為克里木英軍狀況調查委員會主席。——第 30, 87 頁。
- 罗宾逊, 阿伯拉罕 (Robinson, Abraham) ——五十年代宪章运动活动家之一。——第 139 頁。
- 罗宾逊, 弗雷德里克·約翰, 葛德里奇子爵 (Robinson, Frederick John, viscount Goderich 1782—1859)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黨人; 1823—1827 年任財政大臣, 首相 (1827—1828)。——第 644 頁。
- 罗曼納侯爵, 彼得罗·卡罗-伊-苏雷达 (Romana, Pedro Caro y Sureda, marqués de la 1761—1811) ——西班牙將軍, 曾參加獨立戰爭 (1808—1814), 阿斯土里亞中央洪達委員。——第 471, 480, 481, 487 頁。
- 佩特曼 (Peitman) ——德国教育家。——第 356, 357, 367, 393 頁。
- 佩克桑, 昂利·約瑟夫 (Paixhans, Henri-Joseph 1783—1854) ——法国將軍, 軍事工程師和發明家, 著有許多有关火炮的著作。——第 6, 391 頁。
- 佩勒姆, 弗雷德里克·托馬斯 (Pelham, Frederick Thomas 1808—1861) ——英国海軍軍官, 1858 年起為海軍中將。——第 448 頁。

- 佩利西埃, 让·雅克 (Pelisier, Jean-Jacques 1794—1864) ——法国将军, 1855年起为元帅, 三十至五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 (1855年5月—1856年7月)。——第66页。
- 佩雷斯·德·卡斯特罗, 埃瓦里斯托 (Perez de Castro, Evaristo 1778—1848) ——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加迪斯议会议员 (1810—1813), 曾参加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 曾任政府首脑 (1838—1840)。——第509页。
- 佩苏埃拉-伊-塞巴耳奥斯, 璜 (Pezuela y Ceballos, Juan 1809—1906) ——西班牙将军和军事著作家, 属于温和派, 曾任海军大臣 (1846), 1867年起为参议员。——第404页。
- 奈, 米歇尔 (Ney, Michel 1769—1815) ——法国元帅, 曾参加拿破仑第一的远征, 1808—1811年参加西班牙战争。——第481页。
- 奈特, 弗雷德里克·温 (Knight, Frederick Winn 生于1812年) ——英国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第380页。
- 奈斯密斯, 查理 (Nasmyth, Charles 1826—1861) ——英国军官, “泰晤士报”驻多瑙河奥美尔-帕沙司令部的军事通讯员。——第298、335、336、390、395页。
- 奈穆尔公爵, 路易·沙尔·菲利浦·拉法埃尔 (Nemours, Luis-Charles-Philippe-Raphaël 1814—1896) ——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的第二个儿子。——第30页。
- 庞培 (格奈尤斯·庞培·马格努斯) (Pompejus Gnaeus Magnus 公元前106—48) ——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369页。
- 庞森比, 约翰 (Ponsonby, John 1770左右—1855) ——子爵, 英国外交家, 驻那不勒斯公使 (1832), 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1832—1841) 和驻维也纳大使 (1846—1850)。——第179页。
- 庞巴尔, 塞巴斯提安·约瑟 (Pombal, Sebastian José 1699—1782) ——侯爵, 葡萄牙国家活动家, 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 葡萄牙的实际上的执政者 (1756—1777)。——第474页。
- 门罗, 詹姆斯 (Monroe, James 1758—1831) ——美国国家活动家, 美国总统 (1817—1825), 共和党人。——第430、510页。
- 门茨, 乔治·弗雷德里克 (Muntz, George Frederick 1794—1857) ——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分子, 议会议员。——第268页。
- 法卢, 阿尔弗勒德 (Falloux, Alfred 1811—1886)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 1848年解散国家工厂的发起者和镇压巴黎六月起义的鼓吹者, 曾任教育部长 (1848—1849)。——第71页。
- 法耳梅赖耶尔, 雅科布·菲利浦 (Fallmerayer, Jakob Philipp 1790—1861) ——德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第142页。
- 尚博尔, 昂利·沙尔 (Chambord, Henri Charles 1820—1883) ——伯爵, 波旁王朝长系的最后代表, 查理十世的孙子, 法国亨利五世王位的追求者。——第30页。
- 尚加尔涅, 尼古拉·安·德奥杜尔 (Changarnier, Nicolas Anne Théodule

1793—1877)——法国將軍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保皇派；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參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二共和國時期制憲會議和立法會議議員，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變后被驅逐出法國。——第540頁。

林納赫，弗朗西斯科(Linage, Francisco 1795—1847)——西班牙將軍，屬於進步派，埃斯帕特羅的密友，從1835年起為他的秘書，1843年任步兵和國民軍總監；埃斯帕特羅的專政被推翻之後，隨同埃斯帕特羅逃亡英國。——第403頁。

林德赫斯特男爵，約翰·辛格爾頓·柯普利(Lyndhurst, John Singleton Copley 1772—1863)——英國國家活動家，著名的法學家，托利黨人；曾任大法官(1827—1830, 1834—1835和1841—1846)。——第316, 319, 659頁。

彼得一世(Петр I 1672—1725)——1682年起為俄羅斯皇帝，1721年起為全俄皇帝。——第601, 625, 673, 675頁。

彼得魯五世(Pedro V 1837—1861)——葡萄牙國王(1853—1861)。——第365頁。

芬倫，詹姆斯(Finlen, James)——憲章運動的著名活動家，1852—1858年為憲章派全國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第126, 139頁。

圖爾，伊什特萬(Türr, István 1825—1908)——匈牙利軍官，曾參加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和1848—1849年德國革命；曾隨同土耳其和英國軍隊參加克里木戰爭。——第519頁。

帖木兒(塔梅爾蘭)(1336—1405)——中亞細亞的統帥和征服者，東方幅員廣大

的國家的奠基者。——第49, 303頁。

味吉爾(普卜利烏斯·味吉爾·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偉大的羅馬詩人。——第451頁。

金塔納，曼努埃爾·霍賽(Quintana, Manuel José 1772—1857)——西班牙詩人和政治活動家，十八世紀法國啟蒙學派的擁護者，曾參加1808—1814年和1820—1823年資產階級革命，1808—1810年任中央洪達的秘書。——第476, 484頁。

孟德斯鳩，沙爾(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傑出的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作家，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君主立憲制的理論家。——第475頁。

昂古列姆公爵，路易·安都昂(Angoulême, Louis Antoine 1755—1844)——法國國王查理十世的兒子，1823年曾指揮法國軍隊鎮壓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第510, 671頁。

杰羅德，道格拉斯·威廉(Jerrold, Douglas William 1803—1857)——英國資產階級諷刺作家和劇作家。——第659頁。

舍夫茨別利——見艾釋黎，安東尼·庫伯。

岡薩勒斯·布腊沃，路易斯(Gonzalez Bravo, Luis 1811—1871)——西班牙國家活動家，溫和派領袖之一，曾任政府首腦(1843和1868)，內務大臣(1866—1868)，1868年轉到卡洛斯派方面。——第407, 408, 433, 515頁。

九 回

科克，保爾·德(Kock, Paul de 1794左

- 右—1871)——法国资产阶级作家, 著有一些輕浮的消遣小說。——第 168 頁。
- 科貝特, 威廉 (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第 189、274、644 頁。
- 科布頓, 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派領袖和反谷物法同盟的創始人之一; 議會議員。——第 44、50、51、87—91、93、198、380、432、644 頁。
- 科拉第, 費南多 (Corradi, Fernando 死于 1885 年)——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和記者, “人民呼声报”主編。——第 513 頁。
- 科苏特, 拉約什 (路德維希) (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 1848—1849 年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人, 匈牙利革命政府的首脑; 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 9、100、222、282、283 頁。
- 科堡家族 (Coburg)——德国的一个公爵家族, 比利时、葡萄牙、英国以及許多其他欧洲国家的王朝不是属于这个家族, 就是和这个家族有关系。——第 30、123、393 頁。
- 科尔特斯, 艾尔南 (費南多) (Cortes, Hernan (Fernando) 1485—1547)——西班牙征服者, 曾征服阿西德克人 (墨西哥人) 的国家。——第 461 頁。
- 科耳亚多, 霍賽·曼努埃尔 (Collado, José Manuel)——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銀行家, 属于进步派, 曾任財政大臣 (1854—1856)。——第 343、430、514 頁。
- 科尔尼洛夫,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謝也維奇 (Корнилов,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06—1854)——俄国杰出的海軍活动家, 海軍上将, 黑海舰队参謀长 (1849—1853), 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鼓舞者和組織者之一。——第 23 頁。
- 科罗尼尼-克隆貝尔格, 約翰·巴普提斯特 (Coronini-Cronberg, Johann Baptist 1794—1880)——伯爵, 奥地利將軍, 1854 年任駐多瑙河各公国奧軍軍长。——第 325、360 頁。
- 查理一世 (Karl I 1500—1559)——西班牙国王 (1516—1556), 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的皇帝, 帝号查理五世 (1519—1556)。——第 456、459—461、468、496 頁。
- 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 (1625—1649), 十七世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621 頁。
- 查理二世 (Karl II 1661—1700)——西班牙国王 (1665—1700)。——第 455 頁。
- 查理三世 (Karl III 1716—1788)——西班牙国王 (1759—1788)。——第 474、504 頁。
- 查理四世 (Karl IV 1748—1819)——西班牙国王 (1788—1808)。——第 456、463、474、509 頁。
- 查理六世 (Karl VI 1685—1740)——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的皇帝 (1711—1740)。——第 115 頁。
- 查理十世 (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 (1824—1830)。——第 319、431 頁。

查理十二(Karl XII 1682—1718)——瑞典國王(1697—1718)。——第 612 頁。

查尔托雷斯基, 亚当·埃日伊(Czartoryski, Adam Jerzy 1770—1861)——公爵, 波兰大地主, 十九世紀初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 曾任俄国外交大臣(1804—1806);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时任临时政府首脑; 起义被镇压后流亡巴黎, 在那里领导波兰的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第 100、222 頁。

威廉斯, 詹姆斯(Williams, James)——五十年代宪章运动活动家之一。——第 125、139 頁。

威尔逊, 詹姆斯(Wilson, James 1805—186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論者, “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人和編輯; 1853—1858 年任财政部秘书长。——第 53、394、530、642 頁。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魯士亲王, 普魯士國王(1861—1888), 德国皇帝(1871—1888)。——第 83 頁。

威廉三世(William III 1817—1890)——尼德兰國王(1849—1890)。——第 69 頁。

威廉四世(William IV 1765—1837)——英国國王(1830—1837)。——第 45、67 頁。

威尔逊-派頓, 約翰(Wilson-Patten, John 1802—1892)——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保守党人; 議會議員。——第 659 頁。

威灵頓公爵, 阿瑟·威尔斯里(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1769—1852)——英国統帥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08—1814 年和 1815 年, 在反对拿

破命第一的战争中任統帥; 曾任軍械总长(1818—1827), 总司令(1827—1828、1842—1852), 首相(1828—1830), 外交大臣(1834—1835)。——第 150、154、190、191、262、263、267、269、289、317、319、387、398、405、482、484、542、635、636 頁。

威尔斯里侯爵, 理查·科利(Wellesley, Richard Colley 1760—1842)——英国国家活动家, 曾任印度总督(1797—1805), 駐西班牙大使(1809), 外交大臣(1809—1812), 爱尔兰总督(1821—1828、1833—1834), 曾残酷镇压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第 484、636 頁。

哈丁, 亨利(Hardinge, Henry 1785—1856)——子爵, 英国將軍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5 年起为元帅; 曾任軍务大臣(1828—1830 和 1841—1844), 印度总督(1844—1847), 英軍总司令(1852—1856)。——第 9 頁。

哈利耳-帕沙(Halil Pasha 死于 1856 年)——土耳其軍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 多次任大臣职务; 1854—1855 年为海軍大臣。——第 29 頁。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er)——自 1273 年起至 1806 年所謂神圣羅馬帝國王朝(中有間断)、西班牙(1516—1700)、奥地利帝國(1804—1867)和奧匈帝國(1867—1918)的王朝。——第 313、461 頁。

哈德威克伯爵, 查理·菲力浦·約克(Hardwicke, Charles Philip Yorke 1799—1873)——英国海軍上将, 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第 189、376 頁。

哈麦尔-普格施塔尔, 約瑟夫(Hammer-Purgstall, Joseph 1774—1856)——

- 奥地利资产阶级的东方学的历史学家，著有許多关于土耳其历史的著作；1796年至1835年担任近东方面的外交职务。——第282頁。
- 洛佩斯，华金·馬利阿 (Lopez, Joaquin Maria 1798—1855) ——西班牙法学家、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进步派的領袖之一，1843年为政府首脑。——第404、407頁。
- 洛佩斯·巴尼約斯 (Lopez Baños) ——西班牙軍官，曾参加独立战争 (1808—1814年) 和1820—1823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派領袖之一，1820年任陸軍大臣。——第505頁。
- 洛桑諾·德·托勒斯，璜·艾斯特班 (Lozano de Torres, Juan Esteban) ——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反动分子，1817—1819年任司法大臣。——第482頁。
- 施利克，弗兰茨·亨利希 (Schlick, Franz Heinrich 1789—1862) ——伯爵，奥地利將軍，曾参加镇压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1854—1859年任加里西亚和布柯維納的奧軍指揮官。——第37頁。
- 施尔德尔，卡尔·安得列也維奇 (Шильдер, Карл Андреевич 1785—1854) ——俄国將軍，卓越的軍事工程师和发明家，1828—1829年和1854年俄土战争时在多瑙河领导俄軍进行圍攻作业。——第79、146、295、301—303、337、399頁。
- 施梯尔貝公爵，巴尔布·德米特利·比伯斯庫 (Ştirbei, Barbu Demetrius Bibesco 1801—1869) ——瓦拉几亚国君 (1849—1853和1854—1856)。——第347、385頁。
- 胡尔揚——見桑切斯，胡尔揚。
- 咸丰 (1831—1861) ——中国皇帝 (1850—1861)。——第124頁。
- 勃朗，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員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曾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場；1848年8月流亡英国，是在倫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67、125頁。
- 欧文，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 ——偉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68頁。
- 洪秀全 (1814—1864) ——中国农民革命战争 (1851—1864) 的領袖和思想家之一，乡村教师，1851年领导太平天国，封为天王。——第124頁。
- 英格兰，理查 (England, Richard 1793—1883) ——英国將軍，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軍师长。——第561頁。
- 玻利埃尔——見狄亚斯·玻利埃尔，璜。
- 約瑟夫二世 (Joseph II 1741—1790) ——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的皇帝 (1765—1790)。——第116、474、666頁。
- 美延多尔夫，彼得·卡季米罗維奇 (Мейендорф, Петр Казимирович 1796—1863) ——男爵，俄国外交家，1850—1854年任駐維也納公使。——第30頁。
- 柯瓦列夫斯基，叶哥尔·彼得罗維奇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Егор Петрович 1811—1868) ——俄国軍官、旅行家、作家和外交家；1853年任駐門的内哥罗專員，后来在多瑙河 (1853—1854) 和克里木 (1854) 的俄軍司令部任职。——第234頁。

迪斯累里, 本杰明, 貝肯斯菲尔德伯爵 (1871年受封)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托利党領袖之一, 后为保守党領袖; 曾任財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 首相(1868和1874—1880)。——第43、53、87、94—96、98—100、131、132、193、199、236、272、273、323、366、375、380、381、387、392、552、610、651頁。

范哈兰, 安东尼奥, 彼腊卡姆波斯伯爵 (Van-Halen, Antonio, conde de Peracamps 死于1858年) ——西班牙將軍, 属于进步派, 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以及1820—1823年和1834—1843年資產階級革命, 1843—1847年随同埃斯帕特罗流亡国外。——第404頁。

十 画

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 (傳記材料)。——第13、49、56、61、71、82、100、125、126、133、134、158、201、392、427、519頁。

馬德維, 約翰·尼古拉 (Madvig, Johan Nicolai 1804—1886) ——丹麥語言學家和國家活動家, 議會議員(1849—1874), 議會議長(1856—1863)。——第441頁。

馬考萊, 托馬斯 (Macaulay, Thomas 1800—1859) ——英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 輝格黨人, 議會議員。——第53頁。

馬志尼, 朱澤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意大利革命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之一, 1849年為羅馬共和國臨

時政府首腦, 1850年為倫敦歐洲民主主義者中央委員會組織者之一。——第222、519頁。

馬羅托, 拉斐爾 (Maroto, Rafael 1783—1847) ——西班牙將軍, 反動分子, 卡洛斯派軍隊的總司令。——第402頁。

馬尔蒙, 奧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德 (Marmont, Auguste Frédéric Louis de 1774—1852) ——法國元帥, 曾參加拿破侖第一的遠征, 1814年4月投靠波旁王朝, 在1830年七月革命時期為查理十世軍隊的指揮官。——第119頁。

馬基耶羅, 喬治烏 (Maghiero, Georgiu 生于1804年) ——瓦拉几亞將軍, 資產階級革命家, 1848年是臨時政府成員和瓦拉几亞革命軍司令官。——第333頁。

馬扎里尼, 朱利奧·雷蒙多 (Mazzarini, Giulio Raymondo 1602—1611) ——法國國家活動家, 紅衣主教; 1643年起為大臣, 在路易十四成年以前是法國實際上的執政者。——第186頁。

馬丁雅克, 讓·巴蒂斯特·西耳韋爾·格·德 (Martignac, Jean-Baptiste-Sylvère Gaye de 1778—1832) ——法國律師和反動政治活動家, 保皇黨人, 1823年曾參加鎮壓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 1828—1829年任內務大臣, 實際上是內閣首腦。——第510、511頁。

馬薩爾雷多, 曼努埃爾 (Mazarredo, Manuel 1807—1857) ——西班牙將軍, 反動分子, 曾任陸軍大臣(1847), 1854年為巴斯克軍區司令官。——第371頁。

馬土舍維奇, 安得列依 (Матушевич, Андрей 1796—1842) ——伯爵, 俄國外

- 交家,曾参加特劳波会议(1820)和維罗那会议(1822)以及1830年的倫敦会议。——第317頁。
- 馬尔利安尼,曼努埃尔(Marliani, Manuel 死于1873年)——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1859年以前住在西班牙,后侨居意大利。——第402、431頁。
- 馬姆茲伯里伯爵,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1807—188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的著名活动家;曾任外交大臣(1852、1858—1859),掌璽大臣(1866—1868、1874—1876)。——第74、189—191頁。
- 馬丁涅斯·德·拉·罗薩,貝尔迪霍·哥梅斯-伊-阿罗伊奧(Martinez de la Rosa, Berdejo Gomez y Arroyo 1787—1862)——西班牙作家和政治活动家,1808—1814年和1820—1823年资产階級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溫和派領袖之一,曾任政府首腦(1834—1835),內务大臣(1844—1846)。——第365頁。
- 馬尔切西-伊-奧累阿加,霍賽·馬利阿(Marchesi y Oleaga, José Maria 1801—1879)——西班牙將軍,属于溫和派,曾任卡塔卢尼亚軍区司令官(1853—1854),陸軍大臣(1864)。——第371頁。
- 格雷,乔治(Grey, George 1799—1882)——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曾任內务大臣(1846—1852、1855—1858和1861—1866)和殖民大臣(1854—1855)。——第189、283頁。
- 格里貝(Гриббе)——俄国將軍,曾参加克里木战争。——第588頁。
- 格兰特,詹姆斯(Grant, James 1802—1879)——英国激进派記者和作家,“晨报”的編輯(1850—1871)。——第658頁。
- 格拉赫,弗里德里希(Grach, Friedrich 1812—約1856)——普魯士軍官,1841年起在土耳其供职,1854年錫利斯特里亚防御战领导人之一。——第296—298頁。
- 格萊安,詹姆斯·罗伯特·乔治(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輝格党人,后为皮尔分子;曾任內务大臣(1841—1846),海軍首席大臣(1830—1834、1852—1855)。——第67、86、94、99、101、106、121、199、281、428、649頁。
- 格林姆肖,摩提默(Grimshaw, Mortimer 生于1827年左右)——宪章运动的活動家,1853—1854年普雷斯頓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第254頁。
- 格萊斯頓,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十九世紀下半叶是自由党領袖之一;曾任財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53、98、128—132、201、236—239、242、530、629、642頁。
- 格兰維耳伯爵,乔治·魯森-高尔(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1815—1891)——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后为自由党領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1851—1852、1870—1874和1880—1885),殖民大臣(1868—1870、1886);1852—1854年任樞密院院长。——第190、191、648頁。
- 格奧尔基·彼得罗維奇(Georgij Petro-

- witsch)——門的內哥羅的將軍，丹尼洛·涅哥什的親戚。——第 234 頁。
- 埃利奧，弗朗西斯科·哈維埃爾 (Elio, Francisco Xavier 1767—1822)——西班牙將軍和反動的政治活動家，曾參加獨立戰爭 (1808—1814)，1814 年曾幫助斐迪南七世建立專制制度，1820—1823 年資產階級革命期間作為反動暴亂的組織者之一被處死。——第 487、504 頁。
- 埃查古埃，拉斐爾 (Echagüe, Rafael 1815—1887)——西班牙軍官，曾參加 1854—1856 年資產階級革命，屬於溫和派。——第 341、433 頁。
- 埃雷羅斯，曼努埃爾·加爾西亞 (Herreiros, Manuel Garcia)——西班牙政治活動家，自由主義者，加迪斯議會議員，曾任司法大臣 (1808—1814 和 1820)。——第 509 頁。
- 埃斯帕特羅，巴爾多梅羅 (Espartero, Baldomero 1793—1879)——西班牙將軍和政治活動家，進步派領袖，西班牙的攝政 (1841—1843)，政府首腦 (1854—1856)。——第 364、369、371、372、401—408、413、414、426、432、433、435、512—514、522、557 頁。
- 埃斯潘納斯，沙爾·瑪麗·埃斯普里 (Espinasse, Charles-Marie-Esprit 1815—1859)——法國將軍，波拿巴主義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參加佔領阿爾及利亞，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變的積極參加者之一，曾參加克里木戰爭。——第 539、540 頁。
- 埃倫伯勒伯爵，愛德華·羅 (Ellenborough, Edward Law 1790—1871)——英國國家活動家，托利黨人，曾任印度總督 (1842—1844)，海軍首席大臣 (1846)，印度事務督察委員會主席 (1858)。——第 376 頁。
- 埃羅勒斯男爵，華金·伊邦涅斯 (Eroles, Jaouquin, baron de 1785—1825)——西班牙將軍，獨立戰爭 (1808—1814) 時期游擊隊指揮官，1820—1823 年資產階級革命時為保皇運動首領之一。——第 488 頁。
- 埃斯特哈濟·馮·加蘭塔，瓦倫亭·拉迪斯勞斯 (Esterhazy von Galanta, Valentin Ladislaus 1814—1858)——伯爵，奧地利外交家，1854—1858 年任駐俄國公使。——第 231 頁。
- 烏沙可夫，亞歷山大·克列奧納科維奇 (Уш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Клеонакович 1803—1877)——俄國將軍，1854 年任多瑙河俄軍指揮官，1855 年在克里木任師長。——第 350 頁。
- 烏爾基霍，馬利安諾·路易斯 (Urquijo, Mariano Luis 1768—1817)——西班牙作家和政治活動家，保皇派，法國占領西班牙時期 (1808—1814) 投靠法國人，曾任約瑟夫·波拿巴國王的政府首腦，1813 年僑居法國。——第 473 頁。
- 烏爾卡爾特，戴維 (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國外交家，反動的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親土耳其分子；三十年代在土耳其執行外交任務，1847—1852 年為議會議員，托利黨人。——第 12、13、19、62、70—72、179、275、283、386、422、557、658 頁。
- 烏爾卡爾特，威廉·波拉德 (Urquhart, William Pollard 1814—1871)——英國經濟學家和自由派政治活動家，議會議員。——第 53 頁。
- 烏得勒支的阿德里安 (Adrian Utrecht 1459—1523)——西班牙國王查理一世

- 的教师,1517年起为紅衣主教,1518年起为大宗教裁判者,1520—1521年为西班牙执政者,1522年起为羅馬教皇,称阿德里安六世。——第456頁。
- 烏加尔特-伊-拉里薩巴尔,安东尼奥(Ugarte y Larrizabal, Antonio 1780—約1833)——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反动分子,斐迪南七世的宫廷权奸的首領。——第509、510頁。
- 索尔,比埃尔(Soulé, Pierre 1801—1870)——美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曾任駐馬德里大使(1853—1854),曾力图使西班牙政府把古巴让給美国。——第432頁。
- 索拉,璜·馬利阿(Sola, Juan Maria 死于1819年)——西班牙軍官,资产阶级革命家,因参加反对斐迪南七世的专制制度的瓦倫西亚起义被处死。——第511頁。
- 索勒达,貝尼托(Soledad, Benito)——西班牙僧侶,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第478頁。
- 索麦維尔,亚历山大(Somerville, Alexander 1811—1885)——英国記者,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第52頁。
- 索伊蒙諾夫,費多尔·伊万諾維奇(Соймонов,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800—1854)——俄国將軍,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多瑙河和克里木俄軍指揮官,在因克尔芒战斗中陣亡。——第412頁。
- 納多,馬丁(Nadaud, Martin 1815—1898)——法国泥水匠,政論家,蒲魯东的追隨者,1849—1851年为立法議會議員,屬山岳派,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逐出法国,1859年以前侨居英国。——第125頁。
- 納瓦罗(Navarro 死于1817年)——西班牙革命家,因企图在瓦倫西亚宣布1812年宪法而被处死。——第511頁。
- 納皮尔,查理(Napier, Charles 1786—1860)——英国海軍上将,曾参加葡萄牙战争(1810和1834)和叙利亚战争(1840),1854年任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第64、79、117、255—257、308、348、349、356、391、392、449、450、552、673頁。
- 納尔瓦艾斯,拉蒙·馬利阿(Narvaez, Romón Maria 1800—1868)——西班牙將軍和反动的国家活动家,溫和派領袖,政府首腦(1844—1846、1847—1851、1856—1857、1864—1865和1866—1868),曾殘酷鎮压群众的革命发动。——第343、364、369、402—405、407、413、414、432、433頁。
- 納斯尔-埃德-丁(Nasr-ed-din 1831—1896)——伊朗沙赫(1848—1896)。——第10頁。
- 桑切斯,胡尔揚(Sanchez, Julian)——独立战争(1808—1814)时期游击队領袖之一。——第486頁。
- 桑塔-科洛馬伯爵,达馬西奧·凱腊耳特(Santa-Coloma, Dalmacuo Queralt 死于1640年)——西班牙国家活动家,卡塔卢尼亚总督,巴塞罗纳人民起义时被杀死。——第455頁。
- 桑塔-克魯斯-伊-帕切科,弗朗西斯科(Santa Cruz y Pacheco, Francisco 1802左右—1883)——侯爵,西班牙政治活动家,曾任內务大臣(1854—1856)和財政大臣(1856)。——第407、414、435、513頁。
- 拿破侖亲王——見波拿巴,拿破侖·約瑟夫·沙尔·保尔。
-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Napoléon I

-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 (1804—1814 和 1815)。——第 109、173、183、258、262、267、269、271、282、456、463—469、471—473、476、478、484、485、497、502、548—550、570、571、573、594、595、597、598、605、612、613、616、624、625、636 頁。
- 拿破侖第三 (路易-拿破侖·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拿破侖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總統 (1848—1851)，法国皇帝 (1852—1870)。——第 4、5、20、36、44、46、60、71、74、77、82—84、88、92、105、109、117、122、126、127、159、178、261、266、271、283、286、356、364、366、373、389、394、414、520、540、548—550、552、556、559、574 頁。
- 海斯，亨利希 (Heß, Heinrich 1788—1870) ——男爵，奥地利將軍，后为元帅，曾积极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1854—1855 年任駐匈牙利、加里西亚和多瑙河各公国的奥軍总司令。——第 203、345、529 頁。
- 海瑙，尤利烏斯·雅科布 (Haynau, Julius Jacob 1786—1853) ——奥地利元帅，曾殘酷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第 529 頁。
- 庫拉金，亚历山大·波利索維奇 (Кура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Борисович 1752—1818) ——公爵，俄国外交家，总理副大臣 (1796—1798 和 1801—1802)，1807 年参加簽訂俄法之間提尔西特和約，曾任駐巴黎大使 (1808—1812)。——第 465 頁。
- 庫埃斯塔——見加尔西亚·德·拉·庫埃斯塔，格萊哥里奧。
- 紐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費恩斯·佩勒姆·克林頓 (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Clinton 1811—1864) ——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分子，曾任陸軍和殖民大臣 (1852—1854)，陸軍大臣 (1854—1855) 和殖民大臣 (1859—1864)。——第 275、283、316、366、367、554、629 頁。
- 紐堡的瑪麗-安娜 (Maria-Anna de Neuburg 1667—1740) ——西班牙女王 (1689—1700)，查理二世的妻子。——第 456 頁。
- 哥尔查科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維奇 (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8—1883) ——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駐維也納大使 (1854—1856)，外交大臣 (1856—1882)。——第 344、352、353、360、428、647 頁。
- 哥尔查科夫，米哈伊尔·德米特利也維奇 (Горчаков,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793—1861) ——公爵，俄国將軍，曾任多瑙河軍团司令官 (1853—1854)，南方軍团总司令 (1854 年 9 月—1855 年 2 月)，后为克里木駐軍总司令 (1855 年 2—12 月)；波兰王国的总督 (1856—1861)。——第 40、43、143、144、147、223、303、350、360、384、412 頁。
- 倍恩，托馬斯 (Paine, Thomas 1737—1809) ——英国激进派政論家，共和主义者，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和十八世紀末的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第 393 頁。
- 浦若尔，路易 (Pujol, Louis) ——法国政論家，布朗基分子，曾参加法国 1848 年六月起义和 1854 年西班牙的革命事件。——第 426 頁。
- 班克斯，乔治 (Bankes, George 1788—

- 1856) ——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議會議員,財政部官員。——第 380 頁。
- 高尔威子爵, 乔治·爱德华·阿倫德耳 (Galway, George Edward Arundell 1805—1876) ——英国貴族,托利党人,議會議員。——第 52 頁。
- 恩佩西納多, 馬丁·璜 (Empecinado, Martin Juan 1775—1825) ——西班牙农民,独立战争时期(1808—1814)游击队領袖,从議會获得將軍头衔,曾积极参加 1820—1823 年資產階級革命,因企图发动起义反对斐迪南七世的反动制度而被处死。——第 488 頁。
- 翁格恩-施特恩堡, 恩斯特·威廉 (Унгерн-Штернберг, Эрнст Вильгельм) ——男爵, 俄国外交家,五十年代任駐哥本哈根公使。——第 49 頁。
- 涅謝尔罗迭, 卡尔·瓦西里也維奇 (Неселье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 ——伯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总理大臣 (1816—1856)。——第 49、95—97、103、148、152、169、170、190、203、223、231、429 頁。

十一画

- 梅薩, 克利斯提安·尤利烏斯 (Meza, Christian Julius 1792—1865) ——丹麦將軍, 1849—1856 年为炮兵旅长。——第 425 頁。
- 梅肯集, 托馬斯·弗米奇 (Мекензи, Фома Фомич 死于 1786 年) ——俄国海軍上将, 1783—1786 年任黑海分舰队司令, 塞瓦斯托波尔的創建人; 苏格兰人。——第 580 頁。
- 梅特涅, 克雷門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 ——公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民主革命运动的死敌; 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 反动的神圣同盟的組織者之一。——第 36、315、321 頁。
- 梅尔兰, 克利斯托夫·安都昂 (Merlin, Christophe Antoine 1771—1852) ——1808—1813 年为駐西班牙法国占領軍將軍。——第 472 頁。
- 梅塔克薩斯, 安得列依 (Metaxas, Andreas 1786 左右—1860) ——伯爵, 希腊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首相 (1843—1844), 駐君士坦丁堡大使 (1850—1854)。——第 213、217、218 頁。
- 梅耳加尔伯爵, 璜·托馬斯·卡布雷腊 (Melgar, Juan Thomas Cabrera 1652—1705) ——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大臣 (1693—1699), 1699 年人民起义后被驅逐出西班牙。——第 456 頁。
- 梅克倫堡-斯特雷利茨, 格奧尔格 (Mecklenburg-Strelitz, Georg 1824—1876) ——公爵, 德国貴族, 在俄軍中供职的將軍。——第 201 頁。
- 康涅多, 阿隆索 (Cañedo, Alonzo) ——西班牙神甫, 极端反动分子, 加迪斯議會議員 (1810—1813)。——第 500 頁。
- 康罗貝尔, 弗朗斯瓦·塞尔坦 (Canrobert, François-Certain 1809—1895) ——法国將軍, 1856 年起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曾任克里木法軍总司令 (1854 年 9 月—1855 年 5 月)。——第 423、574、594、600、607 頁。
- 康斯坦丁·尼古拉也維奇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7—1892) ——俄国大公, 尼古拉一世的次子, 海軍上将, 曾領導海軍部門 (1853—1881) 和舰队 (1855

- 1881)。——第 299 頁。
- 康波曼內斯,彼得罗·罗德里格斯(Campomanes, Pedro Rodriguez 1723—1803)——伯爵,西班牙国家活动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經濟学家,开明君主制度的拥护者;曾任財政大臣(1762—1791)。——第 497 頁。
- 莫兰諾,安东尼奥·吉埃尔莫(Moreno, Antonio Guillermo)——西班牙銀行家和政治活动家。——第 343 頁。
- 莫里耳奧,帕布洛(Morillo, Pablo 1778—1837)——西班牙將軍,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1815—1820 年指揮西班牙軍隊鎮压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1820—1823 年資產階級革命时期站在反革命方面。——第 402、671 頁。
- 莫尔特克,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Moltke, Helmut Karl Bernhard 1800—1891)——普魯士軍官,后为元帅,反动的軍事活动家和作家,普魯士軍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1835—1839 年在土耳其軍隊供职;曾任普魯士总參謀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參謀长(1871—1888)。——第 297 頁。
- 莫利托尔,加布里埃尔·让·約瑟夫(Molitor, Gabriel-Jean-Joseph 1770—1849)——法国將軍,1823 年武装干涉西班牙时任軍长。——第 669 頁。
- 梯尔泰(Tyrtaios (Τυρταῖος) 公元前七至六世紀)——古希腊的詩人。——第 279 頁。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曾任內务大臣(1832、1834),首相(1836、1840),共和国总统(1871—1873),絞杀巴黎公社的劊子手。——第 286 頁。
- 梯利希,弗雷德里克·斐迪南(Tillisch, Frederik Ferdinand 1801—1889)——丹麦的反动国家活动家,保皇派,曾任內务大臣(1851—1852、1854、1864—1865)。——第 425 頁。
- 曼納斯,約翰·詹姆士·罗伯特(Manners, John James Robert 1818—1906)——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四十年代参加“青年英国”社,議會議員,多次任保守党政府的大臣职务。——第 89、90 頁。
- 曼斯巴赫,卡尔(Mansbach, Karl 1790—1867)——瑞典將軍和外交家,曾任駐維也納公使(1852—1855)。——第 360 頁。
- 曼托伊費尔,奧托·泰奧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普魯士国家活动家,貴族官僚制度的代表;曾任內务大臣(1848—1850),首相兼外交大臣(1850—1858)。——第 83、159、204、206、223—225、233—235 頁。
- 培根,弗兰西斯,維魯拉姆男爵(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1561—1626)——杰出的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的創始人;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第 474 頁。
- 培尔西尼,让·日尔貝尔·維克多(Persigny, Jean Gilbert Victor 1808—1872)——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立法議會議員(1849—1851),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組織者之一,曾任內务大臣(1852—1854 和 1860—1863)。——第 36 頁。
- 基罗加,安东尼奥(Quiroga, Antonio

1784—1841)——西班牙軍官，自由主义者，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和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第505—507頁。

基謝廖夫，尼古拉·德米特利也維奇(Киселев, 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1800—1869)——俄国外交家，1851—1854年任駐巴黎公使。——第27、63、77、229頁。

理查，維散特(Richard, Vicente 死于1816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家，曾发动起义反对斐迪南七世的专制制度，失败后被处死。——第511頁。

累亚德，奧斯丁·亨利(Layard, Austin Henry 1817—1894)——英国考古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后为自由党人，議會議員。——第53、85、86、179、193、194、316、381頁。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偉大的英国作家。——第101、188、267、361、659頁。

勒弗夫尔，比埃尔·弗朗斯瓦·約瑟夫(Lefebvre, Pierre François-Joseph 1755—1820)——法国元帅，曾参加拿破仑第一的远征，1808年参加西班牙战争。——第471頁。

捷尔沙文，加甫里拉·罗曼諾維奇(Державин, Гаврила Романович 1743—1816)——杰出的俄国詩人，古典主义的代表。——第334頁。

得比伯爵(1851年受封)，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領袖，后为保守党領袖之一；曾任殖民大臣(1833—1834、1841—1844)，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

—1868)。——第22、67、74、179、188、191—193、273、610頁。

符拉德五世(Ulad V)——瓦拉几亚国君(1456—1462和1476—1479)。——第328頁。

十二画

菲耳德(Filder)——英国將軍，1854—1855年为克里木英軍軍需司令。——第387頁。

菲埃隆，雅克·阿梅德·菲力浦(Fiéron, Jacques-Amédé-Philippe 生于1796年)——法国將軍，曾参加克里木战争。——第348頁。

菲茨威廉，查理·威廉(Fitzwilliam, Charles William 1786—1857)——伯爵，英国議会活动家，輝格党人。——第376頁。

菲力浦二世(Philipp II 1527—1598)——西班牙国王(1556—1598)。——第478頁。

菲力浦四世(Philipp IV 1605—1665)——西班牙国王(1621—1665)。——第455頁。

菲力浦五世(Philipp V 1683—1746)——西班牙国王(1700—1746)。——第478頁。

菲茨赫伯特，阿倫，圣海倫斯男爵(Fitzherbert, Alleyne, Baron St. Helens 1753—1839)——英国外交家，1783—1787年任駐彼得堡公使。——第92頁。

斯坦利——見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

斯梯林，威廉(Stirling, William 1818—1878)——英国历史学家和艺术理論家，溫和的托利党人，議會議員，著有許

- 多西班牙艺术史方面的著作。——第 53 頁。
- 斯蒂芬逊, 罗伯特 (Stephenson, Robert 1803—1859)——英国工程师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議會議員。——第 53 頁。
- 斯卡利特, 詹姆士·約克 (Scarlett, James Yorke 1799—1871)——英国將軍, 1854—1855 年初任騎兵旅长, 后任克里木英軍騎兵司令(1855—1856)。——第 591 頁。
- 斯图亚特, 达德利·庫茨 (Stuart, Dudley Coutts 1803—1854)——英国政治活动家, 輝格党人, 議會議員; 曾与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有联系。——第 65、76、87、332、381、382、387、390 頁。
-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 斯特腊特弗德·坎宁 (Stratford de 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1786—1880)——英国外交家, 曾任駐君士坦丁堡公使(1810—1812、1825—1828、1841—1858)。——第 10、27、37、65、71、75、88、95—98、107、108、117、121、143、160、175、201、213、214、217、222、332、333、363、421、524、553、557 頁。
- 普切塔——見蒙尼奧斯·本納溫特, 霍賽 (普切塔)。
- 普腊德, 多米尼克·杜福尔·德 (Pradt, Dominique Dufour de 1759—1837)——法国神甫, 外交家, 政論家和历史学家。——第 483、486、494 頁。
- 普里契特, 罗伯特·泰勒 (Pritchett, Robert Taylor 1828—1907)——英国枪炮工匠, 曾改进米涅式步枪。——第 265 頁。
- 普魯士亲王——見威廉一世。
- 普里姆-伊-普腊斯, 璜 (Prim y Prats, Juan 1814—1870)——西班牙將軍和政治活动家, 进步派領袖之一, 曾参加 1834—1843 年和 1854—1856 年資產階級革命, 1843—1844 年殘酷鎮压共和派和进步派左翼在卡塔卢尼亚的起义。——第 530、531 頁。
- 普林西佩-伊-維达烏德, 米格尔·奧古斯丁 (Principe y Vidaud, Miguel Agustin 1811—1866)——西班牙作家, 著有許多西班牙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著作, 屬进步派。——第 406 頁。
- 斐迪南一世 (Ferdinand I 1793—1875)——奥地利皇帝 (1835—1848)。——第 116 頁。
-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1810—1859)——那不勒斯国王 (1830—1859), 因 1848 年炮击墨西拿而有炮彈国王之称。——第 351、414、430、552 頁。
- 斐迪南四世 (Ferdinand IV 1285—1312)——加斯梯里亚和累翁的国王 (1295—1312)。——第 495 頁。
- 斐迪南七世 (Ferdinand VII 1784—1833)——西班牙国王 (1808 和 1814—1833)。——第 407、436、456、463、466、467、469、482、488、490、494、501、504—511、669、670、672 頁。
- 琼斯, 哈利·大卫 (Jones, Harry David 1791—1866)——英国將軍, 軍事工程师; 1810—1813 年参加西班牙战争; 1854 年为波罗的海英国远征軍指揮官, 1855 年在克里木作战时曾負責工程勤务。——第 445、450、527 頁。
- 琼斯, 厄内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无产階級詩人和政論家, 革命的宪章派領袖之一, “北极星

报”編輯之一，“寄語人民”和“人民报”的編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67、125、126、139、416—419 頁。

萊昂斯，艾德蒙 (Lyons, Edmund 1790—1858)——英国海軍上将；曾任駐雅典公使 (1835—1849)，1854 年任副总司令，1855 年任黑海舰队总司令。——第 117、259、363、553、582 頁。

萊宁根-威斯特堡，克利斯提安·弗兰茨 (Leiningen-Westerburg, Christian Franz 1812—1856)——伯爵，奥地利將軍，1853 年率領特派使团赴君士坦丁堡。——第 75、76 頁。

凱撒 (凱尤斯·尤利烏斯·凱撒) (C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 100 左右—44)——著名的羅馬統帥和国家活动家。——第 369 頁。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杰出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探討了唯心主义辯证法。——第 541 頁。

博斯凱，比埃尔·約瑟夫·弗朗斯瓦 (Bosquet, Pierre-Joseph-François 1810—1861)——法国將軍，1856 年起为元帅，三十至五十年代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4 年任克里木法軍师长，后任軍长 (1854—1855)。——第 561—563、579、587、588、590、592、597 頁。

温特兰德 (Wendland)——1854 年是希腊国王奧托一世的私人秘书。——第 360 頁。

腊格倫男爵，菲茨罗伊·詹姆士·亨利·索美塞特 (Raglan, Fitzroy James Henry Somerset 1788—1855)——英国將軍，1854 年起为元帅；以威灵頓的參謀的身分参加反对拿破侖第一的战

爭 (1808—1814 和 1815)，曾任总司令办公室的軍务秘书 (1827—1852)，軍械总长 (1852—1854)，克里木的英軍总司令 (1854—1855)。——第 276、304、306、388、397、398、423、539、541、542、545、554、572、574—576、580、583、586、592、594、596、600、623、627、630、633 頁。

傅阿德-埃芬蒂 (Fuad-Effendi 1814—1869)——土耳其国家活动家，1848 年是駐多瑙河各公国的政府專員，血腥鎮压民族解放运动的組織者之一；五十至六十年代曾多次担任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第 331、332 頁。

登克林男爵，烏利克·坎宁 (Dunkellin, Ulick Canning 生于 1827 年)——英国軍官，曾参加克里木战争，后为議會議員。——第 659 頁。

十三画

奧达利，彼得罗 (O'Daly, Pedro)——西班牙軍官，曾参加独立战争 (1808—1814) 和 1820—1823 年資產階級革命。——第 505 頁。

奧特韦，阿瑟·約翰 (Otway, Arthur John 1822—1912)——英国議会活动家，五十年代是托利党人。——第 357、367、393 頁。

奧托一世 (Otto I 1815—1867)——巴伐利亚王子，后为希腊国王 (1832—1862)。——第 105、121、212、249、360 頁。

奧罗斯科 (Orozco)——西班牙軍官，曾参加 1854—1856 年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第 352 頁。

奧尔特腊 (Oltra)——西班牙軍官，曾参加 1820—1823 年資產階級革命。——

第 506 頁。

奧捷羅夫 (Озеров) ——俄国外交家, 1853 年任駐君士坦丁堡临时代办。——第 75 頁。

奧利維腊, 本杰明 (Oliveira, Benjamin) ——英国議會議員。——第 53 頁。

奧康奈尔, 丹尼尔 (O'Connell, Daniel 1775—1847) ——爱尔兰律师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派的領袖。——第 67 頁。

奧当奈尔, 列奧波多 (O'Donnell, Leopoldo 1809—1867) ——西班牙將軍和反动政治活动家, 溫和派領袖之一; 1854 年, 企图利用国内革命危机来建立軍事独裁; 曾以陸軍大臣的身分領導鎮压 1854—1856 年的資產階級革命, 曾任反动政府的首腦 (1856、1858—1863 和 1865—1866)。——第 324、340、352、364、365、369、373、404、413、414、426、430、505、516、522 頁。

奧尔洛夫, 尼古拉·阿列克謝也維奇 (Орл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27—1885) ——伯爵, 俄国陸軍上校, 1854 年参加对錫利斯特里亚的强攻; 后为將軍和外交家, 多次任俄国駐許多欧洲国家的代表。——第 300、303 頁。

奧尔洛夫, 阿列克塞·費多羅維奇 (Ор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786—1861) ——伯爵, 1856 年后为公爵, 俄国軍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 外交家; 曾同土耳其簽訂阿德里安堡条約 (1829) 和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 (1833), 曾率領俄国代表团出席巴黎會議 (1856)。——第 56、64、69、70、202 頁。

奧羅佩薩, 艾曼努埃爾·華金 (Oropesa, Emanuel Joachim 1642—約 1707) ——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大臣 (1685

—1691 和 1698—1699), 1699 年人民起义后被驅逐出西班牙。——第 456 頁。

奧洛薩加, 薩魯斯蒂亞諾·德 (Olozaga, Salustiano de 1805—1873) ——西班牙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进步派領袖之一, 曾任政府首腦 (1843), 駐巴黎公使 (1840—1843 和 1854), 曾参加 1854—1856 年資產階級革命。——第 403、407、408、433 頁。

奧尔良王朝——法国王朝 (1830—1848)。——第 30、123、520 頁。

奧美尔-帕沙 (米哈伊尔·拉塔斯) (Omer Pasha (Michail Latas) 1806—1871) ——土耳其將軍, 克罗地亚人, 二十年代在奥地利軍隊供职, 三十年代初加入土耳其国籍; 曾任駐瓦拉几亚土軍指揮官 (1848—1849), 門的内哥羅土軍指揮官 (1853), 多瑙河土軍总司令 (1853—1854), 克里木土軍总司令 (1855) 和高加索总司令 (1855—1856)。——第 3、35、40、57、66、72、80、81、143、145、146、208—210、276—278、293、299、304、311、331、338、361、362、383、389、390、396、397、412、422、423、428、529、548、551、555、556、609、624 頁。

奧斯坦-薩肯, 德米特利·叶羅費也維奇 (Остен-Сакен, Дмитрий Ерофеевич 1789—1881) ——俄国將軍, 克里木战争时期在俄国南部任軍长 (1853—1854), 塞瓦斯托波尔城防司令 (1854 年底—1855 年)。——第 40、144、244、245、597 頁。

奧勃魯切夫, 亞歷山大·阿法納西也維奇 (Обруч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Афанасьевич) ——俄国將軍。——第 25、33 頁。

奧斯卡爾一世 (Oskar I 1799—1859)

- 瑞典和挪威的国王(1844—1859)。
——第 201、425、440、451 頁。
- 奥倫治的威廉三世 (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 ——尼德兰总督 (1672—1702), 英国国王 (1689—1702)。——第 621 頁。
- 奥布廉諾維奇王朝——塞爾維亞公国王朝 (1817—1842 和 1858—1882), 后为皇朝 (1882—1903)。——第 26、35 頁。
- 奥修尔利万·德·格拉斯, 阿尔丰斯·阿尔伯·昂利 (O'Sullivan de Grass, Alphonse-Albert-Henri 1798—1866) ——伯爵, 比利时外交家, 1837—1866 年任駐維也納公使。——第 360 頁。
- 塞奥昂奈, 安东尼奥 (Seoane, Antonio) ——西班牙將軍, 支持埃斯帕特罗的独裁, 1843 年后轉到溫和派方面, 曾参加 1854—1856 年資產階級革命。——第 404 頁。
- 塞里姆-帕沙 (Selim Pasha) ——土耳其將軍, 1853—1854 年任高加索土軍軍長。——第 309 頁。
- 塞里姆-帕沙 (捷德林斯基) (Selim Pasha (Zedlinsky)) ——土耳其將軍, 波兰人; 1853—1854 年任多瑙河土軍指揮官。——第 35、57 頁。
- 塞維耳昂諾, 西霍腊·璜, 富安特斯·德·杜埃罗侯爵 (Sevillano, Sijora Juan, marqués de Fuentes de Due-ro) ——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財政大臣 (1854)。——第 343 頁。
- 塞巴斯提昂尼, 奥拉斯 (Sébastieni, Horace 1772—1851) ——伯爵, 法国元帅, 外交家;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2), 駐君士坦丁堡大使 (1806—1807) 和駐倫敦大使 (1835—1840)。——第 549 頁。
- 塞拉諾-伊-多敏格斯, 弗朗西斯科 (Ser-rano y Dominguez, Francisco 1810—1885) ——西班牙將軍和国家活动家, 陸軍大臣 (1843), 1856 年政变的参加者, 政府首脑 (1868—1869、1871、1874), 外交大臣 (1862—1863); 王国摄政 (1869—1871)。——第 351、369、373、433 頁。
- 塞万提斯·德·薩維德拉, 米格尔 (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 ——偉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 406、485、521、672 頁。
- 路汉, 弗朗西斯科 (Lujan, Francisco 1798—1867) ——西班牙將軍, 作家和学者, 西班牙科学院創始人之一, 1836 年起为議會議員, 屬於溫和派, 曾任国民經济发展大臣 (1854、1856 和 1863)。——第 413 頁。
- 路易-拿破侖——見拿破侖第三。
- 路易-菲利浦 (Louis Philippe 1773—1850) ——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 (1830—1848)。——第 105、109、117、123、188、286、403、406、433 頁。
- 路易十一 (Louis XI 1423—1483) ——法国国王 (1461—1483)。——第 456 頁。
-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 (1643—1715)。——第 182 頁。
- 雷德克利夫——見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 斯特腊特弗德。
- 雷芬特洛夫-格里敏尼尔, 亨利希 (Re-ventlow-Criminil, Heinrich 1798—1869) ——伯爵, 丹麦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外交大臣 (1842—1848), 霍尔施坦事务大臣 (1852—1854)。——第 27 頁。

福雷，埃利·弗雷德里克 (Forey, Elie Frédéric 1804—1872)——法国將軍，后为元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1854—1855年为克里木法軍指揮官。——第249、562頁。

福克斯，威廉·約翰遜 (Fox, William Johnson 1786—1864)——英国政治活动家，宣傳家和政論家，自由貿易論者，后归附自由党；議會議員。——第53頁。

瑟美列，貝尔塔兰 (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曾任內务部长(1848)和革命政府首腦(1849)；革命失敗后逃离匈牙利。——第9頁。

葛伊甸，洛金·彼得羅維奇 (Гейден, Логин Петрович 1772—1850)——俄国海軍上将，在1827年納瓦林会战中为分舰队司令，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为俄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第317頁。

塔提舍夫，德米特利·巴甫洛維奇 (Та-тищев, Дмитрий Павлович 1767—1845)——俄国外交家，曾任駐馬德里公使(1815—1821)，俄国出席維罗那會議的代表(1822)，駐維也納大使(1826—1841)。——第509—511頁。

道格拉斯，霍华德 (Douglas, Howard 1776—1861)——英国將軍和軍事著作家，著有炮兵和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448、661頁。

十四画

維达尔，华金 (Vidal, Joaquin 死于1819年)——西班牙軍官，自由主义者，1819

年领导瓦倫西亚起义反对斐迪南七世专制制度。——第511頁。

維多利亞 (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 (1837—1901)。——第29、45、46、56、170、178、188、199、262、285、367、373、375、382、393、405、556、610頁。

維里阿特 (Viriatius 死于公元前139年)——公元前150—139年古代西班牙部落发动起义反对羅馬統治的首領。——第437頁。

維尔埃納——見帕切科，璜·維尔埃納侯爵。

維耳埃耳 (Vilhel)——西班牙貴族，中央洪达委員(1808)。——第482頁。

維索茨基，約瑟夫 (Wysocki, Józef 1809—1873)——波兰政治活动家，將軍和軍事著作家，曾参加波兰1830—1831年和1863—1864年起义以及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起义和革命失敗后流亡法国；克里木战争时曾企图組織波兰軍团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第222頁。

維耳亚康帕，彼得罗 (Villacampa, Pedro 1776—1845)——西班牙將軍，独立战争(1808—1814)时期游击队指揮官，曾参加1820—1823年資產階級革命，后任軍队的指揮官，參議員。——第488頁。

維斯达·埃尔莫薩，安赫尔·哈尔西亚·洛伊哥里 (Vista Hermosa, Angel Garcia Loygorri 死于1887年)——伯爵，西班牙將軍，1854年指揮政府軍力图鎮压西班牙革命，失敗后逃往国外。——第352頁。

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 (Viktor Emanuel II 1820—1878)——皮蒙特国王 (1849

- 1861), 意大利国王 (1861—1878)。
——第 82 頁。
- 蒙克, 查理·斯坦利 (Monck, Charles Stanley 1819—1894)——子爵, 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曾任财政部部务委员 (1855—1858), 加拿大总督 (1861—1866 和 1867—1868)。——第 52 頁。
- 蒙太莫林, 卡洛斯·路易斯·馬利阿 (Montemolin, Carlos Luis Maria 1818—1861)——西班牙王子, 唐·卡洛斯的长子, 五十年代为西班牙王位的追求者, 称查理六世。——第 365 頁。
- 蒙潘西埃公爵, 安都昂·瑪丽·菲利浦·路易 (Montpensier, Antoine Marie Philippe Louis 1824—1890)——法王路易-菲利浦的儿子, 西班牙公主瑪丽-路易莎-費南达的丈夫, 1868—1869 年为西班牙王位的追求者。——第 123 頁。
- 蒙尼奥斯, 奥古斯丁·費南多, 里安薩雷斯公爵 (Muñoz, Agustin Fernando, duque de Riansares 1808 左右—1873)——王国军队的士官, 西班牙摄政女王瑪丽-克里斯亭娜的丈夫。——第 516、521 頁。
- 蒙塔郎貝尔, 沙尔 (Montalembert, Charles 1810—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 奥尔良分子, 天主教派的首領。——第 71 頁。
- 蒙塔郎貝尔, 馬尔克·勒奈 (Montalembert, Marc-René 1714—1800)——法国將軍, 軍事工程师, 曾研究出一种新筑城法, 这种方法在十九世紀被广泛采用。——第 409、443、444、543、582、675 頁。
- 蒙蒂霍伯爵, 欧仁尼奥·帕拉福克斯-伊-波尔托卡雷罗 (Montijo, Eugenio Palafox y Portocarrero)——西班牙冒險主义者。——第 487 頁。
- 蒙尼奥斯-托雷罗, 迪埃哥 (Muñoz-Torrero, Diego 1761—1829)——西班牙神甫, 薩拉芒卡大学校长, 加迪斯議會 (1810—1813) 中最激进的議員之一, 曾参加 1820—1823 年資產階級革命。——第 500 頁。
- 蒙尼奥斯·本納溫特, 霍賽 (普切塔) (Muñoz Benavente, José (Pucheta) 1820—1856)——西班牙斗牛士, 曾积极参加 1854—1856 年資產階級革命, 馬德里人民群众领导人之一, 在街垒战中陣亡。——第 426、433 頁。
- 瑪丽-泰莉莎 (Maria Theresia 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 (1740—1780), 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的女皇 (1745—1780)。——第 112、113 頁。
- 瑪丽-阿梅莉亚 (Marie-Amélie 1782—1866)——法国女王 (1830—1848), 路易-菲利浦之妻。——第 373 頁。
- 瑪丽亚-克里斯亭娜 (Maria Christina 1806—1878)——西班牙女王 (1829—1833), 斐迪南七世之妻, 王国摄政女王 (1833—1840)。——第 343、364、368、371、403、407、413、426、433、434、513、514、516、520—522 頁。
- 赫伯特·悉尼 (Herbert, Sidney 1810—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期是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曾任軍务大臣 (1845—1846 和 1852—1855) 和陸軍大臣 (1859—1860)。——第 93、94、387—390、622 頁。
- 赫克林, 雅科布 (Heeckeren, Jakob)——男爵, 荷兰外交家, 三十年代任駐

彼得堡公使，1842—1876年是駐維也納大使。——第360頁。

豪登——見卡拉多克，約翰·侯伯特，豪登男爵。

歌德，約翰·沃尔弗干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偉大的德國作家和思想家。——第643頁。

十五 画

德爾馬（Delmas）——在西班牙的法國僑民。——第426頁。

德律埃，昂利（Druey, Henri 1799—1855）——瑞士國家活動家，激進分子，聯邦委員會委員（1848—1854），1850年是瑞士聯邦主席。——第519頁。

德拉蒙德，亨利（Drummond, Henry 1786—1860）——英國政治活動家，托利黨人，議會議員，克里木英軍狀況調查委員會委員（1855）。——第91、92頁。

德魯安·德·路易斯，愛德華（Drouyn de Lhuys, Edouard 1805—1881）——法國外交家和政治活動家，在四十年代是溫和的奧爾良保皇派；1851年後為波拿巴主義者；曾任外交部長（1848—1849、1851、1852—1855、1862—1866）。——第7、10、12、27、429頁。

摩爾拉·托馬斯（Morla, Tomás 1752—1820）——西班牙將軍，最高洪達委員，1808年站在法國占領者方面，曾任約瑟夫·波拿巴政府的陸軍和海軍大臣。——第487頁。

摩耳斯沃思，威廉（Molesworth, William 1810—1855）——英國國家活動家，自由黨人（屬於所謂梅費爾激進派），議會議員；公共工程部長官（1853

—1855）和殖民大臣（1855）。——第53、267頁。

璜二世（Juan II 1405—1454）——加斯梯里亞和累翁的國王（1406—1454）。——第455頁。

劍橋公爵，喬治·威廉·弗雷德里克·查理（Cambridge,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harles 1819—1904）——英國將軍，1854年任克里木英軍師長，後為英國陸軍總司令（1856—1895）。——第561、562、590頁。

緬施科夫，亞歷山大·謝爾蓋也維奇（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87—1869）——公爵，俄國軍事活動家 and 國家活動家，1853年任駐君士坦丁堡特使，克里木陸海軍總司令。——第23、43、76、90、96—98、163、169、171、175、176、543、545、546、549、554、556、557、562—565、574、577—581、584、594、595、600、603、624頁。

墨爾本子爵，威廉·拉姆（Melbourne, William Lamb 1779—1848）——英國國家活動家，輝格黨人，曾任內務大臣（1830—1834），首相（1834和1835—1841）。——第67、628頁。

十六 画

穆爾，喬治·亨利（Moore, George Henry 1811—1870）——愛爾蘭政治活動家，保障租佃者權利運動的領袖之一，議會議員。——第200頁。

穆尼哀，讓·約瑟夫（Mounier, Jean-Joseph 1758—1806）——法國政治活動家，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屬於代表大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了的貴族的溫和的保皇派。——第475頁。

穆薩-帕沙 (Mussa Pasha 1810 左右—1854)——土耳其將軍, 1853—1854 年任錫利斯特里亞土軍統帥。——第 299、336 頁。

穆罕默德-帕沙 (Mechmed Pasha 1810 左右—1871)——土耳其軍事活動家 and 國家活動家, 1854 年初為海軍大臣, 後為總理大臣。——第 107 頁。

穆罕默德二世 (Mechmed II 1430—1481)——土耳其蘇丹 (1451—1481)。——第 108、328 頁。

穆罕默德四世 (Mechmed IV 約 1641—1692)——土耳其蘇丹 (1648—1687)。——第 182 頁。

穆罕默德-阿利-帕沙 (Mechmed Ali Pasha 1807—1868)——土耳其軍事活動家 and 國家活動家, 1852 年—1853 年 5 月任總理大臣, 後任陸軍大臣 (1853—1854)。——第 107 頁。

霍桑, 波門特 (Hotham, Beaumont 1794—1870)——男爵, 英國將軍, 托利黨人, 後為保守黨人; 議會議員。——第 52 頁。

霍布斯, 托馬斯 (Hobbes, Thomas 1588—1679)——杰出的英國哲學家, 機械唯物主義的代表; 他的社會政治觀點具有鮮明的反民主主義的傾向。——第 53、267 頁。

霍斯福耳; 托馬斯·貝里 (Horsfall, Thomas Berry 生于 1805 年)——英國大礦主, 托利黨人, 議會議員。——第 90、91、102 頁。

霍韋利亞諾斯-伊-腊米雷斯, 加斯帕尔 (Jovellanos y Ramirez, Gaspar 1744—1811)——西班牙國家活動家, 作家、法學家和經濟學家, 十八世紀法國啟蒙學派的繼承者, 反對西班牙的封

建教權制度; 曾任司法大臣 (1797—1798), 1808—1810 年為中央洪達左翼少數派的領導者。——第 468、474—476、480、497 頁。

諾塔腊斯, 魯卡 (Notaras, Lukas 死于 1453 年)——著名的拜占庭國家活動家, 艦隊司令, 反天主教派的首領, 君士坦丁堡失陷後, 根據蘇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命令被處死。——第 108 頁。

諾福克公爵, 亨利·查理·霍華德 (Norfolk, Henry Charles Howard 1791—1856)——英國貴族, 輝格黨人。——第 9 頁。

鮑蒂揚尼·卡季米尔 (Batthyány, Kasimir 1807—1854)——伯爵, 匈牙利政治活動家, 匈牙利貴族自由派的代表,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參加者, 1849 年任革命政府外交部長; 革命失敗後流亡土耳其, 後遷居法國。——第 9 頁。

蕭, 約翰 (Shaw, John)——五十年代憲章運動活動家之一, 憲章派全國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第 126 頁。

十七 画

繆尔, 威廉 (Mure, William 1799—1860)——英國語言學家和歷史學家, 古希臘文專家; 托利黨人, 議會議員。——第 53 頁。

繆拉特, 約阿希姆 (Murat, Joachim 1767—1815)——法國元帥, 曾參加拿破侖第一的遠征, 1808 年為駐西班牙法軍總司令, 那不勒斯國王 (1808—1815)。——第 414、463 頁。

繆拉特親王, 拿破侖·律西安·沙尔 (Murat, Napoléon Lucien Charles 1803—1878)——第二共和國和第二帝

国时期的法国政治活动家，約阿希姆·繆拉特的儿子，拿破侖第三的堂兄。
——第 4、414 頁。

謝耳万(Сельван 死于 1854 年)——俄国將軍，1854 年为錫利斯特里亚俄軍指揮官。——第 300 頁。

謝里敦，理查·布林斯利(Sheridan, Richard Brinsley 1751—1816)——英国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輝格党激进派的代表。——第 408 頁。

賽义德-帕沙(Said Pasha)——土耳其將軍，1854 年为多瑙河土軍指揮官。
——第 362 頁。

十八画

薩非，阿烏利奧(Saffi, Aurelio 1819—1890)——意大利革命家和作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馬志尼的战友；曾参加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1851 年侨居英国；1872 年为意大利共和派的領導者。——第 519 頁。

薩德勒，約翰(Sadleir, John 1814—1856)——爱尔兰銀行家和政治活动家，議會中爱尔兰議員团的領袖之一，1853 年任財政副大臣。——第 10 頁。

薩米-帕沙(Sami Pasha)——土耳其国家活动家，1852—1854 年为維丁的总督。——第 338 頁。

薩比斯基，揚(Sobieski, Johann 1624—

1696)——波兰国王(1674—1696)，1683 年統率波兰和奧德联軍在維也納战胜土耳其軍隊。——第 282 頁。

薩加斯蒂，曼努埃尔(Sagasti, Manuel)——西班牙將軍，曾支持埃斯帕特罗的独裁，馬德里的总督(1843 和 1854—1855)。——第 438、513 頁。

薩拉薩尔，霍賽·阿耳安德(Salazar, José Allende 1802—1893)——西班牙將軍，屬於进步派，曾任海軍大臣(1854)。——第 414 頁。

薩尔托里烏斯，費南多·路易斯·霍賽，圣路易伯爵(Sartorius, Fernando Luis José, primer conde San-Luis 1820—1871)——西班牙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政論家，溫和派領袖之一，曾任內务大臣(1847—1851)，政府首腦(1853—1854)。——第 340、343、368、372、405、407、413、438、455、513—515、522 頁。

薩巴拉-伊-德·拉·普恩特，璜(Zabala y de la Puente, Juan 1804—1879)——西班牙將軍，屬於溫和派，曾参加 1854—1856 年資產階級革命。——第 370、372 頁。

薩拉曼卡-伊-馬伊奧尔，霍賽(Salamanca y Mayol, José 1811—1883)——西班牙政治活动家，銀行家，屬於溫和派，曾任財政大臣(1847)。——第 438 頁。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倫敦出版。——第 134、147、261 頁。
 “人民杂志”（《Boletín del pueblo》）——馬德里出版。——第 434 頁。
 “人民呼声报”（《El Clamor Público》）——馬德里出版。——第 343、433、434、513 頁。

三 画

- “士兵之友”（《Soldatenfreund》）——見“奧地利士兵之友”。

四 画

-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布魯塞爾出版。——第 229、341、343、352、353、414、521 頁。
 “天主教徒”（《El Católico》）——馬德里出版。——第 434 頁。
 “太阳报”（《The Sun》）——倫敦出版。——第 664 頁。
 “公文集”（《The Portfolio》）——倫敦出版。——第 50、649 頁。
 “世紀报”（《Le Siècle》）——巴黎出版。——第 347、440 頁。

五 画

- “北方旗帜报”（《The Northern Ensign》）

——蘇格蘭威克城出版。——第 250、251 頁。

“漢堡記者”（《Hamburger Correspondent》）——見“漢堡公正記者政治和学术日报”。

“漢諾威日报”（《Hannoversche Zeitung》）——第 223 頁。

“漢堡公正記者政治和学术日报”（《Staats und Gelehrte Zeitung des Hamburgischen unparteiischen Correspondenten》）——第 179、363 頁。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第 148、170、176、225、230、279 頁。

“东德意志邮报”（《Ost-Deutsche Post》）——維也納出版。——第 325 頁。

“民族报”（《La Nación》）——馬德里出版。——第 343、434 頁。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巴黎出版。——第 526 頁。

六 画

“先驅报”（《Herald》）——見“先驅晨报”。

“先驅报”（《El Herald》）——馬德里出版。——第 434 頁。

“先驅”（《The Leader》）——倫敦出版。——第 650 頁。

“先驅晨报”（《The Morning Herald》）——倫敦出版。——第 275、281、316、366、

- 424、594、629 頁。
-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er*》)——倫敦出版。——第 278、283、346、393、665 頁。
- “同盟報”(《*La Union*》)——馬德里出版。——第 434 頁。
- “同盟報”(《*Unionen*》)——都靈出版。——第 386 頁。
- “觀察家”(《*The Examiner*》)——倫敦出版。——第 650、651 頁。
- “觀察家時報”(《*Examiner and Times*》)——曼徹斯特出版。——第 643 頁。
- “觀察家報”(《*The Observer*》)——倫敦出版。——第 361 頁。
- “自由黨人報”(《*El Liberal*》)——馬德里出版。——第 434 頁。
- “伊比利安日報”(《*La Iberia*》)——馬德里出版。——第 434 頁。
- “西班牙報”(《*La España*》)——馬德里出版。——第 343、434、521 頁。
- “西班牙日報”(《*El Diario español*》)——馬德里出版。——第 343、434 頁。
- “米蘭官報”(《*Gazzetta Ufficiale di Milano*》)——第 57、519 頁。

七 画

-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倫敦出版。——第 12、37、201、275、529、627、628、646 頁。
- “希望”(《*La Esperanza*》)——馬德里出版。——第 434 頁。
- “進步報”(《*Journal de Progrès*》)——里斯本出版。——第 438 頁。
- “勞埃德氏報”(《*Lloyd*》)——見“維也納勞埃德氏報”。
- “勞埃德氏倫敦新聞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第

- 221、659 頁。
- “君士坦丁堡日報”(《*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第 213、524 頁。
- “時代報”(《*La Époque*》)——馬德里出版。——第 343、434、531 頁。
- “杜塞爾多夫日報”(《*Düsseldorfer Zeitung*》)——第 425 頁。
- “貝云信使報”(《*Messenger de Bayonne*》)——第 341、352、365、437 頁。

八 画

- “國民報”(《*Le National*》)——巴黎出版。——第 372 頁。
- “國民軍報”(《*El Miliciano*》)——馬德里出版。——第 434 頁。
- “國民議會報”(《*L'Assemblée nationale*》)——巴黎出版。——第 435 頁。
- “國民自衛軍報”(《*El Guardia Nacional*》)——馬德里出版。——第 434 頁。
- “阿格拉姆報”(《*Agramer Zeitung*》)——阿格拉姆(今薩格勒布)出版。——第 233、234 頁。
- “法蘭克福報”(《*Frankfurter Journal*》)——第 557 頁。
- “法蘭克福郵報”(《*Frankfurter Postzeitung*》)——第 345 頁。
- “官報”(《*Gazette*》)——見“倫敦官報”。
- “宗教、哲學、政治、科學和文學界”(《*L'Univers religieux, philosophique, politique, scientifique et littéraire*》)——巴黎出版。——第 71 頁。

九 画

- “俄國殘廢者”(《*Русский инвалид*》)——聖彼得堡出版。——第 600 頁。
- “信使報”(《*Mensajero*》)——馬德里出版。——第 434 頁。

“英国人,政治和工业周刊”(《*Englishman, a weekly political and industrial journal*》)——倫敦出版。——第49頁。

“革命回声报”(《*El Eco de la revolución*》)——馬德里出版。——第434頁。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奧格斯堡出版。——第33、72、73、231、526頁。

“总汇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巴黎出版。——第54、55、60、105、221、228、270、277、287、325、342、353、362、373、394、420、428、450、514、525、526、548、559、608頁。

“南方日报”(《*Gazette du Midi*》)——馬賽出版。——第423頁。

“南非人报”(《*De Zuid-Afrikaans*》)(《*The Zuid Afrikaans*》)——开普敦出版。——第31頁。

“柏林政治和学术問題新聞”(《*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第346頁。

“独立报”(《*La Independencia*》)——馬德里出版。——第434頁。

“政論家报”(《*El Tribuno*》)——馬德里出版。——第426、434頁。

“政治和文学辯論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巴黎出版。——第363、365、435、520頁。

“欧罗巴日报”(《*La Europa*》)——馬德里出版。——第434頁。

“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倫敦出版。——第650頁。

“施本納报”(《*Spencersche Zeitung*》)——見“柏林政治和学术問題新聞”。

“祖国报”(《*La Patrie*》)——巴黎出版。——第10、37、640頁。

“紀事报”(《*Chronicle*》)——見“紀事晨

报”。

“紀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倫敦出版。——第12、271、275、277、279、284、304、324、325、351、354、361、413、627、629、646、665頁。

“科倫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第344、427、521頁。

“軍报”(《*Le Moniteur de l'Armée*》)——巴黎出版。——第412頁。

十 画

“倫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第178、219、553、644頁。

“埃斯帕特罗派”(《*El Esparterista*》)——馬德里出版。——第434頁。

“通訊”(《*Correspondenz*》)——見“普魯士石印通訊”。

“旁观者”(《*Espectador*》)——馬德里出版。——第434頁。

“旁观者”(《*The Spectator*》)——倫敦出版。——第45頁。

“泰晤士报”(《*The Times*》)——倫敦出版。——第11、22、56、64、69、70、79、109、118、121、146、155、165、179、193、194、200、219、232、269—271、275—280、282、284、298、308、315、335、361、365、374、392、395、409、420、422—424、428—430、432、435—437、442、513、547、548、552、572、586、593、594、605、622、623、626、627、630、635、646—649、658、661、662頁。

“紐約每日論壇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第8、19、38、42、47、55、60、68、76、81、84、99、109、116、124、132、139、142、147、159、177、187、199、206、211、216、220、221、227、235、243、247、254、257、260、261、268、274、281、288、

302、309、314、323、333、339、348、359、367、374、382、394、400、408、411、419、421、426、430、434、441、446、451、453、518、524、534、535、544、550、551、553、555、559、565、571、576、580、585、593、599、606、614、619、636、655、657、663、688 頁。

“馬賽新聞”(《*Nouvelliste de Marseilles*》)——第 232 頁。

“馬德里日報”(《*Gaceta de Madrid*》)——第 340、341、351、365、372、435、465、485、508、514、522、670 頁。

十一 画

“晨報”(《*The Morning Advertiser*》)——倫敦出版。——第 46、62、128、242、279、316、357、367、647、658、659 頁。

“晨郵報”(《*The Morning Post*》)——倫敦出版。——第 102、201、219、283、284、385、620、627、628、646—649 頁。

“曼徹斯特衛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第 281 頁。

“曼徹斯特觀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見“觀察家時報”。

“都柏林晚郵報”(《*The Dublin Evening Mail*》)——第 9 頁。

“笨拙，或倫敦喧聲”(《*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第 433 頁。

十二 画

“喧聲報”(《*Le Charivari*》)——巴黎出版。——第 425、426 頁。

“街壘之聲報”(《*Clamor de las Barricadas*》)——馬德里出版。——第 512 頁。

“晚報”(《*Aftonbladet*》)——斯德哥爾摩出版。——第 527 頁。

“普魯士通訊”(《*Preussische Correspon-*

denz》)——見“普魯士石印通訊”。

“普魯士石印通訊”(《*Preussische Lith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柏林出版。——第 37、217 頁。

“最後街壘報”(《*Ultimas Barricades*》)——馬德里出版。——第 512 頁。

“閑談”雜誌(《*El Guirigay*》)——馬德里出版。——第 433 頁。

十三 画

“新聞報”(《*Las Novedades*》)——馬德里出版。——第 434 頁。

“新聞報”(《*The Press*》)——倫敦出版。——第 12、43、47、189、199、620 頁。

“新聞報”(《*Die Presse*》)——維也納出版。——第 233、325、424 頁。

“新聞報”(《*La Presse*》)——巴黎出版。——第 230、528 頁。

“新奧得報”(《*Neue Oder-Zeitung*》)——布勒斯勞(今弗羅茨拉夫)出版。——第 625、629、635、645、651、663、666 頁。

“新普魯士報”(《*Neue Preuss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 12、22、361、431 頁。

“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倫出版。——第 392 頁。

“奧格斯堡報”(《*Augsburger Zeitung*》)——見“總匯報”。

“奧地利通訊”(《*Oesterreichische Correspondenz*》)——維也納出版。——第 354、360 頁。

“奧地利士兵之友”(《*Oesterreichischer Soldatenfreund*》)——維也納出版。——第 9、345 頁。

“奧地利軍事雜誌”(《*Oestreichische militärische Zeitschrift*》)——維也納出版。

——第 485 頁。

“奧地利帝国維也納日報” (《*Oesterreichisch 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

——第 64、110 頁。

“意大利信使報” (《*Il Corriere Italiano*》)

——維也納出版。——第 325 頁。

“經濟學家” (《*The Economist*》)——倫敦

出版。——第 53、394、530、533、558、638、642 頁。

“糧食交易所快報，農業報” (《*The Mark Lane Express, Agricultural Journal*》)

——倫敦出版。——第 220、280、285 頁。

十 四 画

“維也納日報” (《*Wiener Zeitung*》)——見

“奧地利帝国維也納日報”。

“維也納醫學周刊” (《*Wi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維也納出版。——

第 306 頁。

“維也納勞埃德氏報” (《*Wiener Lloyd*》)

——第 345、346 頁。

“旗幟報” (《*The Standard*》)——倫敦出

版。——第 12 頁。

十 五 画

“論壇報” (《*Tribune*》)——見“紐約每日論壇報”。

二 十 画

“議會報” (《*Las Cortes*》)——馬德里出版。——第 512 頁。

地名索引

三 画

- 土倫——第 65、78 頁。
 土拉省——第 613 頁。
 土耳其——第 424 頁。
 土尔图凱（土特腊坎）——第 208、299、395 頁。
 大灣——第 410、411、546、553、587 頁。
 大西洋——第 6、653 頁。
 大貝耳特海峽——第 26、256、526 頁。
 万第——第 286 頁。
 士麦那(伊斯密尔)——第 214、318 頁。
 干地亚(克里特)島——第 167 頁。
 下新城省——第 613 頁。

四 画

- 巴登——第 83 頁。
 巴黎——第 8—10、38、60、63、71、77、82、95、107、108、125、126、140、159、261、286—288、351、360、372、403、424、433、510、536、542、555、607、611、644 頁。
 巴尔干——第 62、92、209、210、260、270、277、290、293、304、322 頁。
 巴士姆——第 20、34、65 頁。
 巴納特——第 37 頁。
 巴塞尔——第 519 頁。
 巴格达——第 37 頁。
 巴勒摩——第 287 頁。
 巴巴达格——在羅馬尼亞。——第 424

頁。

- 巴达霍斯——第 445 頁。
 巴耳契克——在保加利亚。——第 398、423 頁。
 巴塞罗纳——第 370、371、403、406、434、437、466、508 頁。
 巴雅澤特(多古巴雅西特)——在土耳其。——第 524 頁。
 巴扎尔吉克(道布里奇,托耳布欣)——第 208、209 頁。
 巴拉克拉瓦——第 572、574、577、580、587、588、592、593、595、601、603、623、624、662—664 頁。
 巴拉克拉瓦海灣——第 553 頁。
 巴塞罗奈塔——巴塞罗纳郊区。——第 371 頁。
 巴赫契薩賴——第 564、580、584、587、588、603、607、664 頁。
 巴尔塔利曼尼——第 331 頁。
 巴利阿里群島——第 370、499、557 頁。
 切斯特——第 53 頁。
 切塔特——第 34、39、41、79、145、169、301、311、361、602 頁。
 切納沃达——第 207、208、293 頁。
 切尔克西亚——第 258、260 頁。
 切尔尼果夫省——第 613 頁。
 切尔諾維茨(切尔諾夫策)——第 345 頁。
 比斯开——第 370、497 頁。
 比尔巴鄂——第 472 頁。

比利牛斯半島——第 267、344、368、404、
431、459、483、596、636 頁。
比利牛斯山脉——第 468 頁。
比埃罗-科里尔——第 520 頁。
日內瓦——第 519 頁。
日德兰半島——第 290 頁。
牛津——第 53 頁。
太晤士河——第 64、79 頁。
木尔西亚——第 370、499 頁。
什列斯維希——第 49、246 頁。
扎勃利亚克——第 72、234 頁。
韦利基耶魯基——第 509 頁。
文塔斯-德耳-埃斯皮里士-桑托——馬德
里附近的一个居民点。——第 341 頁。

五 画

卡法(費奧多西亚)——第 65、120 頁。
卡塔罗(科托尔)——在門的内哥罗。——
第 75 頁。
卡特希——克里木的一个居民点。——第
580 頁。
卡查河——第 546 頁。
卡尔斯——第 24、32、33、309、524 頁。
卡薩勒——意大利的要塞。——第 350
頁。
卡勒特——第 352 頁。
卡耳恩——第 53 頁。
卡卢加——第 592 頁。
卡卢加省——第 613 頁。
卡緬茨——第 325 頁。
卡塔黑納——第 370、467 頁。
卡茨巴赫(卡查瓦)——西里西亚的河流。
——第 564、592 頁。
卡腊卡耳——第 311 頁。
卡腊苏河——第 208、294 頁。
卡拉腊什(克勒腊希)——第 207、293、
298、396 頁。

卡拉法特——第 25、34—36、39—41、43、
66、79—81、144—147、169、207、210、
221、307、395、397、399、573、624、663
頁。
卡瓦丹加——在西班牙。——第 489 頁。
卡斯提奥涅——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
——第 562 頁。
卡塔卢尼亚——第 365、370、371、414、
437、456、499、530 頁。
卡兰亭灣——第 575 頁。
卡姆契克河(卡姆契亚河)——第 293 頁。
卡内里群島——第 473 頁。
卡尔斯克倫納——在瑞典。——第 425
頁。
卡特加特海峽——第 308 頁。
布倫——第 356、542、550、552、556、574
頁。
布累——第 286 頁。
布哈拉——第 123、639 頁。
布格河(南布格河)——第 144、569、609
頁。
布格河(西布格河)——第 613 頁。
布勒斯特——在法国。——第 70、78、
256 頁。
布尔果斯——第 370、471、472 頁。
布魯塞尔——第 63、352 頁。
布隆采耳——第 326 頁。
布柯維納——第 338 頁。
布澤烏河——第 338、420 頁。
布尔留克——第 561 頁。
布来洛夫(布来拉)——第 144、146、147、
293、325、350、527 頁。
布加勒斯特——第 39—41、66、80、81、
118、207、223、293、294、305、306、315、
325、331、332、350、361、362、412、422、
428、529、548、551—557、624、641 頁。
布列斯托瓦茨——第 428 頁。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布列斯特)——第
570、612 頁。

圣莫里斯——第 350 頁。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 6、8、21、35、
37、38、62、69、70、77、103、106、149、
151、155、163、165、172、190、191、194、
204、234、312、315、321、379、440、526、
557、558、569、570、673 頁。

圣奥梅尔——在法国。——第 256 頁。

圣尼古拉(舍夫卡捷尔)——碼頭和炮台。
——第 24、32、107、309、446 頁。

圣海倫島——第 173 頁。

圣塞瓦斯田——第 370、445、466 頁。

圣瑪丽亚港——第 506 頁。

加来——第 349、366、373 頁。

加拉茲——第 147、293、413、423 頁。

加埃塔——第 351 頁。

加迪斯——第 404、430、467、473、482、
489、495、496、499、502、505—507、669
頁。

加利西亚——第 432、466、480、481、486、
499、508、671 頁。

加里西亚——第 104、113、270、338、420、
536、609、614 頁。

加特契納——第 43 頁。

加利波利(格利博卢)——第 219、259、
266、275、276、307、535、541、632、633
頁。

加利福尼亚——第 643、653 頁。

加斯梯里亞——第 340、370、456—461、
466、468、473、478、494—496 頁。

尼什——在塞爾維亞。——第 202 頁。

尼門河——第 472 頁。

尼泊爾——第 124 頁。

尼克希奇——在門的內哥羅。——第 234
頁。

尼科波尔——在羅馬尼亞。——第 144

頁。

尼古拉也夫——第 603、609、664 頁。

瓦尔那——第 199、209、210、218、260、
276、290、299、304、307、356、362、374、
378、388、392、397、398、409、423、446、
524、536—541、543、548、553、563、565、
574、632、633 頁。

瓦拉几亞——第 7、11、25、39、41、51、57、
65、73、79、88、90、98、103、118、120、
140、143、146、167、171、176、190、207、
221、244、270、276—278、293、294、297、
303—305、310—313、319、322、325—
332、344、347—349、353、354、356、360、
361、376、379、380、383—385、388、389、
391、397、413、420—423、428、429、432、
523、524、527、529、530、535、539、555、
602、641、654、655 頁。

瓦倫西亞——第 352、365、370、404、414、
437、466、467、482、487、499、501、504、
508、511、515 頁。

印度——第 26、263、266、630、631 頁。

印度河——第 266、399 頁。

印度斯坦——半島。——第 639 頁。

北海——第 49 頁。

北明翰——第 280、283、284、645 頁。

弗雷特什提——第 362、363、574 頁。

弗里德兰德(普拉夫丁斯克)——第 612
頁。

弗雷德里西亞——在丹麥。——第 290
頁。

弗拉基高加索(奧爾忠尼啟澤)——第
25 頁。

叶尼卡列——見刻赤。

叶夫帕托利亞——第 542、663、664 頁。

皮阿琴察——第 82 頁。

皮列柯普——第 120、446、554、564、606、
664 頁。

古巴島——第 426、432 頁。
 古斯塔夫斯維恩——第 255、526 頁。
 瓜斯塔拉——在意大利。——第 82 頁。
 瓜的亞納河——第 352 頁。
 漢堡——第 325、440、450、526 頁。
 汉古特(汉科)——第 255、526 頁。
 白海——第 373、389、424、568、569 頁。
 白金汉郡——第 53、54 頁。
 包岑——在薩克森。——第 564 頁。
 龙达——第 507 頁。
 东印度——第 621、638 頁。
 本德雷——第 607 頁。
 旧要塞——即旧堡。——第 542、546、549、553、578 頁。

六 画

托勒多——第 351 頁。
 托洛薩——第 370 頁。
 托列杭(托列杭-德尔-雷)——第 372、404 頁。
 托斯卡納——第 351 頁。
 托尔托薩——第 437 頁。
 托列洛巴頓——第 460 頁。
 托列斯-維德拉斯(托列洽-維德拉什)——在葡萄牙。——第 145 頁。
 托尔特西利亚斯(托尔塔列斯-德-埃斯格瓦)——第 460 頁。
 伊魯薩——希臘的省。——第 120 頁。
 伊万城——第 570 頁。
 伊薩克查——第 325 頁。
 伊皮羅斯——第 108、141、233 頁。
 伊茲馬伊尔——第 293、609 頁。
 伊斯坦布尔——見君士坦丁堡。
 伊奧尼亞群島——第 108、140 頁。
 西罗——第 520 頁。
 西藏——第 123、124 頁。
 西印度——第 645 頁。

西諾普——第 10—12、22、23、28、33、44、65、86、90、98、107、258、381、389、611 頁。
 西西里島——第 351 頁。
 西斯托夫(斯維施托夫)——第 74 頁。
 亞波(土尔庫)——第 527 頁。
 亞尼納——第 121 頁。
 亚历山大里亞——第 350 頁。
 亚历山大罗波尔(列宁納坎)——第 24、32 頁。
 列里达——第 370、437 頁。
 列維里(塔林)——第 568、569、608 頁。
 列尼亚哥——在意大利。——第 209 頁。
 列加涅斯——第 369 頁。
 列杜特-卡列——高加索海岸要塞。——第 258 頁。
 安達魯西亞——第 351、365、370、373、414、466、507 頁。
 安德羅斯島——第 218 頁。
 安那托里亞——第 167、524 頁。
 安吉阿尔-斯凱萊西——第 28、57、320 頁。
 艾頓——在土耳其。——第 524 頁。
 艾阿庫裘——第 402 頁。
 艾爾斯貝里——第 53 頁。
 達里安灣——在中美洲。——第 461 頁。
 達達尼爾海峽——第 48、105、118、318、430、535、647、651 頁。
 达尔雅尔峽谷——第 309 頁。
 多瑙河——第 7、25、35、39—41、43、50、57、79—81、91、122、143—145、147、207—210、242、255、270、276、290、293—296、298、301、302、304、305、312、319、322、325、332、334、335、337、338、350、362、363、376、383、388、389、395—398、421、422、429、525、527、535、539、556、606、609、610、641、642、648、650、

651、655 頁。
 多布魯甲——第 200、207、208、210、221、
 290、293、294、299、306、325、327、349、
 350、389、396、397、424、539、540、555
 頁。
 多瑙河各公国——見莫尔达維亞和瓦拉
 几亞。
 色雷斯——第 167 頁。
 色雷斯的赫尔松涅斯（加利波利半島）
 ——第 119、259、535 頁。
 伐耳赫倫島——第 544 頁。
 伐利亞多利德——第 370、459、467 頁。
 乔宾——在倫敦附近。——第 265 頁。
 华沙——第 8、57、79、424、446、569、570
 頁。
 地中海——第 103、317 頁。
 匈牙利——第 4、7、57、104、114—116、
 202、205、215、270、282、364、380、424、
 614—616 頁。
 朴次茅斯——第 52 頁。
 因克尔芒——第 574、594—596、599—
 601、604、607、624、625 頁。
 吉普斯科阿——第 371 頁。

七 画

貝云——第 370、463、466、513、514 頁。
 貝耳島——比斯开灣的島嶼。——第 559
 頁。
 貝凱普——第 416 頁。
 貝科茲——第 3、65、200 頁。
 貝捷克灣（貝希克灣）——在愛琴海。——
 第 88 頁。
 貝爾格萊德——第 26、35、202、217、355、
 385、428 頁。
 貝爾貝克河——第 553 頁。
 貝斯特里察——第 446 頁。
 貝薩拉比亞——第 143、147、294、319、

339、422、527、555、602、608、609 頁。
 克里木——第 5、21、119、258、308、312、
 315、319、380、381、422—424、536、541、
 542、545、551—555、558、566、568、570、
 572、573、578、579、599、600、602—606、
 608、630、633—635、661、662、664 頁。
 克勒迪頓——第 10 頁。
 克拉科夫——第 113、242、349 頁。
 克羅地亞——第 118、167 頁。
 克拉約瓦——第 25、34、66、145 頁。
 克魯謝伐茨——在塞爾維亞。——第 202
 頁。
 克魯格廉尼——第 412 頁。
 沃溫——在蘇格蘭。——第 253 頁。
 沃倫（沃倫省）——第 338、569、613 頁。
 沃尔塔——在意大利。——第 350 頁。
 沃尔肖伐——第 325 頁。
 沃龍涅什省——第 613 頁。
 沃耳特尼察——第 3、39、40、80、99、145、
 169、207、208、294、311、361、362、395、
 412、555、573、589、624 頁。
 苏阿索——第 506 頁。
 蘇格蘭——第 53、54、129、242、249 頁。
 蘇黎世——第 519 頁。
 苏姆拉（科拉罗夫格勒）——第 40、80、
 209、210、290、293、294、299、306、307、
 322、337、362 頁。
 苏胡姆-卡列——第 258 頁。
 蘇利納河口——在多瑙河三角洲。——第
 350、363、424、655 頁。
 里子——第 126、644 頁。
 里加——第 6、440 頁。
 里昂——第 364 頁。
 里海——第 309、568 頁。
 里斯本——第 433、455、513 頁。
 利尼——在比利時。——第 539 頁。
 利物浦——第 102、550、599、621 頁。

利伏諾——第 552 頁。
 利特里姆——第 53 頁。
 希瓦——第 59、123 頁。
 希布拉克——多瑙河的島嶼。——第 299 頁。
 希尔索瓦(希尔朔瓦)——第 39、41、80、208、294、396 頁。
 麦茨——第 66、83、84 頁。
 麦哈提亚——第 202 頁。
 伯克郡——第 52、54 頁。
 伯尔尼——第 519 頁。
 但澤(格但斯克)——第 280、338、440、570 頁。
 杜恩——在苏格兰。——第 250 頁。
 吕特岑——在薩克森。——第 564 頁。
 那不勒斯——第 83、351、365、552 頁。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 3、10、12、26—29、37、38、41、48、57、65、66、70、71、74、75、90、95、96、100、106—108、117、119、120、143、147、154、161、163、167、169、175、180、185、186、190、200、211、214、217—219、221、222、229、231、260、275、307、320、322、331、332、349、354、363、383、388、397、421、423、428、433、515、525、526、536、541、548、549、553、555、556、574、610、623、632、639、657 頁。
 辛費罗波尔——第 557、580、608、623、663 頁。

八 画

阿拉丁——第 541 頁。
 阿拉斯——第 66 頁。
 阿維拉——第 460 頁。
 阿魯拉——第 352、365 頁。
 阿尔馬——克里木的一个村庄。——第 561 頁。

阿尔馬河——第 545—549、551、552、554、556、557、560、561、565、566、572、579、581、583、586、587、592、593、603、623 頁。
 阿尔塔——第 121、212 頁。
 阿納帕——第 258、363、390、409、423、554、564 頁。
 阿腊貢——第 365、370、404、437、456、494 頁。
 阿尔达汉——第 24、32 頁。
 阿拉伯堡——炮台。——第 298—302、335—338、443、539 頁。
 阿兰惠斯——第 343、438、473、501、531 頁。
 阿速夫海——第 5、21、119、373、648 頁。
 阿兰群島——第 201、409、442、450、451、549 頁。
 阿利康特——第 370 頁。
 阿耳梅达——第 514 頁。
 阿留塔河(奥尔特河)——第 35、361、384 頁。
 阿雷基帕——在玻利維亞。——第 402 頁。
 阿倫德耳——第 53 頁。
 阿迪杰河——第 209 頁。
 阿尔科斯(阿尔科斯-德-拉-弗隆特拉)——第 506 頁。
 阿尔及尔——第 70 頁。
 阿尔及利亚——第 66、399 頁。
 阿尔明尼亚——第 24、32 頁。
 阿尔巴尼亚——第 107、118、121、167、218、234 頁。
 阿耳巴塞特——第 404 頁。
 阿耳布埃拉——第 596 頁。
 阿特拉斯山——第 563 頁。
 阿布魯威山(阿布魯威亞平宁山脉)——第 351 頁。

- 阿德腊米提(埃德勒米特)——第 317 頁。
 阿德里安堡(爱德尔納)——第 28、119、
 147、276、296、307、318—321、329、376、
 651 頁。
 阿德里安堡平原——第 166 頁。
 阿姆斯特丹——第 305、324 頁。
 阿尔哲什河——第 412 頁。
 阿哈尔齐赫——第 24、32 頁。
 阿斯土里亚——第 463、466、480、481、
 486、497、520 頁。
 阿斯特拉罕——第 569 頁。
 阿卡尔納尼亞——希腊的省。——第 120
 頁。
 阿耳黑西腊斯——第 507、515 頁。
 阿尔卑斯山脉——第 8、301、610 頁。
 阿尔汉格尔斯克——第 281 頁。
 阿耳卡拉-德-埃納雷斯——第 324 頁。
 羅馬——第 8 頁。
 羅曼——第 325 頁。
 羅茲島——第 524 頁。
 羅多斯托(特基尔达)——第 118、119、
 122 頁。
 羅克魯阿——在法国。——第 625 頁。
 羅契得尔——第 53 頁。
 羅斯托克——第 280 頁。
 羅德里哥城——第 445、467、486 頁。
 羅瑟土姆山口(土尔努-羅舒)——第 325
 頁。
 波托西——在玻利維亞。——第 402 頁。
 波茲南——第 270、614 頁。
 波尔多——第 351 頁。
 波多利亞——第 325、338、569、613 頁。
 波斯尼亞——第 118、120、167、641 頁。
 波罗的海——第 5—8、21、49、103、189、
 256、257、261、308、348、350、356、363、
 376、377、389、391、392、415、527、552、
 568、569、673、674 頁。
 波尔塔瓦——第 612 頁。
 波尔塔瓦省——第 613 頁。
 波索布郎科——第 365 頁。
 拉索瓦——第 295 頁。
 拉巴斯——在玻利維亞。——第 402 頁。
 拉曼彻——第 364、373、406、508 頁。
 拉科魯尼亞——第 471、481、510 頁。
 拉卡罗利納——第 365、467 頁。
 拉芒什海峽——第 6、38、308 頁。
 拉斯-卡貝薩斯-德-聖璜——第 506 頁。
 芬蘭——第 6、7、21、27、255、257、299、
 308、319、440、568、570 頁。
 芬蘭灣——第 255、526、673 頁。
 芬宁(芬)——島嶼。——第 466、471 頁。
 帕尔馬——第 82、386 頁。
 帕特訥——第 286 頁。
 帕維亞——第 519 頁。
 迭夫尼亞——第 388、541 頁。
 迭夫年斯卡河——第 293、539、540 頁。
 刻赤——第 564 頁。
 刻赤海峽——第 65 頁。
 佩斯——匈牙利首都,現在布达佩斯的左
 岸部分。——第 8 頁。
 佩特郡——第 53 頁。
 金角——港灣。——第 48 頁。
 昆卡——第 365、372 頁。
 林肯郡——第 54 頁。
 肯皮納——第 325 頁。
 明斯克省——第 613 頁。
 直布罗陀——第 308 頁。
 居斯坦杰(康斯坦察)——第 207、208、
 293、305、423、540 頁。
 松德海峽(厄勒海峽)——第 26、49、427
 頁。
 图拉真垒牆——第 208、210、294、325 頁。
 帖姆勃列克——第 352 頁。
 的里雅斯特——第 520 頁。

舍夫卡捷尔——見圣尼古拉炮台。
 門的内哥罗——第 72—74、120、151、
 168、176、398 頁。
 奇申格尔棱堡——在錫利斯特里亚。——
 第 298 頁。
 庞特弗拉克特——第 53 頁。

九 画

科倫——第 427 頁。
 科馬雷——克里木的一个居民点。——第
 588 頁。
 科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第 233、440
 頁。
 科尔貝克(科洛布热克)——第 338、440
 頁。
 科多尼約——第 350 頁。
 科恰班巴——在玻利維亞。——第 402
 頁。
 哈安——第 370、373、467、557 頁。
 哈提瓦——第 352 頁。
 哈瓦那——第 514 頁。
 哈特福郡——第 53 頁。
 哈里法克斯——在加拿大。——第 550、
 565 頁。
 哈里法克斯——在英国。——第 416 頁。
 威特——第 372 頁。
 威特比——第 53 頁。
 威尔士——第 54、219、621 頁。
 威斯特貝里——第 53 頁。
 威斯特米特——第 53 頁。
 施拉瓦——第 412 頁。
 施特廷(茲杰辛)——第 280 頁。
 施梯里亚——第 617 頁。
 施塔尔萊因——在奧地利。——第 111
 頁。
 施維訥認德(施維諾威西策)——第 440
 頁。

南特——第 286 頁。
 南威克——第 53 頁。
 南安普頓——第 356 頁。
 保加利亚——第 118、167、232、270、276
 —278、305、384、397、399、536、540、
 602、641 頁。
 保加利亚高原——第 297 頁。
 耶拿——第 7、64、594、595、624 頁。
 耶路撒冷——第 11、96、183—187 頁。
 約克郡——第 52 頁。
 約薩法特河——第 186 頁。
 美格定茨(美赫定茨)——第 347、348 頁。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 111、325 頁。
 拜兰——第 471、472 頁。
 拜达尔盆地——第 573、574、603 頁。
 柏林——第 37、38、64、158、201—204、
 325、346、361、427 頁。
 軍港——第 576 頁。
 叙利亚——第 183 頁。
 突尼斯——第 168 頁。
 信德省——在巴基斯坦。——第 638 頁。
 郎卡郡——第 47、54、656、687 頁。
 契切斯特——第 53 頁。
 查尔卡斯——在玻利維亞。——第 402
 頁。
 品都斯山脉——在巴尔干半島。——第
 140 頁。
 洛格罗尼奧——第 406、557 頁。

十 画

埃及——第 167、296 頁。
 埃劳——見普略西什-埃劳。
 埃內茲——第 118、119、122、535 頁。
 埃內茲灣——第 317 頁。
 埃托利亚——希腊的省。——第 120 頁。
 埃尔斯倫(埃爾祖魯姆)——第 37 頁。
 埃格里波(卡尔基斯)——第 120 頁。

- 埃維厄島——第 120、216 頁。
- 埃布罗河——第 472 頁。
- 埃克恩弗尔德——第 246 頁。
- 埃斯特勒馬杜腊——第 351 頁。
- 格利納——布加勒斯特附近的一个居民点。——第 412 頁。
- 格蒙登——在奥地利。——第 111 頁。
- 格拉納达——第 370、456、467、472、502 頁。
- 格魯吉亞——第 308 頁。
- 格拉斯哥——第 53、251、253、351 頁。
- 格罗德諾省——第 613 頁。
- 格里姆斯比——苏格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52 頁。
- 格腊納土拉——第 406 頁。
- 格拉克列亞高地——在克里木。——第 587、588、590 頁。
- 格拉克列亞的赫爾松涅斯——第 587、634、663 頁。
- 特雷維佐——第 520 頁。
- 特里卡拉——第 218 頁。
- 特薩利亞——第 108、118、140、141、167、218、233 頁。
- 特拉皮亞(塔拉比亞)——第 525 頁。
- 特魯韋耳——第 404 頁。
- 特果維希特——第 207 頁。
- 特拉比曾德(特拉布松)——第 10、107 頁。
- 特兰西瓦尼亞——第 57、115、146、260、420、536、609 頁。
- 特兰西瓦尼亞阿尔卑斯山脉——第 350 頁。
- 馬賽——第 348、363 頁。
- 馬德里——第 123、324、340—343、351、352、364、365、368—372、404、405、407、413、414、431—434、438、439、455、456、463、466、467、469、471—475、479、487、497、502、505、507、508、511—513、515、516、520、522、530、669 頁。
- 馬其頓——第 108、167 頁。
- 馬拉加——第 438、507、557 頁。
- 馬爾他島——第 65、79 頁。
- 馬里乍河——第 118 頁。
- 馬爾馬拉海——第 48、119 頁。
- 馬斯特沙克——土耳其的省。——第 524 頁。
- 馬利奧爾卡島——第 511 頁。
- 愛丁堡——第 53 頁。
- 愛爾蘭——第 53、54、66、70、129、242、243、249 頁。
- 愛爾福特——第 473 頁。
- 紐里——在愛爾蘭。——第 12 頁。
- 紐約——第 550 頁。
- 紐卡斯尔-安德-萊恩——第 53 頁。
- 倫敦——第 29、30、58、63、77、82、100、107、108、111、125、126、133、134、136、140、146、149、150、159、164、171、194、275、285、286、314、317、324、356、360、362、366、389、405、536、548、553、594、599、611、620、621、651 頁。
- 倫巴第——第 114、116、351、386 頁。
- 倫弗魯郡——苏格兰的一个郡。——第 53 頁。
- 納爾瓦——第 601、625 頁。
- 納瓦腊——第 370、486、495—497、510 頁。
- 納瓦林(皮洛斯)——第 92、212 頁。
- 索拉——在意大利。——第 351 頁。
- 索非亞——第 40、202 頁。
- 索勃拉尔貝——西班牙山区。——第 489、494 頁。
- 烏特雷腊——第 506 頁。
- 烏爾濟琴——第 412 頁。
- 烏列什提——羅馬尼亞的一个居民点。

——第 412 頁。
 桑河——第 338 頁。
 桑卢卡尔(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第 467 頁。
 泰尔(苏尔)——在土耳其帝国。——第 524 頁。
 泰梅希山口(普雷迪亚耳)——在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第 350 頁。
 席尔河(日伊烏河)——第 35 頁。
 席尔涅斯——第 79 頁。
 庫尔迪斯坦——第 24、303 頁。
 庫楚克-凱納吉(凱納吉)——第 28、95、183 頁。
 哥多瓦——第 507 頁。
 哥本哈根——第 26、49、64、415、425、441、526 頁。
 涅瓦河——第 673 頁。
 涅格罗庞特——見埃維厄島。
 班堡——第 360 頁。
 貢比臬——第 463 頁。
 高加索——第 5、25、33、308、319、554、568、570 頁。
 俾路支——第 639 頁。
 热那亚——第 386 頁。
 敖德薩——第 5—7、21、23、24、33、34、49、119、144、147、200、228—230、236、244、245、247、249、255、260、279、349、378、389、527、602、641、664 頁。
 旁遮普——第 638 頁。
 朗格雷奧——第 520 頁。
 茹尔日沃(朱尔朱)——第 43、293、294、315、325、350、362、363、397、422 頁。
 海尔曼施塔特(錫比烏)——第 373 頁。

十 一 画

莫契納——第 412 頁。
 莫尔頓——第 53 頁。

莫德林(諾沃格奧尔基也夫斯克)——第 570 頁。
 莫斯科——第 78、144、570、592、612、613 頁。
 莫斯科省——第 613 頁。
 莫吉廖夫——第 612 頁。
 莫吉廖夫省——第 613 頁。
 莫尔达維亞(莫尔多瓦)——第 7、11、51、57、73、79、88、90、98、103、118、120、143、167、171、176、190、244、270、276—278、305、310—313、319、322、325—332、338、339、347、349、350、353、360、376—379、380、383—385、389、391、397、420—423、428、429、523、524、527、530、539、602、609、641、654、655 頁。
 基輔——第 610 頁。
 基輔省——第 613 頁。
 基什涅夫——第 7 頁。
 基德里亞島(伊德拉島)——第 218 頁。
 曼成——第 25、43、325、326、396、527 頁。
 曼都亞——第 351 頁。
 曼彻斯特——第 8、47、50、68、125、134、136、280、284、324、645 頁。
 曼薩那累斯——第 364、426 頁。
 康太斯灣(沃尔法尼灣)——第 121 頁。
 康士坦丁角——第 411 頁。
 累翁島——第 370、430、483、487、489、499、506、507、511 頁。
 累夫里哈——第 506 頁。
 都灵——第 82、433 頁。
 都柏林——第 46 頁。
 梯弗里斯(梯比里斯)——第 24、32、309、311、527 頁。
 梯維尔頓——第 52 頁。
 蛇島——第 525 頁。
 梁贊省——第 613 頁。
 勒阿耳城——第 352、364 頁。

設菲尔德——第 282 頁。
 措尔恩多夫——第 579 頁。
 崩采耳維茨(列格尼茨凱地区)——在西里西亞。——第 145 頁。
 密多塞克斯——第 54 頁。

十二画

斯來果——第 201 頁。
 斯泰福郡——第 54、645 頁。
 斯塔提腊——第 361 頁。
 斯拉廷納——第 412 頁。
 斯庫塔里——第 118、259、275、308、541、623、632、633 頁。
 斯德哥尔摩——第 26、201、440 頁。
 斯特拉斯堡——第 66、83、84 頁。
 斯摩梭斯克——第 612、613 頁。
 斯摩梭斯克省——第 613 頁。
 斯洛博德捷亞(斯洛博德集亞)——第 325 頁。
 斯維阿波尔格(苏奧緬林納)——第 308、552 頁。
 斯托克波尔特——第 125 頁。
 斯特腊特卡隆——在蘇格蘭。——第 252、253 頁。
 博德明——第 53 頁。
 博托夏尼——第 325 頁。
 博羅迪諾——第 579 頁。
 博尔諾斯——第 506 頁。
 博恩霍尔姆——第 37 頁。
 博馬尔松德——第 350、391、409、410、440、442—451、526、543、582、583、661 頁。
 博斯普魯斯海峽——第 48、99、106、118、119、200、307、525、526、536、549、641 頁。
 普魯特河——第 144、147、278、311、315、325、331、332、420 頁。
 普罗凡斯——第 459 頁。
 普里埃果——第 669 頁。
 普雷斯頓——第 254、687 頁。
 普洛耶什特——第 325 頁。
 普略西什-埃勞(巴格腊提奧諾夫斯克)——第 579、601、612 頁。
 普斯特拉尔佐——第 351 頁。
 黑山——在克里木。——第 573 頁。
 黑河——第 546、574、579—581、587、588、592、595、600、607、608 頁。
 黑海——第 3—7、12、20、21、24、27、34、35、37、80、93、99、106、117—119、199、207、210、256、258、290、305、308、311、312、348、373、376、377、389、409、423、424、525、568、599、605、641、647、648 頁。
 黑森——第 83 頁。
 黑塞哥維那——第 118、167、234 頁。
 雅西——第 222、325、330、336、641 頁。
 雅典——第 121、212、249、271、523、559 頁。
 雅洛米察河——第 294、350、412 頁。
 雅罗斯拉夫里省——第 613 頁。
 喀布尔——第 123 頁。
 喀琅施塔得——第 6、22、104、308、314、348、349、356、391、409、552、673—679 頁。
 喀尔巴阡山脉——第 333、384 頁。
 提尔西特(苏維埃斯克)——第 465 頁。
 提諾斯島——在愛琴海。——第 218 頁。
 萊茵河——第 8、610、612 頁。
 萊斯特郡——第 54 頁。
 菲律賓——第 408、514 頁。
 菲盖腊斯——第 466、530 頁。
 凱恩——第 109 頁。
 費拉拉——第 385 頁。
 腊茲格腊特——第 208、336 頁。

喜馬拉雅山脉——第 124 頁。

十三画

奥尔丹——第 53 頁。

奥斯澤——第 111 頁。

奥得河——第 472 頁。

奥里繆茨(奥洛摩茨)——第 64 頁。

奥尔斯脫——第 12 頁。

奥查科夫——第 446 頁。

奥涅加河——第 424 頁。

奥維耶多——第 469、480、481、520 頁。

奥康尼亚——第 485、508 頁。

奥苏尔盖特——第 309 頁。

奥斯特利茨(斯拉夫科夫)——第 601、607 頁。

塞維尔——第 370、373、403、404、469、470、472、473、480、483、487、501、530、670 頁。

塞尔維亚——第 7、26、35、39、108、120、140、167、207、217、354—356、385、428、429、641 頁。

塞勒特河——第 147、293、304、305、311、335、383、396 頁。

塞瓦斯托波尔——第 3—7、20、21、23、25、34、49、104、107、119、200、299、247、249、258、260、289、308、312、314、315、348、349、378、380、381、386、387、389—391、398、409—411、423、446、535、542、543、545—554、556、557、564—566、570—587、597、599—601、603、604、607、608、623、624、626、661—663、675 頁。

卡兰亭炮台——第 575、582、584 頁。

北区——第 553、603、663 頁。

北炮台——即北堡。——第 543、546、572、607、623、624 頁。

电报局炮台——第 582 頁。

亚历山大罗夫炮台——第 582 頁。

南区——第 410、584 頁。

康士坦丁炮台——第 549、582 頁。

塞瓦斯托波尔灣——見大灣。

塔干罗格——第 641 頁。

塔腊果納——第 370 頁。

雷烏斯——第 365 頁。

雷特沃尔德——第 52 頁。

頓河——第 399 頁。

瑟堡——第 675 頁。

滑铁卢——第 173、263、539、548、555、636 頁。

福克夏尼——第 293、350、384、412 頁。

楓丹白露——第 456、463 頁。

十四画

維丁——第 40、41、118、144、202、338 頁。

維也納——第 5、21、27、35—38、57、62、64、70、72、76、106、110、111、171、173、204、221、242、283、312、323、344、345、355、360—364、384、515、646、648 頁。

維罗那——第 145、209、350、430、489、562 頁。

維尔諾(維尔紐斯)——第 612 頁。

維尔騰堡——第 83 頁。

維多利亞——第 200 頁。

維多利亞——在澳大利亚。——第 370、371 頁。

維斯拉河——第 569、570 頁。

維卡耳瓦罗——第 341、342、512 頁。

維利雅拉尔(利布罗斯)——第 460 頁。

維切布斯克——第 612 頁。

赫罗纳——第 370 頁。

赫尔松——第 119、422、603、609、664 頁。

赫雷斯(赫雷斯-迪-拉-弗隆特拉)——第 506 頁。

赫尔幸福斯(赫尔辛基)——第 409 頁。

赫尔松涅斯角——第 553 頁。

滿洲——第 124 頁。
魁北克——在加拿大。——第 219 頁。
蒙特卡西諾——意大利的一個居民點。
——第 351 頁。

十五画

德黑蘭——第 10、26、37 頁。
德維納河——第 612 頁。
德洛尼亞——希臘的省。——第 120 頁。
德涅泊河——第 610、612 頁。
德尼茲利——在土耳其。——第 524 頁。
德涅斯特爾河——第 208、338、399、539、
569、608、613 頁。
德斯佩尼亞斯佩羅斯——第 365 頁。
撒丁島——第 351 頁。
撒哈拉——大沙漠。——第 540 頁。
摩地那——第 82、386 頁。
摩勒納山——第 365、507 頁。
魯舒克(魯塞)——第 39、80、208、209、
293、307、362、374、396、397、422、555
頁。
魯美利亞——第 118、120 頁。
潘普洛納——第 370、466、502、508、510
頁。

十六画

諾定昂——第 659 頁。

諾塔列爾頓——第 53 頁。
諾依達爾特——蘇格蘭的一個居民點。
——第 250 頁。
錫羅斯島——在愛琴海。——第 218 頁。
錫利斯特里亞(錫利斯特賸)——第 41、
207—209、276、277、284、289、290、293
—312、315、322、325、334—338、361、
390、395、396、398、421、446、536、539、
543、548、555、573、589、597、601、602、
624、647、663 頁。
霍亭——第 7、569 頁。
默麥爾(克萊彼達)——第 440 頁。
賴伊——第 53 頁。

十七画

戴文郡——第 10 頁。

十八画

薩瓦——第 83、350 頁。
薩塞克斯——第 54 頁。
薩拉哥沙——第 324、370—372、437、
455、471、476、508、515、523 頁。
薩羅斯灣——第 317 頁。
薩拉芒卡——第 502 頁。
薩羅尼加灣——第 121 頁。